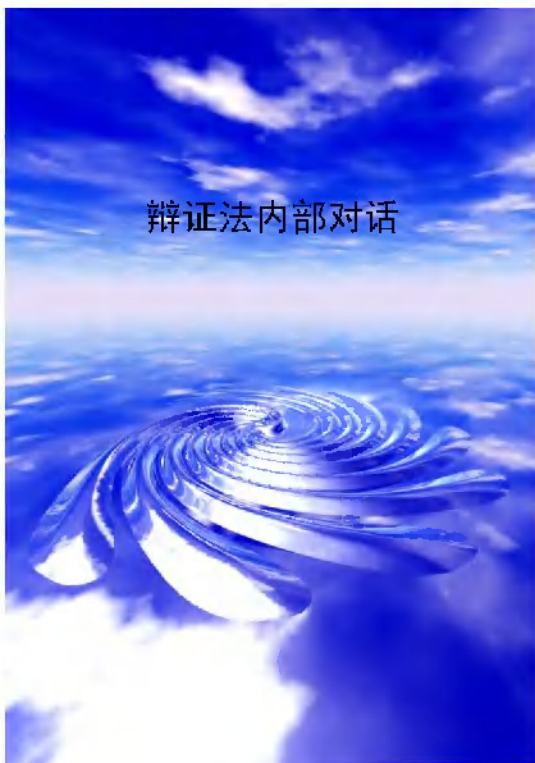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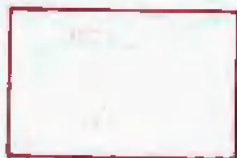


辩证法内部对话





204460243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

Norman Levine

Lodon George Allen & Unwin

First Published in 1984

据乔治·艾伦和昂温股份有限公司伦敦1984年版本译出

云南人民出版社

[美] 诺曼·莱文 著

张 翼 星
黄 振 定 译
邹 邰 溱

B712
3

4460243

责任编辑：杨云宝

封面设计：袁亚雄

辩证法内部对话

[美] 诺曼·莱文 著

张翼星 等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5 字数：430000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2-02183-3/B·100 定价：26.6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1997—002号

序 言

黄楠森

诺曼·莱文是当代美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著有多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有根本分歧的观点在国际上很有名,对我国理论界也有很大影响,《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集中论证了这一观点。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的关系问题,或者扩大一点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问题,历来存在着意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共同创立的,二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创造,马克思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有的人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实践本体论。作者把第一种观点叫做基本一致观点,把第二种观点叫做基本分离观点,把持不同观点的人叫做基本一致派和基本分离派。正如莱文所指出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向恩格斯挑战,主张恢复马克思的本来面貌,一次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挑战,另一次是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七八十年代可以说出现了第三次挑战,即范围更广泛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挑战,莱文正是这次挑战的一个代表,而他的《辩证法内部对话》可以说是这次挑战的一部代表作。这本书根据作者对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分析,阐明了作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00 多年来的发展过程,论证了作者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则分歧的观点。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哲学上有些什么原则分歧呢？作者在《前言》中首先作了简要的概括，然后在正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证。

作者主要谈到了四个区别，一是马克思把辩证法看成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人类行动的指南，而恩格斯则把辩证法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承认自然辩证法。二是马克思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而恩格斯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理解不同，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哲学是不可分割的东西，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即关于行动的方法和理论，但没有接受他的唯心主义（作者这里似乎有点自相矛盾），而恩格斯则继承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方面，虽然也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作者从这里引伸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第四点原则分歧：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是主张人类对于赖以生产其生存条件的生产方式的需要先于人类的其他需要，即社会存在先于一切思维方式和经验活动；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则认为有形物体独立于人而存在并为外在于人类的规律所支配。作者申明这两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并不互相排斥，但由于它们在某些思想体系中占有不同份量，这些思想体系就大异其趣了。从这些区别中，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点说是马克思学说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因此，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那么，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宇宙观（含自然观）、方法论（按一般理解，即辩证法，但一般还认为辩证法不仅是方法，还是宇宙观的一部分）和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是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哲学修改和歪曲的结果。其间主要的不同之处莱文虽然谈了四点，实际有二：一是马克思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创立

的。二是马克思当然有辩证法,但他的辩证法只是方法,即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人类行动的指南,而恩格斯却把它看成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即宇宙观的一部分,搞所谓“自然辩证法”,这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什么客观历史规律的反映,而是社会分析方法。经过近 10 多年的研究和讨论,我国理论界多数人都同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主要是恩格斯后来创立的,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创立的只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本书作者提供了大量材料来证明这一点,这同我国多数理论工作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但能不能说马克思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呢?辩证法无疑是方法,即认识的方法和实践的方法,这在马克思那里是很明确的,他对此的论述也很多,本书作者也提供了大量材料,但能不能说这只是马克思以及黑格尔的观点而不是恩格斯的观点呢?能不能说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只是方法而不是客观辩证规律的反映,自然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客观辩证规律,自然辩证法不能成立呢?还有,如果根本不存在客观辩证规律,辩证的方法又来自哪里,而且能应用于认识和实践而有效呢?再彻底一点,我们还可以问: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不以人的意识和活动为转移,然而却可以为人所认识和改造的客观世界呢?对于这些问题,莱文都有明确的回答和论证。

在莱文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只能停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他说:“马克思认为,既肯定思维来源于存在(感觉和社会先验),又肯定外部世界由概念构成,这二者是不矛盾的。”莱文认为:“通过打破精神的客观性和物质的客观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将重新和它原来的思想结合,这个思想就是:世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莱文认为:“一方面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同时又不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法则本身是辩证的,这是可以做到的。”莱文的观点确是很彻底的基本分离派观点,而基本分离派观点与基本一致派观点的分歧又进一步涉及否定唯物主

义与坚持唯物主义的分歧,这就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而进入了一般哲学领域。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基本一致派观点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分离派观点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介绍,基本一致派观点则受到批评与诘难,二派之间的争论此起彼伏,绵延至今。今天多数学者虽仍坚持基本一致派观点,但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也并不是没有区别,因此,这两种观点应该互相对话,互相探讨,以求更深入更细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过程,并进而在现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书作者说得好,“彻底的科学不但要摆脱资产阶级的偏见,而且要摆脱左倾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科学,不怕挑战,不怕争论,不回避问题,它在回应挑战中只会发展,而决不会被推翻。作为基本分离派观点的代表作,《辩证法内部对话》的出版,无疑可以对这场争论,而且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的发展起一定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由于这个争论涉及一般哲学,它的出版也会推动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

1997年2月

致中国读者

[美]诺曼·莱文

《辩证法内部对话》显然是一部以欧洲为中心的著作,尽管它写于美国。它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是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争议,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本质上是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所引起的社会变动的产物。

这本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范例。它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一种尝试。认定苏联体系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变形,西方马克思主义希望重新激活激进的思想。它试图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斯大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各种形式的历史宿命论,以及党和官僚极权主义相分离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主义传统中的民主重新联系起来。

本书作为越南战争的后果完成于1982年,它从理论上说明从马克思和列宁到毛泽东的革命的连续性。它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的遗产。本书最后一章“辩证法与延安道路”论证了列宁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按照一种行动的理论来论证。在同实践概念的关系上,列宁和毛泽东都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的不懈追随者。

帮助建立列宁和毛泽东之间的血统联系的政治、历史条件是殖民主义的存在和全球范围内的农民造反。没有农民的帮助,列宁不可能取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还是最先发现反殖民主义是第三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战斗口号的人之一。毛泽东

采纳了列宁主义的这些洞见,尽管他使它们中国化了,并因而从与列宁同样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他的政治活动的领域。

此外,毛泽东从列宁那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通用的教条,而是建立在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的行动指南。列宁和毛泽东都是革命党人,因为他们都认识到理论对于实践是一种必要的指导机制,而人类的行为被认作一种实践批判的活动、一种为了改变现实而对之进行的审问。

列宁和毛泽东都重新改革了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便使它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时代具有说服力。摒弃了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和直译主义,列宁和毛泽东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创造。他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证实了自己有能力来改造马克思主义,使之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富有意义。这样他们便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更新。

《辩证法内部对话》的篇章正是着力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更新项目。我的著作试图把焦点放在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基础上,从而将这种努力推向前进。我试图显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学,是对人类劳动的生产力的一种证实。从哲学的角度,我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于从黑格尔延伸到赫伯特·马尔库塞,到乔治·卢卡奇的现象学传统。我的著作受到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影响。

在把马克思主义阐释为现象学的同时,我也试图把它从各种形式的宿命论中解放出来。我的著作不仅抛弃了辩证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而且抛弃了所有社会必须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最后到共产主义的三阶段直线发展的历史现点。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不是按照优先顺序列出客观的自然和社会力量,而是把重点放在个人和集团活动的再生力量上,放在主体对客体的力量上。

与黑格尔相似,马克思是西方表述主义学派的一种声音。黑

格尔把世界理解为人类意识的客体化,而马克思把世界理解为人类劳动力量的客体化。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世界是人类劳动的一种投射,他还试图以客体化理论为基础建立一种民主理论。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的研究不仅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包含了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西欧的共产党放弃了斯大林主义,并且把加强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联系视作重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任务。欧洲共产主义者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式的共产主义一刀两断,他们不仅看到党与国家分离的需要,使国家永存的需要,而且懂得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我的著作不仅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问题,它还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种重新阐释:它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相分离的重大思想差异,以及恩格斯开创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它提出俄国共产主义由两翼构成: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苏联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同时,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本质上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共产主义,成为直接反对克格勃(KGB)共产主义的选择对象。

从1997年的视角来看,我感到我关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区别的重要性加强了,尤其是在美国当前的知识分子气氛中。斯大林主义的破灭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学界的白色恐怖。与波旁王朝1815年在法国的复辟相似,美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般地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结合起来的尝试是一种使所有激进思想的合法性丧失的策略。他们所希望证实的演绎推论是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的导向左翼极权主义。

我关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发生中断的讨论是一个反波旁家族的论证。1815年的波旁家族寻求根除

一切形式的雅各宾主义,而当代学术界的波旁势力希望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官僚极权主义相联系而使一切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丧失信誉。通过把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相分离,我表明了谴责斯大林主义的同时又维护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民主雅各宾派的根基是可能的。一方面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是畸形的马克思主义,而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则是左翼平民传统和马克思的民主精神气质的表现。

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用一种社会现象学代替辩证唯物主义,而20世纪90年代末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对于民主规划的新的系统的阐释,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社会组织的新民主形式的探索精神相一致。为了恰当地理解这个陈述,有必要勾勒出后共产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我所谓的后共产主义意味着斯大林主义的灭亡。后共产主义不指向未来而仅仅指向一个空缺。后共产主义是关于一个体系的结束,它的消亡和随着变迁而来的是发展。

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则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续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的另一个阶段。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工业革命进程中的任务是工业劳动背景中对于民主的分析,而后马克思主义在后工业世界中的任务是对劳动的意义已经革命化的背景中的民主的分析。后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方法的信念上,意识到历史是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按照它发现自身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而重新定义自己。

后马克思主义,正如我在以上段落中所定义的,是对后工业化、后贫穷和全球第一世界成员的规划。它也许并没有对世界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成员的需要进行呼吁。后马克思主义是不平衡发展的法则、南北世界的划分和世界实际上分裂成不同经济区

域的产物。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一般的术语,而是一个适用于大西洋世界的概念。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又有必要在说到马克思主义时用复数的形式,即既是不同经济区域的表述,又表述着各种经济区域的成见。

从这个观点出发,斯大林主义的消亡不是幻想破灭的时刻,而是再生的时刻。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经作出结论,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尽管显得很突然,并且出人意料,斯大林主义的崩溃是期待已久的,而且还加速了左翼理论的再生。斯大林主义是世界第二强大核力量的门面和摆设。它的消亡使世界摆脱了一具阻碍思想的新发展的尸体。斯大林主义的被根除有助于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重新进入历史的洪流是一个开创性的事件。

在电脑化世界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与后现代主义对抗。在欧洲和美洲的区域中激进思想无法取得进展,除非它一方面被后现代主义滋养,另一方面而又征服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这是下一代列宁主义的事业。

1997 年 2 月

(张晖 译)

献 给

罗斯(Ross)、贝思(Beth)、
托德(Todd)、梅利莎(Melissa)、
罗伯特(Robert)、斯图尔特
(Stuart)、戴维(David)

他们都作出了自己的奉献。

致 谢

我要感谢美国哲学协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和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对学术研究的支持,使我能利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cial History in Amsterdam)的档案馆,这是世界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的最大贮藏所。这些手稿对于写作本书第四章“走向《资本论》的重建”特别有价值。

许多人帮助打印这部稿件。美国巴尔的摩县马里兰大学研究生院院长(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马利根博士(Dr. Joseph Mulligan),为此提供了资金资助。迪特里希(Mary Dietrich)和鲁宾逊(Kathleen A. Robinson)即使同时进行两项工作,也毫无怨言地给予支持。尤其是那位不知疲倦而善于幽默的格思曼(Jane Gethman),总是带着微笑承受着最多的重担。

书是时间的吞食者。我的家庭成员毫不犹豫地作出牺牲,使我能静心写作,他们是我的恒心和力量的来源。特别是我的妻子罗斯(Rose),她既分担了书的创作,也令人遗憾地共尝了著述的艰苦。

目 录

致 谢	1
前 言	1
第一章 辩证法内部对话	8
第二章 辩证法的毁坏	107
第三章 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基础	163
第四章 走向《资本论》的重建	227
第五章 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	325
第六章 辩证法与延安道路	401
索 引	517
译后记	537

前 言

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从马克思(Karl Marx)到毛泽东(Mao Ze Dong)的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当然,在这背景中更加重要的人物,是书中经常提到,但却没有专门论述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由于人们从不同的政治时期和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因此,不同的人对辩证法有不同的认识。然而,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看法却是至关重要的。本书试图找出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的本来意义。它使用的方法是,不仅评价马克思的思想,而且描述别人是如何有意或无意地歪曲他的基本思想的。

我把这项研究的全部力量都放在辩证法上,因为它是马克思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马克思是一位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美学家。马克思涉猎了如此众多的学科,这是他的理论事业的内在要求,因为他希望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他要向资产阶级观念的前提挑战,这就使马克思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展开论述,而使他在这些不同学科的探索中保持井然一致的统一概念和中心观点就是辩证法。如果没有辩证法作为他自己世界观的轴心,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Marxism)。他的体系的其他方面,例如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有过错误,也得到了修正,但这些都还不是他事业的中心。辩证法则为他的整个理论大厦提供了平衡和统一。

本书将主要从两种观点探讨辩证法:作为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作为人类行动的指南。那些企图把辩证法和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是最为有害的,他们的观点也招致了最多的谴责。作为社会分析的方法,辩证法把特定的社会经济构成的功能解释为其整体结构与

单个不协调性领域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把总体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转化为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冲突,以这种冲突为基础,便可以解释社会现象。对于社会的辩证分析会告诉我们特定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规范的表现模式,它不必告诉我们这种生产方式的一般历史发展前景。此外,辩证法还会告诉我们人道化行动的力量之所在。社会和群体是生产的机体,而它们的实践(Praxis)便是生产人类生存条件的劳动力。对于行动的辩证法研究将使我们认识人们对于历史进程进行干预的效果和过程。

把作为行动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自然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引出了把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分开的问题。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把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对照。这项工作紧接着就要求我们描述这两人的不同之处,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为了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本书将追溯到爱德华·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和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接着讨论20世纪20年代的三巨头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和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以及当代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涅泽克·克拉科夫斯基(Leczek Kolakowski)的著作。《辩证法内部对话》(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把恩格斯看作第一个修正主义者,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形而上学的一元论的人。我并不宣称这个论点完全是我的独创,我完全认识到有人在此之前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我希望我在这场辩论中的贡献开辟了新的天地,把争论引到了以前没有探讨过的领域。

我是1970年在美国历史协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提出恩格斯是第一位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的。1973年,我在《行为科学历史学报》(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恩格

斯主义;两种不同的历史观”(‘Marxism and Engelsism: two differing views of history’)。两年后,我出版了一本书:《悲剧性的蒙蔽: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圣巴巴拉:ABC—克莱欧出版社,1975)(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 (Santa Barbara: ABC - Clio Press, 1975))。在那本书中,我试图把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与主要是恩格斯的思维模式分开。这本《辩证法内部对话》既是《悲剧性的蒙蔽: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继续,又离开了那本书的观点。它假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重大的歧异,同时它又显示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两种对辩证法的不同阐释在 20 世纪历史中的命运。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的思想关系这一问题与辩证法问题直接相关,因此,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有几句话需要说明。那些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人可以归为基本一致派。那些认为概念上的重大区别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开了的人可以归为基本分离派。

持基本分离观点的人有一个有利的主张,那就是:不可归纳的人的主观性。任何两个人都不可能对一个问题会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但是,假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概念上的重大区别把他们分离开来,例如,在辩证法问题上,却并不排除他们在很多方面也存在一致性这个事实。这两个人是合作了一辈子的朋友,他们从事着一项共同的精神事业。很显然,一致性是有的。然而,我们感觉到的这种一致性也可能是假定的,而这两个人在同一个问题上却可能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这些重点后来就可能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两种不同传统。尽管有这样一派观点,但还有一些人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本身集中于不同的主题上,或专门讨论不同的问题。持基本一致观点的人宣称,这种不可否认的相异之处可以追溯到他们两人之间有意商定的分工。而持基本分离观点的人则把他们的理由追溯到更早的一段时期。他们俩之所以唱出互

相冲突的调子,不是因为一个人专研究科学,另一个人专研究历史,而是因为他们各自的概念不同。他们的科学观和历史观导致了互相冲突的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不同必须追溯到他们的思想前提上。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分离的说法在党派和策略方面会引起问题,因为它产生了哪一个党派或策略坚持了马克思的传统,哪一个党派或策略坚持了恩格斯的传统这个问题。它把统一的左派问题搅合进去了。由于它搅合了这个问题,就会造成分裂。然而,科学不可能从属于政治,而从被贬低到斯大林主义(Stalinism)的困境中恢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肯定科学的独立和自由。彻底的科学不但要摆脱资产阶级的偏见,而且要摆脱左倾教条主义。在一个大反思和大改组的时代,必须坚持科学对于政治的优先地位。

基本一致派的支持者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分工及理论与实践的需要来为他们的立场辩护。马克思被描绘成一位伟大的创新者,这是对的;恩格斯则被描绘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并运用到其他学科,例如科学中去的人,而马克思则没有时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基本一致派会毫无保留地承认恩格斯所描述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而且,由于这一派的倡导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的需要有着必要的敏感,他们便看到,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不同会对工人运动带来危险。对基本一致派的倡导者的回答不是否认分工的因素,或理论与实践的因素,而是指出反复出现的现象。起决定作用的关键问题不是恩格斯显示出科学的才能,马克思显示出历史的才能,而是当恩格斯谈到科学、技术和历史时,长期重复表现出同一模式。恩格斯在研究任何问题时,始终采取决定论的方法,他根据暂时的结果来找原因,根据技术因素去解释历史的运动,这些都是超出了分工的要求的。这种重复使用的方法,这种反复固定在某一类因素上的做法,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恩格斯有概念上的先人之见。

《悲剧性的蒙蔽：马克思反过恩格斯》和《辩证法内部对话》就是要去掉覆盖在马克思的基本要义之上的外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些外壳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这两本书的成功将会产生短期的消极后果和长期的积极后果。从短期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史必须重写。从长远来说，一种摆脱了站不住脚的哲学立场，更具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将留给未来。不过，在一个彻底重建理论的时代，任何一项修正都必定会带来消极的和积极的结果。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黑格尔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二者的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承认他们从黑格尔那里受益匪浅，而且都认为他们正确地运用了黑格尔的遗产。但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理解并不相同，在历史学和认识论上对黑格尔理论的运用也不一样。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东西，不首先掌握黑格尔的辩证法，要想探索马克思的核心是不可能的。本书的前提是，应该把马克思黑格尔化。确实，要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和关于行动的辩证法，只有把它们跟黑格尔关于行动的方法和理论并列起来研究才能办到。然而，在我们进行任何把马克思和黑格尔联系起来的努力时都必须注意，不要把马克思和唯心主义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相提并论并不一定就要得出把马克思和唯心主义相提并论的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警告是中肯的，因为我们一定不能犯卢卡奇那样的错误，一定不能在马克思主义自身内部重新造出本质先于存在论(essentialism)和有机体论(Organicism)。不过，把马克思黑格尔化而又不同时把他唯心主义化乃是可能的，这种联系只有通过给唯物主义重新下定义才能做到。通过把唯物主义跟哲学上的实在论(realism)分离开来，我们可以保留黑格尔的主观活动概念和意识干预物质的和世界的概念。

恩格斯给唯物主义下的定义是：认为有形物体独立于人而存

在并受外在于人类的规律所支配。马克思的定义则是：唯物主义是人们生产自身生存条件的需要，这种需要先于其他的需要，是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使人类得以生产这种生存条件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显然，这两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但它们在一个思想体系中的相对份量却赋予了该体系一种特别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以社会存在先于一切思维方式和经验活动为基础的。没有哪一种马克思主义不是以社会先行为基础的。

如果唯物主义被认为是社会先行，如果我们同意概念的范式是由社会先验(social a priori)造成的，那就有可能把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黑格尔的主观力量概念结合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方面主张人们干预社会，一方面又说这种干预是以社会提供给他们概念模式为基础的，这二者并不矛盾。概念的框架是社会的产物，这些概念框架引导人们朝着一定的计划行动。下了这样的定义，唯物主义就和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思想完全一致了，因为通过社会存在物的活动干预社会，这些社会地产生的概念范式便会按照它们自己的向度改变外部世界。

《辩证法内部对话》是一本旨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它的主要敌人是形而上学，不管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都是它的敌人。通过打破精神的客观性和物质的客观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将重新和它原来的思想结合，这个思想就是：世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以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活动思想为中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得到新的发展。

《辩证法内部对话》是对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欧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新形式的贡献。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是反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的，又是反布尔什维克(Bolshevik)的；它既是反恩格斯派(Engelsian)的，又是反斯大林主义的。然而，通过

去掉使马克思主义失去活力的形而上学覆盖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旨在恢复马克思的方法,而只有运用正确的方法,才能发展出健全的马克思主义科学。

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门实践政治学,于是,就出现了列宁(Vladimir Ilich Lenin)。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或方法论的原则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一种做法割断了理论和实践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撇开列宁的民主或独裁的天性这个问题不谈,他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象征。从这个观点出发,列宁主义(Leninism)遗产必须保留在马克思主义内,因为它是一个所需要的证据,证明马克思主义必须最后成为政治实践,否则它就只能变成一种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它的死亡。

1982年写于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
(Columbia, Maryland)

第一章

辩证法内部对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一个转折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通过他这个过渡环节进入第二国际时期。在把创立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并转达成考茨基(Karl Kautsky)、普列汉诺夫(Georgy Plekhanov)和列宁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方面,他比任何人起的作用都大。如果说马克思是原稿,恩格斯就是神圣的注解。在第二国际时期,他的三部著作:《反杜林论》(Anti-Dühring)、《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Socialism: Scientific and Utopian)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被当作对马克思的无可辩驳的阐释。列宁直到写《哲学笔记》(Philosophical Notebooks)时为止,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整体,这一直是列宁思想的一个基本部分。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中,他写道:

但是要找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难的。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就是瓦连廷诺夫先生们(Valentinovs)也能从这里想到:约·狄慈根(Joseph Dietzgen)的混乱只能在于他背离对辩证法的彻底应用,背离彻底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背离《反

杜林论》。^[1]

在1914年以前,列宁也相信,在唯物主义的某些方面,恩格斯比马克思阐述得更清楚。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Three Sources and Three Component parts of Marxism)中,他写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即上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同。——译者注)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2]

不但列宁肯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一贯性,而且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普列汉诺夫含蓄地追溯了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直至他自己的思想的连续性,因为普列汉诺夫赞赏社会主义,而在哲学问题上,他和考茨基是很接近的。事实上,在与爱德华·伯恩斯坦、康拉德·施米特和新康德主义者(neo-Kantians)辩论时,普列汉诺夫常常站在考茨基一边,充当德国社会民主理论和恩格斯主义(Engelsism)的捍卫者。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阶段,也跟着普列汉诺夫,追随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原则。在恩格斯和考茨基之间,毕竟有着亲密的个人友谊,而且恩格斯还请考茨基编辑《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这本书后来成了《资本论》(Das Kapital)第四卷。^[3]由于所有这些关系,普列汉诺夫也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些最明确的阐释。^[4]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是：他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到关于自然的哲学上。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在极大程度上，马克思把辩证法运用到社会—经济的构成上，并因此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社会经济构成的方法，它把社会看成整体结构，在这些结构中，单个的各方面都反映整体。它是建立在社会冲突模式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断言，每一种社会结构都是由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矛盾构成的。马克思还把社会经济构成看作人类劳动的结果，看作从事社会生产的人共同劳动的结果。社会形态取决于当时的技术力量，但也取决于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概念范式，社会团体就是根据这些范式来解释他们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社会经济构成决定社会的思想潮流。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关心的主要是各种社会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结构对于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的影响，以及这些由社会所决定的思想模式对于自然和社会本身的反作用。

恩格斯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深入到另一方面。它强调自然法则遵循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1)量转化为质的规律；(2)对立统一规律；(3)否定之否定规律。恩格斯认为，以这些规律为基础，可以解释物理学、化学、有机物质和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这样，恩格斯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归纳系统：它先假定了这些辩证法规律的形而上学性质，然后断定，一切事情，从太阳系的运动到人的思想的产生都可以用它们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关心的主要是人类社会的性质，而辩证唯物主义却集中在自然的形而上学方面。

本章将论证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了马克思理论劳作的意图，并论证恩格斯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体现马克思的意图。很清楚，马克思认为，把辩证法运用到自然界中是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鼓励恩格斯去从事这项工作并把

它一直干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强调,恩格斯把辩证法运用到自然界的形式是非马克思式的:换言之,如果马克思自己干这项工作,他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

鉴于唯物主义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区别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合适的。马克思对物质世界持一种实在论的观点。他相信,自然界不依靠心灵而存在。他还认为,物质世界的规律独立于心灵发挥作用。^[5]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古典唯物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他还认为,对于这个独立于心灵之外的王国的探索必须进行下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才反复指示恩格斯发展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兴趣。

因此,关于自然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实在论者,但是,恩格斯把他的实在论贯彻为一种关于自然的哲学,马克思则不这样做。恩格斯既主张一种关于自然的哲学,又主张一种科学。而马克思推究科学哲学,却不愿推究关于自然的哲学。恩格斯让他的唯物主义扩展为自然哲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则不把他的唯物主义扩展为自然哲学,而只把辩证法限制在依附于思想的领域内,即哲学、政治理论和经济学。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对自然界没有辩证法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的科学哲学就是辩证的。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并不认为自然规律本身是辩证的。一方而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同时又不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法则本身是辩证的,这是可以做到的。恩格斯没有弄清这种区别,黑格尔和马克思则弄清了。

当我们把唯物主义观点运用到社会和历史领域时,这个论点就更复杂了,因为社会和历史的世界是由非转化的(*intransitive*) (物质客体)和转化(*transitive*)的(概念框架)两种成分构成的。^[6]例如,一个社会的技术和地理因素是非转化的,它们是独立于思想之外的物质客体。在发明火箭以前,不可能遨游太空。植物需要水、

阳光、空气和无机物才能成长。实体,即独立于思想之外遵循自己规律的客体,帮助决定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也由依附性的思想因素所决定,如政治思想意识,科学范式和其它转化力量。一个社会的构成的部分正是这一转化部分,因为一个社会用来了解它周围环境的概念框架形成该社会进化的转化力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定义上,恩格斯追随着马克思,但即使在这一点上,也存在微妙的然而却是极其重要的区别。

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是作为生产力量的社会。马克思认为,历史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告诉我们,各种社会是如何生产它们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由于人类的繁衍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条件的社会生产就成了马克思关注的中心。让我说得更清楚些:马克思完全认识到,独立于思想的物质客体作用于历史的发展。所有不受思想支配的地理的、技术的、人口统计的力量在社会进化中都是重要的决定力量,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魔力恰恰就是独立于思想之外的和依附于思想的因素的结合。不过,转化的力量是社会发展中更重要的决定因素。例如,当马克思论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主义时,他承认,铁路的出现会打破印度宗法公社的自给自足和与外界隔绝的局面,但只有依附于思想的因素,例如政治主张,可以决定印度的村庄在铁路出现之后,会变成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换言之,依附于思想的力量优先于独立于思想之外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是人类将自然和一切实体加以人化的过程。

对于恩格斯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他整个归纳体系的一部分。恩格斯认为,非转化和转化的因素都是社会中的决定力量。确实,在给布洛赫(Ernst Bloch)的信中,恩格斯注意到转化因素在历史中的意义。本书决不打算否认恩格斯重视概念力量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在于谁是优先的力量,而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一贯把决定因果关系的重点放在非转化力量上。在分析历史进化时,恩格

斯认为非转化的和转化的决定因素都是必要的,但只有非转化的决定因素才是充分的。恩格斯往往把技术因素看作主要的因果力量。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归纳出来的。

第三个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域涉及到他们的认识论。马克思的科学哲学直接和他的认识论类似。马克思不相信真理的符合论。他不相信认识可以反映独立于思想的领域。那只是在古典的英国经验论传统内部通常对认识所下的定义。然而,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范围内,人永远是处在社会环境中的。因此,马克思认为,认识永远属于社会的范畴,认识总会反映群体先前的概念范式。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打算放弃寻求尽可能地接近客体,因为马克思是整个西方科学传统的一部分,他相信人类必须不断地接近独立于思想之外的世界以获得尽可能大的真实度。但是在愿望和可能之间存在着差别。逼真的认识是理想的,对于这个目标的追求是认识不断发展的一个源泉。但是符合一致的认识是不可能获得的,因为社会先验在决定认识的性质(即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性)方面总是起决定作用的。这和转化因素的构成性质有关,而且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和历史的交互作用的基础上的。

任何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的哲学都必须涉及到马克思的认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这里有必要重申已经提出的论点。马克思自己并没有创立一套关于自然的哲学,他确实创立了一套与他的认识论并行的科学哲学。他认为关于自然的哲学是值得探索的领域,并派恩格斯从事那项工作,因为他的思想正集中于其他方面。我的论点是,马克思关于自然的哲学(如果他创立一套的话)会不同于恩格斯关于自然的哲学。其所以会不同,是因为马克思给辩证法下的定义不允许他认为自然本身是辩证的。然而,马克思可以创立一套自然辩证法(关于自然的哲学),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辩证法和他的科学哲学相联系。通过辩证法,马克思了解了依附于思想的力量和独立于思想的力量之间的交互作

用。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也象对于黑格尔一样)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概念的框架(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决定的)吸收物质性。马克思认为,之所以存在自然辩证法,是因为独立于思想之外的领域被纳入了思想之中;恩格斯则认为,自然辩证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独立于思想之外的领域本身按照辩证法规律运转。

恩格斯的认识论和马克思的大相径庭,因为恩格斯的认识论和古典经验主义的传统相符。吸引恩格斯注意力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吸引休谟(David Hume)、洛克(John Locke)、贝克莱(Bishop Berkeley)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问题:自在之物能被认识吗?恩格斯不相信自在之物能被认识,他也不相信真理的“摹本论”。恩格斯是一位实用主义者。真理只能通过对科学假设进行以经验为基础的检验才能获得。但恩格斯也确实坚持真理的符合论。虽然自在之物永远不能被认识,但却可以达到极为接近的近似,这种近似可以说是和自在之物相符合的。

为了充分鉴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论之间的鸿沟,有必要区分下面三个重要概念:(1)感觉;(sensation)(2)存在—思维;(Being—thought)(3)概念与实存(concept and existence)。感觉是指感觉器官呈现于大脑的现象。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涉及到观念和感觉谁在先的问题。例如在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中,观念先于感觉或存在。在英国和法国古典经验主义中,感觉先于观念。概念与实存的关系是指观念形成之后,概念与外部存在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涉及到起源的问题。

恩格斯认为,起源的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按照英国和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强调感觉先于观念。而且,恩格斯还把存在的概念归之为感觉的概念,并强调存在先于思维。然而,恩格斯没有仔细区分概念—实存和存在—思维之间的不同。他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认为既然解决了起源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概念—实存这一难题。

马克思背叛了德国唯心主义,接受了18世纪唯物主义感觉先于观念的主要前提。但是,马克思没有将存在的概念压缩到感觉的概念中去。马克思认为,存在也先于思维,但存在有两个方面。第一,存在是感觉。第二,存在是社会先验:是社会强加给个人的社会学的预示。在马克思的存在概念中,感觉和社会学的预示是并存的。按照马克思的存在一思维关系,感觉和社会先验都是思想的起源。然而,马克思认识到,概念—实存的问题并不是起源的问题,而是个已经存在的观念的活动问题。马克思认为,既肯定思维来源于存在(感觉和社会先验),又肯定外部世界由概念构成,这二者是不矛盾的。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他才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的、经济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因为马克思是通过认识的社会学来探讨认识论的。他假定社会的条件作用形成一个无法缩小的过滤器,认识就是通过这个过滤器产生的。恩格斯是通过古典经验主义留下的认识论模式来探讨认识论的,这种模式就是:个人试图精确地反映独立于思想之外的世界。^[7]

但是恩格斯并不认为心灵只是被动地反映独立于思想的世界。恩格斯认为,认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心灵扮演主动的角色。然而,对于心灵在知识获得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的看法和马克思的大不一样。这种区别可以表征为实用主义与实践之间的区别。实用主义指涉验证过程,而恩格斯又是处在实用主义传统中的。实践则与验证的方法无关,它是一个创造过程。实践的概念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它指的是在人类需要和社会先验的指导下,概念构成外部世界的过程。实践关系到真理的产生,真理是在概念的周围世界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8]

恩格斯的认识论是他关于自然的哲学的基础。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形式把辩证法置于外部世界中,认为辩证法是在物质世界中产生的。确实,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是一个本体论体系,而且是一个还原的体系。我所说的还原的唯物主义指的是一种信

念,即“一切事物,包括心灵及其思想,都可以还原为物质。”^[9]我不否认,恩格斯肯定了意识形态领域即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这一点尤其见诸于他的通信中。但是我强调,仔细阅读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Nature*),会使我们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心灵的活动(其最高的表现形式就是思维)最终都可以用原子相互撞击来解释。恩格斯的微粒主义可以运用到大脑上,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却不是还原的,因为它并不把一切现象都还原为物质的活动。社会先验是不能用原子学说来进行解释的。^[10]

在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区别时,黑格尔这个人物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黑格尔对于马克思本人是如此关键,因此,要恰当地了解马克思本人,必须首先恰当地了解黑格尔——马克思恩的关系。所有那些不能正确评价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人最终都歪曲了马克思。斯大林是这样,写《哲学笔记》以前的列宁是这样,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也是这样。

黑格尔的遗产对于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有必要把黑格尔的遗产一分为二,即黑格尔——马克思的关系和黑格尔——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根据他们套用黑格尔的不同方式来解释。我们现在就来讨论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套用。由于把开头放在结束部分讨论有时在学术上是合理的,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套用将放在本章的结论中讨论。

恩格斯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保持了黑格尔传统的生气,或黑格尔传统的某些方面。在过渡时期,在写作《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期,恩格斯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同德国唯心主义总的传统联系起来,特别是同黑格尔联系起来。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英国的政治

经济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事实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最后--行说道:“德国工人阶级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1]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提出了相同的论点。

实际上,恩格斯认为,他提供了左派对黑格尔的阐释。1842年在柏林,青年恩格斯跟黑格尔左派有过联系。当恩格斯强调黑格尔思想中的运动和过程的观点时,他认为他对黑格尔作出了革命性的阐释。右翼黑格尔主义证明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在国家和社会方面希望保持现状。因此,当恩格斯集中讨论黑格尔的过程概念时,他就为进步政治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他提出,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必定灭亡,由共产主义取而代之。而且,恩格斯认为,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总的说来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因为它是在建立在对自然界的机械看法的基础上,缺乏进化的观点。

恩格斯承认,在18世纪,有几位人物意识到了自然本身是一个历史进程。在这一点上,恩格斯挑选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General Na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Heavens*)作为概念上的一个突破,因为康德断言:“地球和整个太阳系都是某种在时间的过程中形成的东西。”^[12]康德的“星云假说”认为,太阳和它的行星是一团旋转的星云浓缩面成的。许多年后,当太阳系的历史性这一概念得到最广泛的接受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和赫歇尔(F·W·Herschel)重提了康德的这一观点。恩格斯还认识到,赖尔(Sir Charles Lyell)的研究把历史性这个概念引入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领域,从而为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发现扫清了道路。这样,18世纪就经历了一个历史的突破,因为发展这一概念不仅应用于太阳系,而且应用于地球以及居住在地球上的有机结构。虽然如此,除了这几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巨人外,恩格斯认为,18世纪的普遍看法是对自然界持有一种静止的、机械的观点。^[13]所以,当恩格斯提出一种历史的自然观时,他觉得他是在

吸收黑格尔带有革命性的思想。

恩格斯是从一个虔信派教徒(Pietist)的背景来理解黑格尔的。恩格斯出生在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父母都是加尔文派的原教旨主义者(Calvinist fundamentalists)。在他信教的日子里,受到了黑暗而且无情的宿命论观点的影响;上帝决定世界的进程。恩格斯在年轻时受到的教育是:世界和个人的命运都由神的力量操纵着。^[14]

恩格斯对他的家庭的正统虔信主义的反叛把他引向了黑格尔。1840年,恩格斯在不来梅(Bremen)一家商行当职员,同时又从事兼职记者的生涯。在写给朋友威廉·格雷培(Wilhelm Graeber)和弗里德里希·格雷培(Friedrich Graeber)的一连串信件中,恩格斯清楚地说明了他在转向黑格尔。在1839年11月13—20日写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他说:

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帮助我了解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还请务必提到施特劳斯的《鉴别和评述》(Charakteristiken und Kritiken),他的有关施莱艾尔马赫尔(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和道布(Daub)的论著真是妙不可言。文章写得如此透彻、明确和风趣,除施特劳斯外,别无他人。^[15]

在1839年12月19日—1840年2月5日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说出了他转向黑格尔主义的确切时间。1840年1月21日他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写道:

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象欣里克斯(Henrichs)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我应当汲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 的要素。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于是,我加入了……‘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16]

恩格斯是通过戴维·施特劳斯的著作接近黑格尔的。作为左翼黑格尔派的成员之一,施特劳斯在当时被看作无神论者而遭到谴责。他在《耶稣传》(*The Life of Jesus*)中,不但否认基督的神性,而且肯定人类自身就是神圣的。施特劳斯发动了把人类神化的运动,因为他认为,人类通过加入普遍理性的力量而神圣化了。作为一个泛神论者,施特劳斯证明,理性作为一种超验的力量,是在历史的进步中表现自己的。^[17]历史与其说是由人们单个的、与其他无关的行动推动的,毋宁说是由通过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普遍行为的力量推动的。因此,恩格斯也学会了把黑格尔本人看作泛神论者。

1842年恩格斯作为普鲁士(Prussian)炮兵部队的一员来到柏林(Berlin)。然而在晚上,他仍继续从事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不过这一次是作为左翼黑格尔派的代言人。黑格尔已于1831年逝世,而恩格斯恰恰是在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被调到柏林大学来消除黑格尔的影响的时候来到柏林的。尤其突出的是,那些年轻的黑格尔主义者用自由的、进步的方法阐述他们导师的话。普鲁士政府把谢林调到柏林,就是为了反对这些改革的声音,并通过重新建立一种宗教的和政治上保守的哲学来击败具有腐蚀性的理性主义。恩格斯不但是一位黑格尔主义者,而且他在柏林当记者的使命就是要反击谢林对左翼黑格尔派的攻击,而且他也确实使谢林本人名誉扫地。例如,他的《一名来访学生的日记》(*Diary of a Guest Student*)就包含了对当时在大学的圣 圣讲 堂上所进行的学术

和哲学论战的精彩见识。^[18]

恩格斯反击谢林的三本论战小册子,《谢林论黑格尔》(Schelling on Hegel)、《谢林与启示录》(Schelling and Revelation)和《谢林,基督的哲学家》(Schelling, Philosopher of Christ)也包含他自己对黑格尔的阐释。黑格尔认为,绝对就是“自我认识的精神”,^[19]因为引导世界历史的正是作为理性的精神。^[20]理性不但能够“支配存在”,^[21]而且作为绝对理念,具有“成为新纪元开创者”的力量。^[22]在这个世界上,个人的行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精力和发展都是从上面来的。“然而,黑格尔的客观逻辑并不产生思想,而是让各种思想自行产生出来,在这里,思想的主体不过是一个偶然的观众。”^[23]恩格斯还觉得,黑格尔的世界逻辑结构也是由理性派生的。按照柏拉图的方式,恩格斯认为,逻辑的范畴就是把形式结构加于世界的理性的方法。^[24]

恩格斯甚至对黑格尔是反动的普鲁士君主制度的辩护者这一点提出质疑。恩格斯强调说,黑格尔是德国自由力量的真正发言人,因为黑格尔关于历史的进步就是自由的进步的思想为这些自由力量提供了理论基础。恩格斯希望理念会找到一个实践的机会,因此他把路德维希·博尔纳(Ludwig Börne)和黑格尔看作新德意志的两位主要倡导者。路德维希·博尔纳是位诗人,也是政治活动家,恩格斯心目中的头号政治英雄。把博尔纳和黑格尔联系起来,在恩格斯看来,就找到了问题的实质,就把实践和理念融合起来了。^[25]

因此,恩格斯早年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认为黑格尔是一位理性的泛神论者。但是,恩格斯对黑格尔特点的界定还由另一个因素决定:他是虔信派教徒。出于加尔文教派的背景,他受到的教育一直是:上帝的力量支配着世界。正如他在信教时期认为上帝引导着历史的进程一样,在他的黑格尔主义时期,恩格斯相信理念引导着历史。在这两种情况下,共同的准则是他认为有一种形而上

学的力量,它构成了他思想发展的轨迹。

1850~1870年是恩格斯思想发展的中期,他转到了科学研究方面。这段时间,他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经营他家的产业。恩格斯是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曼彻斯特的。为了把他拉回到资产阶级世界中去,他的父亲让他负起欧门——恩格斯(Ermen and Engels)公司的责任。然而,他集中精力研究科学是从大约1858年开始的,从那以后一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自然科学一直是他生活中思想活动的中心。1883年以后,恩格斯把他的所有兴趣都投入到编辑和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上。

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他在生理学、解剖学、化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兴趣。他谈到过去30年来科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谈到有机化学的迅速发展,显微镜的完善使用,以及施莱登(Matthias Jakob Schleiden)和施万(Theodor Schwann)的细胞理论的提出,认为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此外,在物理学上,力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揭示出机械运动如何转换成热能,热能如何转换成光,光又如何转换成电,磁等。物理学界不久就将证明,世界上各种形式的能都只是一种最基本的能的转换。最后,恩格斯还提到了他对比较生理学的兴趣,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各种不同的物种存在着如何紧密的内部联系。^[26]

这种对科学的兴趣与恩格斯继续对黑格尔的兴趣是联系在一起的。在1858年7月14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把这些科学发现中的许多与黑格尔的《逻辑学》(The Science of Logic)联系起来。他把作为生命的生殖力量的动物细胞同黑格尔的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这两个概念就是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和理念(Idea)。恩格斯还把物理学上力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和黑格尔的本质的反思理论进行比较。他认为,各种动物的内在联系表现了黑格尔关于数量转化为质量的原理,或在向质的转化中的飞跃。^[27]

这样,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规律运用到了自然科学中,辩证法和物理学的融合就开始了。把物理学的定律扩展为宇宙规律的努力,引出了物理学的哲学。对物理学定律的本体论地位的寻求把人引入了自然哲学。笛卡尔就是这样。

恩格斯早期对黑格尔的理解与他中、晚期对黑格尔的理解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变化。这里的变化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年轻时期的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是一个理性的泛神论者,他的概念深藏在物理法则中。年轻时,恩格斯注意的是黑格尔的精神,而在成熟以后,恩格斯强调黑格尔的运动和过程的思想。这里的联系则体现在下面这个事实中:恩格斯总是把黑格尔同普遍性的力量和第一原理联系在一起。

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的通信中,恩格斯继续勾画了他对黑格尔和自然科学的综合。在1865年3月29日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的信中,他说关于自然的哲学的原则,在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二编“本质论”(‘the Book of Essence’)中可以找到。恩格斯还走得更远,他断言,格罗夫(Sir William Robert Grove)发现的力的相互关系只不过是黑格尔在“本质论”中所说的原因、结果和力的概念的积极发展。^[28]1874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正专心研究黑格尔的本质论。那时候,恩格斯仍然觉得,《逻辑学》适用于自然科学,不过他发现《哲学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的唯心论色彩要少一些,而且也更容易领会。^[29]当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恩格斯有重要影响,他相信,达尔文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说明了自然界本身是有历史的。^[30]

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起源始于1873年5月30日。那一天,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这天早晨他躺在床上时得到的一些想法。他接着勾勒了后来倾全部精力加以阐释的自然界的辩证原则,物理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而物理学的目标就是研究物质及

其运动。静止不动的物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物质客体在宇宙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一个运动着的其它有形物体所组成的宇宙之中。这些有形物体互相联系,而在物质的撞击和摩擦中,就产生了热、光、电、磁。由物理学引出了化学。化学研究物体内部原子的运动如何使物体发生化学变化。由化学又引出了有机学,而在有机体和无机体之间并没有什么内在区别。因此,化学变化就影响到有机体的存在。^[31]这样,恩格斯便以物理学为基础提出了对自然界的广泛系统的论述。一切事物,从太阳系的行星到个体的生命,都可以在物质运动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出的原则,形成了他从《反杜林论》到《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关于自然界的论述的基础。马克思在回信中,没有立即对恩格斯的结论表示同意,而是说他必须先研究它们。马克思从来也没有直接表示他同意这些原则,尽管他认为,对自然界作出某种形式的辩证解释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由于我要比较恩格斯和黑格尔的自然观,因此,在这里,简略地谈一下黑格尔“关于自然的哲学”是合适的。黑格尔哲学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要克服康德的二元论。康德把知觉的先验结构跟自在之物分开,黑格尔则寻求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康德接受心灵和物质的两重性观点,黑格尔要求它们的融合。黑格尔认为,自然界和心灵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既然辩证法支配着精神世界,自然界本身也必然包含在辩证过程之中。关于自然界,黑格尔和恩格斯都认为辩证法在其中起着某种作用。恩格斯和黑格尔对辩证法不同理解并不是由于他们中一个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界,另一个则不这样运用而引起的。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界的不同方式。恩格斯把辩证法放在自然界中,黑格尔则把自然界放在辩证法中。恩格斯认为,辩证法在自然界中得到了证明;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是辩证法的一种表现形式。

黑格尔的宇宙经历了一连串三个阶段的演化:从客观精神,到

自然界,到主观精神。这种三段式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自我规定的自由。自由在主观性中得到最好的实现,因此,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运动的目的论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主观的自我规定。但是这整个过程不可能无对立面地展开。既然精神是按照三段论的形式展开的,那么普遍必定在特殊中找到其对立面。

客观精神是逻辑必然性的王国,是逻辑范畴的领域,精神的运动就是从它那里演化出来的。然而,客观精神必须归结到主观精神,归结到历史和文化的王国。主观精神是由个体活动构成的领域,是人在国家、艺术、宗教和哲学上对象化的领域。为了使客观精神成为它的“另一个”,并在主观精神中找到它的终结,客观必须找到它的对立面,于是,客观精神就创造了自然界,把它作为这种“另一个”。

中介是黑格尔的一个关键概念。中介是三段论的中项:它是两极达到综合的根据。在从客观精神到主观精神的运动中,自然界是中介项。它是外在的东西,因为只有面对外在的东西并扬弃单纯的客观性时,精神才能了解它自己的力量,并意识到自身是主观的自我规定。

自在的自然反映客观精神,因为它也必须与宇宙的逻辑结构一致。因此,自在的自然必须是三段式的。黑格尔认为,自然界从机械性的王国,即太阳系开始,最后必须归结到个体性:归结到人的生命的开始,归结到地球的个体化。与逻辑范畴相一致,机械性必须找到它的对立面。它在化学性中找到了它的对立面。自然界以机械性、化学性和有机性的形式存在,其中化学性是中介项并被扬弃,最后归结为有机性。然而,尽管自然界的三个阶段与客观精神的辩证结构相一致,自然界在其各个阶段的规律并非自在地是辩证的。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反映了辩证法,因为它与先在的精神的逻辑范畴相一致,但自然规律并非自身是辩证的。

在黑格尔的体系内部,自然界是一种目的论过程中的手段。

黑格尔体系的终结是主观精神对自己的自我规定的意识,而自然界则是精神在认识到自己的自由时所超越的工具。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自然界既是“自在的”,又是“为他的”。自然界的“自在”是自然规律;它们是经验的法则,并不按照辩证法起作用。自然界的“为他”指的是表现精神的目的论的自然界,以及人的目的论所表现的自然界。显然,恩格斯没有意识到精神的先验的存在,他所规定的自然界基本上是“自在的”,而把“为他”丢掉了。恩格斯认为,物质是无处不在的,他用物质代替黑格尔的范畴,把辩证法放入自然界,并说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来源。

虽然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发明,但他在这项工作的进展中,也得到了卡尔·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的帮助。肖莱马是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化学教师,他在1860年初与恩格斯相遇。那时,恩格斯已经着手把辩证法和物理学融合起来。他们俩都是德国人,肖莱马是1858年从吉森大学(University of Giessen)来到曼彻斯特的。他们的相遇是因为他们同属德国工业化学家一个小圈子的成员,这个小团体每周在他们喜爱的餐厅俱乐部聚会一次。对科学的共同兴趣使恩格斯和肖莱马的关系密切起来。^[33]

在恩格斯建立自然辩证法的努力中,肖莱马出力不小,因为他提供了恩格斯所缺乏的科学方面的专门知识。他还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观点,一种与恩格斯所为之努力的方向相吻合的化学的眼光。19世纪中期,有机和无机化学之间的障碍被打破了,肖莱马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肖莱马事业的顶峰是1861~1866年,在这期间,他通过对碳氢化合物的实验,为有机和无机化合物之间没有化学上的区别这一论断提供了新的证据。在有机和无机体中,同样的化学规律在起作用。^[33]恩格斯那时正在寻求把物理的、化学的和有机的生命联系起来的一元的法则,他发现这些化学数据对他帮助极大。

最为重要的是,肖莱马得出了量变引起质变的结论。他对碳氢化合物的实验说明,原子数量和排列的变化可以产生质上不同的化合物。^[34] 通过从简单的化合物过渡到更复杂一些的化合物,有机材料已可以人工配制出来,并在将来得到巨大的发展。^[35] 此外,肖莱马相信原子连锁理论,即原子是依靠化合价而结合成为分子的。这样,肖莱马的化学模式补充了恩格斯正在努力建立的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模式。肖莱马在实验室的工作是建立在原子物质总是处在不断运动中这一基础上的。他机械地想象原子“互相碰撞”,并称化合价“只不过是单位时间里一个原子受到其它原子撞击的次数而已”。^[36] 分子是可以改变的,而通过分子数量和结构上的改变,可以产生出各种各样质上不同的无机甚至有机化合物。^[37]

肖莱马在他编写的化学教科书中,常常提到自然界的辩证规律。在《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Rise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c Chemistry*)第二版中,他写道,这一科目最近的历史“迫使我们用辩证的方法论述这一科目,甚至还在分子方面证实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公理,即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流动之中。”^[38] 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中,肖莱马告诫读者“千万不能忘记我们现在的理论并不是教条,恰恰相反,根据辩证法的规律,它是在不断地变化的。”^[39]

很显然,恩格斯和肖莱马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在恩格斯创立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关键时期,他和一位跟他观点相同的科学家发展了终生的友谊。肖莱马关于化学规律是建立在运动和过程的基础上的观点,量变引起质变的观点,以及从简单的化合物可以产生较复杂的化合物的观点,都强化甚至直接刺激了恩格斯自己研究的思路。^[40] 肖莱马在化学上的发现向恩格斯表明,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追求从经验上来说是正确的。^[41]

也正是在这个中期阶段,并一直持续他的整个后半生,恩格斯

充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员的角色。1870年,恩格斯获得家庭的许可,卖掉了他家在曼彻斯特的产业,搬到伦敦,以便把全部时间投入政治工作。他来到伦敦时,正是第一国际史上马克思和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之间斗争激烈的关键时期。在埋头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他被约请捍卫并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新唯心主义。因此,在19世纪70和80年代,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阐述为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他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合适的自然哲学,这就毫不奇怪了。

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10年20年前的那些问题。它们不再是19世纪50和60年代的思想问题了,而是政治问题。第一国际的建立,继1848年那次以后再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是米哈依·巴枯宁在他与马克思的权力斗争中首次提出来的。巴枯宁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独裁主义者”的同义词来使用的。^[42]“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巴枯宁在争夺国际的斗争中首次使用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上的追随者的同义词。^[43]1873年,在第一国际的日内瓦会议(Geneva Congress)上,马克思未来的女婿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看到了“把党马克思化”的需要。^[44]后来,“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在1882年第一次用作一篇论著题目。这一年,马克思的敌人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国际内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45]如果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一个政党,它就不不但要有政治教义,而且要有政治纲领。在19世纪50和60年代进行大量艰苦的研究并写作《资本论》后,到70年代,马克思不但健康状况很糟,而且心理上和思想上也精疲力竭了。他无法担当政治宣传家的角色,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恩格斯肩上。于是,恩格斯成了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人。^[46]而且正是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解释为科学社会主义,把马克思学说与自然界的关系统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当马克思的说教传

播到劳工运动中时,是恩格斯为那场劳工运动提供了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

把马克思主义这样教条化的最早的例证之一是1859年恩格斯为《人民》(Das Volk)写的一系列分析马克思刚刚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被说成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始人。^[47]而且,论文中所描述的马克思和黑格尔、马克思和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关系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包含的论点一致。1878年,恩格斯还在《人民历书》(Volks - Kalender)报上刊登了一篇评论马克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被说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现者,^[48]是“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49]恩格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教条说成是科学社会主义。有趣的是,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从没提到马克思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发现者。恩格斯经常提到马克思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者,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他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提并论,说他们是19世纪寻求并找到了历史和社会规律的两位巨人。^[50]甚至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没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发现归功于马克思,而是强调说,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是剩余价值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51]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化的极好例证,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极好例证。《反杜林论》与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唯物主义

和经验批判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列宁的这两本小册子都是作为半政治性的文章写的,是他解释并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理论上的敌人的努力。《什么是“人民之友”》是讽刺民粹主义者(Populist)的,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则是对列宁所称的新唯心主义的批判,这种新唯心主义反对19世纪一般唯物主义、尤其是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反杜林论》也起到了与这两本小册子相同的作用,因为它摒弃了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的新唯心主义理论,并加强了年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团结,反对了内部分裂;它是“一部战斗的著作。”^[52]

虽然在哥达(Gotha)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实现了团结,但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由几个派别组成的。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的讲师欧根·杜林是这些持不同政见的派别之一的成员。党的官方喉舌《人民国家报》(Volkstaat)被迫刊载了许多表达杜林立场的文章。最后,在187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党内的支持者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在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表达了反击杜林的需要。^[53]尽管马克思已经批判了哥达纲领(Gotha Program),但他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支持他们的拥护者威廉·李卜克内西最有利于他们自己。反击的任务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他当时正在写作后来作为《自然辩证法》发表的材料,为了反击杜林,他把正在从事的工作放在一边,因而他打算写成的关于自然和辩证法的重要著作永远也没有完成。^[54]不过,《反杜林论》却完成了。它首先从1877年1月至1878年7月在《人民国家报》上连载,并在1878年首次出了单行本。^[55]

从哲学层次上来说,杜林确实代表了新康德主义的复活,认为康德也许是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杜林完全漠视黑格尔,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称作“阿拉伯式的辩证法”。^[56]他的自然哲学是康德和进化论的有趣的混合。他抛弃了感觉主义的认识论,因为它无法

解释空间和时间的概念,他坚持认为空间和时间是先天观念。他论证说要用数学方法研究自然,以区别于机械的方法。^[57]杜林相信进化论,但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他讨厌自然界斗争的观点,也讨厌历史中阶级斗争的观点。实际上,尽管杜林是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员,他在哲学研究中却从未提到马克思。杜林更喜欢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Monet, Chevalier de Lamarck)和孔德(Auguste Comte),喜欢没有斗争的进化改善的观点。^[58]他是按照有机模式思考的,而不是按照马克思的矛盾模式思考的。杜林的思想中还有生理学的方面,因为他把人的“内驱力”(‘drives’)说成是社会合作的基础。^[59]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是由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一前提和社会条件决定的。杜林则认为,社会主义是在普遍情绪中早已存在的团体意识中产生的。^[60]最后,在经济领域,杜林是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的追随者,而凯里是马克思所不齿的美国经济学家。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杜林的影响要小一些,不过他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代表了如此多的思潮,这些思潮一直到今天还在烦扰着马克思主义。杜林的新康德主义后来在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的著作中得到了反复的阐述,杜林反对历史辩证法的进化主义也在后来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费边派(Fabians)的著作中一再得到响应。杜林对“内驱力”的强调,对生命的生理要素的强调,后来又出现在波格丹诺夫(A·A·Bogdanov)、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赖希(Wilhelm Reich)的思想中。结果,恩格斯对杜林的反驳使马克思的观点教条化了,因为它规定了一些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们就是在这些前提下论证他们的立场,反击唯心主义,反对生机论和进化主义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确立的立场把经典的教义变成了公式,马克思主义就是用这个公式来保护自己,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就是例证。

虽然《反杜林论》是欢呼社会主义和科学相结合的主要著作，但这个主题在恩格斯后来的两部论战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这两部著作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恩格斯的科学和社会主义的融合中，黑格尔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的辩证法为这种融合提供了依据。因此，《反杜林论》不仅说明了恩格斯是如何把马克思教条化的，同时也使我们看到恩格斯是如何理解和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我将讨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黑格尔的理解，并以此探讨恩格斯如何笼统套用黑格尔的方式。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是德国唯心主义的顶峰。虽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是辩证法的阐述者，但真正把辩证法带回哲学的中心，使它再次享受在爱利亚学派(the Eleatics)那里的地位的人却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核心是历史性的观点。有趣的是，恩格斯意识到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本身并不是历史的，因为黑格尔只把历史进化归于精神。^[61]尽管如此，却是恩格斯把过程概念从黑格尔的精神背景中提取出来，并把它移植到黑格尔将它排除出去的领域——自在的自然界。

恩格斯论证说，18世纪法国科学的进步创立了唯物主义的一种静态形式。他强调说，19世纪的唯物主义并不包括自然界本身是历史的这一概念。法国启蒙时期的科学倾向于孤立地看物体，把它们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在这方面，恩格斯对于18世纪科学和思想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空白。他知道康德、拉普拉斯和赖尔的巨大进步，但是不知道编史工作中的苏格兰学派(the Scottish School)和他们的历史进化四阶段的理论，也没提到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达朗贝之梦》(D'Alembert's Dream)中所包含的进化理论。令人惊奇的是，对科学史进行了如此广泛研究的恩格斯，对莫佩尔蒂(Pierre-Louis Moreau de Maupertius)在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却一无所知。莫佩尔蒂不但为康德的《自然通史与

天体理论》提供了一些真实的数据,而且把进化的概念运用到遗传研究上。^[62]显然,恩格斯关于18世纪思想的知识是很不准确的,因为他没有把这一时代为现代的进步[按照伯里(John Baynell Bury)的说法]和历史性[按照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说法]观念的诞生作出过贡献的很多人物考虑进去。由于恩格斯对于18世纪历史主义传统的全貌缺乏了解,他在思想上只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把18世纪看成是信奉机械唯物主义的。从这个高度上,恩格斯可以肯定,黑格尔的过程概念使科学可以超越这种机械形式。辩证唯物主义,或恩格斯所说的现代唯物主义,克服了自然永远不变这种观点,并通过把运动法则看作是自然过程的内在规律而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63]

恩格斯提供了一种明确的赫拉克利特式的辩证法观点。恩格斯认为,第一个“关于世界的正确概念是古希腊哲学的概念,最早清楚地阐述这一概念的是赫拉克利特:一切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因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动,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它们不断地出现,又不断地消失。”^[64]物质是第一性的,而如果没有运动,物质是不可思议的。“辩证法只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65]

《反杜林论》也探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其他程式,因为就是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首次阐述了使运动处于首位的辩证法三原理: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得到了充分的阐述,正像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样。尽管对立统一规律没有明确地作为第三条规律提出来,恩格斯却强调了矛盾这一主题,使它成为量和否定之外的第三个因素。在谈到量的那一部分中,我们可以感到肖莱马的存在,因为为了说明化学上量的变化如何能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恩格斯引用了肖莱马的碳氢化合物实验为根据的例子。恩格斯说到了甲烷,而甲烷正是肖莱马用作试验的化合物。^[66]恩格斯认为,运动的概念和辩证法三原理已经上升为一种形式逻辑。^[67]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辩证唯物主义断言,辩证规律是一切存在的运行基础。如果把这些辩证法原理假定为一切存在的先决条件,那些基于这些原理的科学就会废除哲学,因为那种科学会接近绝对的实在。那样,辩证唯物主义就成了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陈述,而且恩格斯所信奉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苏联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先驱。

在讨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方面,《反杜林论》没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谈得那么深。在后一部著作中,恩格斯下的定义是:唯物主义相信物质不依赖精神而存在,唯心主义则认为物质依赖精神而存在。恩格斯断言,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相信,“事物和它们在思想上的映象、观念是分离的。”^[68]而且,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唯物主义者相信思想是“真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抽象映象。”^[69]虽然恩格斯没有详细讲述认识论,但很清楚,他已经在物质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实在论的立场,在认识论方面采取了感觉论的态度。在后来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绝对实在论和感觉论得到了更全面的发挥。

在当时,《反杜林论》体现了对于黑格尔学说的革命性的运用。恩格斯利用黑格尔来克服他错误地认为在18世纪法国自然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机械唯物主义。而且,在唯心主义复活的时期,《反杜林论》捍卫了唯物主义。恩格斯肯定存在先于思维。作为黑格尔左派的成员,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和马克思也把左派黑格尔主义跟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反杜林论》的出版坚持了青年黑格尔激进主义的传统。通过阐释一种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不是我们此刻讨论的话题——《反杜林论》是以左翼黑格尔派继承者的身份出现的。

不管《反杜林论》以什么身份出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是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在套用黑格尔的时候,已经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一元论以及绝对实在论融合起来了。黑格尔用来分

析意识和精神活动的逻辑范畴,被恩格斯用来分析物质的自然界。这就构成了恩格斯式的对黑格尔的颠倒。

在黑格尔的学说中,自然界是精神的对象化。自然界反映精神的辩证运动,因为它不能“自为”而存在,只能“为他”而存在。自在自然界是机械论的,但是自然界为之而存在的“为他”却把它扬弃为辩证的。恩格斯把辩证法限制于自然界的“自在”中,因为黑格尔学说中非物质现象的范畴,在恩格斯的颠倒中变成了物质现象的范畴。这样,黑格尔这位精神上的形而上学论者就被转变成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者。形而上学是黑格尔和恩格斯两人思想的共同特征,因为当恩格斯把黑格尔的范畴和自然科学融合起来时,辩证法便产生了一种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然而,恩格斯却一直表现出对先验范畴的敏感性。他一开始是一个相信有天意上帝的加尔文派教徒,后来成了追随理性泛神论的黑格尔的信徒,最后成了寻求自然界基本规律的科学家。在恩格斯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倾向于先验的范式,所不同的只是他的先验主义形式有所改变。

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也导致了欧洲劳工运动在科学意义上的合法化。辩证唯物主义被说成是包含了宇宙的最终真理。这些真理中,有一条特别指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必须改变。对于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运动来说,变化的不可避免性这一规律只能解释为它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合法性。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阐述刚刚完成,就立即遇到了挑战。很显然,恩格斯在世时,欧洲各社会民主党内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异议被制止了。从他死后到1945年以前,出现了两次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大浪潮,每一次都由许多不同的学派组成。第一次表示异议的浪潮主要出现在1895~1914年。在这次浪潮中,有三个主要的反对学派:新康德派、生机论派(Vitalist)和黑格尔派。新康德派的异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康拉德·施米特。生机论派反对意见的主要发言人是波格丹诺夫,他受到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和理查德·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哲学的影响。黑格尔派的反对意见是由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赫尔曼·郭尔特(Herman Gorter)和鲁道夫·蒙多尔福(Rodolfo Mondolfo)表述的。就潘涅库克和郭尔特来说,1897~1914年间黑格尔派的主张掺合着大量的达尔文主义的成分。至于蒙多尔福,黑格尔的影响则和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唯心主义混合在一起。第二次反对浪潮跨越两次世界大战,其中1923~1939年的主要学派是黑格尔派,因为达尔文学派的影响已经消失。第二次浪潮中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乔治·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以及卡尔·科尔施。由于长寿和思想丰富,潘涅库克的著述年代跨越了两个浪潮。

很显然,在反叛辩证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有许多因素可以把波格丹诺夫生机论的主张和伯恩斯坦、施米特新康德派的主张联系在一起,但也有同样多的因素可以把他们分开。与此相似,在第一次反对浪潮中的黑格尔主义(克罗齐)和第二次反对浪潮中的黑格尔主义(卢卡奇)之间的不同意见也和他们之间的一致性同样多,后者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获益匪浅。然而,抛开大量的差别不说,各种学派在两个关键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否认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基本意思,都肯定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们都拒绝承认唯物主义和物理学之间的联系,而重视强调思维的活动和力量。由于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不同学派的成员常常提出疑问:恩格斯究竟是不是马克思最好的解释者?伯恩斯坦、蒙多尔福、葛兰西、科尔施和卢卡奇都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时,偏离了马克思的意图和精神。

1914年以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考茨基主义(Kautskyism)在政治上的胜利使辩证唯物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也取得了胜利。1918年布

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胜利后,在这第二个时期,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证明仍是胜利者。列宁在1918年的胜利悲剧性地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胜利,而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意味着机械唯物主义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教条,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的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anism)则被贴上异端邪说的标签而逐出了这个领域。到列宁时代为止,辩证唯物主义一直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官方理论,但使机械唯物主义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却是斯大林。这两次浪潮中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混合是一个复杂的网。由于一些只能从历史上解释的原因,获胜的那些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跟形而上学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联合起来了。需要分析的关键问题是,偏离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如何成了获胜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与此同时,坚持马克思基本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却成了处处失败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意识形态。政治上的失败招致了意识形态上的压抑。

一 第一次浪潮(1897~1914年)

为了对马克思主义内部各个不同时代的哲学加以系统的、依时间先后的叙述,本章的以下部分将分成四个小部分,各个小部分的标题是:(1)第一次浪潮,1897~1914年;(2)第二次浪潮,1923~1939年;(3)毛泽东主义的继续;(4)马克思。

伯恩施坦和施米特的新康德主义局限于一种进化论的社会主义。这些人不但否认资本主义马上就会崩溃,而且宣布放弃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他们受到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谴责。新康德主义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实际掌权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唯一目的和证明这个运动正当的最高准则,而是强调社会主义可以作为进化的改革而合法化。新康德主义贬低阶级斗争这个主题的重要性,而把道德的感染力和劝诫看作是带来社会变革的力量。

伯恩施坦和施米特的观点中有不少带有和德国资产阶级进行社会合作的味道。考茨基攻击他们是修正主义,坚决赞同阶级战争和社会革命的观点。与伯恩施坦和施米特相比,考茨基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革命者,正因为如此,考茨基主义在政治上占了上风。新康德主义是一种混合的传统,因为在政治层次上,它引向社会和平与资产阶级国家合作的策略,而在哲学层次上,它导致伯恩施坦和施米特拒绝辩证唯物主义。伯恩施坦/施米特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之间的论战主要刊登在《新时代》(New Zeit)上。然而,这场论战最早发难的一篇文章既不是伯恩施坦写的,也不是施米特写的,而是早在恩格斯死后仅两年的1897年,由J·斯特恩(J·Stern)写的。

在《经济的和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Der ökonomische und der naturphilosophische Materialismus’)这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中,斯特恩区分了这两个概念。斯特恩显然是在寻找唯物主义的定义,并正确地把哲学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希腊原子论者古典形式的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是从物质的概念出发的,斯特恩恰当地把这看作是一元论的一种形式。与此相反,经济的唯物主义则是一种历史的学说,而且它主要关心的不是物质,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生活形态。哲学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凭着敏锐的洞察力,斯特恩意识到,马克思不是形而上学论者。他还意识到,马克思是一位经济上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70]

伯恩施坦进一步发挥了斯特恩的这种见解,但他这样做是从对一般形而上学进行康德式的批判这一角度出发。康德不仅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绝对实在论是不可能的,而且认为任何一种形而上学都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伯恩施坦攻击了恩格斯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核心。伯恩施坦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确切地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根本就不可能是一种科学。^[71]事实上,他

乐于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批判社会主义”。〔72〕

伯恩施坦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斗争的焦点是历史的决定论和必然性问题。伯恩施坦反对把唯物主义和物理学搅在一起。不能把社会历史等同于物理学的决定性规律,社会运动中没有必然性。〔73〕根据这些理由,他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预言是没有根据的。伯恩施坦赞同斯特恩的观点,认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完全行不通的,而作为对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矛盾的一种批判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社会研究的一种恰当方法,这种方法与康德的认识论原理是一致的。〔74〕

伯恩施坦认为,唯物主义不应只关心物质及其规律。如果以为唯物主义只对物质及其运动进行考察,就容易忽视观念和意识这种作为原因的力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伯恩施坦并不想成为观念主要由社会存在决定的那种社会学的牺牲品,他宁愿颠倒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认为,观念在社会存在之外另有来源和所在,意识不仅独立于社会存在,而且是社会进化的一种决定力量。〔75〕

康拉德·施米特在他的著作中重复了伯恩施坦对科学形而上学的攻击。〔76〕但是伯恩施坦却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发现恩格斯并非总是正确地阐释马克思的理论,就这一点他写道:

有时恩格斯没有准确地解释马克思的理论,现在这个例子尤其是如此。恩格斯在这里的阐述与我们所知的马克思的说法不相符。恩格斯引用的这句话,可以赋予跟他的表述的完全不同的意义。〔77〕

此外,伯恩施坦发现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简直就是神学的

另一种形式。伯恩施坦写道：“这就是唯物主义者——一个没有上帝的加尔文派教徒。”^[78]伯恩施坦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形而上学只不过是对早期宗教形而上学的一种修正。伯恩施坦没有明确地点恩格斯的名，却用一句话无意中勾画出了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脉络。

在伯恩施坦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法国革命传统是不相关的。他用进化论取代了阶级斗争和暴力夺取政权的主题。由于受达尔文的影响，伯恩施坦摒弃了矛盾的社会模式，而阐述了一种渐进的进化理论。在伯恩施坦那里，社会进化取代了物理过程，因为他不是主要地从物质和运动方面去考察，而是从社会群体和物种改善的角度进行考察。^[79]19世纪末进化论思潮的巨大影响极大地冲击了马克思主义思潮。潘涅库克也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与那些主张把物理学放在首位的人不同。波格丹诺夫是个医生，他受过福雷尔(Auguste-Henry Forel)的生理生物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不得不屈从于达尔文主义的支配地位。

伯恩施坦还割断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联系。伯恩施坦的马克思主义是康德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他嘲笑黑格尔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对立的辩证法，因为对一个相信社会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来说，黑格尔的内在矛盾和转化的观点就太激进了。这样，伯恩施坦就切断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论联系。他的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修正主义者。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从与黑格尔的联系中割裂出来，把它置于与康德的联系之中。他希望用纯粹的批评取代辩证法，用一种对存在事物的概念式批判取代由于社会对立而出现的历史运动。这里包含了伯恩施坦的道德主义，也表现出他丧失了革命热情。^[80]

生机论者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不同于新康德主义者。伯恩施坦和施米特首先是否认一般形而上学的有效性，不论是思辨的还是科学的。生机论异议的主要发言人A·A·波格丹诺夫则从

社会生物学原理开始他的系统思考。不论是波格丹诺夫还是对他发生了影响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他们的理论都是由于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而形成的。渐渐地,科学和哲学都对“自在之物”是可知的这一认识论的结论产生了怀疑,也对力学是研究外部自然界的合适模式这一认识论的断言提出了疑问。随着新的科学证据的出现,原因决定论和科学规律等等概念都处于重新定义的过程之中。因此,机械物理学的认识论基础被逐渐掏空了。在这种情况下,波格丹诺夫不是从物理学的模式出发,而是从生物学的模式出发研究社会。他代表了从牛顿式(Newtonian)基础到达尔文式基础的社会思维的重新取向。

虽然波格丹诺夫受了马赫的影响,但他的理论却不局限于单纯马赫的影响之内。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认为波格丹诺夫是马赫主义者(Machian),^[81]但列宁的这种说法失之于过分简单化。马赫不仅否认物理学的机械模式,而且否认绝对实在论。在这些方面,波格丹诺夫承认他受了马赫的影响。像马赫一样,波格丹诺夫根本的思辨力量产生于达尔文的生物学基础,即生物体必须适应于它周围的环境。在我们全面地讨论波格丹诺夫的哲学之前,对马赫的思想进行一番总结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既可以作为评价波格丹诺夫的前言,也可以作为分析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背景材料,因为在该书中,列宁对各种形式的马赫主义进行了抨击。

像新康德主义者那样,马赫也是从分析意识入手进行推理的。但是,伯恩施坦和施米特热衷于意识的逻辑性,马赫则对知觉感兴趣。伯恩施坦和施米特说明了意识的逻辑限度,马赫则更注重感觉,意识的抽象过程就是从感觉开始的,伯恩施坦和施米特的出发点是康德的逻辑批判,而马赫的出发点是休谟的经验批判。马赫代表19世纪那股探索内在心理过程的思潮,这股思潮从马赫一直延续到柏格森(Henri Bergson)、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弗洛伊

德。由于受物理学危机的影响,马赫认为外部实在本身是感知不到的。19世纪后期经历了一场对内心世界的有力探索,出现了从外部世界的撤回,即由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在这场运动中,马赫探讨了内在时间,即经验的内在延续性。

受休谟和阿芬那留斯的影响,马赫坚持认为,心灵的最原始的材料乃是感觉经验。从认识论上说,出现于心灵的感觉能被心灵感知,而在这些感觉背后的感觉来源则是永远不可知的。^[82]人的心灵从这种感觉材料开始形成概念,进行抽象,通过对一组感觉与另一组感觉的联结、组合过程,便形成了抽象概念。原来,思想并不反映社会状况或物理现象,思想反映的是感觉经验。^[83]

马赫强调心理生理学,他把感觉经验的组织原则看成是一种本能或反射行为。他认为必须首先有感觉的延续性,才能形成思想,也就是说,感觉经验必须持续,必须经历一段时间。^[84]马赫不是唯独地从原因、从决定论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按照目的论的解释来思考的。^[85]一个生物体之所以被创造的目标、它的目的性决定了它的功能。因此,这个生物体的目的,即它渴求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愿望,也应被看成是它的感觉经验的一个组织原则。^[86]

正因为马赫认为感觉经验是人的观念的基础,所以他认为要了解自然规律本身是不可能的。根据他的认识论,人们所认识的是感觉材料的联结。^[87]他像贝克莱(George Berkeley)那样,坚持认为要是没有感觉,外部实在对人来说就不存在。因此,他否定了一种按照力学模式构造的自然哲学。^[88]这样,马赫便是在寻找与古希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古典模式不同的道路,以构想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从而对物理学的危机作出贡献。其实,马赫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他不赞同物质实在性的观点,而是个支持感觉经验实在性的彻底经验主义者。他希望发现新的自然哲学,这种自然哲学必须区别于古希腊和牛顿的自然哲学,而与他提

倡的休谟的经验主义一致。^[89]

马赫是一个批判的经验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则是个生机论者。不过,波格丹诺夫也承认他从马赫那里获益匪浅。在1908年《新时代》上刊登的《恩斯特·马赫与革命》(‘Ernst Mach and the Revolution’)这篇文章中,波格丹诺夫写道:“马赫的哲学是科学知识两个基本领域之一——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先进趋势的代表。”^[90]作为医生,波格丹诺夫与生活的自然—社会各方面要协调得多,而不是与感知方面相协调。马赫的哲学是一种关于感知的哲学,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则是一种关于实在的自然—社会建构的哲学。适应性、反射、内驱力这些生物学主题在波格丹诺夫的思想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它们不但把他引导到关于社会组织的技术问题上,而且把他引导到意识形态史的领域。波格丹诺夫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很相似,他俩都研究世界观的起源。不同的是狄尔泰把世界观的产生和发展与心理过程联系起来,波格丹诺夫则把世界观的产生和发展与生物体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需要联系起来。

波格丹诺夫的思想有达尔文主义的印记,因为他把整个生命看作是生物体为在自己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而进行的斗争。维持生存的主要机制就是生物体适应变化无常的环境的能力。^[91]同样,意识形态、思绪模式也都由生物体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所决定。思想产生于语言,意识形态是意识的表现形式,生物体通过意识才用最好的方法选择信息以保证自己的生存。^[92]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是生物体适应能力的功能表现。从生物学上说,意识形态是使生物体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因而更好地生存的概念形式。从社会的层次上看,意识形态是一些组织原则,通过这些原则,社会构成其科学知识,以便改进它与其经济环境的适应关系和生产关系。^[93]

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Empirio - Monism)有三个版本,初版于1904年问世,第二、三版分别出版于1905年和1906年。波

格丹诺夫在书中概括了他从马赫那里继承来的思想,把知识归结为感性知觉的一元论。书中还明确地表述了马赫的其他观点,比如外部世界及其规律的无法认识性。^[94]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的正是这本书及其马赫的传统观念。列宁主要捍卫了恩格斯式的唯物主义,集中批判了马赫和波格丹诺夫对古希腊罗马自然哲学的古代唯物主义的否定。但是,列宁没有看到波格丹诺夫思想的其他方面,而这些方面在波格丹诺夫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稳固的发展。因此,《经验一元论》只是波格丹诺夫思想的一个方面。更重要得多的是,他意识到了一般意识的社会生成基础,以及特殊的意识形态(科学)的社会生成基础。

波格丹诺夫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坚信,对马克思的方法的正确运用就是要把社会当作生产单位去剖析。他认为,唯物主义与物质无关,而是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与生命生存条件的生产联系在一起。因此,波格丹诺夫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生成的唯物主义,它把每项社会事业都规定为一种社会现象。^[95]

作为政治上的行动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的位置一般都在列宁的左边。^[96]波格丹诺夫是个布尔什维克,是布尔什维克左派的领袖。1917年前,布尔什维克左派构成这个党的激进派,他们一直主张立即举行武装暴动、推翻沙皇(Tzar)。波格丹诺夫的生机论,他对意志和内驱力的作用的强调,决定了他会想出更带唯意志论和冒险主义色彩的革命政策。因此,波格丹诺夫不仅是政治上的激进派,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而且是文化上的激进派,提倡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化平等主义,这是跟他的一贯思想完全相符的。列宁反对波格丹诺夫政治上的行动主义和文化上的平等主义,他深深地懂得,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都需要一个专门的领导。不过,在第二届杜马(Duma)(沙皇俄国时代的议会——译者注)期间,波格丹诺夫和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竞选运动和论争中站在了一起。但是波格丹诺夫和列宁的联盟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列宁厌恶波格

丹诺夫的马赫主义和经验一元论。而且在第二届杜马以后,波格丹诺夫重新坚持他的政治上的生机论,并再次鼓吹要立即进行武装暴动和群众革命。这种对群众自发性和意志的强调经常引起列宁的反感,于是他向波格丹诺夫和布尔什维克左派宣战,把他们清除出党。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是一项政治禁令。列宁任何时候都站在反对工团主义即卢森堡革命左派(the Luxemburgian revolutionary left)的立场。他后来在1909年战胜了波格丹诺夫,1921年战胜了卢卡奇和潘涅库克。更重要的是,1909年列宁的胜利标志着波格丹诺夫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消沉,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捍卫了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结果是,列宁在政治上对波格丹诺夫的胜利意味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形式和对波格丹诺夫哲学思想的压制,对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维护和倡导。

第三个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学派的领导人是安东·潘涅库克和郭尔特,受狄慈根(Joseph Dietzgen)的影响,他们成了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黑格尔学派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这方面,黑格尔学派与波格丹诺夫派以及伯恩斯坦/施米特派是不同的。波格丹诺夫从生物反射方面进行思考;黑格尔学派则从概念方面考虑;伯恩斯坦和施米特却公开批判黑格尔。无论是伯恩斯坦还是施米特都无法接受辩证法以及它的矛盾、对立、转化的概念所包含的政治内涵,而这恰恰是潘涅库克和郭尔特所接受的黑格尔学说的那部分,因为他们对辩证法性质的思考始于否定和超越的前提。伯恩斯坦和施米特相信政治进化论,潘涅库克和郭尔特却是革命者。从相信意识的构成作用出发,潘涅库克和郭尔特走向了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左派的方向。尽管波格丹诺夫和潘涅库克/郭尔特在活动性的源泉上看法不同,一派认为是生理的,一派认为是理性的,但是他们都把着重点放在人类和存在的活动方面,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潘涅库克和郭尔特的黑格尔主义并不是直接来自黑格尔。对这两位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具有直接影响的是——一位名叫约瑟夫·狄慈根的德国制革工人写的书，而这个人哲学知识是通过自学获得的。狄慈根相信了马克思主义，他是第一国际的成员之一。1869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人脑活动的本质》(The Nature of Human Brain - work)的书。狄慈根缺乏正规教育，他在书中试图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运用于意识领域。对于他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熟悉，实际上，马克思曾写信给这位制革工人，对他的书表示赞扬。^[97]虽然狄慈根的著作有时也显露出作者在正规教育方面的缺陷，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所显示的朴素的洞察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98]在20世纪，列宁也为狄慈根的著作辩护过。^[99]然而，最感激狄慈根的还是安东·潘涅库克。是他给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的第一个美国译本写了序言；^[100]是他在《新时代》上为狄慈根辩护。^[101]最重要的是，潘涅库克指出，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的是马克思，而狄慈根在社会主义史上的作用是继承和完成了马克思的使命，把辩证法运用于意识领域。^[102]

在《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书中，狄慈根从黑格尔的两个基本原理入手进行探讨，即主体和客体的区别，理性和知性的区别。他在两个层次上对主体——客体关系进行了研究。为了尽可能地与经验主义的传统相一致，他承认一切思想开始于感性知觉。^[103]第一层次是意识与它的对象——感觉材料的最初接触。但是意识不会停留在感觉材料的层次上，而是自然地发展，以形成概念。在更高的第二层次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引起意识和概念的汇合。在这一阶段，意识对概念进行审查。由于狄慈根基本上是在黑格尔的主体——客体框架内进行研究的，因此他引入了辩证法的基本过程，不过这是概念的辩证法过程。

此外，主客体的模式使狄慈根像黑格尔那样清楚地认识到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感性知觉的基础是一切思想的起源，这是知性

的层次,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就是自然规律的王国。然而思想会发展到理性,也就是说,思想不会停留在感觉材料上,而要从特殊性中寻找普遍性。普遍性的层次就是理性的层次,因为这就是形成概念的层次,而形成概念正是思想发展的自然方向。狄慈根的知性理论对于正确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避免了恩格斯那种把知识降低到知性层次的错误。狄慈根意识到,研究感觉材料固然重要,但审查概念也同样重要。

在他的黑格尔式前提的基础上,狄慈根承认思想具有某种内在的特性。也许思想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它有普遍性的趋向。^[104]狄慈根认识到,无差别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因此,意识不仅必须具有概括的功能,而且必须具有区别的功能。这样,狄慈根又运用了黑格尔的对立图式,认识到概括包含区别这一原理。^[105]他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辩证法的领域,这种辩证法是对社会辩证法进行补充的辩证认识论。^[106]

狄慈根著作的影响存留在潘涅库克的著作中。潘涅库克称狄慈根为“无产阶级哲学家”,^[107]把他放在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社会主义集团中同样重要的位置。^[108]他还知道狄慈根站在“粗陋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对立面。^[109]潘涅库克所说的“粗陋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指的是使思想完全依赖于自然的认识论观点。在这个名词中,他包括了古希腊原子论者的自然哲学,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自然哲学。与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相反,潘涅库克坚持狄慈根的唯物主义,把感觉材料的可靠性与能动的意识观念结合起来。他认为狄慈根把思想的构成性质从原始唯物主义那里拯救出来的。

由于潘涅库克反对“粗陋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他也明确地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他更关心意识的辩证法,因而认为辩证法并不在物质中起作用。在达尔文与牛顿之间,他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达尔文,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他的达尔文主义又与伯恩施

坦和施米特的不同。作为进化论者,伯恩施坦和施米特认为达尔文的发展规律在动物和社会领域同样适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 and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潘涅库克把达尔文和马克思严格地区分开来。他认为,达尔文和马克思各自在自己研究的不同领域找出了发展规律。他还认识到达尔文主义只能运用于对动物王国的研究,而不能用来研究社会。相反,马克思主义适用于研究社会,而不是动物王国。马克思是一个辩证论者,而达尔文却是一个进化论者。尽管他们都描述了发展,但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110]

潘涅库克从“实践的理性”而不是从“理论的理性”来看待人生。他认为人是必须采取行动,作出决断,而不是闭门沉思的存在物。人最主要的不是“自然的旁观者”,^[111]而“首先是具有需求、意志和行动的存在物。”^[112]根据这些原理,潘涅库克反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理想。在他看来,研究和探索自然是第二位的,^[113]人的实践才是第一位的。^[114]

潘涅库克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这方面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列宁一致,与伯恩施坦和施米特不同。但他认为,伴随着阶级斗争的,是世界观的斗争。意识形态是在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潘涅库克认为,历史上一个阶级的胜利同时也会带来某种意识形态的胜利,这与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中阐述的观点相似。资产阶级战胜了地主贵族,带来了“粗陋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无产阶级将战胜资产阶级并带来社会和概念的辩证法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冲突归根结底是观念的冲突。^[115]潘涅库克把无产阶级的哲学观看作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继承。这样,无产阶级便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人。

因此,在潘涅库克看来,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的生产性力量的唯物主义。由于放弃了一切认识自在的自然的要求,所以,他不是

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在他看来,所有为发现外部自然的实证规律,为研究“自在之物”而付出的努力,都只是“粗陋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实例。^[115]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实践,是对生产的技术基础的理性创造,是作为经济力量的社会与其自然环境的交流。

郭尔特是荷兰左翼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发表过和潘涅库克相似的观点。^[117]他在《历史唯物主义》(*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一书中也对哲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区别。^[11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郭尔特和潘涅库克都是卢森堡的追随者,他们与卢森堡学派的人一起,反对考茨基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像卢森堡一样,潘涅库克是一个工团主义者,一位强调工人阶级的群众自发行动的革命者。^[119]1914年以前,潘涅库克在政治上政在考茨基主义手下,因为考茨基主义的政策和策略在第二国际取得了胜利。因此,在第二国际这段时期,潘涅库克的政策和策略受到排斥,而且,潘涅库克的哲学观也受到压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潘涅库克加入了荷兰共产党。他和郭尔特一样,也是荷兰共产党左翼的成员之一。即使在1921年德国革命失败以后,潘涅库克和郭尔特还继续谴责议会方针,极力主张采取直接革命的策略。德国的三月行动失败后,列宁认识到布尔什维克革命难以蔓延到西欧。作为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列宁看出了西方共产党暂时停止革命行动,转而采取议会策略的必要性,这遭到潘涅库克和郭尔特的坚决反对。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讨论荷兰共产党的那些部分,对潘涅库克和郭尔特进行了谴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恳求西欧的共产主义政党不要照搬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而应努力适应本国的政治形势,采取与各社会民主党派合作的政策。郭尔特后来反驳了列宁,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答列宁》(*R'eponse A*

Lenin)。在书中，他捍卫了左派工团主义，很客气地辩驳了列宁对于西方政治形势的评价，坚持在西方显然有可能以革命夺取政权的观点。^[120]然而，由于列宁控制了第三国际，他的政治主张战胜了潘涅库克和郭尔特的政治主张，而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成了第三国际这一时期的政策蓝图。列宁的政治胜利保证了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胜利。尽管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放弃了许多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阐述的观点和原则，但这些笔记当时没有发表，所以也不为世人所知。因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政治上的胜利确定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哲学上的胜利。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所有主要观点，第三国际的哲学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从1921年到1924年，布尔什维克内部的趋向是稳定、遏制和保守主义。潘涅库克、郭尔特、卢卡奇以及科尔施成了这个过程的牺牲品。

在第一次反对浪潮中，维护辩证唯物主义的任务落在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肩上。由于本书致力的是追溯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西欧到俄国和中国的全球性运动，它将主要讨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因为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的主要是他们。在哲学方面，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难以分开。在第一次反对浪潮中，列宁与考茨基也有紧密联系。在哲学问题上，列宁忠实地遵循普列汉诺夫的指教。直到1913年，列宁还称“普列汉诺夫是掌握了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欧洲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完全承认了这种评价。”^[121]由于普列汉诺夫在理论问题上追随考茨基，所以列宁在这些问题上也追随考茨基。不但考茨基，甚至普列汉诺夫都不会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任何观点表示真正的反对。

普列汉诺夫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是直接向伯恩斯坦/施米特和波格丹诺夫挑战。对于第一次反对浪潮中出现的新康德主义、生机论和新黑格尔主义这三种学派，普列汉诺夫的斗争锋芒直指新康德派和生机论者。在哲学观上，他没有直接与新黑格尔派的潘涅库克和郭尔特交锋。普列汉诺夫经常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很明显，普列汉诺夫在《新时代》上的文章不仅是他对考茨基哲学原则的维护，而且是对第二国际哲学原则的维护。

普列汉诺夫捍卫辩证唯物主义是有其政治缘由的。第二国际的政治策略与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联系在一起，它经验主义地确信：社会进程能够预言，而且是必然的。资本主义濒临灭亡是第二国际的观点之一，从这一观点出发，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例如考茨基，就能够驳斥像伯恩斯坦和施米特那样放弃革命的理想和希望的渐进主义者。他们还可以驳斥像波格丹诺夫那样的极端左倾分子，那些人坚持革命能够凭着无产阶级的意志和群众行动获得成功的观点，认为没有必要等待致使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崩溃的经济危机的到来。因此，第二国际的官方政策要求这样一种哲学：科学地理解社会是可能的；社会进程是可以预言的；最科学的材料证明，资本主义的崩溃既是必然的，也是预言之中的。

在第二国际的世界里，发展了一种哲学和政治的结合，它最终导致了一种官方世界观的发展。考茨基意识到这种哲学和政治的结合，普列汉诺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谈到必须有政治上的一致性和哲学上的一致性时，他并没有背离标准的做法。列宁对哲学上的党性路线的论证，只不过是对第二国际官方立场的重新表述。

在意识形态领域，普列汉诺夫在两条路线上作战，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把他的一些论著分类。《战斗唯物主义》（‘Materialism militans’）一文是反对波格丹诺夫和马赫主义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危机》（‘Alleged crisis in Marxism’）《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

(‘Bernstein and materialism’)、《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和《唯物主义与康德主义》(‘Materialism and Kantianism’)是为反对新康德主义而写的。普列汉诺夫的论战不仅限于生机论和康德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的矛头直接指向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的著作。他认为拉布里奥拉的著作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普列汉诺夫论战的范围表明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激烈程度,这种斗争震撼了第二国际。正如上述有些论文的标题所示,这些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正是唯物主义问题。

普列汉诺夫追随恩格斯所倡导的主要思想路线。他在论著中对唯物主义的描述是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提出的主要论点的进一步阐述,只是他没有谈到认识论方面。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势不两立。唯心主义强调物质对于精神的依赖关系,唯物主义则强调物质不依赖于精神而存在。^[122]普列汉诺夫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者,因为他坚持宇宙的本体是物质。因此,运动中的物质是自然辩证法的基础,是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源泉。唯物主义确信:任何感性知觉都有其起源,那就是在精神之外,并且是完全不依赖于精神的物质源泉。^[123]普列汉诺夫是彻底的实在论者,他促使了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相信成为第二国际的一条信仰原则。

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很大部分是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确立了黑格尔之后的唯物主义原理。普列汉诺夫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采用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原理,并把它们运用于18世纪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确立,首先被运用于19世纪的文化领域。通过把恩格斯的原理扩展到过去的时期,普列汉诺夫参与了对恩格斯世界观的传播。

根据普列汉诺夫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其他任何

形式的唯物主义都不同。郎格在《唯物主义史》（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一书中把唯物主义分成两个时代，即康德前的唯物主义和康德后的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对这本书持批判态度。普列汉诺夫不是把康德看作唯物主义史上的分水岭，因为是黑格尔把运动的观点引入了近代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以及一般的近代唯物主义是以黑格尔的思想原则为基础的。黑格尔认为自然本身是历史的，^[124]因为“辩证法是唯物主义最显著的特点”。^[125]普列汉诺夫把辩证的方法看作是自然界事物运动和变化的同义词。这样，他就分解出了两个基本规律。仔细分析起来，这两个基本规律只是对自然事物的历史性这个主题的说明。第一个规律是：“一切有限事物的本质在于它会自身消亡并走向其反面。”^[126]第二个规律是：“一定范围内不断的量的变化会最终转换为质的不同。”^[127]普列汉诺夫归纳的是两个规律，而恩格斯却指出了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普列汉诺夫没有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另外，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最重要的规律是质量互变规律，而普列汉诺夫则认为辩证法最重要的规律是对立规律。除了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的这些分歧外，普列汉诺夫的对立规律以及质量互变规律是他认识自然辩证法的基础。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贯穿了整个历史。普列汉诺夫对西方思想史提出了一种二元的摩尼教式的看法。相对立的这两个思想营垒都有一元论体系的倾向。普列汉诺夫相信，正像每一个唯心主义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一元论一样，始终一贯的唯物主义者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属一元论体系，因为它所依据的原则是：物质是宇宙的本体论基础。^[128]与此相对，黑格尔和康德则坚持精神是宇宙的本体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唯物论都有其阶级基础。18世纪时，与专制主义和宗教作斗争的资产阶级支持形而上学的唯物论；19世纪时，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和唯心论的斗争

中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普列汉诺夫也接受了恩格斯的认知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即阶级决定哲学观。^[129]

在分析18世纪的唯物主义时，普列汉诺夫特别地对霍尔巴赫（Paul Henri Dietrich, baron d' Holbach）和爱尔维修（Claude - Adrien Helvétius）表示了高度的赞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有一个主要缺陷：它缺乏自然的历史性观点，所以它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130]然而，恩格斯在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普列汉诺夫继续了恩格斯在这方面的探索，他发现法国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是马克思在唯物论方面的先驱。

于是，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黑格尔以后的唯物主义生来就是辩证的。像恩格斯那样，普列汉诺夫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是赫拉克利特式的。他在解释赫拉克利特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时，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概括为：“一切皆流，一切皆变，一切皆亡。”^[131]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是一种关于自然的哲学，它以物质本体论和物质运动的规律为基础。它包括了历史唯物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普列汉诺夫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作出一些有益的贡献。虽然他知道生产关系归根结底是由生产资料产生的，但他清楚地意识到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普列汉诺夫没有单纯地从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角度分析社会，他发现，起先产生于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家庭、团体、和社会习俗本身也能发挥决定性的原因作用。这是普列汉诺夫具有丰富内涵的见解，他看到，不能简单地以机械的眼光看待社会。他认为，自然的唯物主义和社会的唯物主义是有区别的。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学作了较广意义上的解释，他较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意义的阐述。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在他去世后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也随他的去世而结束。无论如何，即使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仍被归为辩证唯

物主义。

像恩格斯那样，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部分地产生于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唯灵论背景中取来辩证法，把它颠倒过来，并把它重新置于唯物主义的背景之中。普列汉诺夫也像恩格斯那样，用革命的观点阐释黑格尔的理论。首先，由于具备了上面所说的那些资格，普列汉诺夫强调马克思的理论是对黑格尔的理论的继承。其次，他把黑格尔本人看成是进步的，因为黑格尔关于过程的概念使他成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奠基人之一。^[132]不应该把黑格尔看作是普鲁士秩序的保守的捍卫者，而应该看作是一个自由派，是一个坚持过程观、了解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必要性的人，普列汉诺夫还认为，19世纪的无产阶级是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合法继承人。与恩格斯和卢卡奇相似，普列汉诺夫认为是无产阶级使黑格尔内在的革命潜流永存于世。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革命方面需要一种武器：无产阶级就是这种武器。^[133]实际上，普列汉诺夫论证说，只要黑格尔忠实于自己的辩证法，忠实于过程的观点，他就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进步分子。^[134]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继承性的强调，乃是对俄国黑格尔主义传统的回答。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改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思潮的推动。在19世纪60年代的西欧，人们带着偏见看待黑格尔，认为他是保守的，支持君主制度的。令人奇怪的是，在强调以过程眼光看待事物的俄国，黑格尔却被当作支持反对沙皇统治（Tzarism）的工具。赫尔岑（Aleksander Herzen）在建立这种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35]在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和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Gavrilovich Chernyshevsky）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著作中，^[136]黑格尔被看作过程思想和近代唯物主义的代言人。^[137]

1909年列宁发表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维护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学派。考茨基、

普列汉诺夫在第二国际的地位，被列宁在第三国际所取代。《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列宁在哲学问题上的最后定论，它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在第三国际的统治地位。

其实，《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不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最后定论，真正记载了列宁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遗产的著作，是他在1914~1915年所写的《哲学笔记》。这本书直到1929年才出版，在这以前，一直不为世人所知，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受到应有的重视。《哲学笔记》中的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原则不同。因此，所有那些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看作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后陈述的人都错了，这些人包括20世纪20和30年代第二次反对浪潮的代表人物葛兰西、科尔施、潘涅库克和卢卡奇。他们所攻击的列宁的许多观点，都是列宁自己在《哲学笔记》中放弃了的。斯大林镇压的悲剧和灾难在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列宁成熟的哲学理论大多数都没有得到继承。

在关于自然的哲学方面，《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形而上学方法的代表。在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列宁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和留基伯（Leucippus）的自然哲学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把唯物主义与一种实在论的和原子论的自然哲学联系在一起。在物理学处于危机的时代里，列宁参与了把唯物主义与本体论相结合的全过程，捍卫了恩格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基本原理。

列宁在唯物主义史上的保守态度还带有政治的内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介入了反对伯恩斯坦的康德主义和反对马赫及波格丹诺夫的生机论。列宁与波格丹诺夫的斗争同样与他俩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系内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不过，在哲学问题上，列宁站在第二国际的哲学立场上说话，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辩护。在这段时期，列宁在哲学上的态度是保守的。

其实，在理论问题上，列宁比普列汉诺夫右倾。受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列宁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唯物主义和德国的哲学。马克思遗产的这三部分形成了第二和第三国际马克思派世界观的基础。然而，普列汉诺夫认识到了自然的唯物主义和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区别。但普列汉诺夫这种很有价值的看法到了列宁那里却完全不见了。列宁回到了更倾向于恩格斯的看法，认为社会的唯物主义的模式应该仿照自然的唯物主义。列宁无视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疑问，认为物理学和力学应该包括社会学。

至于对黑格尔的问题，列宁显得比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都更为保守。不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恩格斯，都继承了黑格尔的革命传统。相反，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1914年以前的其他理论著作中，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它过去的黑格尔传统彻底决裂后才诞生的。列宁知道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但他却认为黑格尔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社会上都是落后的，他把黑格尔看成一个顽固不化的唯心主义者。然而，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列宁完全推翻了他早期的这种看法，反倒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正如在哲学问题上，列宁前后判若两人一样，在列宁著作中的黑格尔也前后判若两人。

在第三国际时期，考虑到列宁不为世人所知的《哲学笔记》中的思想，列宁给人的印象是十分矛盾的。在政治层次上，他是位革命英雄。他发动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这是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的，只是这种革命传奇有些被玷污了。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放弃了在西欧进行革命的希望。他劝西欧的共产主义者走议会政治的道路，而不是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运动模式。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似乎适应了西欧所保持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然

而，他这种现实主义的新意识并没有完全抹去他的革命形象。他实现了自己的主要目标：给俄国带来了革命。另一方面，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看来，他是一位传统主义者。列宁是一位革命英雄，但又是哲学上的保守派，从第二次反对浪潮的成员对列宁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矛盾。例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一书中彻底地抛弃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但他却在《列宁》（*Lenin*）一书中赞扬列宁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同样，潘涅库克为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成就而欢呼，但同时又谴责列宁是一个庸俗唯物主义者。葛兰西也认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歪曲了马克思的哲学。

二 第二次浪潮（1923～1939年）

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次浪潮是由一群不属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那一代的人掀起的。葛兰西生于1891年，科尔施生于1886年，卢卡奇生于1885年。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出生年份则分别为1854年和1856年。在这两群人之间存在一条代沟，因为30多年的历史把这两代人分开了。葛兰西、科尔施和卢卡奇都是90年代的人，他们背叛了他们的父辈，他们都受到了那一时期康德、黑格尔和新浪漫派哲学复兴的影响。相反，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则是19世纪中期的人，他们代表一个崇拜自然科学的时代。这两代人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文化时期的差异：一是物理学和实证主义时期，另一个是主体的人的意识或生理活动时期。

然而，这不仅仅是代与代之间的冲突，而且是政治冲突。反对第二国际辩证唯物主义的作法，总的来说是以革命工团主义的名义进行的。革命的左派需要一种思想体系，作为他们行动主义

政治的依据。20世纪20年代，在革命工团主义和主要是黑格尔式的实践哲学之间实现了一次联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痛斥了革命左派的政策，但没有提及黑格尔的实践哲学。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把攻击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所有实践哲学的表现形式。

潘涅库克、科尔施、卢卡奇和葛兰西在20世纪20和30年代的著作中，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这笔遗产只是到现在才得到应有的评价。尽管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但他们为近年来在西欧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复兴奠定了基础。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大多数新出发点都可以在他们著作中找到来源。在讨论这四个人的贡献时，我打算不按时间的顺序，首先谈谈潘涅库克。他在1938年出版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著作：《作为哲学家的列宁》（*Lenin als Philosoph*），这比科尔施、卢卡奇和葛兰西开始攻击辩证唯物主义要晚许多年。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潘涅库克的写作时期跨越了两个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时期，同时也因为《作为哲学家的列宁》是这种反对的思想过程的极好概括，因而可以作为这场复杂而艰巨的辩论的引言。

潘涅库克的《作为哲学家的列宁》是对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讽刺，因而这部著作深入探讨了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分离。为了把他攻击的主线说清楚，潘涅库克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唯物主义：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或称历史唯物主义。潘涅库克认为，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反映了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从技术上控制自然，把自然变成可以利用的源泉的需要，决定了这个阶级对待自然的态度。由于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来源于这种利用自然的态度，因此它寻求机械的法则，寻求自然秩序的支配原则。与此相反，马克思没有把唯物主

义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而是把唯物主义和社会联系起来，因为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集中在社会的生产组织上。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都认为存在先于思想；然而，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那里，存在是物质的同义词，而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那里，存在是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138]

在确定了这两种形式的唯物主义的定义后，潘涅库克批评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认为这是一本非马克思主义的书，并攻击它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列宁象资产阶级那样，把唯物主义定义为物质，^[139]把实在定义为外部自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科学探索说成是寻求宇宙的原子的二元论，而在这方面，这只不过是赫拉克利特和伊壁鸠鲁（Epicurus）的物理学在 20 世纪的表现。^[140]作为荷兰革命左派的一员，潘涅库克强调人的活动的概念。^[141]潘涅库克的《作为哲学家的列宁》试图打破自然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先占权。在潘涅库克看来，马克思并没有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他建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一旦摆脱了自然科学的束缚，马克思主义就可以重新发现它原来的概念，即它是一种把社会分析为生产的有机体的方法，它是一种哲学。马克思主义并不寻求科学的预见性，它是由对社会的方法论的（哲学的）分析构成的，是以这种方法论体系的结果为基础的对于行动的理性指南。马克思主义不能与活动分离，也不能与这种活动的意识决定分离。

潘涅库克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讽刺可以在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的著作中找到共鸣，但更重要的共鸣是在卡尔·科尔施的著作中。1938 年科尔施为潘涅库克的《作为哲学家的列宁》补充了一章。在这一章中，他同意潘涅库克的基本立场，并指责列宁主义哲学成了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牺牲品，哀叹列宁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实质。有趣的是，当科尔施后来写《列宁的哲学体系》（‘Zur Philosophie Lenin’s’）一文时，他已

经读过列宁的《哲学笔记》，这本书最初是1929年出版的，印数很有限。科尔施已经读过列宁的《哲学笔记》，但没有消化它，因为在读过以后，他仍然认为列宁的观点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表达得最充分。他没有对《哲学笔记》进行评价，认为只有等到将来才能估计这些笔记是否大大改变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和路线。科尔施所攻击的列宁还是坚持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列宁。^[142]

科尔施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与潘涅库克、葛兰西和卢卡奇的不一样。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劳工运动有内在的联系，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预言社会未来演变的公正的科学理论。科尔施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置于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之外的解释，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革命的理论。科尔施相信政治第一，而不相信理论建构第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在于它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策略意向。

1923年科尔施有影响的论著《马克思主义与哲学》（*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问世，从那时的观点出发，他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创立时期，从马克思最早的著作到1850年。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最明确地被当作革命无产阶级的理论指导。科尔施把1850到1900年的第二国际看作是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恩格斯—考茨基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占统治地位，以及随之而起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第三时期是1900年到1923年，科尔施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的时期；它经历了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以及试图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定义为革命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143]

在一篇早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论文《卡尔·考茨基与唯物史观》（‘*Karl Kautsky und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中，科尔施把考茨基定为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人

物。科尔施没有过分难为恩格斯，但也没有把他的责任解脱得一干二净，不过他发现考茨基是第二国际哲学扭曲的关键人物。是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必然论的历史哲学。^[144]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则起源于达尔文。^[145]基于对考茨基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这种理解，科尔施意识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宁主义哲学只不过继续了这个传统。由于从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这种解释开始，科尔施得以看到考茨基和列宁之间的相似之处。科尔施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哲学也必须推翻。在哲学这个领域，反对列宁主义哲学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世界观的斗争。^[146]

确实，按照科尔施的观点，1923~1924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关键时期。^[147]《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发表于1923年，比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晚几个月。1923~1924年间的哲学斗争与这两年的政治斗争相一致。在政治层次上，争论的双方是西欧共产党卢森堡式的工团主义传统和取得了胜利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刚刚发展起来的一党专政。在哲学层次上，争论是在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革命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的。西方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在这两方面都败下阵来，转折点就是1923~1924年。从哲学上来说，斯大林主义大获全胜。

对于斯大林主义的胜利，科尔施从没甘心过，卢卡奇却心甘情愿。这两人的巨大差异就在这里，因为科尔施自始至终一直坚持不断地反对斯大林的堡垒，而卢卡奇则在一生中好几次试图迁就斯大林主义。卢卡奇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才能找到安宁，科尔施却只有通过反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才能找到安宁。在遭受1923~1924年哲学上的惨败后，他们事业的不同是党派意见的善与恶的不同，是流亡者的善与恶的不同。斯大林1924年在斯维

尔德洛夫大学 (Sverdlov University) 的演说《列宁主义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Leninism), 是标志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取得哲学上的支配地位的文件。^[148]

科尔施主要是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跟批判的思想重新联系起来。他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这部著作中指出, 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批判”, 而且马克思对经济学说的主要贡献归根结底就是对李嘉图 (David Ricardo)、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和斯密 (Adam Smith) 的“批判”。^[149] 正像科尔施自己所写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目的是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哲学方面。”^[150] 科尔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 他常常引述马克思的短语“实践的, 人类感性的活动”, 和“革命的实践”。^[151]

科尔施对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持高度批判的态度。他谴责这本书, 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束缚于自然科学的框框内。科尔施意识到, 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假定的基础上的。“这种唯物主义来源于一种视存在为绝对和既定的形而上学的观点。”^[152] 最重要的是, 科尔施之所以谴责列宁主义哲学, 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153]

科尔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他对恩格斯的思想持批判态度。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科尔施没有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不同, 然而他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差异。他意识到, 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 这是做了马克思不会做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中, 科尔施承认, “许多人都相信, 跟在著述方面更富于哲学性的伙伴马克思相比, 后期的恩格斯蜕变成了一个对世界抱有彻底的自然主义——唯物主义观点的人。”^[154] 尽管科尔施试图淡化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字里行间包含的分歧, 尽管他感到, 在马克思本人身上, 已经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的倾向, 但科尔施还是意识到了马克思

主要的思想锋芒和恩格斯主要的思想锋芒之间不可忽视的差别。然而，在使对黑格尔的革命解释不朽方面，科尔施和恩格斯又再次一致起来。不过，虽然目标一致，他们为达到这个目标所走的道路却不一样。恩格斯相信赫拉克利特的理论，把变化的概念和黑格尔主义的革命传统联系在一起。科尔施则认识到，变化的概念把马克思和黑格尔联系起来。他并且相信，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唯物化了，正是这种唯物化造成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决裂。不过，尽管科尔施看到了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必要性，但他并没有把这种黑格尔化建立在变化这个概念的基础上。科尔施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批判的学说。在科尔施看来，把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就必须加强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活动的主旨。这样，科尔施便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根基，因为，作为实践—批判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和策略需要的一种表达。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异议与科尔施的异议的出发点也不一样。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传遍整个西方文明的更大的哲学运动的一种辉煌而特殊的表现。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发明的术语“实践哲学”指的是一场范围广泛的运动，这场运动在马克思的哲学那里找到了最透彻的表述。科尔施背弃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不符合工人阶级的革命需要，葛兰西背弃辩证唯物主义，则是因为它公然与“实践哲学”的核心原则相矛盾。科尔施的著作是政治鼓吹者的著作，他与德国共产党决裂了，而且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左派倡导者。葛兰西于1926年被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监禁，1937年死于狱中。由于长期与党的日常生活和斗争隔绝，葛兰西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反驳打上了他孤独的监狱生活的烙印。在狱中，沉思本身是自我保存的唯一源泉。

尽管他与外界隔绝，葛兰西还是利用了独特的意大利传统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贝内代托·克罗齐是19世纪末意大利知识界

的卓越人物。克罗齐的哲学既受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又受到历史主义的影响。克罗齐强调活动或实践的概念，虽然是以唯心主义的形式强调。受克罗齐的影响，拉布里奥拉开始谈论“实践哲学”。拉布里奥拉排除了克罗齐的唯心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等同于一种“实践哲学”。葛兰西对克罗齐和拉布里奥拉的著作都很熟悉。但是，最坚定不移地把思想用在考虑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问题的人是鲁道夫·蒙多尔福。

蒙多尔福最重要的著作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Il Materialismo Storico in Federico Engels)。这本书于1912年在佛罗伦萨(Florence)出版，是试图详细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不一致，而是在哲学观点上有重大分歧的最早著作。蒙多尔福受到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生机论的影响，集中精力讨论人的活动这个概念。奇怪的是，虽然索列尔和蒙多尔福都不知道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手稿，但当他们集中讨论实践这一题目时，他们都不知不觉地使实践这个关键性的概念重现于世，这个概念对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是至关重要的。葛兰西和蒙多尔福保持着通信联系，他对蒙多尔福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也很熟悉，并且认为这本书是一个重要的成就。^[155]

在蒙多尔福看来，马克思哲学的显著特征是它对人的活动的强调。^[156]蒙多尔福反对几十年间机械论的科学对欧洲知识界的统治，他是重新发现主观能动性的力量的那代人中的一员。然而，蒙多尔福露出了他唯心主义的背景，他集中讨论的实践不是经济的努力，也不是政治的干预，而是意识的活动。蒙多尔福关心的不是自觉的认识，不是人们怎样感知外部世界，他关心的是黑格尔和克罗齐意义上的意识，即人们如何在理性方面占用世界从而驾驭客观世界。^[157]

由于认识到马克思强调意识的活动，蒙多尔福也看到，恩格

斯的思想与马克思的这种强调相冲突。恩格斯颠倒了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东西。马克思强调主观的东西，恩格斯却强调客观的东西，强调外部世界。^[158]按照蒙多尔福的说法，恩格斯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胜利导致了哲学的终结或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证主义的出现。^[159]然而，葛兰西的出发点却不是描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分歧，而是“实践哲学”的历史发展。成熟的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要问世，就必须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古典经济学这些因素都为之作出了贡献。^[160]葛兰西列出的“实践哲学”的代表人物也说明了他理解这场规模宏大的文化运动的方式。他认为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Franc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黑格尔、费尔巴哈、克罗齐、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柏格森、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戴维·李嘉图都表达了“实践哲学”的观点。^[161]

葛兰西在认定了马克思是“实践哲学”最完美的代表后，又提出了“实践哲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个变种。唯心主义变种的典型是黑格尔、克罗齐、秦梯利和柏格森。虽然他们认识到人的行为的构成性质，但唯心主义者的错误是仅仅从意识或精神方面给行动下定义。唯心主义者强调变化和主观性，但把主观性理解为心灵。另一种歪曲的解释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变种，其代表人物是海克尔（Ernst Haeckel）、沃格特（Vogt）和毕希纳（Louis Büchner）。这种变种接受过程和历史性的因素，但却排除一切主体行动的概念。在歪曲了的唯物主义的变种那里，因果关系和过程只局限于外部世界。^[162]

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和个人行动观与唯物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物质观的完美融合。马克思接受了人的活动的概念，但认识到它必须通过物质环境并在物质环境中出现。马克思区分了源泉与出现（或实

现)两种情况,因为构造的源泉是人类实践,但这种实践只能通过物质性、并在物质性中出现和得到实现。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于它的历史性和内在性的概念。由于受到克罗齐历史主义的影响,以及历史主义对整个欧洲思想的冲击,葛兰西觉得在社会中不断变化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相信内在性这一概念,但不是在新柏拉图主义所说的能量从世界以外的源泉流入世界之中的意义上,而是在能量从一个内在源泉、即从世界中心的源泉流向世界地平线的意义上。内在性指的是人的行动的外在化和动力化的性质。^[163]

在他的“实践的哲学”中,葛兰西断言历史和哲学是等同的。^[164]他追随黑格尔的观点,意识到哲学讨论的不是一组永恒的问题,它是一个时代的思想,试图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正像不同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会改变一样,不同时代的哲学也不一样。黑格尔没有提供最后的答案,只提供了方法论。不过,葛兰西也意识到了黑格尔和克罗齐式的“实践哲学”的不足:他们太唯灵论了。对于他们,以及对于大部分德国古典传统来说,行动只局限于意识;它从来也不和政治相联系。^[165]

正是在政治的性质问题上,葛兰西与“实践哲学”的两种歪曲的解释决裂:即黑格尔—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黑格尔和克罗齐没有把他们的实践理论扩展到政治的舞台,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把一切变化都理解成是在外部的、物质的和客观的力量中产生的。葛兰西认为,政治是实践最恰当的实现。^[166]政治是现象学的领域,是行动的修正力量。

葛兰西拒绝把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这导致了他拒斥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范畴。有趣的是,葛兰西在他的论战著作中没有直接抨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布哈林(Nicholai Bukharin)的《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不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

义》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问题是极其相似的，因此，葛兰西实际上是在攻击列宁在1909年的这部著作中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是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本入门书、一本指南推荐给读者的。这本书出版于1921年，与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年出版。和列宁的书一样，布哈林的这部著作也表明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时期的结束。在德国，“三月行动”（‘March Action’）失败了，很明显，共产主义不会蔓延到俄国以外的地方：它能在一个国家存在下去就算不错了。在布哈林的书中出现的是唯物主义和原子论的结合，是把哲学吸收到实证科学中。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是1921~1924年哲学论战的主要部分，葛兰西则通过发现布哈林的书违反马克思主义而显示出他在论战中站在哪一边。^[167]

葛兰西意识到了恩格斯问题。由于在这方面受到蒙多尔福的影响，葛兰西是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重大区别的人物之一。^[168]最后，葛兰西还使对黑格尔的革命性解释永远流传。他是把马克思重新黑格尔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因为如果马克思是实践哲学的顶点，黑格尔则是实践哲学最伟大的首倡者之一。在他的《狱中笔记》（*Prison Notebooks*）中，葛兰西说“实践哲学是对黑格尔主义的改造和发展”。^[169]葛兰西对黑格尔的解释属于历史主义的学派，这和他的一贯立场相符。实质上，葛兰西是用克罗齐的眼光读黑格尔的著作的：无所谓人的本体；只有出现于某个特定时期的历史的人。^[170]葛兰西认为黑格尔学说的革命性质在于他的历史性这个概念，在于他消除了一切不变本质的概念。

与科尔施和葛兰西的情况一样，乔治·卢卡奇的异议也打上了他们生活模式的烙印。葛兰西是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在狱中达到著述的最高峰的，科尔施则拒绝迁就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

在希特勒主义 (Hitlerism) 出现时, 科尔施没有逃向东方去寻求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的庇护, 而是逃往西方, 到美国去过流亡生活直至去世。对于卢卡奇来说, 与共产主义运动分离是心理上不能接受的, 因为卢卡奇是共产党人, 脱离了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 他的生活就毫无意义。所以, 卢卡奇的著作比科尔施和葛兰西的著作都具有更多的政治性, 必须根据党和党派生活在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来评价它们。卢卡奇确实选择了到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寻求庇护, 因此他的许多著述反映了他不得不对斯大林主义的迁就。他的很多著作又表现了在斯大林死后, 他回到祖国匈牙利享受到的自由, 这尤其表现在他后期的著作《美学》 (Ästhetik) 和《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 Seins) 中。寻找卢卡奇的本质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的一生是以退让、公开认错、前进、成熟和倒退为标志的。要全面把握卢卡奇, 必须首先把他的著作置于恰当的策略时期。

然而, 卢卡奇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拒斥却是他这一思想的根本, 它贯穿在他整个生命的所有不同时期。尽管如此, 要对他的思想进行分析, 还是必须把他的著作按青年时期和成熟时期的卢卡奇分开。青年时期的卢卡奇从 1923 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标志, 后期的卢卡奇则以《美学》和《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出版为标志。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是 1952 年问世的《青年黑格尔》 (Der Junge Hegel)。^[171]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历史与阶级意识》, 因此只局限于早期的卢卡奇。虽然卢卡奇从没停止过反对辩证唯物主义, 他进行反对的一些理由却随着时间而变化, 正像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用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那些原则和他后来运用的原则大不相同一样。《历史与阶级意识》确实带有德国唯心主义的外表。在《美学》和《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 这种唯心主义被自然主义的人类学取代了。《青年黑格尔》第一次介绍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论点。尽管《历

史与阶级意识》有不完善之处，我们还是要在这里讨论它，因为它正好符合我们现在分析的第二次反对浪潮的时间界限。其次，我们在这里讨论它还因为这是一部雏形著作：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卢卡奇修正了他的思想，但这部著作的主要观点后来成了卢卡奇的根本思想。

卢卡奇的异议集中在认识论的领域，他所从事的工作与科尔施和葛兰西的不一样。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的工作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他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因为他希望找到一组概念形式，以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解释外部世界。第二，在这些概念形式的基础上，他描述了与资产阶级世界观针锋相对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主要前提。卢卡奇谋求把形成中产阶级世界观基础的那些概念范畴和作为无产阶级自我意识基础的那些概念范畴分离开来。卢卡奇的工作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巨大意义：如果他能把这些概念形式分离开，他就会确立社会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作为认识论探索的一个分支，卢卡奇还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在把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方面，卢卡奇比任何人贡献都大，因为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根据黑格尔的逻辑范畴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历史与阶级意识》所依据的主要材料就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在寻找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逻辑范畴时，卢卡奇把注意力集中在《逻辑学》第二卷，尤其是“本质论”上。用这种方式，卢卡奇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结合起来了，但是由于卢卡奇用来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哲学是一种柏拉图的逻辑形式哲学，因此，卢卡奇的结合便带有唯心主义的印记。尽管如此，不同的传统已经结合起来了：马克思主义重又与批判哲学联系起来，而与自然科学相区别。

在研究黑格尔的这些范畴和其他一些问题时，卢卡奇进而指

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组成要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特征是物化的概念，主观和客观的分离，以及原子论。为了替他们继续占有生产资料进行辩护，资产阶级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说成是固定不变的。他们不愿考虑资本主义消亡的可能性，而宁愿坚持认为，某些社会结构，如私有财产，是不可改变的社会形式。作为一个阶级，它缺乏历史性的概念，陷入拜物教思想的泥坑不能自拔。因此，资产阶级没有内在性的概念，而接受了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如果某些社会的和自然的形式是永恒不变的，那么人的力量也无法改变它们。客观不是出自主观的，它们是互相分离的。最后，资产阶级用原子论的方式看社会，他们注意的是单个的人及其各自的利益。他们不是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而是看作独立因素的组台。

在卢卡奇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而且是两种文化的斗争。^[172]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特点不仅是历史性、内在性和整体性，而且还有一个突出的标志：它是德国传统的继承者，而德国传统就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卢卡奇认为，德国古典传统的先决条件包括：相信人的行动的构成力量；相信人本身就是目的，因而社会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古典传统的这一对先决条件确立了它们自己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永久地位；实际上，无产阶级运动就是这两个条件的实现。无产阶级关于实践的概念发扬了古典传统对个人意志和决定的强调。无产阶级关于共产主义是一种适合人的需要的社会的思想，属于古典人文主义学派把人本身看作目的的信念，因为二者都是以人为中心的。

作为政治上的英雄人物，列宁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当卢卡奇也像葛兰西那样打算攻击辩证唯物主义时，他的目标不是列宁，而是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卢卡奇用类似潘涅库克的语言，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一种形式。^[173]

卢卡奇写了一篇文章，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名叫《关于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über Bucharins,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驳斥了把唯物主义和原子论、把唯物主义和技术发展、把唯物主义和绝对实在论硬扯到一起的做法。^[174]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而言，所有这些概念都是自明的公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没有讨论重新解释唯物主义的问题，而是集中讨论意识的力量，并试图把意识从自然科学的暂时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也许是与卢卡奇自己思想的目标相违背的。但是，首先在《青年黑格尔》继而在后期的主要著作中，他都正面解决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重新定义。

和所有那些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人一样，卢卡奇也对恩格斯问题很敏感，他注意到，恩格斯颠倒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意思，从而使马克思的整个哲学有了缺陷。^[175]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是建立在对黑格尔进行革命性阐释的基础上的。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是个左翼黑格尔派哲学家，其辩证法是一种批评，是通向行动大道的开端。卢卡奇选择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些范畴，作为推导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据，这些范畴都强调实践、构成、限制和历史性等的可能性。这种对黑格尔的左翼阐释，在卢卡奇的主要著作《青年黑格尔》中仍然存在。在这本书中，黑格尔被说成是法国大革命的鼓吹者。^[176]卢卡奇追寻着黑格尔早期的思想发展，直至《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Mind*）。他把该书解释为黑格尔的激进主义的最佳表述。他没有继续追寻《精神现象学》以后的东西，因为那会把他带到黑格尔较为保守的时期，即《法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时期。这样，卢卡奇对黑格尔的探讨就在两个层次上发展：首先，他需要宣布，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先声；其次，为了做到这一点，卢卡奇要用无产阶级的观点解释黑格尔本人，因为卢卡奇

不但想把黑格尔说成无产阶级传统的一部分，而且是整个德国古典传统的一部分。

第二次反对浪潮被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打得粉碎，这不仅在俄国是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正像第三国际要求大家在政治上默许莫斯科路线一样，斯大林主义把机械唯物论强加在布尔什维主义头上的做法也为西欧各国共产党所仿效。因此，这次反对浪潮既反对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又反对斯大林的机械唯物论。除了西欧的这次反对以外，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打上了意识形态一致的烙印。在一系列范围广泛的问题上，第二次反对浪潮是反斯大林主义的。第二次反对浪潮产生于工团主义左派，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激进化。这些哲学原则与非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而非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是对斯大林独裁主义潜在的政治威胁，所以它被粉碎了。

三 毛泽东主义的继续

当毛泽东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呈现在他眼前的思想态势是单维的。毛泽东从没到过欧洲，因此，他对于西欧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的历史和性质一无所知。1937年，当毛泽东开始写他的第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时，斯大林主义机械唯物论的胜利已成事实。从北京通往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道路似乎就是莫斯科。然而，可以吸取的俄国的源泉和毛泽东自己读过的书使他接触的却是列宁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奇怪的是，在哲学层次上，毛泽东避免了与斯大林的机械唯物论接触，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竟存在于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古典阴阳（Yin—Yang）二元论的融合之中。

要想恰当地评价（此处原文“evolution”一词有误——译者注）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必须从哲学和革命策略这两个层次

上分别进行探讨。革命策略指的是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战略问题，正是在这个领域，毛泽东最终摆脱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模式。实际上，毛泽东在民族主义、农民、个人或团体的意志论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模式彻底决裂了。在这些领域，毛泽东使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范式变得毫无用处，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创造性的调整和修正，使之适合亚洲的情况。实际上，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革命范式，一个与东方世界相符的革命范式。这足以说明，他是马克思主义策略的一位伟大革新者。显然，在进行这些必要的修正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而大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的活力，并使之继续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在哲学的层次上，毛泽东没有显示出任何独创性。由于他所接触到的文献资料的关系，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机械唯物主义失之交臂，而一直坚定地保持着恩格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然而，尽管如此，在关系到行动的理论的那些哲学方面，在实践的问题上，毛泽东还是表现了一种独创性，显示出他本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以及意识等问题上，毛泽东使马克思的基本论述永远有效，使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表述的观点永远不会过时。毛泽东在意识的构成性和实践的提问性方面获得如此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与其说是通过哲学的思辨，毋宁说是出于政治上权宜之计的实际需要。由于毛泽东首先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由于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能改变环境的行为理论，因此，毛泽东的行动主义本身就教会了他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十一条中所提倡的观点，即实践—批判活动可以改变世界。由于这一洞察，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回到它最重要的源泉方面出了一份力，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的布尔什维克化始

于延安时期。1935年长征结束时，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历经沧桑后的残存力量带到偏远的西北省份陕西的延安城中。这就是“延安共产主义”（‘Yenan Communism’）^[177]或“延安精神”（‘Yenan Spirit’）^[178]的开始，它标志着毛泽东开始着手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纳入列宁—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框架中。

长征（The Long March）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蒋介石（Chiang Kai - Shek）的围剿战术，而且给了毛泽东当上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机会。1930年以前，中共的领导人是李立三（Li Li - San），他忠于第三国际，唯莫斯科之命是从。李立三接受了俄国革命的模式，认为在大城市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红军在农村的进攻会引起城市产业工人的起义。毛泽东曾经反对过这种路线。^[179]但是当1930年李立三失去领导权时，取代他位置的先是王明（Wang Ming），后是秦邦宪（Ch'in Pang - Hsien）。当时，党中央的大多数重要职位都由一个名叫“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Twenty - Eight Bolsheviks’）的集团占据着，这些人都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Sun Yat - Sen University in Moscow）学习过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回国后，他们支持苏联特使鲍威尔·米夫（Pavel Mif）和共产国际（Comintern）的路线。在湘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Chinese Soviet Republic in Hunan and Kiangsi）时期，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发动了一连串的围剿，“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中共政治局对国民党采取了一种进攻性的军事政策。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泽克特（von Seeckt）的建议，用碉堡封锁并牵制湖南和江西的共产党。对此，“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攻打碉堡的战术，而毛泽东则希望进行更灵活的游击战。^[180]最后，蒋介石胜利了，江西苏维埃被摧毁，“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军事战略失败了。然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在江西苏维埃时期经受了考验。他从江西的经验中认识到，游击队

必须有群众的支持，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长征后，当毛泽东到达延安，开始系统阐述他的游击战争的理论时，他只是把在江西时期所得到的这两条重要经验写进他在延安的著作中。^[181]为了避免被蒋介石全部吃掉，共产党开始了长征，以寻求一个避难所。由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失败，人们不再相信共产国际的指导，毛泽东因而成了党的领袖，领导长征。但是他的领袖地位直到1935年1月在贵州举行的遵义会议上才正式完全确定下来。^[182]

对共产国际领导的怀疑为毛泽东创造了条件，使他得以确立中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控制的独立地位。因此，“延安共产主义”也就成为毛泽东在策略上的创新的同义语：“延安共产主义”乃是毛泽东主义的创造。但是，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主义就不可能出现，因为这种侵略创造了毛泽东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

在军事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意味着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军事理论胜利了，由于不再受莫斯科的控制，中国共产党现在可以采取适合中国的地理条件和政治形势的军事政策了。毛泽东放弃了在城市举行无产阶级暴动的急躁冒进的战略，转而把共产党的力量集中到农村地区。共产党不应该在前线向敌人发动进攻，而应该避免决战，应该发展根据地，以便保存自己，壮大自己的力量，然后波浪式地向外扩展，逐渐扩大根据地的范围，就像水波的圆圈逐渐扩大一样。最后，就像两个圆圈碰到一起时那样，农村这个‘绿’圈越来越大，敌人的圆圈越来越小，农村这个波浪最终会完全吃掉敌人的地盘。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著述上最多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详细地发挥了他关于游击战争的性质的思想。《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Strive to win Over Millions Upon Millions of the Masses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1937年5月）、《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策略》（‘On the Tactics of Fighting Japanese Imperialism’）（1935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Strategic Problems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1936年12月）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eriod of Resistance to Japan’）（1937年5月）这四篇著作，都保留了在江西得到的教训，表达了“延安共产主义”的思想。在这四篇重要论文中，毛泽东列举了中国游击战争的基本特征。这些论文构成了毛泽东主义在策略上的独创性的主要遗产。^[183]

日本对中国的人侵带来了新的情况，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调整他们的策略。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以中国民族主义斗士的姿态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最广泛地团结中国民众，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力量联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上的调整，毛泽东不得不暂时放弃阶级斗争第一的做法。民族主义取代阶级斗争成为首要问题。为了腾出手来实现与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政策，毛泽东中止了他的土地集体化政策。最后，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Wayaopao Conference），毛泽东开始了一种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延安时期，政府的苏维埃形式被放弃了。在江西苏维埃时期，毛泽东的联盟只包括工人、农民和士兵，但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扩大了 this 联盟，把资产阶级作为民族事业和民族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包括在这个联盟中。^[184]延安时期说明毛泽东向民族主义转变的论文是1938年10月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The Ro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National War’）。^[185]同属延安时期的另一篇论文，即毛泽东在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On New Democracy’），是毛泽东放弃阶级斗争，采取统一战线策略的代表作。^[186]毛泽东没有把延安时期构想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时期，而是把它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1945年4月，在《论

联合政府》（‘On Coalition Government’）中，毛泽东再次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统一战线策略的论点。^[187]

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拥护，毛泽东在策略上的这些修正一个也得不到成功。江西和延安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就是与农民群众的联盟，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毛泽东建立强大根据地的政策就无法实现，这样，游击战争的唯一根基就会被摧毁。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88]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Methods of Leadership’）（1943年6月）^[189]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识到了党和群众，军队和人民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他意识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这使某些评论家把他看作民粹主义者。^[190]避开毛泽东究竟是民粹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不谈，毛泽东对农民群众的看法与斯大林完全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强调唯意志论，强调在克服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时，意志的重要作用，这在长征中表现得很清楚。他还强调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群众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都是把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相区别，使之具有独特性的根本因素。

延安共产主义还要求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布尔什维克化。在农民、群众、意志、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这些方面作了策略上的修正后，必须要做的事就是用布尔什维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毛泽东认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不仅要求在策略上…致，而且在意识形态上要有深度并保持一致。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钻研了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著作。他进行了自学，同时也告诫全党干部都进行自学。然而，毛泽东所读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大多是斯大林的著作，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的一部分，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毛泽东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很少接触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对西欧正在进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含

义的重要辩论— 无所知。在意识形态方面，他是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俘虏。在策略上，毛泽东认为党的干部精通布尔什维克思想是很重要的。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Reform our Study’）（1941年5月）、《整顿党的作风》（‘Rectify the Party’s Style of Work’）（1942年2月）、《反对党八股》（‘Oppose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1942年2月）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1942年5月）这些比较注重意识形态的论文中，可以找到延安布尔什维克化的主题。^[191]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布尔什维克化始于1935年的延安，并于1942年到1945年经历了一次有效的复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整风”运动（‘Cheng - Feng’ Movement）。在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要按照斯大林主义的路线改造思想。结果，作为策略上的创新和哲学上的保守主义的结合物，毛泽东主义可以说是在整风运动中形成的。^[192]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包含在三篇论文中，这三篇都写于延安时期。从1936年开始，苏联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几部重要著作被首次译成中文，这促使毛泽东进入哲学领域。毛泽东虽然开始时只是个初学者，但1937年就发表了两次演说，这两次演说就是分别于1950和1952年出版并公开发行的《实践论》（‘On Practice’）和《矛盾论》（‘On Contradiction’）。1940年，毛泽东写了另一篇理论文章，名叫《论辩证唯物主义》（‘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但一直没有写完。^[193]

由于某种阴差阳错的原因，译成中文的一本书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仔细研究毛泽东为《实践论》和《矛盾论》所作的脚注后发现，他经常参考列宁的《哲学笔记》。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理论研究更为深入的西方，列宁的《哲学笔记》鲜为人知，更少有人引证，但是毛泽东却把它作为理解马克思上

义的主要源泉。不过，毛泽东也依赖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他把所有这些著作都混为一谈，这说明他缺乏哲学上的敏锐。尤其突出的一点是，他没有看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哲学笔记》是与另外那些著作相矛盾的，是与它们所代表的教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相违背的。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些著作都表达了完全一致的观点：即它们都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因此，在亚洲，毛泽东主义在哲学层次上使辩证唯物主义的遗产继续下去。第二国际的哲学在东方共产主义世界取得了胜利。

然而，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只是重述了恩格斯的原则。他继续把马克思主义跟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依赖的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而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解释，他相信，正是因为观点完全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成为一个整体。他对黑格尔所知甚少。由于毛泽东属于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联系起来的一派，因此，他把黑格尔看作反动的唯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运动必须与之划清界限。

毛泽东在中国的位置相当于列宁在俄国的位置。列宁在策略上和哲学上领导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同样，毛泽东在策略上和哲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两个人接过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俄国和中国的国情。任何一种理论运动在与不同的条件相接触时，都必须经过修正。在哲学层次上，毛泽东接过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把它与孔子（Confucious）思想的形式结合起来。

四 马克思

至此为止，我一直在追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全

球的发展。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的结合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左派世界观。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和中国的毛泽东主义为辩证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胜利提供了政治基础。但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农民革命的时代也已经过去。马克思主义渡过了经典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衰落时期，历史的钟摆又回到了欧洲这个中心。在技术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必须使自己适应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需要一次新的，创造性的修正，因为它必须探索民主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正是在欧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再次进行革命性的突破。

马克思的思想集中的主要领域，是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方法论的发展，以及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对政治实践的指导。要进行批判活动就必须先有恰当的理论。为了弄懂马克思的概念的关键作用，首先必须掌握他对于自然科学的态度。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mocritean and Epicurean Philosophy of Nature’），说明马克思研究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原子论自然哲学，从中也可看出马克思对待古典的自然理论的态度。马克思抛弃了原子论者、经验论者和培根研究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方法，对希腊和罗马原子论的关系进行了黑格尔式的分析。马克思不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而是从概念的角度，从批判意识的角度去研究自然问题的。

在《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中，黑格尔把伊壁鸠鲁的哲学说成是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原子论的直接分支，说成是在认识论上与感觉论联系在一起的。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的哲学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世界的终结作出了贡献，结束了专门研究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的古典做法，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即集中

研究特殊性、感性的主观性和内容。^[194]虽然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采取的是黑格尔的立场，但他却对伊壁鸠鲁提出了不同的解释。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概念的方法论，修正了黑格尔的哲学史。

马克思的论文中强调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区别。德谟克利特是最糟糕的极端经验主义的象征，因为他把世界看作是在感觉中呈现的样子，这就导致他去积累事实。德谟克利特热衷于没完没了地从“埃及的牧师，波斯的预言家和印度的裸行派教徒”^[195]那里收集经验的材料。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研究自然的方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德谟克利特是19世纪最糟糕的极端经验主义的古代先驱。他还论证说，仅仅感觉不能给人以客观知识。这些是德谟克利特的错误，而伊壁鸠鲁则避免了这些错误。

尽管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都是原子论者，他们对原子的看法却不一样。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就是它的特性，它完全是物质的东西。伊壁鸠鲁认为，原子首先是一个概念，然后才以某种方式与外在的物理特性相一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伊壁鸠鲁的研究没有超出黑格尔关于本质和实存的区别的框架。伊壁鸠鲁认为，原子首先是概念，它是单一性这个概念。后来，这个概念与一个有着特定属性的物质客体发生了关系；这就是实存的领域。本质和实存的结合产生了原子，而本质和实存之间的间断性又产生了辩证法；通过这个过程，经验的实存与客观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了。但是概念是在先的，因为它是根据。^[196]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论述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e*）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相似之处。黑格尔论述自然的著作是从寻找自然的概念、空间/时间的概念和物质的概念入手的。接着他就讨论如何使经验的材料适合这些普遍性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这也就是伊壁鸠鲁研究自然的方法。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意识到，哲学决不能以沉思告终，思想

必须在实践中实现自己。因此，早在1841年，马克思就关心实践和批判的问题。哲学必须干预世界，理论必须最后成为实践，否则哲学就会灭亡。行动就是思想的实现。其次，哲学对世界的干预是对世界的批判。与伊壁鸠鲁对待自然世界的态度相似，概念或本质是用以针对社会现实或实存的。如果实存与概念不一致，就必须批评并改变实存。必须使实存符合概念。^[197]此外，马克思还区分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和概念与实存的关系。存在与思维的问题涉及思想在先还是外部世界在先的问题。究竟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还是它仅仅反映外部世界的前在性？1841年，马克思相信思想的先验性：存在产生于思想。“哲学家在世界和思想之间所建立的一般关系中，他只是为自己而把他的特殊意识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客观化了。”^[198]然而，概念和实存的问题不是关于先在性的本体论问题。它主要是意识出现以后，意识干预外部世界的问题。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并不一定决定概念和实存的关系。它们是互相独立的问题。起源问题和工具问题是截然不同的。

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这篇论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左翼黑格尔派。黑格尔认为，终极的客观性存在于精神之中，普遍性位于人以外的精神之中。可是，马克思则受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的影响，认为客观性存在于主观意识之中；普遍性是概念的一种功能，它们表现在个体意识中。马克思转移了客观性和范畴的位置。在这重新定位的同时，马克思引进了他自己的实践理论。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客观性存在于精神之中，所以行动者便是精神。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既然概念是个体意识的功能，行动的基础就必然是个体意识。

在《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中，马克思更明确地表示，他反对自然的形而上学即古典形式的自然哲学。在这部著作

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Critical Battle Against French Materialism’）这一部分中，马克思提供了对于唯物主义的分析。他从根本上把近代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大派，一派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一派是“感性唯物主义”^[199]。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传统包括笛卡尔·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拉美特利（Lemетtrie）、霍尔巴赫和罗比内（Jean-Baptiste-Rene Robinet）。这个传统把自然科学和力学、数学或几何学统一起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运动的源泉置于外在于人的物体之中。马克思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不管是黑格尔的唯灵论的形式，还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的形式。在谈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时候，马克思写道：“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200]

相反，“感性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培根（Francis Bacon）、洛克、霍布斯（Thomas Hobbes）、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爱尔维修、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和边沁（Jeremy Bentham）。“感性唯物主义”在极大程度上是英国的发明，而18世纪那种法国的感性唯物主义则生来就是反形而上学的，它或者反对唯灵论形式的形而上学，或者反对力学——几何学形式的形而上学。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精神被带进了黑格尔的哲学。另一方面，“感性唯物主义”则导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费尔巴哈反形而上学的态度就源于他在理论上对“感性唯物主义”的套用。^[201]

马克思采纳的那种唯物主义是基于人类实践的观念。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内在活动的概念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以人为中心，认为世界能动的原则是人的活动。马克思认

为，把这个公式颠倒的做法，即把能动的原则置于任何外在于人的力量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的一大支柱。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再次有力地表示，他信奉“感性唯物主义”学派。他再次以人自身的生产的主题为中心。马克思认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所有以前存在过的唯物主义形式，都有一大缺陷：它们没有考虑“人的感性活动”，没有“掌握‘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202]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继承了洛克、曼德维尔和爱尔维修的传统。它注重人与社会环境的接触，注重人类对这种环境的刺激的积极反应。马克思承认，他对人的实践的认识是从费希特、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发展起来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说：“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03]马克思把德国唯心主义对人的活动的强调与洛克一边沁派对社会环境的强调混和在一起，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式的唯物论的独特性。

马克思对弗雷德里克·阿尔伯特·朗格的《唯物主义史》持批评态度。^[204]朗格的书深受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机械唯物论的影响，而笛卡尔的机械唯物论正是马克思本人在《神圣家族》中驳斥了的。朗格的著作没有给洛克以足够的重视，并对费尔巴哈持公开的敌对态度。^[205]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马克思以为朗格这本书很糟糕。^[206]恩格斯也认为朗格的书有毛病，但他的理由却和马克思的不一样。和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没有捍卫“感性唯物主义”的传统。恩格斯反对朗格对沃格特、比希纳和莫勒斯霍特（Jacob Moleschott）的过分吹捧，因为在恩格斯看来，所有这三个人都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因而都否定了自然的历史性。恩格斯不是个“感性唯物主义者”，而认为物理学构成了一切知识的典范。恩格斯摒弃了朗格的机械唯物主义，但却同意朗格关于物理学总的来说是知识的典范的观点。马克思则既摒弃了机械唯物

主义，也摒弃了物理学具有启迪作用的优越性的观点。

可以给唯物主义下这样的定义：即它相信物质客体是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207]从这个公理出发，可以向两个方向前进。要么可以假定，这些物质客体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个方向会导向物理学。要么可以假定，这些物质的外部客体是环境的特征，这个方向会导向“感性唯物主义”。在这两个方向中，人的观念都受外部世界的制约。如果把唯物主义定义为物质，那就意味着我们所关心的外部客体是有形的触摸之物。这是恩格斯给唯物主义下的定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含义则包括物质，也包括广义的社会学的东西。马克思把唯物主义理解为生存条件的全部需要的生产。他指的是社会在一切方面再生产自身的能力的生产。例如，不仅工厂是物质的，态度的因素也是物质的，因为态度的因素决定我们的生产能力。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是唯物主义的，因为我们关于世界的概念影响社会再生产自身的方式。

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者。^[208]然而，因为唯物主义这个词通常已被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因此需要另外一个术语来突破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把马克思看作自然主义者是最为恰当的。^[209]自然主义这个术语表明，不必把唯物主义理解为机械论的物理学，或“被当作形而上学的物理学”。^[210]自然主义这个术语意味着对人的意识和一般的人的行为下一个更强调构成性的定义。

马克思扩展了这种对于社会行为的构成性质的认识，使之包括人的思想的构成性质。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没有被真理的符合论所束缚。相反，他认识到，意识的概念化和普遍化倾向是创造任何知识所必不可少的。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Grundrisse）导言的第三部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The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中，马克思最清楚地阐述了他的认识论原则和社会分析的方法论原则。^[211]

马克思认为，认识是从感性知觉的材料开始的。黑格尔把思想看作是自给自足的，看作是由思想发出的实际过程。马克思则从我们的感觉器官提供给心灵的感觉开始。黑格尔认为，思想先于存在，但马克思却认为，存在先于思想。马克思是从一个生产系统的角度来考虑认识的。^[212]如果没有感觉器官提供的感觉，人的心灵便无法开始其生产过程。在运用了感觉之后，就必然产生一种观念。人的心灵就是根据社会先验所提供的概念组织这种感觉经验的。对于马克思而言，一个认识并不因为它与外部实在相符就是“正确的”。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认识构成一个更大整体的某个特定部分，那么它就是正确的。马克思把认识系统看作抽象的整体，而如果一个特定的观念是具体的，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它就是“正确的”。^[213]

马克思区分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和概念与实存的关系。存在先于思维。在这里，思维是由存在决定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涉及到思想的起源。然而，概念却是由社会学的东西提供给意识的：由于人生来就是社会的，他的头脑只会按照环境提供的范畴思考。概念和实存的关系涉及概念的阐释力量。概念一旦产生，就成了解释实存的工具。头脑并不仅仅是感觉的消极反映。概念是构成性的，这并不因为它们创造实存，而是因为它们能理清结构，以便理解实存。

马克思没有一套关于自然的哲学。与其谈论马克思的自然哲学，不如谈论马克思对自然的认识更为合适。马克思摒弃了笛卡尔、谢林和黑格尔的古典自然哲学，认为对自然的认识必须与形而上学分开。马克思避开了自然哲学或关于物理学的哲学，因而从来没有提出过一种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对自然的认识是认识论的一种表现。

不过马克思确实有一种科学哲学，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就是这种科学哲学的表现形式。对不依赖于心灵的东西的认识总是反

映社会先验的。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由于人是通过社会劳动创造这些社会范式的，因此，人关于不依赖于心灵的领域的知识是一种社会对象，因为它是由社会劳动创造的社会范式所产生的。马克思承认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客观（知识）必须永远反映主观的活动（这里的主观是过去社会产生的社会先验）。对于马克思来说，认识是一个辩证过程，因为它说明了主观（社会先验的生产能力）如何决定客观（知识），随后客观（知识）又如何反过来影响和决定主观（社会以及由该社会产生的社会范式）。

马克思认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存在着一种科学的辩证法：科学的辩证法（不是自然的辩证法）存在于主观和客观的交替之中。科学的辩证法的明显表现是：一种主观（一种社会范式）造成一种客观（自然知识），这种客观（自然知识）又产生一种新的自然知识（一种新的客观），这种新的自然知识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最初的那个主观（社会范式）以至使最初的主观变成一种新的主观（社会范式），这种新的主观继而又产生出一种新的客观（自然知识）。

马克思继续对黑格尔作革命性的阐释。黑格尔关于过程的概念是马克思社会观的核心。既然社会是历史的，那么至少改善人的社会条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坚持主观性思想，只不过形式不一样。黑格尔认为，主观的力量永远是精神。但是精神必须使自己特殊化，因此个体最终成了对象化的基础。马克思认为，主观力量的基础永远是社会群体。显然，在马克思那里，个体会行动，但他们永远是作为社会群体的反映而行动的。有了这些限定条件，实践就要么存在于单个的人中（黑格尔），要么存在于单个的社会群体中（马克思）。实践的概念意味着，应当承认，能动的原则必须由一个主体，即由一个个个体或集体的人类社会的力量来代表。还有，黑格尔强调意识的力量，把它说成是唯一的构成性力量，马克思也使这一说法永久化了。不

过，马克思认为实践通过两种方式来表现自己：或者是经济的活动，人通过经济活动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或者是意识的活动，人通过意识活动生产他们的知识的历史。经济活动和意识活动是相互联系的实践的表现方式。

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的位置并没有被自然科学捷足先登而抢去——心灵、意识、哲学都是构成性的力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哲学的作用不是引向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哲学的目的是增强人在智力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生产能力。哲学是为了帮助我们拓宽知识范式，^[214]以便使我们在智力和社会方面的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在极大程度上，马克思是把哲学跟可能性的创造联系在一起。用略有不同的话来说，哲学是与“自由”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必须创造自由：也就是说，哲学必须创造一种人们能够发展人性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全部哲学的基础就是他的哲学人类学。如果实践是马克思理解人的经济劳动和人的意识劳动的核心，那么人的类存在的核心就必定是他的活动。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人的活动场所放在意识中；自然主义者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活动场所就是人的类存在。人是占据在需要的基础上的一种存在。在马克思看来，需要是主观性、满足需要的是客观的东西。在最深的层次上，马克思主义跟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主题是相联系的：不是在宗教末世学的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而是在这个意义上，即自然的可接近性形成了一种条件，使人可以满足其主观性，满足其需要。马克思没有提出末世学的希望，但他确实提供了幸福论的希望。这种希望并不是说所有的需要都得到满足，因而不再有需要了，而是指某些需要的实现。然而，没有占用就不会有满足，满足人的需要的人类学源泉存在于类的活动之中，存在于它为了生产对象物而对社会和自然的干预之中。

注 释

[1]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卷,第258页。

[2]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卷,第42页。

[3]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1889年1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卷,第134—137页。

[4]George V. Plekhanov,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5]David Hillel Ruben, Marxism and Materialis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77), P. 2.

[6]Roy A. Bhaskar, Realist View of Science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78), P. 21. Bhaskar的另一本书也论述了这部著作的哲学方面,这就是The Possibility of Materialism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6)。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后的科学阐释方面,Bhaskar为自己确立了作为有洞察力和有独创性的评论员的地位。自从19世纪以来,科学理论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Bhaskar反映了库恩(J. Kuhn)以后的宇宙观。在这方面,另一部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哲学的最近发展联系起来的有意思的著作是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 Materialism, ed. John Metham and David Hillel Ruben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8)。Harvester Press出版了一套关于马克思理论各个方面的丛书,Bhaskar和Metham的书是其中的两本。还有一本书也许读者会感兴趣,这就是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 Dialectics and Method, ed. John Metham and David Hillel-Ruben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8)。

[7]Leszek Kolakowski, 'Karl Marx and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 of Truth,' in Toward a Marxist Humanism, Trans. Jane Zielonko Peel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P. 38-66.

[8]Ibid.

[9]Hillel-Ruben, Marxism and Materialism, P. 5.

[10] Hillel - Ruben, *Marxism and Materialism*, P. 79.

[1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卷,第353页。

[1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366页。

[13]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卷,第320页。

[14] 在研究恩格斯早期的宗教信仰对他的社会主义的影响的较早著作中,有两部特别出色。我发现很有用的一本书是 Karl Kupisch 的 *Vom Pietismus Zum Kommunismus* (Berlin: Lettner - Verlag, 1953)。Kupisch 指出,恩格斯的黑格尔主义是直接从虔信主义产生出来的。Kupisch 认为,恩格斯从宗教的先验论发展到黑格尔理性的先验论。Reinhart Seeger 的另一本书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就是 *Friedrich Engels: Die Religiöse Entwicklung des Spätpietisten und Frühsozialisten* (Halle: Akademischer Verlag, 1935)。这本书可以引起人们双倍的兴趣,因为它是在纳粹统治下出版的,而且又出版于1935年,那时候恩格斯思想的宗教基础相对来说还是没有探索过的领域。Seeger 提供了和 Kupisch 不同的东西。Seeger 论述了费尔巴哈和 Moses Hess 的人道主义对恩格斯的影响。Seeger 不是像 Kupisch 那样,主要讨论恩格斯的虔信主义和黑格尔主义时期的连续性,而是从黑格尔左派宗教批判的观点出发,探讨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另一部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关于恩格斯早期的书是 Horst Ullrich 的 *Der Junge Engels*, Vol. I.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61)。这本书是在东德写的,因此有英雄崇拜的弊端。尽管如此, Ullrich 还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恩格斯思想的某些方面。在 Hal Draper 和 Richard Hunt 的著作出版前,西方学者对这些方面还一无所知。Ullrich 找到了恩格斯革命思想的民主基础。Ullrich 断定,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恩格斯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从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 Ullrich 的这种说法是相当正确的。在讨论恩格斯的宗教和他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时,如果不提及 Gustav Mayer 的 *Friedrich Engels*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34),那就太疏忽了。然而, Mayer 的方法与 Kupisch, Seeger, Ullrich 的都不一样。Mayer 没有评论恩格斯的宗教和他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而是集中论述二者的不连续性。按照 Mayer 的观点,恩格斯在成为黑格尔派时,同时就断了他过去与宗教的

联系。在 Mayer 看来,宗教与理性主义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他的观点是 19 世纪理性主义的观点。

[15]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的信(1839 年 11 月 13~2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1 卷,第 540 页。

[16]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1840 年 1 月 2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1 卷,第 544 页。

[17]好几位评论家论述了马克思以前的左翼黑格尔派的历史。虽然 Sidney Hook 的著作 From Hegel to Marx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36) 出版已经 40 多年,但它却仍是一本有用的书。Hook 论述的重点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不同之处,但是他关于从黑格尔到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摩西·赫斯(Moses Hess)、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观点的演变的论述却仍能对这个过程提供很有洞察力的见解。尽管 From Hegel to Marx 这部书只略为提及了恩格斯与这个发展过程的关系,但从 Hook 的论证还是可以推断出这些左翼黑格尔派人士对恩格斯的影响。有一本较新的书,利用了许多 Hook 当时看不到的材料,这就是 William J. Braull 的 The Young Hegeli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从哲学的观点看,这本书不如 Hook 的著作令人满意,但是它所提供的关于所有那些左翼黑格尔派人物的事实详情和生平资料却要丰富得多。在这方面,不能不提及 Herbert Marcuse 的经典著作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Marcuse 是最早重新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性质的人之一。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由 David Green 翻译的 Karl Lowith's From Hegel to Nietzsch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4)。尽管 Lowith 没有专门评述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的许多人物,但是他却有力地论述了黑格尔的思想对于 19 世纪的一般影响。这种论述很重要很有力。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分析得最清楚的,要数 David Mclellan 的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New York: Praeger, 1969)。Mclellan 的描述很精炼,遣词造句很准确,而且抓住了这一时期主要的哲学倾向。像这里提到的其他评论家一样,McLellan 的书并不是专门论述恩格斯的,而是分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所有成员,但却不难从中找出影响恩格斯思想的那些方面。

[18]恩格斯:《一个旁听生的日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41卷,第298—304页。

[19][20]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卷,第234、254页。

[21]恩格斯:《谢林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卷,第203页。

[22][23][24]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卷,第213、239、230页。

[25]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卷,第150—152页。

[26][27]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58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卷,第324页—325页。

[28]恩格斯致弗·阿·朗格的信(1865年3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卷,第471—472页。

[29]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74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3卷,第126—127页。

[30]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59年12月11日或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卷,第503页。

[31]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58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卷,第324—325页。

[32]大部分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合作的著作都很自然地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马克思身上。不管怎么说,恩格斯自己都指出,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他自己只不过是伴奏的。马克思思想的创新性质一再受到探讨。因此,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汗牛充栋,而关于恩格斯生平的作品却很少见到。注释[14]中提到的Gustav Mayer写的传记虽有严重的疏漏,但由于它还没有受到有力的挑战这一不正常的原因,却还是有用的。然而,Mayer没有探讨恩格斯—肖莱马之间的关系,这是它重大的疏漏之一。另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是Auguste Cornu的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3vol, Berlin: Aufbau Verlag, 1954),不过在这本书中,恩格斯的角色却与马克思同等重要。而且,Cornu这部书还没有完成,还没写到恩格斯在伦敦居住期间的事,因此还没涉及到与肖莱马有关的那段故事。有一个专门论述恩格斯的选本,其中收集了许多很有洞察力的论文,这就是Hans Felger编的 *Friedrich Engels* (Hannover: Verly für

Literatur und Zeitgeschichte, 1970)。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恩格斯传记却从头至尾一直写得很糟糕,这说来让人不信,但却是事实。这本书的史料很丰富,但却缺乏有价值的评论,这是它的严重缺陷。尽管如此,它却收集了恩格斯和肖莱马会面和关系的丰富资料,我发现它在这方面是有用的。见 W·O·Henderson, 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London: Frank Cass, 1976)。

[33]关于肖莱马的贡献的最好的研究,是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一篇硕士论文。见 John Kenyon Roberts 的 'The Life and Work of Carl Schorlemm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1972)。我要感谢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the John Rylands Library)的馆员们,因为我 1978 年夏天在那里时,他们为我查找了资料。向我介绍 Roberts 的文章的是 W·O·Henderson, 他也使用了这篇论文。Roberts 救出了一位鲜为人知的化学家,使他免遭遗忘,这一点应受到赞扬。但是关于肖莱马还有工作要做,这个课题还没有研究透。约翰·赖兰兹图书馆藏有肖莱马出版的大部分著作。

[34] Karl Schorlemmer,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c Chemistry (Manchester, J·F·Cornish, 1879), pp. 99 - 100. 这是肖莱马最重要的著作。

[35] K·Schorlemmer, Lehrbuch der Kohlenstoffverbindungen (Braunschweig: Friedrich Vieweg und Sohn, 1871), P.4

[36] Schorlemmer,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c Chemistry, P. 94.

[37] K·Schorlemmer, A Manual of the Chemistry of the Carbon Compounds (London: Mac Millan, 1874) pp. 2 - 3.

[38] John Kenyon Roberts, 'The Life and work of Carl Schorlemmer,' P. 102.

[39] Roberts, 'The Life and work of Carl Schorlemmer,' P. 106.

[40] Schorlemmer,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c Chemistry, P. 5.

[41]其他论述肖莱马的著作是东德人写的。由于肖莱马长期和恩格斯在一起,东德的那些评论对肖莱马吹捧得过分。它们是党派偏见的产物,而非学术成果。东德的评论中,容量最大的是 Karl Heinig 的 Carl Schorlemmer (Berlin: Dietz Verlag, 1954)。东德出版的另一本书是给广大民众看的,这是一本短篇论文集。见 Carl Schorlemmer (Merseburg: Carl Schorlemmer - Kommission, 1974)。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也藏有这两本书。

[42] Margarine Manale, 'L' Edification d' une doctrine Marxiste,' Cahiers de L' Institute de Sciences Mathematiques et Economiques Appliques (vol. III, January -

February 1978), P.212. Margarine Manale 属于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Maximilien Rubel)那一派。他们俩都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多领域上不一样。不过,他们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方法却和本书的不一样。我的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区别在于概念的不同。Manale 却论证说,政治的需要是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区别的根源。由于要把马克思主义调整得适应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政治需要,恩格斯不得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虽然我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离的原因追溯到思想体系上去,但 Manale 的论点还是很有道理的。她的论文'L'Edification d'une doctrine Marxiste',追溯了恩格斯如何被迫适应马克思运动的政治需要。

[43]Manale, 'L'Edification d'une doctrine Marxiste,' P. 213

[44]Manale, 'L'Edification d'une doctrine Marxiste,' P. 170.

[45]Manale, 'L'Edification d'une doctrine Marxiste,' P. 164

[46]Margarine Manale 'La Constitution du "Marxisme",' Cahiers de L'Institute de Sciences Mathematiques et Economiques Appliquees (Vol. X, April - March 1976), PP.816 - 26. Manale 论文中的主要观点已在 Maximilien Rubel 的著述中论证过了。请特别参看他的论文'La Legende de Marx ou Engels fondateur'。这篇文章收集在他的论文集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 中。Rubel 教授是一位极为细致的工艺师,这本选集中的所有论文都有以前从未研究过的材料。Rubel 的马克思传开创了把马克思看作人道主义者的时代,是这方面的最早著作之一。见 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Paris; Marcel Riviere, 1957)。

[47]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3 卷,第 526 页。

[48]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6 卷,第 412 页。

[49]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9 卷,第 115 页。

[50]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9 卷,第 374 页。

[5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20 卷,第 30 页。

[52]Émile Bottigelli, 'Introduction', Anti - Dühring, (Paris: Edition Sociales, 1950), P. 29.

[53]Bottigelli, 'Introduction', Anti - Dühring, P. 17.

[54]Émile Bottigelli, 'Introduction', Dialectics de La Nature(Paris: Edition Sociales, 1952).

[55]Bottigelli, 'Introduction', Anti - Dühring, PP. 19 - 20. 在这一阶段, Bottigelli 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证主义的解释。在上面提到的两篇 Introduction 中, Bottigelli 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根本的一致性,他认为,恩格斯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的做法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意图和精神。然而在后面的另一篇论文中, Bottigelli 却探讨了恩格斯和马克思所走的通向共产主义的不同道路。见他的论文 'Die Hegelrezeption des Jungen Engels,' in Friedrich Engels, ed. Hans Pelger (Hannover: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Zeitgeschehen, 1970), PP. 9 - 19. Pelger 的选本有许多有趣的文章, Bottigelli 论文中的观点和本书的论点一致,即恩格斯从虔信主义的宗教哲学发展到黑格尔的先验论观点。另一篇研究恩格斯,特别是研究他对于第二国际的影响的极有价值的文章是 Lucio Colletti 的 'Bernstein and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n From Rousseau to Lenin, trans. John Merrington and Judith Whi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Colletti 是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问题上,应当向 he 请教。

[56]Eugen Dühring,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Berlin: L. Heimann, 1869), P. 436.

[57]Eugen Dühring, Cursus der Philosophie(Leipzig: Erich Koschry, 1875), PP. 63 - 4.

[58]Dühring, Cursus der Philosophie, PP. 124 - 7.

[59]Dühring, Cursus der Philosophie, PP. 158 - 65.

[60]Dühring, Cursus der Philosophie, P. 177.

[61]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20 卷,第 28 页。

[62]Stephen Toulmin and Jane Goodfield, The Discovery of Time(New York: Harper and Rowe, 1965), PP. 186 - 8. 论述 19 世纪科学史的著作很多,但是另一部对我特别有帮助的书是 Maurice Mandelstam 的 History, Man and Reas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63]Toulmin and Goodfield, Discovery of Time P. 31.

[64]Toulmin and Goodfield, Discovery of Time P. 27.

[65]Toulmin and Goodfield, Discovery of Time P. 155.

[66]Toulmin and Goodfield, Discovery of Time P. 140.

[67]Toulmin and Goodfield, Discovery of Time P. 31.

[68]Toulmin and Goodfield, Discovery of Time P. 27.

[69]Toulmin and Goodfield, Discovery of Time P. 30.

[70]J·Stern, 'Der ökonomische und der naturphilosophische Materialismus', Neue Zeit (Glashütten in Taunus: Verlag Detlev Auwermann, 1973), XV.

[71]Edward Bernstein, Ein Revisionistisches Sozialismusbild ed. Helmut Hirsch (Berlin: Dietz, 1976), P. 78.

[72]Bernstein, Ein Revisionistisches Sozialismusbild.

[73]E·Bernstein, 'Die Nothwendigkeit in Natur und Geschichte,' Neue Zeit, XV II, Vol. 2, PP. 260-9.

[74]Bernstein, 'Die Nothwendigkeit in Natur'.

[75]E·Bernstein, 'Das Realistische und das Ideologische Moment in Sozialismus,' Neue Zeit, XVI, Vol. 2, PP. 227-32.

[76]Conrad Schmidt, '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Plechanow's Letzten Artikel i. d. Neuen Zeit,' Neue Zeit, XV II, Vol. 2, PP. 324-34.

[77]Bernstein, Ein Revisionistisches Sozialismusbild, P. 58.

[78]E·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s Social-demokratie,' in Texte Zur Revisionismus ed. Horst Heimann (Bonn: Verlag Neue Gesellschaft, 1977), P. 105.

[79]E·Bernstein, 'Dialektik und Entwicklung,' Neue Zeit, XV II, Vol. 2, PP. 353-63.

[80]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与伯恩斯坦和施米特之间的论战主要是在1897~1899年的Neue Zeit上展开的。那些论争的文章读来非常引人入胜,使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正统社会民主主义与伯恩斯坦和施米特的修正主义分道扬镳的所有问题都显露得极为清楚。而且,普列汉诺夫跟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哲学立场的紧密联系,以及列宁跟它的间接联系都是显而易见的。在

这个早期时候,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看作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和发言人。除了我已在注释中提到的伯恩斯坦、施米特和 Stern 的论文外,要了解这场论战的全貌,可以参考下面的文章:Karl Kautsky, 'Bernstein und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Neue Zeit, XV II vol 2, PP. 4 - 16. 'Bernstein und die Dialektik,' Neue Zeit XV II Jahrgang, Zweiter Band, PP. 36 - 50. George Plekhanov, 'Bernstein und die Materialismus,' Neue Zeit, XVI, Vol. 2, PP. 546 - 55; 'Konrad Schmidt gege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Neue Zeit, XV II, Vol. 1, PP. 133 - 45; 'Materialismus oder Kantianismus', Neue Zeit, XV II, PP. 626 - 32. Conrad Schmidt, 'Was Ist Materialismus,' Neue Zeit, XV II, Vol. 1, PP. 697 - 8.

[81]要了解对这个问题的全都分析,请参看本书的第五章 'Hegelianized Leninism'.

[82]Ernst Mach, The Analysis of Sensations, trans. C. M. Williams (New York: Dover, 1959).

[83]E. Mach, Knowledge and Error, trans. Thomas J. Mc Cormack (Dordrecht, Holland; Reidel, 1976), ch.3.

[84]Mach, Analysis of Sensations, PP. 22, 57.

[85]Mach, Knowledge und Error, PP. 37, 41.

[86]Mach, Analysis of Sensations, P. 83.

[87]Mach, Knowledge and Error, P. 358.

[88]E. Mach,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trans. Thomas J. Mc Cormack (Lasalle; Open Court Publishing, 1960), PP. 596 - 7.

[89]另外两部应该参考的 Mach 的著作是:The Principles of Physical Optics, trans. John S. Anderson (New York: Doverpublications, 1942),和 Popular Scientific Lectures, trans. Thomas J. Mc Cormack (Lasalle; Open Court Publishing, 1943).

[90]A. A. Bogdanov, 'Ernst Mach und die Revolution,' Neue Zeit, XXVI, Vol. I, P. 697.

[91]A. A. Bogdanov, Entwicklungsformen des Gesellschaft und Die Wissenschaft (Berlin; der Nike Verlag, 1924), P. 27.

[92]Bogdanov, Entwicklungsformen, P. 33.

[93]Bogdanov, Entwicklungsformen, P. 33.

[94]研究 A·A·波格丹诺夫的主要评论家之一是 Professor Avraham Yassour of the University of Haifa. Yassour 教授是在巴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aris)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开始对波格丹诺夫进行研究的。论文题目叫 Leçons de La Revolution de 1905; La Controverse Lemine - Bogdanov. 这篇论文完成于 1967 年。从那以来, Yassour 教授一直继续对波格丹诺夫进行研究, 并发表了这方面的其他研究成果, 其中有: 'Parti ou Soviet! Leçons de 1905,' in Le Mouvement Social (Jan - Mars, 1968), PP. 3 - 26. 另有一本用希伯来语写的书, 叫 The Bolsheviki in 1905; Lessons of the Revolution (Tel Aviv: Massade, 1972). 还有一本是几人合写的: J·Bynac, L·Engelstein, E·L·Keeman, A·Yassour, Sur 1905 (Paris: Champs Libre, 1974). Yassour 还编了一份参考书目 'Bogdanov et Son Oeuvre,' Cahier du Monde Russe, Vol. 1, nos 3 - 4 (1969), PP. 546 - 84. 任何对波格丹诺夫感兴趣的人都应查阅 Yassour 的著作

[95] Bogdanov, 'Methods de Travail et Methodes de Connaissance', in Dominique Lecourt, A. Bogdanov (Paris: Francois Maspero, 1977) PP. 32, 48.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阐释, 见 Bogdanov, Die Wissenschaft und die Arbeiterklasse (Berlin: Wilmerduft, 1920).

[96] Francois Champamaud, Revolution et Contre - Revolution Culturelles en URSS (Paris: Editions Anthropos, 1975), PP. 420 - 33.

[97] 马克思致约·狄慈根的信(1868年5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卷,第535页。

[98] 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8年11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卷,第185页。

[99]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卷,第151—154页。

[100] Anton Pannekoek, 'The Posi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J·Dietzgen's Philosophical Works', Introduction to Joseph Dietzgen,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 trans. Ernst Unterman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06).

[101] A·Pannekoek, 'Dietzgens Werk', Neue Zeit, XXXI, Vol. 2, PP. 37 - 47.

[102] Pannekoek, 'Position of Dietzgen's Philosophical Works', P. 37.

[103] Joseph Dietzgen, The Nature of Human Brain - Work, in The Positive Out-

come of Philosophy, P. 90.

[104] Dietzgen, Nature of Human Brain - Work, P. 73.

[105] Dietzgen, Nature of Human Brain - Work, P. 79.

[106] Dietzgen, Nature of Human Brain - Work, PP. 83 - 4.

[107] Pannekoek, 'Position of Dietzgen's Philosophical Works,' P. 21.

[108] 'Position of Dietzgen's Philosophical Works,' P. 36.

[109] 'Position of Dietzgen's Philosophical Works,' P. 31.

[110] A. Pannekoek, Marxism and Darwinism, trans. Nathan Weiser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07).

[111] Pannekoek, 'Dietzgen's Werk,' Neue Zeit, P. 44.

[112] Pannekoek, 'Dietzgen's Werk,' PP. 44 - 5.

[113] Pannekoek, 'Dietzgen's Werk,' P. 40.

[114] Pannekoek, 'Dietzgen's Werk,' P. 45.

[115] A. Pannekoek, 'Klassenwissenschaft und Philosophie', Neue Zeit, XXIII, Vol 1, P. 605

[116] Pannekoek, 'Klassenwissenschaft,' P. 608.

[117] Hermann Gorter,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Stuttgart: Deitz, 1909), PP. 15 - 17.

[118] Gort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P. 23.

[119] A. Pannekoek, 'Marxistische Theorie und Revolutionäre Taktik', Neue Zeit XXXI, Vol, 1, PP. 272 - 81.

[120] H. Gorter, Réponse A Lenine (Paris Librairie Ouvrière, 1920).

[121]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卷,第153页。

[122] George Plekhanov, 'Translator'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F.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6). Vol. III. PP. 64 - 83.

[123] George Plekhanov,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9) PP. 29, 34

[124] G. Plekhanov,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 trans. Ralph Fox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PP. 189 - 90

- [125]Plekhanov, History of Materialism, P. 188.
- [126]Plekhanov, History of Materialism, P. 174.
- [127]Plekhanov, History of Materialism, P. 174.
- [128]G. Plekhanov,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rist View of History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6), PP. 13 - 15.
- [129]Plekhanov, History of Materialism, P. 17.
- [130]Plekhanov, History of Materialism, P. 11.
- [131]G. Plekhanov, 'From Idealism to Materialism' 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Vol. III, P.602.
- [132]Plekhanov, 'From Idealism to Materialism,' P. 600.
- [133]G·Plekhanov, 'For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Hegel's Death',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Vol. III, P. 483.
- [134]Plekhanov, 'For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Hegel's Death', P. 477.
- [135]G·Plekhanov, 'Our Differences,'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Vol. I, P. 149.
- [136]G·Plekhanov, 'Notes to Engels Book I. Feuerbach,' PP. 491. 487.
- [137]Plekhanov, 'From Idealism to Materialism,' P. 638. 在另一篇有趣的论文中,普列汉诺夫讨论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差别,这就是'Materialism Militans',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Vol. III, PP. 188 - 283. 这篇文章是以给A·A·波格丹诺夫的三封信的形式写成的。在论文中,普列汉诺夫不但把波格丹诺夫当作唯心主义者而排斥,而且重新确立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界限。'Materialism Militans'是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因为阅读普列汉诺夫对波格丹诺夫的攻击,就可以看到列宁攻击波格丹诺夫的根源,这篇论文明确地表现了这一事实:普列汉诺夫是列宁哲学上的导师。一本写得较好的普列汉诺夫的传记是Samuel Baron的Plekhanov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书中讨论普列汉诺夫哲学的章节并不深刻,但这本书最大的用处就在于:它勾勒出了普列汉诺夫本人的政治立场及其与列宁的关系。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所走的不同道路。
- [138]A·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y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9), P. 37.
- [139]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 P. 99.

- [140]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 PP. 100, 102, 116.
- [141]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 P. 40.
- [142] Karl Korsch, 'Zur Philosophie Lenin's' in Pannekoek, Lenin als Philosoph, PP. 132 - 8.
- [143]K. Korsch, 'The Problem of Marxism and Philosophie,' in Marxism and Philosophy, trans. Fred Hallida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P. 102 - 5.
- [144]K. Korsch,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und andere Schriften, ed. Erich Gerlach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1), PP. 104 - 5.
- [145]Korsch,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PP. 26 - 7.
- [146]Korsch, 'The Problem of Marxism and Philosophy,' PP. 113 - 21.
- [147]Korsch, 'The Problem of Marxism and Philosophy,' P. 107
- [148]Joseph Stalin, The Foundations of Leninis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70).
- [149]Korsch, Karl Marx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3), PP. 60 - 65.
- [150]Korsch, 'The Problem of Marxism and Philosophy,' P. 105.
- [151]Karl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5), PP. 665 - 7.
- [152]Korsch, 'The Problem of Marxism and Philosophy,' P. 117.
- [153]Korsch, 'The Problem of Marxism and Philosophy,' PP. 118 - 21.
- [154]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in Marxism and Philosophy, P. 80.
- [155]Antonio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386.
- [156]蒙多尔福在美国鲜为人知。他应得到认真的研究。蒙多尔福论恩格斯的著作于1912年问世。尽管在德国,伯恩施坦和施米特在此之前已开始找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区别,但蒙多尔福的研究却透彻得多,也深刻得多。蒙多尔福、施米特和伯恩施坦这三人的思想都受到19世纪末康德和黑格尔思潮复兴的影响。但是,施米特和伯恩施坦受的是新康德主义的影响,蒙多尔福受的则是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尤其是贝内代托·克罗齐阐述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1890~1914年意大利的文化发展是一段令人心醉的发展;克罗齐站在发展的顶峰,影响了拉布里奥拉和蒙多尔福。必须把葛兰西放到这个背景上来看,的确,如果不考

虑这个发展,就不可能恰当地理解 Della Volpe 和 Lucio Colletti 的著作。由于这种克罗齐、蒙多尔福、拉布里奥拉背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走了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它从来没有成为斯大林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牺牲品。由于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它发展了一种政治上的独立意识,斯大林死后的陶里亚蒂(Togliatti)是这种独立意识的代表。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欧洲共产主义最早发生在意大利而且在那里有着最深刻的根源,这是毫不奇怪的。对斯大林党的霸权主义的反叛是在意大利的背景下激起的。

[157] Rodolfo Mondolfo, Il Materialismo Storico in Federico Engels (Firenze: La Nuova Italia, 1973), P. 5.

[158] Mondolfo, Materialismo Storico.

[159] Mondolfo, Materialismo Storico, P. 20.

[160]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 395.

[161]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 391.

[162]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 389.

[163] Antonio Gramsci, Philosophie der Praxis, ed. and trans, Christian Reichers (Frankfurt: S. Fischer Verlag, 1967), PP. 225 - 6, 253 - 4,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i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收集的材料比较充足,但编者试图涵盖的东西太多,因此这个集子最后成了杂录。葛兰西的哲学在 Christian Reichers 的选本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164] Gramsci,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 268.

[165] Gramsci,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 148.

[166] Gramsci,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 158.

[167] Gramsci, 'Kritische Notizen Zu Bucharins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Kontroversen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 ed. Oskar Negt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9), PP. 293 - 305. Oskar Negt 的选本特别有用,它收入了 Deborin, 布哈林, 卢卡奇和葛兰西的文章。而且, Negt 还写了一篇论据充足的优秀的前言,概述了整个论战的主要轮廓。写得最好的布哈林传记是最近出版的 Stephen F. Cohen 写的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虽然这本书主要是政治传记,但它确实有一章是论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168]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 385.

[169]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 404.

[170]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 405.

[171] 卢卡奇也许是 20 世纪影响最大、著述最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任何想要搞清楚卢卡奇的政治和思想发展的人,都应查阅法国学者 Michael Lowy 的著作。我自己关于卢卡奇的著作主要讨论他对于列宁的看法,并分析了他的两部后期著作《美学》和《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卢卡奇一生的关键时期是 1929~1931 年,那时他在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与拉萨诺夫(Rjasanov)和米歇尔·利夫希茨(Michael Lifschitz)一同学习了两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就在那时趋于成熟。参见拙作‘Lukacs on Lenin,’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no. 18 (1978), PP. 17—31 和‘Completion, death, heritage,’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no. 19 (1979), PP. 49—59.

[172] 卢卡奇关于西欧文化史的著述甚丰。但是,论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斗争的最好著作是他的 Der Zerstörung des Vernunft (Neuwied; Luchterhand, 1972), 卢卡奇采取正统的、恩格斯的方法,看到了 19 世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之间基本的意识形态斗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主要产生于谢林,在希特勒(Hitler)和墨索里尼(Mussolini)的非理性主义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联合起来,最后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

[173] Georg Lukacs, ‘über Bucharins,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 ed. Oskar Negt, P. 283.

[174] Lukacs, ‘über Bucharin’s Theorien’, PP. 284—7.

[175] G.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IT Press, 1971), PP. 2—3.

[176] G. Lukacs, Der Junge Hegel (Neuwied; Luchterhand, 1975).

[177] Maurice Meissner, Mao’s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P. 35.

[178] Meissner, Mao’s China, P. 37.

[179] Edward Rice, Mao’s Wa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2), PP. 64—6.

[180] Rice, Mao’s Way, PP. 67—75.

[181] Brantly Womack, 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 Dong’s Political Thought,

1917 - 1935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2).

[182] Womack, *Foundations of Mao Ze Dong's Thought*, P. 84.

[183]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卷,第 404—438 页。《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卷,第 439—518 页;《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卷,第 541—557 页。

[184] James Chieh Hsiung, *Ideolog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1970), P. 73.

[185]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卷,第 519—536 页。

[18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卷,第 662—711 页。

[187]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卷,第 1029—1100 页。

[188]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卷,第 519—536 页。

[189]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卷,第 897—907 页。

[190] Meissner, *Mao's China* P. 45.

[191]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卷,第 795—803,811—829,830—846,847—879 页。

[192] Stuart Schram, *Mao Tse Tung* (London: Penguin, 1966), PP. 190 - 220.

[193] Schram, *Mao Tse Tung*, PP. 222 - 223.

[194] G. W. F. Hegel,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2). Vol. II, PP. 223 - 307.

[195][196][197][198]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0 卷,第 202,221—223,239—243,203 页。

[199][200][201]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 卷,第 160,164,166—168 页。

[202][20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3-8页。

[204]Frederick Albert Lange, *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 trans. Ernst Chester Thoma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Vol. II, P. 248.

[205]Lange, *History of Materialism*, pp. 246-56. lange 论洛克的部分,见 Vol. I, PP. 318-25.

[206]Jean-Pierre Lefebvre,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Letters Sur les Sciences de la Natur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3).

[207]James W. Comman, *Materialism and Sensa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21.

[208]Sebastino Timpanaro 的著作 *On Materialism*, trans. Lawrence Garn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为唯物主义的讨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Timpanaro 是恩格斯唯物主义方法的支持者,不过,他确实摆脱了这种方法的大多数野蛮做法。但他又确实把历史唯物主义跟自然科学、跟对社会和自然的客观规律的探究结合在一起。尽管 Timpanaro 的成就意义深远,但它主要还是一种 19 世纪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该书所支持的唯物主义是与自然科学和自然规律分离的唯物主义,它把唯物主义理解为对社会结构以及其中人们的实践的研究。一位名叫 Alfred Schmidt 的德国哲学家试图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定义唯物主义。我承认自己是受益于 Schmidt。具体情况请参阅他的下列著作: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Was Ist Materialismus?* (München: Kosel Verlag, 1975); *Beitrag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9), 虽然 Schmidt 本人没有作出区分,但似乎明显的是,他会把马克思置于自然主义的遗产中,这种自然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观不同,它既不求助于自然的规律,也不求助于历史。在 Maurice Godelier 的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中(trans. Brian Pear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Godelier 是位人类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对社会的理解方面,一些较为创新性的突破是由当代左派人类学者作出的,这是不奇怪的。这种情况的另一个例子是 Lawrence Krader 的一部新著: *Dialectic of Civil Society* (Assen: Van Gorcum, 1976)。Krader 是个受过培养的人类学者,他在该书中分析了马克思的公民社会概念。

[209] Norman Levine, 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 (Santa Barbara: ABC - Clio Press, 1975)。在这本书中我深入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区别。而本章我所考察的是这两个人在哲学上的区别。想了解这些区别所造成的政治、策略和编著方面广泛分歧的读者,应参阅The Tragic Deception。在该书中,我把马克思称为唯物主义,这种提法欠明确,而且因为它是六年前写的,思路也不太明晰,但我的本意还是想说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在这一点上,那本书中“马克思的自然观”一章的标题会有助于问题的澄清。

[210] Roy Wood Sellars, Evolutionary Naturalism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9), P. 19.

[211][212][213]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卷(上),第37—47、38、42页。

[214]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Kuhn采用了概念“范式”这一观点。科学成了不是建立与外部世界绝对逼真的认识的方法,而是创造概念“范式”的方法,这些概念“范式”能够最好地解释经验方法所提供的基础材料。

第二章

辩证法的毁坏

本章我要深入分析恩格斯与黑格尔的关系，由于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首先说明一下我的探讨所要采取的方向，将是有帮助的。我将首先指出恩格斯受益最多的黑格尔的思想领域。黑格尔对恩格斯的影响，可分为三个主要方面：（1）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对立面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2）恩格斯也吸收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层次结构，即把自然界分为机械性、物理性（化学）和有机性三个领域。（3）最后，恩格斯求助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作为他自己抨击机械唯物论和还原的经验主义的确证。

本章的重点不是指明黑格尔与恩格斯是有区别的，因为这是很明显的。重点是要阐明这些广泛分歧的确切性质，以便表明恩格斯曲解黑格尔的特定性质。

为了充分揭露恩格斯融合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内含，本章的中间部分，作为与恩格斯自己关于自然的哲学的一种对照，将对黑格尔关于自然的哲学展开广泛的讨论。此外，本章的中间部分还将详细对照黑格尔与恩格斯对量转化为质，对立面相互渗透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不同解释。为了进一步证明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滥用，本章的最后部分将对黑格尔与恩格斯对原因、必然性、科学、规律、决定论和哲学之类极为重要的概念的理解。支撑这整个讨论的基本设想，就是恩格斯理解物质世界的模式变成了他

理解历史过程的模式。

马克思与恩格斯以不同的方式套用黑格尔遗产，因此，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和恩格斯与黑格尔的关系是很不相同的。我将论证，恩格斯将自然科学与辩证法进行的综合，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一种内在的毁坏。这种将物理学与辩证法的混合构成了我所要说的恩格斯式的谬误。恩格斯把辩证法弄颠倒了。

认为恩格斯毁坏了辩证法，并不是说这是一种自觉的目的，因为恩格斯并没有预先图谋曲解黑格尔。其中有故意的错误，也有疏忽造成的错误。当恩格斯开始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时，他自以为这种修正是进步性的，以为这会改善和实现黑格尔最初洞见的诺言。然而，恩格斯式的颠倒，既是把辩证法置于毁坏辩证过程本身的意义之自然哲学领域，又是对黑格尔思想意图的全盘歪曲。

1870年恩格斯卖掉了他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份后，从曼彻斯特迁往伦敦。因此，恩格斯摆脱了经营实业的负担，给自己提供了一笔可靠而宽裕的收入，今后就有充分的时间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写作生涯了。在他于1870~1895年间所写的四本重要著作，即《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中，黑格尔这个人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在许多方面不同意黑格尔的观点，他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反对黑格尔把自然看作静止、凝固化了的观点。但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黑格尔哲学又被说成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它把欧洲人对自然的理解划分为两个时期，即机械论的时期（黑格尔本人也属于这个时期）和辩证法的时期（黑格尔的著作指向这个时期，但没有完成，只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才得以完成）。而且，尽管《自然辩证法》并未写完，但它仍然是

恩格斯关于辩证法与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主要论述，而黑格尔在《自然辩证法》中出现有着决定性意义。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套用产生了两个黑格尔：“为恩格斯的黑格尔（Hegel - for - Engels）和“自为的黑格尔”（Hegel - for - Himself）。恩格斯在求助黑格尔来证实他自己对自然辩证法的解释时，他不是求助于一个“自为的黑格尔”，而是在要求一个按照恩格斯的个人想象改造过了的黑格尔。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核心包含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面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1]恩格斯认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构成了整个黑格尔体系的基础。恩格斯发现量转变为质的规律在《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The Doctrine of Being”）中发挥得最为充分，而对立面相互渗透的规律是黑格尔《逻辑学》的更为重要的部分，即关于“本质论”的第二部分中讨论的。在“为恩格斯的黑格尔”那里出现的这些规律，形成了恩格斯关于自然的哲学，他的科学哲学，他的认识论和他的唯物主义的核心。恩格斯的成熟思想的整个大厦就是建立在一种黑格尔的基础之上。

不过，恩格斯也意识到了他改变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部署。虽然他称赞黑格尔重新发现了古希腊人的辩证法思想，但他批评黑格尔使辩证法仅仅处于意识中，他认定现代唯物主义给辩证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恩格斯看来，辩证法最初是在自然和社会中起作用的。恩格斯还改变了辩证法的发源地：在黑格尔那里，意识自身是辩证的；而在恩格斯那里，意识反映了自然和历史的外部辩证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反映时，他不是说外部自然在人的头脑中印下它自身的“摹本”，而是说外部的东西通过人脑被组织在概念中；外部的东西形成概念的内容，并以这种方式反映在思想中。而且，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出现于普遍与特殊，宾词（原文如此，恐为“主词”之误——译者注）与谓词

之间的矛盾，而恩格斯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过程和流动来理解辩证法的。黑格尔把辩证法看作概念与具体之间对立的进展，恩格斯改变了这一点，而认为辩证法与“运动不灭”^[2]同义。最后，在“自为的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一个引向自我规定的过程。当意识反思它自身的活动，当它认识到使个别完全符合普遍的不断失败时，它便逐渐意识到概念的重要性，从而意识到它自身规定世界的力量。恩格斯修改了黑格尔，基本上认为辩证法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由于恩格斯把辩证法规定为变动性，由于他把辩证法理解为既是历史又是自然的基本规律，他便认为，用一种决定论和必然论模式的观点去说明自然和历史的过程，乃是恰当的。

尽管恩格斯颠倒了辩证法，但他从未试图割断自己与他所理解的黑格尔遗产的联系。恩格斯误解了“自在的黑格尔”（Hegel in - Himself），不过他感到了坚定地维护黑格尔遗产的重要性，感到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如果能够与“为恩格斯的黑格尔”相联系，就更能增加活力。虽然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但黑格尔的巨大思想影响却照样明显地印在恩格斯身上。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一部严密而又在许多方面颇为费解的著作。《自然哲学》的“导言”可能是这本书最经常被人阅读的部分，因为它最容易理解，也因为包含黑格尔如何定义自然的中心内容。但是，书的主体部分充斥着过时的科学材料，为黑格尔过分的哲学热忱所淹没，而且处处是为适合他的逻辑构想而对经验材料的肆意曲解。黑格尔应用他整个哲学规划的基本范式，即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对立和新的统一的出现，按照三段论的模式来解释自然。自然有三个层次：机械性，或普遍性；物理性（包括化学），或特殊性；和有机性，或个体性，或自我规定的生命的实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使自然科学系统化的一种经典尝试，是一种进化的分类，因为物理性与机械性相互联系，有

机性又与物理性相互联系。正因为存在着自然科学的三个范畴，也就有了相应的研究不同科学领域的三门科学学科。

恩格斯所维护的不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立场，而是一种突生进化论哲学。这并不是说，恩格斯的哲学是一个首尾一贯的，不矛盾的整体。恩格斯的思想是许多因素的混合物，他把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突生进化论融合在一起。比如，尽管恩格斯抨击机械唯物主义，但机械论的特征仍然保留在他的思想中。实用主义是恩格斯的体系中一个强有力的成分。的确，恩格斯也与实证主义相联系，但不是与逻辑实证主义而是与孔德的科学实证主义相联系。然而，一般地说，恩格斯又是站在19世纪突生进化论的传统方面。虽然《自然辩证法》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恩格斯留下的笔记表明了这部著作若完成后的结构。《自然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的取代。它意在纠正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描述，说明应当如何唯物主义地解释自然，也就是要设想运动中的物质的原始状态。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取得结构形式，而用基本上来自物理学和化学方面的19世纪的经验内容去充实它们。

不过，恩格斯避免了过分的还原的唯物主义。说到底，物质世界是能够还原为物质的运动的，但恩格斯把物质世界看作由机械性、物理性和有机性三个阶段组成时，他是承认了各个领域的区别的。要想了解自然三领域中各对象的作用，就必须重视所研究的领域的质的区别。要是寻求从还原的量的方面来说明每个事物，而不涉及自然的不同领域，就会滑向机械唯物主义而否认自然本身的进化过程。

恩格斯承认需要对自然科学作“百科全书式的、全面的论述”。^[3]他称赞圣西门（Saint Simon）的尝试，虽然这种尝试是不完全的，也称赞黑格尔对自然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解释。事实上，恩格斯称“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机械论、化学论、有机

论，在当时是完备的。”^[4]但是，黑格尔的系统分类已经陈旧到了无用的地步，需要在最新科学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包括各种学科的探讨。恩格斯懂得承担这项课题是他的任务，《自然辩证法》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部辩证地构想的关于19世纪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5]

恩格斯关于自然的哲学依据两个黑格尔的原则：(1) 导向一种“螺旋式发展”的自然各领域的相互联系^[6]。(2) 尽管最终要落脚到物质的不可毁灭性，但认识到自然的各领域与自然的不同进化阶段相联系，并按独特的方式进行。力学与质量的运动相关，化学与分子的运动相关，有机学与生物体的运动相关。在恩格斯看来，有机学是一个较高的领域，高于力学或化学，因为它把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统一于自身。^[7]

为了证实自己的主张，恩格斯基本上是求助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全书》，他从这两部著作中摘录的，是那些既强调自然的个体性，又强调它的过程和连续统一的段落。恩格斯主要是要摒弃绝对同一性的概念。恩格斯感到，通过摒弃绝对同一性的概念，坚持个体与过程相统一的概念，他就能立即表明自然的一个类或一个阶段的独特性，以及自然所固有的进化性质。对同一性规律的否定，使恩格斯得以维护他的科学观，即认为特殊性过程可以是同时存在的现象。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对立面相互渗透的规律。

恩格斯在讨论这个规律时主张，抽象的同一性： $a = a$ ，和否定的同一性： a 不能同时等于 a 又不等于 a ，“在有机界中同样是不适用的。”^[8]恩格斯用来证明同一性规律不能适用于有机生命的例证就是，一个植物、动物或细胞，在每一瞬间既与自身同一，又通过呼吸和无休止的分子变化过程，总在变得不同于它自身。就是在无机自然的领域，“这样的同一性也是不存在的。”^[9]恩格斯指的是不断地改变一个物体的化学的或力学的过程。这种信念

的哲学基础是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引的话：“重要的是，要对同一性的真实含义有一种恰当的理解，为此，我们必须特别警惕那种把同一看作排斥一切差别的抽象的同一性。”^[10]恩格斯不但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原理来证实他正在提出的自然观，而且以这种方式利用黑格尔，恩格斯是想说，“自在的黑格尔”也是反对同一性思想的。对黑格尔的逻辑的这种解释乃是不正确的。

否定了同一性规律，就使得恩格斯既可以肯定自然物体的独特性，又可以肯定它们的转化，也使得恩格斯可以按不同于量的方式来说明自然物的活动。如果自然物体是独特的，那么就一定有可能以一种非量的方式对它们的行为加以某种程度的说明。在这一点上，恩格斯也曾求助于黑格尔。比如，对于有机体，不能简单地以它们的力学成分或化学成分去描述，而要按内部组织的复杂性来描述。恩格斯从单纯量的解释转向了对有机统一体的认识。但是，恩格斯为了再次证实他对自然的解释，又求助于黑格尔的一个哲学原理，并且再次利用了来自黑格尔的《哲学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的根据，把下面这段长长的黑格尔的引文掺入《自然辩证法》中：

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为一种直接的关系，乃是反思的知性所非常容易理解的，而因此每当事实上我们在寻求深刻的关系时，反思的知性也常会以这种直接关系为满足。比如，一个活的有机体的肢体和器官并不能只是看作那个有机体的各部分；这些肢体和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里，它们才是肢体和器官，它们无疑受统一体的作用，同时也反过来作用于统一体。只有在解剖学者手里，这些肢体和器官才是些单纯的机械的部分。但在那种情况下，解剖学者所要处理的已不再是活的身体，而是尸体了。这倒并不是说这种分解工作不应该有，而

只是说，如果我们要真正认识有机体的生命，单凭全体与部分之间的外在的机械关系是很不够的。^[11]

恩格斯驳斥抽象的和否定的同一性概念，跟他驳斥偶然与必须、吸引与排斥、量与质之间抽象差别的主张一样，采取的是相同的争辩方式。与其说恩格斯主张偶然与必然、吸引与排斥、量与质之间有固定的区分，不如说他主张每对范畴的每一方在每一瞬间既与自身同一，又在成为不同于自身的某物。对于观念或对象能够同时呈现为独特的而又成为与自身相区别的 he 者这一事实，恩格斯称之为对立面相互渗透的规律。由于运动是永恒的过程，所以恩格斯要求一种确证运动的观点的逻辑。恩格斯认为他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发现了这种确证。恩格斯基本上是通过辩证法去理解过程。

比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讨论了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以下说明来论证偶然与必然既相区别同时又辩证地相互渗透。首先，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表明黑格尔关于必然与偶然相融合的描述是正确的。^[12]其次，有机种类与无机种类在生态上的混合状态证明了必然与偶然的交叉。一个特定的种在哪里诞生是件偶然的事，但是，只要它一诞生，就必须与它周围的环境发生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又成为必然的事情。^[13]作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第二规律，即对立面相互渗透规律的这种例证，恩格斯请来黑格尔充当他的权威，并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作了长段引证，来证实偶然与必然的统一。

恩格斯摘引的段落，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米勒（A. V. Miller）译本第 545 页上从第二段直到第四段中找到。^[14]恩格斯本人使用的黑格尔著作的版本，是由邓克尔（Duncker）和洪布洛特（Humboldt）于 1832~1848 年间在柏林出版的全集。黑格尔的《逻辑学》成为邓克尔—洪布洛特版本的第三至五卷，这几

卷出版于 1833~1834 年间^[15]。恩格斯用来证实他关于偶然与必然相统一的主张的段落，是引自《逻辑学》的第二编“本质论”，第二编第三部分“现实”（‘Actuality’），第三部分第二章“现实”。黑格尔的大部分著作的内在结构都采取了一种三段论的形式，《逻辑学》第二编“本质论”的三段论模式是本质—现象—现实。所谓本质，黑格尔指一种普遍的东西，一个对象如何反映在它的周围环境中；他的观点是，一个对象只有在与一个他物的关系中才能获得意义。现象，黑格尔指特殊性，对象的实存不是处于与一个他物（普遍的东西）的关系中，而是自在的，是有其特性的对象。从普遍与特殊、本质与现象的相互渗透中，现实出现了：现实是内与外的统一，对象既为他物而存在，又为自在而存在。但“现实”这部分自身又分为一个三段式。“现实”这部分分为第一章“绝对物”（‘The Absolute’），第二章“现实”和第三章“绝对的对比”（‘The Absolute Relation’）。在这个格局中，所谓“绝对物”，黑格尔指外在性；比如，斯宾诺莎的自然。“绝对物”是无差别的外在性，是普遍的东西。与这种普遍性相对置的是“现实”，特殊性，或自在之物与为他之物的统一。在讨论“现实”的这种形式时，黑格尔引入了偶然性（Contingency）、可能性（Possibility）和必然性（necessity）的概念。黑格尔没有讲到偶然（chance），而是说现实，因为它是内与外的统一，也包括可能性。由于现实的也是可能的，由于现实的能够成为它的内部，所以现实的也就是偶然的：它是公开的可能性。的确，黑格尔继而肯定地说偶然性变成了必然性。换句话说，可能的东西是必然的，因为自在必须成为它所是的东西，而这种变成某物之所是就是必然性。于是，黑格尔那里的三段式运动就从“现实”引向第三章，“绝对的对比”，或者说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创造了“绝对的对比”，或因果关系。在《逻辑学》的这一部分，黑格尔关于现实、可能性、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讨论，是因果性得以出现的

条件。对于黑格尔来说，必然性意味着一个对象变成它所需要的东西的需要，而这种它自身的变乃是世界上因果性出现所要求的先在条件。

恩格斯误解和误用了黑格尔这里的整个一段话。当事实上黑格尔的本意是指可能性导向必然性，必然性本身是因果性的一个先在条件时，恩格斯却误解为黑格尔指的是必然等同于偶然。这样，黑格尔这段话本身，以及这段话在整个《逻辑学》结构中的地位，便与恩格斯的解释不一致了。

恩格斯在偶然—必然问题上所进行的那种分析，与他在吸引—排斥和量—质问题上产生同样结论所进行的分析是相同的。恩格斯把吸引—排斥和量—质问题看作对立而相互渗透的辩证规律的例证，并再次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全书》的摘录中寻求为他的观点所提供的证据。^[16]但是，恩格斯利用黑格尔来证实自己的思想，并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而是扩展到认识论和知识论的范围。为了弄清为什么恩格斯在这些领域利用黑格尔，就必须把特别的《自然辩证法》，以及一般的恩格斯关于自然和科学的哲学，置于它们的理论环境中来考察。

在19世纪下半叶，恩格斯发现他自己与海克尔、毕希纳、福格特和莫勒斯霍特所代表的那种自然科学处于交战状态。在这方面，恩格斯进行了一场反对某种自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按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认为这种自然科学是有害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在同一个时期，即1870~1895年时期，恩格斯还进行了反对体现在杜林身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复活的斗争，并反对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Bakuninist anarchism）和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改良主义（Lassallian reformism）。在马克思的兴盛时期开始衰落的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日益承担起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哲学和政治上的敌人的重任。在1870~1895年间，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解释者，捍卫马克思主

义，反对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非革命的社会主义，反对恩格斯列为机械唯物主义^[17]的那种自然科学，这些斗争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必须把《自然辩证法》看作这三个层次斗争的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为建立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而写了《资本论》，恩格斯也把《自然辩证法》看作是建立一种无产阶级物质世界观的诸原理。

按照恩格斯的解释，19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有五个主要特征：（1）静止的自然观。（2）完全从量的方面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别的自然观。（3）建立在把一切思想归结为感觉印象的严格经验主义基础上的认识论。（4）主张通过归纳过程可以达到一切真理的认识论。（5）一种不顾对哲学的需要、即不顾对形成检验和解释事实的假说的需要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还拒绝对真理作任何历史的解释。恩格斯在与19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鼓吹者的论战中需要黑格尔。更明确地说，恩格斯需要这样一种逻辑和认识论，它本身的范畴系列不是静止的和凝固的。为了既从自然的固定的物种方面，又从归纳法的固定的范畴方面彻底铲除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要求一种基于过程观念的逻辑。

在恩格斯看来，固守于一种严格的经验主义的方法，是不足以说明真理的。事实并不为自己说话，对观察的单纯归纳的整理，不会告诉我们自然如何自在地发生作用。在恩格斯看来，认识必须从感觉印象开始，但意识也必须发挥一种解释的作用。意识的作用是创立假说，通过这种假说来检验经验的观察。假说提供关于自然如何活动的说明，如果假说被证明与事实相一致，那么它就是正确的。^[18]

恩格斯的实用主义在上文的意思里是很明显的。认识所涉及的基本事物是外部世界。认识的标准是客观的物质实在，认识的目的是获得尽可能与这些外部物质客体相一致的反映。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获得相一致反映的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实用主义

的方法。意识所创立的假说要根据这种外部实在来检验。

显然，思想的历史表明，一种科学假说代替了另一种科学假说。恩格斯懂得，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不同技术条件和不同社会学条件的假说，会互相取代。在恩格斯看来，认识的这种历史过程，纯粹是认识的进步性质的一种实例。当发现新的事实，获得外部实在的新的近似值时，正当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就是要抛弃那些不为尽可能多的事实作出说明的假说。

但是，从一种更高的层次来看，不应当把认识的历史性质，即一种假说被另一种假说所代替，视为表明与外部实在严格相符是永远达不到的。终极说来，我们的认识是会接近于自然规律的。在这一点上，恩格斯仍然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因为他从未放弃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社会终将获得关于自然客体和自然规律的尽可能确切的图象。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的规律是辩证的，他一直相信，实用主义方法的最终结果，是获得一种与这些客观的辩证规律严密一致的认识。由于思想反映实在，对这些客观的辩证规律的认识，也会产生一种对思维规律或逻辑规律的认识：科学的认识是第一位的。思维的规律本身就是这些外部辩证规律的近似反映。

恩格斯拒绝彻底的经验主义，因为感觉印象本身不能与富有意义的型式相符合。而且，恩格斯认为心灵不只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因为意识必须解释感觉印象。然而，科学最终会废除哲学，不过在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完成以前，哲学仍然是一件必要的工具。明确地说，辩证哲学仍然是一件必要的工具，因为经验的事实必须按照辩证规律来组织。换言之，因为恩格斯相信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是辩证的，因为这些辩证原则的科学证实仍然无疑处于被证明的过程中，所以哲学仍然是一件所需要的解释工具，要靠哲学去取得最初的感觉材料，并把它组织成为辩证的假说。然而，在自然的科学规律确定无疑地建立之前，一个外部客体决

不能自在地被认识，而总是作为本身被历史地制约的一种假说的组成部分。恩格斯写道：“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9]

恩格斯的事业是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形式与启蒙运动的科学进展融合起来。恩格斯希望在左翼黑格尔主义的传统中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他想使自然科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这项工程并不是前所未有的，恩格斯要让我们相信，在文艺复兴时期，革命的资产阶级就曾使自然科学摆脱僧侣控制的主要鼓吹者。恩格斯这样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状况：“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20]这种社会革命与科学的融合，就是恩格斯所想象的左翼黑格尔主义的传统。首先，他试图防止一种科学倾向于支持社会现状。恩格斯写道：“开始时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站在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面前，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是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21]恩格斯之所以批评沃格特、毕希纳、莫勒斯霍特和海克尔，就在于他们的著作形成了科学与社会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系。因此，他把他成熟的年代致力于寻求一种能综合经验主义和社会进步主义的自然科学的逻辑和方法论。

从这个角度说，《自然辩证法》应该是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令人遗憾的是，它没有完成，大都是些笔记的汇编。在该书中，恩格斯要宣布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形式，一种革命的唯物主义。不过，如果把《自然辩证法》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摆一起来读，便可较完整地看清，恩格斯是如何使他的新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与其他哲学区别开来的。为了确切地把握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形式的意义，有必要略述一下恩格斯对文艺复兴以来科学

文化发展的看法，以及他对启蒙运动的特别强调。

恩格斯把唯物主义的历史区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文艺复兴直到启蒙运动，恩格斯描述为机械唯物主义的时期；第二个时期基本上从黑格尔开始，随后由恩格斯自己完成，他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22]里，在他与不可知论进行的对话中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恩格斯试图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相似范围，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治上的同盟者，他希望通过把不可知论者划入“历史的不可知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入“历史唯物主义”，从而阐明不可知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似处。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唯物主义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是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他把这描述为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形式。首先由宣布自然科学脱离宗教而独立的哥白尼（Copernicus）开始，这个时期的思想在牛顿（Sir Isaac Newton）和林奈（Carolou Linnaeus）的著作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述，而在18世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形式。恩格斯与这种牛顿式的论域决裂，因为它基于对自然和人的一种静止的观点。^[23]从历史上看，近代对自然世界的考察是与中产阶级的兴起和自由社会的征服同时产生的。

恩格斯认为，在这第一个时期，天体力学和数学领导了科学革命。集中到无机界，伽利略（Galileo）开始了动力学的探究，刻卜勒（Johannes Kepler）则发现了椭圆形的行星运动规律。而且，没有微积分，天体力学就不能超出刻卜勒和伽利略，是莱布尼兹和牛顿独立地发现了这样一种数学。在恩格斯看来，微积分和椭圆形有助于牛顿的热力学定律，而力学的模式则是科学解释完善化的例证。无机自然中的发现领导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机科学中的进展则落在后面。生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一般生命科学，要待到18世纪末才得以开拓。启蒙运动表明了科学认识的扩展，但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受缚于颓废的牛顿学说（New-

tonianism) 的科学观。^[24]

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第二时期的开端是由少数科学天才发动的，他们突破流行的牛顿学说，把进化的概念引入一切科学，虽然起初主要是引入有机科学。将近 18 世纪末时，人们把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看作不同的科学，但是，随着 19 世纪的到来，人们发现有机领域和无机领域的化学定律是相同的，这就证明了这样的思想，即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进化原则。正是靠基本上是从生物学引申出来的发展概念，恩格斯连接成了一种进化的逻辑，他把它看作一种辩证的逻辑。

从恩格斯的观点出发，是自然教给我们辩证法，因为是自然显示它自身辩证地发挥作用；逻辑反映实在。物质世界进化概念的出现这一突破，不发生在生物学，而发生在宇宙论。恩格斯认为，康德于 1755 年出版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是提出对宇宙的进化论解释的第一本书。^[25]50 年后，拉普拉斯对康德的太阳系进化观提出了数学的证明，而赫歇尔父子认出了星云，于是引起人们思索，所有众多的宇宙天体都是在历史地进化着。^[26]虽然开始于宇宙论领域，但恩格斯的意见仍然是，进化概念在生命科学中找到了它最丰富的发展领域，因为在那里，沃尔弗 (Christian Freiherr Wolff von)，奥肯 (Oken) 和拉马克向有机物种固定不变的概念发起了挑战，从而使他们自己成为达尔文学说的早期先驱者。赖尔开始了地质学的发展，从而引入了地球本身是一个处于历史进化过程中的行星的观念。阿加西斯 (Louis Agassiz) 和居维叶 (Georges Baron Cuvier) 指出了物种斗争的概念，从而促使了动物的类型本身是历史过程的结果的概念。道尔顿 (John Dalton) 和拉瓦锡 (Antoine - Laurent Lavoisier) 的化学成就有助于破除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的严格分离。恩格斯感到，牛顿的机械论的世界到 18 世纪末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从生物学产生的进化观念，正在变成用以解释一切科学的范式。

恩格斯试图证明，19世纪的无产阶级科学，并不是第一次把过程的概念与自然的概念结合起来。19世纪的无产阶级科学是对伊奥尼亚式（Ionic）的解释的返回^[27]，而不是创始一种全新的智慧。恩格斯的自然观，是回到赫拉克利特。他跳过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自然的目的论概念，把目的论谴责为唯灵论的一种形式。所谓形而上学的，恩格斯是指一种静止的自然观或社会观。在恩格斯看来，形而上学不与实体的观念相关，而只与变化的观念相关。无产阶级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伊奥尼亚唯物主义之间的基本区别就是，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是思辨的，而现代唯物主义则从经验的考察中汲取灵感。古代唯物主义在直观的基础上设想自然的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设想自然的辩证法，是因为科学的探究证明，自然按照辩证法的原理自在地发生作用。因为自然与历史本身是辩证的，19世纪的人也就终于认识到，他自己的思想必须通过达到辩证式的思维来反映和摹写外部世界的辩证法。

恩格斯不仅从伊奥尼亚人那里借用了对自然世界的看法，而且从他们那里借用了辩证法的定义。由于自然是过程，恩格斯便要求一种自身是基于过程观念的逻辑。由于精神只是反映自然和社会所固有的辩证过程，恩格斯便需要一种证实外部生命和无生命世界的流动的逻辑。恩格斯复活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使辩证法与运动同义。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写道：“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28]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历史与逻辑相同一的思想可以在黑格尔自身中找到：“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

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29]

我们不仅应当把恩格斯看作是个寻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扩展到自然科学的人，而且应该按照他对现代欧洲思想史的贡献来评价他。在这方面，他的贡献是主要的。他的论科学史的著作，是J·B·伯里（John Bagnell Bury）的《进步的观念》（The Idea of Progress）、R·G·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的《自然的观念和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Nature and The Idea of History）、A·N·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自然的观念》（Concept of Nature）和F·迈内克的《历史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Historicism）的先驱。所有这些著作都指出，历史和自然中的发展概念构成了19和20世纪欧洲思想占支配地位的主旋律。所有这些著作都认定进化学说出现于18世纪末。所有这些人写作于20世纪，而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著作中就提出了同样的解释。从思想史上看，恩格斯比迈内克、科林伍德、柏里和怀特海的见识领先了30~40年。在他独自完成的方面，他关于科学史的解释确实达到了一种突破。的确，把他跟世纪中期其他欧洲思想史家联系起来看，恩格斯显然是作为最有远见和最重要的角色出现的。F·朗格代表了科学史上唯心主义的反动，在他的著作《唯物主义史》中，把近代科学划分为前康德和后康德两个时期，朗格论证了一种康德式的心理学，就是说，如果我们毕竟要赋予感性—知觉以任何连贯性和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把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以及因果性概念，看作人类心灵中内在的感知结构。^[30]

按照朗格的说法，科学史上的前康德时期，以培根—洛克—休谟为代表，他们设想外部世界的特性是能够认识的。在后康德时期，这种素朴的经验主义被推翻，而代之以康德的正确观点，即认为外部实在就其本身而言决不能被感知，而必定总是在我们精神内在结构的框架内被感知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

到的 J·W·德雷珀 (John William Draper) 的《欧洲思想发展史》(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提出了关于近代思想进展的一种培根式的观点。^[31] 德雷珀没有找出历史性的观念, 而是感到自 18 世纪以来欧洲思想的特点, 就是在人类生活愈来愈多的领域运用经验的方法。梅尔齐 (Merz) 的多卷本著作《十九世纪欧洲科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European Scientific Thought in the 19th Century)^[32], 尽管出版于恩格斯逝世之后, 但没有把流动概念作为现代科学思想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单独提出来。的确, 梅尔齐的著作选择了 19 世纪用以解释自然世界的几种科学范式, 包括诸如机械论的、生机论的、或有机论的解释模式。

恩格斯履行了他对工人阶级运动的职责。他帮助创立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提出了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思想史的无产阶级的说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留下未完成的那种无产阶级思想史, 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留下未完成的那种工人阶级思想史是相同的, 前一著作集中于经济思想, 后一著作集中于科学文化。恩格斯通过证明变化是一切事物所固有的, 寻求从理论上使工人的主张合法化, 即资本主义必定灭亡, 并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

但是, 对于《自然辩证法》, 不应当仅仅看作思想史、科学史, 而且应当看作一种关于自然的哲学。它提供了一种关于自然世界的理论构建。在这方面, 恩格斯的思辨科学在当时也是革命, 因为他期待着爱因斯坦式 (Einsteinian) 的宇宙。恩格斯从未放弃物质微粒说, 他坚持运动中的物质是宇宙的基本建筑材料的思想。他没有完全前进到作为微粒的物质必定消失, 物质必定在能量子中分解的爱因斯坦式的思想。然而, 恩格斯确实谈到了从量到质的变化, 虽然他不是的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或 M·普朗克 (Max Planck) 的意义上说物质是一种单纯的能量的凝

结，但他的思想的确指向了这个方向。《自然辩证法》为通向二十世纪对自然的解释敞开了大门。

这里要争论的问题，不是恩格斯对一种自然辩证法的探索。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需要出发，一种自然的辩证法是必需的，马克思也希望恩格斯完成这项任务，虽然本书并不认为恩格斯的结论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长存。当恩格斯把自然本身的规律解释为辩证的，他是取得了某些进步性的见解，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里有两个基本的争端：（1）通过把辩证法解释为一种自然哲学，恩格斯是否没有破坏辩证法的本质意义。（2）一旦他作出这种融合，是否没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引入一种既传播旧的歪曲，又造成新的歪曲的对辩证法的理解。

正如恩格斯把18世纪看作近代科学概念的起点一样，他的一般认识论也既继承又离开这个启蒙运动的传统。尽管恩格斯修正了18世纪认识论的许多概念，但他仍然停留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传统之内。我们已经看到，恩格斯是他所称呼的“庸俗唯物主义”的论敌；他反对还原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相信在感觉印象的基础上说明一切观念是可能的。这样一种来自休谟的经验主义观点，要把意识归结为对外部属性的一种被动的反映。尽管对18世纪唯物主义作了这些批评，恩格斯仍坚持18世纪达到与对外部世界相符的反映的方案。从认识论上看，恩格斯所强调的仍然是知觉。

休谟与康德都否认认识“自在之物”的可能性。但是，休谟认为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是因为头脑受感觉—印象的限制，因而不可能有透过事物属性的认识，而康德认为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是因为知觉被限制在心灵的某种固有的结构之内。恩格斯既反对康德的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也反对休谟的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恩格斯既不是按照康德的意思从“纯粹理性批判”的角度思考头脑认识能力的限制，也不是从“可能性”的角度考

虑，在休谟把认识降低为对属性的感觉印象的获得之后，还剩下什么认识，而是坚持寻求确定性。当恩格斯写到“自在之物”能够被认识时，我们不应当头脑简单地看待他的意思。他并不是说“自在之物”能够在现实中被认识。他是说明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可以达到对“自在之物”准确的、哲学上可以接受的反映。

恩格斯在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他相信真理的“摹本论”。在这本著作中他写道，“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摹本。”^[33]但是，在他思想成熟的年代里，很具体地表现在《自然辩证法》的篇章里的是，他放弃了“摹本论”，而代之以反映论。恩格斯对反映的定义接近于休谟在《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表述的关于主观的思想。^[34]对恩格斯来说，“反映”（“Reflection”），并不是指完全的复制，而只是相似。恩格斯使用“反映”一词时所断言的，只不过是观念起源于感性知觉；这个词应当被看作是对感性知觉在观念形成中的先行地位的维护。像休谟那样，恩格斯也认为观念比“自在之物”更“微弱”、更“模糊”，而这种微弱而模糊的同类相符，必定出现在实用主义的检验中。但是，恩格斯不是放弃经验主义的传统，而是想维护它；他不是用可能性的限制条件去削弱它，而是努力去加强它。他对合理的确定性的探索引导他信奉绝对实在论。恩格斯追随笛卡尔的唯物主义，墨守这样的思想，即物质和它的运动是宇宙的最后建筑材料，二者都能确定地被认识。

恩格斯对18世纪古典经验主义的主张所引进的修正，必须采用的方法是，能够建立我们的观念与外部实在之间的符合。恩格斯的认识论过程按如下的方式展开：感觉印象是在先的，它使观念得以产生。我们获得的观念反映了外部世界的事件；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是自然和社会的辩证法的一种反映。

由于断定感觉印象的先行，恩格斯也就肯定了存在先于思

维。思维在存在中，在感觉材料中有其来源。但是，恩格斯主要想到的存在不是社会先验，而是作为外部自然的存在。恩格斯所谈及的事物是非转化的。由于恩格斯主要注视对外部客体的知觉问题，所以他把存在主要规定为物质客体，这种客体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然后产生感觉材料。存在是根据非转化的东西来定义的。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心灵得到这些感觉印象的信息，进而构造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假说。恩格斯并不把心灵想象为外部世界的被动反映，而是心灵能动地构造关于外部实在的本性的假说（起初是未被证明的）。对恩格斯来说，哲学使经验的过程进入假说的层次，在许多场合下，他颂扬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和思辨的把握。比如，恩格斯是笛卡尔的一个赞赏者。为了证明科学中假说性思维的创造性，恩格斯提到笛卡尔关于能量守恒定律的思辨的发现。笛卡尔最早在 17 世纪提出了这个定律，但到 19 世纪才获得经验上的证明。最后，一个假说是否正确，要通过对该假说的检验从实用的角度予以确定。如果检验表明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就能设想这个假说与外部实在相符合。休谟和 18 世纪的思想认为只能由知觉证实的东西，恩格斯修正为证实的过程只能被实用主义地具体化。但恩格斯与 18 世纪的经验主义目的一致，只是方法不同。恩格斯与 18 世纪的经验主义都把科学探索的目的看作是达到与外部实在相符的真理。恩格斯与 18 世纪的经验主义都立足于知觉的确证，都认为，当被感知到的东西就是自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时，知觉就被证实了。

恩格斯在洛克—休谟的传统之内进行研究，他把精神确定为知性（understanding），也就是感觉印象进到观念所经历的过程。由洛克和休谟所进行的人类知性的分析，基本上涉及从感觉印象到简单观念，又从简单观念到诸如空间、时间或因果性等复杂观念的运动。按照洛克和休谟的观点，从感觉经验到复杂观念的逐

步上升，是在观念的联结的原则上进行的。恩格斯不重视联结的机制，而是集中精力于实用主义的证实方法。洛克和休谟讨论的是感觉印象并合为简单观念，简单观念又结合成复杂观念的过程。恩格斯则把讨论的中心转移到证实过程，从结合的机制转移到检验的方法。尽管有这种不同，但洛克、休谟和恩格斯都没有划分知性与理性之间的区别，他们三人都把理性看作形成复杂观念的能力。

由于恩格斯把精神确定为知性，他就不能划出知性和意识之间的区别。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知性是感性知觉的领域，是自然规律的王国，而意识则具有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当恩格斯不能把握意识的反思性质，不能看到意识能观察它自身的活动或产品时，他也就不能看到辩证法能够是一种概念辩证法。对恩格斯来说，精神，或知性，是指对外部世界的近似反映的获得。由于不重视知性与意识之间的区别，恩格斯便一直不知道意识能成为对它自身概念的自我意识，而且辩证法就存在于意识与它的概念之间。

恩格斯不把精神看作一种被动的工具、单纯反映外界的东西。在恩格斯看来，精神或知性，是能动的，因为知性必须提出假说，来接受外界的检验。而且，恩格斯懂得，认识是一项历史性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知性不断地创造假说，这些假说对一代人有效，而对另一代人又被证明是无效的。然而，实用主义意义上的能动的精神与概念—实存意义上的能动的精神之间，是有差别的。从实用主义上说精神是能动的，因为它以外界事物作参照，而在概念—实存的范式中，说精神是能动的，因为概念干预和改变外界事物。当恩格斯没有作出知性与意识之间的区别时，他就仍然看不到意识的干预性质，因为他只是想到知性能够反映实在，而没有想到意识观察它自身关于实在的概念，并运用那些概念去改变实在。

知性用来把握自然规律的一个范畴，就是因果性概念。休谟在他的因果性定义中，列举了他所要求的四个要素：邻近、在先、相继和必然联系的概念。^[35]休谟头脑中的模式是从物理学引申而来。休谟在定义因果性，或者说18世纪的人在定义因果性时，他们基本上都想到原子的碰撞。因果性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理解的：起初有一个物体A，碰撞另一个物体B，结果就迫使物体B进入运动，但只有在B已经受到A的碰撞时才会这样。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被用作了建立因果性理论的模式。

恩格斯的因果性概念是基于17和18世纪的物理学。恩格斯追随笛卡尔和牛顿也是按台球相撞的方式思考因果性。恩格斯的研究所依据的因果性模式是基于太阳力学，并与物质客体相互影响因而引起方向和热度的变化有关。恩格斯思考因果性时，他按先后顺序思考。他按连续的运动，一种原因与结果前后相继的链条来思考。

恩格斯希望尽可能保持18世纪的物理学和因果性的传统，这就把他引向了物理定律和因果性的综合。恩格斯设想物质世界的每个定律必然符合一种因果关系型式，所有的定律必然遵守一种因果相继的型式。在恩格斯看来，必然性也遵守太阳力学的因果关系模式。恩格斯关于科学的意义有三部分：（1）科学是一项致力于获得以感觉印象为基础的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事业。（2）对外部世界的知识需要这样的概念，即外部世界是按规律起作用的。（3）自然规律采取不变的因果顺序。恩格斯抨击18世纪科学的形而上学，因为它基于对自然的一种静止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他想利用假定自然和社会二者的进化模式的观点来代替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但恩格斯试图为研究物质世界而提供的生物学模式，也是建立在一种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自然是历史的，而自然的进化过程本身是受必然性支配的。

恩格斯的自然哲学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

混合物。恩格斯吸取 18 世纪的内容，试图把它置于黑格尔的形式之内。把基于太阳力学的内容与部分地来自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teleology）的形式相混合，乃是一种站不住脚的综合。最重要的是，恩格斯把这种混合物作为他的重大理论工程，就不仅歪曲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也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辩证法。为了认定恩格斯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歪曲的确切性质，首先需要讨论黑格尔关于自然的哲学，作为讨论黑格尔辩证法学说的导言。

恩格斯在涉及黑格尔关于自然的哲学时，对它提出了三点指责：（1）它是唯心主义的。（2）它是机械论的和形而上学的。（3）它缺乏辩证法。恩格斯称黑格尔关于自然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由观念产生。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这种评价是正确的，而且这种观点告诉我们，恩格斯是如何划分哲学派别的。一个唯心主义者就是设定精神在先，而一个唯物主义者则设定物质在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者能不能归结为哲学实在论是有疑问的。恩格斯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形而上学的，他是指黑格尔把自然看作静止的和固定不变的。恩格斯的这种评价是错误的，因为黑格尔远不是一个牛顿学说的信奉者。最后，恩格斯说黑格尔的自然观是非辩证的，他是指黑格尔对自然的解释缺乏任何过程或历史性的运动。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尽管黑格尔的自然辩证法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一致，但在黑格尔自己思想的格局内，黑格尔关于自然的哲学乃是辩证的。

黑格尔从思辨哲学的原则出发，把一门科学规定为一种概念的自我发展。黑格尔受亚里士多德的强烈影响，仍然认为有机论者预想客体按它们的目的（telos）发展是正确的。目的是一种有原因的质，因为客体会按内在于它们的结构发展。在黑格尔看来，概念有两个方面：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和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自在的存在是潜能，它是客体生来就

有的能力。自为的存在是现实，它是潜能实现了的特殊性。比如，哈维（William Harvey）对血液循环的发现就是科学概念的自为的存在。概念，对黑格尔来说，不是静止的东西，它们发展着，它们进入世界来组织感觉印象。^[36]

这样，科学就从概念与具体之间的交替发展出来。科学不能产生于直接性的东西的形而上学。要有科学，就必须有中介；为了构造感觉印象，概念必须介入直接性与自我之间。^[37]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的；一切科学都是研究每个历史时期如何获得概念与直接性的东西之间的接近。^[38]

在黑格尔看来，为了有一门科学，首先就必须有一种概念，使具体的东西能与之相适合。所有黑格尔的主要著作，都有一篇很长的导论，其中黑格尔首先分析该著作要讨论的那门科学的概念。他的《哲学史》就有 一篇很长的导论，为了建立各个哲学派别的经验事实与哲学自身的概念相一致的结构，他在导论中分析了哲学的概念。《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也开始于一篇很长的导论，研究历史的概念，又是为了建立借以解释历史事件的连贯一致的框架。自然科学本身的研究必须有一种概念，就是说，必须有一种普遍的东西，用它来把物理科学的特殊性系统化。于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有一篇很长的导论，其中黑格尔首先确定科学的概念。

认识，在黑格尔看来，要求直接性适合于概念。这种认识论不同于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所坚持的真理符合论。在黑格尔看来，一个陈述是正确的，不是因为它反映了外界的物质，而是因为在那个陈述中具体的东西适合于它的概念。黑格尔关于认识的定义遵守占用—对象化—再占用的模式。概念占用直接性，产生一个对象，即具体的东西，于是通过确定内容与概念相互关联的程度而再度占用那个具体的东西。这种产生认识的过程，这种关于精神能动性的看法，决不是静止或凝固的，因为概念不断地被

驱使去达到它自身与直接性之间更大程度的一致。^[39]

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对自然的分析是与他关于科学的一般定义相一致的。恩格斯批评黑格尔的自然观缺乏辩证的发展，但恩格斯错了。黑格尔对自然界的解释不是机械论的，勿宁说，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界是沿着一系列阶段上升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自然的世界对此有一种设计，有一种导向有意识的个体出现的目的。

为了把握黑格尔关于自然的哲学，最好是对他的学说运用占用一对象化一再占用的公式。精神由以获得自我认识和自我规定的过程，是通过对它所产生的一个客体的再占用。客体，作为概念外化的结果，是绝对必然的，因为只有通过观察它自身的活动，作为精神的概念才能获得对它自身的自我认识。在黑格尔那里，认识要求一种主观的动因，黑格尔指的是这种主观的动因产生一个物质的或精神的客体。在本体论的规模上，精神或主体必须按作为主体的个别意识的同样的方式起作用。如果普遍的精神要获得对于它自身的自我认识，要获得自由，它就必须外在化为一个客体。因为它要求一个客体，所以普遍的精神允许自然从它流出。自然成为中介，它是精神的自我产生的客体，因而在最初的精神和获得了自我认识之后的精神之间起中介作用。占用一对象化一再占用的三合一，是黑格尔一般辩证法的主要方面。这种三合一体现了主观活动的概念，体现一个客体被引入与意识相关，以及那个客体超越到一个更高综合的概念。

三段论的模式也提供了一种确切的类比，通过这种类比可以了解黑格尔关于自然的哲学。自然界的目的是使理性意识到它自身。当理性意识到了它自身，也就完成了精神和自然的和解，因为理性懂得了它自身与自然界是同一个东西。要达到理性与自然的和解，就必须达到普遍与特殊（三段论的两极）的综合。普遍的东西是一种无差别形式的精神。精神要认识它自身就必须对象

化它自身。所以，精神产生了特殊的東西，即与它自身的普遍性相对立的个别之物。这种特殊性就是自然。在这种模式中，辩证法产生于一般与特殊之间的矛盾。如果一般被设想为概念，特殊被设想为具体，辩证法就可以被了解为概念与直接性之间的关系。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是一种质的关系，因为它建立在质的统一体的对立之上。

黑格尔的宇宙论的整个型式设置在他的《哲学全书》中。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逻辑》(Logic)、第二卷是《自然哲学》，第三卷是《精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ind)。《自然哲学》的位置在《逻辑》与《精神哲学》之间，集中体现了黑格尔关于物质世界的观点。全部三卷的整个运动是赫然的目的论：全书以《精神哲学》，以哲学审视它走向自我认识的整个进展结束。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哲学或思想就必须成为它自身的自我意识。不同于精神的某物必须存在，因为精神成为它自身的自我意识，乃是通过克服对立的过程。对黑格尔来说，《逻辑》，或客观的结构，是开场戏，从这里出发，整个螺旋运动或体系便开始了。然后，为了把自身的矛盾引入存在，精神便创造了自然，即《自然哲学》。从这种对立中，《精神哲学》，即意识的自我规定便演化出来了。《哲学全书》描述了一个教育的过程：精神进行它自身独立性的自我教育。

《哲学全书》的第一卷是《逻辑》。在这本书里，黑格尔建立了存在(Being)的逻辑原则，即客观逻辑(Objective Logic)，或者说外在性如何得以出现。他也建立了主观逻辑(Subjective Logic)，或者说精神借以感知的形式。当外部存在和主观认识的逻辑结构阐明之后，黑格尔便结束了他对精神的分析，进展到对自然的分析。黑格尔说：“我们从理念开始，现在我们又返回到理念的概念了。这种返回到开始，同时即是一种进展。我们所借以开始的是存在，抽象的存在，而现在我们又达到了作为存在的理

念。但是这种存在着的理念就是自然。”^[40]从黑格尔所言精神先于自然这一点看，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是明显的。从这种泛逻辑主义的框架出发，黑格尔提出了他的自然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在自然能够以其客观性出现以前，必须呈现自然的逻辑。

客观逻辑的原则，即实在如何得以出现，要求物质性从精神的主观性流出。主观逻辑的原则，即意识得以感知的结构，要求自然表现为三种形态：机械性，化学性和有机性。不仅黑格尔的自然概念根源于他想使精神与直接性和解的愿望中，而且关于自然的划分，即所设想的自然的形态，本身也是主观逻辑所固有的结构。

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对自然的划分是模仿一种三段论的形式。^[41]普遍性由机械性、即空间、时间、物质和重力的领域代表。在黑格尔那里，“机械性”的领域实际上涉及太阳动力学的领域，黑格尔称之为“自我外在性”(self-externality)。^[42]“机械的”东西没有内在性，因为它从“超出和外在于自身”的东西那里接受它的规定性。^[43]三段论的对立的一极，即特殊性，是由化学性(或物理性)代表。在化学的领域，物质有了个体性，这些物质客体可以按这种内在性来研究。^[44]三段论的两极的综合由有机性来代表。在这个领域，普遍(机械性)和特殊(化学性)被扬弃于主观性中。有机性包括地质的、植物和动物的领域。^[45]主观性意味着按照目标或目的从事的活动，或者说从潜能到现实的运动。^[46]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可以是主体，因为当它允许自然从它自身流出时，它是按照它自身的目标活动的，这就是自我意识。实际上，自然的整个三段论的运动，可以按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描述为从潜在性到现实性的运动。精神是潜在的自我意识，为了变成现实的自我意识，它需要一种中介的客体：自然。

黑格尔的辩证的自然观植根于一种概念的基础。对于黑格尔来说，自然是辩证的，不是因为辩证法处于自然中，而是因为自

然处于辩证法中。自然是辩证的，因为它必须适合于宇宙的先在的逻辑结构。宇宙的先在的逻辑结构是基于从普遍性到自我意识的进化运动。因此，自然实际划分机械性、物理性和有机性，是模仿这种达到自我意识的运动。此外，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主观性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主观性或者表现为个性，或者表现为精神。不论主体是个人还是精神，能动的力量必定是一个，它占用一对象化一再占用，它按照“自在”的外在化活动，所以它所做的就能变成“自为”。从“自在”到“自为”，从普遍到具体的运动，是一种解释学的模式，一种自我教育的模式，其中力量的潜在性外化于主观性所产生的现实中。

恩格斯的谬误根源于恩格斯把辩证法内在化。黑格尔了解为精神的目的论发展的东西，恩格斯把它颠倒为发生在物质客体内部的度的变化。黑格尔关心逻辑结构，关心通过总体内部关系达到的意义，恩格斯则关心度量，关心通过量的规定达到的意义。而且，恩格斯的谬误是去掉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主观因素。因为黑格尔那里的辩证法离不了概念，为了使概念外在化，需要某种主观的力量。然而，在恩格斯的颠倒中，由于变化是按度量来说明的，主观的力量就不需要了。

上面我谈到恩格斯注意辩证法关于内在的量的规定，这与我早先谈到恩格斯保留质的区别的概念并不矛盾。这里的问题涉及到恩格斯是从不同的层次看待自然。当恩格斯涉及特殊科学中的问题时，他仍然坚持机械学、物理学和有机学之间的质的区别。恩格斯在寻求对这些特殊科学领域的对象行为的说明时，他关心每个领域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定律。从这种观点出发，恩格斯对海克尔持批评态度。但是，当人们涉及物质构造这样的终极问题，涉及有关自然本性的本体论问题时，恩格斯在这个层次上把一切事物都归结为内在的量的规定。这两个层次之间没有矛盾，因为恩格斯可以证明，人们进展到讨论自然的进化阶段时可以略

过不同的状态，而这些不同的状态都有其独特的定律和结构。下面关于恩格斯的讨论，我将集中于本体论的层次。

恩格斯的颠倒是一种自然哲学的形式。在17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断言自然的先在性，主张哲学的陈述在符合世界的决定论规律的范围内是正确的。在牛顿和笛卡尔时代，物理学是占支配地位的科学，自然哲学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即某物如果是必然的，它就是真实的，因为物理学的定律是必然的。黑格尔区分了关于自然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Nature）和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关于自然的哲学涉及自然的逻辑观念，而自然哲学则以物理学或物质客体的量化为基础。^[47]黑格尔寻求物理学与关于自然的哲学的分离，而恩格斯则把物理学作为他的辩证法的实体。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解释束缚于笛卡尔和17世纪的原子论，是一种物理学的形式，因为这种解释像笛卡尔那样，按照物质、物质的运动和广延来说明变化。在恩格斯的颠倒中，数学和物理学是认识的模式，所有其他科学都必须模仿它们。

对恩格斯的这种批评，并不否认黑格尔的辩证法需要改变。它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把自身表现为逻辑形式的外在化。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必须使辩证法物质化。唯一的问题在于用什么形式来实现物质化，恩格斯的物质化形式是不合适的。恩格斯的物质化形式使辩证法以可量化的变化形式深入到物质内部。这种颠倒的形式导致了自然哲学。恩格斯在寻求从左翼解释黑格尔时，正确地看到了推翻概念的辩证法的需要，但却不正确地代之以化学的和物理学的度量原则。

马克思也使辩证法物质化，但他运用的是与自然哲学大不相同的方式。这里整个讨论背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唯物主义以不同的意义。对恩格斯来说，唯物主义意味着17世纪的笛卡尔主义和微粒实在论。对马克思来说，占支配地位的科学既不

是数学，也不是物理学，而是 18 世纪的比较社会学和环境论，或者是对不同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社会先验或社会范畴的研究，通过这些范畴，我们对自然和历史的考察才得以过滤。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既改变了又继续了黑格尔的传统。他改变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但保留了黑格尔对作为结构和关系的辩证法的理解。黑格尔的结构是逻辑的结构，而马克思的结构是社会的结构。

使恩格斯受害的谬误预定了他走向实证主义。之所以说恩格斯是个实证主义者，就在于他想把哲学纳入自然科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判断看作个别性的判断；摩擦生热这个单独的事实被记录下来。第二个判断可以看作特殊性的判断：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或机械运动形式）展示出在特殊情况下（经过摩擦，转变为另一个特别的运动形式（热）的性质。第三个判断是普遍性的判断：任何运动形式都证明自己能够而且不得不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到了这种形式，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的表达。由于有了新的发现，我们可以给他提供新的证据，提供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如此表述的规律本身，我们是不能再增加什么了。在普遍性方面——其中形式和内容都同样普遍——这个规律是不可能再扩大了：它是绝对的自然规律。^[48]

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继续了孔德的实证主义。^[49]谈论孔德与恩格斯之间的连续性，并不否认他们二人之间的重大区别。谈论这种连续性，只是肯定孔德和恩格斯都把科学定律的发现视为给人类带来实证的知识，视为表明哲学会成为科学。当然，这是黑格

尔所不承认的事情。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那篇著名“导论”中，他阐明了哲学需要发展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它自己的方法，因为他认识到，如果把哲学和辩证法归属于数学和物理学，那就是哲学和辩证法的毁灭。^[50]另一方面，马克思确实谈过超越哲学的需要。^[51]恩格斯在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内，试图超越哲学，但他的做法跟孔德一样，是在物理学中消解哲学。马克思说到超越哲学的需要时，他指的是实现哲学的需要。马克思不想取消哲学，因为他认识到，哲学的事业，概念的分析，是一种构成性的活动。按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马克思看到了哲学的作用不是黑格尔式的玄思，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实现意味着哲学将干预世界，并改变世界。

恩格斯对他视为辩证法最核心的东西的三条规律的解释，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使辩证法陷人的谬误。这三条规律是，“质量互变规律；对立面相互渗透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每条规律所描述的变化都是通过物质客体内部性质的量的改变实现的。我们首先研究恩格斯的第三条规律，否定之否定，是适合我的论述的分析步骤的。

一 否定之否定

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为了说明他所说的否定的含义，他从自然科学借用了类比。比如，当大麦种子在正常的大气条件下落到适宜的土壤里，就会变成一棵植物；植物否定了种子。然而，植物生长又长出大麦颗粒，然后植株死去；新的种子否定了前一否定，植株不再存在了。恩格斯没有断言植物学、生物学、地质学和历史学中的变化和发展是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进行。^[52]他承认在所有这些存在层次的过程中，有差别，有特定的变化。但是，变化的一般规律，最好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来表

述。而且，在恩格斯看来，这些变化首先发生在物质客体中。恩格斯最关心那产生物质客体内在性质变化的量的增加或减少。这样的定义易于模糊有关物质客体的同一性观念。如果这些客体是处于不断的分子变动的条件下，那么，企图把某一特定的同一性凝固起来是很困难的。恩格斯的否定之否定思想，只不过表述了一种较为基本的理解，即认为世界适合于赫拉克利特的流动观，而这种流动是按照原子的度量来理解的。

对黑格尔来说，否定的概念有着更深更复杂的含义。黑格尔使用这个术语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1）限制（limitation）或排斥（exclusion）。（2）扬弃（Aufhebung），或超越（transcendence）。我将在下面的段落里确定每一种的含义。

斯宾诺莎是黑格尔把否定用作限制的意义的来源。在《逻辑学》第一篇里，黑格尔引证了斯宾诺莎：“一切规定都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 est negatio*）”。^[53]为了使某物显露，就必须对它作出规定和概括：它必须排除那不是为了建立它自己的特色的东西。黑格尔关心质的存在：为了存在，一个事物就必须是它自身而不是某个他物。否定是这种划界的过程，即排斥的活动，通过这种划界或排斥，一个客体便作为一种质被提了出来。在这个定义范围内，否定出现在自然中。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说光明否定黑暗是恰当的，说运动否定静止也是恰当的。自然呈现它自身是由不同的物体组成的，否定是一个事物用以建立其质的方法。^[54]

其次，否定也可以指超越。但是，为了懂得黑格尔的超越的思想，必须熟悉一下客观性（objectivity）这个术语。在黑格尔那里，一个客体用许多方式表现它自身：我在前面提到过其中的两种方式：“自在”和“自为”。还有第三种方式，“为他”：这三种方式描述客体之扬弃于目的中。当一个客体表现它自身为“自在”时，它基本上自我关系。因此，一支钢笔“自在”地放在桌上，它就单纯是在那里。“为他”这一术语指客体使它自身与

一种主观性相联系：钢笔的存在现在被一种主观性所中介。在“自在”与“自为”的关系中，一个客体从它具有的一种可能走向具体；它由它自身设置出一种特殊的规定性。在“自在”与“为他”的关系中，一个客体成为达到一种目的的工具，这种目的是由一个外在于该客体的主观性建立的。^[55]

二 对立面的相互渗透

恩格斯用来说明辩证法的对立面相互渗透规律的例证主要取自物理学，他在《反杜林论》中写道，“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56]运动是对立的统一，是在这里和不在这里的结合。恩格斯大量地引用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把吸引描述为力，把排斥描述为能，认为这些互相对立的两极就是运动起源的构成因素。^[57]

为了充分熟悉黑格尔的对立和矛盾思想，必须确定这些概念在《逻辑学》中的位置。黑格尔在第二篇即“本质论”部分讨论对立和矛盾。在《逻辑学》的第一篇里，黑格尔涉及存在，涉及事物与其作为度的广延的同一性。但在第二篇，黑格尔的分析移到了另一个方向。第二篇即“本质论”部分（客观逻辑），是用来讨论使现象成为可能的逻辑结构。^[58]在某物能够出现之前，必须有某些客观的和主观的逻辑形式，把确定的同一性推向前进。^[59]“本质论”是一种关于实在的逻辑前提的讨论。黑格尔在进行对这些客观的和主观的逻辑前提条件的分析时，虽然他发现首要的东西是关系。在黑格尔看来，现象和物质的东西的内部状态无关，现象，毋宁是一种外部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第二篇的大量篇幅，即第二章被用来分析诸如同一、差别、杂多、对立和矛

盾的概念。^[60]

黑格尔在两个层次上运用对立和矛盾的概念：反思的层次（客观逻辑）和概念的层次。在这些论述中，对立和矛盾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在反思的层次上，对立和矛盾作为现象的根据起作用。在概念的层次上，对立和矛盾涉及由主观性用来在现象中作出区分的逻辑工具。

对立和矛盾作为现象的根据起作用，因为它们是建立同一性的范畴。为了使 A 成为 A，就必须使 A 也是非 A。对立和矛盾于是显示在规定的行为中：通过抹去某物所不是的东西，它们帮助设定某物是什么。^[61]在概念的层次上，对立和矛盾的观念是与主观性，也就是目的性相联系的。主观性是目标，是有机体的目的地完成。^[62]通过面对外部世界的人的主观性为中介，概念采取的第一程式是判断。其实，判断是把区别性引入对实在的概念的把握。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概念以特殊—普遍—一个别的方式进行理解，乃是一种认识论的必然性。规定、区别性，乃是从概念演化出来的质的判断：判断是分解的领域。通过人的主观性的工具，设立了区别（特殊—普遍），而且这些单独的规定被带入相互的关系中。

概念的另一种形式范畴，的确是较高的范畴，那就是三段论。在三段论中，判断的有关系的对立面连接起来了，因为三段论是达到同一性的辩证法的层次。但是，同一性不是自明的，它是一种推断。当三段论设定了特殊与普遍的统一时，同一性，这另一个认识论范畴，就产生了。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普遍出现在特殊之中，乃是一种逻辑的必然，然而，在这个层次上需要一个第三项：作为中介的项。于是，即使在三段论的层次上，差别还是保持着，特殊仍然是特殊，但增加了一个作中介的根据，作为同一性之所在。这个中介是否定的，因为否定的东西是界限、障碍，既抑制又维护两极的规定。判断的层次是分析的，而三段论

的层次则是综合的。

在主观逻辑方面，对立和矛盾的范畴发挥着与它们在客观逻辑方面相对称的作用。正如在客观逻辑中，为了产生现象而要求对立和矛盾，在主观逻辑中，为了意识能把差别引入外部世界，也需要对立和矛盾（特殊—普遍）。正如在客观逻辑中，对立和矛盾适合于作为现象的根据，在主观逻辑中，对立和矛盾（特殊—普遍）也就是理念用以组织它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范畴。

最后，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说到，对立面相互渗透的规律“占据了它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6]恩格斯对《逻辑学》第二篇的这种评价是错误的，因为“本质论”是描述从直接性通过本质到现象的过渡，而不是描述对立面的相互渗透，或同一性的否定。“本质论”主要致力于同一性的建构，或同一性现象所必需的逻辑前提的建立。因此，被恩格斯解释为对同一性概念的攻击的文字，其实黑格尔的明显目的乃是展示同一性的绝对需要。

恩格斯之所以发生对辩证法的曲解，因为他单纯停留在自然的层次上，他使自然界成为全部本体论的准则。恩格斯是个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者。恩格斯式的辩证法是19世纪物理学与赫拉克利特的一种融合。恩格斯采纳赫尔姆霍兹的能量守恒定律，并用它来说明赫拉克利特的流的思想。从赫尔姆霍兹关于能量（运动）永恒和不可毁灭的观念出发，恩格斯把这种见解加入赫拉克利特的想法：流能够由运动中的物质的量的增加或吸引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对立和矛盾的概念便被用于描述量的变化了。

三 量转化为质

恩格斯把辩证法的第一规律，即量转化质的规律，定义为物质和运动（能量）的量的增加或减少引起质的变化的过程。恩格

斯在讨论他的辩证法的第一规律时，把他的关注限制在非有机体方面。事实上，恩格斯涉及的是物理学或化学，因为他感到量的变化并不正常地出现于力学中。^[66]恩格斯对这条规律的证明，基本上集中在化学方面，通过对碳化合物由氢、氧、碳原子的增加而发生质变的方式加以描述。

对黑格尔的质和量的概念的任何释义，都必须首先弄清这些概念在《逻辑学》的整个结构中的地位。第一篇“存在论”的目的，是弄清确定的存在的逻辑前提。第一部第二篇“本质论”的目的，是要证明一种特殊的同一性发现它自身与另一种特殊的同一性相联系所必需的逻辑前提。第一篇“存在论”是第二篇“本质论”的必要的前提。在黑格尔的逻辑世界之内，在能够使一种特殊与一个他者相联系之前，需要同一性，或者说，同一性，对于整个辩证过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像他的所有其他哲学论述一样，“存在论”是建造在三段论的模式之上。在黑格尔看来，同一性需要质，或规定性。存在是确定的质。在三段论中，确定的质作为代表普遍性的一极出现。但存在必须有向量，像表现为高、宽或质量。为确定的存在提供广延的东西，就是大小或量。在二段论中，量作为代表特殊性的一极出现。普遍性与特殊性在更高的统一中的结合，质和量融合为更高的个别性，发生在度（measure）中。度是质和量在一个确定的存在中的结合。

当恩格斯把量转化为质的概念加以量化和内在化时，他完全破坏了黑格尔对这个命题的本来理解。此外，恩格斯甚至忘了告诉他的读者，黑格尔也断定质可以变成量。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整个误述，使读者错误地设想，黑格尔那里的辩证运动只是朝着一个方向走，即由量到质。恩格斯毁坏黑格尔辩证法的根子，就在于他对那个过程的重心的绝对转移。对黑格尔来说，质与量的对立是客观逻辑的必然结构。精神要求质—量—度的客观逻辑形式

预先存在，这样，物质的外在世界才能出现。由于恩格斯的颠倒，辩证法成了物质的内在条件的一种作用，其中物质客体的状态是根据它的原子和分子的量来改变的。

而且，当黑格尔允许量到质的变化时，这种转化发生在度的范围之内。在质的概念之内，量并不变为质，因为质的概念是确定的存在，这里不能有同一性的转化。而且在量的概念之内，量也不变为质，因为量的概念只涉及大小，而大小不具有确定的存在。只是在度的概念中，黑格尔才允许量变为质。度是一个“物”（‘thing’），一种确定的存在，它具有广延，而且内部是可分的。

内部可分性是数学（音乐）和化学的一种特征。对黑格尔来说，量到质的转化限于这两门科学。黑格尔把化学中量变为质的过程称为“选择的亲和性”，并对此描述如下：

与前面所用中和与亲和性等名词一样，这里所用的选择的亲和性这一名词，也牵涉到化学的关系。因为一种化学物质主要是以与它的他物的关系为其特殊的规定性，它只是作为这种区别而存在。再者，这种特殊的关系又与量相联，同时，这不仅是对一个个别的他物的关系，而且是对一系列与它这样对立的有区别之物的关系；……和谐是排他的选择亲和性，而其有特色的质同样又消解于新近的量进展的外在性中。^[65]

只有在那些有度的关系的情况下，才发生量向质的转化。^[66]黑格尔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看到这一原则的作用。在生物学领域，不发生量到质的变化。生物学上的规定性，是由结构和目的形成的。同样，从量到质的运动也不适用于力学领域。空间，可以在量上无限地增长，而仍然保持空间的质；时间，可以在量上

无限地增长，而仍然保持时间的质。恩格斯把从量到质的转化弄成一个普遍的规律，适合于自然和社会的每个单一的领域。恩格斯这样做，因为他也把物理学看作适合于全部自然领域的普遍科学。

在黑格尔看来，目的论的解释适合于有机界，因为生命是以目的为特征的。同样地力学的解释适合于太阳动力学，因为下落、碰撞和引力是物质行为的方式，这种行为要求绝对的空间和时间的向量：事实上，在说明太阳动力学时，黑格尔把物质解释为空间与时间的相互折迭点。^[57]同样地，量变为质的思想是一种解释模式，一种适用于度量科学的理解方法。因此量变为质的思想是黑格尔的一个概念，一个使得物质世界成为更可说明的概念。对恩格斯来说，量转化为质是从属于物质客体内部的、可量化的状态的一个普遍规律。在度量关系上有一个“关节点”（‘nodal point’）；就是说，有一个当一种量不再是量而变成一种质、一种确定的存在之点。^[58]但是，这种“关节点”不是自在的自然的一条规律。宁可说，这个“关节点”的概念和它所处的从量到质的改变，是主体为了理解度量关系而运用的一种概念解释方式。

这里关于否定、矛盾和质的概念的讨论，准确地探明了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的位置。辩证规律不是在自然本身中起作用。规律确在自然中起作用，但它们不是辩证规律。开普勒的太阳椭圆定律不是一种辩证规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贝采利乌斯（Jöns Jacob Berzelius）的分子排列学说都不是一种辩证规律。事实上，开普勒、牛顿和贝采利乌斯的学说是与牛顿、休谟的因果律概念相一致的自然规律。黑格尔承认牛顿和休谟的因果律在自然界起作用的事实，不应当被用来否认自然本身（因果性）存在于一个更大的逻辑的（辩证法的）氛围之中这一事实。我们已经看到，在精神向自我意识的迁移中，自然是一个必需的阶段。自

然一旦被精神释放，一旦变成精神的他在 (Other - ness)，它便按照古典的经验主义的因果律活动。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在三个广阔的领域起作用：(1) 客观性的层次。(2) 主观认知的层次。(3) 主观活动的层次。我来分别讨论一下每个领域。

在客观性的层次上，辩证法按照必然的逻辑范畴活动。依柏拉图的方式，黑格尔是一个泛逻辑主义者 (Pan - logicist)。概念范畴，作为先决条件，作为形式，把一种特殊的现象模式给予物质性。黑格尔的逻辑本体论自身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A) 客观精神的占用和对象化；B) 允许物质性如此这般出现的先行的逻辑结构。客观精神的活动乃是作为组织宇宙的一种背景。客观精神的自我目的 (self - purpose) 是自我规定 (Self - determination)。精神向着自然运动的第一步，是使精神对象化它自身；为了认识它自身，它必须把自身看作他者。精神把它自身对象化为自然。然后精神重新占用自然；它把自然纳入它自身的目的，并实现它自己的自由。客观精神的活动，即占用—对象化—再占用的有节奏的运动，建立了宇宙的三段式结构的范型。

辩证法在客观领域中的第二种表现，涉及允许物质性出现的先行的逻辑结构。如果物质的直接性要呈现任何一种连贯性，那么就需要先行的逻辑范畴，而辩证法就产生于逻辑范畴的相互斗争、相互需要和相互的自我保持的关系。比如，对黑格尔来说，某些最重要的逻辑范畴是中介概念，像现象与本质，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对立—否定，内容与概念，整体与部分。这些范畴是本体论的，它们是不可毁灭的，是物质性的先决条件，正如理念是自然的先决条件。由于这些范畴是自我保持的，辩证法就必定表现为一种逻辑的质与另一种逻辑的质之间的经常交替。

通过主观应用逻辑范畴于物质世界，辩证法在主观认识的层次上也是发挥作用的。黑格尔批评康德和休谟的认识论，认为这

种认识论是建立在思维着的“我”与其自然环境相分离的基础上的。^[69]为了克服休谟的思想的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重性，黑格尔宁愿把认识看作内在地包含着自我与外部世界两个方面，黑格尔关于认识的学说奠基于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上，他写道：“那自为的概念也必然地在直接的实存之中，在这种与生命实体的同一中，由于淹没在它的外在性中，它是人类学的题材。”^[70]黑格尔谈到主观的与客观的统一时，他的意思是，用以理解世界的范畴直接呈现在同类的自我中。于是认识就是固有的范畴与物质性之间相融合环节，或者说，除非逻辑范畴与物质性二者都出现，否则就不可能有认识。^[71]

主观认识的发生所通过的形式，就是客观逻辑组织物质性所通过的形式。基于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黑格尔认识到“概念的规定性”是“设定在概念自身之中的。”^[72]换句话说，认识发生所通过的逻辑形式，普遍性—个别性，现象—本质，矛盾，内容和概念，中介，整体和部分，乃是意识的概念的固有成分。^[73]

在第三个层次上，即主观活动的阶段，辩证法按照意志发挥作用。客观精神是一种个体的力量，它的活动是创造一个自身的他者，因为为了实现它的自由，它需要超越这个他者。与此相似，主观精神能够以两种方式表现它自身：通过个体的力量或者通过群体的力量。为了使辩证法在主观活动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必须的是一种意识的力量，即能主观促成它自身目的的东西。

在主观活动方面，辩证法的三段式采取占有一对象化一再占用的形式。达到了主观活动的辩证法这一步，也走完了那基本上用于讨论存在于客观和主观领域的逻辑的形式范畴的《逻辑学》。在讨论主观活动的辩证法时，我们把逻辑本体论的领域抛在后面，进入了意识的目的的领域。

主观活动的辩证法依据的是行动主体的一种基本需要：自我外化（Self-externalization）的需要。在描述自我外化时，我们已

经进入《精神现象学》和《精神哲学》所包括的领域。我们进入了生产的领域，意识的主体如何造成它的对象化。为了完成自我规定的目的，意识的主体必须是自我反思的（Self - reflective），它必须首先观察它自身的活动。意识的主体通过外化它自身、产生某种东西，就能够观察它自身的力量。当主观的力量观察它自身的产物，它就得以了解它自身的性质，而通过认识它自身的性质，它就能按照它自身的目的来规定它自己；这就是自由。

“为恩格斯的黑格尔”，或恩格斯的颠倒，除了肢解辩证法，还造成了其他后果。恩格斯融合古典力学和辩证法的尝试，同时具有定义原因、必然性、科学规律、唯物主义、科学和哲学的内涵，讨论这些概念，将充分揭示恩格斯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

恩格斯从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那里吸收了因果性的概念。恩格斯的因果性概念是17和18世纪古典力学的因果性定义的直接继续。首先由伽利略提出的这个定义，是根据台球或根据原子在真空中的下落、碰撞和反作用来描述的。按照伽利略的定义，当台球A碰击台球B，使B移动时，A就是B的运动的“原因”。这种因果性定义适合于在16和17世纪发展的那种物理学，适合于按物质的微粒概念建立的那种物理学，而且物质又是在绝对空间中运动的物质。

正如洛克和休谟囿于伽利略的这种原因定义，恩格斯也把原因确定为由“相邻、接近、有规则的相继”^[74]构成。与台球A撞击台球B，B又击中台球C相似，恩格斯把因果性看作“相邻、接近和有规则的相继的成双的事件。”^[75]在恩格斯那里，因果性被描述为事件的连续。恩格斯思考因果性时，他想到的是事件在时间顺序上的相互跟随—— t_0, t_1, t_2, t_3 ——。^[76]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自然规律被描述为既具因果性又具必然性。^[77]在这方面，恩格斯也仍然受洛克—休谟的“自然规律是强

制的原则”这种论点的束缚。^[78]当某种东西是有原因的、必然的并因而指向一种“必然的结果”，^[79]那么它就是一种自然规律。如果事件既前后相继地互相跟随，又有规则地互相跟随着，那么这些成双的事件就会指向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本身是有规律的、恒常不变的。当恩格斯把因果性确定为时间上的相继时，也就要求他把自然规律确定为预示的能力。

恩格斯不是看不到“自然规律是强制性的原则”这种信念的含义，这些原则所表明的是有规则的会合。他意识到了这种自然规律的定义与一个全能的上帝的定义之间的相似性。一个绝对决定论的宇宙与一个绝对预先注定的宇宙是相似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

承认这种必然性，我们也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走出来。无论我们同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of Hippo）和加尔文一起把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旨意，或者象土耳其人（Turks）一样叫做天数（Kismet），或者叫做必然性，这对科学来说是完全一样的。^[80]

尽管恩格斯认识到他对必然性的信念有神学的含义，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他对 17 和 18 世纪古典物理学的忠诚。

恩格斯关于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的定义暴露出他思想中残存的机械论因素。我在这一章前面已经提到，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不是一个首尾一贯的整体，而是由一些矛盾因素组成的。一般地说，恩格斯确实避免了机械唯物主义，而作为一个突生进化论者出现。但是，这种一般的进展并不否定机械论因素继续存在于恩格斯的思想中。恩格斯继承笛卡尔原子论的传统，主张宇宙最终能够用运动着的原子的碰撞来解释。对笛卡尔的这一微粒说，恩格斯结合了康德关于宇宙演化性质的星云学说，而且恩格斯一旦

要涉及自然的历史基础，他又进一步融合了一种把辩证法本身确定为过程的辩证哲学。恩格斯把机械论的模式和进化的模式结合在一块，是一种站不住脚的综合，因为他一方面认为物质世界最终能够归结为在绝对空间中运动的原子的微粒问题，同时又主张自然处于三个上升的进化阶段，而且银河系本身，以及所有的银河系都显示出进化的发展。

在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基本上是同义的。他不是像马克思那样把唯物主义理解为与作为一种物质生产力的社会相联系。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定义为，社会为了提供它的生存条件所必须生产的物质客体，而恩格斯则把唯物主义定义为物质的本体论^[81]，定义为发现自然规律。在这方面，恩格斯使孔德的实证主义永恒化了。甚至辩证唯物主义也把发现自然的辩证规律当作它的目的，而且当人们认识到了这些规律，哲学的需要就会被排挤掉。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附和孔德的看法（孔德的看法本身是培根的梦想的一种继续），认为人关于自然的知识（实证知识）会逐渐取消对哲学（对概念和思维规律的考察）的需要。^[82]

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理解，与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特别是讨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第三卷中使用的唯物主义非常一致。但是，黑格尔把笛卡尔的唯物主义作为直接性的领域来谴责。在恩格斯看来，唯物主义总是可以归结到物质，归结到具有一种物质实体的东西。他不使唯物主义与任何社会情况相联系。在恩格斯看来，社会的生产关系，一个社会内的结构关系不是唯物主义的，因为他们是触摸不到的。^[83]恩格斯甚至照孔德的方式承认，他的唯物主义形式倾向于一种自然哲学，只是他的自然哲学的形式不同于古典物理学的变种，因为他的自然哲学是动态的，与牛顿的固定性相对立。^[84]

恩格斯所说的科学，乃是对表现有形物质事件的恒常现象的

规律的探索。而且，科学必须能够预示事件的结果。不过，在恩格斯看来，若与社会的发展完全脱离，科学就不会发展。正如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提到的，上层建筑，即思想领域，不仅反作用于基础，而且它自身也受基础的反作用。在恩格斯看来，科学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它回答一个社会的生产的需要。

然而，恩格斯的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自然的认识是通过社会先验过滤的，因而是一种社会的产物。主张我们对自然的解释必然总是反映社会先验和主张技术的需要决定着所要考察的自然领域，二者是大相径庭的。马克思持第一种主张，而恩格斯持第二种主张。当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85]他的意思是，社会的技术的需要把科学探索引向一个特定的领域。比如，农业民族为了较好地计划谷物的种植和收获，在生产上就需要了解季节的变更，因而就把他们的科学探索引向了天文学领域。^[86]另外，农业民族改良农田水利的需要，也把他们的科学研究引向力学领域。而且，科学的发展也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因为为了天文学和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发展数学。因此，在恩格斯看来，科学认识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因为技术的需要把科学研究导向特定的领域。但是，主张社会指导和指引科学研究，和主张自然要通过社会范畴来解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从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出发。它首先假定自然规律本身是不能被接近的，而必然总是反映认识的社会范畴。换句话说，自然本身是一个社会范畴，或者说，自然仅仅就社会向它提出的问题作出反应。但是，恩格斯从来没有停止把外部的东西当作真理的标准，并且从不怀疑人类可以尽最大的可能，按自然本身的面貌来把握自然。

正如恩格斯承认历史对科学的影响，他也承认科学需要哲学。他反对归纳的经验主义，即那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从事实走

向假说都是可能的主张。他激烈批评惠威尔 (William Whewell) 的著作《归纳科学史》 (*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指出“归纳法的全部混乱是英国人惠威尔造成的。”^[87] 在这个范围内，恩格斯打破了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传统。事实不会自动地把它自己组合成假说。某种组织原则必须运用于各个部分。哲学的作用就是决定哪种假说运用于特殊的经验事实。恩格斯确实坚持一种感觉主义的心理學。但他不是坚持培根的经验主义，他并不想把哲学消解为经验主义。^[88]

恩格斯的科学哲学应当划分为作为方法和作为目的这样两个层次。作为方法，科学研究开始于经验材料的整理。在这个层次上，恩格斯肯定存在先于思维。但恩格斯不相信事实会为自己说话；事实必须被组织成一种假说，这种假说必须从实用的角度受到检验，而这个组织的过程必须由哲学来实现。在方法的层次上，恩格斯意识到哲学履行一种解释的作用。为了证明哲学的重要，恩格斯指出笛卡尔对能量守恒定律的思辨的发现。笛卡尔依靠他的原子论，没有任何经验的证据，提出了宇宙中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因为它既不能被毁灭，也不能被创造。笛卡尔在 17 世纪的思辨的洞察，在 200 年后的 19 世纪通过赫尔姆霍兹的工作，由科学材料得到了证实。恩格斯不得不维护哲学对科学的重要性，因为他想抬高辩证哲学的效力。恩格斯也知道，19 世纪的科学并没有无可争辩地确定，自然的规律本身是辩证的。但恩格斯想采取与笛卡尔相同的态度。他想作出一种哲学推测，即自然的规律是辩证的，他所依据的假定是，正如科学已经证明笛卡尔正确，所以未来科学也将证明马克思（或者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正确。

因此，归根结底，恩格斯相信哲学会被科学吸收，正如孔德所相信的科学的同样胜利。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写道：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89]

在这段引文中，恩格斯断言诸如宗教或唯心主义之类的“坏的哲学”，会被科学的前进所否定。“坏的哲学”会被科学超越，它将发现自己“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坏的哲学”的消失，将留下唯一正确的哲学——辩证哲学。但是，辩证哲学本身只不过是自然规律自身的反映。于是，在恩格斯看来，一切哲学都将归属科学的名下，因为它们或者将被科学证明是谬误而遭抛弃，或者被证明是科学规律的反映而作为一门科学保留下来。

然而，要把恩格斯划归为实证主义者，就必须区分两种形式的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所谓逻辑实证主义，我是指一种与语言分析密切联系的对真理主张的性质的哲学研究。逻辑实证主义主要地不是关心自然规律的发现，而是主要注重弄清什么样的关于真理的陈述是实证的，即与经验材料相符合的。恩格斯与逻辑实证主义没有联系，因为他不把他的思想精力倾注于对语言真理主张的研究上。

恩格斯关于自然规律能够认识，自然规律是实证知识，以及用高低层次组织统一自然科学多样性的信念，都是可以从科学实证主义引申出来的。然而孔德与恩格斯相区别的一个关键点，是在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孔德公开放弃一切形而上学，把认识限制于自然规律的范围。与孔德相反，恩格斯则以坚持辩证法原则

而抬高形而上学的领域。当恩格斯使黑格爾的三条辩证法规律成为宇宙的本质时，他就跨入了形而上学的领域，这是孔德拒绝采取的一步。

恩格斯关于自然的哲学最后成了一种自然哲学。马克思没有阐述一种关于自然的哲学，而恩格斯则像笛卡尔那样，从一种关于自然的哲学引向了一种形而上学。事情并非不得不如此。纵然马克思自己并没有发展一种关于自然的哲学，也没有必要使一种关于自然的哲学成为自然哲学。只是因为恩格斯在笛卡尔的微粒意义上把唯物主义定义为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这才必然导致他使自己关于自然的哲学与自然哲学同义。

此外，恩格斯的科学哲学在极大程度上继承了古典经验主义的传统。虽然恩格斯承认存在先于思维，但他没有意识到概念先于实存。当然，恩格斯一再肯定人通过他的劳动改变世界。但他是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肯定这一点的。他的意思是，一旦人获得了与自在的自然规律相一致的图象时，他就能利用这些规律去控制自然。但他的主张是实用主义，而不是实践。这种主张没有说明概念的构成力量。它不承认概念或社会先验能够干预和变更实存。实践认为概念按其自身的内在本性是生产性的。实用主义则认为客观的、外部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控制自然的方式是通过认识自然借以发生作用的规律。实用主义把外在的规律应用于外部世界；而实践则包含概念对外部世界的渗透。

由于恩格斯没有把握概念对于实存的优先性，他也就不承认转化的力量对于非转化的东西的首要性。恩格斯关心控制而不关心渗透。他对非转化的东西的态度是浮士德式（Faustian）的，即拼命想去操纵它。但是，从控制和支配的角度去对待自然，乃是设定非转化的东西的首要性。这正是实践的哲学所否认的。马克思主义肯定转化的活动对非转化的东西的生产性作用。

在说明自然的和历史的事件时，恩格斯按照因果链条来思

考。在说明自然和历史事件时，恩格斯所应用的解释模式是机械论的必然性公式。由于历史反映自然，由于自然是按照必然论的规律运转的，所以历史也是按照同样有限的必然论（机械论的）规律运转的。相反地，黑格尔在力学—化学的领域和逻辑—有机—历史的领域之间作了很大的区别。因果链条（机械论的）在力学—化学的领域起作用。但是，在逻辑—有机—历史的领域，因果链条的解释是不适用的。因为逻辑—有机—历史乃是主观辩证法的领域，它的解释方式也必须是辩证的。辩证的解释涉及结构关系（客观逻辑）和占用的一对象化的活动（主观逻辑），而不涉及成双事件之间决定论的变动不羁的联系。

恩格斯用来说明自然的解释方式，与他用来分析历史运动的解释方式是相同的。在恩格斯看来，思维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反映自然的规律；自然的规律成为所有其他各类解释的模式。由于自然的规律是辩证的，所以思维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辩证的。

恩格斯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和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相同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发现社会的必然论的（机械论的）规律。按照笛卡尔的因果性型式，这些规律是依次连续地导向一种可预言的结果。而且，正如自然的辩证法是可量化的和内在的，自然的规律也必然反映物质的社会力量。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中第一位的原因是技术的因素。事实上，可以把恩格斯对历史运动的认识描述为技术决定论。最后，由于自然规律是辩证的和普遍的，所以历史的规律也是普遍的：同样的规律适用于地球上的每个社会，从而带来了进化的统一序列和时间型式。

此外，恩格斯已经主张存在着三个主要的自然辩证法规律：量的首要性和矛盾与否定的规律。这三大规律也必定在历史中起作用。历史的进化必定是可量化的（技术上的）、以及矛盾的、否定的。历史必然清楚地展示与自然同类的动态、流和可变性。

因此，历史中的一切事物必然变化。资本主义必定被内在的矛盾毁灭。资本主义必然被一种新的社会所否定和代替。恩格斯关于辩证法意味着动力学（运动）的见解，使得他也把历史看作一种赫拉克利特式的流，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消亡。

正如恩格斯定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历史的研究引进了一种不可避免性的论调。由于社会的各阶段必然按动力学的方式变化，由于它们的变化必然发生在连续的阶段中，于是由于生产工具的技术上的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恩格斯关于依次性阶段的学说不仅仅适用于欧洲。自然的辩证法是普遍的，社会进化的辩证规律也是如此。恩格斯的历史观最后以一种普遍的决定论结束。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古典世界到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每个社会必然经过的前后相继的历史时代。有一条普遍的社会进化道路，每个社会都必然遵守这条规律。^[90]

注 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401页。

我已经提到 Gustav Mayer 的重要的恩格斯传。August Cornu 已经提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卷本包含某些有关恩格斯的好材料。另外，有几本别的研究恩格斯生活的著作，但并不都是优秀的学术研究典范。一部包括恩格斯生活的全部事实的传记，却毫无解释或分析，那是：W·O·Henderson, 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Cass, 1976)。由 Yvonne Kapp 撰写的优秀的两卷本，虽然主要是讲埃利诺·马克思 (Eleanor Marx) 的生活，却提供了有关恩格斯的启发性见解。见 Yvonne Kapp, Eleanor Marx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2)，另一部著作主要记述青年恩格斯第一次在曼彻斯特居住时的情况，是 Steven Marcus, Engels Manchester and the Working 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2][3][4][5][6][7][8][9][10][11][12][1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598、593、595、593、556、650、574页。

[14]G. W. F.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trans. A. V. Miller (London: Allen & Unwin, 1969), P. 545. 比较一下恩格斯所摘录的引文与米勒所译的相同段落，是很有意思的。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引证，见《自然辩证法》第358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562页）。

[1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3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595页。《自然辩证法》包括一个列举恩格斯所使用的黑格尔著作德文版的文献目录。

[1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卷，第586、587页。

[1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关于恩格斯与沃格特(Vogt)、摩莱肖特(Moleschott)、毕希纳(Buchner)的关系的争论，见 Frederick Gregory, *Scientific Mat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Boston: Riedel, 1977)。

[18][19][20][2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584、585、362、364—365页。

[22]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23页。

[2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24页。费尔巴哈本人已经或为认真研究的主题。关于他的最好著作也许是 Marx Wartofsky, *Feuerb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24—225页。

[25]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62页。

[26][2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620—622、386页。

[28]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17页。

[29]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214页。

[30]Friedrich Lange, 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 trans. Ernest C. Thomas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

[31]John William Draper, A 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London: Ball & Daley, 1854)。

[32]John Theodore Merz, A History of European Scientific Thought in the 19th Century (London: Blackwood, 1904-12)。

[3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39页。关于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的有趣讨论可在以下著作中找到: E. C. Burt,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and Paul, 1932);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Gerd Buchdahl, 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Oxford: Blackwell, 1969); E. J. Dijksterhuis, 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 trans. C. Dikshoorn (Oxford: Oup, 1961); Mary B. Hesse, Forces and Fields: The Concept of Action at a Distance (London: Nelson, 1961); Max Jammer, Concepts of Ma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A.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Na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5); Ernan McMullin, The Concept of Matter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3); A. M.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本章,事实上整个这本书,我都是批评恩格斯的。不妨借此机会指出一篇维护恩格斯和他的唯物主义形式的文章,这就是 Donald D. Weiss, "The philosophy of Engels vindicated", Monthly Review (January, 1977), pp. 15 - 29。

[34]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Vol. (Aalen: Scientia Verlag, 1964), P. 375。

[35]Hume,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p. 378 - 9。除了在我的整个这本书中提到的其他著作之外,我还发现以下两本有用的书,特别是它们在区分现代物理学哲学和18世纪物理学哲学之间的某些基本差别方面是很重要的: 见 Gerd Buchdahl, "Semantic Sources of the Concept of law", in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III, eds Robert S. Cohen and Marx W. Wartofsky (Dordrecht - Holland: Reidel, 1967), PP. 272 - 91; Peter Mittelstaedt, Philosophy Problems of Modern Physics (Dordrecht, Holland: Reidel, 1976).

[36]G. W. F. Hegel,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Introduction', Vol I, PP. 20 - 1.

[37]G. W. F.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trans. J. B. Bailli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PP. 86 - 96.

[38]Hegel,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troduction', PP. 27 - 8. 又见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J. S. Cree (New York: Dover, 1956).

[39]Hegel, Phenomenology of Mind, P. 95.

[40]G. W. F. Hegel,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trans William Wallace (Oxford: Oup, 1975) Vol. 1, P. 296.

[41]Hegel, Science of Logic, PP. 710 - 42.

[42]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OUP, 1970), P. 28. 黑格尔论自然的著作没有引起学术方面的集中注意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自然哲学中的许多科学是过时了,而且耕耘有时代错误的科学是得不偿失的。此外,黑格尔仍然有活力的部分,是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他的认识论和政治理论中,黑格尔的许多学生都被吸引到他的这些领域里。因此,对黑格尔的科学哲学的研究就很少了。但是,我受益于在这个问题的一切基本方面持一致意见的两本书: Ernst Bloch, Subject - Object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2); David Lamb, Hegel - From Foundation to Syste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0).

[43]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713.

[44]Hegel, Philosophy of Nature, P. 85.

[45]Hegel, Philosophy of Nature, P. 273.

[46]Hegel, Philosophy of Nature, P. 275.

[47]Hegel, Philosophy of Nature, PP. 3 - 4.

[4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20 卷,第 568 页。

[49]孔德(Auguste Comte)著作的一部好的选集是, Gertrud Lenzer, 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伦泽的选本突出了孔德

对一种社会物理学的探究。她在选集的导言中对孔德的实证主义形式给了一个完好的定义。

[50]Hegel, 'Introduction', Phenomenology of Mind, PP. 88 - 96.

[51] Karl Marx 'Toward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troduction,' in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s Lloyd D. Easton and Kurt H. Guddat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P. 264.

[5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148—151页。

[53]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113.

[54]Charles Taylor, Hegel (Cambridge: Cup, 1975), P. 110.

[55]Taylor, Hegel, PP. 297 - 300.

[56]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132页。

[5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410—413页。

[58]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424.

[59]Hegel, Science of Logic, PP. 414 - 18.

[60]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412.

[61]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412.

[62]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99.

[63][6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401、402—404页。

[65]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354.

[66]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355.

[67]Hegel, Philosophy of Nature, P. 34.

[68]Hegel,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Vol I, P. 1217.

[69]Hegel, Science of Logic, PP. 778 - 80.

[70]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781.

[71]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783.

[72]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622.

[73]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601.

[74]Norwood R. Hanson, Patterns of Discovery (Cambridge, Cup. 1961), P. 90.

[75]Hansen, Patterns of Discovery, P. 90.

[76]Hanson, Patterns of Discovery, P. 54.

[77]Stephen Toulm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 P. 97.

[78]Toulm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P. 92.

[79]Toulm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P. 96.

[8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561页。

[81]乔治·L·克兰(George L. Kline)于1980年12月29日在波士顿(Boston)召开的美国哲学协会东方部的会议上提交的一篇卓越的文章,很好地讨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捍卫“唯物主义”的不同方式。文章题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神话”,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幸运地见到了发言的副本。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论文是否已经出版。

[82]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卷,第422页。

[83]Kline, 'The Myth of Marx's Materialism'.

[8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28页。

[85][86][87][8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523、570、550页。

[8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552页。在实证主义的问题上,见孔德的以下著作:A General View of Positivism, trans. J. H. Bridges (New York: Speller, 1975); A Positive Philosophy, trans. C. Blanchard (New York: AMS Press, 1974)。

[90]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由此引出了两个阵营。有些人主张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有重大区别。我属于这个阵营,我把它叫做“分歧阵营”。第二个阵营由那些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本质上完全一致的人组成,我叫他们为“完全一致阵营”。除了那些我在正文中已经列入主张马克思与恩格斯有重大区别的人之外,“分歧阵营”

还由以下的人组成: Terrell Carver, Engels (Oxford: OUP, 1981)。该书只打算概略描述恩格斯的生活。但卡弗(Carver)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总是发表同样的意见。Lucio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trans. John Merrington and Judith Whi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Iring Fetscher, Marx and Marxism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72);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rans. P. S. Fall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这是大部头的三卷本著作。克拉科夫斯基对恩格斯的评论出现在第一卷里。David McLellan, Friedrich Engels. (Hammondsworth: Penguin, 1977)。这本书类似 Carver 的著作,作者 McLellan 虽然只是介绍恩格斯的生平,但同时又恰当地把恩格斯跟实证主义和决定论联系起来。Maximilien Rubel, 'Friedrich Engels—Marxism's founding father: nine premises to a theme', in Varieties of Marxism, ed. Schlomo Avineri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PP. 43 - 52。该篇文章只是 Rubel 关于这个题目的多篇论文之一。Rubel 的论著一贯是很出色的。J. P.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trans. Alan Sheridan - Smith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在 Sartre 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经常出现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区别的课题。Teodor Shanin, 'Marx,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History Workshop (Autumn, 1981), PP. 108—28。这虽是篇短论,但 Shanin 触及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观怎样也不一致这一重大问题。“完全一致阵营”由像 Gustav Mayer 和 Auguste Cornu 这样的人组成。美国学术界大多属于“完全一致阵营”。另外,请参看 Robert S. Cohen, 'Friedrich Engels', Supplement I in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 Sons, 1978) PP. 131 - 47。Cohen 的文章包含关于恩格斯的自然哲学有价值的见解。一位有洞察力的英国学者写过两篇论恩格斯的文章,这就是 Gareth Stedman Jones, 'Engels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New Left View (March - June, 1973), No. 79, PP. 17 - 36 和 'The Originality of Engels', New Left View (November - December, 1977), NO. 106, PP. 79 - 104。虽然我不同意 Stedman - Jones 的阐释,但他对恩格斯的谨慎态度是值得我学习的。

第三章

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基础

在开头两章“辩证法内部对话”和“辩证法的毁坏”中，我集中讨论了本书的两个主要论题：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区别，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全然不同的解释何以成为他们两个分歧的原因之一。^[1]前一章“辩证法的毁坏”分析了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某些方面的理解，这一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完全错误地套用了黑格尔，并因而造成了毁掉辩证法的内核的结果。

本章我将更详尽地研究业已提出的两个主要论题，涉及至今尚未接触的领域。我将详述使马克思不同于恩格斯的某些区别，^[2]并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迥异的套用黑格尔的方式方法。^[3]我将不仅继续依据前面考察过的论题，还要在本章提供一个马克思的方法的概要。由于我将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区别加以描述，所以也就是要通过证明马克思所独特的东西，勾画出既无恩格斯又无黑格尔作中介的马克思的方法。

本章乃是前后联系的桥梁。一方面，它是第一、二两章对马克思的方法的全部讨论的明朗化和精炼化。另一方面，它开辟了新的视野，为追寻马克思的方法在列宁和毛泽东那里的命运作铺垫。本书五、六两章在分离出马克思的辩证法的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探讨辩证法在俄国和中国的命运。

更具体地说，本章引出下一章“走向《资本论》的重建”，

即对恩格斯怎样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的研究。在详细讲清楚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不同的之后，“走向《资本论》的重建”展示的是这些冲突在《资本论》第二卷文本中的表现。明确了与独特的恩格斯相反的独特的马克思的情况之后，就有可能说清楚恩格斯塞进《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的修改和重点。

不应该因为我倾向于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连续性，而认为我无视造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分离的重大区别。随着本章论述的深入，在马克思看来的黑格尔与在恩格斯看来的黑格尔之间的区别将充分展开。此外，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区别也会界线分明。在说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区别时我要证实两点：一是马克思套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哪些部分；二是马克思怎样把黑格尔的唯灵论的辩证法转换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是一种关于转换的研究：起初根植于一种土壤的概念移植到另一土壤时是怎样被改变的。

概要地说，我的论证的基本前提是：黑格尔为马克思提供了他解释社会的方法所需的逻辑工具。本章不去讨论马克思接触黑格尔的历史，而将表明马克思需要黑格尔特有的范畴充当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基础。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在论及黑格尔的《逻辑学》时，把它描述为“一种活动的逻辑，它解释结构如何形成，而它自身又不是形式的、客观的、或类几何学的。”^[4]马克思在他开始在大英博物馆认真研究经济学几年后的1858年，便已得出了他对比较经济形态学的基本见解。^[5]每个社会都是一种结构，与生产资料相联系的方式是它的重力中心，这种普遍的联系反过来制约着总体结构中的每个特殊单元。当马克思达到这一见解，当他能够用他自己对比较经济结构的考察获得的证据证实这一见解时，他需要一种能够借以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逻辑。由于这种需要，他转向了黑格尔的逻辑，因为它作为一种“活动的逻辑”，解释“结构如何形成，而它自身又

不是形式的、客观的、或类几何学的。”马克思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发现了自己所寻找的东西，这是不奇怪的，因为黑格尔在该书中阐明了他所构想的世界的逻辑结构。黑格尔从未写过一部形而上学，《逻辑学》就相当于他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从未论述过本体论，但他从事了完全类似的工作；他论述的是作为实存的框架的逻辑的诸决定因素。^[6]

黑格尔的全部著作讲的是一个问题，即描述精神达到自我认识。这些著作都是从直接性的东西开始，上升到自我规定或自由。《精神现象学》从感性确定性或直接性开始，以哲学理念或知道自己的自由的意识结束。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自然哲学》从纯粹的机械性或物质的外在性开始，上升到有机生命阶段，在此阶段，意识理解到自己是自我规定的。《逻辑学》的全盘计划遵循着相似的形式。它也是从直接性、从存在开始，以概念和实在在自由中的结合的理念告终。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描述的是概念的生成。正如在《自然哲学》中精神是预先存在的，因此在《逻辑学》中概念——精神的另一称谓也是预先存在的。^[7]

大量材料证明，黑格尔思想的基础是宗教和新柏拉图主义。^[8]黑格尔的精神——外在化——自我意识的三段论运动十分类似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或新柏拉图主义的从一个本质溢出万物的思想。鉴于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概述概念的目的性，即概念在其自由得以自我实现之前必然采取的形式，所以我们在此只提及黑格尔思想的宗教基础就够了。黑格尔把《逻辑学》中的“存在”、“本质”、“概念”的三段式划分称为“概念的判断”。^[8]《逻辑学》设定概念（神）为先验之物，并遵循概念到主观性和自由（圣灵）的自然发生过程；这一自我实现过程必然经过中介阶段，即经过介于直接性和自我意识之间的概念的形式（基督）。

在着手分析黑格尔的逻辑之前，先附带说明一些术语是恰当的。我将用“辩证法的范畴”一语指概念在其自我实现过程中所采取的划分，如“存在”、“本质”和“概念”。“辩证法的形式”则指本质—现象、形式—内容、全体—部分、普遍—特殊这四对东西。之所以把它们称为“辩证法的形式”，是因为它们出现在“辩证法的范畴”内部，涉及矛盾、否定、规定和中介的活动。而“辩证法的原则”则既非“范畴”也非“形式”，而是活动和运动的“原则”。它们是黑格尔逻辑的全盘计划的内在动力，即“范畴”和“形式”两者内部的运动源泉。

就马克思对“范畴”、“形式”、“原则”等某些辩证法的逻辑要素的使用与黑格尔对同样一些逻辑要素的使用，我将进行比较，并找出它们在马克思的历史逻辑中与在黑格尔的逻辑方法论中所起作用的异同之处。根据这样一条思路，我们分析的重点将是四对“辩证法的形式”，即“本质—现象”、“形式—内容”、“全体—部分”、“普遍—特殊”。本章的主题是：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这些“辩证法的形式”融合于他的历史解释方法之中。

在《逻辑学》中，甚至概念的自我实现过程都必须在三段论的形式内展开。这种三段式发展的最终结果必定是已经自我意识到自身的自由的概念。在三段式发展之初也有概念，但它还不知道自身的自由，而为了成为有意识的，概念必须首先把自己对象化为不确定的中介，或“存在论”。不确定的存在构成三段论的普遍性的一极；不确定的存在尚未将自己特殊化，因而仍然是无差别的。《逻辑学》中的“本质论”代表三段论之特殊性的一极。作为存在的否定和生成，“本质论”描述的概念采取特殊性的形式。为了认识自己是自由的，概念必须在确定的形式中意识到自己：本质是概念表现为一种特殊性的过程。于是，存在和本质便是两个“辩证法的范畴”，它们建立了现象的逻辑结构。具体地说，“存在”这个辩证法范畴由质、量、度构成，阐述了无差别

的直接性的客观逻辑结构。此外，“本质”这个辩证法范畴由本质、现象、现实构成，阐述了现象或特殊性的东西的客观逻辑结构。读到“本质论”的末尾，便弄清了使实在表现其应有状况的逻辑基础。但对于作为自我意识的概念的客观逻辑结构，读者尚不了解。这一答案在《逻辑学》的第三部分中。在“概念论”（‘Book of Notion’）中，概念实现了自身的自由，并进而重新占用实在，通过理念（概念与实在的结合）征服实在。概念的发展代表三段论的第三极，即把普遍性和特殊性融合为独特的个体性。概念是第三个“辩证法的范畴”。

概念的范畴是在“本质论”中出现的。很显然，既然概念是逻辑学的整个三段论运动的结果，它也就有其根源于存在范畴中。但从接近原则来看，作为概念的基础的还是本质范畴。本质范畴构成了特殊性的逻辑前提，而且每一特殊性都有一种自在性。对象之自在性，即其潜在性，也就是它的必然性；对象的自在性的东西就是它的必然的发展。在黑格尔看来，必然性的东西即按照一种内在潜能的发展，或实体。此外，思想必须遵守跟存在和本质同样的客观原则。^[10]

因此，“本质论”在《逻辑学》中处于关键的地位，因为它是直接性和自由的中介。“本质论”否定了存在，同时发现自己被概念超越。它同时既是实在得以出现的基础，又是概念的自由的前提。^[11]为了充分理解“本质论”在《逻辑学》中的作用，最好就它提出两个问题：（1）它的“目的”是什么？（2）它用以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是什么？“本质论”有两个目的：（1）为概念提供认知对象；（2）说明概念的发生。

由于概念的作用是从事认知活动，所以就必须使认知对象预先存在，而“本质”便提供这些认知对象。“本质”通过否定不确定的直接性或存在，并创造一个可辨别的特殊事物的世界，来做到这一点。此外，本质是概念的生成的中介，因为在其后来阶

段本质发展成为实体。本质创造对象的可感知结构，而事物的一个特征便是展开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即对象所蕴含的东西，也就是它的“固有的必然性”。^[12]一旦创造出了实体，作为对自身有了自我意识的概念便有了它的起源。本质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是诱使特殊性进入必然联系之网。

把握“本质论”的“线索”就在于认识到，在它的结尾出现了“一个连贯的现实世界”。^[13]《精神现象学》的第三章“力和现象”相当于《逻辑学》的“本质论”。^[14]在“力和现象”中，知性达到了对现实的、可感知的世界的把握。而在“本质论”中黑格尔又说明了这个现实的、可感知的世界的逻辑前提。我对“本质论”的讨论，将集中于“辩证法的范畴”、“辩证法的形式”和“辩证法的原则”。我将证明，“范畴”、“形式”和“原则”的相互联系怎样产生了一个连贯的外部世界，即一个处于自身“必然的相互联系”中的对象世界。^[15]实体只能出现在对象的相互关系产生出“必然的相互联系”之后，然后概念再从实体中演化出来。

在我开始分析第一部分“作为反思自身的本质”时，最好请记住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达到这第一部分三段论的结论。我们将以“事物”得以出现的全部逻辑前提全都具备来作结束。在这一点上，“作为反思自身的本质”与《自然哲学》中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讨论有相似之处。物质没有（此处原文显然有误——译者注）空间和时间的先决条件不能存在。^[16]“本质论”的第二部分叫做“现象”，在这一部分中“事物”显现自身，但是，使“事物”可能的逻辑形式必须首先具备。

第一部分“作为反思自身的本质”的三段论开始的第一章是“虚假的存在”（普遍性的一极），进到第二章“本质性或反思的规定”（特殊性的·一极），结束于第三章“根据”（由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形成的新的个体性）。在第二章“本质性或反思的规

定”中，黑格尔引入了他的矛盾思想，我把它认作一个“辩证法的原则”。黑格尔之所以引进矛盾的思想，是因为他试图为“事物”得以显现建立逻辑基础。第二章内部的三段论结构形式以矛盾的新的个体性结束。矛盾的三段论由同一性开始，因为为了“事物”的存在，必须首先有同一性的概念。这三段论的第二极是差别，它本身又被表述为三段论内的一个三段论。为了“事物”的存在还必须有差别。差别中的小三段论有三个要素，即差别、杂多（多样性）和对立。差别以对立结束，因为对立是差别和杂多的统一；或者说对立是一种假定，即为了说出一个事物自在是什么，必须说出它不是什么。但是，对立也是向矛盾的过渡。差别的小三段论结束后便跟同一的大三段论融合了。矛盾是对立的实现，因为矛盾假定了事物的显现能力依赖于同一和对立的逻辑框架。矛盾不是物自身的一种性质，勿宁说它是使“事物”可能的一种认识论形式。

在进而讨论黑格尔的“根据”理论之前，在此有必要评论一下他的“反思”思想。黑格尔对“反思”的论述出现在“本质论”的第一章“虚假的存在”中。我没有把“反思”的理论包括在辩证法的“范畴”、“形式”或“原则”中。但是，“反思”本身却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本质论”的整个计划中，从无差别的直接性到第三部分“现实”和必然性与实体的王国，它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黑格尔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一是指自己知道，二是指否定的折回、种种排斥方式。在《精神现象学》中他是在自己知道的意义上使用“反思”，而在《逻辑学》中，他用以指的是自我规定的方式。下面分别讨论这些用法。

《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区别是，前者讨论意识的活动和产物，后者讨论概念在其向自由的演进中必然采取的逻辑形式。两个过程即意识的过程和概念的过程的结局都是自我意识或

自我规定。在《精神现象学》中，意识对象化自身，并且或者与独立于精神的王国互相渗透产生出蒸汽机和太空卫星之类客体，或者与依附于精神的王国互相渗透产生出观念的文化系统，诸如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意识对象化自身的时候，它便意识到了它自己的力量。在它产生了独立于精神或依附于精神的对象之后，意识能够观察该对象，从而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意识研究它自己的产物的这一过程称为“反思”，或意识的反映力量。

但在《逻辑学》中，“反思”是一种规定的机制。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在一种斯宾诺莎的意义上使用“否定”一词：否定就是规定。为了把一个对象规定为一个个别“事物”，它就必须从自身中否定、排斥掉不是它自身的东西。否定作为一个“辩证法的原则”，指的是建立质的过程或个体化过程。“反思”涉及否定表现为排斥时的否定方式。在“本质论”的“虚假的存在”一章，黑格尔提出了三种“反思”形式或三方面的否定。“设定的反思”涉及自身否定性；一个“事物”“设定”自身的存在的可能性总是有的。“外在的反思”指一“事物”与复多事物的环境的关系；通过对他物的否定建立起质，这种否定因为是靠一种“外在”的他物被反思的，所以它设定了规定。“规定的反思”是规定的直接性；对象将进入到“无”，在此之前必须否定“无”以容许质的东西出现，因此可以把直接的规定性看作是依靠“无”反思的，或排斥“无”的。

“本质论”的第一部分“作为反思自身的本质”的目的，是为个体事物的出现建立逻辑前提。在《逻辑学》中，“反思”是一件帮助特殊性的东西出现的逻辑工具。在个体性能够建立之前必须具备三种关系：必须联系它自己的忽悠即逝来看待一个“事物”；必须联系它自身来看待一个事物；必须联系“无”来看待一个事物。

现在我们再回到否定和矛盾问题。黑格尔设定了这两个“辩证法的原则”之后，便可以进一步达到三段式的结论了，即“根据”那一章。“根据”一章使我们深入到“本质论”的核心，因为我们把特殊性抛在了后面，开始讨论自身存在的东西。“根据”使我们离开了阐明“事物状态”所必需的逻辑范畴，达到了那些作为“事物”的基质或内在性的逻辑范畴。^[17]

但是，为了充分理解黑格尔对“根据”的讨论，必须首先明确在“本质论”的这个地方具有更大意义的另外两个“辩证法的原则”，即中介和规定。中介作为一个“辩证法的原则”指的是直接性的否定。中介意味着一个对象并非单纯地以完全孤立于它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形式显现出来。而跟一个他物的关系又可以 from 两种意义上来看待：一是在无生命的结构的意义上，二是在意识主体的意义上。某物如果是其他对象的网络中的一部分，它便是有中介的：它作为这个网络或过程的一个成员而获得它的意义。此外，某物如果被意识加以利用，它也是有中介的。如果一个对象是意识主体的更大目的中的一种手段，它便是有中介的，它使得意义加诸于它身上了。

规定作为一个“辩证法的原则”也出现在两种意义下：一是作为某种具有独特的同一性的东西，二是作为引起某种结果（黑格尔的意义上）的力量。如果某物具有一种同一性，那它便是确定的，或有一种特定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确定性和特殊性是同义词。在“存在论”中，有可能谈到非确定性的存在，而在“本质论”中则有必要谈到确定性的存在，或某种已经经过了分化过程和个体化过程的东西。此外，如果某物使得其他东西经过这样的个体化过程，那么它就是起规定作用的。在黑格尔看来，规定就是分化过程，就是使一个对象成为一个被区分出来的东西的力量。

介绍了上面四个“辩证法的原则”，现在就可以来看看黑格

尔是怎样界说我们将要讨论的第一对“辩证法的形式”即“形式——内容”的辩证方式。但首先必须探讨一下第三章“根据”的三段论结构。这个三段论普遍性的一极被表述为“绝对的根据”，或者未采取确定的形式的根据。这个三段论的特殊性的一极是“确定的根据”，或已经被个体化了的根据。这个三段论的解决是“条件”或“事实”的基础。“质料”、“真实性”由“条件”而成为可能，而且这是向实存或“事物”的过渡点。向“根据”一章的整个冲刺的目标是个体化。

“根据”一章结束了第一部分“作为反思自身的本质”的三段论，建立了确定性的前提条件。进一步划分为同一、差别、杂多和对立诸要素的矛盾所确定的是，同一和否定（肯定性和否定性）将容许一个区分了的对象显现出来。但是，除了确定性还需要点东西，因为还必须有确定性的“理由”或“原因”，这就是“根据”。在黑格尔看来，“根据本身是本质的反思的规定之一”。^[18]在“根据”的三段论划分中，黑格尔在其中的普遍性的一极介绍了“形式—内容”这对“辩证法的形式”。他在“绝对的根据”或尚缺乏具体的规定的根据中讨论“形式—内容”，但“绝对的根据”又细分为一个小三段论，即“形式—本质”、“形式—质料”、“形式—内容”。最后的“形式—内容”是向“确定的根据”的过渡。“确定的根据”是呈现更大特殊性的根据，所以它能成为条件，成为质料的基础。

黑格尔对形式作了如下的界说：“属于形式的一般是一切确定的东西；就其为某种设定的东西并因而与它是其形式的那个东西相区别来说，它是一种形式规定。”^[19]在黑格尔看来，形式是准备接收质料的根据。在形式的三段论中，“形式与本质”构成普遍性的一极。在“形式与本质”二者中，作为起限定作用的形式面临着本质，或“单纯的基质”。^[20]换句话说，在“形式与本质”中，确定性的东西（形式）面临着非确定性的东西。^[21]在特

殊性的一极，“形式—质料”二者是朝着更大的形式特征运动的环节。质料把同一性带给形式，但在“形式—质料”中存在着矛盾。在起限定作用的形式和被限定的质料之间尚无统一性和单一性。对于这种关系黑格尔界说道：“作为漠不相关地确定的东西的质料，是与作为能动的方面的形式相对比的被动的方面。”^[22]“形式—内容”二者使形式的三段论达到综合：否定性被取消了，“形式与质料”成为一个东西。”原先是自身同一的东西——开始是根据，然后是单纯的内在性，最后是质料——归属到了形式的支配之下，并再次成为它的一种规定。”^[23]但是，在“根据”的三段论中，作为一种“辩证法的形式”的“形式—内容”又为“确定的根据”开辟了道路。“形式与内容”发挥着统一者的作用，它克服了“形式—质料”的矛盾，而且从这种统一中才能出现“实在的根据”。从这种特殊的根据中出现了“条件”，于是我们便来到了“现象”的门口。找到了质料的基础，我们就要过渡到“物”了。“辩证法的原则”帮助了“物”的出现，因为它们曾是分化过程的必要因素。事实上，没有“形式—内容”这对“辩证法的形式”，概念向个体化的演进是不可能的，因为否则决定质料成为内容就会缺乏逻辑结构。

从多方面来看，第二部分“现象”乃是“本质论”的高潮。概念的自然发生过程的结局，即一个确定的对象世界，这时已达到了实存。“本质论”当然是按三段论编排的，而“现象”就是“本质”与“现实”的中介。没有现象的中介，作为必然性和实体的根据的现实就不可能。对象世界，以及这些对象所进入的相互关系，实现了“全体之系统的必然性”。^[24]

第二部分“现象”也产生了两个矛盾的世界：“现象的规律”和“自在的世界”。第二部分的第二章也称为“现象”，在那里黑格尔描述了“表象的世界以颠倒的形式”的生成。^[25]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这一同样的过程称为“颠倒的世界”的出

现。^[26]两个世界的概念是“现象”部分的产物（实现于“现象”一章），它结束了直接的、可感知的世界。这个直接的世界在规律的世界、“现象的规律”或“知性”的领域得到理解。“知性”的功能是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但是，“现象的规律”的世界的“颠倒的”表现是“自在的世界”或“本质的关系”的世界。^[27]这个“颠倒的世界”不是一个“事物”的世界，而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个对象直接地反映另一个对象。正是这个“颠倒的世界”是“内在必然性”之所在。

“现象”这一部分的三段论以“实存”一章开始。在“实存”中，“物”终于显现出来，但“实存”涉及的是自我封闭、自我包容的“物”。“实存”是直接性的、孤立的“事物”的王国，它有条件作基础。但在概念的演化过程中，“物”不可能保持孤立，因为概念本身就是必然性。“实存”的“物”必定被带入与一个他物的联系之中，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造成了向三段论的第二颠倒第二章“现象”的过渡。在“现象”中表现了一个“辩证法的原则”，因为“现象”否定了“实存”。现象的作用是实现关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就必须否定直接性。

现象是“事物”不同方式的相互联系。规律是相互联系的一种形式，而且在概念自然发生的这个阶段上，黑格尔是以休谟和康德的方式使用规律一语。^[28]在黑格尔看来，因果律在这现象的阶段起作用，事实上“规律的王国乃是对现象的稳固的控制”。^[29]直接性的“事物”、孤立的“事物”遭受着不稳固性；它们可能消逝或消解。需要为“事物”提供连续性或内在性，而规律正是担负这一作用。解释的世界也就是“知性”的世界，即还是个未达到自我意识的思维阶段。“知性”把世界想象为“规律的王国”，^[30]而且在《精神现象学》中，“知性”是自我意识或者说能够反思自身并认识到自己的必然性的思维之前的阶段。“知性”只能够把规律当作“恒常的会合”来把握，而不可能把必然

性当作自在的东西、内含的东西去把握。在《精神现象学》中唯有自我意识能够做到这一点，在《逻辑学》中则只有概念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现象”走向自身的消解，因为从实现了现象世界的内聚性的“规律的王国”之中，出现了一个“本质的关系”的“颠倒的世界”。在这个“颠倒的世界”中，事物不是以康德式或休谟式的次序彼此联系，而是按照相互反映的方式彼此联系着。“规律的王国”被否定，被代之以一个作为内容的结构、作为“把自身发展为整体的本质的关系”的世界。因此，反映在它自身内部的“现象”便不成为一个世界，即不是一个“把自身揭示为超越‘现象’界的自在自为的世界。”^[31]随着现象的最后消解，“规律的王国”被整体性所取代。随着现象的消解，前后相继的规律被必然性和因果关系所取代。

说到这里应该暂时停下来考虑一下在黑格尔那里规律与必然之间的区别。说到“规律的王国”时，黑格尔显然是指自然界和自然的规律。它们是牛顿、休谟和康德所说的那些规律，对这些规律加以探究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成对的事件总被发现为连带出现。没有这些规律便不可能说明现象世界。另一方面，必然性则涉及一种不同的因果关系。必然性不是企图把根本不相同的事件联结起来，而是关系到对象的潜在的东西。必然性涉及对象的内在本性方面的发展。必然性在无生命的自然界是不起作用的，因为这种物质性只有外在性。必然性起作用的地方是有生命的对象的有机的王国、结构的王国，因为在这些王国确实包含着必然演化的内在本质。当黑格尔引进两个世界的问题时，他把规律限制在“现象”的世界，并把必然性限制在“颠倒的世界”或“本质关系”的世界。

在此还有必要进一步评论一下“现象”一章中所引进的“颠倒的世界”这个问题。在“现象”中所提及的“颠倒的世界”不

能跟“本质——现象”这对辩证法的形式相混淆。关于这对形式我们在本章后部分再来讨论。“现象”一章中的“颠倒的世界”的出现，是因为黑格尔认识到，精神要想学会对自己的活动进行反思，就必须否定直接性的世界。在黑格尔看来，直接性是精神沉没于自然中。世界，在黑格尔看来，必须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因为正如存在有自然和规律的必要，同样也存在有中介和自我意识的必要。不仅必须存在一个“规律的王国”，而且必须存在一个跟自然、跟“自在的世界”相分离的世界，即必然性的世界。

“颠倒的世界”是“本质的关系”的领域，而且这种对象间的相互联系采取的是一种整体的形式。当各种各样的对象彼此互相关联的时候，对象间互相关联的第一种形式便是“全体与部分”的形式。黑格尔坚持说，在“颠倒的世界”中“事物”绝不会孤立地出现，而总是出现于一种背景中，即作为一个全体的部分。在整体的内部存在着互为中介的情况，因为部分以全体为中介，全体又以部分为中介。同时，整体以矛盾状态存在，因为全体与部分之间是有对立的，但整体因矛盾的力量尚未强大到足以破坏它的地步而保持着。

黑格尔没有把任何唯灵论的因素归于他的整体概念。整体并不包含一种把它自己弥散于部分的实体。毋宁说，整体仅仅是部分的聚集；部分的性质和各部分间相互联系的方式把整体的独特性分散于整体之中。黑格尔的整体概念——我名之为一种“辩证法的形式”还没有把自己外在化，还没有产生一个外部世界。在我现在讨论的“本质的关系”一章中，整体向外在化的运动是由“力”来完成的。在黑格尔的用法上，“力”意味着去规定的力量，而且在从物理的王国到“颠倒的世界”的王国的一切领域，凡是谈到规定，黑格尔都称之为力。在“本质的关系”一章的上下文中，黑格尔把力理解为“全体与部分”走向外部表现的冲刺。从我在这一点上的讨论来看，力的重要性仅仅因为它是“内

和外”的出现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整体必然显现，“本质的关系”必然成为可感知的。但是，在描述“内与外”的时候，黑格尔确实陷入了本质主义的提法。他写道：

内被规定为被反映的直接性的或本质的形式，与被规定为存在的形式的外相对立，但这两者只是一个同一。这个同一首先是两者作为具有充实内容的基质的实体的统一，或绝对的事实，其中这两个规定是漠不相关的、外在的环节。^[32]

这样，黑格尔就是把“内”说成是“本质”，“内”是“自在的”；而“外”就是“事实”或现象的东西，即潜在之物的实现。黑格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这里得到了强烈的表现，因为他采用了从潜能到现实的运动的说法。在此我要补充一句：我前而之所以没有把“内—外”包括在“辩证法的形式”中，就是因为它固有的本质先于存在的内涵。

为了充分理解“内与外”的问题，有必要严格地弄清它们在《逻辑学》整个结构中的地位。关于“内与外”的讨论构成了“现象”部分与“现实”部分之间的过渡。在关于“现实”这一部分，还是跟亚里士多德相类似，潜在的东西这时已经成了现实，但为了有一种现实，首先必须有一种潜在，而“内与外”建立的正是潜在的东西。在“现实”部分，黑格尔讨论了因果关系、必然性和实体。实体的先决条件是内含的、自在的东西的存在，而关于“内与外”一章阐明的正是这些先决条件。“现实”部分证明了潜在之物的产生。当“现象”实现了这一步时，也就达到了“现实”，或实体，以及自在的概念。

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一下关系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有两种关

系。首先，当部分的某种组合形成一个统一体时，有一种结构关系。其次，有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指的是一种实体或精神，其各个部分从它那里发散出来，由它派生出来。黑格尔所说的关系，这两种意义都有。在他讨论“全体与部分”时，他谈的是一种结构关系；在他讨论“内与外”时，则说的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关系，不过结构关系又是本质先于存在的关系的必然先行者。

结构关系与本质先于存在的关系之间的区分对于正确理解“现象—本质”的“辩证法形式”至关重要。既然我快要结束对“现象”部分的分析，就应该来考察一下“现象—本质”的意义了。根据上述两种关系，“现象—本质”的“辩证法形式”也可以以两种形态出现。首先是作为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本质指的是一种内在本性或实体，现象指的是该实体的现象表现。或者“本质—现象”呈现一种结构关系，其中本质被看作是部分的一种互相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本质被认作一种组织型式。虽然有一个整体，但它是跟各部分一起自我存在的；全体与部分之间互为中介。但部分不是从全体发散出来的，它们有一种在这个整体之外的独立实存，而且即使这个整体崩溃了，它们还会存在下去。马克思就是在这种结构主义（阿图塞）的意义上使用“本质——现象”这对“辩证法的形式”。^[33]

“本质论”的第三部分“现实”完成了概念从单纯的显现到“自在”状态的演进。“现实”部分结束了“本质论”，把我们带到了世界的真理，即不是可感知的世界，而是事物的内在本性。遵循亚里士多德的范式，在“规律的王国”之外还有一个王国，这就是“本质关系”的王国。必然性来自“本质的关系”，而且正是在这里实现了向概念的过渡。在黑格尔看来，概念是自在的因果关系；概念是自身规定的并因而自由的。“本质论”的三段式以自我规定的发现结束。

花点时间讨论一下关于“现实”的第三部分是值得的，虽然在这里黑格尔没有介绍任何后来马克思融入他的《资本论》的逻辑结构的“辩证法形式”。事实上，我将要讨论的最后一对“辩证法形式”即“普遍—特殊”，实际是出现在第二卷“概念论”之中。不过，对“现实”部分的考察将非常深刻地向我们表明黑格尔所说的必然性、实体和因果关系的意义。由于《逻辑学》的内在动力是概念的发生，所以在概念出现之前必须首先出现概念的先决条件。“现实”部分阐明了概念的先决条件，这就是必然性。但必然性本身的先决条件是“内与外”两个世界的存在。不过，“现实”中的“两个世界”^[34]问题不同于“现象”一章中的“颠倒的世界”。“颠倒的世界”涉及“规律的王国”与“本质关系”或整体的世界之间的分离，而“现实”中的“两个世界”的问题则仅仅涉及“本质关系”的领域，涉及结构的相干性与这种结构相干性的现象表现之间的联系。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世界是内在性的世界，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现实的东西乃是按照自身演化的自在性的东西。第三部分“现实”的三段论制定了概念从必然性到实体再到因果关系的发展。

“现实”部分的内部结构分为三章，即“绝对”、“现实”和“绝对关系”的三段论。“绝对”一章说得比较简单明了，它把“绝对”确立为“内与外的这种统一”。^[35]“现实”一章则表明黑格尔竭力要在可能性、相对必然性和绝对必然性之间作出有效的细微区分。这一章是对必然性的多重含义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与对必然性的辩证理解之间的区别所作的详尽考察。

对“绝对”的定义包含一种内在性或固有性。但是在“现实”的最初阶段，并不能保证固有的东西能够实际地变成现象的东西。或者说，为了具备必然性，首先必须存在必然性的矛盾。必然性的否定是偶然性或可能性。内在性在其运动之初把自己表现为可能性。起先，内在固有的东西是有可能不会按照它自己的

本性外在化自身的。

对偶然性的东西的部分否定是相对必然性。这种偶然性的矛盾出现在内在性演化成“现存环境的多样性”的时候，^[36]即可能性的范围已经缩小的时候。这种可能性的限制就是相对必然性。事实上，对可能性的进一步限制便产生绝对必然性，因为当内在性只能演化为对它自身为真的一种现象时，我们便进入了绝对必然性的王国。黑格尔用辩证法的术语把必然性描述为：“它是自在的东西，但是它的自在性是它的直接性，它的可能性是它的现实性。因此，一物之所以是一物，乃由于其自身；作为存在与自身的结合，它是本质；但因为这纯粹是同样直接的单纯性，所以它又是存在。”^[37]在区分“相对必然性”和“绝对必然性”时，黑格尔描述了自然界中的必然性与辩证法中的必然性之间的差别。自然界中的必然性，因其总是展开为“现存环境的多样性”，所以包含不止一种结果的可能性。而辩证法中的必然性，因其按照一种内在本性展开，所以只能有一种结果。

在第三章“绝对关系”中，“绝对必然性”的预先存在提供了实体得以出现的基础。“绝对关系”一章本身分成三段：“实体关系”、“因果关系”和“交互关系”。虽然“必然性”是实体的先决条件，但必然性与实体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必然性指的是按照内在性的发展，而实体则是指全体与偶然性的统一。^[38]但实体也是力量，而且作为力量，它又是因果关系。因此“绝对关系”一章便进入到它的第二部分“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本身又分为“形式的原因”、“确定的原因”、“作用和反作用”这样一个小三段式。在黑格尔讨论的“因果关系”的三种现象中，我们又有可能看到“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与“辩证法中的因果关系”之间的区别。无论是关于必然性还是关于原因的辩证法定义，都总是密切联系着来自内在本性的运动。

对因果关系的讨论为的是从被动的和外在的因果关系运动到

能动的和自我产生的因果关系。“形式的原因”和“确定的原因”这两部分所说的原因跟休谟、康德和恩格斯所说的原因是一样的。“形式的原因”中的原因在结果中消灭自身；结果被决定之后原先的原因便消失了。因此“形式的原因”中的原因是不存留的。“确定的原因”中的原因则无法与结果区分开来：它是外在的或物质性的，因而是被动的。^[39]

为了达到自我关系和自我产生的因果关系，有必要进入“作用和反作用”部分。原因反映在结果中，而结果也反映在原因中，^[40]因此这原因是存留的。它自在地保持着，无须借助外在的或物质性的东西。这种原因完全不同于“形式的原因”或“确定的原因”中的那种线性的因果关系，也完全不同于休谟、康德或恩格斯的那种因果链条。这种因果关系出自“现实”的世界或“内与外”的统—的世界。事实上，黑格尔从辩证法的意义上定义的因果关系跟事件前后相继的恒常出现毫不相干。在黑格尔看来，因果关系意味着可能性的条件的创造。“因果关系是一种预先假定的艺术。原因是有条件的……”。^[41]黑格尔把因果关系看作是由实体预先假定的，或者是造成事物得以出现的条件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原因既是受制约的又是制约性的东西。

对辩证法的形式“普遍—特殊”的探究把我们带入了《逻辑学》的第二卷。第三部分“现实”的结论结束了“本质论”。第二卷是“概念论”，在那里我们可望找到黑格尔对最后一对“辩证法的形式”“普遍—特殊”的讨论。但在深入讨论“概念论”之前不妨记住，“概念论”乃是《逻辑学》赖以构造的三段论的结论。“存在论”代表这个三段论的普遍性的一极，“本质论”代表它的特殊性的一极，“概念论”代表“存在”和“本质”的综合。此外，还应记住，“存在”、“本质”和“概念”都属于我前面所说的“辩证法的范畴”。

我所讨论过的大多数“辩证法的形式”，如“现象—本质”、

“全体—部分”、“形式—内容”等，都出现在“本质”这一“辩证法的范畴”中。“普遍—特殊”的“辩证法形式”则出现在“概念论”中，出现在一种内在论的上下文中。在黑格尔看来，概念是自我规定的，是自由的王国，我们必须根据这一背景来理解他所说的“普遍—特殊”。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那里，“全体—部分”、“形式—内容”和“普遍—特殊”的“辩证法形式”往往被当作同义词使用。而在黑格尔那里，这些“辩证法的形式”是出现在《逻辑学》的不同地方的有区别的程式，各有其依赖于它们所出现的上下文的单独意义。

概念本身是两个矛盾要素的融合。概念代表三段论的第三级，即存在和本质的综合的环节。它是自我实现了的实体的力量，^[42]或者说，由于它是本质和存在的结合，所以它是作为绝对的自我规定了的东西出现的。这就是自由，即黑格尔所说的成为外在化了的自在的东西。概念从客观逻辑演化而来，因为随着必然性的确立，便达到了向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的过渡。主观性仅仅是把它自身置于人的精神之中的概念或必然性。

但概念也一定要分化。概念是本质和存在的统一，而且概念必然按其部分表现自身。由于存在是普遍性，本质是特殊性，概念就必定出现为三个“环节”或三个“功能部分”，^[43]即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我对概念的第三个环节即个体性并不感兴趣，不过重要的是应该指出，“普遍—特殊”的“辩证法形式”在黑格尔那里出现于对概念本性的分析的上下文中。因为概念就是必然性，而且它必然地由“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要素构成，那么概念也就必然以“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形式表现自身。概念以三段论的形式表现自身，这种必然性对于“主观逻辑”这一剩余部分具有重大意义。黑格尔不仅把三段论确立为概念的内在本性，而且是从概念演化出来的一切精神功能的内在本性——诸如判断和认知。判断被称为“概念的接近实现”，^[44]而且判断涉及的是

“主谓关系”。^[45]黑格尔通过使三段论成为概念的内在本性，因而也就使得判断即谓词的指定按照“普遍与特殊”的方式发挥作用。此外，感知外部世界的认识活动也必须适合“普遍——特殊”的“辩证法形式”。跟康德一样，黑格尔也把认知分成分析的和综合的形式，^[46]但在这两种形式中我们对世界的统觉都必须按照“普遍——特殊”的方式进行。^[47]

现在我想转到对马克思套用黑格尔的方式的分析。可喜的是，我对黑格尔的讨论已经为这两个人的比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的比较方法将采取这样的形式：我在对黑格尔的评述时分离出了我所说的“辩证法的范畴”、“辩证法的形式”和“辩证法的原则”三者。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的范畴”我列了“存在”、“本质”、“概念”三要素；关于“辩证法的形式”我注明了“全体与部分”、“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和“普遍与特殊”四对；对“辩证法的原则”我也具体化为四项：“矛盾”、“否定”、“中介”和“规定”。当然，马克思是完全抛弃了“存在”、“本质”和“概念”这套黑格尔的逻辑工具；代替黑格尔的公式的“辩证法范畴”是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经济职能。除了这一“辩证法范畴”的构成要素的不同，所有其他的“辩证法的形式”和“辩证法的原则”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共同使用的，只是意义有所不同。我将要做的工作，是把“辩证法的范畴”（以上述替换了的形式）、“辩证法的形式”和“辩证法的原则”置于马克思的头脑中。明白地说，也就是要证明马克思怎样把所有这些种种辩证法的工具融合成《资本论》的解释基础。基本说来，我就是拿《资本论》跟《逻辑学》作比较；或者说，通过证实这些辩证法的工具如何以类似在《逻辑学》中的方式而在《资本论》中起作用，从而确认两点：马克思究竟套用了黑格尔哪些东西，以及他以什么方式修改了（物质化了）这些套用的东西。^[48]

凡是关于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的研究，都把这种关系分为

两个时期：人本主义的影响时期和认识论的影响时期。人本主义的影响时期的例证在《巴黎手稿》（*Paris Manuscripts*）（即《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者注）中。该书中明显出现了对象化、异化、外化、实践、内在等黑格尔式的命题，只不过采取了物质化的形式。这一时期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著作是《精神现象学》。从这一高度来看，马克思的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表现出了这个时期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的主流。阿图塞曾谈到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认识论上的决裂”，他所说的决裂乃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影响的第一个时期的决裂，或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人本主义影响的决裂。我不同意阿图塞的论点，因为有可能证明，由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人本主义之间不存在决裂，而毋宁说只有调整，早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也就贯穿了他的一生。这里发生的是一种重点的转移，因为随着马克思变得专心于对社会构成的分析，他早期的人本主义主题也就失去了其优先地位，但仍然是个隐含的假定；而且他思想上主要转到了黑格尔认识论的影响上。马克思从未脱离过黑格尔，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变换他对黑格尔著作的各个方面的兴趣。在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第二个时期，即他探索生产方式的时期，他需要一种能够支撑他的社会分析方法的逻辑，因此他转向了黑格尔的认识论方面。人本主义时期与认识论时期的区别也就是《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区别。

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兴趣占优势的时候，他读得最多的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在马克思的认识论时期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资本论》时期，他所借助的黑格尔的两部著作是《逻辑学》和《哲学全书》的第一部分《逻辑》。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此作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译者注)中,马克思认为,工具并不自在地生产价值,而毋宁是从属于生产价值的工人的目的的一种纯粹的手段。为了证实这一点,他转向了黑格尔。事实上他是通过援引黑格尔《小逻辑》中的话来支持他自己的论点:“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49]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此作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译者注)中,马克思在企图解释货币拥有者在哪一点上成为资本家,即实现其经济地位的质变所需要的货币量时,他再次求助于黑格尔来证明。马克思写道:“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50]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非常明确地表示,在他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黑格尔的思想一直伴随着他,因为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表示了他对黑格尔的感激,不过同时声明他把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了”。^[51]但是,马克思宣称:“正是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他“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思想巨人的学生”,^[52]这一说法却不很确切。确切地说,马克思在1857年动手写作《大纲》时,就开始依靠黑格尔的认识论了。此外,马克思不仅仅是“卖弄黑格尔所独特的表达方式”,^[53]而且实际地把黑格尔的逻辑形式融入了他在《大纲》中解释资本主义的方法的结构之中。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的著述向《资本论》推进的初始阶段;经过七年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对经济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正式着手试图解释

他在自己的阅读中瞥见的社会进程。此时，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明确化，他需要转向黑格尔的认识论，转入他自己对待黑格尔的第二个时期。

在马克思加以归类的黑格尔的所有其他概念中，“范畴”这一概念也许对于我们的论述最为重要。从1850~1857年这一时期，也就是从他开始在大英博物馆进行研究直到他着手写作《大纲》，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演进的关键几年。通过自己的研究，马克思进入了比较经济形态学领域。在思想形成的这几年里，他阅读了罗马历史、早期德国史、亚洲历史，并提出了支撑这些历史时代的一种经济制度类型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序言”中，他提出整个历史时期存在过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这样四种基本的经济结构。^[54]这一著名论断就是他1850~1857年间在比较经济人类学领域的发现的直接产物。马克思认识到，一切社会，为了人的生存得以维持，都必须执行某些经济职能。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所有权看作是生产的条件和拥有生产条件的权利。通过这种权利，人才能占有和生产，社会经济生活才能够前进，因为社会经济生活纯粹是生产的活动，是消费和生产之间的交互关系。马克思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人类经济活动的普遍方式的论述，乃是对黑格尔的主客体统一思想的变化提法。在黑格尔那里，主客体的统一指的是主观概念征服客观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主客体的统一指的是这样的事实：只有物即生产的成果才能满足人的需要，才能实现消费。^[55]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是：黑格尔把主客体的统一理解为发生在逻辑或意识的层次上，马克思则把这种统一理解为在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展开。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主客体的辩证模式，但他把这一主客体模式附加于人的经济存在。马克思借来的是形式，而改换了内容：这本身就是一项黑格尔派的事业。

确认了生产—消费这一维持生存的活动的普遍形式之后，马克思进而把这一见解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经济生活。他的结论是，一切社会，如果要为其人口的生存提供必需的物品，它们就必须执行四种基本的经济职能。这四种职能是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马克思把它们称为范畴：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56]

马克思认为，一个“范畴”是通过发现一组特例所普遍具有的一种特征得到的（“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马克思在他对比较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中获得的是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四种经济职能的分离。这四种职能是他所考察过的一切社会普遍执行的，所以他称这四种基本的活动为“范畴”。

黑格尔的“范畴”概念与马克思的“范畴”有着巨大的区别。根据我在本章开头提出的范式，黑格尔有三个“辩证法的范畴”——“存在”，“本质”和“概念”。在黑格尔那里，“范畴”是概念在其自身演化过程中必然采取的形式。马克思则剥去了黑格尔这一定义的神秘外衣，而认为“辩证法的范畴”乃是一切社会为了再生产自身所必然经过的经济过程。马克思所做的工作是移动这些“辩证法范畴”的位置：把它们搬出唯心主义的环境，然后置于社会学的基地。实际上，马克思致力的是项转换工作。他并没有取消“范畴”的黑格尔式的使用，而是对它们加以转换。马克思并没有跟黑格尔发生“认识论的决裂”；确切地说，他是以一种变形的方式继承了黑格尔的遗产。

在马克思的四个经济“范畴”中，生产是最基本的。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就是一群人选择在其中生产的一种形态。为了种的保持，必须生产出物以满足人的需要。但是并不存在普遍的生产形态；虽然一切社会都生产，它们却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生产。其他的经济的“辩证法范畴”也是同样的情况。一切社会都消费、分配和流通，但没有哪两个生产单位即社会以同样的方式执行这些职能。

马克思跟新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决裂了，他抛弃了商业或土地是价值的构成的看法。马克思是个李嘉图主义者，主张价值来源于人的劳动。正如不存在一般的生产，同样也不存在一般的劳动；正如生产以其所处的社会形态为中介，劳动也同样以它所处的社会形态为中介。马克思不仅制定了一套社会分析的方法，而且他同样关心人类劳动的历史命运。马克思写作了关于人类劳动的社会的“奥德赛”(Odyssey)。正是在我所分析的这一点上，将使“辩证法的形式”成为有效的。我的研究是要表明，“形式—内容”、“现象—本质”、“全体—部分”、“普遍—特殊”这些“辩证法形式”怎样跟生产（劳动）和流通的“辩证法范畴”相互交结在一起。马克思是在他希望证明社会总体如何对它的各个部分起中介作用时使用这些“辩证法的形式”。但是，“辩证法的形式”是交互作用的：它们不仅构成被规定的东西，而且由于总体是由部分组成的，所以它们也决定着全体。

劳动被归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方式，其特点是为了使物得以出售或成为商品的目的而进行生产。^[57]作为生产过程的基础的劳动，是由这种资本主义方式起中介作用的：劳动本身转化为一种商品。经典的例子是，在英国，劳动者被“圈地法”抛出了土地，他们由于脱离了自己原先的生产资料而进入城市。他们因无力生产自己的食物而成为自由的劳动者，并只能依靠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才能生存下去。

购买这种劳动的人即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便是资本家。因此，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便是一种交换关系；购买者是资本家，出卖者是劳动者；被购买的是劳动力（不是劳动者本身），交换的媒介则是货币。

资本主义的劳动被规定为雇佣劳动。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且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人的联系。把所有者与劳动者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东西是劳动力与货币的交换。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因为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基础。劳动对于资本家具有使用价值，它的使用价值即是交换价值的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中介作用，劳动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生产。

由于剩余劳动是利润的源泉，所以资本家的目标便是使劳动增殖：资本家的愿望是使劳动有更大的价值。资本家实现这一点的办法是，通过利用技术和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来使劳动更具生产性。这并不是说资本家会为这种提高了的生产率支付工资。事实上，资本家不会多付工资，而且劳动者的生产产量增加而资本家却支付同样的工资，这正是资本家利润增长的来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下，劳动被规定为“增殖过程、资本的自我增殖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手段。”^[58]

在封建的经济形态下，生产并不是为了交换价值而进行，而是为了使用价值。由于技术发展水平的低下，由于产品仅仅带来有限的剩余劳动，所以封建形态下的经济活动是为了使用价值的目的进行的。中世纪的劳动者农妇不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封建贵族不仅占有生产资料即土地，而且对中世纪的劳动者拥有政治支配权。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交换不涉及货币。农奴的劳动不是被出卖的，它不是商品。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交换的东西是劳动者的劳动。劳动者在每周为地主工作部分时间，也为自己工作部分时间。跟资本主义相反，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确实包含有某些人的因素：它并不能完全归结为货币的交换或劳动的交换。

由于在封建经济内部流通非常有限，所以商品形式尚未存在。所有者也尽可能多地从劳动者那里榨取剩余劳动，但其目的不是为了生产商品和获取利润，而是为了生产奢侈品，为了超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剩余的剩余的使用价值。在它种生产形态中，劳动被规定为仅仅是一种“增殖过程的工具。”所有者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59]

劳动过程的第三种形态可以在奴隶制度中找到。马克思承认，奴隶制的生产本身又必然分为两种形式：家长制和种植园制。罗马和希腊世界是建立在种植园式的奴隶制之上，^[60]在美国南部也存在同样的种植园制。在古希腊罗马世界，种植园式的奴隶制并没有引向商品的生产。如果商品生产曾在罗马存在，那么资本主义也就会在罗马存在了。但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从而为了交换的生产，在希腊罗马世界从未存在过；他还特别指责过德国历史学家泰奥多尔·蒙森（Theodore Mommsen），因为他关于罗马历史的多卷著作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拉丁语世界的存在。^[61]

奴隶劳动者既不象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者，也不象农奴，他们并不被看作是法律地位的人。资本家和封建领主都不占有劳动者的人身，他们获得的只是劳动者的劳动力。但是，奴隶所有者却把奴隶当作财产拥有。奴隶与其所有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换关系，既无货币的也无劳动的交换关系，因为一件财产是没有什么可交换的：它本身就纯粹是一件工具。

奴隶制的劳动形态跟封建制类似，也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因此，奴隶劳动也不被看作增殖过程的一部分。^[62]但是，奴隶劳动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两种劳动之间的重要区别是，种植园式的奴隶劳动必须有大量的监督。^[63]必须对奴隶加以监管以防他们逃跑，奴隶也因为奴隶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工作动力而需要大量的监督。^[64]

交换是另一个“辩证法的范畴”，不能把它跟分配“范畴”混为一谈。交换涉及经济物品由一个群体到另一群体的转换。但这一过程的实现必须具备两个社会前提：一是劳动的社会分工，这样才有必要使物由从事一种劳动的群体转到从事另一种劳动的群体手上；二是两种群体的划分，特别是游牧群体与农业群体之间的划分，这样，每个群体才会需要其它群体的经济物品。另一方面，分配涉及的是生产资料或由生产资料获得的总收入的分割配给。例如，在部落战争的情况下，一个部落打败了另一部落之后，失败了的部落的生产资料便在征服者之间进行分配。在分配上没有买者和卖者，没有经济对等物的交换；毋宁说，在分配中存在的是通过某种政治的或社会的权威的干预而进行的配给。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在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都是各自独立的，不过它们都依赖于该社会整体。^[65]

在这一部分讨论中，我将集中于流通现象。马克思把流通看作是交换的派生物。我们最好把流通得以出现的过程理解为一系列的必要前提。交换出现的社会前提是劳动的社会分工以及游牧的和农业的社会单位之间的区分。在这种情况下的交换首先是以物物交换的形式来规定的，但随着交换的扩大，就必需另一种交换媒介，即一种普遍的媒介。这种普遍的等价物是一种被视为所有其他产品的共同标准的東西。^[66]为了进行扩大了交换而对一种普遍等价物的需要，乃是货币出现的前提。^[67]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本身并没有价值，它仅仅是一种便利的工具；它使得物在卖方和买方之间的传递更为简便。诚然，货币作为一种便利的工具是没有固定形式的，它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可以是产品自身（如在物物交换中），或通过社会的约定采取贵金属的形式。但是，尽管货币本身是一种商品，是一种标志两件物品等价的商品，可它却具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即转化的力量。因为拥有了货币就可以使人由卖者转变为买者，或者货币可以经过一个自我转

化过程，即开始以货币的形态出现，然后又表现为商品的形态。作为一种便利工具，货币使交换跨越空间、时间和数量的限制。交换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空间、时间和数量上的扩张，这就是流通。因此，货币乃是流通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需要一种表达形式来传达他对流通以及一般经济“范畴”的理解。有趣的是，马克思使用了黑格尔的三段论思想，来为说清楚他的流通观点提供逻辑形式：

但是，这个作为贸易基础的、并因而扩展成为流通的主要现象的过程，一般说来要成为可能，“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这一循环就必须被看作流通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同货币单纯表现为商品交换手段，表现为中项，表现为推论中的小前提的那种形式，有特殊的区别。^[68]

事实上，当马克思试图解释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这四个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时，他也只能借用黑格尔的语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因此形成了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69]由于马克思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由间接性的部分构成的总体，所以他需要一种逻辑来明确表达特殊性的统一。建构在对立面的统一的思想之上的黑格尔的三段论，便给予了他所需要的认识论公式。

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公式就在三段论之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马克思把历史的运动描述为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冲突。^[70]一个社会是一个对立中的统一体，是个归属于矛盾和否定的整体。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冲突，基本上属于普遍与特殊的相互矛

盾，而这正是三段论的核心。生产方式是普遍性，它是生产得以在特定社会中进行的一般形态。生产资料是特殊性，它是新的技术形式以及形成于同一社会内的与之相伴随的社会阶级。

但是，交换和货币并不是流通的唯一前提。为了进行交换，还必须有买卖双方，必须有交换价值，或者说必须有一件物品，它对于买者有足够的价值，使他愿意为之而付钱给卖者。随着交换价值的形成，也就具备了产生商品的条件。在流通过程中货币变化着形态：在流通开始时形式货币作为货币出现，买者出现在卖者面前；在流通中期，形式货币转化了，它成为一种商品出现在买者那里——由于他起先从卖者那里购买了这种物品；而到了基本流通形式的末尾，转化过程又进入了一个再次转化的过程：最初的买者这时把他所购买的物品卖掉，于是他拥有的就不再是商品而又是货币了，即商品经转化再次回到了货币。因此流通乃是一个商品货币化和货币商品化的过程。^[7]换句话说，流通是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经济形式。没有流通就没有利润，因为利润只能出现于交换价值。

此外，流通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先决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被变成为商品，但资本家若不能实现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他是不会作为劳动的购买者出现的。而剩余价值又只能出现在流通形式中，所以没有流通这一前提，便不会有资本的运动。

流通过程既是个单一的循环，又是由个别流通组成的。马克思用以表示整个流通过程的公式是 $M-C \frac{L}{M} P$ （原文有误，下同——译者注）— $P-C'—M'$ 。其中 M 代表货币， C 代表商品， L 是劳动， MP 是生产资料， C' 和 M' 表示 C 和 M 有所增加。而这种增加就是剩余价值。这个流通公式是个循环，因为它的开头和结尾都是 M ；但两个 M 有很大的差别，末尾的 M 经过了价值的增加，即剩余价值已经转移到了它身上。虽然这一循环以 M

结束，但它已不再是同样的 M；它是 M 加上剩余价值，或 M' 。而且这样一来，这个循环又可以再次从头开始了。

在资本主义能够存在之前，流通也必须存在，或者说实现利润的潜能必须存在。但是，资本认识到了流通具有创造利润的潜能之后，它便把流通过程归之于自身。在资本主义下的流通中，资本或者使自己出现于整个流通过程，或者出现于资本的特殊流通过程。资本的这种以多种面貌出现于整个流通过程的能力，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化身”^[72]过程，或资本的“形态变化”。^[73]

因此，流通是 $M-C \frac{L}{M} P-P-C' -M'$ 这一现象中的一个总体，一种普遍。同时，流通也是个部分的统一体，是 $M-C \frac{L}{M} P$ ，或 P ，或 $C' -M'$ 的单个流通的合成。所以说，流通乃是整体与其特殊的同一。每次流通都由整体作中介，因为每次流通都是 M' 即利润的实现中的环节。然而，每次流通又是流通的普遍运动内的特殊，而且在这些特殊的环节内部资本以不同的表现被规定。

资本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以其作为货币的形态开始，资本产生出 $M-C$ 阶段的流通过程。在它的第二种变形中，资本是作为拥有货币的买者出现于 $M-C$ 的流通中，而被购买的是或为劳动 (L) 或为生产资料 (MP) 的商品 (C)。当资本以货币的形式从卖者那里购买劳动 (L) 和生产资料 (MP) 时，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劳动 (L) 和生产资料 (MP) 必然成为剩余价值实现过程的中介。它的办法是找到一条增加它起先购买的的商品的价值的途径。

资本的第二种变形表现为生产 (P)，生产则是商品的增殖。商品得以增殖的手段是劳动，特别是剩余劳动。生产形态的资本，以剩余劳动为手段，使商品增殖，超过其原有价值，从而促进了普遍过程的实现。

接下来资本的转化采取的是 $C' - M'$ 流通的表现形式，在这一表现中，资本卷入了再转化的过程。资本出现的第一种形态是 $M - C$ ，即最初是货币。但在整个循环的末尾，已经化体为 C 的资本必须再次转化自己，回到货币，但那是带有剩余价值增值额的货币即 M' 。为了实现自身为资本，资本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内实现自己为货币。资本家必须再转化自身为卖者，以便能够实现 M' 。^[74]

前面关于劳动和交换的讨论业已证明马克思怎样把我所说的辩证法的“范畴”、“形式”和“原则”融入他的经济学的和历史学的认识论。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是“辩证法的范畴”，是每个要繁衍自身的社会必然从事的经济活动，虽然每个社会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从事这些基本活动。另外，马克思还运用“全体一部分”、“本质—现象”、“形式—内容”、“普遍—特殊”的“辩证法形式”，去说明“辩证法范畴”如何由其自身所处的经济环境而定型。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和流通时，他不想描述超历史的过程（这是李嘉图的错误），而是致力于由它们自身所处的环境赋予不同特征的过程。马克思把“辩证法的形式”当作社会的决定性和特殊化作用的重心。他把“辩证法的形式”当作社会的中介性和反映性作用的根源。最后，“矛盾”、“否定”、“中介”和“规定”这些“辩证法原则”乃是“辩证法形式”本身的内在规程。马克思运用“矛盾”、“否定”、“中介”和“规定”去说明“辩证法形式”的决定力量和特殊化力量是如何起作用的。

根据我所构造的范式，显然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利用了辩证法的“范畴”、“形式”和“原则”。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了这些概念，这就造成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的确切性质还有待弄清。因此，在此有必要解开马克思—黑格尔的关系，有必要首先使马克思脱离黑格尔。

割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必须集中于主体性概念。在黑格

尔那里，意识或精神是主体性，而马克思则认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主体性。此外，马克思和黑格尔对主体的活动也有不同的看法。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生产方式的_{活动}就是生产它的物质性或它的生存；而黑格尔则把活动看作是意识或精神产生出观念。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分歧，正好分割开主词一谓词，主体一客体和思维一存在的疑难问题。

此外，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分离还必然使马克思摆脱任何黑格尔的内在论的污点。马克思不从有机体的意义上考虑问题，他不考虑注入特殊部分的一般性的质，而是着眼于结构的互补性。而且，马克思毫无黑格尔的进化论的偏见。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描绘了一幅渐次演进的人类历史图景。另一方面，马克思却既不预先假定进步，也不预先假定时间上的前后相继，而是把社会或事件看作是不同发展时区的会合或并成。

如果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差距如此之大，如果说马克思为了建立他的历史唯物主义面必须把黑格尔革命化，那么他为什么又在1857年转向黑格尔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脱离了黑格尔之后，马克思究竟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看到了什么，使得他又回到了黑格尔？答案就是：为了表述他到1857年所获得的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看法，他觉得有必要利用黑格尔的逻辑形式。在马克思写作《大纲》时，他就把社会看作是在总体内同时既统一又矛盾的各种经济形态的会合。总体是部分的中介，而且由于这统一体内部各要素间的矛盾和否定性，这种会合又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为了表述这种看法，马克思需要一种设定统一、矛盾和过程的逻辑。《逻辑学》适合这一需要，但马克思求助于黑格尔的不止是对一种特定语言或交际符号的需要。此外，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需求也不能用形式和内容的转换来解释。确切地说，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连续性必须用黑格尔的逻辑形式对马克思所起的作用来解释。其实，马克思之所以利用黑格尔的逻辑

范畴，是因为他需要构建一种历史解释的认识论。首先，马克思需要一种能够描述转化的逻辑。马克思基于他自己的经验研究提出的理论是，劳动转化为剩余劳动，货币转化为资本，价值能够从使用价值变态为交换价值。况且，“本质论”正好是一套建构理论：它描述了现实即人为的世界是如何逻辑地建构起来的。“本质论”提供了现实的形式能够据以显现的一种逻辑结构。

马克思将黑格尔某些特有的逻辑形式融为一种历史的认识论的工作开始于《大纲》中，在《资本论》中达到高峰，并持续到他的晚年，再次出现在他写于1880年的《对阿道夫·瓦格纳的评论》(Notes on Adolph Wagner)中。在他这一未发表的对瓦格纳的批驳中，马克思继续利用了自1857年以来就起作用的“辩证法的形式”：“形式—内容”、“普遍—特殊”、“全体—部分”、“本质—现象”。这些“辩证法形式”在《对阿道夫·瓦格纳的评论》中的运用方式跟在《大纲》和《资本论》中毫无二致，也是作为描述社会总体如何决定其内部各特殊形式的手段。^[75]

仔细阅读马克思的《对阿道夫·瓦格纳的评论》便可发现，马克思拒绝任何关于价值的一般定义。他认为，价值的不同形态，也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仅仅出现在“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因而也就是历史发展的有限阶段”。交换和使用价值，而且实际上是商品本身，纯粹属于“历史概念”。马克思通过运用“辩证法的形式”，试图证明价值本身可以采取多种形态，证明价值形态以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为中介。黑格尔的逻辑给了马克思借以说明社会决定性的形式。此外，马克思为了捍卫他的劳动价值论，他指出，瓦格纳本应该承认，“商品的‘价值’只是以一种历史地发展的形式，表现出那在其他一切社会的历史形态中也存在的东西，即劳动的社会性”，商品仅仅是社会劳动力的具体化，通过这种外在化，社会劳动被转化成了物。黑格尔的直觉论也给马克思提供了借以描述转化过程的范畴。

确认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在认识论上的连续性之后，现在有必要来看看这种认识论是怎样通过马克思的方法起作用的。我们已经分析出了马克思借自黑格尔的确切的“辩证法形式”，现在有必要对于这些形式对马克思的认识论、他的社会探究方法和解释方法发生影响的确切方式作一番考察。为了完成这些新的任务，深入细致地对马克思的《大纲》的“导言”加以评述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1857年的“导言”已经很快地变成了马克思文库中最具权威性的部分。

我将把对“导言”的分析分为三部分。首先讨论的是在此表现的认识论，其次探讨他的社会探究方法，最后讨论他的解释方法，即他怎样把他的探究变为论述。为了尽量接近马克思的意图，我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每项讨论中，都将首先专门地援引马克思1857年“导言”中的原话。

一 认识论

（一）经验的证据

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⁷⁶⁾
〔而且〕……虽然它〔具体〕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
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⁷⁷⁾

在马克思看来，认识的过程开始于感性直观和经验材料的基础。当涉及到认识的产生的起始点的时候，马克思是个洛克派。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直观和经验的证据不是认识，它只是认识的开始。在这一点上认识的过程是归纳的。

（二）抽 象

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

的地方，在那里，一件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78]

为了得到认识的结果，必须经过抽象过程。必须把特殊现象所共有的要素抽象出来形成一个一般。认识是一个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开始于直观阶段，然后通过抽象活动上升到一般的阶段，即概念。

〔三〕社会先验

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79]〔因为〕现实中的劳动在这里成了创造一般财富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80]

社会先验在四个方面表现出来：现时的个人观，现时的历史观，未来的历史观和未来的个人观。下面几段我就来分别讨论这四个方

概念，一般的产生乃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发生于处于特定历史背景的个人内部。个人所从事的抽象过程受着他周围的现时的历史准则的制约。个人的观点总是现时主义的；它只能在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给定予个人的历史画面中展开。

现时的历史观决定着将要提出的问题。具有它那全部巨大的生产力的工业社会，把劳动揭示为所有这种生产率的源泉。唯有在历史用具体例子说明了劳动是一个历史问题之后，经济学才能提出劳动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同样，商品社会已经把贸易扩展到

了全世界的范围，而且只有到这时，经济学家才去探究交换价值的历史和本质、使一个问题成为一个理论研究的领域，其前提乃是该问题的先天的历史的形成。

未来的历史观是众多人的生产活动的结果。人类通过自身的活动将提高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并从而造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在未来的个人观方面，个人再次从历史提供给他视野出发开始自己的认识过程。这整个的运动、在认识的产生上，社会先验的作用，乃是主客体统一的一个具体例子。它是人类实践的辩证法的一个示例。社会为人的认识提供可能性，而个人在取得对客体的认识之后，又通过按照这种认识框架的活动去影响他的社会。

(四) 概念

这样的情况，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态——美国，最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纯粹绝对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81]〔但是〕它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以外或凌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82]

概念是抽象和社会先验的统一。作为一种归纳的产物，它是普遍性的东西，却又是处于历史的决定之中的。商品是一个概念，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看来全部以往的生产形态中抽象出来的一般。交换价值是一个概念，因为它是从以前的社会里存在过的一切其他交换形式中抽象出来的一般。

(五) 概念与外在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表明单个人本身的交换和他们本身的生产是作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物的关系而与他们相对立。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已同时包含着突破它自身的条件。……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毫不相干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上。^[83]

马克思一直是个实在论者。概念的形成并没有取消精神与自然之间的区别，因此一个独立于精神的世界仍然存在。概念的产物也不带来精神与独立于精神的世界之间的相符合，因为马克思所相信的不是这种相符合，而是主客体间的彼此相互作用。

由概念产生的认识具有回顾作用：我们通过现在的情况而知道过去，但我们无法预见未来。由于我们现在暂时的处境揭示了过去隐秘的方面，所以我们的认识是回溯性的：我们对过去了解更多。

(六) 作为一种生产性力量的概念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

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84]

概念是生产性的力量，而认识则是概念的活动的产物。精神首先去把握，然后进行生产，被生产出来的东西便是一种认识、一种理论。

实践的观念在马克思那里有两个含义。当概念产生出一种认识或理论时，这是实践。还有，当理论在现实中得到实现，这也叫实践。其实，实践一定要从理论中出现，因为实践是理论的企图现实化。

二 探究的方法

当马克思接着进入到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时，他的解释方法也从归纳转到了演绎。上升到了概念的阶段之后，马克思便运用这些一般范畴把特定经济方式内部的主要生产关系分离出来。马克思从概念的层次上演绎出了社会结构的形式所围绕的核心经济关系。

此外，马克思的探究方法还融合了我在本章前面所说明的“辩证法形式”。马克思把社会看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经济范畴以不同的顺序排列着；这些经济范畴的不同排列便是经济总体之间差别的原因。当马克思解释某一特殊社会时，他利用了“辩证法的形式”，以便深究一种社会结构内部范畴的独特的联系。基本上说，马克思是把这些“辩证法形式”用作规定的方式：他运用“形式—内容”、“全体—部分”、“普遍—特殊”、“本质—现象”去说明社会总体中的互为中介作用。

但是，马克思另外还利用了出现在《逻辑学》中的黑格尔的另一逻辑模式，即条件性的模式。黑格尔对条件性模式的讨论是在“本质论”中的“根据”那一章。^[85]在“根据”一章中黑格尔

还利用了“形式—内容”的“辩证法形式”。在该章中黑格尔的意图是为“事物”的出现阐明必要的条件。“形式—内容”的“辩证法形式”是这些条件之一，因此，为了内容（“事物”）的显现，它必须显得与形式有所不同。不过，条件性表现为两种方式：作为前提条件和作为保存条件。马克思对这两种条件性方式都作了利用。

前提条件指的是，为了某物的出现，必须有一种先在条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驳斥了休谟和康德的因果观，并认为不能把前提混同于因果关系。前提不是说事件 B 跟着事件 A，而是说由前提条件建立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与否则依赖于其他因素。但是，一旦一个新的条件或事件得到了实现，那么，不借助其前提条件便无法对这一新的条件加以解释。在休谟那里是：A 对于造成 B 来说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而在黑格尔那里则是：前提条件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

保存条件指的是一个事件的前提条件未被取消。我们已经知道，黑格尔对休谟的原因概念的批判之一是：原因在结果中绝迹了。在黑格尔看来却是：由于前提条件是必要的而非充分的，所以它能被保存在新出现的事件或条件中。前提条件建立可能性，而不是建立恒常的前后相继。前提条件在新的事件中作为可能性保存着自身。

下面分五个步骤讨论马克思的探究方法，讨论的方式跟前面关于他的认识论的讨论相同。

三 社会探究的方法

（一）演绎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

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86]

在资本主义内部，“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一定的生产”是物和人向商品的转化。于是这种支配关系可以“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换句话说，商品关系决定一种生产方式内部的所有其他经济范畴和经济活动。但是，为了确定哪种生产关系支配一切其它生产关系，首先有必要达到关于那种支配关系的概念。获得了这一概念之后，还应该演绎出被这种支配关系淡化和减缓了的该生产方式内部的其他一切特殊事物。

（二）“辩证法的形式”

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87]

正是在他的这方面的研究上，马克思最有效地利用了“形式—内容”、“普遍—特殊”、“全体—部分”、“本质—现象”诸范畴。他运用这些“辩证法的形式”，表达在一种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中中介的相互变动。这些“辩证法的形式”表明，中介可以同时由支配关系转到特殊，并由部分转到支配关系。

（三）结构的结构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

有不同的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曾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88]

马克思的探究进而超出了“辩证法的形式”——这说明了分析的升级。马克思在假定了“辩证法的形式”和相互规定的过程之后，便考察了社会结构的内部组织，每个社会都是由某种支配关系融合起来的特殊事物组成的结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这些特殊都是同一种类，或都处于相同的复杂性阶段。

特殊的范畴有着类的差别；劳动不同于货币。特殊的范畴其复杂程度也不一样；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作为物物交换的东西出现时形式并不复杂，而作为商人的资本或后来作为工业资本时就要复杂多了。劳动也一样，它可以在生产使用价值的农业中以不太复杂的形式出现，或在生产交换价值的工业社会里以较为复杂的形式出现。不太复杂的范畴跟较为复杂的范畴混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具有不同特征的社会结构，这是可能的。社会结构不仅是特殊范畴的统一体，而且是复杂程度不一的特殊范畴的统一体。一种社会结构就是复杂程度不一的经济范畴的一个示例，这些范畴被一种支配关系的重心所吸引，并交错成为一种结构。

例如，不太复杂的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与不太复杂的货币即用作物物交换的货币，它们的交织乃是原始公共农业社会的特征。不太复杂的、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与较为复杂的、出现在商人资本中的货币，这种交织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农奴同时也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现在生产交换价值的那种较为复杂的劳动，与现在作为工业资本出现的那种复杂的货币，这两者的搭配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因此，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不仅必须着眼于其中各特殊之间的关联和互补，

而且必须着眼于各特殊自身的复杂程度。

复杂一词不应从进化的意义上去理解。所谓一个范畴比另一个范畴复杂，不是就时间的历史的意义而言，而是就其作用的普遍性而言。如果货币的使用范围仅在农业群体与游牧群体之间，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有限的，因而它是不太复杂的。但是，如果货币能够在全世界流通、连结欧洲和亚洲，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无限的，因而它是比较复杂的。复杂性与时间的发展两者间的这一区分必须划清。时间的发展的思想带着某种历史循环论的涵义。复杂性的思想则单纯涉及作用的程度，而且没有任何较为进步或不太进步的内涵。

（四）探究的同时代性

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89]

在马克思看来，探究的目的不是要发现时间中的进步。他不是提出有关过去的进化和未来的发展之类历史循环论的问题，因为他不可能预言未来。我们的研究是同时代性的：我们探问的是有关资产阶级社会的本性。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其历史的发展，而是其特殊范畴的会合；特殊范畴为了造成这个社会的存在是如何会聚在一起的。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结构，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这些特殊范畴所采取的形式。对总体的认

识会告诉我们，总体是怎样决定特殊的要素并作为它们的中介的。

(五) 通过回溯和前提的探究

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猿体解剖是一把钥匙。^[90]

在我们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诸特殊范畴的会合之后，就能够把我们的理解往回扩展了。我们的认识是回溯性的：对于每一特殊范畴在受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关系吸引的情况下如何呈现自身的前提，我们是可以弄清楚的。从一种较为复杂的角度可以辨明不很复杂的东西。

我们发现了前提，发现了诸特殊范畴在出现于资本主义之前的形态。我们理解了前提条件，即处于同时代的规定性之中的特殊范畴得以出现的先在的诸规定。

我们既发现了灭绝，也发现了保存。原先的前提就可能继续保持下来。

四 解释的方法

马克思的探究方法具有他的其它批判的方式，因为他透析了现象形态背后的内在根源。在他的经济学批判中，内在的根源是决定现象之表现形态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但他面临着—个

新的问题：即找到一种正确表述他的探究结果的文字形式。他需要一种辩证的文字叙述方法。

（一）解释的程序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的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与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的”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91]

这段话是马克思打算写作《资本论》的最初纲要。他一直没有实现这全套计划，但其中第（1）、（2）点的内容大多包括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此外，这段话还表明了马克思不再想记叙式或漫谈式地阐明自己的批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按照事件的前后相继次序所作的一种历史循环论或实证论的表述。

马克思的解释以辩证的形式，首先陈述在一个社会内部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接着，说明该社会中诸特殊范畴怎样以那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中介；然后，考察这些特殊范畴如何合并，即它们结合的不同复杂性限度；最后，是反证式的分析；以此证明特殊经济范畴结合于支配关系之下时所存在的形态的前提条件。当我们找出使特殊范畴得以如此这般地表现、并从而赋予结构总体如此这般的形态的前提条件时，我们的认识是反证式的。马克思的辩证的解释，其目的就在于描述“可能性的条

件”。^[92]

其实，在1867年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他在《大纲》中所勾画的解释方法便成了他在他的巨著中所使用的解释方法。《资本论》并不想预言资本主义发展的结局。^[93]它也不企图以孔德的方式预测资本主义进化的未来阶段。^[94]毋宁说，它是批判，它的用意是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条件。该书的内在结构是共时性的，而且这种设计与其弄清资本主义存在的“可能性的条件”这一意图是相适应的。

《资本论》第一卷从概念的层次上开始，首先陈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它不是以对资本主义的现象的分析开始，而是先说明资本主义那种看不见的、本质的关系：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95]由于这就是资本的概念，因此作为生产的结果的物品便必然由这种支配关系所规定。于是，作为生产的结果的物品便采取“商品”的形式，即是一种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物品。^[96]但是，确定了资本的概念之后，马克思立即开始寻求商品的前提。马克思领着我们分析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形态，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确认了商品的前提条件。^[97]但既然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根据他的探索逻辑，马克思必然要阐明价值的前提，而这就是劳动的二重性。^[98]劳动最初以劳动力的面目出现，即作为尚未分化的人的生产能力。劳动同时还以它所处的生产结构为中介：由特定的结构对劳动的规定造成了特殊表现的劳动，即作为具体的劳动。^[99]劳动力不是价值的直接生产者，因为它太一般化了。具体劳动是价值的前提，因为它是由于它所处的总体的中介作用而进入了特殊形态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统治的具体象征而存在。马克思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存在的前提的探究，使他回到了劳动的转化性质上，因为具体劳动本身既可以表现为使用价值，也可以表现为交换价值。

这种对资本主义“可能性的条件”的反证式探究贯穿了整个《资本论》的第一篇。第一篇第一章是批判地研究商品的本质、生产商品的劳动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两种价值形态。但马克思的批判并不停留于此，因为商品还有一个前提是交换的存在。所以第一篇第二章又用来分析交换。在该章中，马克思对于交换的种种复杂情况作了精辟的评论，比较了物物交换和货币交换。^[100]马克思以对货币的论述结束第一篇，因为，由于商品若没有货币便无法出售，所以货币乃是交换的又一前提。关于货币一章写得特别生动有趣，在那里马克思说明了在古罗马、中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的货币形态的种种复杂情况。为此，马克思首先必须破除认为货币本身具有内在价值的重商主义观念，并代之以这样的证明：货币也是一种特殊，它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承受着不同的表现。^[101]这样，马克思便在第一篇末尾将他反证式地探明的资本主义“可能性的条件”具体化为五个前提：货币、交换、价值、劳动和商品。这是资本主义存在的部分根据。《资本论》中的共时性解释方法是马克思明确表达他的“结构的因果性”思想的叙述方式。^[102]

第一卷第二篇就开始谈资本问题，但第一篇所概述的五个前提（货币、交换、价值、劳动和商品）还不足以为资本的出现提供充分的根据。还必须有其他前提。就此，马克思在第二篇第四章引进了流通这一前提。“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103]但是，流通是另一必要条件，而至此阐明的全部前提还是不充分的，因为“仅仅靠流通来说明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是不可能的”。^[104]“上面已经说明，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因此，在剩余价值的形成上，必然有某种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况发生在流通的背后。”^[105]那种“发生在背后”的情况即另一根据，便是第六章（原文如此——译者注）中所介绍的劳动力的买卖。^[106]为了资本的存在就必须要有剩余价值，而且无疑地，产生于劳动力的剩余

劳动乃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但对可能性的条件的追溯并不就此止步，马克思还必须对“劳动力的买卖”发生的条件加以解释。他在第二篇第六章中深入说明了这一根据。“劳动的买卖”呈现着一种交换关系，因为必然存在着买者和卖者。拥有劳动力的人即劳动者必须作为卖者出现，而且这就要求他作为自由的劳动者出现在市场上，这一情况又决定了他是在推行圈地法案期间被迫离开土地的。以市场上劳动力的买卖为核心的交换关系，基本上再现了马克思在1857年《大纲》中用以开始他的经济学的那种生产——消费模式。劳动力的生产者是劳动者；他总得维护他自身。劳动力的消费者是资本家。

对于《资本论》的这一阐述方式必须从两个角度予以评价：作为一种文字的运用和作为马克思的探究方法的一种表述。作为一种文字的运用，《资本论》乃是对共时性叙述方式的一次探索。《资本论》阐明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此外，在对每一前提的说明中，马克思还详述了每一前提的复杂性程度；他论证了每一前提如何发生复杂程度的差异，以及这些虽然复杂性不一的前提又如何可能彼此交织在一起。

作为马克思的探究方法的一种表述，《资本论》的逻辑构架仍然是黑格尔式的。从存在的条件的基础出发的解释具有鲜明的黑格尔的特征。我在本章的前部分说明了黑格尔的原因概念，他的看法拒绝休谟的公式，而讲的是现象的条件。我们将看到，马克思借来了黑格尔的因果观，同时也借来了这种黑格尔式的解释。《资本论》试图透视资本主义的本质，但这里所说的本质不是黑格尔的内在性意义上的本质，而是阿图塞“结构的因果性”意义上的本质。通过透析基本的结构相关性，马克思认为他能够弄清特殊的经济范畴表现其形态的原因。

马克思的探究方法和解释方法确实在对历史的认识和撰写方面造成了一次巨大的“理论革命”。^[107]事实上，马克思发明了他

自己的一套历史编纂的分析和表现方法。他完全抛弃了历史循环论、实证论和进化论的分析形式，因为他觉得，基于事件的时间次序进行的解释是不充分的。马克思把历史从时间的支配下解放了出来。马克思的巨大革命就在于，他把19世纪历史和社会科学中公认的解释基础由时间转移到了事态的会合。此外，在抛弃作为解释规范的时间模式的基础上，马克思还把历史的功用从预言转移到了方法。由于实证论、历史循环论和进化论都把时间当作解释的规范，^[108]所以它们的解释形式便企图对未来的时间进程作出预言。马克思则是根据事态的会合来解释，所以他也就放弃了预言未来时间进程的企图，而集中于方法和反证。

以上对马克思的认识论、^[109]他的探究方法以及解释方法的探讨，清楚地说明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套用黑格尔的方式上的差异。这并不是说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全部区别都产生于他们对黑格尔的不同套用。他们对黑格尔种种不同的阅读、理解并不是原因，而是更深层次的智力偏差的结果。在马克思眼里的黑格尔，他提供的是指导一种社会研究方法论的重要逻辑线索。马克思没有接受黑格尔的任何形而上学，而只是采纳了他的逻辑学，马克思套用的是有助于他对一种经济生产方式的结构相干性作出解释的那些认识论范畴。在恩格斯眼里的黑格尔，他确实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因为恩格斯不是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分析社会结构的方法，而是把它视为构成存在的规律的东西。在恩格斯看来，这些本体论的规律主要可用来解释物理世界的过程，而不是社会领域的结构。由于他们对黑格尔的不同套用，所以马克思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而恩格斯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110]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不同套用，还表现在他们各自从他那里采用的逻辑范畴的区别。恩格斯采用了他所谓的辩证法的三个规律：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对立统一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

规律。按照恩格斯对它们的应用，所有这些规律都可以解释同样的现象；它们都说明了为什么赫拉克利特式的变化在物理世界是必不可免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黑格尔的范畴：“本质——现象”、“形式——内容”、“全体——部分”、“普遍——特殊”这些“辩证法的形式”，以及“规定”和“中介”，“否定”和“矛盾”等“辩证法的原则”。马克思所套用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范畴，并不是可用来对过程作出解释的逻辑形式，而是可用作解释一种生产方式的结构相关性的逻辑形式。

当恩格斯要分析社会运动的时候，他是用实证论的逻辑公式去解释社会的发展。恩格斯对社会的解释有四步程序：（1）正如存在着自然的规律，同样也存在着社会的规律；（2）正如有可能认识自然规律，同样也就有可能认识社会规律；（3）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是因果性的（休谟意义上的）；（4）既然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是因果性的，所以自然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决定论的。基于实证论的逻辑准则，恩格斯一直受缚于一种线性的解释形式。恩格斯的历史探究方法要求对事件或历史阶段的前后相继性加以明确。恩格斯一直局限于孔德主义的历史观，即直线性的观点，认为世界各地的一切社会都必然经历一些必要的发展阶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摒弃了这种解释社会的经验主义形式。

但是，在说明了马克思对经验主义的否定之后，重要的是应解释《大纲》与《资本论》第一卷之间在语言风格上的决定性转变。《大纲》的语言风格明白无误地是黑格尔式的。但到了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也就是在他写作《大纲》仅仅大约十年之后，那种盛行的黑格尔式的语言消失了。事实上，是自然科学的词汇起而代之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发表是在达尔文发表他的《物种起源》之后，当时正值自然科学巨大发展时期，所以马克思著作的语言风格也反映了这些事件。马克思

在第一卷中经常反复地谈到“规律”，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语言作了调整，以适合流行于科学加速发展时代的论辩方式。

例如，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写道：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11]

甚至《资本论》正文本身也处处可见社会“规律”的提法。事实上，大部分经济范畴都被表述为起着规律的作用。有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112]有简单流通的“规律”，^[113]有商品生产的“规律”，^[114]又有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规律”。^[115]但最重要的是，《资本论》中有两段话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使用规律一语的论辩策略和意义。现将它们逐一引述如下：

A，调节公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本书作者所引作 value，有误——译者）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而每一个手工业者，例如铁匠等等，在他的工场内按照传统方式完成他职业范围内的一切操作，但是他是独立的，不承认任何权威。^[116]

B，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117]

为了解这两段引文，有必要记住“比拟”（‘analogy’）与“套入”（‘imputation’）之间的区别。仔细阅读这两段话便可知，马克思并未“套入”，即没有断言规律以其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方式同样存在于社会“之中”。如果他是这样说的，那他就像象恩格斯一样采取一种实证论的立场了。毋宁说，这两段话表明马克思所使用的规律一词是一种“比拟”。他是在肯定社会总体的结构规则起着“类似”自然规律的作用。

例如，在第一段引文中马克思说，劳动分工“以自然（本书作者引作 value，有误——译者注）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在第二段引文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占有“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起着作用。最后，在摘自《资本论》的引文中马克思本人还对他所说的规律的意义作了规定，他不是休谟的意义上定义规律，而是把它定义为“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在这里转述的三句话中，马克思都用了介词“以”，而不是用动词“是”。他没有把以自然为模式的休谟式的自然规律的存在套入社会“之中”，而毋宁说他所设想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类似”自然规律的规范性现象。

在马克思看来，原因并不意味着事件 B 恒常地跟随着事件 A。马克思不从相继性或线性的意义上看待因果关系。他所思考的因果关系指的是社会由其结构所决定的运动。一个社会显示出某种现象，是因为该社会的结构给了它一种特定的重力。根据原因是总体结构的效应这一定义，马克思认为，我们对于某个社会结构的认识向我们表明的是该社会的某些趋势。我们得不到事件的恒常性意义上的规律，但我们确实了解依赖于其内在结构的社会单元的可能的或正常的效应。

《资本论》中其他一些段落也证实了马克思在谈到社会结构的规范性现象时，说的是“趋势”或“倾向”，而不是“规律”。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

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正常的趋势。”^[118]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像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的，”^[119]在这两段话中马克思声明了，当他谈到因果关系时，他指的是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具体表现的效应。事实上，在第三卷的那段引文中马克思说明了，“经济规律”其实仅仅是趋势本身。此外，在这段话中他还肯定地说，甚至“一般剩余价值率”这一概念的提出，也不是因为它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适用性的规律，而是为了“理论上的简便”。最后，在他1873年为《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写的跋中，马克思讨论了它的著作受到的一个评论，该评论载于彼得堡（Petersburg）的《欧洲通报》（*European Messenger*）1872年5月号上。^[120]马克思长篇地摘引了那篇俄国人的评论，以表明与根本抓不到他的要点的其它德国评论家相比，该作者很接近于他的意思。马克思对于这篇俄国人的评论最欣赏的地方之一，是该作者认识到了马克思并不企图推究一种对时空中的一切社会普遍有效的经济“规律”。该作者承认，马克思仅仅涉及英国资本主义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不妨记住马克思1872年对米哈伊洛夫斯基（Mikhailovsky）的历史发展理论的回答，那种理论认为，一切社会一定以规律性的方式跨越特定的必然的历史阶段。^[121]因此，马克思在解释一种社会结构的现象时，他总是把他的解释置于他所指的特定社会结构的背景之中。

其实，仔细阅读《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便可知道，马克思不承认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着必要和充分意义上的规律^[122]。第三卷第十三章是对规律本身的说明。但紧接着的第十四章讨论的是“反作用的影响”，即那些效应，它们“阻挠和抵销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就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作趋向下降。”^[123]于是，马

克思在第十四章中列举了“阻挠和抵销”利润率下降的六种矛盾趋势：(1) 剥削程度的提高；(2) 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3) 不变资本要素变得便宜；(4) 相对过剩人口；(5) 对外贸易；(6) 股份资本的增加。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内部存在“阻挠和抵销”这一“规律”的趋势，而且“规律本身”还存在着“内在矛盾”。在第十五章中，马克思进而开列了那些固有的矛盾，以破除认为利润率的下降存在着一种“规律”的虚妄看法。他列举了两个基本的内在抵销因素：(1) 生产的扩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的冲突；(2) 过剩资本和过剩人口的出现。

因此，马克思驳斥了两种意义上的经济“规律”概念。首先，他否认规律以事件的恒常性的意义存在于社会中。其次，他否认规律在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意义上存在于社会中。关于第一点，马克思写道：“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124]关于第二种意义，马克思屡次否定了一种社会结构的趋势可以普遍适用于其他社会结构，他断言：“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125]

无论是马克思的探究方法还是他的解释方法，都绝不允许我们对历史的未来作出预言。不过，我们最好别忘了预言与预测二者的区别。预言是根据当代现象内在的条件和机制作出的一种演绎。预测则是根据当代现象内在的条件和机制作出的一种假说。^[126]正如我已经说明的，马克思的方法不是演绎的。他没有从一般规律演绎出特殊的事件。这样一个过程恰好是他的方法的反面——他的方法是反证式的。但是，根据我们对一个社会的现有结构及存在的先决条件的认识，还是能够形成关于该社会未来

运动的某种假说的。如果存在着，而且确实存在着现象的趋势，那么也就存在着未来发展的趋势。这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马克思所提供给我们东西，它是一种关于被视为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的效应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假说。马克思的历史观直接驳斥了一切决定论者从普遍管用的规律演绎出历史进程的企图。

注 释

[1]我已经提到过 Lucio Colletti 的两本书，Marxism and Hegel 和 From Rousseau to Lenin，但是，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差异论述得最好的是 Colletti 的第三篇东西。我是在完成本书之后才读到他的那篇文章，他在该文中正确地叙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不一致的主要方面。见 Colletti 为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写的“导言”，Rodney Livingstone 译（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pp. 7-56。

[2]Gerald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32. 虽然我不同意 Cohen 的观点，但这是一部特别明晰的著作。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地位感兴趣的人不可不读它，它那简洁明了的文风对读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Cohen 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不存在丝毫差异。他这一学派的其他成员，即 William Shaw, D. Ross Gandy 和 John McMurtry 等人也看不到任何差异。关于 Cohen 学派这些其他成员的观点，请看下列著作：William Shaw,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D. Ross Gandy, Marx and Hist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该书是 Cohen 学派很有意思的一部代表作，但它本身既不深刻，也没有什么新意，都是从 Cohen, Shaw 和 McMurtry 那里贩来的货色，只有 Gandy 对非西方经济方式的讨论算是最精彩的部分。John McMurtry, 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是一部优秀的著作，它写得象 Gerald A. Cohen 那样明晰，对马克思的人类学作了某些富有洞见的评论。McMurtry 是位哲学家，所以他在本来漫谈式论述更好的地方往往罗列许多概念。

[3]当代世界论述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作家还不止这些。这里列举

的一部分,只是让读者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较有创见的那些人物。这里提到的作者的全部书目如下:Oscar Negt, 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0); Helmut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0); Roman Rosdolsky, Zur Entstehungs - Geschichte des Marxistischen 'Kapital'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9); Alfred Schmidt,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9)。

[4] Stanley Rosen, G. W. F. Hegel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56.

[5] Jean 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Samuel Cherniak and John Heckma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Hyppolite 是当代最杰出的黑格尔思想的解释者之一。在这部具体的著作中涉及马克思的并不多,但为了了解 Hyppolite 对黑格尔的理解,它是重要的读物。它把《精神现象学》描述为一部遥远的传奇。Hyppolite 是从哲学人类学的观点来解释《精神现象学》。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是 Hyppolite 的 Hegel and Marx 的必要入门,因为在 Hegel and Marx 中,Hyppolite 对《资本论》提出了一种哲学人类学的解释,从而把《资本论》跟《精神现象学》联系起来。我的观点跟 Hyppolite 不同。我不集中于异化问题,而集中于马克思的逻辑的方法论。

[6] G. W. F.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trans. A. V. Miller (London: Allen & Unwin, 1969), pp. 63 - 4.

[7] Ernst Bloch, Subjekt - Objekt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2) pp. 155 - 78.

[8] Emil L. Fackenheim, The Religious Dimensions in Hegel's Thought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7)。

[9] 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60.

[10] Charles Taylor, Hegel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95 - 300.

[11] 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61.

[12] Hans - George Gadamer, Hegel's Dialectic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83.

[13]G. R. G. Mure, A Study of Hegel's Log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0), p. 94.

[14]G. W. F.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trans. J. B. Bailli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p. 179 - 213.

[15]Taylor, Hegel, p. 263.

[16]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p. 112.

[17]Mure, Study of Hegel's Logic, p. 108.

[18]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444.

[19]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448.

[20]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449.

[21]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450.

[22]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441.

[23]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455.

[24]Taylor, Hegel, p. 266.

[25]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09.

[26]Hegel, Phenomenology of Mind, p. 203.

[27]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11.

[28]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03.

[29]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04.

[30]Hegel, Phenomenology of Mind, p. 195.

[31]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07.

[32]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24.

[33]路易斯·阿图塞虽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却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一个哲学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一切的时代,阿图塞发挥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客观主义传统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阿图塞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于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从政治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工具,而且它要想改变社会,就必须同时是分析社会的工具。这是阿图塞提出的重要论点之一。他在提出这一论点时重新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政治的方面。关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社会的政治和哲学干预形式这个问题,请看阿图塞的 Lenin

and Philosophy,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阿图塞从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分析的工具的观点出发,提出了结构的马克思主义。阿图塞注意到了使结构的整体概念与结构的精神——机体观相分离的重大区别。阿图塞认为,黑格尔代表结构的精神——机体观,这是一种浸透了本质先于存在论的语言和思想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则简单地把整体规定为它的部分的总和,并把整体的特征理解为由各部分相结合的经验的方式所决定。由于阿图塞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具有不同的结构观,他便合乎逻辑地论证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认识论上的决裂”。关于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有趣评论,请看他的 *Politics and History*,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34]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29.

[35]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29.

[36]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49.

[37]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52.

[38]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57.

[39]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55.

[40]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66.

[41]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66.

[42]Hegel,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p. 223.

[43]Hegel,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p. 226.

[44]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623.

[45]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625.

[46]Hegel,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p. 285.

[47]Hegel,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p. 284.

[48] Barry Hindess 和 Paul Hirst 的著作代表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Hindess 和 Hirst 把他们的理论工作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一种批判分析。他们响应理性主义的批判传统,认为在进入对社会的考察之前,必要的第一步是达到准确的概念。他们的著作的弱点是,马克思主义过分地变成了一种理论的实践。虽然他们的分析能力是属于高层次的,但他们过分地陷入了依赖于精神的王国。他们对概念的分析给人以启发,但它也使人迷惘和厌烦。大凡读到他们的著作的末尾,诸者便需要沉思于经验的证据。两位

都是多产的作家,但跟我们这里的讨论有关的著作是:Barry Hindess and P. Hirst, Pre - 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77); 还有 Barry Hindess,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77)。

在前面的注释中我提到过阿图塞的其他著作,但对阿图塞所说的“认识论上的决裂”的最广泛的讨论,见于他的 For Marx 一书, Ben Brewster 译 (London: Allen Lane, 1969)。Hindess 和 Hirst 否认马克思的方法具有一种认识论的基础;阿图塞和 Etienne Balibar 则论证有一个认识论的基础,这一论证在阿图塞的 Reading Capital 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该书译者是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很明显,在本章中我是同意阿图塞和 Balibar 的看法,即要探究马克思的方法的概念基础。

“存在的条件”一语我是借助这样一部著作:Barry Hindess and Paul Hirst,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Vol. 1, p. 223.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的第一卷写得很出色,充分地探究了马克思的阶级和经济构成概念的定义。Hindess 和 Hirst 都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的第二卷似乎要差一些,不然我就不会对它关于货币、物物交换和资本主义的自私打算的讨论有如此的兴趣。

[49][50][51][52][53]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3 卷,第 203、342—343、24、24、24 页。

[5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3 卷,第 9 页。

[55][5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6 卷,上,第 36、38、22 页。

[57]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3 卷,第 47 页。

[58]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9 卷,第 49 页。

[59][60]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5 卷,第 892—898、906 页。

[61]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190页。

[62][63]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893—917、432—434页。

[64]在下列著作中,可以找到对我们这里论及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奴隶生产三种经济形式的某些很好的描述和分析: D. Ross Grandy, Marx and History; Barry Hindess and Paul Hirst, Pre - 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以及 William Shaw 的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鉴于这个以及其他原因, Perry Anderson 的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具有特别的价值。Anderson 不仅帮助了规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罗马奴隶制的含义,而且他的著作第一次试图把马克思方法论的新理论应用于从罗马到封建主义的到来的西欧的发展。Anderson 的著作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工作的重要著作,因为它提出了经济方式、经济结构的概念,去解释中世纪欧洲史的全面概貌。他的另一部著作, Innegate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将历史继续写到了法国革命,同样写得不错。他的成就就是推翻了认为马克思坚持直线发展的历史观的陈旧看法,并结合生产方式的概念,证明马克思完全清楚,符合其内在结构一致性的本性的不同社会的历史发展,有可能是多元的、多样的。

[6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卷,上,第36—37页。

[66][67]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102—111、110—200页。

[6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卷,上,第15页。

[6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卷,上,第26页。马克思借用三段论的另一个例子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08—209页。

[7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卷,第8—9页。

[7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卷,上,第151页。

[72][73]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122、122页。

[74]Maurice Godelier,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trans. Brian Pe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虽然我在读到 Godelier 的著作之前已经得出了我的全部结论,但我还是要承认这部有力的著作对我的惠益,因为他那惊人的简明精确的表述阐明并扩展了我所猜测到的许多问题。Godelier 看到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裂痕,而在这一点上我的立场与他相反。马克思受益于黑格尔, Godelier 则大大地受益于 Levi - Strauss, 并使 Levi - Strauss 的结构主义左右他对马克思的解释。不管 Godelier 受到哪方面的影响,他的这部著作对于每个有兴趣于马克思的人都将是有所裨益的。

[75]Terrell Carver, *Texts on Method* (Oxford: Blackwell, 1975), p. 207.

[76][77][78][79][80][81][8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卷,上,第48、38、42、42、42、42、39页。

[8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卷,上,第108页。这段话不是引自“导言”的。

[8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卷,上,第39页。

[85]Hegel, *Science of Logic*, pp. 444 - 78.

[86][87][88][89][90][9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卷上,第44、43、46、45、43、46页。

[92]Derek Sawyer, *Marx's Method*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9), p. 109. 按照我对 Godelier 的评论,我发现 Sawyer 的这部著作是大有帮助的。Sawyer 跟 Balifar、阿图塞和 Godelier 一样,试图找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础。Sawyer 也把结构主义的解释应用于马克思。该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了价值和利润之类的经济学问题。对价值的探讨写得很精彩,但该书的真正高潮是它的第二部分,其中 Sawyer 讨论了《大纲》的“导言”。这第二部分对我自己关于《大纲》“导言”的论著是很有用的。

[93]关于预言与预测之间的不同的讨论,见本译稿本章第210—217页。

[94][95][96][97][98][99][100][101]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19、48、47、48—54、54、60、102—109、

110--166页。

[102]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103][104][105][106]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167、186、187--188、189页。

[107] Althusser, For Marx. 关于对阿图塞的有趣解释,请看 Robin Blackburn and Gareth Stedman-Jones, 'Louis Althusser and the Struggles For Marxism', in The Unknown Dimension, ed. Dick Howard and Karl Kla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2), pp. 365 - 87.

[108] Eric Hobsbawm,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in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ed. Robin Blackburn (London: Fontana, 1972), pp. 268 - 9.

[109] 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的其他研究见下列著作: Jean Hyppolite,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trans. John O' Neill (London: Heinemann, 1969)。

George Lukacs, Der Junge Hegel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2)。在该书中,卢卡奇证明了黑格尔早期的人道主义如何继续表现在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中。正如我在前一章所说明的,黑格尔对于列宁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探究黑格尔对列宁的政治行动主义态度的影响的文章,请看 Michael Lowy, 'From the "Logic" of Hegel to the Finland Station in Petrograd', Critique (Spring, 1976), pp. 5 - 15.

我曾提到过 Godelier 的著作。Auguste Cornu 同意 Godelier 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的看法,他写了一部三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传。请看 Auguste Cornu,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Berlin: Aufbau - Verlag, 1954 - 7), 3 vols.

我已提请注意 Derek Sawyer 的 Marx's Method。在探讨马克思的方法论时,应查阅 Stuart Hall 的 'A "Reading" of Marx's 1857 Introduction to the Grundriss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irmingham: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no. 2, 12 November 1973. Stuart Hall 对《大纲》的“导言”、关于马克思的方法论以及关于反证的问题,有一些有趣的见解。

关于对阿图塞的评价,请看 Barry Hindess 的著作: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在该书中 Hindess 对阿图塞提出了最强硬的批判。Hindess 痛斥了阿图塞关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分,他声称,阿图塞对科学的

攻击也就是对经验主义的攻击,并从而抹杀了精神或范式与实在之间的相互联系。正如我在前面几个脚注中所说,Hindess 对马克思的研究,采取的是对概念及其构成性性质的理性主义批判态度。

[110]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Vol. 5, pp. 28 - 9.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 卷,第 32—35 页(经查阅,中译本中并无此注正文所说的意思,这里只是作者的某种分析——译者注)。

[111][112][113][114][115][116][117][118]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3 卷,第 8、188、180、643、649、396、832、355 页。

[119]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5 卷,第 195 页。

[120]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3 卷,第 20—23 页。

[121]Karl Marx, 'Letter to Mikhailowsky', in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 David McLellan, pp. 571 - 2 (此信未查到中译本,故按原文注——译者注)。

[122]Barry Hindess 对马克思关于一般社会规律和特殊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的看法问题,作了精彩的论述。参看他的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第二卷。特别请看第二卷第二部分 'Capital and Laws of Tendency'。

[123][124][125]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5 卷,第 258、275、289 页。

[126]Sawyer, *Marx's Method*, p. 139. 同时请看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第四章

走向《资本论》的重建

马克思亲自哺育了《资本论》第一卷，直至它的出版。可惜的是，它的原稿已经丢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笔记编辑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幸运的是这两卷马克思的原始手稿还在。虽然恩格斯在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序言”中简要地说明了他重新编排马克思的原稿的方法，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恩格斯的编辑工作未加改变地保留了马克思的意图和要旨。本章仅限于讨论第二卷的第一篇，初次尝试对恩格斯在印行版中所作的修改的程度和性质，作一详尽的评价。通过把用作第二卷第一篇的马克思的原稿跟恩格斯编定的第二卷版本相对照，可以揭示两个问题：首先是恩格斯实际改动马克思原文的程度；其次是恩格斯版本改动的种种手段和意义。^{〔1〕}

在进入本章的主体部分之前，有必要进一步界定讨论的范围和意图。由于本章分析的材料极为细致，往往涉及单个词语的变化，所以利用的仅仅是第二卷很少的和易于处理的部分。为了透彻地、不可辩驳地证明恩格斯的修改情况，我们的考察仅限于有限的领域。

我们不想对马克思的原文加以诠释。实际上，强调的重点将是恩格斯的修改，可以说是对恩格斯的编辑资格的一种审查。为了弄清恩格斯版本改动的种种手段，要用到几个修改方面的范畴，它们是（以在本章中出现的先后为序）：释意，更改时间，

重新编排，增添，删节，改述，变动结构和数学方面的改变。

所谓释意，我指的是恩格斯用他自己的语言去囊括马克思好几页原文的意义。在谈到恩格斯的释意时，我至少要涉及马克思原文四、五页的内容。时间的更改指的是恩格斯破坏了马克思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第二卷第一篇开始的内容并不是最早写下的手稿，而是在时间上写到最后的手稿。重新编排指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原来章节的变动。马克思最初计划第一章分为三节，恩格斯却把它重新编排为多达六章和很多节。增添指的是恩格斯把自己的语句加到马克思的原文上，而又不加脚注说明是他自己的东西。删节指的是恩格斯略去马克思原来的一些语句，同样未加脚注予以说明。改述指恩格斯变动了马克思的个别词句，也没有说明他对马克思的措辞的这种更换。所谓变动结构，我是指恩格斯对一些段落或句子（不是章节）次序的改变。恩格斯常常在原文中插入一些脚注和补充说明，从而改变了马克思行文的流畅性。恩格斯还常常在原文中插入取自全然不同的手稿，来源的材料，打乱了马克思原来的顺序，而且又是没有向读者作出说明，造成了读者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的实际原稿的印象。数学方面的改变指的是一些算式计算方面的变动。

确定了恩格斯的版本改动情况的上述分类之后，就有可能细致地审查恩格斯对马克思原文的理解了。在这方面，本书将探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审查恩格斯借以解释马克思原作的概念形式，以及恩格斯赋予马克思的原文的概念形式。

不过，在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本来意义（在我们这里所定的范围内）跟恩格斯对这些题材的理解加以比较时，也须记住两种不同的变化：一是重点的转移，二是意义的变换。

“重点转移”一语指的是结构和重心的变化。“重点转移”还将用来指不涉及所用方法的语气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质上是不改变意义的。

“意义变换”将用于指对作者思想意向的改变。

本章将对“重点转移”从正面加以证明。恩格斯作出结构上的改变的确切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恩格斯同时热衷于“意义变换”这一点，本章仅视之为一种可能性。

为了认定“意义变换”的真实性，有必要确切地了解马克思整个《资本论》的意图。有必要阅读马克思的每一页原始手稿和第一卷，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地接近《资本论》的“意义”。但这样一种分析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本章的探索仅限于第二卷第一篇。由于这样一种自身约束的限制，所以其结论也必然是有节制的。

本章的目的是通过集中讨论第二卷第一篇来认定整个《资本论》“意义变换”的可能性。通过证明第二卷第一篇的“重点转移”，本章认定在此范围内还发生了“意义变换”的可能性，并推而广之，在整个《资本论》中也出现了“意义变换”。换句话说，为了最后结论性地认定恩格斯的编辑工作是否带来了“意义变换”，或者说恩格斯的版本事实上是否忠实于马克思的意图，就必须对马克思的全部原始手稿加以研究。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原始手稿收藏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国际社会历史学院（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另外，恩格斯编辑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原始手稿也收藏在那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 - Engels Werke*）的《资本论》第二卷依据的是恩格斯的原稿。根据本章的目的，将把马克思的原稿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资本论》作比较。读者在阅读本章时手头最好有一本1976年迪茨（Dietz）版的《资本论》。为了阐明恩格斯对原文修改的意图和方法，本章将提到迪茨版中的一些具体词语、句子和段落。所以手头若有本迪茨版便于参看谈到的地方，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本章的论述的。关于恩格斯用作编辑第二卷第一篇的全部手稿的情况，请参看本章

后面的“索引A”。

恩格斯在1885年的第二卷序言中叙述了他据以编辑第二卷的马克思留下的手稿的情况。据恩格斯说，马克思开始写作第二卷的时间是在完成第三卷的大部分之后（1864~1865年间），而且是在他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作好了准备之后。在1865~1870年间有四份对开纸手稿。恩格斯发现手稿I是没有用的。手稿II上记的时间是1868~1870年，却是第二卷的一份近乎完整的提纲。手稿III大多是引文和对亚当·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批判，所以大部分也是没用的。手稿IV提供的是第二卷第二篇第一章的提纲，恩格斯发现它对第一篇也很有帮助。手稿IV有意思地增加了手稿II的内容，所以为我的讨论第二卷的一些重要部分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马克思在1870~1877年间停止了第二卷的写作。这一中断是他的病情造成的。但在这七年间马克思大量阅读了土地比较史、地质学和生理学以及数学方面的书籍。1877年他又开始了第二卷的写作，一直持续到1878年。这两年间他又完成了四份对开纸手稿，第二卷共计便有了八份原稿。

手稿V完成于1877年3月底，它试图重新考虑和重新构造第二卷。这一稿虽未完成，且仅包括第一篇的开头四章，但它是对第一篇的这一重要部分所作的最后的深思熟虑的表述。写于1877年10月和1878年7月间的第VI稿（原文有误——译者注），是马克思准备第二卷付印稿的第一次尝试。但这次马克思还是没有多大进展，他只完成第一篇的第一章。写于1878年7月2日的第VII稿也只有第一章。

手稿V体现了经过七年的间歇后马克思对第二卷第一篇最重要的观点的重新考虑和重新阐述。第二篇没有重大的理论困难。但马克思决定用第三篇专门讨论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事实上手稿II已经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不过没有提到货

币的流通。因此便有了第Ⅷ稿或第二篇，表述了对社会资本在其与货币流通相联系方面的更广阔的看法。

国际社会历史学院所拥有的马克思手稿的清单，与恩格斯所说明的马克思的文字遗产几乎完全一致。学院的清单上开列了属于第二卷的八份对开纸手稿。但第一份手稿，即恩格斯说没有用的那份，缺掉了。它要么丢失了，要么藏在其他某个马克思档案馆，也许在莫斯科马列学院。因此阿姆斯特丹的清单上的第一项便是手稿Ⅱ。根据该学院对马克思手稿的编号，我们发现 A63 相应于手稿Ⅱ，A64 为手稿Ⅲ，A65 为手稿Ⅳ，A66 为手稿Ⅴ，A67 为手稿Ⅵ，A68 为手稿Ⅶ，A69 为手稿Ⅷ。编号 A70 的严格说来不是一份手稿，而只是与第一篇第四章有关的三页文字。因此在目前已知现存的有七份手稿，它们构成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但其中有一份手稿的绝大部分内容一直没有发表，这就是手稿Ⅲ。恩格斯把它主要地视为无用的，它在国际社会历史学院的收藏编号是 A64，没有收入到第二卷中去。其中有用的部分也许收进了第三卷。因此，马克思八份对开纸原稿有一份和另一份的绝大部分至今尚未发表；手稿Ⅰ至今下落不明；手稿Ⅲ（A64）（原文有误——译者注）的大部分仍未发表。国际社会历史学院还拥有恩格斯已发表的著作的清单，《资本论》第二卷的恩格斯的稿本，在编号为 H80 的大宗文稿中。

但是，要把马克思的手稿完全编好号，远比上述情况复杂。马克思的笔记本分为上下页。上页写的是马克思的实际正文，下页一般用作写脚注、后来对正文的添加内容或解释（补充说明）。马克思对他的笔记本采用的是水平划分。相反，恩格斯对自己的笔记本采用的则是垂直划分，恩格斯的笔记本不是分为上下两部分，而是分为左右两部分，他用每页的左边写正文，右边写增添的内容或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字遗产有三个独立的编号系统。每一份

完整的手稿都有一个号码，如马克思的 A68。另外，每份手稿的每一页，或马克思—恩格斯文字遗产的每一页也都有个号码，如 A48/1（原文如此——译者注）。再则，在马克思那里，笔记本的上下两部分也各有标示，如 NH1A 或 NH1B。因此在查看马克思的手稿时，读者会发现三种不同的数字记号，一个标示笔记本号，一个标示页码，还有一个标示一页的划分。例如，使用迪茨 1976 年版的第二卷，关于其中第 31 页的最后一段，就必须用到三个数字记号才能找到该段落所来自的马克思手稿的准确地方。这三个数字记号是 A68，A48/1（原文如此——译者注），NH1A，指的是它来源于手稿 A68（即手稿 VII）、其中的第一页、而且是该页的上半页。

凭什么特征确认马克思的段落的准确出处，这对于正确地译解和重建《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至关重要。例如，马克思是用笔记本的底部即 B 部分写脚注、他想包括在正文中的添加内容和他不想包括在正文中的解释（补充说明）。在这 B 部分中，马克思用以标明脚注的符号是 A、B、C；他用 ×、××、××× 等标明他肯定想在修改稿中包括于正文的添加内容；解释性的材料是要跟正文脱离开来的，所以他像黑格尔那样用 1、2、3 之类数字标示。举个这方面的例子：手稿 V 第一页的底部（A66，A/45【原文如此——译者注】，NU1B），马克思记了“补充说明”字样，然后用阿拉伯数字标出每个解释性段落。马克思把脚注和解释性文字分开写在各页的底部，这种做法跟黑格尔相似，也符合他自己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因此很可能他是想他的第二卷完成稿的补充说明和脚注也作如此处理。

恩格斯违背了马克思的意图。脚注（用字母编号）、增添（用 ×、×× 编号）和某些补充说明（用阿拉伯数字编号）被移到了正文中。所以把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跟马克思相应的手稿对照，便经常发现恩格斯把解释性的材料和脚注

包括到了正文本身之中。此外，恩格斯不仅把补充说明从下半页搬到了同一页的上半页，从 NH1B 搬到了 NH1A，而且把根本不同页、有时甚至前几十页的下半页的补充说明搬到某处上半页中，如把 NH13B 上的一个补充说明搬到了 NH3A。常常在某处下半页有多个补充说明，他又会移动一些而留下另一些，或把它们插入上半页不同的段落。

因此，在重建《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时，弄清稿次（如 A68）、页码（如 A48/1）和上下页（如 NH1A 和 NH1B）的标记是很关键的。为了证明恩格斯是怎样重新构造第二卷的某些部分，必须能够把稿次、页码和上下页的情况分别开来。例如，关于第二卷 1976 年迪茨版的第 108 页，恩格斯是从马克思的手稿 A66、A45/47 的下半页 NU48B 开始的。但七行以后，恩格斯却跳了一页，把 NU49B 上的内容掺了进来。九行以后这一段完了，但接下一段又回到了 NU48B 上的内容；再下一段又回到 NU49B。这 108 页的最后一段又回到了 NU49A 上的材料。这里的问题是，为了说明恩格斯编辑的第二卷的一些具体的段落确切地来源于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哪些部分，必须有一个准确的关于稿次（如 A66）、页码（如 A45/47）和上下页（如 NU48A 和 NU48B）的查找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把恩格斯重新构造的错综复杂情况搞清楚。

在恩格斯的第二卷原稿对开纸 H80 号中，他说明了他的编辑所遵循的手稿次序。在迪茨版第 28 页上开列了马克思的手稿分别用于第二卷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三篇的次序。^[2]但这个单子纯粹是恩格斯手稿中的脚注的汇集。东德人和俄国人简单地认为恩格斯没搞错。他们的看法反映了一种普遍的世界性观点，即不加批判地听信恩格斯，不加怀疑地照搬他所写的东西。恩格斯的那个排列次序既有错误又不完全。总之，恩格斯是在说假话，东德人则不加思索地照搬这些谎言。况且恩格斯列举的既不充分又

不准确。他简单地把手稿排列出来，却不说明每一手稿的那一部分是他采用了的或舍弃了的。对于他把补充说明或脚注掺入正文、改词换句、重新编排等做法也未加说明。照迪茨版中恩格斯的解释，好像恩格斯是在搭积木，只把每份原稿彼此拼在一起。但这只能极有限地说明恩格斯的实际做法。他确是在搭积木，但他同时又从根本上重构了原文。因此，本章是批判地审查恩格斯的说明的第一次尝试。它是第一次试图弄清恩格斯事实上是否按照他说的去做了。本章的结论是，恩格斯实际上的重建工作远远超出了他自己所辩解和表白的忠实。

在此必须说明一下恩格斯自我感觉方面的情况。需要把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所造成的后果或结果区分为有意性和无意性两个方面。在有意性的即有意识的目的方面，恩格斯决心希望的结果是能够传达马克思著作的真实目的和意图。恩格斯决无故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理论目的的打算。但“重点转移”甚至“意义变换”是可以无意地造成的。无意性涉及的是理解、判断和认识问题。有意和无意的区分必然涉及愿望与逻辑之间的差距。所谓有意，即恩格斯愿望的是传达马克思的合理意图。所谓无意，即恩格斯确实把次序和内容的改动引入了原文。谈到恩格斯的无意性，我们不得不面临恩格斯对马克思原文的理解问题。无意可能是偶然造成的，也可能是缺乏理解造成的。偶然性的无意只能暴露偶然因素的作用，缺乏理解的无意则表明理解能力问题。对于恩格斯，我们讨论的是贫乏的理解造成的无意性后果。恩格斯无意地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引入了“重点转移”或“意义变换”，尽管他有意地希望照搬马克思的意图。原因就在他自以为理解了马克思的意图，而事实上他是误解了马克思的意图。

恩格斯在研究马克思的八份手稿时，他必须认定，是一份手稿还是某几份合起来最能体现马克思的意图。恩格斯有意地把自己的作用视为主要地是复制。所以他决定选择第二种编辑方法，

即尽可能多地把八份原稿结合起来。显而易见，恩格斯的出发点是，马克思的话语和思想都是至关重要的和富有洞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这些话语和思想都引起公众的注意，成为公众的知识。在这一点上恩格斯是很明确的。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他解释道：“我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接受了这种委托；我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3]在第三卷的“序言”中他重复了同样的编辑方针：“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当机立断，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的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4]还有大量信件也证明了他对自己的编辑责任的这一认识。^[5]

1870年前和1877年后两个时期的手稿是有区别的。手稿Ⅰ（1865~1867年）和手稿Ⅲ（1867~1870年）的绝大部分或大多被恩格斯抛弃了。而手稿Ⅱ（1868~1870年）结果却极受重视。第二卷第一篇的目录是从手稿Ⅱ来的。^[6]恩格斯显然认识到要以马克思手稿Ⅱ中的目录作为第二卷第一篇的基本结构，因为马克思在1877年后的笔记中提到：“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础”，^[7]恩格斯就是把这句话奉为指令。

虽然上述分析主要涉及第二卷第一篇，但在此值得指出的是，整个《资本论》第二卷的大多数篇幅都是来自手稿Ⅱ。迪茨版的第二篇只有5页例外，总共有187页属于手稿Ⅱ。此外，第三篇共167页中有41页取自手稿Ⅱ。在马克思的所有原稿中，手稿Ⅳ是最便于付印的。它写于手稿Ⅱ之前，约在1867年，是对整个第一篇和第二篇第一章的修订，^[8]但迪茨版中仅第124~153页（第一篇）和第154~163页（第二篇）是取自该稿。有趣的是，被恩格斯本人称为“已经可以付印”和“形式上比较完整”^[9]的手稿Ⅳ，他却只采用了原有篇幅的1/4。相反，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Maximilien Rubel）在他自己重编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收入他的《马克思全集》（Marx: Oeuvres, 第二卷，

Gallimard, 1968) 中却采用了几乎整个手稿Ⅳ作第二卷第一篇的材料。鲁贝尔这样做是因为手稿Ⅳ最有条理最完整, 因为手稿Ⅳ最明确地表述了马克思的论点, 同时又避免了重复累赘。^[10]手稿Ⅳ也许写于 1867 年, 但肯定在 1867~1870 年之间, 那时马克思精力最旺盛, 所以它对包括三个循环的资本流通过程作了全面的总结和广泛的解释: 这是与对资本主义流通的每一个循环作精细的经验研究不同的一种分析, 一种方法论的通观。

自 1877 年以后, 马克思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明显地日益下降, 那时的手稿Ⅴ构成了恩格斯编辑的第一篇的主要部分。按照恩格斯本人的看法, 1877 年马克思很想修订第二卷, 为“重新修订第二卷”打下基础,^[11]这次重新修订的结果就是手稿Ⅴ。这次修订虽“还没有怎么加工”,^[12]却包括了第一篇的开头四章, 而且尽管它还不是定稿, 却“是对第一篇的最重要部分的最后的完整的论述”。^[13]手稿Ⅵ写于 1877 年 10 月以后和 1878 年 7 月以前, 只有几页对开纸, 是以手稿Ⅴ为基础整理出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的尝试。虽然恩格斯说明了他对手稿Ⅵ的使用, 即迪茨版第 42~45 页采自该稿, 但恩格斯的工作难以叫人承认, 因为马克思本人写的手稿Ⅵ又被他自己划掉了(关于手稿Ⅵ的性质问题本章后面还要谈到)。手稿Ⅶ是根据手稿Ⅴ整理付印的第二次, 又是无效的尝试, 它写于 1878 年 7 月。但马克思只完成七页对开纸。很明显, 1870 年即手稿Ⅴ以后马克思再也没有能力有效地写作第二卷第一篇了。但是, 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 这是一个他以前没有深入探讨的题目。因此出现了手稿Ⅷ, 它将包括第三篇的大部分内容。自 1877 年以后的时期, 包含马克思最丰富的思想的手稿是第Ⅴ稿, 它写于第二卷的写作中断七年之后, 本来被视为是对第二卷讨论的问题的新探讨。

马克思遗留给恩格斯, 恩格斯后来把它们编成第二卷第一篇的全部手稿, 都是讨论资本流通问题的。在第一卷中马克思提供

了对 $M-C-M'$ 公式的批判分析，他认为这一公式表达了资本的本质意义。^[14] 资本是通过生产手段或流通过程控制和引导商品（劳动是一种商品）的能力。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中，马克思描述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他说明了货币怎样支配商品，变成资本，并通过对商品的控制扩大和膨胀自身。^[15] 当然，商品即交换对象的存在乃是资本的发展、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的生产的一个必要前提。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被交换的商品是劳动。为了使劳动成为一种商品，成为某种被交换的东西——其存在在购买和出卖中实现，劳动就必须成为自由劳动。当劳动被分离出来，脱离了生产资料，它便成为自由劳动或一种商品。在农业革命时期，独立的农民被分离了土地，不再能够通过耕种土地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他便被迫作为劳动出卖者进入市场。他出卖自己的劳动以便获取工资购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条件下，他的劳动便是一种商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想要说明的是，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怎样成为一种商品被购买，以及在生产过程之后货币怎样得到膨胀和增加。为了说明 M' 怎样从 $M-C$ 中演化出来，马克思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1）通过延长工作日生产绝对剩余价值；^[16]（2）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通过使用机器和工具提高劳动强度和生产率，生产相对剩余价值。^[17]

但是，第一卷所围绕的 $M-C-M'$ 这个公式并不能囊括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方面。马克思希望写作一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全面系统的分析的著作，可在他对生产的分析中实质上忽略了流通过程。他没有充分说明商品怎样以购买的方式出现在市场上，以及货币实际上怎样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购买作为劳动形式的商品，即为了商品在创造剩余价值之后以增殖了的销售方式再次出现，为了世界规模的商品销售，从而为了商品再转化为增殖形式的货币。为了讨论流通的不同阶段，必须用 $M-C \cdots P$

…C'—M'的公式代替M—C—M'的公式。马克思在讨论M—C…P…C'—M'时分析了这整个公式，然后分析了它的三个循环（首先是M—C，尔后是P，再后是C'—M'），并进而描述了国内规模及国际规模的商品销售过程。这就是恩格斯编入第二卷第一篇的马克思的那些笔记的任务。^[18]

在恩格斯宣称对他没有用处的那五份手稿中，马克思显然在煞费苦心地思索着可以表述他对流通过程看法的最佳方式。若承认恩格斯的说法，那么马克思就实质上留下了关于资本流通过程及其各次循环这个总题目的五份较为不完整的文稿。马克思讨论了货币、商品、生产过程等不同形式的资本流通，而且基本上写下了对于M—C…P…C'—M'问题的五种不同看法。他意识到自己心力日渐衰退，所以对这些文稿都不满意，只有手稿Ⅳ例外，因为它对流通的单个循环过程的讨论既不很详尽也不很明确。确切地说，手稿Ⅳ的重点是总的流通过程。在该稿中马克思集中讨论了流通的整个和一般运动，其中单个的循环是整体过程的表现：流通被当作是一种本质性的社会关系的表象，这种社会关系即是资本主义的。^[19]但在1877年，马克思好象改变了他的看法，或至少变换了重点，因为在手稿Ⅴ中，他集中的不仅是M—C…P…C'—M'（原文有误——译者注）整个式子，而且是那些独特的和单个的循环。手稿Ⅳ和Ⅴ围绕的焦点、重点和重心是有差异的。在手稿Ⅵ中最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自己工作的不满，对准确表述他的理论概念的形式所作的呕心沥血的探索。恩格斯声称他采用了这份手稿，这似乎既犯了个判断上的错误，又违背了事实。如果马克思想使用这份手稿，他就不会划掉它。马克思之所以划掉它，表明他自己也认为它没有用，没有思想价值。此外，迪茨版中恩格斯声称采自马克思手稿Ⅵ的那几页，事实上在手稿Ⅵ的印件中是不存在的，就连划掉的也没有它们。那有可能是恩格斯对手稿Ⅵ的诠释，不可能是他严格地记录了马克思的原话，

因为原稿中根本没有那样的语句。不过，手稿VI说明了马克思对于找到表述他的流通概念的文字工具的灰心丧气和无能为力。手稿VI中马克思费力地叙述资本流通过程的三个循环，即 $M—C…P…C'—M'$ 。在手稿VI本身，他就对三个循环写了几种引述。大概在1877年马克思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单个循环加以批判分析。但适合他的思想的准确措辞问题把他难住了。他心灰意懒，最后便把这些文稿一一划掉了。因此马克思留下的其余五份可用的手稿乃是草稿，而较为完满地讨论流通问题的文稿马克思一直没有完成。在这些手稿的发表方面，关键问题是编辑者的选择方式。简言之，哪些是恩格斯要包括或要删去的？或者按照恩格斯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哪些手稿他认为最能说明马克思的本意？

作为编辑者，恩格斯的态度是自己不作选择性的决断。作为一个记录者、复制者，他决定在他编辑的第二卷第一篇中尽可能多地包括马克思的原稿。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增补”中这样说到自己的重建方法：

在编辑出版时，我最关心的是要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版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得出的各种新成果。只是在绝对不可避免的地方，并且在读者一点也不会怀疑是谁在向他说话的地方，我才加进自己的话。这样做曾经遭到指责。人们认为，我应该把摆在我面前的材料变成一本系统地整理好的书，像法国人所说的，*en faire un livre*，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读者的方便而牺牲原文的真实性。但是，我不是这样来理解我的任务的。我没有任何权利作这样的改写。象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完全全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20]

恩格斯编纂第二卷第一篇的方法，是利用马克思包括在1868～1870年的手稿Ⅱ中的目录表作为这一篇的基本结构。马克思在手稿Ⅱ中写下的提纲是：

第一章 资本的循环

(1) 流通的三种形态

- (a) 货币资本流通的形态。资本的形态变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 (b) 生产资本流通的形态
- (c) 商品资本流通的形态
- (d) 循环的三种形式

(2) 流通时间

(3) 流通运输费用^[21]

恩格斯利用这个写于1868～1870年的提纲，再从1877～1878年的笔记本中摘取第二卷第一篇的内容和材料。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对 $M-C \cdots P \cdots C' \rightarrow M'$ （原文有误——译者注）这个（表示流通过程的）公式的单个循环的分析。对于整个循环及其单个成分的分析基本上是在手稿Ⅴ和Ⅵ中。恩格斯把马克思在这两稿中对 $M-C \cdots P \cdots C' \rightarrow M'$ 的分析拿了过来，用作1870年手稿Ⅱ的目录表的第一部分的内容。对于该目录表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恩格斯又回到1867～1870年时期的手稿，大量地从手稿Ⅳ和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的其他来源获取内容。恩格斯的编辑绝大部分是一种综合。他以1868～1870年手稿Ⅱ的目录表为基础，^[22]大量摘取1877年以后的手稿，并把它们跟1870年以前的手稿混合起来，整理出了第二卷第一篇。对于1870年以前的手稿Ⅳ，恩格斯自己把它看作是最后的最完整的，却利用得很少，主要出现在第二卷第一篇的结尾几页。手稿Ⅳ一开始讨论的是整个流通公

式 $M-C \cdots P \cdots C' - M'$ 及其各部分，并扩展到讨论总的流通过程。恩格斯在采用手稿Ⅳ时抛弃了它开头的一半，即讨论 $M-C \cdots P \cdots C' - M'$ 或总的流通过程的部分。确切地说，他使用的部分开始于该手稿 A/43/32（原文如此——译者注）^[23]，或在马克思讨论完流通的一般运动之后。总之，恩格斯对手稿Ⅳ的利用排除了集中讨论流通的一般过程、整个运动结构的部分。

因此，在第二卷第一篇中有一条错误的线索。恩格斯硬性地造成了原稿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时间连贯性。他把 1870 年以前的手稿跟 1877 年以后的手稿凑在一起，其实二者之间相隔七年之久。结果是该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之间也存在一种断裂。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内容，恩格斯最主要靠的是手稿Ⅴ和Ⅶ，那是马克思对 $M-C \cdots P \cdots C' - M'$ 的各个循环进行经验的分析。第五、六两章主要取材于手稿Ⅱ，那是对整个流通过程、流通统一体的表现所作的描述。之所以造成这种断裂，是因为恩格斯以为马克思所写的每一部分都同等重要、同样不可舍弃，所以他便拼命把相距七年（根据在手稿中的位置，有的甚至相去更远）所写的两套手稿搅合在一起。

恩格斯无意地造成了“重点的转移”。例如，1868～1870 年的手稿Ⅱ的目录表上列出第一章（“资本的循环”）的分节是：

(1) 流通的三种形态

- (a) 货币资本流通的形态。资本的形态变化。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 (b) 生产资本流通的形态
- (c) 商品资本流通的形态
- (d) 循环的三种形式

很明显，马克思在 1868～1870 年的手稿Ⅱ中是想把上述

(a)、(b)、(c)、(d)四个方面的讨论结合为一章(“资本的循环”)。恩格斯改变了这一计划。他把(a)、(b)、(c)、(d)分列为各自独立的四章。1870年以前的手稿Ⅱ和Ⅳ对资本不同循环的讨论,都不足以使它们分别形成单独的一章。恩格斯不得不从1877年以后的手稿中取材,但那些材料乃是马克思对资本的单个循环所作的深入分析。这样一来,1870年的目录表便被重新编排以吸收和消化1877年的内容。1870年设制的容纳一种内容的提纲被恩格斯改换,填进了不同的内容。具体地说,货币资本的流通按1870年的提纲,马克思是把它当作第一章的第一部分,现在被扩充成了专论这个题目的独立一章。按照恩格斯(参看迪茨版的目录),货币资本的循环本身又分为四节。第一节讨论 $M-C \cdots P \cdots C' - M'$ 整个式子的 $M-C$ 阶段,第二节讨论 P 的阶段,第三节是关于 $C' - M'$ 阶段,第四节谈的是整个过程。这种不同的细分乃是恩格斯的独创。在迪茨版第32页,恩格斯注明第一节即“Ⅰ.第一阶段 $M-C$ ”采自手稿Ⅶ(1878年7月)。^[24]马克思原稿中确有此标题,但他把“第一阶段”几个字划掉了。第二节的标题见迪茨版第40页,“Ⅱ.第二阶段生产资本的职能”^[25],那是恩格斯加的,这个标题并不存在于这里所采自的马克思原始手稿Ⅶ中。第三节的小标题见迪茨版第43页,“第三阶段 $C' - M'$ ”,它大概出自手稿Ⅵ,但却并不存在于手稿Ⅵ中。它也是恩格斯加上去的。^[26]第四节的标题在迪茨版第55页上,据恩格斯说出自手稿Ⅴ。但“总循环”这个标题并不存在于第55页所采自的手稿Ⅴ中。^[27]这标题又是恩格斯加的。因此,恩格斯不仅把马克思原来的手稿Ⅱ的目录表由一章重新编排为六章,每一章分别单独讨论资本的一种循环,而且外加地把他的第一章分为四节,每一节又分别讨论资本流通的各阶段。恩格斯的修改造成了印行版本中的重复。马克思是极不可能希望把他关于流通的整个提纲包括在第二卷中的。这种重复的产生,是因为印行版本

重复了马克思在几份手稿中思考和包含的关于流通的部分不同构想。

更为重要的是，“重点的转移”产生于恩格斯的重新编排中从一般到特殊的变化。通过把马克思计划的一章扩充为四章，又把其中的一章分为四节，恩格斯的编辑便强调了整个流通过程的那些特殊阶段。假设马克思本来不想把第二卷的每份草稿合编为一部最终的第二卷，假设马克思在手稿Ⅳ（恩格斯认为最可付印和最完整的一稿）中表明了他关于第二卷基本计划的某些想法，那么结论就是，马克思写作的是对资本在其流通阶段的批判、提供的既是对流通的一般性结构的分析，又是对流通（包括其每个方面的表现在内）的运动、过程和历史性的讨论。在恩格斯的重新编排中，他的变更强调了流通过程的那些特受宠爱的阶段，恩格斯的重新编排过分确认了流通过程那些经验的、量化的和具体的方面。

另外，在1868~1870年手稿Ⅱ的目录表的（b）中（原文写作“B”，按前改为“（b）”——译者注），马克思简单地写了“生产资本流通的形态”。然而，恩格斯（指他的迪茨版的目录表）不仅改作了标为“生产资本的循环”的一章（即第二章），而且进一步把增加的这一章分为四节：“简单再生产”，“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货币积累”和“准备金”。^[26]独立的这几节材料是从写于1877年的手稿Ⅴ中搜集的。再者，恩格斯倾入1868~1870年的设计和模式中的内容改变了该计划的形式和重点，而且这些改变1868~1870年的结构的内容所出自的乃是七年后写作的手稿。恩格斯的编辑方针貌似忠实于马克思的手稿，并把1870年前后两个时期的手稿融合在一起，这就迫使他一方面接受1868~1870年的形式设计，另一方面又掺合1877年的材料当作实质和内容。

恩格斯对第二卷第一篇的重新编排，不仅为了恩格斯式的定

量性而减弱了马克思式的理论性，而且抹去了黑格尔的风格。由于恩格斯强调的是经验的、数学的和特殊的东西，人们就不会注意处于其各个阶段的流通整体的作用了。马克思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流通形式、资本主义流通的本质的批判分析，恩格斯的重点转移则强调流通的单个阶段，以及它们在量上对流通所起的作用。恩格斯破坏了黑格尔对阶段的看法：整体的过程对于部分的可度量的活动具有某种调节作用。^[29]

把马克思 1868 ~ 1870 年的目录跟恩格斯迪茨版的目录进一步加以对照，更会清楚地显示对第二卷第一篇以及整个第二卷的重新编排和扩充。第二篇（迪茨版）的第五章（流通时间）和第六章（流通费用）的论题在马克思的目录中有相应的内容，但恩格斯又是把它们分为“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两章，而马克思却只是在他的整个第一章“资本的循环”中把它们写作“(2)”和“(3)”两节。而且马克思这两节的确切标题是“流通时间”和“流通运输费用”。此外，恩格斯的第六章“流通费用”本身又分为三节：“纯粹的流通费用”，“保管费用”（它又分为两部分）和“运输费用”。恩格斯的第五章（流通时间）和第六章（流通费用）的材料来自马克思 1867 年的手稿 IV。由于手稿 IV 开头部分讨论的是资本流通过程的一般运动，而恩格斯不想收入它，所以他跳过了开头这几页，从手稿 IV 的后部分摘取他所要的五、六章的材料。

此外，马克思 1868 ~ 1870 年的目录 (A63) 开列的是把第二卷分为几章。马克思在手稿中列了三章：“第一章 资本的循环”（前面我们已讨论了该章分为 (a)、(b)、(c)、(d) 四个范畴和二、三部分），“第二章 资本的周转”，“第三章 流通和再生产资本”。^[30]把第二卷本来的“章”的划分改为“篇”的是恩格斯。应该记得，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才使用“篇”的划分。恩格斯基于自己的考虑采用“篇”的划分，并把各篇进一步分为若干章。跟

马克思的三部分划分相对应，恩格斯有三个篇目：马克思的第一章叫“资本的循环”，恩格斯的第一篇叫“资本的形态变化”；马克思的第二章叫“资本的周转”，恩格斯的第二篇也是这个题目；马克思的第三章叫“流通和再生产资本”，恩格斯的第三篇的题目则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有趣的是，在原稿中马克思开始计算了将成为第二卷的文稿的页数，目录中有这样的标记：“第一章 资本的循环（P.1—39）（此页数与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第5页上所译有异，下同——译者注）；第二章 资本的周转（P.39—129）”，第三章旁却没有标明页数。虽然很难确切知道马克思的心目中指的是什么样的页数，是打字页数还是手写页数，但根据他自己早先考虑的手稿篇幅，即第一章39页，第二章90页，可以合理地设想马克思心目中的手稿（它将成为第二卷）比恩格斯编成的500页的版本要少得多。^[31]马克思在手稿中留下了许多部分，他显然不想把它们包括在成为《资本论》第二卷的那部书中。第二卷第一篇及整个第二卷扩大得超出了马克思的计划，这工作是恩格斯干的。把正文的“章”重新编排为“篇”，只是大大增加全卷的页数，它要求在结构上作广泛精细的重新编排，而这又造成了现代欧洲理论史上的一部巨著的“重点转移”。^[32]

罗曼·洛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历史》（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是对《资本论》的起源和发展的一项重要研究，书中记录了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开始他的经济学研究七年后即1857年写的一份提纲，它草拟了马克思想要完成的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鸿篇巨制。这里把马克思1857年的原始提纲抄录如下：

I 论资本的分册

a 资本一般

- (1) 资本的生产过程
- (2) 资本的流通过程
- (3) 利润和利息
- b 关于竞争部分
- c 关于信用的本质部分
- d 关于股份资本部分
- II 论土地所有制分册
- III 论雇佣劳动分册
- IV 论国家分册
- V 论对外贸易分册
- VI 论世界市场和危机分册^[33]

看了这一提纲须记住，马克思讲的是“册”，而不是“卷”。

但1866年马克思修改了他原先的计划，在1866年10月13日给他的朋友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信中，他这样概述他的修改：

我的情况（由于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工作老是被打断）迫使我也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 第四册 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34]

马克思 1866 年给库格曼的信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马克思显然废弃了他 1857 年的最初计划。关于国家的第四册、关于对外贸易的第五册和关于危机和世界市场的第六册，在 1857 年的提纲中都提到了，而在 1866 年的提纲中都没有了。虽然没有专论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的独立分册（如在 1857 年的计划中所标明的），但在最后成为《资本论》三卷的材料中有对于这些题目的讨论，所以它们还是进入了最后成形的《资本论》。对雇佣劳动的分析出现于第一卷，对土地所有制的分析见第三卷。尽管如此，还是必须弄清马克思改变计划的原因。

其次，如果我们唯独集中讨论《资本论》问题，丢开与最终成为《剩余价值理论》的材料有关的问题，那么很明显，1866 年马克思的打算是《资本论》由两卷构成。1857 年马克思单纯考虑写成分册的问题，1866 年则既考虑分册又考虑分卷次。按马克思说的，《资本论》“第一卷”要包括“头两册”，即关于“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两册。《资本论》第二卷仅由第三册即“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构成。马克思列为第四册“理论史”的东西，最后在考茨基手里变成了《剩余价值理论》。但是，马克思甚至于要改变 1866 年的计划。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只包含 1866 年说的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而不是 1866 年计划的两册。我们在本章后面将要谈到，马克思一直没有背离他要写成两卷的计划。马克思不是想把 1866 年说的第二册放到第一卷，而是考虑把这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放到第二卷。在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中，马克思 1866 年所计划的分册被恩格斯升级成了卷。马克思想把“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包括在第二卷中，而恩格斯却打破了这个计划，把单独一卷用作马克思考虑的一册。由于恩格斯突破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的限制，他也就敞开了扩大篇幅的大门。《资本论》篇幅的庞大造成了“重

点的转移”，造成了离开批判走向科学论述的变动。

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分析，以及对最终成为第二卷的东西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放弃他 1857 年的最初计划？亨列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在他 1929 年的一篇文章“马克思‘资本论’原先计划的改变及其原因”（‘Die Aenderung des Ursprunglichen Aufbauplanes des Marxschen Kapitals und ihre Ursachen’）中提出了一种解释。^[35]格罗斯曼坚决认为，马克思最初计划把《资本论》分为三卷，后来之所以修改他的提纲，是为了集中讨论剩余价值的创造及其随后划分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和利润率的下降。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则在他 1973 年的文章《经济学的纲领与方法》（‘Plan et Methode de L’economie’）中表述了相反的论点。^[36]按照鲁贝尔的看法，马克思之所以没有完成论国家、对外贸易和危机与世界市场这几本书，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时间和健康状况恶化。格罗斯曼看到的是马克思思想意图的变化；鲁贝尔则把 1857 年的计划看作是一个马克思无法完成的庞大计划，而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身体状况和他的工作习惯。洛斯多尔斯基的意见跟鲁贝尔是一致的。

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研究证实了鲁贝尔—洛斯多尔斯基的论点，即马克思并非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计划，而纯粹是没有能力去完成一项构想太宏伟的任务。此外，由于他的工作习惯，由于他无法摆脱尽可能深入地阅读他所论述的每个题目的需要，拖延了他的写作进程，也大大地促使了他无法把握自己原先的计划。例如，从 1861 年 8 月直到 1863 年 6 月，马克思把 50 年代开始的经济学方面的写作丢在一边，只写后来直接构成《资本论》的那些材料，所以留下了 1472 张四开页的初步文稿。这些材料约有一半涉及的是马克思后来在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讨论的题目。1861 ~ 1863 年写作的其余部分变成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个任务恩格斯无法完成，便把它移交给了考茨基。1864 ~ 1865 年间马克思

写的那些手稿到恩格斯手上变成了第三卷。第三卷的手稿涉及的问题有如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平均利润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等，以及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论地租和土地所有制的那一章。从1866~1867年，马克思准备并出版了第一卷。在马克思直到1867年关于经济学的思考的写作方面，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断裂，使人感觉到一种理论上的遗漏：他讨论了剩余价值的产物及其所采取的多种形式，却因而大大地忽略了流通问题。后来从1868~1870年，马克思写出了关于流通的手稿，其中最重要的是手稿II和IV。从而到1870年，马克思便出版或以手稿形式备有了他1857年最初计划的头三册书中所包括的全部材料。1870年，马克思52岁，他应庆幸后来多活的13年，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并发表他的第二卷（第二卷包括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根据他1866年的信），然后接着完成他1857年计划的论国家、对外贸易和危机与世界市场几册。马克思没有这样做，而是停止了这一工作。这里所说的停止，不仅是指他未能完成第四、五和六册（1857年最初计划的论国家、对外贸易和危机与世界市场），同时也指他连第二卷也没有完成或发表——这一卷要包括的是关于“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材料。这就是恩格斯要填补的断裂。

马克思工作的停滞不能归因于思想意图的变化。确切地说，是由于他健康状况不佳、智力衰退，以及为了使自己不受可能来自洛贝尔图斯（Rodbertus）的追随者及凯里（Carey）的批评，他一定需要熟悉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到1868年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已经遇到了障碍，土地所有制和地租方面的一些问题开始困扰着他。显然，马克思开始对自己1864~1865年写的关于地租和土地所有制的材料有了怀疑，而这些材料最后却成了恩格斯编辑的第三卷。由于他的拖延，出现了一些可供他利用的新材

料，特别是 H·凯里论美国的著作的发表，以及马克思通过跟俄国民粹主义者的通信获得的关于俄国土地状况性质的信息。1868年7月4日马克思给 S·迈耶尔（S·Meyer）的信中写道：“由于我在第二卷里要研究地租（这明显是说马克思打算把关于土地所有制的材料放在第二卷而不是第三卷——作者注），所以我非常欢迎批判凯里先生的《谐和》（*Harmony*）的材料”。^[37]1868年10月7日他在写给他的俄国通信人丹尼尔逊（Danielson）时说，他无法完成第二卷，因为他必须等待来自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必要统计数字的发表。^[38]

3年后，在1871年6月3日（原文如此，似应为13日——译者注）给丹尼尔逊的另一封信中，马克思再次示意他的《资本论》的写作受阻了。他说：“我曾认为必须把稿子全部改写。而到目前为止，我还缺少一些必要的文献，不过这些文献最终会从合众国寄来的。”^[39]马克思之所以停止《资本论》的进展，是因为他越来越害怕他1864~1865年写的东西因新情况的出现而过时了，结果会使他早先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遭受到严重的抨击。

他投入了为时七年的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和积累知识的工作。为了掌握关于俄国的材料，他自学俄语。在他1870年后的读书笔记、摘抄中，大量地提到俄文版的关于沙皇帝国土地状况的书籍。除了俄文书籍和统计资料，马克思还查阅了 G·L·冯·毛勒（G·L·von Maurer）关于德国中世纪土地所有制惯例的著作。他还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Haxthausen）和乌第森洛维克（Utiesen-ovic）论俄国土地所有制的著作。此外，他阅读了弗腊斯（Fraas）、赫拉伯克（Hlubeck）、李比希（Liebeg）和施莱登（Schleiden）关于植物生理学和土壤化学方面的著作，以及 J·B·朱克斯（J·B·Jukes）的一部地质学巨著，并做了200多页的笔记。马克思这一时期的通信总是提到凯里、美国的农业状况、爱尔兰的农业状况，以及 N·弗列罗夫斯基（N·Flerowski）关于

《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Russia)的著作。例如,在1869年11月26日给恩格斯的一封长信中,马克思对凯里的地租理论作了长篇的讥讽,并利用爱尔兰、欧洲海外殖民地和美国边远的密执安(Michigan)和弗吉尼亚(Virginia)等地的历史实例驳斥凯里。^[40]不过,这种详尽无遗地探究的癖好乃是马克思典型的工作习惯。在50年代,马克思曾作为自由撰稿人为理查德·德纳(Richard Dana)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撰写社论。1853年,印度爆发土著雇佣兵聚众事件。恰好这段时间马克思作的摘抄表明,他精读了印度和东方的历史,并做了笔记。关于1854年西班牙的政治动荡,他也阅读了大量材料,并做了笔记。马克思那年的摘抄表明,他深入细致地阅读了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的历史。马克思的工作方式要求他在使自己的意见形诸文字之前一定得阅读有关的题目。他要求在把自己的观点公诸于众之前得详尽地占有事实。他在学生时代养成的学术研究习惯一直保持着,终生不变,这种习惯就是对事实的渴求和对定义明晰性的需求。从1870~1877年,他年事渐高,健康状况日下,智力衰退,研究工作也就简直停止下来了。

1877年马克思或许如恩格斯所说确实重新振奋过,想摆脱日益增长的无法完成他心爱的著作的恐惧。其实他在1878年11月15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暗示了他又在写作第二卷:“一俟《资本论》第二卷付印——但是这未必会早于1879年底——,您将像您希望的那样得到手稿。”^[41]在马克思重新写作他计划的《资本论》第二卷亦即最后一卷时,由于其间经过了十年深入细致的学习研究,他对问题会有一些新的看法,这是毫不奇怪的。

1877年马克思仍然想第二卷由两分册构成。第一分册如他1866年给库格曼的信所说,要包括“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分册也如同前一信所说将讨论“总过程的各种形式”。当马克思满怀

完成的希望再次开始写作时，他自然是先从第二卷第一分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着手，他也自然希望根据十年来的新思考重写1867年和1868年的手稿。可以认为，1877年的手稿V乃是打算作为“一个新的修订本”。但它后来成了恩格斯的第二卷的材料。可以料想，1877年完成的手稿VI乃是试图“准备付印的一份手稿”，但这还是注定了一直未实现。最后，在1878年，马克思终于认定手稿II和手稿IV都没有对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作出令人满意的讨论。他想总得有点东西付印的最后努力也终于失败了，但又出现了一份不完整的第VIII手稿，它倒是提供了对再生产过程最广泛的讨论。

马克思没有有意识地改变他的《资本论》计划，而只是没有能力完成这一计划，这个事实也证明了认为马克思只计划《资本论》分两卷的看法是可信的。洛斯多尔斯基认为马克思没有改变他《资本论》的初衷，这是对的；但他认为成为恩格斯编的三卷《资本论》的材料，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初衷，那就错了。马克思打算《资本论》只写两卷，这证据可以通过两方面的探究获得：一是包括在马克思的第二卷中的材料，二是马克思在除《剩余价值理论》之外是否还提到过《资本论》的第三卷。

1866年给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谈到两卷《资本论》。第一卷由两册构成，第一册论“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论“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卷将包括第三册，即“总过程的各种形式”。但是，在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时，这个1866年的计划改变了：第一卷只包含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不过事情很清楚，马克思对1866年计划的改变，只是想把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以及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讨论都放到第二卷，而且还是把《资本论》限制为两卷。其实，在第一卷出版后的一年里，马克思多次提到第二卷的内容包括流通、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平均利润率和地租，还提到对土地所

有制和地租的考虑。他在1867年6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明了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的转化将在第二卷中讨论，并说“第二卷包括第二册和第三册”。^[42]1868年3月6日马克思通知库格曼第二卷将分析土地所有制问题。^[43]在1870年1月24日给德巴普（Debaepe）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再次重申他计划在第二卷中论述土地所有制问题。^[44]但马克思最明确地说明自己的结构设计是在1868年4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1868年4月30日马克思向恩格斯概述的计划跟他1866年向库格曼概述的完全相同。流通问题将在第二册讨论。^[45]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率、利润率趋向下降以及地租问题，都将在第三册中加以分析。^[46]在马克思看来，地租问题涉及到更广的剩余价值问题，因此应该归属到转化问题中来讨论。这样一来，时至1868年，恩格斯完全清楚马克思希望把什么材料包括到第二卷中，他也知道马克思只计划写两卷——这个打算马克思在1867年6月27日和1868年5月7日两封信中跟恩格斯说得很明确。^[47]

此外，马克思从未说过《资本论》本身（除去《剩余价值理论》）应包括三卷的意思。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866年他考虑的是两卷。在发表于1867年的第一卷中他提到过第二卷，说它将含有对流通的广泛讨论。^[48]最后，在他再次开始写作《资本论》的1878年，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从未提到过第二卷之外的什么东西。^[49]

根据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有可能重建马克思本来计划的《资本论》第二卷了。马克思的第二卷本应包含下列内容：“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第二卷第一篇，手稿II和IV）；“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第三卷第一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第三卷第二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第三卷第三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第三卷第六篇）。

恩格斯把马克思两卷本的《资本论》扩大为他自己三卷本的

《资本论》，同时也就造成了一种“重点的转移”，即把马克思的这一巨著由批判转到了科学论述。马克思原打算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加以概念上的批驳，恩格斯却转向了一种经验的科学发现。马克思希望阐明共产主义的经济学原理，恩格斯对原稿的扩大却把它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根本规律和必然演化的发现。恩格斯对马克思留下的手稿从一开始就抱有实证主义的看法。1883年9月18日他写信给考茨基说，第二册“只包含严格的科学。”^[50]约6个月后再在给拉甫罗夫(Lavrov)的信中，他再次宣称第二册是“纯粹科学性的。”^[51]1885年第二卷出版后，他写信给左尔格(Sorge)谈到，因为这本书不是意在引起激烈的辩论，而是“纯粹的科学”，所以使很多人感到失望。^[52]恩格斯之所以偏爱把《资本论》变成一种经验的研究，部分原因是他希望他的第二和第三卷将最终镇住凯里、杰文斯(Jevons)、洛贝尔图斯和瓦格纳等所有马克思的批评家。不过他最大的希望还是在第三卷。1885年4月2日，恩格斯写信给贝克尔(Becker)说：“这个包含着最后的并且是极其出色的研究成果的第三卷，一定会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彻底的变革，并将引起巨大的反响。”^[53]恩格斯一心想着第三卷会使马克思显得战胜了一切对手。他在1889年7月4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上说：“但是，由于这最后一卷是一部如此出色而绝对不容置疑的学术著作，我认为我有责任在出版这一卷时，要使全部论据都十分清楚而明确。”^[54]因此，恩格斯谋求的是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无可争议地合法化，这就导致了他突出手稿中经验的、实证的因素。经验主义的癖好，连同他对马克思本人的话的供奉，乃是《资本论》得以扩大的根本原因。

通过追寻恩格斯的重建方法，可以把《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和整个第二卷扩大的情况弄清楚。通过注意恩格斯的整理办法，即他从现有的众多手稿中选材的方式，可以明确恩格斯是怎样打乱了马克思第二卷的各个方面。再来看迪茨版，它的第31

~42页开头三句话，绝大部分是来自手稿Ⅶ（A68），马克思这份原稿上的日期是“ab.2.VII.1878”，^[55]这表明马克思是在那个日子开始写作这份手稿。

我们把迪茨版视为跟恩格斯的原稿（H80）完全一致，按照第31页的脚注，恩格斯说从第31~32页顶头第一段是来自马克思的手稿Ⅱ。这话不对。恩格斯的注释是错误的，即令恩格斯的话是无可辩驳的，那么迪茨版也同样是错误的。

事实上，恩格斯第31页的材料实在都是来自马克思的手稿Ⅶ。它选自手稿Ⅶ的A48/1、NH1A。^[56]

此外，第31页第5段，开头的话是“循环的公式……”（作者本章大量引述马克思原话的只言片语，多与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有异，为忠于原著，此处照译，请读者参阅时注意。以下不再注明。——译者注），恩格斯说它来自手稿Ⅱ，却是手稿Ⅱ和Ⅶ中都不存在的。十有八九这一段是恩格斯自己加进去的。手稿Ⅶ一开始马克思列出了 $M-C \cdots C'-M'$ 的公式，以概括资本的流通过程。而恩格斯对手稿Ⅶ的摘取却是首先列出 $M-C$ 、 P 、 $C'-M'$ ，资本流通的这三个独立的阶段。或许，为了使马克思的论述连贯起来，为了强调三个阶段的独立性，恩格斯自己加上了这一句话的段落。在第31页底下，紧接着刚说过的那一段，恩格斯又回到了手稿Ⅶ（开头的话是“第一和第三阶段……”）。

按照恩格斯的注释，第32页的第一段（以“为了纯粹地理解这些形式”开头）也来自马克思的手稿Ⅱ。恩格斯又错了。照恩格斯意见排印的迪茨版也错了。这个段落恩格斯在手稿Ⅱ和Ⅶ中都是找不到的。他是在马克思的手稿Ⅴ（A66）中找到这段话。它来自手稿Ⅴ的A45/1、NU1B页上的“补充说明”。^[57]马克思像黑格尔那样，喜欢使解释性的材料（补充说明）与实际的正文独立开来，而且通常把前者写在每页的底部。这里的例子（整

个第二卷第一篇还有其他例子)说明,恩格斯把写于1877年的手稿V中的补充说明,搬到了取自1878年的手稿Ⅶ的主要正文中,同时又宣称它确是来自写于1870的手稿Ⅱ。

在第32页靠近顶页的“第一阶段。G—W”一语后面有第二个脚注,声称从第32页到第42页顶头来自马克思的手稿Ⅶ。在此恩格斯说的是对的,因为从第32页到第42页顶头的全部内容都是手稿Ⅶ中的。恩格斯关于第31~32页顶头的话错了,而关于第32页至第42页顶头的话却没说错。本章前面提到,“第一阶段。G—W”这中间有着恩格斯的更改,因为马克思虽在原稿中写了“第一阶段。I.G—W”,但他又把“第一阶段”四个字划掉了。恩格斯把它们留着,显然是为了明晰起见。在手稿Ⅶ的前面部分(见迪茨版第31页),马克思提到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恩格斯为了保持文字的连贯性,决定恢复马克思删去的东西,把“第一阶段”几个字包括在正文中。

在第42页开头,(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一段开始),恩格斯说明了他转到了马克思的手稿Ⅵ(A67)。这一转向手稿Ⅵ直到第45页的第一段末(即以“商品资本由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结束的地方)。恩格斯所注明的第42~45页主要取自手稿Ⅵ的说法,完全是在欺骗读者。

马克思的手稿Ⅵ写作于1877年,包括将近六页。其中的最后一页(A67)(A49/5)(NW23A和NW23B)是一份数学图表,马克思是在试图图解从C'到M'的运动。这一页未被划掉。但开头五页(A49/1—5)(NW18,19,20,21,22)却都划掉了。对于马克思已经划掉而且显然不想付印的东西,恩格斯本来不该采用。此外,恩格斯实际写出的马克思所划掉的头五页(NW18—22)的内容,与马克思本人写下的没有什么形式上的一致。恩格斯是在宽泛地诠释这五页的思想。尽管恩格斯是在解释马克思,可他在迪茨版中的脚注却错误地使读者信以为自己读到了马克思

的实际原作。

再者，对于手稿Ⅵ的最后一页，恩格斯并没有抄录上面的图表，而是以文字叙述的形式说明在生产过程之后商品向货币的运动。但是，恩格斯从未向读者说明迪茨版的整个第44页和第45页的一半，是对马克思的数学图表的文字叙述。

在手稿Ⅵ的开头五页，马克思讨论的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写作于1877年的这份手稿也许最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精力的衰退。马克思对于同一问题打上好几次草稿，又全部划去，显然总是不能满意。因此，他既十分沮丧地想要把关于同样问题的几份草稿凑在一起，又十分失望地发现没有哪份草稿是令人满意的。

迪茨版从第45页末段（头一句是“W'的职能是”）至120页首段末尾（最后一句是“满脑袋都是生意经”），这几十页都来自马克思的手稿Ⅴ（A66），共有75页，在第二卷第一篇中是单独取自一份手稿最多的部分。这份手稿写作于1877年，恩格斯自己说过，它是马克思重新考虑和重新建构第二卷第一篇所作的最后的深思熟虑的努力。

除去第42~45页（迪茨版）是对马克思划掉的手稿Ⅵ的解释，恩格斯从手稿Ⅶ跳到手稿Ⅴ，从手稿Ⅶ中摘取“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和第一节“第一阶段 G—W”及第二节“第二阶段 生产资本的职能”。然后又转到手稿Ⅴ，大部分从那里摘取材料，用作“第一章”后两节以及“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按这里的前后文，应包括“第二章”，可能作者有误——译者注），因此，主要取自手稿Ⅴ的有描述W'—G'周转和整个循环过程的“第一章”的最后两小节，以及关于生产资本周转、商品资本周转和作为整个过程总结的三个单独的“章”。这并不是说恩格斯对他所选择的手稿，如这里的手稿Ⅶ和手稿Ⅴ，每一页都加以采用了。我们只是说迪茨版的某些篇幅中所掺合的材料，

除注明的情况之外，乃是取自马克思的一份特定手稿。但马克思原稿中还有很多页文字恩格斯并未选用。

再来看看迪茨版第 69 页，又一次证明恩格斯对马克思原计划的第二卷结构作了重大的修改。该页上有个标题：“第二章——生产资本的循环”。但在马克思的原稿 A66, A45/24, NU23A 中^[58]，马克思并未写上“章”这个字，而是简单地列出：“#2, 生产资本的循环”。简言之，是恩格斯加进了“章”这么一个概念和词语，而马克思的符号“#2”也许仅仅有分节的意思。此外，第 91 页上恩格斯在标题前加了“第三章”，第 104 页上标题前加了“第四章”，第 124 页的标题前加了“第五章”，第 131 页标题前加了“第六章”。这些标题恩格斯都是照抄无误的，但马克思的原稿中却从未使用过“章”这个字来标示这些划分。因此可以肯定，马克思从未打算像现在那样在第二卷的开篇中用“章”来标示章节的划分。按照马克思 1870 年的最初计划，他是想使第二卷包括三大部分或“章”。正是由于恩格斯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计划，才使马克思原先的“章”变成了“篇”，然后又用“章”来标示“篇”内的章节。

从第 120 页第 2 段（开头的话是“资本家投入较少的价值”）一直到第 123 页末的内容并非采自《资本论》八份手稿中的任何一份。在第 120 页的脚注中恩格斯承认，这四页是从马克思 1878 年的一份读书摘要中取来的。

马克思是位求知欲很强的读者，也同样是位不知疲倦的笔者。马克思的“读书摘要”大部分是关于自己的阅读的摘录。在他的笔记中偶尔掺有他阅读时对某些问题的简要思考。在 1878 年的“摘要 B142”^[59]中，马克思就中途记下了这样的思考，那便是恩格斯在第 120~123 页之间插入的内容。换句话说，在第 120 页的地方恩格斯停止了从《资本论》的笔记中摘取材料，而是跳到 1878 年，发现了那时马克思关于流通问题的一段补充材料，

他便把它插入《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现在那个地方，他认为它与马克思的原作是自然吻合的。

恩格斯手中的“摘要 B142”包含一个目录表，在标记为 #2 的条目下恩格斯写上了“关于流通的补充笔记，P.32, G—W—PAPM—W’—G’”的话。恩格斯插入原稿的正是这一补充笔记。有意思的是，马克思的这一简短的思考恰好出现在他所做的关于拉克鲁瓦 (Lacroix) 的《微积分》(Calcul Diff. und Integral) 的笔记之先。⁶⁰因此，马克思在停止《资本论》的实际写作之后，便是在阅读微积分学方面的著述，其间他又中断下来记录了关于流通过程的一些新思想。恩格斯发现这些 1878 年的沉思与正文大致相关，便打乱原稿一气呵成的连贯性，插入基本上没有联系的四页“摘要”。实际上恩格斯是删去了马克思手稿 V 中的一些原有文字，而在他自己的修改版中代之以 1878 年“摘要”上的材料。

然后恩格斯回到《资本论》的手稿，但他不是回到手稿 V，而是回到手稿 IV。从第 124 页一直到第 131 页头上的内容都是来自手稿 IV。但是，第 131 ~ 132 页的大部分材料恩格斯又是取自马克思的手稿 VII。从第 132 页中间直到第 153 页的第一篇结束处，恩格斯再次回到马克思的手稿 IV。不过，恩格斯在这里对手稿 IV 的利用，并非从该手稿的第一页开始。确切地说，手稿 IV 的开头部分是再次讨论流通过程的各种循环。这几页恩格斯是跳过去了的（关于恩格斯如何重新构造第二卷第一篇的情况，请看“索引 B”）。

尽管这里分析的是第二卷第一篇的情况，但也有助于我们对恩格斯的编纂方法的理解，使我们可以粗略地按照这种方法来分析第二卷的结束部分。第二卷第二篇的开头几页恩格斯继续使用了手稿 IV 的材料。第二篇的第 154 ~ 163 页，取自恩格斯所说的“已经可以付印”的手稿 IV。但在这几页之后，恩格斯跳到了手

稿Ⅱ——他的目录表就是从该手稿上摘来的。迪茨版从第 163 ~ 358 页都是采自手稿Ⅱ。这意味着第二卷第二篇的这些剩余部分都属于手稿Ⅱ，而且第二卷第三篇的第一章也取自手稿Ⅱ：总共连续 195 页的篇幅都来自一份手稿。就第二卷第二篇来说，恩格斯关于他整理马克思手稿的情况的报告是正确的。他在第 38 页（迪茨版）上综述的情况跟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但是，恩格斯关于第二卷第三篇的其余部分所说的情况却并不确切。下面的“表一”表明的是恩格斯取用手稿的实际情况，“表二”表明的是恩格斯自称的他的取用情况。请读者记住，这里分析的是第二卷第三篇的情况。

恩格斯的取材情况

迪茨版的页码	手稿
1. 359—388	VII
2. 388（底下）—393	II
3. 393（底下）—394（中间）	VII
4. 394（中间）—397（中间）	II
5. 397（中间）—420（头上）	VII
6. 420（头上）—435（头上）	II
7. 435（头上）—470（中间）	VII
8. 470（中间）—472（中间）	II
9. 472（中间）—476（头上）	VII
10. 476（头上）—484	II
11. 485—518	VII

恩格斯自称的取材情况

迪茨版的页码	手稿
1. 359—388	VII
2. 388—393	II
3. 393—394	VII
4. 394—397	II
5. 397—420	VII
6. 420—435	II
7. 435—476	VII
8. 476—484	II
9. 485—518	VII

如上述两个表所示，在第7项即第435~476页之前恩格斯的报告是正确的。恩格斯说的是第435~476页取自手稿VII。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事实上他的第435~470页来自手稿VII，而第470~472页他又回到了手稿II，第472~476页再次回到手稿VII。在第476页他确实如他自己所示返回到手稿II。简言之，其中有六页的篇幅恩格斯未加恰当的说明：他忘了告诉读者第470~472页和第472~476页的正确来源。

恩格斯的第二卷第三篇的材料取自马克思的两份手稿即手稿II和VII。手稿II写作于1868~1870年，手稿VII则写于1878年。这两份手稿之间相隔大约10年。联系第三篇的情况，恩格斯的重新构造方法再次清楚地显示了出来：恩格斯把1870年之前和之后的两份手稿融合在一个提纲之中。这是一种搭积木的方法，他把1868~1870年和1878年的两份不同手稿的一些内容交织在一块。

恩格斯对第二卷第一篇的原始手稿的使用，按照的是一种后

退的时间顺序。现已确认，恩格斯整理的次序是手稿Ⅶ、Ⅵ、Ⅴ和Ⅳ。按这些手稿的时间次序，是1878、1877、1877、1867年。因此，恩格斯的工作是后退式的：他从马克思第二卷写作的第二个时期即1877~1878年的后面的手稿开始，倒回到第一个时期即1865~1870年的一份手稿。

恩格斯在整理第二卷第一篇时对马克思手稿时间次序的改变，还只是衡量恩格斯对马克思原稿所作修改的质和量的情况的一个方面。本章一开始我就列出了其他修改的方面：增添、删节、改述、变动结构和数学方面的改变。在这里，分析一下恩格斯塞入马克思原先文本中的一些增添内容，会使我们看到“意义变换”的可能性。很显然，囿于本章的篇幅，不可能把恩格斯增添的东西全部列举出来讨论（其他方面的所有情况也不可能全部列举讨论），有的只能一笔带过，还有的甚至根本无法提及。我只选择了几处增添的例子，因为我觉得它们能够说明恩格斯解释时的偏见。我选择的例子表明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原作的理解，表明了他如何通过这些增添、修改马克思的原作，以及这些增添怎样造成了“重点的转移”及“意义的变换”的可能性。

暂且不谈马克思的原作，让我们来读读恩格斯对第一卷的评论，便可引导我们很好地了解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大体的认识。第一卷第一次发表于1867年，在1867和1868两年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意义共发表了11条看法。当他于1883年开始编辑第二卷第一篇时，恩格斯已经对马克思的理论意图形成了一套预先假定。这些假定归结起来有三点：（1）《资本论》是一部“科学性的”著作；（2）《资本论》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3）马克思的著作预言了资本主义终究会被推翻。

恩格斯在对第一卷的评论中，反复强调马克思所致力的工作的“科学性”。在他1867年10月22日为《爱北斐特日报》（*Elberfelder Zeitung*）写的书评中，恩格斯称马克思的巨著是一种

“系统的科学理论”，^[61]他还骄傲地指出这部书是为“科学界人士”写的，从而强化了他的倾向性。^[62]还有一篇书评写作于1868年3月（此时间恐有误，似应为1867年12月——译者注），载于《斯图加特观察家报》（*Stuttgarter Beobachter*），他把马克思的著作说成是“直接丰富了科学。作者在那里用完全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历史的方法考察了经济关系。”^[63]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恩格斯进而又肯定：“社会联系和关系，——如何自然而然地一个接着一个发展出来”。^[64]

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专心关注开始于50年代后期旅居于曼彻斯特之时。总的来说，恩格斯坚持的是一种培根式的科学观：由经验的方法达到的事实是符合实在的，因而是无可辩驳的。恩格斯高扬科学的真理，当他想要提出一个免遭批驳的问题时，他总要用无懈可击的科学外衣将它保护起来。《资本论》的真理必须成为坚不可摧、攻而不破的。恩格斯把《资本论》说成是对从亚当·斯密到洛贝尔图斯和阿道夫·瓦格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断然批驳。为了确立《资本论》无法批驳的地位，恩格斯便附之以“科学的”这个形容词。19世纪后期是自然科学的伟大时代，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一书。自然科学的模式被人们视为真理的标准。186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仍在专心从事于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上合法化的工作。50年代马克思已经开始了他对经济学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无产阶级最大的意识形态需要就是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提供一种经济学上的证明。在《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了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黑格尔左派伙伴们的意识形态斗争。186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了在经济战线上反对蒲鲁东（Proudhon）、斯密、李嘉图、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Lassale）的斗争。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合法性，恩格斯作出了19世纪后期引人注目的贡献，他宣称马克思

主义是“科学的”。

恩格斯利用的第二个假定是，坚持认为《资本论》阐明了社会进化的“规律”。在他提出这一点之前必须证明政治经济学具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自然科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模式。这步工作恩格斯是在写作于1867年、载于《杜塞尔多夫日报》（*Dusseldorfer Zeitung*）的一篇评论中完成的。他在该文中提到：“政治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却还是像数学一样是如此抽象的和普遍的科学。”^[65]提出了自然科学作为认识论模式的优先地位之后，恩格斯便声称马克思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实在1867年10月载于《未来报》（*Zukunft*）的一篇文章中，恩格斯就欢呼马克思“把经济规律当作永恒的真理。”^[66]（此处作者引述的恩格斯的话语和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卷，第234页的意思完全相反，请读者注意参阅——译者注）此外，在他1867年11月为《杜塞尔多夫日报》撰写的那篇文章中，恩格斯认为雇佣劳动“规律”不仅对于资本主义而且对于此前的一切社会都是有效的。如果“这些现代的规律”，比方说，不适用于古代的状况，那么这种矛盾并非表明雇佣劳动“规律”是错误的，而是表明“古老的情况是异端的”，是证明这种法则的例外。^[67]（此处作者引述的恩格斯的话语和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卷，第245页上的意思完全相反，请读者注意参阅——译者注）

恩格斯所用的第三个假定依据的是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崩溃的观点。1867年《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上有篇关于《资本论》的短论，恩格斯在文中认为，马克思业已达到的结论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消灭”。^[68]在1867年11月载于《杜塞尔多夫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恩格斯继续论证了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灭”正在到来。^[69]恩格斯通过反复地使用意为废除或取消或超越的“消灭”一词，造成了《资

本论》解释的“崩溃论”学派的出现。按照恩格斯的看法，《资本论》的主要论题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生产制度的“崩溃”。

在他为《斯图加特观察家报》写的那篇论文中，恩格斯把“科学”、“规律”和“消灭”这三个核心思想扯到了一起：

至于作者的倾向，那我们在其中也可以分别出双重的趋向。因为他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力图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规律确立的，只是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这种逐渐的变化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在社会关系方面也在发生着，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到我们现在为止。^[70]

同是这篇文章的后面，恩格斯还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71]

公平地来看恩格斯，他并没有肯定和明确地断言资本主义“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掌握的，是必然构成这样一种肯定性断言的要素或成分。不过这样一些要素一直是游离不定的，恩格斯从未把它们缀合成一句结论性的断语。恩格斯没有给我们提出肯定性的断言，他所提供的是若要作出这种断言所必需的条件。“科学”、“规律”和“消灭”三个概念反复出现于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全部著作中。尽管我们没有得到一句确实的断言，但所有这些要素的重复出现已造成了一种假定。恩格斯所做的工作是三番五次给我们提供必需的要素，最后却把一个未言明的假定留给了我们。^[72]

迪茨版第83页上有一处重要的增添，它表明恩格斯是从量的角度看待《资本论》，表明了他对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该页头上开始的第五行起有这么一句话：“这种货币资本所以是

潜在的，因为它停留于货币形式时，不能作为资本发生作用。”这句话并不存在于马克思的原稿中，而是由恩格斯加进去的。马克思的原文是这样的：

生产过程可能扩大的比例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技术上规定的，因此，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虽然要资本化，但往往要经过若干次循环的反复，才能增长到必要的规模（也就是要积累到必要的规模），这时它才能实际执行追加资本的职能，即进入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因此，这个剩余价值凝结为贮藏货币，并在这一形式上形成货币资本。

到这里，恩格斯加上了上述那句话：“这种货币资本所以是潜在的，因为它停留于货币形式时，不能作为资本发生作用。”恩格斯不承认这句话是他自己增添的。在这句话完结处恩格斯有个脚注（见第83页底部），脚注中包括两句解释性的话，对此恩格斯倒注明了是自己增加的。这个解释如下：

“latent”（潜在）一词，是从潜热这个物理学概念借用来的，这个概念现在差不多已为能量转化理论代替了。因此，马克思在第三篇（晚些时候的修订稿）中采用了“potential”（可能的）这个从“potential energy”（位能）这一概念中借用来的词，或者仿效达兰贝尔的“virtual velocities”（虚速度），称作“virtual capital”。——
典·恩^[73]

恩格斯在正文中增添的那句话和加上的脚注，造成了一种“强调”，即在《资本论》文本中突出了18世纪机械物理学的侧

重点。为了解释“潜在”一词，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求助于18世纪机械唯物论。因此，“资本”一词的量化，“价值”一词的量化，乃是恩格斯强加给原作的两个重点。想把经济学与物理学结合起来的是恩格斯。淡化《资本论》中的黑格尔印记的也是恩格斯。

相反，马克思曾在成为第二卷第一篇的原稿中多次用到“潜在”一词，而且是明显地以黑格尔的方式使用的。例如，迪茨版第125页上马克思有如下一段评论：

二者的差，就是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这个超过部分总是由以下事实产生的：生产资本潜在地处在生产领域内，但不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执行职能；或者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但不处在劳动过程中。

接下一段马克思继续谈潜在的生产资本这个话题：

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准备好的那部分潜在生产资本，如纺纱厂的棉花、煤炭等等，既不起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也不起价值形成要素的作用。它是闲置的资本，虽然它的闲置是使生产过程连续不断进行的一个条件。为了保存生产储备（潜在资本）而必需的建筑物、装置等等，是生产过程的条件，从而也是预付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74]

在第二卷第一篇的另一个地方，马克思把潜在的概念应用于货币资本：

而在这里，贮藏货币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形式，货币

贮藏表现为随着资本积累暂时发生的过程，这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潜在的货币资本；这是因为，货币贮藏，即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的贮藏状态，对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来说，是一个在资本循环之外进行的，职能上确定的预备阶段。^[75]

马克思是把“潜在”一词用作结构互补性的同义语。在《逻辑学》中，黑格尔用“潜在”来描写从本质到现实的过渡。^[76]黑格尔追随亚里士多德，把潜在的东西视为“自我表现”、“自我实现”。^[77]马克思跟目的论的潜在定义决裂，代之以从结构要素的相互依赖性造成的条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准备好的那部分潜在生产资本”，表明他把潜在资本定义为成为具有生产过程的一种“可能性条件”。马克思所说的“贮藏货币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形式……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潜在的货币资本”，表明他把潜在资本定义为现实资本的出现的必要先决条件。马克思对潜在一词的使用毫无亚里士多德唯心主义的痕迹。但马克思的确一直很接近于黑格尔的影响，因为他把潜在定义为由总体内各要素的相互依存演化出的可能性条件。

所以说，恩格斯企图在 18 世纪机械唯物论的意义上解释“潜在”，这是对马克思的本意的极大歪曲。恩格斯曾指明，“潜能”或“位能”的概念是从能量转化理论借用来的。^[78]能量转化理论产生于 18 世纪的力学，首先是由罗伯特·迈尔（Robert Mayer）和赫尔曼·赫姆霍茨发表的。据迈尔说，“很多情况下的运动只有产生热的结果，因而热的来源唯有运动这一原因。”^[79]因此迈尔和赫姆霍茨描述了一个热力学的还原系统，在该系统中一切形式的能——热、光、电、磁、化学能和机械能，都产生于摩擦

生热。^[80]恩格斯把经济学比作物理学，认为正如有可能通过量的变化由热转化到电，也就有可能通过量的变化由潜在资本转化为资本本身。恩格斯不是像马克思那样谈论先决条件，而只讲能量。恩格斯不来自本质的运动（如上所定义的）出发考虑，而只讲度和量；马克思却是把经济系统想象为力学，想象为可以还原为可度量的能量度。明确地说，马克思把价值规定为形式上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东西；恩格斯则把价值规定为劳动的数量。^[81]

此外，恩格斯对马克思原稿的某些增添还表明，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就流通过程提供的结构分析方法不甚理解。在马克思看来， $M-C, P, C'-M'$ 这三个流通循环的周转，乃是工业生产基本过程的职能形式。明确表现资本主义体系之全体的核心、基本关系、乃是生产的活动。整个流通过程及其单个部分（ $M-C, P, C'-M'$ ）都是表现方式，都是总体生产领域中的局部化领域。

例如，在恩格斯作为“第四章”的“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中，马克思有一段话强调生产过程在流通循环的三个周转上的表现。马克思着重核心关系对各构成要素的作用。这段话出现在迪茨版的第105页，是恩格斯一般性地从手稿V（A66, A45/46, NU47A）中采取的，然后以恩格斯修改了的样子出现在迪茨版第105页。首先我得指出，恩格斯的“第四章”（第104页）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的一个脚注移入了正文。整个第104页——开头的话是“这三个公式”，末尾是“来说明商品”——采自马克思的一个脚注，它见于手稿V的底部，即A66, A45/46, NU7B。但是，从第105页开始，恩格斯又回到马克思的正文本身，而且整个105页都是采自A66, A45/46, NU7A。

马克思手稿的原文如下：

如果把任何一种循环都看作不同的单个产业资本所

处的特殊的运动形式，那么，这种区别也始终只是作为一种个别的区别而存在。我们的分析假定，资本价值在它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每一形式中总是找到它的全部价值总量，而且在它的每个阶段总是找到它适当的职能形式。例如，我们假定 422 镑首先是全部作为货币资本，然后全部转化为生产资本，最后又全部转化为商品资本，即价值 $500 \frac{1}{2}$ 镑（其中有 $78 \frac{1}{2}$ 镑的剩余价值）的纱。在这里，各个不同阶段会分别形成中断。例如，当 422 镑保持货币形式时，也就是说，在购买行为 $M-C(L+MP)$ 完成之前，资本只是作为货币存在，从而只执行货币的职能，全部资本只是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82]

恩格斯修改后的这段话却是：

如果把任何一种循环都看作不同的单个产业资本所处的特殊的运动形式，那么，这种区别也始终只是作为一种个别的区别而存在。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环中。这三种循环，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例如，现在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货币资本，但同时另一部分则离开生产过程，作为新的商品资本进入流通。因此， $W' \cdots W'$ 循环形式不断地进行着；其他两个形式也是如此。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就象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和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是连续进行的一样。可见，在这里，总循环是它的三个

形式的现实的统一。

我们的考察曾经假定，资本价值是按照它的价值总量全部作为货币资本，或作为生产资本，或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例如，我们假定 422 镑首先是全部作为货币资本，然后全部转化为生产资本，最后又全部作为商品资本，即价值 500 镑（其中有 78 镑剩余价值）的纱。在这里，各个不同阶段会分别形成中断。例如，当 422 镑保持货币形式时，也就是说，在购买行为 $G-W (A + Pm)$ 完成之前，全部资本只是作为货币资本存在并执行职能。^[83]

在比较上面两个版本的内容之前，我请读者注意恩格斯加入原作中的几处修改。迪茨版第 105 页顺数第 12 行的“但是实际上”开始，直到该段落末尾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这部分都是恩格斯增添的内容。在马克思的原稿上，正好在恩格斯这段添加开始前一句的末尾，即“只是作为一种个别的区别而存在”的后面，马克思画了两个“××”，然后有恩格斯手迹的一个记号“[]，2”。^[84]在恩格斯编辑第二卷第一篇所使用的马克思的任何其他手稿中，我都找不到恩格斯添加的这段话，所以只能视之为本来就是恩格斯添加的。此外，读者应该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的数学式的变化。在马克思的版本中，他写的是“500 $\frac{1}{2}$ 镑（其中有 78 $\frac{1}{2}$ 镑的剩余价值）”；而在恩格斯的版本中，恩格斯写的却是“500 镑（其中有 78 镑剩余价值）”。最后，这两个不同的版本还包括改述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在两个地方改述了马克思原来的表达方式。

比较这两个版本的内容，恩格斯的增添和改述造成了一种转移，即从生产过程的总体思想转到了流通过程的特殊的和单一的

形式。这是从生产过程的全体方面向流通的构成要素方面的一种转移。恩格斯写道：“总循环是它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这是明确地宣称构成要素形成总体；全体由单个要素表现出来。

马克思所说的意思却完全不同。马克思强调总体的先在性，即主要生产过程的全体方面的表现力量。马克思曾写道：“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在它的每个阶段总是找到它适当的职能形式”，恩格斯却把这句话删去了。马克思这句话是在肯定流通的周转对生产过程的依赖性。再有，马克思曾写道：“资本只是作为货币存在从而只执行货币的职能，全部资本只是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这句话恩格斯也忘了如实地保留下来。马克思在此再次强调，要素、特殊、成分都是主要关系形态的表现；基本的形式是生产，派生的形式表现为流通的周转。马克思的方法论更接近于黑格尔，他从过程的总体开始，再展开到其特殊性的功能表现。恩格斯则更靠近 19 世纪科学的经验论传统，他从特殊出发，各部分累加的结果便构成了一般。

研究一下删节方面的情况，可以进一步发现由马克思的总体性概念向恩格斯的特殊性概念的“重点的转移”。与添加方面的情况相类似，恩格斯不仅删去了马克思原稿中的一些不重要部分，也删去了其中的一些重要部分。在此我们仅提出与本文研究的主题有关并能说明主题的那些删节。

迪茨版第 61 页顺数第 13 行的“金或银的实物形式”一句话后面，恩格斯删去了这么一句话：“在那里，属于流通的形式很快会消失，它们仅仅是生产资本价值的职能变形。”^[85]迪茨版第 106 页顺数第 15 行的“资本的循环过程”几个字后面，恩格斯删去了“因为各个阶段的连续被看作是各种职能形式。”^[86]迪茨版第 106 页的这一段，顺数第 18 行，在“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后面，恩格斯删去的话是：“因此，资本的这些形式的每一种总是其特殊的职能领域和职能过程内的一种职能形

式。”^[87]为了确切说明这些被删去的文字的意义，我首先将迪茨版第106页上的这一段，按恩格斯的表述和马克思真正写的内容，分别摘抄如下：

[恩格斯]实际上，以上所说适用于处在运动中的资本的每一部分，并且资本的所有部分都要依次经过这种运动。假定10000磅纱是一个纺纱业主的一周的产品。这10000磅纱要全部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其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必须全部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只要资本价值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它就不能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它必须先进入流通，并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 $A + Pm$ 。资本的循环过程是不断的中断，是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抛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88]

[马克思]实际上，以上所说适用于处在运动中的资本的每一部分，并且资本的所有部分都要依次经过这种运动。假定10000磅纱是一个纺纱业主的一周的产品。这10000磅纱要全部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其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必须全部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只要资本价值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它就不能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它必须先进入流通，并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 $A + Pm$ 。资本的循环过程，因为各个阶段的连续被看作是各种职能形式，是不断的中断，是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抛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因此，资本的这些形式的每一种总是其特

殊的职能领域和职能过程内的一种职能形式。^[89]

显而易见，恩格斯删去了两个地方后，便转移了整段的重点。恩格斯的那段话突出了流通和生产领域的特殊性。他强调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马克思本来的这段话强调的是生产过程的总体性，他把流通过程、货币资本看作是生产过程的职能。^[90]

删节问题不仅涉及恩格斯对正文本身原有文句的排除，还包括“补充说明”方面——恩格斯把其中一部分收入，而把另一部分删去了。例如，我们已经提到，迪茨版第32页的第1段（从“为了纯粹地理解这些形式”到“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动撇开不说。”）是取自手稿V即A66, A45/1, NU1B上的一个“补充说明”。不过，恩格斯全凭他自己的意愿对这一“补充说明”作了取舍——他包括了上述一段，却删去了同一“补充说明”的其他部分：（1）“作为资本生命过程中的阶段的第一种形式活动有着职能上确定的内容：货币的数量将被转变成资本不劳动总体的因素，劳动力转变成生产资料，货币通过其资本的职能转变成各种特定的用途或自然形式。”（2）“资本价值的运动是资本主义每个阶段的中介，以不同的特征出现在每一阶段；M—C是商品的购买者（流通的行为者），P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及在C'—M'中（作为商品的购买者，流通的行为者）”。^[91]

为了弄清恩格斯对A66, A45/1, NU1B上的“补充说明”删节的形式和内容问题，我把恩格斯删改后的版本和马克思实际写下的文字摘录如下：

〔恩格斯〕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些形式，有必要把一切同形式变换和形式形成本身无关的因素撇开。因此，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

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

[马克思]为了纯粹地理解这些形式，首先要描述所有因素，并把一切同形式变换和形式形成本身无关的因素撇开。因此，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作为资本生命过程中的阶段的第一种形式活动有着职能上确定的内容：货币的数量将被转变成为资本劳动总体的因素，劳动力转变成为生产资料，货币通过其资本的职能转变成为各种特定的用途或自然形式……资本价值的运动是资本主义每个阶段的中介，以不同的特征出现在每一阶段；G—W是商品的购买者（流通的行为者），P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及在W'—G'中（作为商品的购买者，流通的行为者）。^[92]

马克思从生产开始：在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生产是首要的。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技术的因素造成了采取工业形式的经济生产能力；社会的力量要求工业生产能力受资本主义的目的的指导和牵制：工业生产的外壳是由资本主义的目标提供的。资本主义下的工业生产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朝着利润的目标演进的运动。流通是一种生产职能。流通的目的是利润的实现：流通是生产过程的那么一个环节，通过这一环节利润得以实现。此外，流通过程还分成若干派生形式：货币和商品是流通过程的职能性的派生形式；它们也是工业生产的普遍过程这一更大的运动的局部表现。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中造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即作为

一个整体的过程的首要性（马克思）与该整体由以出现的单个部分的首要性（恩格斯）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状态。从恩格斯给我们提供的版本中两种结论都可能得出。而未经恩格斯删节的马克思的原作却只允许我们得出一种结论：生产过程是总体化的运动；运动的单个方面，即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则表现为这个永恒的过程中的一些运动。向特殊性的转移、即造成总体是部分之和的可能性的转移，只会出现在恩格斯删节后的文本之中。

看看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货币的思想的胡乱删节，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我将举出三个例子。为了明确分辨两人之间的差别，我首先列出恩格斯修补后的整段文字，再抄出马克思的整段原文。

在迪茨版第65页的第2段末尾（“而在其他两种循环形式中则不是这样”后面）有一句话被删去了。这是“货币资本的循环”一章中出现的删节。恩格斯删节后的文字是：

货币资本的循环不仅是商品生产，这种循环本身只有通过流通才能进行，它是以流通为前提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因为属于流通的形式G是预付资本价值的最初的纯粹的形式，而在其他两种循环形式中则不是这样。^[95]

马克思的原文则是：

货币资本的循环不仅是商品生产，这种循环本身只有通过流通才能进行，它是以流通为前提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因为属于流通的形式G是预付资本价值的最初的纯粹的形式，而在其他两种循环形式中则不是这样。因此，货币资本的流通是产业资本流通中最明显

最典型的形式表现的最初资本。^[94]

在迪茨版第89页，即第二章“生产资本的循环”的第四节“准备金”中，有着两处删节。第一处出现在第四节“准备金”的标题下的第二段，即该页倒数第13行（“用来代替货币资本或它的一部分”后面）。恩格斯修改成这样：

如果 $W'—G'$ 过程超出了正常时间，商品资本不正常地停滞在它向货币形式转化的过程中；或者，在这种转化完成之后，比如说，货币资本必须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循环开始时的水平，这种起着积累资金作用的贮藏货币，就可以用来代替货币资本或它的一部分。这样，货币积累基金就充当准备金，来消除循环中出现的干扰。^[95]

马克思原来的文本是：

如果 $W'—G'$ 过程超出了正常时间，商品资本不正常地停滞在它向货币形式转化的过程中；或者，在这种转化完成之后，比如说，货币资本必须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循环开始时的水平，这种起着积累资金作用的贮藏货币，就可以用来代替货币资本或它的一部分，结果是 $W'—G'$ 的职能必然出现，而且这时完成其作为货币的职能（也就是说，货币资本的正常循环，在别的同等情况下，必然成为作为简单层次的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这样，货币积累基金就可以充当准备金，来消除循环中出现的干扰。^[96]

另一处删节见于迪茨版第 108 页，顺数第 16 行即第一段的末尾（在“正是由总资本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而引起的”后面）。这一删节出现在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中。

恩格斯的版本是这样的：

资本的一部分，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作为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资本而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货币资本而存在；第三部分则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而存在。所有这三种形式的经常存在，正是由总资本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而引起的。^[97]

马克思手稿 V 中的原文却是：

资本的一部分，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作为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资本而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货币资本而存在；第三部分则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而存在。所有这三种形式的经常存在，正是由总资本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而引起的。货币资本不断地作为出发点和复归点而存在——生产和流通两个无中介的过程甚至作为两个相反的流通阶段即 $G-W$ 和 $W-G$ ，依次前进；但这种依次运动找到了和解，它存在于资本的相反部分之中，起着截断另一流通过程系列的某一流通过程的出发点的作用，使这另一系列从而表现为一系列的形态变化，而且它成为在同一运动中执行职能的另一流通过程的出发点的一部分。^[98]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是购买即 M—C 的出发点，以及出卖即 C—M 的终点。因此它同时既是起始又是终结。但货币不是物，它不是自然物体，不是黄金。货币是那么一种状况、那么一种条件，它给予它的拥有者着手一次购买或结束一次销售的能力。货币从流通过程获得它的力量，正如流通过程从生产过程获得其力量。恩格斯冲淡了、模糊了马克思对过程、对过程内的现象的集中考虑。

在迪茨版第 41 页，有三处改述和一处增添的例子。它们属于“第一章：货币资本的循环”，采自原始手稿Ⅶ（A68）（A48/7）（NH7A）。第一例见顺数第九行（从“一旦依靠”开始）。恩格斯改述成的是：“一旦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的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就必然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99]马克思原来的说法则是：“一旦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的生产普遍化，生产的普遍形式就是商品的生产。”^[100]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相同的：都指出了这一事实：由雇佣劳动从事的生产伴随着仅仅为商品的生产而进行的生产。但是，在马克思那句话的后半句中，是以“生产的普遍形式”即总体的先在性开头的，再说到“商品的生产”即特殊性的东西，作为这个总体化过程的一个个别实例。相反，在恩格斯那句话的后半句中，恩格斯却设定“商品生产”即特殊性在自身中构成“生产的普遍形式”。从字面上看，恩格斯的改述更明白、更精确。在很多情况下，恩格斯的改述都通过简洁明确的手段改进了马克思的原文。然而，在我们这里所举的例子中，以及在很多其他情况下，从意义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是把商品生产视为普遍的生产的一种凝结，而恩格斯则把商品生产视为普遍的生产的构成。

在迪茨版第 41 页上还出现了另一个类似的“重点转移”的例子。倒数第 14 行恩格斯编辑成的话是：“资本家也必须以相同的规模作为货币资本家出现，或者说，他的资本必须执行货币资

本职能（德语为 *fungieren*（活动））的规模（德语为 *Massstab*（尺度））将会扩大。”^[101] 马克思的原文是：“资本家也必须以相同的规模作为货币资本家出现，或者说，他的资本必须执行货币资本之职（德语为 *funktionieren*（尽职））的层次（德语为 *Stufenleiter*（等级））将会扩大。”^[102] 在此恩格斯改动了马克思的两个措词：涉及数量方面和能动者方面。恩格斯把马克思用的“*Stufenleiter*”一词改为“*Massstab*”，即把“等级”改为“尺度”。从语法上讲，“*Stufenleiter*”是个比喻性的词，而“*Massstab*”则是个名词；因此，从语言上看，恩格斯是把一个强调渐进等级的比喻词变成了一个强调特定事物和数量的名词。再者，恩格斯的文本是“资本活动（*fungieren*）”，按此说法即资本是个能动者、是个主体，它起着货币资本的作用。马克思的原文与此不同。在马克思的用词中，资本是尽职（*funktionieren*），即资本是一种表现，是更大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凝结。

第三个改述的例子见于倒数第 19 行（以“它们来自”开头一句）。恩格斯修改后的句子是：“它们（商品）来自那些完全和他的生产部门分离的独立经营的生产部门，作为商品进入他的生产部门，因而是必须购买的。”^[103] 马克思的原文却稍有偏差：“它们（商品）来自独立的经营部门，推进那些完全和他自己的生产部门分离的生产部门，作为商品进入他的生产部门，因而是必须购买的。”^[104] 在同一页倒数第 17 行（在“必须购买的”之后），出现了第四处更改。在此恩格斯增添了“物的”一词，使这句话成了“商品生产的物的条件”，^[105] 而马克思的原句是“商品生产的条件”。^[106] “物的”一词的增添，又一次强化了恩格斯文本的量化性。恩格斯的所有这些修改都突出了《资本论》的物质化和科学主义的含义。迪茨版第 41 页上改述的例子，即有关“独立经营的生产部门”的例子，无可怀疑地说明了在一个具体句子中“意义的变换”。马克思的那句话讲的是，一个生产部门

的商品的出现，乃是为某个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商品的“独立的经营部门”的结果。在此，恩格斯讲的是，“独立经营的生产部门”生产由另一生产部门购买的商品，而马克思的意思却是“独立的经营部门”生产由另一生产部门购买的商品。虽然在这一个特殊例子中存在着明显的“意义的变换”，但我们无权仅仅据此一例就说恩格斯改变了《资本论》第二卷整个第一篇的意义。我们只可以说，在一些个别情况下恩格斯的确改变了意义。我们还必须证明他对整个第二卷第一篇的意义的改变。但恩格斯在个别情况下的确改变了意义的事实，展示了他确实改变了整个第一篇的意义的可能性。^[107]

迪茨版第56页上有一个地方，能说明恩格斯的改述使马克思的原文更为清楚明白。这还是迪茨版的第一章“货币资本的循环”，采自马克思的原始手稿V（A66）（A45/18）（NU17）。恩格斯的改述开始于迪茨版第五十六页倒数第十四行、倒数第三段（开头的话是：“因此，在这里”），行文如下：

因此，在这里，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并不是指这样一些独立的资本，这些独立的资本的职能形成同样独立的、彼此分离的营业部门的内容。在这里，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功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108]

马克思的原稿是：

因此，在这里，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并不是指这样一些独立的资本，这些独立的资本的职能形成同样独立的、彼此分离的营业部门的内容。在这里，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功能形式。另一方面，生产资本也不

是独立的资本，而只是产业资本的一种特殊的职能形式，这种形式是产业资本在其生产阶段所具有的。^[109]

上述恩格斯的表述与马克思的表述意思相同。很显然，恩格斯表述得更为简洁，使其中的意思更易于理解。

另一处表明将原文量化了的例子见迪茨版第101页，“商品资本的循环”一章。该页顺数第18行（“社会资本的总运动”之后），恩格斯改述成：“= 单个资本的运动的代数和。”^[110]这段马克思的原文见于手稿V（A66）（A45/44）（NU45A），原话是：“社会资本等于单个资本运动的总和。”^[111]比较这两句话，有两点很明显：恩格斯不仅去掉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一语（原文如此——译者注），而且增添了“代数和”一词。这是他为了解释社会总资本，觉得一定要使用一个数学的、可量化的词语。结果是，经过恩格斯的改述，原著的可度量性、科学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了。

同一页中还有一处改述，再次说明了从马克思的总体性到恩格斯的特殊性的转移。倒数第18行（“作为……来看”之后），恩格斯的话是：“作为社会资本总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即和社会资本的其他部分的运动联系起来看。”^[112]未更改的马克思的原话却是：“作为一个运动、作为社会资本总运动的一部分的一个运动来看，即和社会资本的运动联系起来看，也和社会资本的其他部分的运动联系起来看。”^[113]未改动的马克思的原话突出了被动性的和转化性的语气，他集中考虑的是社会资本的总体过程：“社会资本”的总体才是能动者，而且它使自己成为“其他部分”的中介。按照恩格斯的提法，对整个“社会资本”能动性的强调被淡化了、模糊了。虽然恩格斯的表述再次使行文更为明白，但它却减弱了马克思对总体性和全面规定性的强调。

由“国际出版社”（International Publishers）出版的1967年版

的《资本论》第二卷在这方面是可疑的。“国际出版社”的版本乃是莫斯科“进步出版社”（Progress Publishers）发表的英文版的翻版。莫斯科的译本由于受恩格斯的影响（在此具体指迪茨版第101页），既不可靠又偏向于支持恩格斯对原文的量化。例如，在上面讨论的那一段中，莫斯科版把“Gesambewegung”译为“aggregate movement”（合计运动），而我则把它译为“whole movement”（整体运动）。恩格斯原来还添加了“代数和”一语，意味着社会资本起着数学上的决定作用。莫斯科版顺着恩格斯的意思，使用“合计运动”一语，把这运动表现为其各个部分的“代数和”，表述为可以在数量上结合在一起的独立要素的复合。而我所译的“整体运动”则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它强调这个运动是个不可分的连续统一体。根据卡塞尔（Cassell）的说法，“gesamt”是个形容词，意为“整个的、全部的、完全的，统一的、结合的、共同的、总体的、集合的”。卡塞尔曾说明，“gesamt”只有在“Gesamtwert”——意为“总价值”——一词中才用作“合计”的意思。然而，“gesamt”有两个内涵，一是强调整体性、全体性和不可分性；二是强调可分的原核部分的集合。莫斯科版选择“合计”一词，倾向于强调可分的、原核的各部分。依据恩格斯的“代数和”的提法，莫斯科版确定把“运动”解释为可分要素的“总和”。这一认定是有争议的。马克思的原文表明他关心的是表现在单个资本家那里的“社会资本”的连续统一体。在这里的上下文中要把握住这层意图，更准确地是把“Gesambewegung”译作“整体运动”，以符合社会资本的统一性和连续统一体的意思。^[14]

由马克思对总体过程的强调走向恩格斯对特殊性的强调这一“重点的转移”，其关系之重大，可以通过参看迪茨版第49页的另一改述进一步看清楚。这一改述出现在第一章“货币资本的循环”，开始于该页顺数第7行（“资本的循环”之后）。恩格斯的

表述是：“作为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这个货币额包含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且它们已经不再像在纱里面那样交织在一起，它们现在是并列着的。它们的实现，使它们二者各自取得独立的货币形式。”^[115]未经改动的马克思的提法却不同：“当商品资本实现自身于货币形式中，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便不再结合，它们是并列的。它们的实现，使它们二者各自取得独立的货币形式。”^[116]在马克思的原文中，马克思开始于抽象的东西，即范畴、形式。在马克思那里，活动的原因是抽象的形式的“商品资本”：马克思突出转化性，因为范畴即“商品资本”活动而造成货币形式的结果。在马克思那里的活动是从抽象形式的“商品资本”进入抽象的范畴即“货币形式”。在恩格斯的修改中则发生了量化的变化。在恩格斯看来，活动着的是一笔“货币额”。一笔“货币额”乃是一个物质的、可度量的数量。这样一来，恩格斯便再一次增强了文章的自然科学色彩。其次，在恩格斯看来，活动着的是一个主体、一个非转化性的能动者，亦即一个物质的、具体的、特殊的能动者——一笔“货币额”。恩格斯的笔调是反思性的。在恩格斯看来，抽象、范畴、形式都不活动，能够活动的只是一个具体的、特殊的主体。

马克思把活动赋予抽象的和形式的范畴的另一个例子在迪茨版第39页。它出现于第一章“货币资本的循环”讨论资本主义的作用的历史前提时。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句子的改述，清除了马克思所理解的一般、普遍的东西活动着的全部意味。恩格斯抹去了马克思那里的黑格尔主义痕迹。这段马克思的原文见于手稿Ⅶ(A68)(A48/6)(NH6A)。恩格斯的改述见迪茨版第39页顺数第3行(紧接“问题还有另一方面”)。

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此也需要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

展到一定的阶段；因为不是为了出售，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表现为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117]

马克思写成的原文是：

商业发展的一定阶段，加上商品流通和随之而来的商品生产（因为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即不是为了出售而生产的物品，是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在资本主义中，生产本身为商品所占有，需要商品作为生产的标准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征，这时商品生产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基础。^[118]

拿马克思的原文跟恩格斯改动的文本一对照，人们立即深刻感到恩格斯文风的明晰。尽管这段话是马克思在1878年写的，那是他在英国居住了28年之后，但马克思的文风仍旧是浓重的日耳曼式，即毫无区别地给主语堆积许多个说明语，结果是容易模糊主语。恩格斯由于学过新闻写作，早年就受过简炼写作的训练，而且他自己的风格的英国化更增强了这种对明晰性的爱好。我们承认，恩格斯的文字比马克思的文字更好读；我们承认，马克思的原作和恩格斯的改作都达到了同样的最终目的，但是，两个版本通过两条不同的路线达到它们的目的，这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马克思的原作从存在的前提的观念出发，从需要预先假定的东西出发，所以强调的是一般的生产范畴。马克思说，生产是受“占有”的，结果，生产“需要”有前提。马克思进而肯定，生产的“标准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征”改变了，一种形式的生产被压垮，改变成了另一种类的生产。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便是

“商品的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换句话说，马克思整个这段话的主语是形式的范畴“生产”，顺此下来告诉我们的，是这个生产的前提作为一种先决条件出现于不同的经济环境时，它如何地变更自身。恩格斯的修改本本质上是不关心生产的，而主要非的是资本主义。恩格斯把资本主义定义为其各特殊部分的总和，资本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特殊。马克思关心的却是普遍的生产范畴的历史，是使得这普遍范畴必然表现其自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马克思集中于一种普遍的生产的进程；恩格斯则集中于分离资本主义的核心成分。

恩格斯对马克思原作的改述，不仅限于句子和段落的变化。常见的是，恩格斯仅仅换动一个单词。换动最多的是“funktionieren”（尽职）一词。在马克思使用“funktionieren”的地方，恩格斯则换用“fungieren”（活动）一词。第二卷第一篇正文共122页，除去删节、重新编排、变动结构之类修改时用“fungieren”代替“funktionieren”的情况，仅单独这一字改动的地方就至少有18处。^[19]

德文“funktionieren”相当于英文“function”，德文“fungieren”则相当于英文“act”。马克思之所以使用“funktionieren”一语，是因为他想强调总体性要求特殊性去发挥的职能。既然马克思是从形式的、范畴的东西开始，所以他企图强调的是，特殊性的东西并不自行“活动”（act），而是“尽职”（function），是形式的东西的过程的中介。恩格斯之所以使用“fungieren”一语，是因为他想强调特殊性的要素。由于恩格斯关心的是要说明全体仅仅由部分的活动总和组成，所以他代用“fungieren”一词，以便强调单一者的“活动”（act）。

恩格斯还替换了其他一些词语。例如，他用“Kreislauf”（循环）代替“Bewegung”（运动）。德文的“Bewegung”相当于英文的“movement”或“motion”，“Kreislauf”则相当于“circuit”或

“rotation”。我们不想详尽无遗地计算，仅看第二卷第一篇就至少有五个地方，恩格斯用“Kreislaufl”代替了“Bewegung”。^[120]

若把这两种用词跟某个经济范畴，如资本，联系起来，这种替换的影响之大就很清楚了。按照恩格斯的措辞，资本经过的是“循环”（Kreislaufl）。在第二卷第一篇，资本的“循环”用公式“M—C…P…C’—M’”来定义。资本的一次“循环”指的是资本的一次完整的运转，即从最初的原材料购买，到由该原材料产生交换价值的生产，再到为获取利润的该商品的出售。恩格斯的表述所指的这种“循环”是有限的、封闭性的、特定的，是对单一资本的单一活动的描述。按照马克思的措辞，资本必然包含在一种“运动”中，它是“运动”着的。马克思的表述向我们展示的不是资本的封闭的、有限的、终结的活动，而相反，是资本的总体化的、连续不断的过程。马克思的术语——资本的“运动”，意指的是一个总体过程，不是范围有限的M—C…P…C’—M’所概括的过程，而是不可分割地进入生产过程的每一方面的运动。例如，假若我们把“循环”和“运动”运用于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那么恩格斯的公式便毫无意义。我们要谈论印度资本主义的资本“循环”，并以此指的是“M—C…P…C’—M’”的单一、封闭和有限运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里，恩格斯的公式是片面的、部分的，它漏掉了印度资本主义资本的许许多多含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使用马克思的术语，并谈论印度资本主义资本的“运动”，那我们所得到的概念和见识就会包括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的一切方面。印度资本主义资本的“运动”指的是印度生活所有层次（从教育至工业）的资本的总体过程。此外，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乃是资本的普遍化“运动”的一种“职能”。如果资本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循环”，那么它便是无终止的，容易倾向于无限和全球化。因此，资本主义，即资本的全球化，便成为资本一般即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资本的连续

“运动”的一种“职能”。

恩格斯的修改不仅去掉了黑格尔的痕迹，造成了从总体性到特殊性的“重点转移”，而且是使《资本论》篇幅剧增的主要原因。第二卷第一篇篇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恩格斯硬要把解释性的脚注和补充说明收入正文。研究恩格斯如何加大篇幅的最好办法，是看看他怎样改变《资本论》的结构。

结构变动的一个恰当的例子见于迪茨版第75~79页。这是在题为“生产资本的循环”一章，即第二卷第一篇的第二章。为了准确理解下面的讨论，最好手头备有一部迪茨版的《资本论》，跟着我的讨论随时查阅。

本段我要重温马克思本来的结构。在此所讨论的一大段文字中，马克思论述了商品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在原稿中，马克思的论述开始于第75页最后一段（以“第一，货币资本G出现”开始的那一段），该段结束于第76页头上第一段（最末一句是“与一般商品流通本身无关的因素”）。未更改的马克思的原文由此接下来是第77页中间两段，这两段开头的话分别是：“第二，在流通中”和“第三，它的职能”，换句话说，在未修改的原稿中，紧接着第76页第一段（末句话是“与一般商品流通本身无关的因素”）的是第77页上的两段，这两段分别开始于“第二，在流通中”和“第三，它的职能”，直到第77页这三段的结束（末句话是“商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媒介”）。再有，未修改稿上由此又是过渡到第79页的第三段。换句话说，在原稿上，第77页第三段的结尾（末句话是“商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媒介”），紧接着的是第79页的第三段（开头的话是“在形式I中”），直至“也就是反复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先导”。在此，为了使读者能明确未修改稿的原样，最好请读者在迪茨版上作以下注明：第76页第一段旁边注上AA，第77页第二和第三段边上分别注以BB和CC，第79页第三段注以DD。^[121]马克思的原作

都在手稿V、A66、A45/27、NU27A上。

恩格斯的修改版扩大了内容，使篇幅实际增加了一倍。例如，请参看迪茨版第76页，在该页第一段的末尾（这段的最后一句是“与一般商品流通本身无关的因素”），马克思本来安排了一个脚注“PT1”。按照他自己的编排习惯，他把这个脚注的内容写在了他的NU27B页的下半部分。

恩格斯却把这个脚注插入了正文本身。换句话说，从第76页上的“G'表现为W'的转化形式”一句开始，到第77页上的“储备形成的概念完全消失了”一句为止，整个这一大段，本来在马克思那里属于NU27B页上的脚注“PT1”，现在却成了恩格斯正文的基本内容。

恩格斯对《资本论》这一部分内容的扩大不止于此。例如，恩格斯在插入了上述一段之后，接下两段又回到了马克思的正文，即回到了NU27A。简言之，恩格斯回到了马克思原来的正文，抄下我刚标明为“BB”和“CC”的两段。但是，“CC”一段，即以“商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媒介”结尾那段完了之后，马克思本来又有一个脚注，即“P.2”。对此马克思还是按照自己的编排方法，把脚注“P.2”的内容写在了NU27B页的底部。恩格斯却再次把这个脚注从下半页提到上半页，将它插入了正文本身。实际上，马克思的脚注“P.2”篇幅较大，从NU27B页的底部一直继续到下一页的底部即NU28B。于是，从第77页末段（头句话是“循环要正常进行”）一直到第79页第二段末（以“W'所代表的单个资本”结束），所有这部分材料本来都是NU27B和NU28B上的脚注，现在却都成了恩格斯的正文的基本内容。第79页上接下来的那一段，即我标明为“DD”那段，是恩格斯又回到马克思原稿的正文取来的。^[122]

恩格斯变动结构的做法有两个重大后果。首先，导致了《资本论》的篇幅剧增。脚注本来是马克思思想留作说明性材料、与原

稿主体部分独立开来的，恩格斯却把它们塞进正文，造成了《资本论》篇幅的增大。其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的扩大改变了手稿本身的特征和形式。例如，照马克思的结构，把我标为 AA、BB、CC 和 DD 的这四段并列连贯起来，那么马克思所要强调的东西就很明确了。整个这一章的主题是“生产资本的循环”。在上述四段（即 AA、BB、CC 和 DD）中，马克思描述了货币怎样变为生产资本。货币可以把自身转化为劳动，并从而使自身变形为生产资本。它可以把自身转化为商品，例如棉花加工成纱，并从而使自身变形为生产资本。马克思的解说强调的是货币资本通过劳动或通过原材料转化为商品资本，以及由商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过程。

恩格斯把脚注插入正文，并未有助于马克思原先的解说。事实上，恩格斯的剪接倒是给正文加上了一种不同的色调，由于增添的是无关紧要的材料，便造成了马克思原稿的重复。采自 NU27B 上的第一个脚注，被置于迪茨版第 76~77 页，恩格斯将它塞入正文，也就是插入了关于过去劳动的讨论。由于把更适于用作说明材料的脚注插入正文本身，恩格斯便使读者转向了对过去劳动的分析。在等式 C—M 中，货币总是过去劳动的一种表现；或者说，除非过去劳动已经创造了一笔货币的补充，否则商品的购买便不可能。此外，为了证明过去劳动的需要，被恩格斯包括在正文中的这段话中还有几句是讨论数学等式的，马克思这些讨论的意图是对货币变为生产资料的运动的量化。再有，这一段还包含对于在生产过程中提高工人工资的需要思考。

另外，第二个脚注采自 NU27B 和 NU28B，被恩格斯插入第 78~79 页迪茨版的正文中，这就是把涉及货币的各个方面的材料引入了正文本身。这部分材料说明的是，只要货币仍然仅仅是货币，仅仅是循环的媒介，其价值便不可能增长。为了使货币增殖，它就必须转化自身。增殖的过程就是转化的过程；货币必须

变形为商品或生产资本，然后又再转化为货币。在第二个再转化过程中，在它的第二次形态变化中，货币便增殖了。

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货币到生产资本的运动，而恩格斯的剪接却引进了关于过去劳动、提高工资、货币增殖和货币增殖的数学计算等思想。虽然这些外加的段落也都是马克思的原话，但马克思明显地把它们排除在文章的主流之外，而置之于脚注之中。恩格斯插入正文的思想内容与上下文的主题大意并无紧密的联系，而仅仅是些有趣的扩充。《资本论》的这一部分的中心主题是关于货币向生产资本的转化，而不是关于通过过去劳动对货币的创造，也不是关于为了使货币增殖而需要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被恩格斯变动了结构的这段正文，由于在如此短的篇幅中以如此多的形式去说明货币概念，文字便变得啰嗦重复了。此外，马克思的数学计算内容的包括进来，增加了文章的量化色彩。《资本论》的经验主义调子提高了，它那科学预见性的态势更为明显了。

恩格斯的另一处变动结构的例子可以佐证他那重点转移的性质。下而研究的是见于迪茨版第 80~81 页的结构变动情况，那也属于“生产资本的循环”一章。^[123]恩格斯的这部分材料都取自手稿 V，A66，A45/29，NU29A 和 NU29B。在此，为便于追寻恩格斯的作法，同样请读者手头备好一部迪茨版。

首先我要描述的是马克思原来的正文。马克思原稿 A66，A45/29，NU29A 上的正文，在迪茨版上开始于第 80 页顺数第 6 行。^[124]这第 6 行开始的话是“循环中的 C—A 的结果”，它也就是马克思原稿 A66，A45/29，NU29A 上一开始的话。原稿由此一直继续到迪茨版第 80 页第 2 段末尾，即该页顺数第 22 行以“这一点在考察危机时很重要”结尾的一段。迪茨版上由此接下去，即以“W' 一旦卖出”开始直到第 81 页的那一大段，便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几个脚注构造的内容。对此结构的变动我将简略地

讨论一下。但第 81 页第 2 段又重新回到了马克思本来的正文，这一段是从该页倒数第 13 行“当商品 Pm 和 A”开始的。换句话说，我们在从第 80 页顺数第 6 行的“循环中的 G—A 的结果”直到该页顺数第 22 行的“这一点在考察危机时很重要”，这一大段正文旁标记 AA，再在第 81 页倒数第 13 行以“当商品 Pm 和 A”开始那段边上标以 BB，便能够弄清马克思的正文的连贯性。在手稿 A66，A45/29，NU29A 上马克思是从 AA 直接过渡到 BB。

不过，在顺数第 22 行的“这一点在考察危机时很重要”一句后面，马克思原来有个脚注“P1”。从第 80 页顺数第 23 行的“W’一旦卖出”到第 81 页倒数第 14 行的“资本再生产过程”，这一大段正文乃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脚注构造的，这些脚注马克思本来写在 A66，A45/29，NU29B 上，即该页的下半部分。下面我就来谈谈恩格斯采自马克思 NU29B 上的几个脚注构造的这一段话。

为了弄清恩格斯的这一段结构变动，读者必须知道，马克思笔记本的下半部即这里的 NU29B 又分为两个独立的脚注和一个标了“II”的补充说明，而且标为“P1”的独立脚注是在“II”这个记号之下。恩格斯把这两个脚注和一个补充说明交织成了长长的一段。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脚注“P1”末尾为脚注“P2”标了个记号，却无内容。这表明，如果马克思思想使脚注联系起来，他本来就更愿意使脚注“P2”直接跟着脚注“P1”。恩格斯没有遵循马克思的明显暗示。马克思似乎想使脚注“P2”出现在最后，但恩格斯却把它置于他根据这些脚注和补充说明构造的那一段的中间。为了正确地理解这段构造的材料，读者首先必须知道，它乃是恩格斯根据两个独立的脚注和一个补充说明，将各种不同的内容混合而成的。

第 80 页倒数第 17 行的“W’一旦卖出”到倒数第 13 行的“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这中间的两个句子采自 NU29B 上的脚

注“P1”。我们将看到，脚注“P1”并非就此为止，而恩格斯却打断脚注“P1”的连贯性，仅摘下这两句，并把它插入整个补充说明“II”。换句话说，从第80页倒数第13行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到倒数第7行的“只能是大商人”，这中间的两句乃是整个补充说明“II”的内容，它却被恩格斯插在了他这一段的中间。抄完补充说明“II”，恩格斯又回到脚注“P1”。简言之，从倒数第7行的“在一定的界限内”到倒数第3行的“这个商品从中出来的资本循环”，这两句又是采自脚注“P1”。脚注“P1”还没有完，但恩格斯却又一次断然破坏它的连贯性。从倒数第二行的“例如，纱一旦卖出”直到第81页顺数第4行的“不会中断”，这中间共三句话的材料便是整个脚注“P2”的内容（马克思本来也是把这部分置于脚注“P1”之后），恩格斯将它插入了脚注“P1”的中间。此后的全部内容恩格斯又是回到了“P1”。换言之，从第81页顺数第4行的“如果这种过程扩大了”直到顺数第26行的“资本再生产过程”，其中共十个句子，乃是再次从脚注“P1”取来的。略为换一个角度，总的来说，恩格斯对这一段的构造是：他从脚注“P1”取来了这段的头两句，从补充说明“II”摘取接下两句，再下面两句又是来自脚注“P1”，接着的三句采自脚注“P2”，最后十句也采自“P1”。

上述对恩格斯的变动结构的讨论，说明了他的做法是令人生畏的。至少，《资本论》的这一段的形式被大大地改变了。但对于内容我们也必须加以比较。由于这些文字仍属于讨论“生产资本的循环”一章，所以马克思所关心的仍旧是货币向生产资本的转化问题。在我标为AA和BB的迪茨版第80页和第81页的两段中，马克思描述了货币不立即转化为商品或生产资本时的两项职能。货币可以存放或贮藏起来。当货币被存放起来时，它仍然处在流通过程中，不过暂时处于流通中断状态。当货币被贮藏起来时，它便完全退出了流通过程。存放的货币保留其资本价值，

保留其转化能力，因为它可以立即重新进入流通过程，并购买商品或生产资本。而贮藏的货币则放弃了它的资本价值。它不再保留其资本价值的能力，不再能够继续进行购买或出售。在贮藏中，货币丧失使购买和出售永远继续进行的能力，这一点对于经济危机的到来是很有影响的。

被恩格斯塞进正文本身的那一段，却把讨论的中心由对货币的存放和贮藏的分析转到了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分析。在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脚注和补充说明构造的这段文字中，讨论的中心是资本家扩大生产的需要，以及从而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大的商品供应的趋势。这一探讨进而描绘了生产过剩的形式，即卖不出去的商品的积存，以及接踵而来的资本家为出售这些商品而发生的野蛮竞争。这一段触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周期性命运这一主题，以及它将由于生产过剩的危机的结果而灭亡的假定。

有趣的是，被恩格斯编织在一起的那两个脚注和一个补充说明，它们各有自己独立的主题。脚注“P1”的篇幅最长，它一开始描述了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它进而描述的是，商品转化为货币后又如何由货币再回到再生产过程。由于再生过程的广泛扩大，它所生产出来的商品便不一定马上消费掉。生产过程的扩大会带来更大的劳动就业，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出来的商品会被消费掉。生产过程的某个部门生产的商品不一定是某个雇佣劳动力所购买的商品。因而，在生产过程的某些领域，商品就可能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的状况乃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前提。插在脚注“P1”头两句话之后的“补充说明”只有两个句子，涉及的主题是资本主义不断扩大生产的需要。脚注“P2”有三个句子，讲述的是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它说明了商品转化为货币便完成了资本的循环，商品本身的命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货币的重新出现及其再次浸入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整体的影响力超过了个别部分的重要性。被马克思放逐到脚注和补充说明中的思想，

经恩格斯的变动插入了正文本身，这一思想便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恩格斯拔高了生产过剩必然带来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

我们已经提到过恩格斯在迪茨版第 105 页上所作的数学上的修改，但至今未提及他在第 72 页上所作的数学变动。第 72 页顺数第 5 行，马克思本来写的是“1500 磅”，恩格斯却把它改成“1560 磅”。顺数第 6 行马克思原来的数字是“1500 $\frac{1}{2}$ 磅纱”，恩格斯改为“1560 磅纱”。顺数第 12 行恩格斯删去了马克思的几个字，即在“C 中的纱的数量”几个字后面，马克思原有“假定 d 磅 = $\frac{1}{2}$ ”一语，恩格斯却把它去掉了。顺数第 13 行有两处对马克思的计算的改动：马克思原先的“1d.0.8”被恩格斯改成了“8929 便士”，马克思原先的“8d.3.112f”也被恩格斯改成了“1200 便士”。顺数第 14 行可找到一处修改，即把马克思本来写的“3.488f (1lb.—1ct.)”改成了“1872 便士”。⁽¹²⁵⁾虽然恩格斯的这些数学上的改动，好像很明显，是改动这些经济学计算的数量，而我也并不认为它们有重大的关系。在此我只是把这种情况提出来，其关系是否重大就留待数学家或经济学家去讨论吧。而且我也不能说对恩格斯在数学上的改动已详尽无遗地列出来了，其他一些例子在文章中还是存在的。

现在该进入本研究的最后一项了，在这个方面我将把马克思的原文跟恩格斯相应的修改版并行列出，以便对照。我将把马克思原稿中的两段话翻译出来，跟恩格斯同样的两段话并列，再加以分析评论。最后我们还要谈谈在恩格斯的迪茨版第 120 页上删去了的马克思的两段原文。被恩格斯删去的段落和被他用来自取的马克思的原始材料都将译成英文。通过这一对照比较，将使本章业已提到的恩格斯修改马克思的很多问题得到具体说明。

在进行这一比较之前，我要破例涉及一下第二卷第一篇以外的材料。我要谈的是恩格斯添加进《资本论》第三卷的一段话。

这段话的情况不像我摘自第二卷的那些文字，恩格斯给它加了括号，并署上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清楚地表明了这是他的添加。此外，我之所以不愿违背自定的集中讨论第二卷第一篇的限制，有目的地摘录第三卷的这段话，是因为它有助于我的论点，即恩格斯突出了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的思想。恩格斯的这段添加见于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其主要部分如下：

自从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业的一切领域内，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与此相反，这些增产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却日益变慢。大工业在几个月中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几年内未必吸收得了。此外，那种使每个工业国家同其他工业国家，特别是同英国隔绝的保护关税政策，又人为地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结果是全面的经常的生产过剩，价值下跌，利润下降甚至完全消失；总之，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但是生产社会化的这个形式还嫌不足。各个公司的利益的对立，过于频繁地破坏了它，并恢复了竞争。因此，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126]

按照恩格斯说的，资本主义制度遭受着“经常的生产过剩”、“利润消失”（这是复述马克思说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这将导致剥夺者和被剥夺者之间鸿沟的加深。生产过剩将造成“价格下跌”和工资减少，造成工人阶级更悲惨的境地。最后，集中化、两极化和贫困化这三个因素，将导致资本的全面衰落。

《资本论》全书处处可见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它是恩格斯塞进去的。为了对恩格斯将崩溃论注入马克思手稿的情况加以评论，我们来比较几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字。

首先对下面两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字加以并列对照：

恩格斯修改的迪茨版第 109 页：

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那些把价值的独立性看作是单纯的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

马克思（参看索引 C 马克思的德文原文）：

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种不同形态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那些把价值的独立性看作是单纯的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

在其中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因为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首先是单纯的运动形式，所以对资本价值在它的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革命就不去考虑了。但是很明显，尽管发生各种价值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价值完成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销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资本的运动所以会表现为产业资本家个人的行动，是因为他作为商品和劳动的买者，作为商品的卖者和作为生产的资本家执行职能，因而通过他的活动来促成这种循环。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

在其中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因为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首先是单纯的运动形式，所以对资本价值在它的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革命就不去考虑了。但是很明显，尽管发生各种价值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只有（这个运动从……〔字迹不清？基础〕将自身强加于产业资本家，其作用是商品和劳动的购买，商品的出卖者，以及或生产的资本家）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成为独立的、价值完成它自身的连续过程（通过资本的中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销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单个的产业资本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但是，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就会有越多的投机的资本被迫受制于这个自动的价值运动，而且单个资本的处境就越危险。甚至在它们想反对它时，这个过程的

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屈限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家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因此，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获得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性。^[128]

正常发展却得到了证实，而且价值作为资本——它通过自身的运动首先发源，然后保持其自身，继续其独立性。⁽¹²⁷⁾

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区别在上述引文中表现得十分集中和鲜明。首先，恩格斯对量化和科学主义的癖好是无可否认的。在引文快完的地方，恩格斯谈到“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时，他自己加上了“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恩格斯之所以使用这一短语，他推论的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前面我们曾看到，恩格斯在一段正文中插入了这样的话：“潜在的，因为它停留于货币形式时，不能作为资本发生作用”，接着他又在这话的脚注中把货币资本比作能量转化规律。想把《资本论》变成预言资本主义演化的科学工具，这乃是恩格斯的图谋。由于恩格斯沉浸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所以当他把自然科学与经济学并举时，也就是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变成了决定论—实证的经济科学。恩格斯所运用的解释模式乃是因果决定论的链条。

马克思所运用的解释模式不是因果决定论的，而是结构相干性模式。在上述马克思的原稿中，他把资本描述为一种综合的重力，“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马克思的段落

中的前提是资本，或决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单个要素的先决条件。他再次从转化性的角度出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压倒一切的目的是利润，这个压倒一切的目的造成了资本主义结构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依存，于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条件便预存于利润的实际实现：剩余价值仅仅是存在于要素的聚结中的先在条件的物质化。马克思对结构互补性模式的运用适合于这里摘译的所有段落，因为这些段落都是来自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马克思在这一章中讨论了运动的每一种形式： $M \rightarrow C$ ， $P \rightarrow P$ ， $C' \rightarrow M'$ ，为的是要说明这每一种形式都是支配性的结构的一种局部化表现。

恩格斯在上述引文中还改换了两个用词，这进一步证明了他对因果决定论模式的屈从。这段话开头有个句子，马克思写的是：“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种不同形态的循环过程”。恩格斯却把它改成了：“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换句话说，在马克思措词为“形态”（Formen）的地方，恩格斯代之以“阶段”（Stadien）。马克思考虑的是从一个过程现实化出来的不同形态，恩格斯想到的却是由必然性逐一展开的事件的因果序列。此外，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中加进了“周期性的”（periodischen）一词，述说的是“周期性的价值革命”。由于插入“周期性的”一词，恩格斯再次引进了经济大灾变的概念：他暗示的是，资本主义容易遭受周期性的危机，而且周期性的危机的结果将是它的崩溃。若把恩格斯引入的“周期性”危机的概念，跟“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这一概念——也是恩格斯加进这段话的，结合起来，便构成了不可避免性和经济灾变的思想。恩格斯的因果决定论的解释模式，以及他对经济崩溃论的供奉，一旦结合起来，便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崩溃是由经济决定的思想。

在上述恩格斯的版本中，主体不是价值概念，而是单个资本

家的活动。有句话中恩格斯增加了：“资本的运动所以会表现为产业资本家个人的行动”。另外，同这句话接下来，他又用他自己的“活动”（fungiert）一词取代了马克思用的“尽职”（funktion），所以这句话的结论就是，“产业资本家个人的行动，是因为他作为商品和劳动的买者……”。恩格斯把被动变成了主动，结果作为主体的不是过程，而是单个的人。关于恩格斯在此的个体化还可以提出的证据是，他把马克思所用的“资本”一词换成了“资本家”。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根本没用到“资本家”一词（原文如此——译者注），马克思提到的是“产业资本”。马克思在此又是从被动的、集合的意义上表述。“产业资本家个人”这话全是恩格斯换上去的。由过程到个体的“重点的转移”再次得到了证实。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谈到资本价值时，他心中有一系列的必要条件，即作为价值的存在和增大的基础的各种因素的聚结。因此，当他提到价值的“独立性”时，他指的是，资本主义价值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可能取得剩余价值的条件。“独立性”并不是说价值独立于结构总体，而是说价值是对此前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物质形式的规定。恩格斯显然不懂这种结构相干性的解释模式。通过恩格斯的修改，引进的是价值高出于、分离于资本主义生产总体的思想：价值不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一种具体化。由于恩格斯在这段话中多用了两个词，便造成了“重点的转移”。首先，他多加用了一个“独立性”。其次最为重要的是，他还加上了“社会的”这个词。“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这一句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的。“社会的”一词的引入蕴含着物质性，暗指某种可捉摸的有形之物。这是跟马克思这一段开始有句话直接相矛盾的，因为马克思写道：“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恩格斯说，价值不是可能性的先在条件的一种表现，而基本上是一种量，是由物理性

构成的。结构规定性的概念与恩格斯无缘，因为他考虑的不是总的规定性在一个总体内部将自身特殊化，而是把价值视为有形之物，视为具体性。

我们已经借此机会记下了对恩格斯文本的差劲的翻译，以及对实际的马克思文本重新翻译的需要。我们刚讨论的上述引文最为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种需要。我们已经看到，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原文中插入了自己的句子和词语。耐人寻味的是，莫斯科的译文也加进了一些词语。只是莫斯科的译文添加于恩格斯的修改版。因此往往是这样：阅读莫斯科英文翻译版的人所读的乃是修改本的再修改本。例如，在莫斯科翻译版第 105 页上加进了这么一句：“只要使得资本价值去创造剩余价值。”^[12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提到有关剩余价值的事情。这里所说的剩余价值乃是莫斯科的发明。莫斯科版的意图是想解释价值总在增大自身这一事实，所以它就不得不考虑价值本身之外、不同于价值的东西，以便说明价值不断增大自身的情况，于是便抓到了剩余价值概念。不过，尽管这一改动全是莫斯科的责任，但在此莫斯科又仅仅是总结恩格斯所开始的东西。恩格斯也想从价值过程本身之外来解释价值的增殖；恩格斯发现这原因存在于“社会资本”或物质化的资本之中。莫斯科是把恩格斯的这一提法往前推进了一步。

下面比较的文字摘自迪茨版第 110 页。

恩格斯的修改版，始于第 110 页：

……假定商品按照价值出售是不够的，还必须假定这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以 P…P 形

马克思（参看索引 D 马克思的德文原文）：

……假定商品按照价值出售是不够的，还必须假定这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我们

式为例，我们把生产过程范围内会使某个资本家的生产资本贬值的一切技术革命撇开不说；把生产资本的各种价值要素的变动对现有商品资本价值所产生的一切反作用（如果有商品资本的储备，它的价值会因此提高或降低）也撇开不说。假定 W' ，10000 磅纱，按照它的价值 500 镑出售了；8440 磅 = 422 镑，补偿 W' 所包含的资本价值。但是，如果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提高了（我们这里把单纯的价格波动撇开不说），那末，要全部补偿生产资本的要素，这 422 镑也许就不够了，而必须有追加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就被束缚起来。如果这些东西的价格跌落了，情况就会相反，货币资本就被游离出来。只有在价值关系保持不变时，过程才能完全正常地进行；只有各种干扰在循环反复中被排除，

把生产过程范围内会使某一定量的单个资本的产业资本贬值的一切革命撇开不说，资本将采取 $P \cdots C' \cdots M \cdots C M P \cdots P$ 的形式。

假定 10000 磅纱的商品被纺成 $500 \frac{1}{2}$ 个纱锭，按照它的价值出售。但是，在现有商品资本有所储备、它的价值有起有落的情况下，生产资本各要素的价值与现有商品资本价值交换，便会赔本。因此，这里的 8490 镑价值的生产资本各要素换回的是价值 $922 \frac{1}{2}$ 镑的商品资本价值。但是棉花、煤炭的价格提高了——在此排除纯粹的价格革命。这一提高的合成即 $922 \frac{1}{2}$ ，商品资本所包含的产业资本的价值，将不能补偿生产资本的全部本来要素。这就必须增加货币资本，货币资本便被束缚起来了。如果货币资本的价格放开了而

过程才能够在事实上正常进行；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排除干扰；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言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131]

且下跌，情况就会相反。只有在价值关系保持不变时，整个过程才平稳地进行；只有在循环的运转中流动得到补偿，这过程才平稳地进行。流动越是偏离常轨，产业资本就越需要拥有更多的货币资本，才能顶得住这个不平衡时期。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及单个生产的进展中，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大资本总量的需要，造成了迫使产业资本家执行垄断的大货币资本家的职能的条件。^[130]

上段引文进一步证明了恩格斯的个体化和量化趋向。马克思的措辞是“扩大资本总量”，恩格斯却代之以自己的“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恩格斯指的是个别产业资本家的活动，以及个别产业资本家的行为怎样增加他的资本的“最低限量”。这段话的前面恩格斯还用他自己说的“某个资本家的”，代替了原来马克思说的“某一定量的单个资本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不是提到个别的行为，以及个别行为的算术和如何合起来造成总资本的增加，而是指“资本总量”本身增大的趋势。恩格斯把资本一般看作仅仅是个别行为的算术和，而马克思则把资本一般看作拥有它自己的增长扩大的力量。另外，恩格斯还给这段话加入了科学技术的调子。在马克思说到“生产过程范围内的一切

革命”的地方，恩格斯却变成了“生产过程范围内的一切技术革命”。马克思所用的“革命”一词乃是个包容性的词，它包括各种形式的生产革命，恩格斯却把它特定化和物质化为特殊的技术革命。

恩格斯对这段话结尾处的修改不仅造成了语气的变化，而且造成了“重点的转移”。他把马克思所用的“执行”（verrichten）一词换成了“转化”（verwandeln），还插入了他自己的“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这一定语。这样的意思在马克思那里根本不存在。恩格斯修改后的最后一句话说，单个资本家的活动已被“转化”，即他已不再是单个的资本家了，而是个“垄断的大货币资本家”。恩格斯还说明了“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可能是“各自独立的或互相结合的”。因此，恩格斯便给这段话加上了一种关于阴谋的论调，即金融资本家有可能合伙搞阴谋。相反，马克思原来那句最后的话并未谈到“转化”，而是讲“执行”，也没谈到“各自独立的或互相结合的”阴谋行动。毋宁说，马克思原来讲的是同一个产业资本家“执行”一种混合的、交迭的职能。生产条件的改变迫使产业资本家不仅当产业资本家，而且当金融资本家。在此并不存在作用的转化，而是作用的扩大。

恩格斯对这段文字的修改展示了他的因果决定论的解释模式。恩格斯的叙述表现出一条依次发展的线索：资本家的个别行动增大他们“最低限量”的生产过程。为了克服周期性的价格波动，个别产业资本家被迫获得大量的货币资本；无意之中，他的经济职能转化了，他不再是个产业资本家，而变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一个金融资本家，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集中化。金融资本家可能单个地起作用，也可能共同地起作用，但无论如何，他们对货币资本的控制给予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支配性影响。马克思那里却没有这种因果决定论的调子。按照马克思说的，是资本“总量”的扩大。这种资本“总量”的扩大要求产业

资本家扩大他们必须执行的职能。由于对货币资本需要量的增加，产业资本家必须既充当货币资本家又充当金融资本家。在马克思原来这段话中，根本没有独立的金融资本家阶级的影子。

我要比较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最后一段文字，见于迪茨版第120页。在本章前面谈到时间次序的改变时，我说明了，恩格斯为了插入采自马克思1878年的读书摘要的材料，如何打乱了手稿V的流畅行文。在此我要比较的两个段落是：恩格斯删去的马克思手稿V上的开头两段，和恩格斯收入的马克思1878年读书摘要B142上的两段。比较的这两段不是马克思原始手稿V的全部，也不是马克思原始读书摘要B142的全部，这两份原稿都有好几页的篇幅。但它们将使我们看到包含在马克思手稿V和马克思读书摘要B142中的不同内容。马克思在这两份原稿中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恩格斯却删去其一收入其二，因而造成了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结束部分内容的“重点转移”。

恩格斯修改的迪茨版第120页（马克思读书摘要B142）（收入部分）：

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小于他从流通中取得的价值，这是因为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大于他以商品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既然他只是作为资本的入格化，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家执行职能，他对商品价值的供给，总是大于他对商品价值的需求。如果在

马克思—手稿V（删去部分）（参看索引E的德文原文）：

在资本出现于 $M \cdots M'$ 形式的第一个趋势中，清楚地显示出包含在产业资本流通过程中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不断重复的运动。货币首先必须转化为工厂〔字迹模糊〕、原材料，再就是劳动力。货币经过 $M-C^A PM$ 的过程之后，再转变成为生产资本，并开始执行它在生

这一方面他的供给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资本没有增殖；他的资本没有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生产资本转化为没有生出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从劳动力取得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他实际上必定是“贱买贵卖”，但是，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他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他所购买的价值较小因而较廉价的商品，转化为价值较大因而较贵的商品。他之所以卖得贵，不是因为他的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而是因为所卖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

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越大，就是说，他所供给的商品价值越是超出他所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率就越大。他的目的，不在于使二者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的供给超出他的需求。^[133]

产过程中的最后职能。这个过程完结便有了商品，然后，作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就仅仅忙于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即 $M' \cdots G'$ 。

但是，一旦这个连续的程序中的事务体现为 $P \cdots P$ 的形式，这种连续就表现为并列，这种运动就陷入了变动。产业资本的各种形态显得并列着。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它们本身是不可分辨的，因为它们描述的是循环的资本的各个部分，而且它们自身处于并列的各个循环阶段的各部分之中。它绝不会同时处于各阶段的那些同样部分，也绝不会同时处于货币、商品、生产资本的形态。^[132]

很明显，马克思写于 1877 年手稿 V 中的段落，与恩格斯取而代之的 1878 年读书摘要 B142 中的段落，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实质。上面采自马克思手稿 V 的那段译文，是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的合乎逻辑的总结，它回到了马克思在这一章开始时的主题。马克思论述的内容是运动和过程。他再次提供了对生产资本的结构分析，证明一般过程如何在不同的运动和形态中现实化自身。出自马克思读书摘要 B142 的材料叙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描述了资本家的商品价值的供给与其对商品价值的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马克思是在捍卫他的价格理论，即商品是以它们的价格出售的。但他也同时证明了，为什么说是资本家的商品价值供给与其对商品价值的需求的差异，而不是价格的变化，驱使资本家越来越大量地消耗劳动力，而且越来越大规模地扩展产业资本的技术基础。

在这个例子中，文章结构的改变确实造成了“意义的变换”。恩格斯用马克思一个内容迥异的段落取代马克思另一种内容的段落，造成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这一特定部分的“意义变换”，这还不足以证明可以作结论说整个第二卷第一篇都出现了“意义变换”。但它确实表明在文章的这一特定部分发生了“意义的变换”，而且确实告诉了我们，整个《资本论》总的出现“意义的变换”是有可能的。

上引马克思的两段文字之间截然明显的差异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恩格斯为什么硬要用马克思一段全然不同的文字代替他的另一段文字？恩格斯在 1878 年的读书摘要中看到了什么东西，使得他想牺牲 1877 年的手稿 V 而予以收人？恩格斯认为更为可取、至关重要的是，应在文章的这个地方收人马克思的如下思想，——不管它出自哪种手稿：即使价格保持稳定，资本家也需要贪得无厌地获取劳动力和扩大他的技术基础与生产产量。于是

恩格斯从马克思那里挑选了有经济预见性的调子很强的一段文字，因为它描述了资本主义渐次地、决定性地走向生产过剩的运动。因此，恩格斯剪接到文章中的这段话，强调了资本主义走向生产过剩和经济崩溃的不可避免性。

但是，恩格斯在这个特定地方造成的“意义变换”，突出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的矛盾和脱节。经恩格斯构建和修改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变化于马克思—黑格尔式的重点与恩格斯的、科学的一量化的重点之间。文章的协调与和谐遭到了破坏。之所以存在这样一条错误的线索，是因为在那些未修改的原有文字中，马克思对结构分析的强调乃是清晰可见非常鲜明的；而在其他经过修改和重述的地方，恩格斯对技术的可预见性的强调则十分醒目。整篇东西显得杂乱无章，缺乏整体的和谐与综合性；出现的是经济决定论与黑格尔的结构主义的对照和冲突。^[134]

注 释

[1]若无美国哲学协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资助,我就不能够在1977年冬进入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学院的马克思档案馆,这项研究也不可能进行。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27—28、2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9页。

[5]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Briefe über 'Das Kapital' (Berlin: Dietz Verlag, 195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卷,第5—6页。

[7][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7、7、7页。

[10]Maximilien Rubel, Marx; Oeuvres (Paris: Gallimard, 1968) Vol.2. 关于

鲁贝尔对他自己如何重编《资本论》的说明,请特别参看第1686页。我本人在本章中的分析,与鲁贝尔在 *Marx: Oeuvres* 中的研究是一致的,不过更为明确。鲁贝尔确实把他所用到的马克思手稿从德文译成了法文。然后他根据自己对这些原始手稿的认识,编辑了不同于恩格斯的版本的重编的整个第二卷(以及第三卷)。鲁贝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他重编的版本比恩格斯的(也是可读的、有文采的)更具可读性、更有文采,还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版本更加紧紧地把握了马克思本来的意图。正如我在本书前面说明的,我既无意于翻译马克思的手稿,也不想重编全卷书。确切地说,我的做法是文字评注性的,即深入研究恩格斯编辑整卷的一篇的方法和步骤。虽然鲁贝尔和我探讨类似的问题采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但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原作作了实质性的更改。我们还一致认为,确认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确切意图的唯一办法,就是将马克思的全部原始笔记以可读的形式付印发表。但是,这是一项需要多人合作、颇费年月的浩繁工作。迄今为止,鲁贝尔在为这项工作获取资金方面尚未成功,我也无法筹措。看起来,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学院在这方面正在开始取得缓慢的进展。

[11][12][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8、8、8页。

[14][15][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171—177、177—179、258—259、350—354页。

[18]马克思本人曾说明,将把《资本论》第二卷用于讨论流通问题。参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7篇“资本的积累过程”,第619页。因此恩格斯把第二卷用于讨论流通问题,这是实现了马克思的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实现了马克思的第二卷的意图。

[19]读读鲁贝尔编辑的那部书中的手稿IV,将证实马克思的重点与恩格斯的重点的区别。参看 Rubel, *Marx: Oeuvres*, Vol. 2, pp. 509—56.

[2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1005页。

[2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卷,第5页。

[22]鲁贝尔也认为,手稿II(1870年)的提纲应该作为第二卷第一篇的基础。鲁贝尔也把马克思的话奉为命令。参看 *Marx: Oeuvres*, Vol. 2, p. 1685。此

外,正如我前面说明的,鲁贝尔却不同意恩格斯的重编。鲁贝尔不像恩格斯那样把《资本论》编成独立的第二、三卷,而是把这两册合编为一卷。换言之,鲁贝尔把被恩格斯拉长的著作(三卷)压缩成两卷。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更为精心的挑选、裁断,删去了重复的材料。关于这一点请看 Marx: Oeuvres, Vol. 2, pp. 501—2。再有,恩格斯修改的迪茨版与鲁贝尔版的目录是一个有趣的比较,请看 Marx: Oeuvres, Vol. 2, p. 503。通过这一目录比较可以看到鲁贝尔的压缩情况。

[23] Marx, Manuscript IV, A65, A43/32, NJ30(马克思手稿,除 I、II 外,均尚无中译本——译者注)。

[24] Marx, Manuscript VII, A68, A48/2, NH2A。

[25] Marx, Manuscript, A68, A48/7, NH7A。

[26] Marx, Manuscript VI。

[27] Marx, Manuscript V。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 卷,第 1 页。

[29] 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为本·福克斯(Ben Fowkes)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所写的导言中,正确地察觉到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黑格尔痕迹。虽然曼德尔只涉及第一卷,但他同样正确地把《资本论》理解为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曼德尔看到了,马克思无意于微观的经济规律,也无意于资本主义必将崩溃的可预言的必然性规律。确切地说,按照曼德尔的提法,马克思寻求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表现。马克思的意图是要发现与实证主义的可预言性相反的规则、型式。曼德尔关于第一卷所说的意思同样适用于第二卷。向数学确定性、向因果决定性的变动,乃产生于恩格斯的影响。马克思只是想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职能常规、行为表现。曼德尔教授还将为《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也由本·福克斯翻译)撰写导言。人们在急切地盼望着它,也很需要它。从上面讨论的问题来看,曼德尔的评论将是很有意义的。关于曼德尔的导言,请看 Vintage 版 pp. 11—86。

[30]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0 卷,第 5—6 页。

[31] 这将证实鲁贝尔的论点,即马克思只打算分两卷,而不是恩格斯的三卷。鲁贝尔的看法是,《资本论》第二卷应由两册构成,而不同于在恩格斯

手上把它扩充为三卷。另一方面,马克思本人确提到过“第三卷”;此外,他也确实说明了,“第三卷”应讨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关于这一点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卷,第620页。

[32]关于《资本论》的结构和意义的争论很快成为当代马克思学的核心问题。早先发起热烈讨论的是 Henryk Grossman, ‘Die Änderung des Ursprünglichen Aufbauplanes des Marxschen Kapitals’ und ihre Ursache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Vol. X IV, 1929, pp. 305—38。格罗斯曼(Grossman)认为,《资本论》应由三卷组成。但他震惊地发现,最终在三卷本《资本论》(恩格斯修改版)中出现的内容与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计划,有着差异。既然有差异,格罗斯曼便设想马克思本人有意识地打算修改计划。在格罗斯曼看来,马克思的新计划有目的地删去了1859年计划的论国家、论国际贸易和论世界市场部分,而且更详尽地讨论了剩余价值的创造及其随后划分为地租、利润和工资这一中心问题。关于一种相反的观点,请看 Maximilien Rubel, ‘Plan et méthode de l’économie’, *Études Marxologie*, Vol. VI (Oct. 1973), pp. 1777—820。还请看 Rubel’s ‘Introduction to his Karl Marx; Oeuvres’, Vol. 2。鲁贝尔坚持一种反对的论点,即《资本论》只应该有两卷,马克思并没有改变他原先的设计或计划。确切地说,在鲁贝尔看来,马克思纯粹是无法完成他1859年的原有计划,这只是因为它太大了,所以他分两卷写作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希望这样他便可以自由地进而写作关于国家理论的批判和看法。介入这场争论的另一个人物是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 请看他的 *Karl Marx*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不过,虽然麦克列伦看到了马克思1857~1858年的《大纲》在他的经济学思想演变中至关重要,但他对于马克思自己的《资本论》计划的一贯性或变化问题本身,却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在这方面,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的著作要好些,请看他的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 1969)。这是一部在此领域具有创新性的著作。罗斯多尔斯基在书中也采取了反对格罗斯曼的立场。他认为不是计划的改变,而是无力完成(鲁贝尔),他还进一步论证道,马克思本想独立成书的关于阶级和雇佣劳动的材料,有些确已进入了第一卷。罗斯多尔斯基的著作很有意思,因为它包含了关于马克思早期计划的具体说明。

应该注意的是,当恩格斯重编第二、三卷时,还没有发现或者他显然不知

道《大纲》的存在。况且,东柏林马列主义学院(Institute of Marxism - Leninism)也是最近才发表两份以前未发表的手稿的头半部分。有份手稿的一半注明 的日期是 1857 年,它显然是 1857~1858 年《大纲》的初步或草稿。另一份手稿的一半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稿。这份手稿也许更为重要,它属于 1861~1863 年间。恩格斯不仅不知道《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和《大纲》,而且他不知道这两份后来的手稿。很有可能,对于马克思写给库格曼和拉萨尔讨论他的《资本论》的想法和计划的重要信件,以及《资本论》的确切内容,恩格斯也是一无所知的。

因此,《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者根本不知道有份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手稿,而这份手稿的篇幅却超过了《资本论》最后两卷。关于 1857 年和 1861 年的著作,请看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和 1980 年版,第 46 卷上册和下册)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7、48 卷。

[33]Rosdolsky,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p. 27.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1 卷,第 535—536 页。

[35][36]见本章注释 31。

[37][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32 卷,第 539、551 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33 卷,第 230 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32 卷,第 383—390 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 卷,第 332—333 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1 卷,第 318 页。

[43][44][45][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32 卷,第 526、629、70、70—76 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1 卷、第 32 卷,第 318、81 页。

[48]Mandel, 'Introduction' to *Kapital*, p. 709.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 卷,第 332—334、

335—336页。

[50][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卷,第63、102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卷,所有1886年给左尔格(Sorge)的信。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卷,第288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卷,第236页。

[55]Marx, Manuscript VII, A68.

[56]Marx, Manuscript VII, A68, A48/1, NH1A.

[57]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1, NU1B.

[58]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24, NU23A.

[59]Marx, Exzerpte B142, p.32.

[60]Marx, Exzerpte B142, p.36.

[61][62][63][64][65][66][67][68][69][70][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卷,第242、242、254、255、244、234、245、237、244、255、256页。

[72]请看 Melellan, *Karl Marx*, pp.341-53.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91页。同时请参看马克思手稿V, A66, A43/30, NU30B,可以发现恩格斯的添加。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139页,此处的材料出自马克思手稿IV, A65。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98页。此处的材料出自马克思手稿V, A66, A45/33—A45/345, NU33A—NU34。

[76][77]G. W. F.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trans. A. V. Miller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9), pp.481—574. p.138.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91页。

[79][80]Stephen F. Mason, *A History of the Sciences* (New York: Collier, 1962), p.491. p.486.

[81]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马克思学领域的突出问题。由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新研究再次掀起了这场争论,而这一研究本身又是由以前不知道的马克思手稿的发现引起的。在这些新发现的手稿中,马克思

显然借用了某些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作为《资本论》的解释手段。令人惊奇的是,第一个发现这种联系的是列宁,请看他的《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列宁于1914~1915年埋头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写下的这些笔记中,他敏锐地看出了黑格尔的整体性概念如何被马克思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罗曼·洛斯特多尔斯基在他的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äl* 中追寻的是同样的论证线索,只不过把马克思所利用的黑格尔的范畴扩展为包括本质—现象—形式—内容等等。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在他的‘Plan et methode de l’*economic*’一文中也提到与黑格尔的联系。同样研究了题目的还有 Helmut Reichelt 的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äl begriffs bei Karl Marx*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3)。探讨得最为透彻的见于 Jindrich Zeleny, *Die Wissenschaftslogic und ‘Das Kapital’*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9)。泽勒尼(J. Zeleny)是上述评论家中最富哲学睿智者,他还很有意思地洞察了马克思的数学观。Joseph O’Malley 最近根据他对马克思的读书摘要的深刻精确的认识,写了一篇文章:‘Marx’s precis of Hegel’s Doctrine on Being in the minor logi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X XII (1977), pp. 423 - 31。奥马利(J. O’Malley)能够凭文献十分精确地证明马克思再次重新认真阅读黑格尔的年份。马克思不仅仅卖弄黑格尔,他还认真地读了他的著作、吸收了他的思想。

[82]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46, NU7A.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117页。

[84]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46, NU7A.

[85]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20, NU9B.

[86]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46, NU47A.

[87]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46, NU47A.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118页。

[89]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1, NU1B.

[90]关于这一点请看马克思的《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卷上)。《大纲》中第25~152页、383~422页及“导言”部分的内容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有关。下面摘自马克思的“导言”中的两段话无可争辩地证明,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生产过程总体性的经济学,生产过程在先,流通是整个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一个环节。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第26页）在第37页还有这么第一段：“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虽然《大纲》写作于1857年，大概比马克思从事最后成为《资本论》第二卷的那些手稿的写作早十年，但《大纲》包含了马克思要在《资本论》中引申和详述的基本思想。《大纲》和《资本论》显然是连贯的。《大纲》中黑格尔的风格表现得更为确定鲜明。似乎完全有理由认为，马克思在《大纲》中如此凸出地表达的意图一直是他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意图：强调生产过程是经济存在的最基本的东西，并把流通归属于这一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或其蒸馏。

[91] 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1, NU2B.

[92] 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1, NU2B.

[9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71页。

[94] 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22, NU21A.

[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99页。

[96] 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34, NU34.

[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120—121页。

[98] 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34, NU34.

[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43页。

[100] Marx, Manuscript VI, A68, A48/7, NH7A.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43页。

[102] Marx, Manuscript VI, A68, A48/7, NH7A.

[1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43页。

[104] Marx, Manuscript VI, A68, A48/7, NH7A.

[1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43页。

[106] Marx, Manuscript VI, A68, A48/7, NH7A.

[107] 这里讨论的这段话的马克思版和恩格斯版的译文，请参看本章末的“索引C”（原文如此——译者注）。

[1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卷，第63页。

[109] 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18, NU17.

[1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 卷,第 113 页。

[111] 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44, NU45A.

[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 卷,第 113 页。

[113] 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44, NU45A.

[114] 本书所有采自德文的材料都是我本人翻译的。目前,三卷本《资本论》的标准英译版是纽约国际出版公司(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 年出的版本。国际出版公司的版本本身又是莫斯科进步出版社(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资本论》英译本的翻版。但是,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的第二卷又主要吸收了查尔斯·H·克尔(Charles H. Kerr)1909 年在芝加哥(Chicago)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英译本。克尔 1909 年版的第二卷是由爱德华·艾威林翻译的。因此,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的版本与艾威林的译著是十分一致的。

艾威林的翻译令人深感不足。艾威林认识恩格斯,显然受到了恩格斯爱好量化和科学主义的影响。艾威林正确地传达了恩格斯想体现的重点。本·福克斯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附有曼德尔写的导言,由 Vintage 出版,这个译本比艾威林的远为出色。艾威林不断地冲淡黑格尔的影子,而福克斯却把握并再次突出了黑格尔的风格。福克斯翻译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也将是研究《资本论》很好的辅助材料。

我本人的翻译想遵循福克斯的方法。凡在恰当的地方,我都试图保留黑格尔的影响。注意一下不同的翻译怎样能够改变一段话的整个意义,这是十分有趣的事情。例如,迪茨版第 101 页上马克思本来使用了“全部的”(gesamt)一词,艾威林却把它译成“总计的”(aggregate)。而我却把它译为“整个运动”(whole movement)(更符合福克斯的译法),以利于强调黑格尔的总体过程概念。要把我本人的翻译与艾威林的所有不同之处列举出来,这是毫无意义的。总的看来,我的译本失之于抽象和普通,艾威林则失之于数学的具体和实证主义的确定。

在不久的将来,可望马克思自己的手稿会得以发表。

[1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 卷,第 52—53 页。

[116] 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44, NU14.

[1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 卷,第 40 页。

[118]Marx Manuscript VI, A68, A48/6, NH6A.

[119]Marx - Engels Werke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Vol. 2, pp. 35, 41, 65, 79, 83, 88, 89, 92, 95, 100, 103, 105, 107, 109, 110, 113, 116, 118.

[120]Marx - Engels Werke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Vol. 2, pp. 81, 82, 86, 89(这里说的 Vol. 2, 恐为 Vol. 24 之误——译者)。

[1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4 卷, 第 83—87 页。

[122]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20, NU27B&NU28B.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4 卷, 第 88—89 页。

[124]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29, NU29A&NU29B.

[125]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24, NU24.

[1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第 25 卷, 第 494—495 页。

[127]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48, NU49A.

[1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4 卷, 第 122 页。

[129]关于这里论及的整个一段文字, 请看 Karl Marx, Das K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Vol. 2, p. 105.

[130]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48, NU29A.

[1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4 卷, 第 123—124 页。

[132]Marx, Exzerpte B142, (1878).

[133]Marx, Manuscript V, A66, A45/55, NU56—57.

[134]路易斯·阿图塞富有洞察力地批判了当代那种源于乔治·卢卡奇的联系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趋势。如若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竟会导致唯心主义, 那么阿图塞对这一运动是正确地予以抵制的。在跟这一唯心主义的产生过程作斗争中, 阿图塞犯下了相反的错误, 这就是他抹去了黑格尔影响马克思的一切痕迹。因此, 阿图塞摒弃关于马克思受黑格尔影响而具有总体性思维的看法。阿图塞偏爱全面规定性的思维。阿图塞未能看到的是, 既具有总体性的思维(黑格尔), 又不失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像马克思那样), 这是有可能的。一个总体不一定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或精神的实体。可以把一个总体

看作是一个生产性的有机体;可以把一个社会视为一个生产性的主体,一个其目标是再生产自身的能动者。根据这种观点去看待、去分析的总体,就会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总体。当然,把这视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化,乃是我的假定。阿图塞有时是有问题的,但他总是令人感兴趣的。请看他的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以及 *Lire Le Capital* (Paris: Francois Maspero, 1967), Vol. 1.

附:索引

(为便于读者和研究者直接查阅,以下五段资料索引不作翻译——译者)

Apparatus A

Numbering of original Marx manuscripts

<i>Inventar (Amsterdam listing)</i>	<i>Manuscript (Folio)</i>	<i>Date Written</i>
A63	II	1868/70
A64	III	1867
A65	IV	1867
A66	V	1877
A67	VI	1877
A68	VII	1878
A69	VIII	1878
A70	IX	1878

Apparatus B

For the sake of charity, Engels' s model is repeated below:

<i>Pages in Dietz</i>	<i>Manuscript</i>	<i>Date of manuscript</i>
pp. 31 - 2	II	1868/70

pp. 32 - 42	VI	1878
pp. 42 - 5	VI	1877
pp. 45 - 120	V	1877
pp. 120 - 3	(a note found among extracts of books)	
pp. 124 - 31	IV	1867
pp. 131 - 2	VII	1878
pp. 132 - 53	IV	1867

My Reformulation

<i>Pages in Dietz</i>	<i>Manuscript</i>	<i>Date of manuscript</i>
pp. 31 - 2	Engels mistaken. Most of material for these pages taken from Manuscripts VI and V. Engels wrote middle of p. 31 himself. See description of these pages in text proper.	Ms VI 1878 Ms V 1877
pp. 32 - 42	VI	1878
pp. 42 - 5	Engels mistaken. Engels did not transcribe these pages from Marx. Rather this is a complete rewording by Engels of crossed out text and mathematical tables calculated by Marx. See text proper for description.	1877
pp. 45 - 120	V	1877
pp. 120 - 3	Engels does not give complete reference taken from <i>Exzerpte</i> B 142	1878

pp. 124 – 31	IV	1867
pp. 131 – 2	VII	1878
pp. 132 – 53	IV	1867

Apparatus C

Original Marx text referring to p. 109 of Dietz.

Das Kapital als verwertender Werth umschleisst nicht nur Klassenverhältnis, bestimmt gesellschaftliche Charakter, der durch d. dasein oder Arbeit als Lohnarbeit ruht. Es ist eine Bewegung, ein Kreislaufprozess durch verschiedene Formen, der selbst wieder den Kreislaufprozess in 3 verschiedene Formen einschliesst. Es kann daher nur als Bewegung und nicht als ruhiger Ding begriffen werden. Diejenigen, die Verselbständig der Werth als eine Abstraction betrachten, vergessen dass die Bewegung der industriellen Kapitals diese Abstraction in actu ist. Der Werth durchläuft hier verschiedene Formen, verschiedene Bewegung in denen er sich erhält und zugleich verwertet, vergrössert. Da wir ist mit den blossen Bewegung Form hier zunächst zu thun, indem Revolutionen, die dem Kapital Werth in seinen Kreislaufprozess untergeben kann, nicht berücksichtigt; aber es ist klar das trotz aller Werthrevolutionen die kapitalistic Produktion nur so lange existiert und fortbestehen kann (die Bewegungen drücken sich mit Bezug auf die industriellen Kapitalisten aus [illegible] dass er als Waaren und Arbeit Käufer, Waarenverkäufer and productiver Kapitalist funktioniert) als der Kapital Werth verwerthet wird, d. h. als nur selbständig. Werth seinen (durch die Kapitalisten vermittelten) Kreislaufprozess beschreibt (so lange als der Werthrevolution in irgend einer Art überwältigt und ausgeglichen werden). Das individuelle Industrielle Kapital, für die das nicht gelingt, gehen eben diejenigen unter,

weil sie d. Bedingungen dieser Werthbewegung nicht erfüllen können. Je akuter häufiger der Werthrevolutionen werden, desto speculativer wird die unter automatische Werthbewegung, und desto gefährlicher für individuellen industrielle Kapitals, eben weil sie die normalen Verlauf der Prozesses gefahrdet besätigt also statt zu widerlegen, was man widerlegen will, d. Verselbständigung die den Werth als Kapital erst erhalt und durch seine Bewegung erhalt.

Apparatus D

Original Marx text referring to p. 110 of Dietz.

...das d. Waaren zu ihnen Werth verkauft werde, sondann dass untersonst gleichbleiben Umstände geschieht - Z.B. abgesehen von allen Revolution innerhalb d. Productionprozesses die Z. B. d. produktive Kapital eines bestimmten individuellen Kapitals entwerthen können, nehm wird d. Form $P \cdots W' \cdots G \cdots WP^A M \cdots P$ ist zu B. d. W' (d. 1000 lbs. garn 500 $\frac{1}{2}$ st. also), also zu ihren Werth verkauft (ist sehr herab von Rückzahlung im Wechsel d. Werthelemente d. Productiven Kapitals auf der Werth vorhanden Waarenkapitals, d. appreciert und - indem seinen, wenn Vorrat davon vorhanden) so 8490 lbs. zum Wert so $922 \frac{1}{2}$ ersetzen d. im W' erhaltenen Kapitalwert. Aber d. Werth von Baumwolle, Kohle, etc in Preis gesteigen (davon hier von blossen Preisrevolutionen absehen, so vielleicht jenach verfassung dieses Steiger, $922 \frac{1}{2}$ (d. Werth d. in Waarenkapitals enthalten industriellen Kapitals) ... von das Urwerk d. Produktionen Kapitals ganz zu ersetzen; es ist zusetzlicher Geldkapital, nötig, Geldkapital, Geldkapital wird freigesetzte d.

gans kehrt wenn d. Preise gefallen Geldkapital und wird freigesetzte d. gans normal verläuft d. Prozess nur, wenn d. Werthverhältnisse konstant bleiben, er erlaubt so factisch so solange sich ihre Stromungen ausgleichen, in der Wederholung, der Kreislauf; je grossen d. Stromung Abweichungen von d. Norm um so grosse Geldkapital wird der industriellen Kapital besetzen, um die Ausgleichung abwarten zu können, in der fortgang d.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auch d. individuelle Productionprozess und ihre d. universalgrosse der Kapitals erwertet so kommt jener Umstand noch kommen in d. Funktion d. industriellen Kapitalisten zum Monopol grosse Geldkapitalisten [illegible] zu verrichten.

Apparatus E

Original Marx text referring to p. 120 of Dietz.

Die in d. Kreislaufprozess d. industriellen kapitals enthalten beständige Bewegung aus einen Stadium in d. – ersohnt klar bei erster Anlage einer Kapitals in d. Form $G \cdots G'$, Geld muss erst 3 kapitalkunde [illegible] Rohmaterial etc. und d. Arbeitskraft umgesetzt werden. Erst wenn so $G - WP^A M$ durch laufen geld Kapital in productives Kapital verwandelt in – d. letzters Funktion des Produktionsprozess. Erst Wenn dieser produziert d. Waare, ist das produktive Kapital in Waarenkapital verwandelt und vollzieht nur d. funktion d. waarenkapitals $W' - G'$. Sobald aber genug und ist in d. form $P \cdots P$ darstellt erscheint das Nebeneinander als Nebeneinander, so die Bewegung also Bewegung versteht [not clear]. Die verschiedenen frühierenden Formen d. industriellen Kapitals Erscheinen neben einander. Produktions Kapital, Waaren Kapital, Geldkapital – aber nur was nicht sichtbar verschiedene Theil dieser Kapitals [illegible] d. Kreislauf bestehen und sich d. verschiedenen Theil neben

einander in verschiedenen Stadium d. Kreislaufs befinden. Es ist dieselben Theil, der gleichzeitig sich in verschiedenen Stadium befindet also gleichzeitig in d. formen von Geld ~ Waaren, Produktiven Kapital.

第五章

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不是由捷尔吉·卢卡奇、卡尔·科尔施或安东尼奥·葛兰西单独完成的。甚至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也不是历史上再一次把黑格尔与马克思相联系的第一次尝试。列宁在1914~1916年流亡瑞士期间研究了黑格尔，并因此而成为20世纪第一个受到黑格尔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幸的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也就是他于1914~1916年在瑞士对所读的黑格尔著作作了大量评注的笔记，直到他逝世以后才开始出版。第一个出版这些笔记的某些部分的是德波林，1925年他负责发行了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Conspectus on Hegel's Science of Logic*），并写了一篇序言。1914~1916年所写哲学笔记的其余部分收入《列宁文集》（*Lenin Miscellanea*）第9卷和第12卷，出版于1929~1930年，这些笔记包括列宁对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哲学全书》的小逻辑、《逻辑学》的评注，以及列宁自己未写完的文章《谈谈辩证法问题》（‘On the question of dialectics’）。但是，直到1933年，列宁的内容丰富、具有创新精神的《哲学笔记》才以包括1914~1916年全部哲学沉思的单独著作的形式出版。

到那时，要列宁的《哲学笔记》对苏联哲学产生显著的影响

已为时过晚。1931年斯大林战胜了他的哲学对手德波林（Deborin），从此开始把一种沉闷而贫乏的形而上学一元论强加于苏联思想界。在反法西斯战争和随后的冷战时期，列宁的《哲学笔记》仍鲜为人知，读到的人也很少（亨·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诺·古特曼 [Norbert Guterman] 和卢卡奇是值得注意的例外）。一般地说，在过去的20年内，《哲学笔记》已经成为评论注视的中心，并随之引起对列宁哲学观点，特别是表述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那些观点的重新评价。1930年寓居莫斯科的卢卡奇在梁赞诺夫（Rjazanov）的帮助下，有机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在那里第一次阅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这当然已经不能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造成任何影响，但它对卢卡奇的后期著作《青年黑格尔》（*Der Junge Hegel*）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Die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1]却具有重大的意义。

概括地说，列宁的理论活动有三个时期。青年列宁时期，从1894~1904年。这是写作《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的时期，结束于1904年，即1905年革命的前一年。当时青年列宁主要关心的是党的组织和策略问题。列宁哲学活动的第二个时期，从1905年延续到1914年。这是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时期。政治方面的事件迫使列宁为党的思想统一奠定基础。在这些年里，列宁制定了后来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Stalinist Bolshevism）思想的组成部分。第三个时期，从1914年直到列宁逝世。这是写作《哲学笔记》的时期，是列宁离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僵化立场，转向使黑格尔与恩格斯之间实现妥协的时期。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就诞生于这些年里。可是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直到10年前一直毫无地位。在苏联，斯大林压制它，把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形式建立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基础上。因为这本书在斯大林手中是一部意

思不明确、未经认真分析的著作，被当作一种政治宣传品，并被变成一种哲学的教条。

本章将研究布尔什维克哲学的各个阶段，将集中考察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或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Leninist Bolshevism）的出现，它是在列宁哲学活动的第三个时期显露出来的。与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相区别的苏联哲学的另一个阶段，是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将在下一章作更深入的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最终表现为机械唯物主义的形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竟从列宁哲学活动的第二个时期，即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时期吸取力量，而那时列宁是受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影响。这一章将涉及列宁的整个哲学生涯，但着重论述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到《哲学笔记》的发展，或者说列宁主义哲学的转变。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曾被看作列宁在哲学问题上成熟的和最终的陈述。按照这种解释，列宁的哲学观点是在他哲学生涯的第二个时期，即1905～1914年获得了发达的和最后的形式。本章将抨击这种论点，说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不体现列宁的成熟的思想，论证应当在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哲学笔记》中找到列宁的最终哲学陈述这个观点。事实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列宁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而写作的。列宁写这本书不是由于他要捍卫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遗产，而是出于把“左派布尔什维克”（它的主要发言人是波格丹诺夫）驱除出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需要。为了使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派别免除波格丹诺夫所代表的政治能动主义的危险和党分裂的可能性，列宁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一种手段，使布尔什维主义获得思想上的内聚力，为布尔什维主义确定哲学基础，从而把它的信徒、追随者与批评者、持异议者鲜明地区分开来。

第一时期：1894～1904年

年轻的列宁以捍卫马克思的《资本论》，反对民粹派（Narodnik）批评家的活动，开始踏上他的哲学斗争舞台。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我们的意见分歧》（*Our Differences*）中，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N. K. Mikhailovsky）和民粹主义（Narodism）。1894年列宁以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参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有趣的是，米海洛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列宁之间的论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翻译成俄文的一个间接的结果。当自由派经济学家И·茹柯夫斯基（J. G. Joukovsky）在1877年最先就这本书发表评论时，俄国评论者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一场论战，接着在同一年晚些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对茹柯夫斯基进行了怀有敌意的反驳。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在那些涉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部分，列宁就米海洛夫斯基对茹柯夫斯基的回击中所论及的有关马克思的主张作了回答。^[2]

1894年在年轻的列宁看来，马克思在他对米海洛夫斯基的回答中（见《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一个“跋”）^[3]已经“断然反驳了那种说他是黑格尔主义的责难。”^[4]面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证明，列宁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确来自黑格尔。然而，列宁仍旧主张，在更为成熟的马克思那里，在发展了社会的自然历史观的马克思那里，一点也看不到这位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痕迹，“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5]事实上，按照年轻的列宁的看法，马克思完全没有运用辩证法。被列宁描述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6]的辩证的说明方法，并不是《资本论》中运用于社会的科学分析的说明形式。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有一页末尾的一条附录中，列

宁严厉地斥责了所有那些试图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搭桥的人：

看来只要把这些实例拿来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因为这本著作的手稿预先读给马克思听过）这样明白肯定的声明——根本谈不到用三段式来证明什么东西，或把这三段式的“假设成分”塞到现实过程的描述中，——对照一下，就完全可以明白，责难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是荒谬绝伦的。^[7]

20年后，列宁反过来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作了如下的论述：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8]

我们所占有的列宁的第一篇哲学笔记注明日期为1895年，即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发表一年之后^[9]。在这篇1895年的笔记，即《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摘要》中，列宁对黑格尔，特别是对《精神现象学》作了怀有敌意的解释。黑格尔被描绘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者，他仅仅是把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客观化。马克思被说成是对黑格尔作了无情的批判。为了清楚地划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列宁作了以下评注：“在这里，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是显著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10]

的确，在早期的列宁看来，马克思接近达尔文更胜于接近黑

格尔。黑格尔的三段式“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不是一种说明历史的精确方法，按年轻的列宁的观点，应当把历史看作“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11]与辩证的观点相比较，列宁像是在信奉一种历史的进化观点。列宁公开主张《资本论》与《物种起源》之间存在着亲属关系。“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12]正像达尔文描述了动物新种的起源一样，马克思描述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的起源。通过完备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马克思推断出，其他独特的经济形态已经存在于过去，也会存在于将来，因为“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这一事实已经得到证实。^[13]每一种经济形态的基础是社会关系。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进行社会生产的方式决定着各种经济形态的性质。

列宁通过对“自然与史”的透视，解释了19世纪俄国的经济史。在详尽地依据大量材料写成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部著作里列宁再一次与民粹派经济学家展开论战）中，他把俄国社会的发展描述为从一种经济形态到另一种经济形态的运动。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的“自然经济”^[14]的经济形式，“自然经济”的社会关系也同样被城乡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所代替。但即使是大规模工业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增长，也经历了若干阶段，即“三种基本的工业形式”。^[15]与这三种工业形式相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

根据各种不同的技术结构，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不同阶段。小商品生产与工场手工业的特征是小作坊占优势，从小作坊中，只产生出少数大作坊。大机器工业彻底排挤小作坊。资本主义关系就在小手工业中形成起来（表现为有雇佣工人的作坊及商业资本），但它们在这里的发展还很微弱，没有在各生产参加者集团

间形成尖锐的对立。这里既没有大资本，也还没有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这两者的形成。”^[16]

列宁写于1896~1899年间、第一次以书的形式出版于1899年3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避免用任何黑格尔的术语。列宁把黑格尔的术语看作极为唯心主义的，因而在描述俄国资本主义到来的情形时，避免运用这种思辨的概念。列宁写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是29岁。他宁可运用术语“矛盾”，而不是运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去说明社会变化，因为用“矛盾”一词说明自然历史更为适当。从“自然经济”到资本主义的变化的基本“矛盾”、是一种为使用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制度与另一种为生产商品而组织起来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对立。那时对于年轻的列宁说来，“矛盾”是社会变化的开端环节。为了证明这一点，列宁经常引证马克思，特别是引证《资本论》第三卷，在那里用社会矛盾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起源。他运用“矛盾”一词，作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驳。按列宁的观点，“矛盾”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功能，而辩证法则只是唯心主义意识的功能。

早在1897年发表的论文《评经济浪漫主义》(*A Characterisation of Economic Romanticism*)中，列宁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论点。由于阅读《资本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宁懂得马克思的方法是对不同的经济形态的分析，这种经济形态是由社会和生产关系构成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以普遍繁荣或者‘向自身循环’的空话为基础，而必须以生产关系进化的性质为基础的观念是绝对地与它们相异的。”^[17]与被划为“经济浪漫派”(‘economic romantics’)的民粹派不同，列宁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进步的经济力量。他认识到社会、生产关系自身是由技术和制作力量所形成和铸就的。列宁视为形成社会动力因素的

“矛盾”，正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概括，是以新的技术力量与比较旧的、过时了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而不是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在这个时期，列宁理解社会形态的基础有三个层次：（1）工艺技术；（2）社会关系；（3）一种经济形态的行为和思想组成的整个系列。

当列宁写《评经济浪漫主义》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他对社会运动的理解，不是运用物理学的模型，而是运用生物学的模型。总的说来，他受牛顿、克拉克和麦克斯韦尔（Clerk - Maxwell）的影响，要大于受达尔文和自然主义的影响。列宁从自然主义向自然的形而上学转移发生在第二个时期，即1905～1914年间，是在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的充分影响下完成的。在第一个时期，即1894～1904年^[18]，列宁把历史解释为一个必然的、自然的过程。他写道：

不容争辩，是他把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性（这一点是所有这三位作家都确认的）问题置于历史的基础上，并且认为这种不稳固性是进步的因素。换句话说，第一，他认为通过比例失调、危机等等而实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发展，他说，生产资料（机器）的性质本身就引起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向，并使供给经常先于需求。”^[19]

因此，对列宁来说，社会的自然历史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它也是一种取得了进步的历史，因为尽管资本主义有种种罪恶，资本主义所解放的巨大的生产力本身在人类历史中却是有益的收获。在19世纪末，列宁的社会理论是与进化的自然历史相近的。盛行一时的达尔文主义革命对他的影响极深。不过，达尔文讲的

是适应，而列宁讲的是“矛盾”。社会进化的必然性引起了社会矛盾的必然性，也就是当新的技术形式侵蚀了早期经济形态的传统基础时发生变化的必然性。

列宁早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摘要》(Conspicuous of the Holy Family by Marx and Engels)中，也包括列宁对费尔巴哈的某些评注。作为黑格尔的对立面，费尔巴哈受到称赞，因为他曾经指明，思辨哲学不过是一种宗教的精神气质的继续，^[20]从而揭示了宗教与哲学异化之间的相似性。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和布鲁诺·鲍威尔、埃德加·鲍威尔(Bruno and Edgar Bauer)的思辨的玄想，最后指明了只有现实的人，即从事于经济上支持他们现实生活的现实活动的人，才是社会科学的适当的对象。^[21]开始是唯心主义思辨的反对者，继而把注意力从理念转向如他一样实际存在的人，费尔巴哈是马克思的一个必然的先驱者。列宁在《摘要》中表述的费尔巴哈的形象，因袭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作的解释。列宁在这个时期大概读过这本书。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有关18世纪唯物主义的发展，作了某些透彻的评论。列宁在《摘要》中谈到，他发现这一段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22]列宁表明他理解机械唯物主义的意义。追随马克思的说法，列宁认为机械唯物主义起源于笛卡儿。^[23]有趣的是，1895年列宁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摘要》中熟悉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而1894年在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却毫无提及机械唯物主义，而是注视达尔文和进化的自然历史。列宁认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在笛卡儿和洛克的形式中，不论是机械的或感觉论的，都是对17世纪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唯物主义的推进。事实上，18世纪的唯物主义完全突破了17世纪的形而上学。^[24]如同在他以前的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列宁未能认识到17世纪的形而上学可以以不

同的形式，即以物质的形式继续进入到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中。

追随马克思所发展了的思想，列宁也同意法国唯物主义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笛卡儿的倾向；另一种是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洛克的倾向。洛克的感觉论传给了康狄拉克(Condillac)和爱尔维修。事实上，列宁本人似乎也确信感觉是人类思想观念的起源。他称赞培根认识到“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25]以后，列宁在他的感觉论的认识论中甚至走得更远。他写道：“从唯物主义的前提中最容易引申出社会主义（改造感性世界——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等等）。”^[26]感性知觉不但引起观念产生，也起到把个人与其周围世界联系起来的作用，而且从环境的角度解释犯罪的根源。

在列宁的一生中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早期的1894~1904年是一个起源。布尔什维主义还没有打上坚实而持久的印记，因此发现这时列宁的思想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列宁的压倒一切的思想，在他整个生涯中始终居首位的思想，是政治。对于年轻的列宁来说，政治就意味着锻造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怎么办？》写于1902年，接近于这个时期的结尾，表明列宁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政党的基本结构和指导理论。在1902年，列宁主义第一次出现了。

《怎么办？》不包含哲学探讨。但列宁确实进入了反对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辩论。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02年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结成联盟。普列汉诺夫对哲学问题的通晓，使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已经反对伯恩施坦和司徒卢威(Struve)而在理论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27]列宁在《怎么办？》中对伯恩施坦和司徒卢威的抨击，回避了问题的哲学方面。^[28]作为政治策略家，列宁批评了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因为它们是非革命的理论。从政治的首要地位出

发，列宁反对这些理论，因为它们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放弃了革命的希望。

然而，《怎么办？》对于讨论列宁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还是重要的，因为它显示了列宁的某些基本的预想。列宁的主观能动性理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1）有关政治准则的实践的思想；（2）有关哲学准则的实践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因为列宁在他一生的早期，确有一种与政治准则有关的实践的学说，我们将讨论他的行动的辩证法。在这一章的后面部分，我们将讨论列宁的哲学的实践概念。列宁在开始他的哲学活动时，是认为政治实践能够改变外界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结构。在后期生活中，列宁对主动能动力的认识，扩展到把哲学准则的实践也包括在内。在他的成熟时期的1914~1924年，列宁确信概念自身不但产生认识，而且参与改变外部现实。早期对政治能动主义能够改变外部现实的信念，到后期生活中，就扩展为对概念自身具有构成力量的信念。

在1902年的《怎么办？》中，列宁在政治的准则上清晰地概括了一种行动的辩证法。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决定论，强调自觉行动的生产的性质。列宁首先考虑制度方面的问题，他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这些外部剥削势力的斗争，如果工人阶级意识到这种斗争的决定意义和目的，就会更加有效。在1902年，意识，对列宁来说，就是政治的意识，就是无产阶级关于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关系的意识，就是工业劳动者关于造成他们被奴役地位的阶级、财产和制度上相互关系的意识。这种意识对于有效的政治行动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意识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才能够达到对改变社会的权力和制度关系所需要的行动的联系、目的和正确策略的评价。按照列宁的观点，对于实践—批判活动，亦即改变社会的行动，意识是一个被期望的先决条件。人们只有意识到社会权力之结构，才能处于采取改变这种社会权力之网的有效直接行动的地位。

政治意识，在列宁看来，是前进到理论—实践均衡的必要前提。一种关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正确理论一旦获得，理论的认识就能使它自身转向实践。列宁把政治实践理解为理论与社会革命之间的桥梁和渠道。列宁的目的始终是政治革命。^[29]实践是实现一种革命理论的过程。实践是理论用以把自身实现于外部的中介。对列宁来说，政治是实践—批判活动（按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精神），是旨在改变一个社会中权力性质的活动。列宁从不怀疑主观能动性能够改变独立于精神之外的领域，也从不怀疑行动要求理论指导它改变独立于精神之外的领域。

列宁没有在教条的意义上把理论与实践解释成互相独立的东西。换句话说，列宁没有把马克思主义阐释成为政治革命提供了具体预言和不可逾越的规则的东西。对列宁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行动的指南，正如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一样。列宁在他的生涯中无数次地改变过他的政治策略，因为他意识到，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因而要求不同的战略响应。理论对列宁之所以是有生命力的，正是因为它确实揭示了一种主观动因所面临的不同的政治历史环境。理论是对各种历史状况的独特性的有意识的占有，是继而相应地要求一种适应于历史状况中现存各种力量的联盟的实践的一种评价。按列宁的看法，策略必须重新制定。马克思主义教导说，由于政治—历史总是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因而必须根据独特的环境而重建无产阶级的战略。

从列宁一生中的第一个时期，即 1894 ~ 1904 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行动的辩证法肯定了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的介入。列宁把政治理论看作主观力量与客观力量的交叉，在交叉中主观的东西成功地改变着客观的权力关系。历史就是依赖精神的东西对独立于精神之外的东西的一种连续改变的过程。历史是理论借以现实化的过程，实践是政治理论得以实现的桥梁。

他的行动辩证法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继续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植下内在矛盾的种子。列宁坚持一种理论—实践的公式，这是以实践批判活动的有效性为基础的，但却是与他用来说政党的杰出人物的性质相矛盾的。在《怎么办？》中，列宁关于党的概念本身就表明它是贵族式的和柏拉图式的。列宁在这本书中的一些篇章里把党说成是工人运动的总参谋部，这表明他确信应当由开明的少数人，即一个有先进的先锋队意识的有限的核心，来领导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列宁所献身的一种由杰出人物组成的党的组织，是与他关于主观行动的生产性质的哲学认识相矛盾的。就党的组织而言，列宁所赞赏的理论与实践，不是工人运动的多数人的理论与实践，而是某一先锋队政党的领导集团的理论与实践。

除了讨论列宁关于政治领域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理论以外，还可以谈谈能概括他早期（1894~1904年）思想的其他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看法。当时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是不熟悉的，这个时期的著作中未出现这方面的用语。他不相信辩证法能够说明历史的运动。他没有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列宁所承认的辩证法只是政治的主观对政治的客观的介入，或者说理论与实践的互相依赖。他不感到辩证法有一种本体论的存在并处于存在的中心，因而不仅否定黑格尔，而且与关于自然和历史的任何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相排斥^[30]。在这个时期，列宁把辩证法限定为一种政治行动的理论，只是在他一生的后期，才把他的辩证法的沉思扩展到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把辩证法扩展到认识论，是他的《哲学笔记》的最重要的进展。

另一方面，列宁熟悉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马克思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随着时间所产生的运动和变化。看来，他直观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并不涉及到发现物质世界的机械论的或辩证法的规律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对待的是已经存在的和本身是由其固

有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不同的经济形态。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与达尔文之间的相似点，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历史、生物模式联系起来。

这样，对于列宁来说，唯物主义首先是确立在社会学的水平上，确立在人们用来生产和人们为了生存所消费的物质上。从认识论上说，列宁是一个感觉论者。物质是独立于我们的精神之外而存在的。物质是我们的感性知觉的原因和来源。由物质产生的这些感性知觉引起了我们的思想。因此，列宁是以一种社会学和认识论的形式来叙述唯物主义的。他还没有把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或者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统一起来。

在认识论方面，列宁接受了基础—上层建筑的公式。认识被降低为一种认知的社会学。思想只是反映物质和社会关系的。的确，哲学没有独立于科学的作用。事实上，哲学能够被科学所包含。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自然的历史学，是发现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规律的尝试，“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31]列宁缺乏任何哲学人类学的概念。他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摘要》中对费尔巴哈的描述，一点都没有提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或人类学。19世纪晚期是科学理论的斗争舞台，不是一个容纳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时代。最后，列宁表现出，他认识到意识必须先于行动。这不是一种关于意识起源的陈述。然而，列宁表现了一种反生机论的倾向。正确地了解社会是在该社会中采取正确行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32]

第二时期：1905～1914年

列宁哲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布尔什维主义形成一种政治工具的十年。^[33]这十年是从1905年革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

战为止。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Menshevism）之间的分裂，可以追溯到1903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但1905年革命扩大了这两派之间的不和。1904~1914年期间也表明了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间的分离。在1903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怎么办？》的策略的热烈论战中，普列汉诺夫是完全支持列宁的。但是，1905年革命时，普列汉诺夫不支持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而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1912年布尔什维主义采取了确定的形式。也是在这一年，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发生了最终的破裂。于是，在1914年，造成俄国1917年革命的政治工具，就锻炼出来了。

有典型意义的是，这政治上定型的十年也表明了党的理论体系的定型。随着布尔什维克与其他论战者的日益分离，形成政治上的特性与独立，它也就要求哲学上的特性和独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 Criticism）写于这个十年的时期。这部著作建立了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组成部分。尽管列宁的《哲学笔记》不承认它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仍然成功地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当做党的重炮。在这部1909年出版的著作中，列宁继续了他在《什么是“人民之友”？》（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和《怎么办？》中所做的工作，捍卫马克思主义而反对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但是，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他采取了超出这种立场的危险的一步。他不仅开始制作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并且使哲学具有一种党的职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标志着布尔什维主义下哲学政治化的开始。列宁清楚地表明，做一个布尔什维克，就意味着要坚持一套特定的哲学原则。党规定信念。哲学成为一种阶级的功能。列宁虽然不是第一个，但他确实在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

限，把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阶级斗争涌入了思想体系的斗争。^[34]

如果说，这些就是使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得以加强的主要历史事件的话，那么的确，《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不单是列宁与孟什维克的争辩引起的，而更是他与波格丹诺夫以及那些在他看来是厄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追随者长期不和的产物。直到1904年，列宁才亲自见到波格丹诺夫，但是他熟悉波格丹诺夫的著作，则要追溯到1898年。那一年波格丹诺夫出版了他的《自然史观基本原理》（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a Historical View of Nature），列宁被监禁在西伯利亚时读过这本书。^[35]1901年，波格丹诺夫出版了另一本书，《认识的历史概念》（The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Knowledge）。波格丹诺夫曾受到19世纪末抨击机械物理学和社会理论的影响。这方面在物理学家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的影响下，波格丹诺夫是一个生机论者（vitalist），对自然持动能学的观点。

托洛茨基（Trotsky）的自传描述了1902年在伦敦他与列宁的第一次会见。按托洛茨基的回忆，列宁当时已经熟悉波格丹诺夫的著作，并且是同意波格丹诺夫的哲学立场的。^[36]列宁与高尔基（Gorky）的通信中，能够证明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的材料比比皆是。在1908年2月25日的一封信里，列宁作了两点有趣的评注：第一，“在哲学问题上”，“我认为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还不够内行，不想急于发表文章。”^[37]第二，在1903年他与普列汉诺夫讨论过波格丹诺夫的哲学。普列汉诺夫指出了波格丹诺夫的立场错误，但仍考虑与波格丹诺夫在政治上的联盟，不想让哲学上的争辩引起政治上的破裂。在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下，列宁由1902年与波格丹诺夫的一致转向1903年反对波格丹诺夫的哲学。

这样，建立政治联盟的需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与波格丹诺夫各自的追随者之间形成一种集团的需要，便是把列宁与

波格丹诺夫尽管有其理论上的分歧也能结合在一起的需要。波格丹诺夫与列宁在1904年第一次会见时，两人互相交换了礼物，列宁赠送《进一步，退两步》（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ward）一书，波格丹诺夫赠送第一次发行的《经验一元论》（Empirio-monism）（1904年出版）。列宁答应继续实行政治联盟的政策。他向高尔基写道：

1904年夏天和秋天我们同波格丹诺夫等几个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达成默契，大家不谈哲学，把哲学当作中立地区，这个同盟在整个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它使我们有可能在革命中共同贯彻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我深信不疑地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策略。^[38]

1905年革命期间，哲学的争论理所当然地被遗忘了。1906年初，波格丹诺夫在俄国被捕，在狱中写了《经验一元论》第三卷，于1906年出版。1906年夏，他送给列宁一本。自1903年以来，列宁一直确信《经验一元论》是错误的，这时列宁不由自主地向波格丹诺夫写了一封长信，占据了三个笔记本，概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列宁称自己为哲学上的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并考虑以“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札记”（Notes of an Ordinary Marxist on Philosophy）^[39]为题出版这些笔记。这些笔记本列宁从未予以出版，因而现已无从查找了。这就是迟至1908年，即直到大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前一年时列宁的立场：应该承认哲学上的分歧，但不允许导致政治上的分裂。这就是他于1908年2月25日给高尔基信的精髓之点：

我认为有必要直率地告诉您我的意见。我认为，现

在布尔什维克之间在哲学问题上发生某些争吵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因此而渐成分裂，我看是愚蠢的。我们订立同盟是为了在工人政党内执行既定的策略。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执行这个策略始终没有意见分歧（唯一的意见分歧就是抵制第三届杜马（Third Duma）的问题，但是第一，这个分歧在我们中间并没有尖锐到分裂的地步，甚至连分裂的迹象也没有；第二，这个分歧和唯物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的分歧毫不相干，例如，马赫主义者巴扎罗夫也和我一样，曾反对抵制，并且在《无产者报》上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很长的杂文。)^[40]

从《无产者报》编辑登载于1908年《新时代》的一篇简短声明，可以看出列宁关于不允许思想争论导致政治派别活动的坚定决心。《无产者报》已经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布尔什维克派的官方喉舌，列宁与波格丹诺夫是这份报纸的编辑。在1908年的《新时代》上，《无产者报》的编辑作了如下声明：

《无产者报》编辑部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思想上的代表者，认为有必要就此发表如下声明。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派别的争论，而且编辑部的意见是，这也不应当成为派别的争论；任何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无论在这个或那个派别里，都有两种哲学流派的拥护者。^[41]

列宁对波格丹诺夫主义者有着政治上的需要。在1905年革命进程所应遵循的策略上，在联合抵制或参加各届杜马的策略上，列宁与孟什维克进行着尖锐的政治斗争。与波格丹诺夫主义者分裂，会严重削弱布尔什维克，因而加强孟什维克。分裂就意

味着布尔什维克强有力的政策的结束。所以，列宁看到，为了保持布尔什维克派的统一，需要容忍哲学观点上的分歧。^[42]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决定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仅是一种哲学的意向，而且是一种政治的意向，是打算把波格丹诺夫主义者赶出布尔什维克派，肯定是与列宁的不再需要把波格丹诺夫主义者作为政治盟友的决心相适应的。波格丹诺夫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派内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1905年的第三次党代表会上，他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05年革命爆发时，他正在俄国，并以第二届杜马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团顾问的身份活动。在与列宁的关系中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行动，因为列宁已从不参加第一届杜马的立场，转变为全力参加第二届杜马。波格丹诺夫不仅与列宁合作编辑《无产者报》，而且掌握着俄国革命流亡者赖以活动的资金储备。^[43]直到1908年，波格丹诺夫还在支持列宁，站在“布尔什维克中央”一边，与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或那些不愿布尔什维克参加杜马的人展开斗争。到1908年末，转变发生了。波格丹诺夫从“布尔什维克中派”转向“布尔什维克左派”，他采取了为布尔什维克党带来分裂种子的步骤。最初，他支持克普里学校，这是一个由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创立的学校，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内部一个反对列宁政策的中心。^[44]波格丹诺夫参加了这个学校，并从起初反对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立场，逐渐成为他们的代言人。1909年6月，《无产者报》的一个编辑会议在巴黎召开，波格丹诺夫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扮演了一个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保卫者的角色。编辑部谴责这些派别为“左派取消主义”。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列宁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波格丹诺夫的行动破坏了统一的政策。由于他本人威胁着分裂布尔什维克党，列宁便不再认为需要与他在政治上保持统一。政治集团的分化带来了哲学准则上宽容的瓦解。^[45]

然而，最早抨击过波格丹诺夫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的，是普列汉诺夫。^[46]在标题为《战斗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 Militans*）的一系列信件中，普列汉诺夫最先把波格丹诺夫归结为一个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截然相左的唯心主义者。^[47]列宁在1908年意识到自己哲学素养的缺乏，因而在那一年给高尔基的信中提到“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修养不够，这使我不能公开发表意见。”^[48]有趣的是，尽管他与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之后，列宁仍然承认普列汉诺夫在哲学领域的领导地位。事实上，正是在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下，列宁从一个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比如，在1908年2月7日，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谈到普列汉诺夫：“但在哲学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49]大约一个月后，在1908年3月24日，他又写信给高尔基谈到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反对他们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50]列宁在继续报偿普列汉诺夫，说明普列汉诺夫一度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列宁则显然是第二代继承人。

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是19世纪末反对机械唯物论的一种表述。在奥地利物理学家厄恩斯特·马赫的影响下，波格丹诺夫主张，人类存在确实具有的唯一材料，就是他头脑中的感觉印象。马赫与波格丹诺夫两人都断言，按休谟的式样，不可能识破这些感觉印象。换言之，就是不可能确实了解这些感觉印象的原因。因此，“自在之物”就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是认为物质是产生感觉的材料，物质的性质是能被认识的，这与波格丹诺夫和他的老师马赫的观点是相冲突的。

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有所不同，在波格丹诺夫那里，物理学并不是最能吸引他的科学。他更有兴趣的是心理学、生物学和生理学。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观点，认识是人类精神的产品，是人类有机体将感性材料系统化的需要的产品。为了活下

来，组织和构造感性材料，以便使有机体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乃是人类动物的一种生物学需要。波格丹诺夫否认识自然基本规律的可能性。按波格丹诺夫的观点，认识的目的在于弄清物质世界的决定性规律。更确切地说，认识是一种有机体经验的系统化，使有机体能在它周围的环境中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经验一元论放弃了物理学的理想，它否认宇宙的机械规律是能弄清楚的。经验一元论反对牛顿的科学、笛卡尔的科学以及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此外，波格丹诺夫也否认说某种辩证唯物主义是可行的，他否认马克思曾想使辩证法理论运用于自然界。辩证法是一种社会的辩证法；它只涉及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能动性和生产能力。任何使物理学与辩证法相统一的企图，不仅是对哲学观点的歪曲，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向和理论的背离。

对波格丹诺夫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做出回答时，列宁大力依靠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的解释方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本质上是对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准则的一种捍卫。的确，在实际开始写作之前，为了使自己熟悉基本的问题，列宁在近代科学和哲学领域内，作了广泛的阅读。1908年，他研读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同意其中所有的基本论断。^[51]他也使自己了解了厄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卡尔·皮尔生（Karl Pearson）的著作、波伊克尔（Poincare）以及其他某些有关哲学问题的综合性论著。他的《哲学笔记》包含对阿伯尔·莱伊（Abel Rey）的《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的一篇很长的批注。^[52]考虑到列宁承担的政治重任，我们会感到惊奇，他是如何善于约束自己，发挥优势，在1908~1909年充分利用巴黎图书馆的藏书的^[53]。无论如何，当他希望有所确定、寻求权威时，他所求助的教科书，是恩格斯的著作。支配《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三部著作，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

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此外，列宁不但在回答马赫与波格丹诺夫，同时也在指出“近代物理学的危机”。恩格斯的整个自然哲学，他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是建立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不可毁灭的信念上的。对于恩格斯，正如对于古希腊、罗马的原子论者一样，原子是宇宙的不可分割的建筑单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恩格斯死后，“近代物理学危机”达到一个顶峰时，原子确实开始按着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或恩格斯所不能够预见的方式分解了。原子开始分解为电荷和能量的运动。世界好像在一种非物质的能量之波上流动。1892年发现电子，证明了原子的可分性。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在1900年发现了量子理论。原子看来只是放出能量的一种震动。最后，爱因斯坦(Einstein)在1905年出版了他的一般相对论的著作，动摇了牛顿的绝对时间、空间的宇宙观。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面临的任務，就是对“近代物理学危机”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是他们的重大任务。此外，恩格斯不可能预见到科学的革命进展。无意之中，他遗留给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是一种到19世纪已经过时了的科学理论。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必须决定，是把恩格斯的科学作为在现代经验科学的进步面前，已不再适应的东西加以抛弃，还是维护恩格斯的科学，把它调整到能够适应新的概念结构。显然，对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来说，要放弃恩格斯的过时了的科学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的头10年里，两人从两个方面与修正主义作斗争，即与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和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马赫主义作斗争。如果切断与恩格斯的科学的联系，就势必严重削弱他们与伯恩斯坦、波格丹诺夫作斗争的哲学根据，而且意味着削弱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生命力。于是，普列汉诺夫与列宁采取了保守的态度。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们不得不维护一种过时了的科学体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主义》，在哲学的水平上，是一个保守的文件。列宁用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重新肯定，来回答现代物理学的革命性突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完全没有功绩或创新。我们将看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表明列宁正在适应于20世纪的科学进步，它显示着对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超出。它不是一本列宁在其中保持不变的书，它是一本列宁在其中不能前进得足够远的书。它是一个开端，但却是一个退回到传统模式之中的开端。列宁以一种并非为他所特有的姿态，维护了一种保守的哲学模式，而斯大林后来即使在列宁改变了这种态度之后，还在拖住这种哲学模式不放。^[54]

最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像《怎么办？》那样，再次肯定了政治的首要地位。列宁一贯认为恰当的理论是行动所必需的指针，始终主张政治上的需要必须作为党的决策的准则；在否定和肯定的两层含义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党性的标记引入哲学。在否定的方面，《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使信仰成为党的一种功能。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Marxism and Revisionism）一文中，列宁就已经把修正主义的概念，从它的政治—策略的意义，扩展到范围广阔的思想体系的意义。不仅俄国的经济主义者、法国的布鲁斯主义者（Broussists）和英国的基尔·哈丁派（Keir Hardians）在党的意义上是修正主义者，而且在他们之外还有当前结成联盟的康德和马赫的现代追随者们。^[55]所以，对列宁来说，所谓哲学上的党性，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政党来坚持，因而也就必须坚持一套既定的思想信念。与哲学相比，政治处于首位，或者说，哲学是按政治来解释的。在肯定的方面，哲学上的党性也意味着对人们生活的环境能动的、主观的干预。在这层意义上说，列宁擅长于正确评价辩证法。在对辩证法的理解方面，列宁经常强调意识的改造力量。列宁经常关注与当前未定条件相矛盾或相否定的行动。于是对列宁

来说，意识与政治是紧密相联的。从这个观点看，当列宁去使思想符合党的需要时，他实际是在使政治上的变动成为把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为一个革命的武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列宁实际是在干预着一场政治上的危机、亦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面临改良主义时遇到的危机。在1905年后的这些新条件面前，列宁懂得，如果布尔什维克党要不失去它的革命热情，就必须进一步确定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组成部分。换言之，列宁的有意识的决定，他对1905年后布尔什维主义面临问题的理论的认识，使他确信，只有对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成分的干预，才有助于坚持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56]

从基本上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捍卫一种既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又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有趣的是，列宁没有提到他十分熟悉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特别指出的两个辩证法规律。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列举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1)量转变为质；(2)否定之否定，而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及这些规律。而且，列宁甚至没有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他没有涉及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矛盾、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力的矛盾。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关注的中心是在“现代物理学危机”和唯心主义复活的年代，捍卫唯物主义。从这一点出发，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都是不重要的。

按照列宁的观点，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独立于精神而存在。列宁的哲学论断的中枢，就是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清晰地划出一条分界线，就像有可能从社会—经济上区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在哲学上区分这两个阵营。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唯物主义主张外部世界与自我的分离和独立。^[57]列宁把他的唯物主义与追溯到德漠克利特的古典唯物主义联系起来。^[58]如果说唯物主义肯定物质对精神的分离，那么，唯心主义则断言物质对精

神的依赖。^[59]因此，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斗争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唯物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哲学，总是与进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相联系。对比之下，唯心主义是一种保守的哲学，总是与所有者资产阶级相联系。同样，思想上的斗争也是由经济上的阶级斗争造成的。

在列宁关于唯物主义的定义中，隐含着物质是实体的涵义。列宁的哲学发展的这个阶段，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是如此。作为独立于精神之外的物质，引起我们头脑中的感觉。^[60]列宁抨击马赫，他坚持认为，对于假定在我们的感觉之外存在着一种“客观实在”，^[61]这是一个“唯一不可避免的结论。”^[62]在唯物主义的信念中，对这种“客观实在”的信念，是关于物质的定义。为了明确地表达物质的意义：

需要有一个关于这种客观实在的哲学概念，而这个概念很早很早以前就制定出来了，这个概念就是物质。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63]

物质就是这种实体；它成为存在的不能缩小、不能少的因素。由于没有弄清它，列宁陷入了形而上学。

尽管列宁捍卫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路线，《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仍然在两个重要之点上修正了那个理论。对于列宁来说，要完全不顾现代物理学的进展是不可能的。他在书中坦率地承认，不打算争辩现代物理学家的科学理论。他把他的关注限制在一个哲学观点上：坚持客观物质实在的思想。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列宁不得不修正恩格斯的三个基本思想：原子物质不可再分的概念；“自在之物”能够被认识的思想；以及认识论上

的“表象”的概念。

列宁不能忽视原子已经消失在大量的电荷中的科学事实，他不能否认“物理学危机”的这一进展。恩格斯的关于可感到的物质的观念只能抛弃。德谟克利特意义上的不可毁坏的原子已经被放弃了。然而，列宁用电荷的唯物主义替代了不可毁坏的原子。在列宁看来，电荷仍然是物质，因为它符合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定义：它独立于精神而存在，它是某种不同于精神或意识的东西。换句话说，按照列宁的观点，“现代物理学危机”迫使我们放弃的只是原子不可毁坏的概念，而不是物质的概念。的确，电荷是物质，因为它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外，因为它不是精神，因为它是客观的（它是由物理的属性组成的）。

由于可感觉到的原子的消失，列宁还放弃了“自在之物”能被认识的思想。在列宁哲学活动的第二个时期，即1905~1914年，他得出结论，人的思想最多只能认识物理客体的“属性”，但决不能认识“自在”的物理客体。不过，列宁并未放弃哲学实在论或真理相符论。列宁的一生始终维护实在论的立场，承认外部客体独立于精神而存在，这些客体在某种意义上是物质的，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外部客体，应该获得尽可能多的关于客体“属性”的知识。但是，列宁放弃了我们获得的无论什么认识都会揭示内在本性即客体“自在”的希望。而且，列宁的一生始终相信认识的真理性的真理性决定于该种认识与外部客体的相符性。我们认识的真理性的真理性，是由它反映一个物质的外部客体的“属性”的精确程度来计算的；物质的外部客体是为建立真理所指的对象。列宁始终是一个实在论者，所变化的，是在20世纪物理学革命性进步的影响下，他为外部的物质客体所下的定义。

最后，为了恰当评价列宁对真理“摹本论”的回答，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在第二章“辩证法的毁坏”里已经看到，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是最后又

否定了真理的“摹本论”的。但列宁不熟悉《自然辩证法》。列宁死于1924年，而《自然辩证法》是1925年才第一次在俄国出版。但列宁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这些著作中，恩格斯阐述过真理的“摹本论”。因此，恩格斯的认识论思想有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他维护了真理的“摹本论”，而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他否定了这种立场。由于只熟悉恩格斯在第一个时期的上述三部著作，列宁以为恩格斯的一生都始终是主张真理的“摹本论”的。当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放弃这一真理时，他还以为这是在修正恩格斯的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其实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已经放弃了这种立场。

列宁认识到，不可能有关于电荷的“表象”；对自身不固定、不确定的客体，是不能有清楚的摹本的。但是，按照列宁的观点，需要否定恩格斯的“表象”的概念，并不是说也必须放弃人的思想受外部感官知觉刺激的概念。虽然可感觉到的外部客体不再产生“表象”，外部物质仍然刺激感官知觉，在我们头脑里产生一整套感觉的属性；这些感觉的属性就是反映。所以，列宁反对当代形式的唯心主义：意识并不先于物质。相反地，物质先于意识，虽然外部物质现在是电荷，仍然可以把思想的来源追溯到这种客观性；思想是派生的，它们不是什么预想的东西。人的认识可以接近外部实在，即使这种实在是电荷；属性会返回到作为原因的客体自身。辩证法对列宁来说，是以对外部实在的经常的经验探讨为特征的。因此，辩证法，亦即反复并坚持进行科学实验，最终会把客观的物质属性呈现在我们面前。

列宁的感觉主义源出于他的唯物主义。物质产生感觉印象。的确，在他哲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的事业，是要建立外部世界，客观实在对于精神

的首要地位。他也是这样做的。但他进一步把“外部世界”、“客观实在”定义为自然的物质，是与社会或历史条件相对立的。因此，物质、自然的性质，取得了对精神的首要地位。追随恩格斯的观点，列宁相信物质产生我们头脑中的感官材料，这些感性的东西是物质的反映，引起感觉的物质是居于第一位的。^[64]这就是列宁的反映论。与休谟、贝克莱、康德、马赫相对立，列宁主张我们接受对外部世界作出的反映，是“对外部实在的一种近似的摹本”，^[65]因此，“自在之物”是可以认识的。或者说，由于我们开始探寻“自在之物”，通过近似于它的一系列属性来探寻它，实验和实践引导我们不断地接近客休，因而“自在之物”是可能充分认识的。

从哲学的观点看，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的主要对手是波格丹诺夫和马赫，他们的背后是休谟、贝克莱和康德。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相对立，列宁通过证明客观实在能够被认识，来维护客观实在的首要地位。如果确切认识外部世界是不可能的，那么客观实在第一性的命题，即唯物主义自身，也就破产了。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后面章节里（在那里特别详细地叙述了自然科学中的革命），列宁发现，要否定现代物理学的进展，面对电子理论要坚持原子的不可毁坏性，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放弃了物质具有范围、可以度量的观念。列宁放弃了可见性、可触性的观念，认识到电荷和能量也可以是物质。重要之点不在于质量、密度、广延，而在于“物质这个概念，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在认识论上指的只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66]而且，列宁也了解到，思想必须跟随科学。他认识到，象物质定义的情况那样，科学的发现经常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的唯物主义的定义。按列宁的看法，恩格斯的精神迫使我们改变关于世界的概念，如果对世界的科学理解要

求我们这样做的话。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

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忽视这种联系来研究马赫主义，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为了恩格斯的某个词句而牺牲恩格斯的方法。恩格斯直率地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姑且不谈人类历史）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对他的自然哲学论点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的东西”，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67]

这种论述表明了列宁思想的开放性，它表明列宁看到为未来而存在着一个深远的规划。^[68]但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还没有为这一规划做好准备。虽然这本书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开端，但它仍然是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认识论感觉主义二者的维护。而且，虽然列宁确实维护了客观实在的首要地位^[69]，被列宁列为首位的物质却是物理现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外部实在或数学的物理现象，还限于18世纪的解释。在这种唯物主义的概念形式中，外界的首要地位意味着按牛顿方式的自然界的首要地位。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谈到费尔巴哈时，大都引证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但也有少数场合，是列宁自己指出费尔巴哈的成就。列宁完全忽视了费尔巴哈思想的哲学人类学基础。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没有被他发现。相反地，列宁把费尔巴哈看作基本上是与培根或洛克同一类型的经验主义者。他认为费尔巴哈是维护一种感觉主义的经验论，或者是从哲学唯物主义的观点谴责黑格尔的唯心主

义：

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同他承认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对象、物体、物的客观实在性是分不开的。费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70]

再者，实践（Praxis）的观念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不见了。相反地书中列宁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出现。实践的概念包含人类自觉干预周围环境的思想，包含人类经济或意识活动进入环境、并具有改变环境的作用的思想。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则是用来证实真理要求的一种认识论手段。实践是有原因的、确定的，而实用主义则是从经验上证明真理主张的一种方法。^[71]当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谈到实践（Practice）时，他指的是实用主义，指的是对与外部世界相对立的假设的检验。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对外部现实的接近或无止境的探讨，达到了日益增强的确实性。列宁对此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象，区分它们的正确和错误。”^[72]

在1905～1914年的第二时期里，列宁持一种有矛盾心理的认识论。一方面，它分解为一种认识的社会学，另一方面它又提出形而上学的确定性的要求。就认识的社会学而言，列宁相信思想是依赖于社会阶级的，理论的信念可以归结于阶级根源。资产阶级总是唯心主义者，而进步的或无产阶级的成员则总是唯物主义者。就要求形而上学的确定性而言，列宁只使它们与无产阶级或进步的阶级相联系。唯心主义总是错误的。于是，资产阶级由它们的阶级宣判而忠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信念，注定是生活于错误之中。而无产阶级是唯物主义者，这样，哲学唯物主义的坚持

运用，必定使无产阶级接近于实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认为，科学会超越哲学。简要地说，列宁的哲学理论就是，哲学将要被纳入一种更高的学科。自然科学会扬弃哲学。物理学的首要地位再次得到肯定，而物理学又是一切真理要求的模式，认识被看做是与发现宇宙规律相同义的。

但是，人们必须记住，马克思著作的决定性部分，在列宁的整个一生中，都是为他所无法利用的。比如，列宁不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但更重要的是，列宁不了解《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和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以，他不了解那些充分包含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手稿，即1844年的手稿。而且恰恰在这些手稿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是相联系的，马克思探索了经济实践的思想 and 人类客观化的命题。因此，列宁对于肯定实践唯物主义、肯定在社会和自然中都有决定作用的人的能动性的马克思，没有什么认识。结果，列宁在1909年没有涉及人类学和实践的命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列宁不了解马克思那些对这些概念作了充分探索的著作。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看不到黑格尔。由于缺乏黑格尔，书中也就缺乏对辩证法的透彻讨论。事实上，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辩证法是与过程、运动相联系的。辩证法仍然表现为《什么是“人民之友”？》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情形：基本上表现为进化。在考茨基之后，它接近于达尔文更胜于接近黑格尔。这样，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极少谈到的辩证唯物主义被看做与变化同义，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列宁不能正视黑格尔，就决定了他不能领会辩证法。直到1914~1916年他与黑格尔斗争时，才真正以一个辩证法哲学家的面目出现。^[73]1905~1914年期间，列宁是在捍卫哲学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发生“物理学危机”的年代，列宁以保守的态度应付这种危机便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采取的行动。他试图用退到古典唯物主义传统的方法来支撑马克思主义。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之间，也就是在1909~1914年的这些年里，列宁积极地投入哲学问题之中。他广泛地阅读哲学资料，特别是科学哲学领域，以及唯物主义认识论危机方面，尽管列宁不是一个熟练的哲学家。1904年的列宁认为自己未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而1914年的列宁则实际上已经在重大的科学和认识论问题上有了深入的了解。二者之间是有重大差别的。列宁在巴黎和瑞士的居留对他十分有利，因为他能利用巴黎大学和伯尔尼、苏黎世的图书馆。而且，列宁不断发表文章，直接提出哲学问题。但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发展的立场，在1909~1914年间一直占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和《卡尔·马克思》所表明的，是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进了的分类法。他现在把“马克思的学说”^[74]分为三部分：哲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然而，列宁对“马克思学说”的各个方面的较好的理论上的把握，仍使列宁首先强调认识论问题。他把哲学唯物主义的范畴置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之上，坚持把唯物主义定义为形而上学的实在论。^[75]有关认识论的问题在他头脑中的中心地位，可以在他的《阿贝尔·莱伊〈现代哲学〉批注》中进一步得到证实。他在1909年读此书时，把莱伊看作一个“不可知论者”，因为莱伊怀疑对“自在之物”的认识是可能的。尽管如此，莱伊总的说来是维护唯物主义的立场，列宁的批注表明，当莱伊维护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之点时，他是完全同意的。虽然莱伊的著作概述了“科学危机”的整个领域，而列宁的注意力却没有放在这里，他比以往更为相信，绝对

实在论是唯一有价值的理论立场。^[75]写于1909年的对阿·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批注，也可以看出列宁对认识论的专注。^[77]

在1909~1914年间，列宁为费尔巴哈的著作所吸引。1909年他读了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Essence of Religion*）。列宁用恩格斯的眼光探讨费尔巴哈，把这部著作看作首先是认识论的。他理解费尔巴哈拥护感觉主义的认识论，因而是接近而不是达到哲学唯物主义。费尔巴哈被看作向黑格尔唯心主义挑战的唯物主义者。列宁再一次完全忽视了费尔巴哈思想的人类学基础。在对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的一条评语中，列宁写道：“这就是为什么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用的术语——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是狭隘的。”^[78]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N. G. Chernyshevsky*）的评注也表明，他漠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列宁心目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因而自然是一个早期的唯物主义者和感觉主义者。^[79]列宁缺乏任何哲学人类学的概念，这对他的国家学说和关于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评了不首先以人类实践与活动为基础的任何唯物主义。从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札记的一条脚注^[80]中，我们知道列宁读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也从列宁的《卡尔·马克思》（1914）知道，列宁读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因为列宁曾从中作出引证（没有脚注），并使用了著名的短语“革命实践活动”，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它。^[81]然而，列宁没有看到，他在第二个时期（1905~1914年）的唯物主义形式与马克思所主张的是有明显差别的。因为列宁没有读《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所以没有看到对马克思来说，唯物主义是以人的

实践活动为基础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从社会的人的能动作用中成长起来的。相反，列宁所信奉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倒转的类型。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中，居首位的不是人，而是物理现象。马克思把人的社会力量看作积极因素，而列宁则以外部的东西为积极因素，外部的东西就是指物理现象。

在列宁的1909-1914年的著作中，黑格尔未被认真对待，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事。无论在什么地方提到黑格尔，都只是被当作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遗弃了的人。因此，在1914年正视黑格尔之前，列宁更为关注哲学唯物主义。由于某些原因，列宁没有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那样把辩证法运用到自然界。我们知道，恩格斯在那部著作中挑选了与自然规律相符的两条辩证法规律：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补充了第三条规律：对立面的统一。但列宁不了解《自然辩证法》。不用说，列宁没有按照恩格斯的方向前进。直到1914年他接触黑格尔之前，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到否定规律或量变转向质变的规律。列宁没有像恩格斯做过的那样，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界。直到1914年前，列宁所关心的是维护哲学唯物主义；即便当他论及辩证唯物主义时，也没有从否定或量转向质的角度来论述。相反地，他把辩证唯物主义本质上看作认识论的过程，看作人类认识的连续进化。

20世纪初期，在1933年列宁的《哲学笔记》单成一书正式出版之前，《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般被看作布尔什维克主义哲学的代表作。20年代在苏联，广泛流传着反对苏联一党专政的早期迹象的不同意见，一种反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哲学僵化的主张也发展起来。卢卡奇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列宁主义哲学的不加掩饰的反驳。卢卡奇要求回到黑格尔。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本尼迪克特·克罗齐的唯物主义哲

学史》(Il Materialismo Storico e la Filosofia di Benedetto Croce)也否定了列宁的1909年这部著作的主要前提,提出回到黑格尔,哪怕这种返回需要通过克罗齐的历史循环论也罢。杰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另外两本著作,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的《作为哲学家的列宁》(Lenin Als Philosoph),和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提出了相似的主题。他们的异议受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压制:在苏联是通过极权主义制度,在西欧则是通过西方共产党对斯大林主义的默认。列宁逝世之后,所有这些著作都被宣称为反对苏联在布哈林(Bukharin)和斯大林的傀儡米丁(Mitin)指导下出现的哲学形式(即机械唯物主义)的。

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所不了解的是,列宁本人已经丢弃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许多思想。这些人不了解,列宁于1914~1915年间在伯尔尼公共图书馆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以及《哲学全书》中的《小逻辑》,列宁自己黑格尔化了。在黑格尔的深刻影响下,列宁的哲学达到了他的成熟形式,1914年,列宁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辩证法家。^[82]

第三时期:1914~192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的全球性出现,第二国际的瓦解,使列宁面临着重新思考他的革命年代甚至他的革命前的政策的任务。承认政治居首位,列宁意识到他必须再次回答一种危机。像在《怎么办?》中做过的那样,列宁懂得他的政治——自觉性的任务,就是要寻求克服这些新困难的道路。带着这种能动主义的精神状态,他探讨了黑格尔。

我在前面的几章里已经指出,对黑格尔可以从右的方面,也

可以从左的方面去解释。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都给予黑格尔一种左派的解释：他们强调他的思想的主观的、能动主义的人类一构成的性质。因为20世纪大多数的黑格尔的解释者突破了19世纪右翼的形而上学和客观主义的解释，相反地强调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实践和干预的命题。尽管列宁对黑格尔有所曲解，但他的工作仍然是20世纪较大规模地重新解释黑格尔的一部分。早于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十年，列宁重新发现了黑格尔思想的人类一构成的方面。当列宁处于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新环境中，面临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战略的任务时，黑格尔哲学的能动主义，按照列宁对这种哲学的理解，有助于为他自己对必须彻底地与战前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决裂的认识提供凭证。黑格尔哲学，它的意识、干预和改变外部世界的命题，这种左翼对黑格尔的解释，支持了列宁的政治上觉醒：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时代的环境，创立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简要地说，列宁为接纳黑格尔作了心理上的准备。列宁在黑格尔那里为当时他的形成派别的政党生活的需要，找到了哲学的证实。正如在1894~1905年时期，《怎么办？》从政治上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从思想上回答了1905~1914年时期新的政治要求一样，《哲学笔记》就是对列宁所面临的一个全新世界的一种自觉的政治的回答，并且是对未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思想上的论述。

对列宁的哲学生涯的第三时期（1914年至他逝世）进行的这种分析，实际上是在分析列宁作为一个辩证法家的出现。而且，这个时期表明，正如卢卡奇已经发现的，作为列宁主义哲学的真正表述，《哲学笔记》必须取代《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然而，全面地研究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哲学史》、《历史哲学》和《哲学全书》的评论、摘录、批注，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为了清晰起见，最好是先把这一研究的程序说明一下。

下面关于《哲学笔记》的分析将按五个总括性的题目进行：(1) 关于列宁对黑格尔误解的讨论；(2) 关于列宁对黑格尔正确理解的讨论；(3) 关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之间的连续性的讨论；(4) 关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之间的新的分离的讨论；(5) 关于黑格尔对列宁思想影响的概括和黑格尔化列宁主义主要原则的陈述。

列宁研读黑格尔，是以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的。使人感到《哲学笔记》中康德、阿芬那留斯和马赫无处不在。列宁1914年的能动主义的深意，不仅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再度的肯定，而且在列宁看来，可以用黑格尔来反驳康德、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维护一种在精神之外的实在，依然是《哲学笔记》的任务之一。列宁从来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哲学唯物主义。但在列宁看来，黑格尔是一个肯定外部客观性可以被认识的哲学家。当列宁表示他唯物主义地研读黑格尔时，意指他是以相信外部物质的客体可以被认识这一观点来阅读的。列宁读黑格尔多半是用与读费尔巴哈时同样的方式。不管怎样，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黑格尔作为哲学实在论的维护者，可以解释为一个批评康德、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的人。

列宁阅读黑格尔时有大量误解，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对黑格尔正确理解的方面。由于沉浸于黑格尔之中，迫使列宁放弃了他的早期哲学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在《哲学笔记》中，列宁的思想是恩格斯与黑格尔思想的混合。恩格斯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规律，在这个方向上列宁并没有追随恩格斯。1914年列宁的主要兴趣在于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他所关注的仍然是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由于集中关注人在他的辩证的斗争中获得认识，列宁突破了恩格斯的综合辩证法和物理学的传统（虽然列宁仍然接受恩格斯的某些原则）。在《哲学笔记》中，自然辩证法，即辩证唯物主义，是居第二位的。被列宁置于首位的，是

认识辩证法，也就是人的意识用以获得真理的能动性和过程。

(一) 关于列宁对黑格尔误解的讨论

列宁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显然，试图作出这样一种解释，是列宁的权利。列宁阅读了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的研究，按照唯物主义的原则分析和描述它们。简要地说，是列宁把按他所理解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认识论的实在论（外部的、物质的客体能够被认识）加入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结构之上，在《哲学笔记》中发生了一个融合过程。列宁试图使黑格尔的辩证法适合、插入古典哲学唯物主义内部。

列宁试图把黑格尔唯物主义化，这就形成了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基础。这种哲学唯物主义（恩格斯的）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互相混合，产生了肯定的与否定的双重结果。在肯定的方面，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起到了丰富马克思主义在辩证法和哲学方面的思想的作用。从哲学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这种混合中，黑格尔的影响涌回马克思主义内部，就产生一种创造性的动力，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脱离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不结果实的传统而改变方向。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就是把恩格斯与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强加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逻辑结构之中的结果。当列宁从事他的事业时，他受到了这种融合的黑格尔化结构的影响，并且这种黑格尔化的影响，使列宁终于在某些主要方面突破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传统。

这种混合的否定的方面，指的是对黑格尔逻辑研究的目的、意义的不恰当的解释。从这种融合中，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更多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生了复活。黑格尔的思想却丢失了，因为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化导致了对黑格尔思想的某些不恰当的描述。要使一种唯物主义的探讨和一种唯心主义的探讨完全融合是

不可能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方法论的矛盾。这些方法论的矛盾迫使列宁对黑格尔的思想做出许多没有事实根据的论断。

列宁对黑格尔思想的误解扩展到两个基本的领域。首先，列宁不恰当地理解了黑格尔逻辑研究整体的意图和目的。第二，列宁对黑格尔的特殊概念提出了不确切的定义和用法。列宁所寻求完成的东西也就是把唯物主义的內容置于唯心主义的结构之内，这是行不通的，这就迫使列宁歪曲黑格尔的某些特征。

比如，列宁不正确地解释了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意图。对黑格尔来说，《逻辑学》是对必须与存在相一致的形式的逻辑结构作出描述的一个尝试。黑格尔概括了精神的范畴结构，是现象必须与之相符合的。只是在《逻辑学》的第二卷里，在主观逻辑中，事实上是在倒数第二章里，黑格尔才拿出认识的命题。他这样做是准备论述绝对观念。《逻辑学》的压倒的份量是全力讨论逻辑的形而上学，讨论精神已经埋置于实在的性质之中的形式。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导言中，他描述了《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差别：

在《精神现象学》中，我曾经从意识与对象的最初的直接对立起直到绝对的知这一前进运动，这样来表述意识。这条道路经过了意识与客体的关系的一切形式，而以科学的概念为其结果。……

因为《精神现象学》不是别的，正是纯科学概念的演绎，所以本书便在这种情况下，把这种概念及其演绎作为前提。绝对的知乃是一切方式的意识的真理，因为正如意识所发生的过程那样，只有在绝对的知中，对象与此对象本身的确定性的分离才完全消解，而真理便等于这个确定性，这个确定性也同样等于真理。……

这种客观思维，就是纯科学的内容。所以纯科学决不是形式的，它决不缺少作为现实的和真正的知识的质料，倒是唯有它的内容，才是绝对真的东西，或者，假如人们还愿意使用质料（matter）这个名词，那就是真正的质料，——但是这一种质料，形式对于它并不是外在的东西，因为这种质料不如说是纯思维，从而也就是绝对形式本身。^[83]

这就是说，《逻辑学》是涉及存在的逻辑形式的形而上学的陈述。象柏拉图（Plato）和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把思想看作永恒的和普遍的一样，黑格尔自信他揭示了那形成存在的本质的逻辑范畴。《逻辑学》不涉及意识，《精神现象学》才涉及。《逻辑学》概括认识必须借助发生的形式，《精神现象学》概括认识的过程、概括意识寻求与外界统一的能动性。俯瞰漫长的思想史和各种已经创立的世界观，黑格尔把意识对真理的探寻描述为“一席豪饮”，^[84]认识属于意识的领域。《精神现象学》开头的几章论述“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对黑格尔来说，意识与认识是结合的，因为那“精神在现象的进程中为自己所准备的就是真实认识的环节。”^[85]

列宁在读黑格尔时，他把《逻辑学》看作对认识的一种描述。黑格尔把对意识的研究交给了《精神现象学》，列宁却不适当地把《逻辑学》解释为对意识、认识的一种调查研究。对列宁来说，认识论的问题是首要的问题，所以，列宁把《逻辑学》应用于认识论。恩格斯曾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的规律，列宁却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列宁关于辩证的认识论的陈述。

列宁自己进一步证实，他把《逻辑学》当做认识论阅读。在《摘要》中的一个评论写道：

一般说来,《逻辑学》第二部(“主观逻辑”)第三篇(“观念”)的导言以及《哲学全书》中相应的各节(第213—215节),差不多是关于辩证法的最好的阐述。也就在这里,可说是特别天才地指明了逻辑和认识论的一致。^[86]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黑格尔的这些著作,就不难看到,在这些部分里是什么特别引起列宁的注意。在《逻辑学》的第三篇(“观念”)的导论中,黑格尔写道:

但是理念不仅具有真正的有,即概念与实在的统一这种较一般的意义,而且具有主观概念和客观性较确定的意义。概念,作为概念说来,本身就已经是它自己和实在的同一。

理念作为这种关系,是一种过程,即自身消散为个体及其无机的自然界,并重新使无机的自然界受主体的支配,而又回到最初的单纯的普遍性。理念的自身同一,与这一过程是一回事。^[87]

如果我们查阅《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查阅列宁挑出的那些段落,就会发现一段类似的评注。在第213节,黑格尔说:

理念乃是自在自为的真理,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它的理想的内容不是别的,只是概念和概念的诸规定;理念的实际的内容只是概念自己的表述,象概念在外部的实在的形式里所表现的那样。而且概念还包括这种外部形态于它的理想性中,使它受自己的支配,从

而保持它自身于其中。^[88]

在这一节里，黑格尔描述了概念与实在之间的统一。然而，对黑格尔来说，概念是先行的。概念是普遍的，是逻辑的范畴，实在在它之外进行。“现在这里所要考察的这种普遍的概念，包含三个环节：普遍、特殊和个别。”^[89]黑格尔相信一种逻辑的形而上学，进一步主张逻辑形式是现实得以出现的先决条件。所以，当黑格尔谈到概念与实在的统一时，他并不是描述一种主观概念与一种外在客体之间的一致，相反地，他是在描述实在中的个别事物与它的逻辑范畴的一致性，描述类与普遍的关系。在黑格尔那里，向后走向形而上学的运动，是从实在走向超验的东西。对黑格尔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普遍的：这是一切意义的根据。

在这些段落里，黑格尔也把观念的达到，实在中个别事物对普遍的关系，描述为一个过程。黑格尔非难那种把真理设想为“死寂”、“简单的图像”的观点。^[90]事物与普遍性之间的一致性主要地是一种艰巨的发展，必须克服许多特殊的对立面。“认识的过程在于回到由差别所丰富的统一。”^[91]

列宁为黑格尔著作的这些部分所吸引，因为它们强调了较多的意识的能动作用。列宁也正确地理解了黑格尔关于过程的命题，即认为认识只在于一个长的进化运动的结尾的理论。但是，就大部分说来，列宁完全颠倒了黑格尔所说的话。列宁把这些段落看作肯定一种真理的摹本论，看作断定人的一种思想，即关于一个事物的概念能够获得对外部物质客体的近似。列宁对《逻辑学》的唯物主义的阅读，把黑格尔看作主张个别的、外界的事物是真理的基础。当然，这是黑格尔所最不愿意说的事情。

关于列宁对黑格尔的本质论范畴的理解，也可以做出类似的评论。本质论构成《逻辑学》第二卷，是《逻辑学》中重要的一

卷，是《逻辑学》中对列宁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部分之一。本质论分为三部分：“本质”，“现象”，“现实”。但是，黑格尔有两个关于本质的单独的定义。本质是存在的继续。“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说来，就好像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92]本质使自身伸展于存在之后，简单直接性之后，并且使自身与一个他者相接触。本质是与一个他者的关系，它就创立如同同一、差别和矛盾的范畴。本质又是存在的伸展。因为只有当存在被引入与他者相接触时，同一与差别的概念才有意义。在《逻辑学》中，本质必然分化为现象。“本质必须表现。”^[93]现象的世界是关于“现象”的、“直接性”的世界。^[99]在黑格尔《逻辑学》的进化中，当我们达到了现象的水平，我们就处于实存的世界。

另外，黑格尔也把本质确定为自在。黑格尔在这方面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主张一个客体的相持，它的发展，只能被解释为一种内在核心的展开。本质是自在，它把质分给一个客体。黑格尔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与可能的公式，主张本质是现实，是持存于一个事物中的质，它赋予一个事物贯穿于所有发展阶段的唯一的特征。作为一个形而上学家，黑格尔把本质看作达到实体学说的开头阶段。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按进化的范式建构的，本质论就是这种发展范式的一例。本质正是表现为相互联系面作为实体结尾，中介的阶段是本质作为自在。在可能进化到实体之前，持存必定是持久的，持存必定成为质，它必定凝结到不朽的自在之中。

由于唯物主义地阅读《逻辑学》，列宁不准确地确定了黑格尔的本质的两重含义。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写道：

这里都是极其晦涩难懂的。但是，看来也有活的思

想：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整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黑格尔在这里热衷于对词和概念的“加工琢磨”和“穿凿雕镂”，这是反对把规律的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像化。现代物理学应该注意这一点!!!^[95]

黑格尔的本质指的是与一个他者和自在的联系，而列宁则把本质转向科学的规律。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本质起着重要作用，因为作为持存，它创立同一与差别，作为自在，它是实体的序幕。在列宁的思想中，规律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它部分地提供了对事件的决定性说明。在列宁的图式中，本质等于必然性，而在黑格尔的图式中，本质等于持存或自在。

再者，黑格尔与列宁还对普遍—特殊的对立持有不同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普遍—特殊的关系是他的概念论的一部分。在《哲学全书》中，黑格尔用以下的方式描述这种对立：

概念本身包含下面三个环节：(1) 普遍性，这是指在它的规定性里和它自身有自由的等同性。(2) 特殊性，亦即规定性，在特殊性中，普遍纯粹不变地继续和它自身相等同。(3) 个体性，这是指普遍与特殊两种规定性返回到自身内。这种自身否定的统一性是自在自为的特定东西，并且同时是自身同一体或普遍的东西。^[96]

从总体上看，黑格尔的体系可以说具有泛逻辑主义的特点。黑格尔的体系描述客观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作为宇宙的基础起作用。黑格尔摹仿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模式，用理性主义的形式来安置他的三合一图式。按照黑格尔的普遍推理，精神的进展经历三个阶段：精神是原始的

实体，它使自身转化为自然，而自然又回到自觉的主观性或意识，它的作用在于适宜于自然。推理对于黑格尔的整个思辨体系有着重要意义。推理，把握从精神到特殊到个别的运动，表明黑格尔确信普遍性是一切特殊性的前提。

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的命题，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它是整个辩证法赖以存在的根据。但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必须置于推理之内，以便确切地理解。推理的模式，被黑格尔用作一种图式，逻辑的图式。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在它的精神形式中，三合一的运动，由精神流向自然再到意识。逻辑形式的推理复制精神形式的推理，于是三合一的运动就由普遍流向特殊再到个别。然而，在逻辑的层次上，普遍就是概念。对于黑格尔来说，特殊必定总是单纯孤立的，特殊的东西总是分离的，而分离的东西就失去意义。概念使特殊的东西具有意义。因为概念给予意义，所以概念就是普遍。在黑格尔看来，概念对于特殊的现象是必然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特殊终究有意义的话，它必定被看作是与一个普遍相对立的，必须置于一个概念的关联之内。虽然概念与特殊处于互相矛盾的地位，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实体，但也形成一种统一，因为其中每一个都需要另一个来完成它自身的定义。

然而，在列宁看来，普遍不是精神或逻辑。在接触黑格尔之后，列宁使普遍性具有相互联系的意义。列宁在一条叙述黑格尔的概念命题的含意的评论中写道：

看起来，对黑格尔来说，这里主要的也是把转化指出来。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之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不仅是（1）一切概念和判断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是（2）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转化，并且不仅是转化，而且是（3）对立面的同一

——这就是黑格尔的主要的东西。^[97]

所以，列宁想到普遍—特殊的命题，就想到无限的联系。对列宁来说，特殊性决不能单独站住，这不是因为它是从一个形而上学的逻辑形式引申出它的存在，而是因为个别的東西内在地系于一个关系之网中。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单纯是一场欧洲的战斗，一场欧洲战争是通过帝国主义而与全球其他地方联系着的。

列宁不愿意把黑格尔关于普遍性的观念看做一种精神的、逻辑的范畴。这使他误读了他在1915年研究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当黑格尔写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他把这些人看作辩证法的前辈。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黑格尔表述所有这些已经发现了普遍的在先性。比如，黑格尔对毕达哥拉斯作了如下的描述：

毕达哥拉斯派说，第一个单纯的概念是统一；不是算术的一，——不是绝对隔绝的、排斥性的、消极的一；而是有连续性、积极性的一，——不是多数的，它只是一。它是整个的普遍本质。他们更说，……一个事物的最后本质，或对一个事物的“自为之有”的纯粹考察，就是一。……

其次是对立。一是同一，普遍性；第二个是二元，分别，特殊。这些范畴今天在哲学中还有价值；毕达哥拉斯派第一个把它带到了意识中。……至于这个一对多，或自身同一性对“他在”是什么样的关系，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98]

在黑格尔看来，希腊哲学家之所以说到辩证法，是因为他们

懂得个别对普遍的依赖、个别从普遍派生。按黑格尔的表述，辩证法不是意味着运动，而是涉及普遍—特殊的矛盾和相互依赖。发展、过程都从这种矛盾和相互依赖中发生。这里二重性是前提。

在列宁的《〈哲学史讲演录〉摘要》中，他首先关注的是把辩证法看作运动。在评论爱利亚学派时，列宁写道：

辩证法一般地就是“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不带唯心主义的神秘意味来说就是：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

辩证法特别是研究自在（Ansich）之物、本质、基质、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相互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99]

简而言之，列宁提供了一种明显是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见解。从根本上说，在列宁看来，辩证法意味着运动。当然，列宁的辩证法定义还有另外的方面。但是，预示对列宁来说就是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继续了恩格斯的传统。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公式中，变化不是最初的东西。《逻辑学》中辩证法的根据，是特殊出自普遍和在个别之中这种对立的解决。黑格尔的《逻辑学》建构在一系列三段式上，推理是它的核心。有趣的是，列宁的《摘要》中，涉及推理的章节的地方不

多。对判断一章极少评注，虽然黑格尔正是在这一章里把判断看作分化、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差别。列宁几乎没有评注有关机械性、化学性、目的性的几章。这种对机械性、化学性的实际排除，是极为重要的。这表明列宁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规律在机械的（物理的）或化学的（无机的）领域内不起作用。黑格尔的辩证法隐含在形式的结构中，普遍与特殊是给定的范畴，它们组成存在的逻辑结构。出于解决矛盾、中介这种对立的需要，一种向个别性的发展就产生了。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过程是一种推理，它在两个形而上学范畴（普遍与特殊）的最初对立之后发生。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称赞赫拉克利特，不是因为这个希腊人发现了变化，而是因为这个希腊人发现了不变。

黑格尔的《逻辑学》讲述概念的进化史。《逻辑学》从一种客观逻辑开始，它描述实在必须与之适合的逻辑形式，又以主观逻辑结束，它描述隐含在认识之下的逻辑形式。黑格尔再次以推理为先决条件，说明从本体论的逻辑到主观的逻辑的发展，而从普遍到特殊所经历的运动是实体的运动。本质，或者说它的自在是实体，因而认识必定有它自己内在的、客观的逻辑结构。于是，在《逻辑学》中，当黑格尔达到认识即概念进化的“最后”阶段之一时，他首先必须描述认识的逻辑前提。又一次循着推理的模式，黑格尔感到认识的逻辑前提是普遍，如果意义要成为认识的一个特征，概念就是必然的先行者。列宁没有抓住《逻辑学》的泛逻辑基础，因而也就没有抓住它的目的论预想。按黑格尔的观点，《逻辑学》中进化运动的发生，是因为精神必须完成它的目的；精神对它的自在或本质必定是真实的，精神必定进化到认识，因为它为了认识自己而观察它自己。《逻辑学》是精神自我认识的一种漫长的历程，为了反思到它的历史，认识它自身的力量和世界，它必须达到认识的水平。列宁回避了《逻辑学》

的这些三合一的和结构上的特征，而继续把这部著作当作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扩充了的补论来阅读。

（二）关于列宁对黑格尔正确理解的讨论

列宁认识到，要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必须把关于精神的所有概念，即绝对或纯观念弃之一旁。^[100]讲到黑格尔时，他写道：

这只是黑格尔这类话的千分之一。这样的话激怒了《科学入门》的作者毕尔生（Pearson）之类的天真的哲学家。毕尔生曾引用过类似的一段话，并且怒气冲冲地说：在我们学校里竟然教这些毫无意思的东西！！从一定的、局部的意义上说，他还是对的。教这些东西是荒谬的。首先必须从中剥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因为这些东西中十之八九都是些外壳、皮屑。^[101]

然而，尽管它的“十之八九”是“外壳、皮屑”，显然在1914年的9月和12月之间，黑格尔的《逻辑学》对列宁的影响一直在不断增加。列宁越是深入地阅读《逻辑学》，就越受到其影响。《逻辑学》的第一篇“存在论”，除了关于质的那一部分再次肯定了列宁原先对真理“摹本论”的反思以外，对列宁的思想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迹。列宁向黑格尔学习的过程开始于“本质论”一篇。在本质论的“现象”部分，列宁得出了“本质”与“规律”之间的联系，在论“现实”的一章中，列宁论及相互关系的概念。列宁放弃了简单同一性的概念，而开始关注相互联系的思想。“概念论”一篇对列宁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恰恰是在评论和旁批中列宁讨论了他的认识论。在“观念”部分，列宁提到黑格尔的整体性命题。这样，列宁从阅读黑格尔获得的见识，与

《逻辑学》本身的实际流动和结构是一致的。

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列宁在他的认识论—逻辑的理论中作出的最重要的突破，就是认识到，概念是组织感性材料所必不可少的。列宁放弃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真理“摹本论”，但他仍然坚持一种感觉主义的观念论。换句话说，列宁已经了解到，头脑并不接受外部实在的精确的“图像（images）”，然而他却仍然相信观念是由感性材料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哲学笔记》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相区别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列宁的真理的感觉主义理论的根本改变。在与黑格尔接触的过程中，列宁了解到概念是组织原则所必需的，从特殊抽象普遍的过程是一切认识的一个先行步骤。感性材料虽不为自己说话，但必须由精神的触动性通过概念的运用组织起来。列宁认识到感性材料对思想的刺激作用，但他也意识到只有当概念构造感性材料时，认识才能够进行。《哲学笔记》表明列宁变得确信精神的更为能动和构造的性质。当列宁充分把握了这种见识，他就不再首先是一个哲学唯物主义者了，他作为一个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捍卫者的作用消失了。这就使得列宁能够向辩证法转变。《哲学笔记》是他向辩证法的初次远足。

1914年9月至12月，列宁再次断定，那种认为物质把“自在之物”的“图像”印记在我们脑中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再一次提到自在之物=抽象、抽象思维的产物。”^[102]而列宁已经了解到，单是感觉不能创立“图像”，要形成一个客体的正确概念，需要理性的抽象过程。对列宁来说，头脑已经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一张照相底片变成一个感性材料的积极解释者。为了证明这一点，可以作一个长的引证：

自在之物是“非常简单的抽象”。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自在之物。——这句话似乎是明智的。自在之物是摆

脱了一切规定〔为他的存在〕的抽象，是〔摆脱了一切对于他物的关系的抽象〕，即无。因此，自在之物“无非是不真实的、空洞的抽象。”

这是非常深刻的：自在之物及其转化成为他之物（参看恩格斯）。自在之物一般地是空洞的，无生命的抽象。在生活中，在运动中，一切的一切总是“自在”，又在对他物的关系上“为他”，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103〕}

列宁开始思考相互联系和整体。一个客体的意义不在于单独接受那个客体（如果可能的话），而在于了解它与周围必然围绕它的别的客体的关系，看到关系之网。但是这种相互联系的意识并不来自外界，而是理性抽象的一种产物；取消简单同一的观念，代之以对立和矛盾的观念。^{〔104〕}

列宁的反映论经历了革命。再作一段长的引证，会有助于证明这个结论：

“自然这个直接的整体，扩展为逻辑观念和精神。”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在这里的确客观上是三项：（1）自然界；（2）人的认识=人脑（就是那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人不能完全把握=反映=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

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105]

列宁的修正了的反映论，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强调了人类思想的能动性。第一个层次可以叫做抽象的能动性，列宁在上面的段落中作了描述。列宁仍然肯定自然的首要地位，他仍然相信思想是由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感性材料而开始的。然而，这种感性材料还不是一种“图像”，而是初步的印象。抽象的能动性，“一系列抽象过程”把这些初步的印象组成概念。列宁的修正了的反映论反对认为外部世界是以“直接的整体”出现在头脑里的观点。相反地，列宁现在断定，对感性材料的一种理性的抽象过程，把这些材料能动地组织到概念中。

如果说列宁的反映论的第一个层次强调在概念形成中的抽象的能动性，那么第二个层次则是强调在改变世界中概念的能动性。第一个层次涉及概念的形成，第二个层次涉及概念形成后的能动性。这里需要再作一段较长的引证：

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思想（=人）不应当认为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象精灵、数目或抽象的思想那样没有趋向的、没有运动的、惨淡的（灰暗的）简单的图画（形象）。观念也包含着极强烈的矛盾，静止（对于人的思维来说）就在于坚定性和自信心，由于它们，人永远产生（思想和客体的这个矛盾）和永远克服这个矛盾。^[106]

在这一段里，列宁没有谈到抽象的能动性，而是涉及概念的能动性。概念由外部世界引起，一旦形成，就自身具有塑造和改变的力量。“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

界。”^[107]换言之，概念通过提出对原先没有被预见到的外部世界的说明方式，自身就能具有一种创造的功能。概念能够打开说明和探究的新道路。

至此，被 1914 ~ 1924 年间的列宁所探究的能动性的概念，已经涉及到精神的能动性，因而它们是抽象的和概念的能动性。迄今还丝毫没有说到主观能动性。但是，将在后面部分讨论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结果，在列宁的成熟的、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中，有着关于能动性的三个层次：抽象和概念的层次；概念自身的改变力量；主观自我的能动性。所有这些活动的领域都证明黑格尔的能动性意识的哲学对列宁的影响。对黑格尔来说，精神是具有活力的，列宁被这种普罗米修斯的想象说服了。

由于与黑格尔接触，列宁把握了存在—思想（Being—Thought）和概念—实存（Concept—Existence）之间的差别。总之，在这些方面列宁采取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立场。有关存在—思想的问题，像马克思那样，列宁认识到，观念从感性材料的基础上产生；存在为感性印象所接受和社会在先，是观念出现的前提。但是，像马克思那样，列宁也认识到，观念一旦形成，它们就变成干预社会和物理世界的概念。有关概念—实存的问题，像马克思那样，列宁看到概念能够改变实存；列宁了解到概念指导人对外部世界的探讨，并且通过这种指导，实现外部世界的改变。列宁已经变得相信概念的转化性质。他始终意识到政治能动性的转化性质，政治行动改变社会环境的能力。在他与黑格尔的对话中，列宁已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概念自身是转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对周围非转化的东西有一种构造的效果。

关于因果性和必然性，列宁也离开了一种纯粹的实证的解释。在他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的《摘要》的那些部分中，列宁是按实证主义的范式了解黑格尔的因果性、必然性概念的。列宁认为黑格尔的意思是因果性就是一个事件 B 总是跟随着一个事

件A。对列宁来说，一个A型事件总是被一个B型事件跟随的事实，就是科学规律的定义。黑格尔并没有按这种实证主义的范式来定义因果性或必然性。列宁完全忽视了亚里士多德在黑格尔身上的出现。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把原因定义为一个客体内部存在方面的能动性。对黑格尔来说，原因是一个完整的自我一存在；一个客体的内部存在以自我运动的形式作用于那个客体的外部性质。^[108]亚里士多德的目性概念影响了黑格尔，但列宁却仍然未被目性概念说服。

然而，在《逻辑学》的影响下，列宁的因果概念改变了，扩大了。必然性和因果性的命题不断扩展为相互联系的意思。列宁越来越离开了那种认为一个单独的A型事件必定带来一个单独的B型事件观念。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只是作为一个相互联系之网的部分而存在。列宁开始就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思考。每一事件的发生是一个较大统一体的部分，并且从整体性引申出它的意义。^[109]列宁在读《逻辑学》论“现实”的一章里，形成了许多关于相互依赖命题的见解。

（三）关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之间的连续性的讨论

列宁仍然坚持他的哲学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虽然他已经放弃了他原先的感觉主义认识论的素朴性，但仍继续强调客观实在性独立于人的精神而存在。因此，列宁仍然坚持精神与客观实在性的分离。必须以某种方式架起一道桥梁跨越鸿沟。对列宁来说，物质仍然是第一性的，感性知觉是思想的开端。外部刺激，无论是来自自然方面，还是来自社会方面的，都是形成思想过程的来源。^[110]

而且，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的：它们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按照他的反映论，列宁主张思想只是反映这些客观的辩证法规

律。这样，自然是辩证地起作用的，同样社会也是辩证地起作用的。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这一点说，他要使恩格斯的综合永久化。然而，列宁运用于社会和自然的辩证法，是因他遇到黑格尔而修正了的辩证法。

列宁也继续把哲学和文化的历史划分为唯物主义阵营和唯心主义阵营。正如列宁对阶级斗争持有 一种两极性观点一样，他也热衷于思想信念的两极性。列宁的这个方面，他的文化的党性观念，终生保持，成为布尔什维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武器。

列宁从未放弃哲学实证主义的本质。他总是断言物质的第一性，断言存在先于思维。这是列宁对唯物主义所持的不容妥协的标准。其次，列宁总感到客观实在性是可以认识的，唯物主义也包含着人足以认识客体的可能性的思想。列宁的唯物主义以这样的科学理想为基础，即所谓认识世界，意味着人们能够最充分地认识这个世界。

（四）关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之间新的分离的讨论

读《逻辑学》的过程中，列宁对思想能动性的认识提高了。在精神领域，这种新意义的力量被表述为抽象的能动性和概念的能动性。列宁在他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讨论主观动力、讨论人时，一种新意义的能动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理性的、主观的能动性命题，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是完全看不到的。为了说明这种新的背离，有必要作详细的引证：

作为主观东西的概念（=人）又以自在的异在（=不以人为转移的自然界）为前提。这个概念（=人）是想实现自己的趋向，是想在客观世界中通过自己给自己

提供客观性和实现（完成）自己的趋向。

在理论的概念中（在理论的领域中），主观的概念（认识？）是作为普遍的和自身没有规定的东西来和客观世界相对立的，它从客观世界中汲取一定的内容并得到充实。在实践的观念中（在实践的领域中），这个概念是作为现实的东西（作用着的东西？）来和现实的东西相对立的。

主体〔在这里突然代替“概念”〕在其自在和自为的存在，即作为规定的主体的存在中所具有的对自己的确信，就是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

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11]

这段话是对人类干预性的一种极好的论述。两种力量相互对立：客观实在和人。主观的力量，人，具有一种思想。他与客观实在相对立并通过他的思想改变客观实在。列宁在这里所描述的这类主观能动性，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实用主义不大相同。实用主义是检验与客观实在相对立的假设，而主观的干预则意味着改变人周围的客观条件。

主观能动性的命题，列宁自进入政治生活以来是熟悉的。但是，直到1914年，即列宁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以前，主观能动性的概念还限于政治领域。在1914年，由于黑格尔的影响，列宁把主观能动性的概念扩展到概念的或意识的领域。在1914年，精神独立领域中的干预不仅由政治活动引起，而且通过概念的活动引起。

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

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现实。^[112]

列宁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一条扩展到意识的水平。这样一种评注，在《哲学笔记》之前，列宁的任何著作中都未曾出现过。从黑格尔那里，列宁看到了理论观念的统一。对于理论观念，列宁指的是抽象与概念的能动性。对于实践观念，列宁指的是主观动因的干预。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认为理论观念必须通过实践观念实现它自身。“对于实践观念来说，却恰恰相反，这个作为不可克服的限制与它对立着的现实，同时又作为自在自为的虚无的东西，这个虚无的东西要通过善的目的才取得它自己真的规定和唯一的价值”。^[113]当列宁把抽象或概念的能动性与主体的能动性统一起来，他也就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十一条统一起来，就以一个充分的理论与实践的鼓吹者出现。

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另一个分离，是列宁的辩证法概念的深化和丰富。列宁经常有一种赫拉克利特式的辩证法观点，并把它看作与变化同义。但他与黑格尔的接触向他展示了通向辩证法的又一个尺度，即对立和矛盾的尺度。事实上，在1915年，列宁批评了斐·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赫拉克利特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eraclitus*）一书，因为拉萨尔过分强调运动和变化的观念，从而“破坏赫拉克利特的生动性、新颖性、素朴性”。^[114]另一方面，在他的也是于1915年写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Conspectus of Aristotle's Metaphysics*）中，称赞了亚里士多德，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毫不怀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也没有刻板地在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上陷于混乱。^[115]

列宁在这个阶段辩证法的理解中所强调的因素是对立的思想。如果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范式，压倒一切地把焦点集中于运动上，就留下了没有得到回答的运动的根源问题。运动源出于对立，作为绝对运动的过程是从矛盾导出的。^[116]列宁回到了在他早期以不同形式出现的矛盾的命题。从1894~1904年，列宁应用了自然历史结构内部的矛盾，新近出现的生产力与经济形式之间的矛盾。在列宁的第二个时期，1905~1914年，在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下，矛盾的概念从他的著作中失落了。追随恩格斯的普列汉诺夫基本上是一个哲学唯物主义者，他所关注的是自然规律的发现；列宁在这些年里追随普列汉诺夫。在列宁活动的第三个时期，矛盾的概念又回复了。但这时是以黑格尔的形式回复的。列宁兴趣的中心是概念和概念之外的世界之间的矛盾。此外，列宁改变了并非有意识地由恩格斯阐述的辩证法规律的先后顺序。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量向质转变的规律看作第一个辩证法规律。在《哲学笔记》中，特别是在写于1915年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把对立规律置于首位，就表明他已离开物理学，而代之以相互依赖的哲学概念。

1915年列宁的哲学变成了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中的以下一段话证明了这一点：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象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

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117]

这段引文不仅证明列宁把对立规律置于首位，而且证明列宁意识到黑格尔出现在马克思的认识论内部。1914年以前，列宁坚持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破裂。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列宁则主张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连续。事实上，列宁超出连续性的主张，进而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论的确源于（如果唯物主义地去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这就是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列宁批评了看不到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直到1914年以前，普列汉诺夫一直是列宁哲学上的良师益友。到1915年，列宁才与自己过去的这一方面进行决裂。他批评了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相似处。

正是得力于黑格尔的帮助，列宁达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我们已经看到，列宁最感兴趣的是认识论。当列宁突破认识论上的“摹本论”，并在阅读《逻辑学》之后，他就试图把黑格尔的逻辑形式结合进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他把一种逻辑变为一种认识论的努力中，他把逻辑范畴历史化了。黑格尔把他的逻辑看作形而上学方面是客观的，列宁则把范畴看作历史地产生的。

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118]

对列宁来说，范畴包括既定时间内我们对世界的科学认识。这样，我们感知世界、我们探讨客观实在所通过的形式，是以围绕我们的科学世界观为条件的。列宁肯定知觉范畴的社会发生的基础。观察世界的方式，认识世界的概念，是以当时的整个认识为条件的。这“整个认识”，在既定时间内的社会“认识”，是列宁的一种概念。黑格尔的范畴，按列宁的修正，是社会地产生出来的。

然而，列宁的范畴的历史性质，并不意味着他屈服于相对主义。“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119]尽管我们经常通过我们时代的条件来观察客观实在，我们的意图、目的也总是向着客观实在靠近的。列宁的认识论直接地类似于黑格尔把认识了解为一个连续的螺旋。用列宁的话来说，“科学是圆圈的圆圈”。^[120]虽然目的是要完全把握客观实在，但这却是一个不能达到的目的。尽管如此，某种客观标准存在的事实，我们能够对照着某种外在的标准衡量我们的前进的事实，防止了我们重新陷入相对主义。接近于这种完全把握的运动，是一个圆圈。列宁的认识论设想了一种向着客体的连续前进，但在这一前进中各种科学认识的范畴，始而被实现继而又被丢弃了。因而列宁的认识论假定概念、科学的世界观，会连续地被利用，各自提供它的最大成果和收获，然后被一个更为先进而丰富的认识范畴所代替。列宁的认识论是与认识体系的社会起源密切联系的。于是，对列宁来说，逻辑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理的科学征服。

列宁的认识论在两个层次上是一种辩证的认识论。第一，它建立在对立而斗争的原则上。同时，也正是对立的观念，把列宁引向整体、全体与部分的相互依赖的命题。第二，列宁的认识论认识到客观实在与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客观的东西与认识动因之间的对立中，是认识的动因依赖于外部的东西，并在认识的指导下寻求对外部的东西进行归类，从而超越它。概念自身就是

生产性的动因。

(五) 关于黑格尔对列宁思想影响的概括和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主要原则的陈述

黑格尔的启示是，意识和政治能动性是转化的力量。列宁经常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的《怎么办？》是一篇政治能动主义的声明。从党的策略出发，列宁始终相信理论的重要性。在1914~1915年写的《哲学笔记》中，列宁固有的理论——政治的能动主义融化、溢进了黑格尔的概念的能动主义。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成为一种综合，把列宁长期形成的政治能动主义的意义与黑格尔的概念实践的启示综合起来。

创立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不是卢卡奇，而是列宁。列宁的成就是巨大的。列宁离开了恩格斯把辩证法与自然规律结合起来的传统，而着力将辩证法与认识论统一起来。因此列宁有助于形成一种辩证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已经成为卢卡奇和列斐伏尔的工作基础，并可避免斯大林的机械唯物主义的陈词滥调。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从1914~1933年尚不大为人所知，乃是一份被丢弃了近30年的遗产。它代表一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传统。

列宁在将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时，在他探寻逻辑的社会发生形式时，放弃了关于因果性和必然性的实证主义解释。事件不是孤立的插曲，而是复杂的相互联系结构的组成部分。要说明事件，就是要看到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因为恩格斯运用辩证法于物理学，他以写作《自然辩证法》为结束。因为列宁运用辩证法于认识论，所以他是认识《资本论》的黑格尔基础的第一人。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

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121]

当列宁按照格尔方式思考部分反映整体、部分从整体上获得意义，放弃因果性的决定论概念时，他所持的立场，就是看到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使黑格尔的逻辑具体化了。列宁重新沿着马克思的步伐前进。当初，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整体性、相互依赖的概念，运用这些范畴作为《资本论》的逻辑基础。而列宁只是在他自己被黑格尔的这些范畴说服之后，才意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较早应用。列宁正确地觉察到《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资本论》是马克思把辩证的认识论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以合理的形式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122]列宁最终认识到辩证法是一种历史的认识论，他最终看到辩证法是一种社会分析的方法。列宁指出，黑格尔的整体性概念，以及在列宁看来是辩证法首要原则的对立统一思想，能够形成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至少，《资本论》必须按照这些辩证法的原则来解释。

写《哲学笔记》时的列宁没有与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遗产完全决裂。或者，确切地说，不是决裂，而是强调方面的转移。写《哲学笔记》的列宁了解辩证法在认识论中的恰当位置；后期的列宁把辩证法的首要地位从辩证唯物主义转移到认识的辩证法。尽管如此，列宁一生中承认辩证法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它也在社会领域起作用。人类头脑不妨碍辩证法，相反地，用《哲学笔记》中所理解的话来说，头脑“反映”外部的、客观的辩证法。列宁仍然是一个哲学唯物主义者，像恩格斯那样，他承认存

在先于思维。但恩格斯与后期列宁在界说存在时有不同的强调方面。对恩格斯来说，存在就是自然界在先，后期列宁虽也承认自然界在先，但着重把存在看作社会的。对于成熟时期的列宁，辩证法更多地趋向于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因为他更为关注人的社会学的存在在人的思想上打下的印记。列宁的后期哲学避免简单化的唯物主义，而把社会存在置于首位。

像马克思那样，《哲学笔记》中的列宁避免纠缠于一种自然哲学。像马克思那样，后期的列宁关注于一种科学的哲学。列宁的科学哲学是他的更为广义的认识论的一部分，二者都认识到社会在先的前提性。因为人类存在本来是社会的存在，我们对自然界的知觉，是通过社会造成的概念结构而过滤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哲学是一种社会范畴。因为我们对自然的认识是依赖于社会在先的，科学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在先的表述。科学的目的是要达到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思想与外部世界自身最大可能的一致。但是归根结底，由于科学的范例是全社会中的从属范畴，科学认识本身是现行的社会需要和社会重点的一种反映。后期的列宁的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概念的实践而出现。科学的历史就是将社会从属概念连续运用于外界的历史。科学史就是社会实践史，因为最终是社会产生知性的社会范畴。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包含一个对列宁的黑格尔化认识论的极好的概括。尽管这又是一个长的引证，最好仍然是让列宁自己来说话：

1. 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2. 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
3. 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

它自身的生命。

4. 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

5. 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6. 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7.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8. 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9.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

10. 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11.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12. 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

13. 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14. 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

15. 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16. 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15和16是9的实例）。〔12〕

仔细阅读上述引文，可以看到列宁认识论的四个层次。第1—6条表明辩证法的客观性。辩证法首先出现于自然和社

会内部，出现于客体自身。自然和社会中的客体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尽管客体相互依赖，它们也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矛盾与斗争是首要的。运动与发展就是从这种对立中发生的。这就使列宁设想对立面的统一是首要的辩证法规律。这是列宁对于他一九一四年的唯物主义的陈述。

第二，6—9条表明列宁的认识论。思想是精神固有的能力，但观念在感性材料中发现它们自己的内容。概念是组织这种感性材料所需要的，而自然和社会反映在这些概念中，它们为感性材料提供了概念的内涵。自然和社会的辩证法反映在人的精神中，人类精神必须采取与辩证法的客观性相一致的思想形式和说明方法。为了接近客观实在，人类精神在它说明客观实在时必须应用辩证法的思想形式。从认识论上说，人类精神必须通过运用诸如相互依赖、对立、整体和关系等概念来分析独立的外部的东西。这些概念是抽象的，它们是精神能动性在概念的形成中的产物。运用这些概念去分析客观实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因为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应用，对外部实在的描述必须是辩证的，描述必须接近于客观的现实的辩证法。

第三，10—12条表明列宁对认识的辩证性质的理解。认识是一种缓慢的积累，对客观实在的缓慢的接近。认识不是相对的，如果它接近于客观，它就是真实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借用了黑格尔的真理如螺旋的思想。我们的认识运动是一种日益逼近于客观的前进。

第四，13—16条提出列宁的科学范例的主张。围绕着客观的每道螺旋，每个圆圈，都表现出一种科学的范例。科学的世界观是积累的产物，是认识进化的产物。有时老的范例必须打破，即“内容与形式的斗争”，新的范例出现，即“从量到质的转化”，认识的范例因而有一种社会发生的起源。这些认识的范例是统觉的范畴，它们是认识的螺旋的逻辑。但即使这些科学的世

界观也必须以认识的辩证法为基础。认识结构必须以辩证的认识论为基础，以互相依赖、对立、整体和关系等概念为基础。

列宁的认识论，在它的较高层次上，没有成为一种认识的社会学。在描述思想的阶级基础时，列宁的观点包含着一种认识的社会学。资产阶级是唯心主义者，无产阶级是唯物主义者，阶级决定理论世界观。但在描述真理的螺旋时，列宁又避免社会的相对主义。每个圆圈内有一个绝对。对一种科学范例的真理性的衡量，不在于它对阶级的依赖性，而在于它接近客观实在的密切性。从政治上说，列宁承认了一种认识的社会学，它有助于说明阶级的态度。从哲学上说，列宁相信整个人类探索认识的历史证明了一种朝着外部世界的不断前进和对于外部世界的不断控制。

显然列宁强调的是有关认识系统的历史性。他是一个二元论者，因为他承认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分离。他的唯物主义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假设外部世界是离开精神而独立的。出现在《哲学笔记》中的列宁，更加关注历史唯物主义，他的兴趣中心是认识体系的逻辑。然而，在这些认识体系下面，是经济形态。列宁的主体是实际社会和社会的进化。作为这种社会估价的组成部分，认识体系也开始存在。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于与经济形态相一致的
科学范例（一种社会内部的理论体系）的完整图像。

很清楚，在《哲学笔记》中没有讨论哲学人类学。凡是提到费尔巴哈的地方，都把他描述为一个经验主义者，或者是宗教与唯心主义的对手。在《哲学笔记》中，列宁所描述的人是一个实践的存在。人是作为一种经济、政治和概念的实践而出现的。但这里却根本没有提到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类的存在、对象化、私有社会的出现。在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颇为盛行的诸成分，都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有关，但在列宁的思想中却永远也找不到。列宁熟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因为他在1895年所写的《〈神圣家族〉摘要》中评论过这部著作。但是，关于《现象学》，列宁只有否定的东西可说，因而黑格尔的人本主义、关于异化、对象化、占用等这类概念，都与列宁的思想毫不相干。有趣的是，当马克思接触黑格尔，读完他的《精神现象学》时，他已经熟悉了有关对象化和异化的概念。^[124]同样，卢卡奇在读《精神现象学》后，黑格尔的异化、对象化思想在他后来的著作，特别是在他的《青年黑格尔》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列宁对《精神现象学》中的人本主义命题始终是不敏感的，因而从不思索哲学人类学的问题。结果，列宁能够把《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典范来阅读，同时却不能捕捉马克思的伟大著作中的异化命题。不过，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详尽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认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的详尽阐述需要靠其他著作来完成。

对于成熟时期的列宁，哲学摆脱了科学的实证主义模式。列宁放弃了所有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科学必定发现宇宙的最终规律从而使一切思辨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显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列宁继续相信，所有思想的目的是达到对客观世界的恰当认识，达到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了解。不过，在《哲学笔记》中，列宁进而了解到，哲学的作用是对我们用以解释世界的那些概念的考察，通过这些概念我们解释世界。抽象的过程、概念形成和概念考察的过程表明意识处于能动主义的姿态，而在这方面，列宁给予哲学一种自身独立的领域。当然，黑格尔想一般地授予逻辑和哲学自身的一种方法，区别和独立于各门科学。列宁不想走得那么远。但他考虑到抽象、概念形成和概念分析的自主和自含的能动性，把握了哲学努力的构造性质。在《哲学笔记》中，列宁进而把哲学自身理解为实践，哲学成为使概念受到批判和重新形成的努力。哲学是思辨的实践，这种实践参与创造我们

用以解释外部世界的那些概念，所以哲学是一种生产性的训练。作为一种有助于形成改变外部世界的概念的转化力量，哲学是人们的主观性能够借以对不转化的东西产生影响的又一种工具。

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不以列宁在瑞士流亡的结束而结束。它是一种持久的转变。1922年，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列宁写道：

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个集体应该是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125]

列宁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哲学遗产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哲学意愿和遗言。

注 释

[1]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对卢卡奇的影响，可参看我的评论卢卡奇的两篇文章：‘Lukacs on Lenin’，*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Spring, 1978)，PP. 17—31；‘Completion, Death, Heritage’，*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Winter, 1979)，PP. 20—35。

[2][3]关于这一点，可参看 Margarite Manale 的文章，‘La constitution du “Marxisme”’，*Cahiers de LSEA* (April—May 1976)，Vols. 4—5，PP. 813—39。她在 PP. 814—15 上的脚注描述了这一系列事件。

[4][5][6][7]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卷,第 143、133、133、143 页。

[8]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91 页。

[9]《哲学笔记》一词,指的是列宁所有现存的哲学方面的笔记。所有这些笔记收集在一起,形成他的全集,第 38 卷(指《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译者)。按年代顺序,最早的笔记写于 1895 年,最后的笔记写于 1916 年。从结构形式上看,这些笔记,包括从简单地记下读过的一本书的书名,到少量的一般评注,到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所作长达 200 页的评注和摘要。一般地说,《哲学笔记》一词指 1914~1916 年列宁记载他的黑格尔研究方面的笔记。但是,要注意笔记的多样性,就应当记住,列宁的《哲学笔记》还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eraclitus the Obscure of Ephesus)等书的摘要。

[10]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7 页。

[11][12][13]《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卷,第 135、111、111 页。

[14][15][16]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 卷,第 49、499、499—500 页。

[17]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 卷,第 179 页。

[18]首先给我引介青年列宁的概念的,是 Richard Pipes 的文章,“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the intellectual evolution of young Lenin”,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ed, Richard Pipe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 pp. 33—66。但是, Pipes 的文章论述列宁的政治思想的发展,而我对青年列宁的描述,则涉及他的社会思想。就我所知,这是说明列宁早期和成熟时期之间历史思想的变化最初尝试。而且这个重要时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9]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 卷,第 185 页。

[20][21][22][23][24][25][26]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7、20、26—27、27—28、27、30、30

页。

[27]Samuel H. Baron, Plekhanov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Still the standard work on Plekhanov.

[28]Baron, Plekhanov, P.220.

[29]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 卷,第 1—183 页。

[30]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列宁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但他在使用时完全没有涉及自然的辩证法。换言之,在这个早期,当列宁使用“辩证唯物主义”术语时,他是用来指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指社会运动,而没有与宇宙的物理规律及其牛顿式的应用相联系。他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同义词使用,因此,这里的用法对正文中所涉及的方面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参看《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卷,第 151 页。

[31]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卷,第 129 页。

[32]青年列宁的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值得重视的研究。然而,近来有几本著作对这个过程的研究迈出了最初的几步。这方面可参看 Roger Garaudy, Len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伽罗蒂遵循了这篇文章中对列宁生活所作的分期。他也把列宁的生活划分为三个时期,1894~1905 年,1905~1914 年和 1914 年至他去世;或者,就是分为早期、成熟期、晚期列宁的一种范例。一种更广泛的研究,并将获得更大影响的著作是,Marcel Liebman's Le Leninisme sous Lenine (Paris: Editions Seuil, 1973) 2 Vols. 利布曼只在此书的最后一章涉及列宁的哲学思想,他基本上是把列宁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研究,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卷本的大部分内容,都始终是致力于研究列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著作。Neil Harding 的一本新著,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77), 指望在列宁的政治思想方面开辟新天地,这是两卷本的第一部,与利布曼的著作一起,指望在解释列宁方面,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33]列宁生活的这个时期广泛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为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塑造为一种政治工具的时期,并且直接指向 1917 年的革命。权威性的美国解释,是把这个时期的列宁看作一心想着颠覆,只是怀着一个目的:革

命。把列宁看作个性不屈不挠和铁面无情的人。这些描述中的最拙劣者,可在 Adam Ulam 的著作中找到,特别是他的 *The Bolsheviks* (New York: Macmillan, 1965)。一本较早的著作,可以看作美国解释列宁方面的开创历史的工作,是 Alfred C. Meyer 的 *Leninism* (New York: Praeger, 1956)。尽管对列宁本身没有什么专门的研究,但 Robert C. Tucker 的著作,在美国有关列宁的研究史上,却代表了对俄国革命领袖的最为公允的解释。特别是在 Rucker 的 *A Lenin Anthology* (New York: Norton, 1972), 以及他的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New York: Norton, 1969) 中,可以看到关于列宁的长篇介绍。某些关于列宁的非美国的解释,试图考察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如 Irving Fetscher, *Karl Marx und der Marxismos* (München: Piper, 1967), 和 George Lichtheim 的 *Marxism: An Historical und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Praeger, 1962)。但是,关于列宁的一种大量的再解释的过程也已经开始了,而这大都是在一些欧洲的学者中进行的。利布曼和伽罗蒂的著作,是这个过程的一些环节。不过,关于列宁的广泛的再评价,仍然处于起始阶段。另一本英国人所写的著作,代表了本质上是欧洲人的努力,这就是 Tony Cliff, *Lenin* (London, Pluto, 1975)。在这一点上值得提及的另一本书,是美国学者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它是关于列宁的修正主义解释的一部分,但它所贡献的再解释,不是对青年列宁,而是对老年列宁的再解释。本章,与修正主义的学派相一致,对作为哲学家的列宁提供了一种再评价。

[34]辩证唯物主义的演变,曾经是人们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在那场讨论中,《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自然起着重要作用。在 Gustav wetter 的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Praeger, 1958) 中,将找到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早期概括。威特尔的著作是综合性的,但由于试图覆盖各个方面,而忽视了读者对深入探讨的要求,这本书是有关主题的一篇好的引论,但未用作深入分析。J. M. Bochenski 的著作 *Soviet Russia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Dordrecht: Reidel, 1959), 表述得更为详细,但基本上是为有训练的哲学家们写的。在这个主题上最好的著作是 Z. A. Jordan's *The Evolu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7)。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有许多闪光的见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领域里,是使任何人都感到兴趣的,至今仍然是中肯的、有启发的。在这方面还不应忽视 Oskar Negt 的著作,可看他

的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9)。Negt 为这本著作所写的长篇序言作了高度的评价,这部选集中所选的部分,叙述了从列宁到德波林、布哈林、卢卡奇和葛兰西的历史。

[35]列宁:《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25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卷,第178页。

[36]L. 托洛夫斯基叙述他与列宁的第一次会见,记载于他的自传 My Life (New York: Pathfinder, 1970), pp. 142—5。托洛夫斯基记下列宁赞同波格丹诺夫思想的那段话是第144页的上端,那段话的全文如下:“在哲学方面,波格丹诺夫的把马克思主义与由马赫、阿芬那留斯推向前进的认识论结合起来的著作,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那时,列宁也认为,波格丹诺夫的理论是正确的。他细声谨慎地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普列汉诺夫把波格丹诺夫的哲学作为唯心主义的伪装形式来谴责。’几年以后,列宁奉献了一本巨著,讨论马赫与阿芬那留斯,他对他们的理论的批评,与普列汉诺夫所表达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37][38][39][40]列宁:《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25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卷,第178、181、182、184页。

[41]列宁:《〈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卷,第405页。

[42]列宁:《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3月24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卷,第192—194页。

[43]波格丹诺夫成为重新引起兴趣的对象。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波格丹诺夫代表了反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波格丹诺夫今天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他是被斯大林主义摧毁的一代创造性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成员。他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非斯大林主义形式的代言人而被研究。Dietrich Grille 对波格丹诺夫作了详尽的研究,著有 Lenin's Rivale (Kö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66)。对波格丹诺夫哲学的另一个有见识的研究,可从 Dominique Lecourt 的 A. Bogdanov (Paris: Francois Maspero, 1977) 中找到。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斯大林死后法国共产党哲学的进展。作为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他提供了对波格丹诺夫的一种令人惊奇的敏锐而公开的解释。

[44] Lecourt, Bogdanov, P. 32.

[45]海法(Haifa)的大学的 Avram Yassour, 出版了几部研究波格丹诺夫的优秀著作。事实上, Yassour 是当今世界从学术研究上重新提出波格丹诺夫问题的第一位学者。Grille, Lecourt 和 Cham Parnaud 的著作都出现在 Yassour 的开拓性工作之后。作者受惠于 Yassour 教授, 因而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史上的这个重要人物。关于波格丹诺夫哲学的卓越见识, 还可见于 Yassour 的文章, 'Un Texte de A. Bogdanov; La Voie de L'Empirie - Monisme', Cahiers de L'ISEA (Aout, 1966)。

[46] Grille, Lenin's Rivale, P. 27.

[47] G. Plekhanov,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1). Vol. 3, PP. 188—283.

[48][49]列宁:《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7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卷,第171页。

[50]列宁:《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3月24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卷,第192页。

[51]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的笔记,有4页。这些笔记包含在现在一般称为《哲学笔记》的书中。上而提到,《哲学笔记》的中心,是列宁对黑格尔的评论,但也包括诸如对普列汉诺夫的批注等许多其他次要的东西。列宁的批注,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7—461页。

[52]列宁对阿伯尔·莱伊的《现代哲学》的批注,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62—536页。

[53]看看列宁读到或涉及的书是有趣的。用这种方式可以很好地了解他的兴趣和思想倾向。列宁所熟悉的索尔邦图书馆(Sorbonne)的一份书目,见《哲学笔记》第45—49页。

[54]关于列宁与“科学危机”,见 Roger Garaudy, Lenine。伽罗蒂感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过时了的。对列宁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一种不同见解,可见于 Dominique Lecourt 的 Une Crise et Son Enjeu (Paris: Francois Maspero, 1974)。Lecourt 而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缺陷,但从基础上以维护此书对科学客观性的捍卫而结束。在最后的分析中表明,列宁的著作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主张,只有相信物质的、客观的外在

性,才能给予经验的探寻以确实性。

[55]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卷,第13—17页。

[56]政治与辩证法的主题,在伽罗蒂那里讨论过,也见于利布曼的 *Le Leninisme Sous Lenine*, Vol. 2, PP. 347—53。

[57][58][59][60][61][62][63][64][65][66][67]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卷,第99—100、130、35、103、49、130、35、130、65、278、274、263—264页。

[68]对列宁的哲学发展的一种很好的分析,是 Henri LeFebvre's *Le Pensee Lenine* (Paris: Bordas, 1957), 勒菲伏尔的努力代表了对列宁哲学进行再评价的一种早期的尝试。勒菲伏尔是最初转而强调列宁的《哲学笔记》包含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思想实质的人物之一。

[69]对列宁关于客观实在首要性的微妙而复杂的维护,可见 Lecourt's *Le Crise et Il Enjeu*, 考察一下 Lecourt 如何回避《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明显的不足,是迷人的。

[70]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卷,经158页。

[71]对马克思的实践(Praxis)的含义、实践与实用主义的差别的有益的讨论,见 Richard Bernstein, *Praxis and Ac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1), 对马克思的实践的另一个有趣的研究,联系实践与辩证法的研究,是 Gottfried Stiehler, *Dialektik und Praxis* (Berlin: Aka Demie - Verlag, 1968)。

[72]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卷,第108页。

[73]伽罗蒂(Garaudy)的列宁哲学发展的转变环节的描述是卓越的,见他的短小而善于表达的著作, *Lenine*。

[74]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卷,第52页。

[75]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2—5页。

[76]见列宁对阿伯尔·莱伊的《现代哲学》的批注,《哲学笔记》人民出版

社 1974 年版,第 462—536 页。

[77]见列宁对阿·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批注,《哲学笔记》第 537—545 页。

[78]见列宁对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的评注,《哲学笔记》第 78 页。

[79]列宁广泛评注并强调了 G. V.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N. G. Chernyshevsky)《哲学笔记》第 565—626 页。

[80]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95 页。

[81]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6 卷,第 55 页。

[82]把列宁与黑格尔联系起来的尝试,是比较近期的事,这是与重新认识《哲学笔记》代表列宁的成熟哲学这一点相联系的。用英文使列宁与黑格尔相联系的早期尝试,出现于 Raya Dunayevskaya's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Dell, 1973),但 Dunayevskayan 走得太远,她把列宁说成一个彻底的黑格尔派,于是作出了一种缺乏事实根据的极端的陈述。从 Jacques d' Hondt 的著作中可以见到更为公允、恰当的判断,这位法国哲学家既认识到列宁与黑格尔之间连续性,也认识到他们之间的非连续性。特别是 d' Hondt 的以下两本书: De Hegel A Marx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La Logique de Marx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4)。在这方面,应当提到路易斯·阿图塞(Louis Althusser)的著作。阿图塞正如他否认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联系那样,否认黑格尔与列宁的联系。阿图塞相信,与黑格尔的任何联系,都将导致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非唯物主义化。我自己的见解与阿图塞相对立。然而,他在许多透辟见识方面,具有第一流的智力。他强调列宁哲学的政治方面,对这种观点的最好的精细分析,见阿图塞的 Lenin and Philosophy,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83]G. W. F.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Trans. A. V. Miller (London: Allen & Unwin, 1969), pp. 48—9.

[84]G. W. F.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trans, J. B. Baili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85]Hegel, Phenomenology of Mind, P. 97.

[86]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05 页。

[87]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600.

[88] G. W. F. Hegel,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trans. William Wall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89] 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759

[90] 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759.

[91] Hegel,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 P. 279.

[92] Hegel,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 P. 163.

[93] 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479.

[94] Hegel,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 P. 188.

[95]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58 页。

[96] Hegel,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 P. 226.

[97]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88 页。

[98] 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rans. E. S. Haldan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3), Vol. I, PP. 212—13.

[99][100][101][102][103]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77—278、104、162、99、110 页。

[104] 关于矛盾代替同一的问题,见 Henri LeFebvre, Logique Formale, Logique Dialectique(Paris: Edition Anthropos, 1969)。

[105][106][107]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94、208、228 页。

[108] 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559.

[109][110][111][112]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71—173、177、228—229、235 页。

[113] 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821.

[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396、418、408、410、89—90、408、251、357、190、238—239 页。

[124]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2 卷,第 156—182 页。

[125]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 卷,第 29—30 页。

第六章

辩证法与延安道路

辩证法的漫长历程现在把我们带到了中国。在许多但不是所有的方面，毛泽东的成功结束了辩证法思想史上一个将近两个世纪的时代。我们已经考察了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的唯心主义形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形式、恩格斯的作为物理学的哲学、以及列宁的重新黑格尔化的形式，现在我们来研究毛泽东的辩证法的中国化。从1789年的法国革命开始，一场革命运动席卷了从巴黎到北京及其以外的世界。不管人们如何描述这两个世纪的剧变，它的全球性以及它所带来的重大结构变化，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实质上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结束了第三世界的革命，或者说结束了世界革命运动的最后阶段，尽管在阿尔及利亚（Algeria）、古巴（Cuba）或越南（Viet Nam）还有某些余震：中国共产党人为这些反帝起义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范例。本书不能忽略毛泽东，事实上，他告诉了人们这场运动的必然结论。^[1]

从巴黎到北京（Peking），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到毛泽东的运动，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两个世纪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辩证法既表现为哲学，又表现为政治—革命战略。作为这个历史时期在东方的终点，毛泽东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对辩证法的政治—革命策略的提炼。当辩证法作为一种起义的方法论出现时，为了理解辩证法，就有必要研究毛泽东。然而，毛泽东没有结束辩证

法自身的演进；他只是结束了辩证法的一个特殊阶段，因为辩证法史的另一个时代开始在西欧展现；虽然毛泽东对这个新的哲学和策略的启程又是有着重要贡献的。

本书在描绘辩证法的旅程的同时，已经探究了三个小题目：（1）试图分离出马克思的主要的方法论；（2）试图概述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区别；（3）说明黑格尔对于试图弄懂辩证法的决定性意义。论述毛泽东的这一章，也与这些题目的某些方面相关，而并不涉及其他方面。

比方说，黑格尔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不起直接作用。毛泽东不读外文资料，他只是通过列宁、恩格斯、斯大林和 M·米丁的某些涉及黑格尔的著作的中译本接触到黑格尔。列宁的《哲学笔记》是毛泽东所涉猎过的唯一广泛讨论黑格尔的著作，但他没有全读这些笔记，只是读了从俄文译成中文的某些部分。毛泽东所评论的哲学，不是评论黑格尔，而是评论从俄国传入中国的那种辩证的或机械的唯物主义形式。不是黑格尔的出现而是黑格尔的缺席影响了毛泽东，由于黑格尔的不存在，就迫使毛泽东从列宁那里或者从斯大林获胜后的其他俄文资料那里得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就这个意义来说，在毛泽东主义哲学的演化中，黑格尔没有起直接作用，而列宁是决定性的中介。

本章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区别问题将不作什么补充。有可能要追溯恩格斯对列宁的影响，特别是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影响，在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性质的问题上，也可能追溯到恩格斯对列宁的影响。但恩格斯不能对斯大林永久性地践踏马克思主义遗产的行为负责。恩格斯确实损坏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区别的辩证唯物主义，并影响列宁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但不能把他与斯大林所创立的那种布尔什维主义的极权主义和贫乏性相联系。的确，机械唯物主义对艾布拉姆·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

胜利，即那次只有通过斯大林的直接政治干预才得以实现的胜利，是苏联的一场反恩格斯主义的胜利。我们已经看到，恩格斯认为自然的规律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因此他必定会反对并谴责机械唯物主义在苏联的这种支配地位。恩格斯有不少弱点，在上面的篇章里已经指出过。但是，不管以怎样的方式，要使他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负责任，那不仅会使他遭受巨大的历史的不公正，而且也会像认为他与马克思观点一致一样，是不正确的、歪曲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恩格斯所器重的，如果恩格斯能活到俄国革命之后，那么，他很可能会保持在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之内，而谴责斯大林统治下发生的独裁。

然而，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到毛泽东主要地跟马克思相联系：（1）在首先由马克思阐明的社会探究的辩证方法的运用方面；（2）在毛泽东是否与一种主要的革命策略范式相一致方面；（3）在毛泽东是否与某种行动的辩证法范式（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观、客观与意识问题的关系）相一致方面。将马克思与毛泽东作这种比较时，重点将放在活动的领域。辩证法将不在思想的领域而在行动的领域进行分析。辩证法不仅是一个探究的公式，而且是一种行动的指南。要判断毛泽东是否继续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必须以他是否遵守行动的辩证法为依据。可以把行动的辩证法分为两套程式，理论—实践，主观—客观。本章就是要揭示毛泽东履行或者偏离这些行动程式的程度。像在哲学的领域一样，列宁再次成为决定性的中介。毛泽东按照列宁的著作向他表述的样子去理解马克思的辩证的方法论。从这个角度看，这里的讨论说明马克思如何影响毛泽东的东西不会很多，而主要是毛泽东如何丰富行动的辩证法的那些程式。关于毛泽东的大部分讨论集中于追溯马克思的影响如何涌向毛泽东。实际上，就行动的辩证方式而言，影响又反过来了，因为正是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主体—客体范畴重新活跃起来。

为了进行这种分析，这一章有必要分成三部分：（1）哲学；（2）理论与实践，主体—客体；（3）意识。

一 哲 学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兴起和发展，与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的命运，或者说与《哲学笔记》中具体体现的列宁主义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好是按照一系列时间交替的次序来考虑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入。第一个时期是发源阶段，也是发生偏离的阶段，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第二个时期是出现在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卡尔·考茨基的时代。第三个时期是出现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列宁和斯大林的时代。毛泽东是在第三个时期，即当马克思主义思想表现为一种布尔什维主义的形式时，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因此，当人们探讨毛泽东的思想的时候，正确的态势不是把毛泽东与马克思相比较，而把毛泽东与列宁和斯大林相比较，毛泽东的哲学思辨，不是从19世纪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的俄国所呈现的形式出发。

但对苏联哲学的时期也必须进行划分，这里我们设想分为两部分：列宁主义的哲学布尔什维克化时期，和斯大林主义的哲学布尔什维克化时期。在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化条件下，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精神是有活力的。在列宁于1924年去世之后，艾布拉姆·德波林是苏联哲学有头衔的首领，直到斯大林废黜他而代之以M·米丁。然而，德波林继续执行了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继续执行了《哲学笔记》关于研究黑格尔，把辩证哲学应用于自然和历史的嘱托，诚然，像我在上一章所指出的，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列宁首创的，但它也由德波林推进了。所有这些都

是在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开始黑格尔主义的探索之前。斯大林把布尔什维克哲学的黑格尔化时期引向了终结，他不但废黜了德波林，而且开始了苏联思想内部的机械唯物主义时期。斯大林主义的哲学布尔什维克化，表明了哲学必须由自然科学代替的实证主义思想的胜利。此外，机械唯物主义抛弃了辩证规律在物质中起作用的思想，而回到了断言运动是由外部冲击给予物质的笛卡尔式的原子主义。毛泽东最早开始哲学的旅程是在1937年，所以他进入这块园地正是在机械唯物主义战胜德波林的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6年之后。毛泽东介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战，正值斯大林主义的哲学布尔什维克化的强化阶段。虽然我们将要看到，他的许多思想是回到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因此，为了了解毛泽东主义思想演化的布尔什维克前提，就有必要通过莫斯科去接近延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世界性漫游中，有一个中间停靠站；在接受它的中国化形式之前，它正需要经过布尔什维克化的锤炼。

列宁在传下政治上的最后意愿和遗嘱之外，同时也传下了一种哲学上的最后意愿和遗嘱，只是没有以专门的形式。显然，列宁认为在布尔什维克哲学中，黑格尔必须起一种核心作用。列宁对《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der the Banner of Marxism*）杂志的编辑们的训示是清楚明白的：“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应该形成一个‘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2]在给创办于1922年的这家新杂志的同一篇献辞的较前一点地方，列宁同样肯定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3]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列宁对辩证法的理解有五个基本原则：（1）黑格尔的中心地位；（2）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主导原则的思想；（3）哲学是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的必要指南的思想；（4）对立统一规律形成宇宙的中

心逻辑的形而上学信念；（5）由于辩证法是宇宙的本体论原则，它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反映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在自然领域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列宁怀疑德波林是孟什维克党（Menshevik party）的早期成员，但他于1921年批准了德波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教师职位的任命，大概是希望德波林会在布尔什维主义内部坚持执行这种黑格尔的使命。^[4]大概由于列宁了解他，德波林在1922年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编辑之一，列宁曾劝告这家杂志从事黑格尔的研究。

列宁早在1909年就知道德波林的著作。他在那年读了德波林的论文《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并在上面写了几页评注。列宁不喜欢德波林的写作风格，但他同意德波林的思想，因为在对那些摘要的一条旁批中列宁写道：“把正确的真理用异乎寻常的晦涩难懂的形式来叙述。为什么恩格斯不用这种莫名其妙的语言来写呢？”^[5]在这篇论文中，德波林竭力解决的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竭力解决的同样问题，即面对物理学危机试图挽救实在论。德波林论证，把辩证法正确理解为一种认识论和一种本体论，会克服物理学危机而重新肯定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列宁与德波林两人有着同样的目的，即在原子论正在分解的时代要挽救哲学唯物主义。德波林在这种尝试中使辩证法思想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甚至主张由恩格斯和马克思所实践的辩证法乃是欧洲哲学的顶峰。德波林把辩证法分为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使普列汉诺夫的传统永久化了。德波林确实执行了苏联哲学中的列宁主义遗产，他也确实使黑格尔成为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讨论的中心。在列宁和列宁所指定的德波林的领导下，苏联哲学的布尔什维克化，采取了一种明显的黑格尔化的形式。

布尔什维克的黑格尔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机械唯物主义之间的那场斗争，从1922年持续到1931年。^[6]这场斗争的焦点之一，

是有关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解释和列宁的黑格尔著作摘要的某些部分，在两派之间展开的激烈争论。《自然辩证法》最初由梁赞诺夫（Ryazanov）出版于1925年。德波林也在1925年出版了列宁的黑格尔摘要的某些部分，但只是到1929年，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才出版于《列宁文集》（*Miscellanea*）第9卷和第12卷中。最后，到1933年，已载入《列宁文集》的，再加上他所有未出版过的哲学文稿，一起编辑成书，以《哲学笔记》为书名出版。这些著作出现于布尔什维克哲学派别之间斗争的时刻，不是偶然的。这些著作是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黑格尔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机械唯物主义之间斗争的弹药而出版的。其实，德波林是利用1925年出版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机会，发布一篇谴责机械主义者的哲学宣言。

由伊凡·斯捷潘诺夫（Ivan stepanov）、S·来丁和伊曼纽尔·恩克曼（Emmanuel Enckman）领头，机械主义者发起了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攻击。他们论证说，辩证法是精确的科学研究的結果，而恩格斯错误地把辩证法当作某种先于科学研究的東西，当作一种发现的方法加以应用。机械主义者认为，运用一种先验的方法论去研究自然是荒谬的。斯捷潘诺夫反对由哲学来支配科学，要求依据现代电子理论^[7]来修正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我在关于恩格斯的讨论中已经指出，斯捷潘诺夫看到恩格斯不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这是正确的。机械主义者在哲学问题上的论点是极为实证主义的，比如S·来丁，他想完全废弃哲学，并且出版了一本题为《哲学是资产阶级的支柱——科学到达桥梁——废弃哲学》（*Philosophy is a Prop of the Bourgeoisie—Science to the Bridge—Philosophy Overboard*）的书。^[8]同时，机械主义者又继承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另一些方面，比如主张一切有机生命都能单纯从化学的角度来解释。实际上，伊曼纽尔·恩克曼

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就以他的著作《关于生物学理论的十八题》(Eighteen Theses Concerning the Theory of Biology) 发动了机械主义的运动, 在这本书中他提出, 有机生命可以完全化归为生理学的和化学的过程。机械主义使恩格斯思想的某些部分永久化, 而反对其他部分, 这样一种处理反映了我所描述的《自然辩证法》中的紧张状态。在恩格斯那里, 存在着突生进化论因素与机械论因素的不平衡, 这种紧张状态表现在俄国机械论者对待他的态度上。

尼古拉·布哈林虽然没有直接卷入关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论战, 但他也维护了机械论的立场。布哈林否认辩证法存在于物质客体中, 否认对立面的统一产生物质的自身运动, 而主张运动的起源在于物质的外部, 运动是由于外在于客体的力量。^[9]由于否认辩证法存在于事物之中, 布哈林就采取了不仅与德波林而且与恩格斯相对立的立场。在布哈林看来, 谈论辩证法存在于事物之中, 就会陷入某种形式的神秘主义。当斯捷潘诺夫论证自然界不存在质的差别, 而只有量的差别, 整个宇宙可以追溯到物理的过程时,^[10]他就进一步暴露了机械论者的实证主义立场。总的说来, 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机械唯物论观点, 恩格斯成了一个被黑格尔哲学玷污而不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论者。

有趣的是, 起来维护恩格斯的是德波林, 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黑格尔派, 原因就在于他把黑格尔主义结合进了对自然的研究。德波林一再宣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完全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的黑格尔主义立场的正确性。德波林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主要先见是在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科学方面。尽管德波林可能觉得自己并不同意《自然辩证法》中的实证主义因素, 但他正确地把恩格斯评价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然而, 德波林在 1925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 德波林声称“恩格斯试图在自然辩证法中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

学理论引向最高可能的发展。”^[11]德波林还就一般辩证法写道：“辩证法只不过是普遍的方法论。然而，这种方法论构成了作为一门特殊科学的哲学的根本实质。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必须纳入所有具体的和经验的科学，因为它代表科学的代数学。”^[12]事实上，德波林抨击了乔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因为卢卡奇批评恩格斯融合了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德波林也批评了卢卡奇确认自然辩证法不可能的观点。

但是，对于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德波林则倍加高度的称赞。列宁的笔记证实了德波林的主张，即黑格尔必须成为布尔什维克哲学的中心，哲学必须充当自然科学的指导。的确，《列宁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德波林所需要的证实，确立了德波林在按照列宁的传统坚持布尔什维克哲学的看法。由于这种合法性，在1929年4月举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德波林学派完全战胜了机械唯物论者。^[13]当时，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采取了布尔什维克的黑格尔主义的形式。

德波林的胜利是一次暂时的事件，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他自己试图使哲学政治化的一个牺牲者。作为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一种武器，德波林给他们贴上布哈林主义、或斯大林所痛斥的右倾分子的同盟者的标签。后来，同样的办法被用来对付德波林，他被诬蔑为左倾分子，或托洛茨基阵营的成员。可悲的是，哲学正失去它的自主性，而变得依赖于宫廷政治了。斯大林在1929年曾发表讲话支持德波林，促使了他的胜利；而大约一年之后，同样又通过讲话予以奚落，造成了德波林的垮台。1930年12月，斯大林发表演说斥责德波林，不是把他的学派申斥为托洛茨基派，而是申斥为某种几乎有害的“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14]1931年1月25日，德波林的学说和他的刊物《在马克思

主义旗帜下》受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谴责，于是布尔什维克的黑格尔主义的十年，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的十年便结束了。

布尔什维克的黑格尔主义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斯大林试图使俄国农村集体化的一种牺牲品。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在为政治而占领文化领域，为把文化归结为仅仅是政治的一种表现的尝试中被消灭了。1930的12月29日，红色教授学院（the Institute of Red Professors）的党组织恭顺地奉承斯大林，发布了对德波林的谴责。这一谴责纯粹是模仿斯大林，把德波林划为信奉“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并且进一步把他归属于另一个异端分子即乔治·卢卡奇，把他跟“卢卡奇类型的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15]联系起来。这次决定还断言列宁甚至在他的《哲学笔记》中也超出了黑格尔辩证法，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有用性。这样，德波林就犯有双重罪过，即由于对黑格尔保持忠实，同时也就违背了列宁的精神。^[16]正在到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机械唯物主义时期排斥黑格尔，也排斥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但跟对德波林哲学上的谴责同样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斥责也向他猛扑过来。M·米丁在针对整个这场辩论的一次单独发言中，指出德波林使理论脱离了实践。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哲学必须从属于政治。按米丁的意见，哲学必须成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战线”，^[17]知识分子们必须组成一条“哲学战线”，^[18]并且把支持斯大林的农民政策看作他们的首要任务，因为这对于社会主义斗争的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米丁的语言求助于诸如“战线”之类的军事术语，这标志着苏联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一种变革。哲学和知识分子正在失去他们的自主性，成为国家官方政治的附庸。德波林自己促使了这个过程，布哈林后来也是这样。在一篇自我坦白（这是30年代苏俄的典型东西）中，德波林承认他脱离了斯大林主义的俄国的政治要求。为了拼命使自身合法化，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正强占着文化的领域，使之适应国家的需要。

按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对理论与实践的理解，理论必须执行政治需要的职能。

一种新的世界观出现在苏联。自1917年后的14年里，苏维埃俄国经历了一场文化革命。沙皇俄国的文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布尔什维克文化所代替。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场文化革命中有两个时期，即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时期和布尔什维克的斯大林主义时期。在苏维埃俄国，资产阶级文化必须代之以无产阶级文化。1928年是这种转变的关键的一年，当时斯大林发动了他对农民的进攻，开始了苏联的迅速工业化。俄国农村中的革命，俄国农业的强制性集体化，反映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反映在布尔什维克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强制性胜利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的十年里，斯大林在俄国建立了一种官方的国家文化，他把它等同于无产阶级文化。斯大林的第二次革命不仅在经济“战线”上一往无前，而且推进了文化“战线”上的胜利，并导致政治对哲学的支配。在国际范围内，这意味着苏维埃国家的实践，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模式，以及俄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全世界其他共产党都必须遵循。斯大林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苏维埃霸权的缔造者。

斯大林在推倒德波林之后，把M·米丁提升为苏维埃哲学的领导者。实际上，米丁不是机械唯物主义学派的成员，而是属于正统派集团。这意味着米丁不是一个黑格尔派，但也说明米丁懂得科学必须有一种哲学的基础。换句话说，虽然米丁认识到科学研究需要哲学的指导，但他不认为这种哲学指导来自黑格尔主义。^[19]在承认需要哲学指导研究的意义上，米丁继承了列宁的传统。米丁写了两份重要的哲学著述：《辩证唯物主义》（*Dialektichesky Materializm*），出版于1933年；他还为1935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写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长篇系统解说。这两份著述对毛泽东是重要的，他读了米丁

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上的解说，也读了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尽管斯大林能在俄国压制德波林主义，但他不能在全世界扑灭它。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谴责了德波林主义四年之后，在中国，德波林派与反德波林派哲学家之间发生了一场剧烈的争辩。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谴责了德波林主义四年之后，毛泽东开始了他的长征。谴责德波林五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不仅与“回国留学生”的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思想作斗争，而且着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国化。于是，在毛泽东已经控制了共产党的时期，在他寻求把中国特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系统化的时期，中国的德波林和反德波林之间的一场哲学斗争便在进行中了，它也是被人们称为新启蒙运动的一次文化发展，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相融合的一种尝试。

中国德波林派的领导者是叶青（Yeh Ching），反德波林派的领导者是陈伯达（Chén Po - Ta）和艾思奇（Ai Ssu - Ch' i）。叶青属于国民党，而艾思奇和陈伯达则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从1935年开始，这两个共产党的哲学家断定叶青企图综合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做法是徒劳的。^[20]因为在共产党的陈伯达与艾思奇看来，围绕德波林主义的争论是涉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关系这个重大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是新教育运动的中心，这个运动是由陈伯达于1936年9月发表在上海的定期刊物《读书生活》上的一系列文章发起的。

同时毛泽东在延安正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战胜由俄国训练的“回国留学生”而斗争，陈伯达和艾思奇则在上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融合起来。由王明（Wang Ming）领导的“回国留学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小组，他们在莫斯科的孙逸仙（Sun Yat Sen）大学受过几年训练。这些人被彻底灌输过斯大林主义，能够流利地用俄语说话和阅读，十分熟悉苏联

共产党的历史，宣誓要实现共产国际的纲领，所以他们竭尽全力把苏联的模式强加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于1930年回到中国，从李立三手里夺取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从此到1935年，他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尽可能按照苏联的模式来塑造中国共产主义的策略。新教育运动反对对苏联的这种奴性的模仿，宣称把一种先验的模式强加于中国的事件，而忽视中国历史条件的特点，会把中国的革命引向毁灭。的确，陈伯达大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及策略必须按照中国的环境来调整。正如列宁把马克思主义调整到适合俄国的独特环境，马克思主义也必须调整到适合中国的独特环境。^[21]事实上，是艾思奇把“回国留学生”的过分表现称为“左倾教条主义”（left-wing dogmatism）。^[22]在中国渴望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的情况下，“左倾教条主义”意味着试图把苏联模式移植到中国共产主义的各个方面的倾向。在对上海“文学左翼”（‘literary leftists’）的一次抨击中，艾思奇指控“左倾教条主义者”有一种“最进步的外貌，但他们一再背叛，他们的投降危害着那些联合救国的人们。”^[23]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36年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在延安由毛泽东领导，另一个在上海由艾思奇和陈伯达领导。毛泽东明确地意识到了新教育运动的思想，因为在运动开始的六个月之后，延安的一个共产党理论家肖承蒙（Hsia Cheng-mung）就出版了一本有关运动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艾思奇写的。^[24]

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占产生了分裂的效果，渗入了那些想使中国共产主义俄国化的人和那些寻求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形式的人之间意见分歧。在德波林派/反德波林派的斗争方面，日本的侵占使对手们分道扬镳了。德波林派的叶青根本不是个共产主义者，所以他寻求国民党的保护。陈伯达和艾思奇二人是反德波林派，提倡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形式，因此走向延安并

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保护。^[25]由于陈伯达和艾思奇来到延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两股力量便汇合了。当然，毛泽东领导了运动的政治方面，寻求一种适合于中国独特历史条件的革命战略，陈伯达和艾思奇领导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哲学—文化方面，寻求使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中国相结合的哲学和文化。毛泽东欢迎这支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小队伍，1938年9月，毛泽东建立了“新哲学协会”（The New Philosophy society），并让陈伯达与艾思奇领导。“新哲学协会”的目标是“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促进具体理论问题的认真研究”，并保证哲学在“中国的抗战、国家重建和理论发展”中发挥它的作用。^[26]总之，“新哲学协会”是要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这时已准备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六次全会上发表著名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正式号召中国化运动的制度化，政治部门由毛泽东领导，哲学—文化部门由陈伯达和艾思奇领导，实际上是为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实施一场文化革命，创立一个“思想堡垒”，即理论中心。

这支共产主义理论家小队伍来到延安，适应了毛泽东直接的政治需要。在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Tsunyi Conference）上，毛泽东取代了王明，王明是充分信任斯大林的，是“回国留学生”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1935年12月举行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说明向王明挑战，使反对王明的斗争逐步升级。但在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在党内还不具备无可争辩的霸权。那时他的缺陷之一，是在辩证哲学的知识方面。据我们所知，毛泽东阅读过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1920年所读的《共产党宣言》。^[28]1936年，当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保安（Po-an）访问他时，他明确地承认自己需要增加辩证法的理论知识，因为斯诺把他当作一个“哲学方面热情的学生”来描写。^[29]陈伯达和艾思奇满足了毛泽东的两项重大

需要，一项理论方面的和另一项政治方面的。在理论的层次上，陈伯达和艾思奇帮助毛泽东研究并理解辩证法思想，帮助他发挥使中国革命的民族经验得到证实的辩证法原理。换句话说，毛泽东需要一种能证实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哲学。在政治的层次上，一旦毛泽东达到了一种正确的辩证法哲学，他就能运用这种新哲学作为他继续反对王明的武器。陈伯达和艾思奇为毛泽东履行了这种职能，而毛泽东便在延安真的作为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辩的领袖出现了。被称为毛泽东主义的一批思想的出现，一种毛泽东主义哲学的例证，都始于延安时期。陈伯达和艾思奇对毛泽东主义的出现作出了重大贡献。反对苏联模式的斗争，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俄国化的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同时发生的过程。

除了这些重大的理论作用之外，艾思奇还执行了作为翻译者的重要的具体任务。艾思奇懂得俄文，所以让他把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的俄文教科书翻译成中文，以便毛泽东能够阅读。为了把毛泽东准确地置于世界辩证法思想运动中加以考察，首先需要确定他所接触和理解经典原则的程度。当毛泽东在1937年写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和《论辩证唯物主义》时，他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什么呢？事实上，他了解得很少。关于马克思，毛泽东只了解《共产党宣言》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他在1920年读过《共产党宣言》，但关于他第一次阅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间，却没有确实的材料证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注释列出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但这些注释是由党的出版社附加于毛泽东的著作上的，而且不准确，因此不能作为毛泽东了解这部著作的确实证据。不过，在我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时，我将表明，毛泽东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重要的哲学原理，特别是著名的提纲第11条，结合在他的著作

中，所以我把它作为文字的根据，确认他在1937年前就了解这部著作。

关于恩格斯，毛泽东肯定了解《反杜林论》，这本书早在1930年就第一次译成了中文，后来1932年在北京、1936年在上海和1940年在延安又再次发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参照了《反杜林论》的“辩证法，量与质”一章，由于这部著作是这样容易得到，所以没有理由怀疑他没读过^[30]。似乎毛泽东不知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文献目录学家说，直到1940年这本书还是不可得到的。除《反杜林论》以外，毛泽东还读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31]有趣的是，毛泽东读过恩格斯的两部最流行的著作。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总是与恩格斯相一致。我将在后面指出，毛泽东与恩格斯思想的机械论方面，特别是在仅仅根据量变说明质变的问题上，有着尖锐的分歧。然而，这确实表明，被用来在西欧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的同样著作，也显然被用来在东方普及马克思主义。我在本书的第一章里已经指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说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都是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入门。毛泽东不熟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但显然《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他也像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那样，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尽管毛泽东并没有被说服到一种完全的恩格斯的立场。

斯大林亲自干预哲学的短文写于毛泽东写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后。斯大林于1938年写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50年写他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些显然与毛泽东在哲学上的劫掠无关。毛泽东熟悉斯大林出版于1924年的《列宁主义基础》，这不是一本哲学著作，但它把列宁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分析，试图弄清列宁对20世纪马

克思主义的贡献。当毛泽东确定自己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时，当他像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那样，把他自己与列宁主义并列起来时，他利用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毛泽东为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感到鼓舞，因为斯大林已经说明，列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使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显然，斯大林不会同意毛泽东对他的论文的利用。

但是，毛泽东确实知道列宁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毛泽东知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过只知道它的节略版。^[32]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确实了解列宁在 1914 年所写的《哲学笔记》中最丰富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不考虑德波林早先对它们的部分出版）在俄国于 1929 年出版，收入《列宁文集》第九卷和第十二卷。只是到 1933 年，他的《哲学笔记》的一个完整的版本才出现，包括附加的哲学摘录和旁注。1936 年在中国，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以《黑格尔论理学大纲》（A General Outline of Hegel's Logic）为标题翻译出版了。直到 1949 年后，整个《哲学笔记》还没有译成中文。^[33]然而，在毛泽东开始认真研究哲学时，在他准备与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进行政治和理论的斗争时，在他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时，他读了列宁的最重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发现对他自己最有用的哲学家列宁乃是黑格尔化的列宁。这对于毛泽东的社会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有决定意义的。

最后，在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列宁的上述著作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苏联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也是毛泽东可以读到的。在这一方面，艾恩奇又帮助了毛泽东，帮助了毛泽东主义哲学的系统化。我上面已经提到，M·米丁是苏维埃俄国德波林派与机械主义者斗争的正统中心，他于 1933 年出版了一本叫做

《辩证唯物主义》的书。艾思奇翻译了米丁这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出版于一部叫做《哲学著作选》（*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的文集中。虽然《哲学著作选》直到1939年才正式出版，但很明显，艾思奇在1937年就把它译好了给毛泽东利用，因为毛泽东的《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很大一部分是引自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章和第三章。^[34]此外，米丁还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长篇系统的说明，这部百科全书在苏联于1935年出版。艾思奇也把这翻译成中文，把米丁的文章叫做《新哲学纲要》（*Outline of a New Philosophy*），于1936年在中国出版。^[35]苏联二十年代哲学论战正统中心的代表人物所写的这些论著，毛泽东不仅读了，而且在系统形成他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明确地依靠了它们。

尽管毛泽东没有直接接触德波林的著作，尽管他的主要哲学顾问属于反德波林阵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许多东西仍使人想起德波林。但是，毛泽东通过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最重要部分，直接接触了布尔什维克的黑格尔主义。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对毛泽东有重大的影响。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建构了毛泽东主义哲学的基础，而毛泽东主义哲学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中国化的哲学基础的主干思想。他正在创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以便从逻辑上证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在这一建构时期，毛泽东从三个来源上获得他的基本灵感：（1）米丁的正统观念；（2）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3）古代中国的二元论。

在我进入分析毛泽东的哲学基础之前，必须确定我将借以把毛泽东跟马克思的思想联系起来的若干基本规则。毛泽东的哲学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和作为一种分析历史一政治态势的方法。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没有增添什么，但他确实把马克思主义扩展成了一种社会分析的方法。我将不在

形而上学的层次上比较毛泽东与马克思，这主要是因为，如我已指出的，马克思并不提倡什么辩证唯物主义。我将在历史—政治分析方法上比较毛泽东与马克思，在这个大题目下，包含理论—实践、主观—客观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我所要做的，就是建立在理论—实践、主观—客观的层次上我所借以比较毛泽东与马克思的标准。

以列宁为中介，把毛泽东与马克思相比较的问题，必然涉及正统性问题。它包含着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的理论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它包含着马克思的理论在何种程度上适合于毛泽东的需要的的问题。这样，正统性问题便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从毛泽东到马克思，毛泽东是不是遵守马克思的模式；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能够适合于毛泽东自己所处的环境。

回答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二者都包含对马克思的教义所说的东西的分析。换句话说，对于毛泽东对马克思的信奉和马克思对毛泽东的关联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方式，二者的观点是从对经典内容的两种不同解释出发的。我将把一个学派称为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s）（很像圣经的咬文嚼字派作风），而把另一个学派称为再创造主义者（re-creationists），或相继启示学派（很像自由新教派作风）。

按照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一种明确而严格的教条。按照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除了其他方面，还就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提供了明确具体的圣训。比如，马克思的革命教义的第一条训令也许是一切革命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第二条训令也许是农民不能被当作一种真正革命的力量。因此，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合法性的决定因素，就应以毛泽东是否坚持马克思的策略预想为根据。这种论证是以禁律和规范的方法为基础的，而且必须贯穿从毛泽东到马克思和从马

克思到毛泽东的两个方面。换句话说，按照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如果能够表明毛泽东遵守了马克思的策略预想，也就同时认定了马克思对毛泽东所起作用的环境是绝对适用的，由此便可证明毛泽东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路线上。毛泽东便属于使徒传统之列了。

在很大程度上，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支配着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关系的大多数学者。仅举几个例子，如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阿瑟·柯亨 (Arthur Cohen) 和班雅敏·施瓦茨 (Benjamin Schwartz)，就致力于弄清毛泽东是不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预想。如果发现他遵循使徒传统，那么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合法的。否则，如果发现他背离了马克思的规范和禁律，那么，他与马克思都要受到谴责。在后一种情况下，毛泽东之所以受到谴责，是作为不想遵循教义的背教者，而马克思也会受到谴责，是因为最初建立的规范和禁律本来就是不能应用的。原教旨主义者从政治战略的基础出发进行论证。如果教条的任何部分证明是不适用的，如果它的普遍性受到挑战，那就说明整个体系在基础上存在缺陷。

按照再创造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行动的指南，他们否认马克思留下了有关策略行为的规范性和禁律性范畴。再创造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分析具体形势的方法。由于各种具体形势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会为各种不同的历史形势提出不同的机变战略。按照再创造主义者的观点，必须按照各种独特的历史环境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策略。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必须重新创造，因为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预想，而只有关于构建一种适合于给定环境的战略的责令。

在再创造主义者看来，正统性问题与使徒传统无关，而涉及对一种方法的正确运用。毛泽东主义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

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毛泽东的问题，只能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回答。这里强调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一种方法的恰当运用。如果马克思的方法在被毛泽东运用时，产生了与存在于中国的历史—政治力量的性质相符合的成功的结果，这就表明，马克思的方法（不是马克思的任何特定内容），是用来分析社会力量的一种有效形式。对于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必须按照它所面对的不同历史状况而重建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家所采取的策略必然总是不同的。

我要论证再创造主义者的观点。在理论与实践的层次上，对于毛泽东与马克思的关系的正统性问题的正当探讨，不是要问他是不是背离了马克思，或者问为什么他背离了马克思，而是假定背离马克思的必然性。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所面对的条件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就要求他通过运用（凡在适用的地方）一种普通的方法论，去发现不同的回答。毛泽东再创造了一种符合 20 世纪中国历史环境的策略，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履行马克思的重新创造的训令方面，毛泽东是既忠实于列宁的精神又忠实于马克思的。列宁也懂得正统性意味着革命战略的重建。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意味着从事再创造和再解说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特别嘲笑了西方共产主义政党试图模仿苏维埃的做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特别嘱咐西方共产主义政党去发现与 20 年代的欧洲相应的他们自己的战略。^[36]其实，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就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增添了一个新的方面。^[37]马克思看到了革命在西方发生是因为阶级的两极分化，列宁则看到在全世界帝国主义链条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着一种革命的形势。实际上，斯大林自己也懂得，列宁是在重新创造一种与 20 世纪相关

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把列宁主义称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38]，从而证明了这种重建的合法性。毛泽东之所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因为他懂得他为中国而重新创造的活动。

这里将要作出的毛泽东与列宁的比较（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范式），只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即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指南，而不是一种教条。在社会方法论、理论—实践和主观—客观的层次上将毛泽东与列宁所作的比较，只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是他为亚洲的革命揭示了一种新的战略。因此，我将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即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要求责成毛泽东去创造一种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模式，这种革命会适合于亚洲的农民条件。如果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毛泽东主义就是亚洲农民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自我批判，它作为自我批判而生存，因为毛泽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的一个阶段。

这种由毛泽东所具体表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在毛泽东到达延安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39]正式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然而，毛泽东意识到，在六中全会之前，他已经着手搞了三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布尔什维克化与中国化之间的决裂，实际上是发生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代表会议上。对于毛泽东来说，为了弥合他与布尔什维克化的裂痕，他必须看到革命成功的苏维埃模式与中国模式之间存在着的差别。这种意识只能在毛泽东实际卷入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发生。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正是作为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结果，他才自觉到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因而这种自觉就成为一种条件，使他能够把布尔什维克化和中国化之间的裂痕加以理论化。

毛泽东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认识到与哲学相区别

的理论的重要性。对形势作出正确的理论把握，是适当的政治行动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毛泽东牢固地站在列宁主义的传统上，这种传统肯定理论、政治和意识的至上性。在列宁看来，对形势的正确的理论把握，是任何生产性活动的必要前提。在列宁主义的思想中，意识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毛泽东是这种列宁主义传统的一个部分，从1921年到1935年的14年中，他寻求对中国革命作出一种恰当的理论上的系统阐述。1935年12月在瓦窑堡，毛泽东最后达到了对中国革命的确切的理论估价，在延安的后来几年，他便对这种理论占用给予一种思想体系的表述。

列宁主义传统中固有的东西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这一章的后面我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个理论—实践的问题。在这里只需把实践定义为人对环境的干预就够了，这种干预改变那种环境。在实践的定义中，主观提问的思想，（通过这种提问，环境得到改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列宁对理论—实践范式的了解，与马克思的意向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也懂得人的能动性的改造力量。他认识到人的能动作用的构成性力量。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毛泽东对他的环境的探讨本质上是策略性的。他总在为发现改变客观现实的手段而斗争。毛泽东的很大一部分著作是用来在学习的正确方法上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他经常在分析形势的正确方法、自我教育和纠正错误思想方面教育党。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懂得，为了达到确切的理论，正确分析具体形势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支游击部队的领袖，毛泽东的亲身经验告诉他自己，只有正确的战略，只有对军事形势的正确理论的把握，才会带来胜利。在他对于干预客观的手段的经常探索中，他一直忠实于列宁主义。毛泽东对于向实在提问的方法的探索，是他不仅与列宁主义，而且与马克思的理论—实践范式相一致的基础。

毛泽东的方法是他的军事经验的结果，这种经验以不可辩驳

的形式向他表明，俄国革命成功的条件不会在中国重复。1937年，毛泽东写了他的著名论文《矛盾论》，一般地说，这篇论文主要是从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引申出来的。在哲学的层次上，毛泽东是以一种道家学说的外表，单纯重复包含在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的辩证法本体论的原则。在方法论的层次上，《矛盾论》也是从列宁在他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所信奉的社会分析方法引申出来的，虽然毛泽东从《摘要》中提炼的矛盾概念与列宁的形式不同。但是，《矛盾论》是延安时期的主要著作。事实上，它是毛泽东在哲学上的主要著作。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明了他的社会分析方法。毛泽东的社会分析方法是指定用来捕捉差别的。在《矛盾论》中表述的毛泽东的方法论，是他认识到了布尔什维克化与中国化之间一定要决裂的例证。

在这方面，为了证明毛泽东的社会分析方法如何是1927~1935年，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盛行的政治斗争的结果，我将简要地评述发生于这个时期的主要争论。我将指明，毛泽东的社会分析方法，在很多方面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所经历的现实的政治—军事斗争的一种理论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做的，只是对他关于中国独特性的正确理论加以抽象，并以此为基础，借助于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建构起一种一般的历史分析方法。他在延安时期的贡献，是把这些理论以一种普遍方法和第三世界革命的思想体系的形式表述出来。

我对毛泽东主义哲学的讨论采取这种途径，需要走迂回的路，因为毛泽东主义哲学是毛泽东的政治活动的产物。他的政治活动向他表明了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差别。在这些差别向他暴露之后，他便探寻一种说明这种差别的辩证的方法论，探寻与这些差别相联系的正确方式。即使看来是一段很长的弯路，我也将这样

开始毛泽东主义哲学的演化史：首先说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斯大林如何与中国革命相联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又如何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相联系。

撇开马克思的情况不说，正是列宁认识到农民可以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列宁认为，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农民会与城市无产阶级相联合，随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民无产阶级会与城市无产阶级相联合。^[40]虽然列宁认识到农民阶级分为两部分，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各个部分能加入革命的不同阶段（资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这是早在1905年事件之前就论述了的，但对这些观点最为全面的论述是在他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中。^[41]列宁使得农民的革命性质的思想成为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的一个正式部分。但是，农民的任何革命活动都必须总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此外，列宁还意识到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论民族主义的著作中，列宁强调即使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和反封建力量的民族主义，仍然是革命的，因为可以用它来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42]最后，192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争论中，列宁承认亚洲的革命必须采取与沙俄革命的不同形式。列宁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M·N·罗伊（Roy）的讨论中认识到亚洲革命的独特性，因为他承认民族资产阶级能够与民族无产阶级相联合，达到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43]可见，在1920年的第三国际的会议上，和在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表明他意识到，在不同历史形势下的革命进程，会与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相歧异。因此，概括地说，列宁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要求培养城市无产阶级干部的同时，承认亚洲的革命不同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因为它

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又基本上是反帝和反封建的。由于它主要是民族的和反帝的，列宁也就把它看作首先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中农民和资产阶级力量会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斯大林都忠实地坚持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进程作列宁主义的理解。1926年3月13日，正好在毛泽东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年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中国的革命基本上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因此还不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问题。”^[44]事实上，斯大林也在毛泽东以及一般说来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认识到了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1926年11月30日，在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5个月前，斯大林在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成员的谈话中，断言“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45]在农民问题上，俄国共产党比中国共产党更有发言权，因为布尔什维克们自己曾经使他们的党与1905年的农民革命结成联盟，接着又与1917年的农民革命结成联盟。事实上，1917年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由于他们实行了与革命农民运动结成联盟的策略。他们自己的列宁主义遗产以实际例子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中起义农民的重要性。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主张，值得作更周密的考察，因为像列宁那样，斯大林也承认，根据某些标准，中国革命会不同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从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分为前1917年和后1917年两种类型的观点出发，斯大林开始了他的分析。前1917年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发生于布尔什维主义胜利之前的运动，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而后1917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生于布尔什维主义胜利之后，应考虑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46]俄国1905年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斯大林觉

得，中国必须首先经历她的 1905 年，必须通过她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坚决肯定中国的 1905 年不会重复俄国的 1905 年。的确，由于中国的 1905 年是后 1917 年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它因此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将还有它自己独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一定会给中国革命印上自己的特别标记。”^[47]按照斯大林的想法，中国不同于俄国的一个方面，是越过“工农民主专政”状态。^[48]在布尔什维克的 1905 年，“工农民主专政”意在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府的形式。但是，斯大林意识到，“工农民主专政”这一用语不适合于中国的 1905 年，因为中国革命基本上是反帝国主义的，而俄国的 1905 年基本上是反沙皇制度的。这个名称问题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 1930 年 11 月 16 日解决了，与布尔什维克的 1905 年只是一种“工农民主专政”相比较，它把中国的 1905 年称为一种“工农革命民主专政。”^[49]斯大林所考虑的是，在中国本质上是民族解放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会建立一个“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50]。斯大林所想象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词语“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用意，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起义的胜利，会同时肃清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并伴随着肃清一切形式的地主土地制度，以及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地主集团，从而为向社会主义迅速前进开辟道路。因此，1926 年，斯大林设想，从封建主义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俄国是不同于中国的；他甚至提出警告，反对使中国经验彻底布尔什维克化的企图。1927 年 5 月 9 日，斯大林写了《中国革命问题》(Ques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文，文中抨击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拉狄克—托洛茨基 (Radek - Trotsky) 的论点。他写道：

最后，这就是说，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处于什

么阶段。这就是说，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器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的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在进行民族革命，而是在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51]

与斯大林反对“人为地移植”布尔什维克模式有关的关键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准问题。按照斯大林、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早期列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能省却无产阶级领导权、城市的决定性作用，以及需要在城市中不断扩大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思想。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保持在这些基准之内，就可以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所接受。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保持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准之内，那么即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广泛差别也是可以允许的，而且在那种情况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避免被污称为“莫斯科苏维埃化”。

于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意味着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需要不断增加城市产业工人的数量，并且意识到城市对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些界限之内，中国可以发展自己的差别，而这些差别，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就可以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中国化，这一点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分歧，而关于这种中国化的界限却产生了分歧。1927年后，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没有写多少东西，表达苏联有关见解的任务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履行的。在苏联历史上，这是斯大林战胜了托洛茨基，并使苏联承担起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共产国际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能被认为是反映斯大林观点的，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1926~1929年；（2）1930~1934年；（3）1935年以后。

从1926~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严格遵循斯大林在他的《中国革命问题》中所明确表达的立场。在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共产国际执委会宣称中国还不宜建立城市苏维埃(这是拉狄克和托洛茨基信奉的主张),而仍然必须深入农村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并不认为还要号召游击战争和农村起义,而是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者和农村贫民之间的联系。^[52]农村的革命运动与城市的革命运动必须结合起来。而且,由于西方大萧条的开始,共产国际执委会继续大谈整个欧洲和亚洲革命运动的高涨。1929年6月7日,它谈到“中国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53]1929年7月1日,它再次谈到一个在欧洲和亚洲“发展革命运动新高涨的时代。”^[54]大约一年后,在1930年6月,它又一次主张大萧条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革命高潮的新的更高的兴起。”^[55]共产国际执委会坚信革命高涨的趋势,而不顾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因遭受1927年蒋介石的打击所招致的失败。共产国际执委会显然觉得,世界范围的大萧条对于最终带来革命的高涨,比起国民党血洗上海造成的暂时挫折,会有更大的影响。在1926~1929年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方面承认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同时在这些年里它又从不号召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或建设红军。而且在这整个时期里,共产国际执委会经常使用“矛盾”一词来描述中国的历史环境。它的信件和报告一再提到在中国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之间的“矛盾”,提到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买办阶级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写作他的重要论文《矛盾论》之前,显然知道共产国际的这些信件,肯定熟悉关于“矛盾”的思想。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试图描述中国运动的独特性时,经常谈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见到这种概念,这正是毛泽东自己对中国革命进行分析所依据的概念。

然而,在1930~1934年的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在

毛泽东的指导下，一支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在中国建立起来了。此外，在江西省，先是兴起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然后是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突破，迫使共产国际执委会放弃它原先在1926~1929年反对建立苏维埃和红军的主张。在1931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写道：

苏维埃和一支红军在有几千万人的地区内，使中国在殖民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进入最先进的地位。苏维埃和一支红军的形成，是成功地肯定无产阶级开始于民族革命运动、开始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条件，是业已奠定在国家权力的开端中的领导权。^[56]

然而，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被迫折服于毛泽东所完成的东西，但它与毛泽东仍是从不同的方面看待江西的苏维埃。共产国际执委会与毛泽东对江西苏维埃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看来，苏维埃应当扩大，扩展它们的根据地范围，并且渗透到城市，与工业无产阶级联接起来。但是，毛泽东是从无产阶级战争的角度看待苏维埃，在战争中首先是敌人的军队，而不是城市，慢慢地被征服。共产国际执委会把苏维埃看作一种双重权力，看作一种正在扩展以推翻别的国家的国家，看作一支能作拿破仑（Napoleonic）式的决定性战斗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则是从游击战争的角度、从红军得以保持、使优势敌人逐渐地最后被拖垮的灵活运动的角度看待苏维埃。

正如斯大林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意识到它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俄国的模式。总之，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定范围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它意识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完全布尔什维克化是不可能也不合乎需要的。毛泽东所做的就是要突破可接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准。或者说，

苏联人认为对于任何无产阶级运动都必不可少的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恰恰是毛泽东所拒绝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化的因素。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限度内承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一再肯定的。^[57]

不同于“工农民主专政”和布尔什维克形式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中国化形式的概念，对于苏联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有决定意义的。按照苏联人的观点，“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会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它会符合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模式。但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本质上是多数中国人民的一种专政，它的胜利意味着推翻帝国主义和支持帝国主义的封建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它又不同于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模式，1905年的模式只是要求建立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秩序，因为它看到了在俄国保持资产阶级成分的需要。但是在中国，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已经是专政中的大多数，它就有可能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快转向社会主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完全放弃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中国化的）的概念和“工农民主专政”（布尔什维克的）的概念。他的论文《新民主主义论》，是对主要以工农为基础的专政概念的一种反驳。其实，在他的论文《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完全重新解释了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中的整个专政概念。

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承认了毛泽东的某些政治成就，因为在1926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称赞毛泽东的成绩，并且号召中国共产党，“特别在满洲，在毛泽东和贺龙活动的地区，加强和扩大游击队运动。”^[58]后来，在193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以毛泽东为范例，建议中国共产党“广泛运用（毛泽东）短期培训战士的积极经验。”^[59]莫斯科至少从1926年起就了解毛泽东的著作，并且认为它们是有趣的，只是还不足以使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卷入中国革命的最后时期开始于 1935 年，那时第三国际把它的全球战略改变为一种统一战线策略。

1928~1935 年，共产国际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中发现了苏联的主要敌人。但是，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使苏联在它的西部边界上面临着直接的战争威胁。共产国际放弃了它反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反对一般西方民主的斗争，而号召一种全部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战线。这是以一国社会主义的原则为基础的一种对外政策。斯大林首先着眼于保卫苏联，为此他取消了对西方的阶级斗争。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采取了一种社会和平的政策，以便劝诱西方民主国家开辟反对希特勒主义的第二战线，而不致使苏联单独面对纳粹的猛攻。直到 1935 年在遵义和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行使他的领导为止，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基本上遵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建立的路线。其实，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中农民革命的核心意义，比共产国际自己认识得还要晚一些。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 1926 年达到这种认识的。不过，仅仅一年之后，在 1927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就遵照 1927 年 2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思想指令，使得农民革命与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思想，成为它自己的中国革命理论的主要部分。的确，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莫斯科强加于中国人的。从 1921~1927 年，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从未提到过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8 年 9 月召开，通过了以下的政治决议：

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现在构成中国革命力量的唯一来源，无产阶级的领导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已经建立（在土地革

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能够支持和指导农民)。因此，这将为中国的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开辟道路。

同时，以苏维埃统治形式表现的工农民主专政将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转变的出发点。只有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团结和组织力量，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才能决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将在何时结束，决定它将如何转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

现时两个主要的革命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进行土地革命——通过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苏维埃民主专政。^[50]

这段话包括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化的所有的成分。它描述中国革命的显著特征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中国革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现在土地革命已被看作是这种革命的极其重要的途径。中国共产党也按照一种中国的1905年来思考，并用“工农民主专政”的术语来指称中国共产党现阶段革命的胜利所产生的政府形式。列宁主义的术语“工农民主专政”，是在确切的列宁主义的含义下使用的，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在“工农民主专政”的保护下得以实现。然后，“工农民主专政”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

这段话还把江西农民苏维埃的建立看作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积极步骤。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律令内，即农民苏维埃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个律令内理解这些苏维埃的。在这段陈述中，布尔什维克的绝对律令就在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了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训令就在于这段话的主题中：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转变能够很快从“工农民主

专政”或资产阶级革命中演变出来。这段陈述中所表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意识到，由于农民苏维埃已经是一种工农专政，因此在党取得胜利之后，它们能够较快地实现向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向社会主义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新的暴动姿态，跟也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首先弹奏的革命高潮的论调有联系。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举行的，因而在尔布什维克的直接影响下，它肯定“鉴于新的革命高潮的不可避免的到来，党必须准备武装起义。”⁽⁶¹⁾革命“高潮”的论调，与江西省的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的存在一起，使得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立三能够去计划革命起义。李立三的希望，仍然依据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律令，是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的，即乡村的农民为了激发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攻打城市，从而使无产阶级运动与农民运动融合在一起。李立三的战略失败了，他被撤了职而由王明为首的莫斯科的“回国留学生”所代替。

虽然城市掌握在国民党手里，但江西、湖南的农村仍然保持在共产党人手中。苏维埃运动深化了，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在这里，农民被争取到了革命事业一边。土地的再分配，封建主义的摧毁，是把农民与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的手段。在瑞金开展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们被争取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旗帜下。1934年1月22日，正好是长征的前一年、也是毛泽东取代王明的前一年，毛泽东在向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作了如下的论述：

只有按照这种环境和这些目的才能了解各种政策与活动。它们是：巩固现在已经确立的工农民主专政；把专政扩展到全国；动员、组织和武装苏维埃地区和全国人民群众，通过一次决定性的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

和国民党统治，巩固并发展工农专政；准备现在的工农民主专政在将来转向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所有这些形成苏维埃政策的出发点……

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是直接依靠群众的群众自己的政府。它必须与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以便有效地发挥作用。它已经成为具有伟大力量的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的巨大力量，是历史上任何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所不可比拟的。但它的力量完全依靠人民，而一刻也不能使它自己与人民相脱离。它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以对付阶级敌人，而对它自己的阶级基础——工农群众、贫民，私人雇工，革命知识分子——它使用的不是暴力，而是的广泛的民主。^[62]

不管毛泽东与王明或莫斯科有多大的差别，显然在1934年1月，他仍然保持在莫斯科提出的基准内。他把中国的苏维埃共和国看作一种中国的1905年。他接受了“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关于1905年的列宁主义表述，证明中国在1934年的革命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也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那样认为，工农专政能够迅速转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此外，毛泽东完全把他自己限制在阶级斗争的观念上。土地重新分配本质上是要求阶级斗争的。而且毛泽东是献身于土地革命纲领的。他知道，要使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生存下去，农村的阶级斗争，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失去了城市，共产主义运动只能在农村生存，而在农村它只能靠农民的支持而生存。没有一条群众路线，共产主义便不能在农村存在，因而共产主义也就不能在中国存在。这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的民粹主义与他的共产主义同样深沉。

从上面对斯大林、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的讨

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毛泽东的创造。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思想首先在莫斯科得到阐明，并且采取了布尔什维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毛泽东并没有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工作是突破布尔什维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律令。他所做的是要创立一种非布尔什维克的，但适合中国需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上突破了布尔什维克中国化的基准。当中国共产党由于在上海和广州的失败，被切断了与城市的联系时，它的生存便被推向依靠农民，不仅农民取代了无产阶级的位置，而且农村取代了城市中心的位置。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农民和农村的领导权。此外，当毛泽东放弃城市的时候，他就放弃了在城市工业中组织无产阶级的意图，而且放弃了以占优势的无产阶级成员来充实共产党队伍的意图。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集中于加强农民武装或赤卫队，加强红军，巩固红军与人民之间的联系。

在对毛泽东主义思想的分析中，我已经集中讨论了毛泽东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斯大林之间的联系。由于毛泽东主义的策略和毛泽东主义的哲学基本上是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实践的理论化，现在就有必要来叙述一下毛泽东与中国化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裂。为了说明毛泽东的哲学的起源，我必须首先阐明引起这样一种哲学的实践—政治事件，而且现在我要按照毛泽东与苏维埃模式相分离的年代顺序加以论述。下面分两部分来讨论毛泽东与布尔什维克中国化的决裂：决裂的形成和决裂的理论化。第一部分，决裂的形成，我将讨论 1928 ~ 1935 年的时期。这里我将略去毛泽东的论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我承认它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决定性意义，虽然在这篇论文中毛泽东认识到了农民的革命性质，但由于我认为它本身对于造成毛泽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中国化的决裂没起作用，因此，在这一章里我将不涉及这

篇论文。

而且，我们在展开毛泽东主义的思想体系时所要表明的、作为不同于毛泽东主义哲学的东西，乃是关于亚洲革命的理论。所谓毛泽东主义的思想体系，我指的是毛泽东的以农民为基础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而不是指某种唯物主义一元论或某种普遍方法论的哲学思辨。决裂的两个时期的文献不但提供了中国与俄国之间分歧的理论基础，而且提供了开始于中国、继之在越南、也许还有其他地区的亚洲革命理论的基础。在撰写关于这一决裂的著作时，我们不仅要写到关于中苏之间的分裂，而且要说明一种世界革命理论的出现。

在我进入毛泽东主义的正题本身之前，还有一点需要事先说明。除此之外，大量的讨论将放在毛泽东的独特性上。但是，为了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结构，就有必要特别指出毛泽东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公式中所得的益惠。在多数领域，必须承认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是来源于苏联的。具体地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观念首先是由苏联人提出的。

“矛盾”术语最初被苏联人用来提及中国的情况，他们自己又是吸收了从马克思到列宁的长期传统。中国正在经过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也是最早在俄国提出的。“不平衡”的概念，中国的发展不同于俄国和西方的事实，也是最早在莫斯科提出的。事实上，我将表明的是，毛泽东借用了上述某些概念，而且必须公开承认他从苏联的公式得到的益处。这样，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确切性质才能被清楚地勾画出来。

（一）决裂的形成：1928～1935年

1928～1935年是毛泽东准备与布尔什维克中国化决裂的时期，有四本决定性的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10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和重要的《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这些论文大都写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之前，但农村苏维埃却已经存在了。两种政权并存于中国，而毛泽东的论文是想要说明为什么这种双重政权的局面在中国是可能的。

在这些论文中毛泽东证明自己是第三国际的一名忠实信徒。他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中国化的绝对律令。在于莫斯科召开只有少量党员出席的(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所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写道：“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63]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再次表明他对第三国际指示的信赖：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64]

不过，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中国化的信奉，可以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找到最为简明的表述。^[65]

此外，毛泽东不仅表明他乐意遵循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令，而且在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中还借用了特有的苏维埃概念。毛泽东需要说明，为什么红色苏维埃，即一种国中之国的局面，当时存在于中国而不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他需要说明，发生于中国的“双重政权”的类型，不是俄国那种城市工人阶级苏维埃与也位于城市中心的临时政府并存的双重政权，而是位于城市中心的国民党与农村地区的

中国农民苏维埃并存的双重政权。为了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利用了最初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半殖民地的分析概念。毛泽东写道，中国化的双重政权的出现，“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66]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重申了同样的思想：

……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67]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是中国化的双重政权存在的一个前提。这种分裂，因外国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有日本，而且有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干预而加剧。各种力量，帝国主义的干预，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军阀混战的出现，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便成为红色苏维埃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术语吸收的另一个分析概念是“矛盾”的思想，他把这也用作社会分析的一种工具。“矛盾”的思想被用作了分析中国革命形势独特性的一种方法。在他的论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认为中国化的苏维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68]矛盾的概念反复地出现于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全篇中，并且总是从叙述中国革命的独特性的观点出发的。毛泽东在这里写道：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69]

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事实，中国革命确实不同于所有其他革命的事实，就是毛泽东在他的革命活动进程中逐渐意识到的东西。毛泽东越是意识到这种独特性的条件，就越是感到要超出布尔什维克中国化的基准。

在1928~1935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与俄国之间差别的意识，不是以任何官方的形式表述的。只有到1935~1945年的统一战线时期，毛泽东才表述这些差别，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仍然在言词上坚持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化”，论证他关于“加速革命高潮”^[70]的多次主张，而一个“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71]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范式的要点。毛泽东与李立三的分歧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毛泽东不承认一个“革命高潮”的存在。分歧发生于对“快要”一词的解释。李立三过于急躁地解释了“快要”一词，把它的意思解释为“一年”，^[72]因而缺乏必要的准备就投入了战斗。毛泽东也认为一种高潮正在到来，但指出“不久”一词不是规定一个确切的时间，而只是意味着所要达到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在这一点上，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73]

然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布尔什维克中国化方面的最重要的延续，乃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这一主题的坚持。1928～1935年，在蒋介石进行围剿时期和长征之前，毛泽东仍然致力于贯彻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原则。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在广大农民支持的基础上，红色苏维埃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并且把土地的重新分配看作是取得农民对苏维埃支持的一种手段。“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74]毛泽东懂得他必须吸引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并牺牲有产者以吸引无土地者，因而他完全愿意剥夺农村资产阶级的土地。毛泽东认为农村“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75]毛泽东的土地革命直接指向“大、中地主阶级”和“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毛泽东用以下的说法表述他的农村阶级斗争：“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76]如果阶级斗争是反对农村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那么这种斗争必定按照1905年的模式，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另一个范式，采取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手段。毛泽东完全接受了1905年的工农范式，因为他把红色控制区域的政府称之为“工农武装割据。”^[77]

但是，就在这种与布尔什维克中国化相一致的范围内已经埋下了某些方面的未来分歧。比如，从军事观点说，毛泽东日益意识到，在他所领导的反对蒋介石围剿的那类战争中，建立强大根据地的重要性。在他的论著《井冈山的斗争》中，他列举了为什么井冈山有利于红色苏维埃出现的五点理由，其中第四点是“有根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割据地则各县都有。”^[78]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又谈到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断言：

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79]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在1930年就达到了对这种游击战争理论的成熟表述。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成熟模式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1）运动战；（2）以某些根据地为依托；（3）处于势必持久的斗争中。到1930年，毛泽东掌握了运动战和可靠根据地的因素，但他仍然缺乏持久斗争的概念。持久斗争的概念只是到1935年才充分把握，只是在毛泽东那年发表的两篇论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此两篇论文发表于1938年5月，而不是1935年——编者注）中，毛泽东的游击战三因素才综合为一种充分发展了的战略。^[80]然而，1930年所发展的东西，乃是军事战略的核心。这种军事战略是毛泽东的独特创造和中国历史环境的表现。在1928~1935年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以显然与俄国内战相似的形式，使用了共产党红军对国民党白军的类比，但是，从毛泽东提出他自己的以根据地为依托的运动战的战略（随后与持久斗争的概念相结合）来看，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与俄国的内战显然是不一致的。

另一个会最后导致突破苏维埃模式的地方，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的出现。^[81]毛泽东的整个游击战争的战略，是以设想广大农民的支持为根据的。没有根据地，毛泽东的游击战略就不可能发挥作用，因为按照运动战的要求，为了在再次出战之前，获得休整和重新组织，游击部队必须安全撤退到根据地。而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根据地就不可能建立和守住。毛泽东懂得需要发展一种群众、红军和共产党之间的生死与共的联系。有两个办法来做

到这一点，第一，通过土地革命和土地重新分配的诱饵。第二，保证红军和共产党尽可能答应农民的需要。必须有一条群众路线，来融合群众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是以党与群众之间的民主关系为基础的。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先决条件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出现了。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为了保证决策过程向群众公开，就以群众路线的名义，谴责和打击了一切官僚主义、杰出人物统治论、业务至上和先锋队论的残余。的确，赤卫队本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种创造，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的一种派生物，因为它们最初是一种地方的农民武装。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写道：“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标、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82]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或许可以在他的论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找到最好的表述。毛泽东详细论述了使革命与群众再结合的措施。首先，他说，“从组织上动员群众”，而最好地做到这一点，是通过“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83]其次，有必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有必要“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84]

出于这种民粹主义，毛泽东提出了一种与列宁主义思想完全不一致的党的概念。^[85]毛泽东与列宁主义遗产的关系，跟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主义不同，是有两重性的，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训令——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况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而言，有一条连续的路线把毛泽东与列宁联系起来。但是，就共产党的作用和建构而言，毛泽东与列宁又完全不一致。在《怎么办？》里，列宁概括了一种党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概念。列宁表现出对工人运动的极不信任，他把党设想为一个与工人阶级运动相脱离的先锋队。^[86]如果让工人阶级运动

自己发展，它就会接受听任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压迫存在的经济利益。

列宁主义所固有的假定，就是政治上的知识分子比工人群众具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意识。政治意识，或者懂得社会中权力一阶级关系的意识，是比工人们经济意识更为先进的一种意识状态。在这一点上，列宁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事情的思想。^[87]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会改变它自己的意识，会懂得它的解放只能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而获得。列宁与马克思的主张不一致，他把党看作一种特权知识的贮藏所，并带着一种柏拉图式的贵族政治观念，去指引那些对自身自由无知的人们。

在阶级的自我解放的问题上，毛泽东更接近于马克思（与列宁相比）的意图。但是，毛泽东所提到的意识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毋宁是农民的意识，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通过使农民卷入政治斗争，农民的群众意识能够改变成为一种革命—解放的意识。毛泽东提倡群众路线，他并不觉得党有任何特殊的有关知识的权利，而觉得群众通过他们自身的政治与社会活动的经验，能够改造他们自身的意识。

列宁对群众有疑心，而毛泽东却高度信任他们。正因为毛泽东并不觉得需要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把先进的意识带给群众，所以他不认为共产党应当与群众截然不同。按照民粹主义的方式，毛泽东认为党与群众应当融为一体，他谈到建立一条群众路线，使大部分人参与决策过程，而不是说要使党成为农民的先锋队。而且，虽然毛泽东使用了“民主集中制”的术语，但他给予了与列宁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列宁那里，“民主集中制”指的是由一小部分职业精英分子的党来产生一致意见的过程，而在毛泽东这里，“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在一个群众性的党中，在作出决议之前经过公开讨论，听取各种意见之后形成一致。毛泽东关

于“民主集中制”的定义实质上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民主。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中国经验的某些方面，与布尔什维克中国化的模式有分歧。但只是到1935年，他才开始表述这些思想，为毛泽东主义的思想体系奠定基础。决裂时期的主要著作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问题》（*Strategic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eriod of Resistance to Japan*）（1937年3月），《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只有在毛泽东已经完全使自己脱离苏维埃的中国化之后，他才自由地撰写他自己的哲学著作。论文《实践论》出版于1937年7月，《矛盾论》出版于1937年8月，而《论辩证唯物主义》出版于1938年4月，虽然它是1937年的一篇演说。

在决裂时期的著作中，毛泽东特别陈述了苏维埃模式不适合于中国的观点，在1935年，他写道，“如果说，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三个年头里完结了的话，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过去已经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而要最后地彻底地解决内外反革命势力，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88]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人被迫与蒋介石和日本人开展的那种战争，主要地造成了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中国化的突破。中国军事上的独特性，毛泽东的完全不同于托洛茨基的红军战略的游击战的创造，是对苏维埃模式的最初的穿刺。毛泽东自己在1936年12月，在他的论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承认了这种破裂。^[89]

第一个裂口一旦形成，^[90]反驳苏维埃模式的过程便一浪接一浪地扩展开来。除军事上的破裂之外，毛泽东取代苏维埃模式还有三个主要的领域；（1）夺取政权的革命手段；（2）共产党人胜利后出现的国家的性质；（3）在中国将要建立的经济秩序的性质。在三本不同的笔记中，即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

读书笔记》(Reading Notes on the Soviet Text Political Economy) (1961-1962年),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Concerning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1958年)和《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Critique of Stalin's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1958年) (后来都以《苏联经济学评论》(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的书名出版)中,毛泽东提出了勾画向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过渡的非常具体的设想。对整个过渡的末尾,毛泽东提出了另一种共产主义模式。从摒弃俄国内战的布尔什维克战争模式开始,毛泽东趋向于提出一种民族形式的共产主义。这正如铁托(Tito)那样,是一种后来与布尔什维克模式竞争和挑战的模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谈不到什么共产主义的坚如磐石的东西,毋宁说必然是在共产主义建设的各种不同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多样性不仅涉及获得政权的途径,而且涉及将要建设的社会形态,铁托与毛泽东破坏了布尔什维克在共产主义世界内的霸权要求,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中引进了选择的余地。

使得毛泽东关于跟苏联国内战争相矛盾的中国军事战略独特性的思想得以定形的事件,是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随后日本在中国大陆的继续扩张。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1]并接着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92]正是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领导了对王明和“回国留学生”的一场思想攻击,这是他赢得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的努力的一部分。毛泽东把他反对附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回国留学生”的思想斗争,建立在中国不同于布尔什维克模式的台基上,而他在党内获得领导权的机会则依靠他的解释的正确性。于是,瓦窑堡会议,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对王明的胜利,而且开始了毛泽东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上的明确表达。与布尔什

维主义决裂的文献，从瓦窑堡会议时开始。的确，决裂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看到日本的侵略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军事形势，并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第一次提到“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93]由于意识到“持久”战，毛泽东便把握了他的游击战争战略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日本的侵略向毛泽东证明了，需要把基于阶级斗争的战争转移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转移到基于统一战线政策的斗争。统一战线的号召也是第一次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即瓦窑堡会议的演说中作出的。当毛泽东在1935年12月第一次发出统一战线的号召时，他更多的是向民族资产阶级而不是向蒋介石呼吁。只是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拘留，被迫与中国共产党人组成统一战线，国民党与毛泽东之间才暂时结成一种联合。^[94]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与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战争，是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极不相同的。在1935年的战略变化中，毛泽东以民族统一的概念代替阶级斗争的概念。而且，毛泽东的战略变化证明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了民族主义的旗帜，毛泽东在1949年的胜利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为共产主义运动夺取了民族主义的口号。

放弃阶级斗争的观念，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与资产阶级力量结成联盟的政策。起初，毛泽东想从他的统一战线中排除买办和封建地主阶级，但当他与国民党通力合作时，表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1935年，当毛泽东第一次宣布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时，他把统一战线确定为包括“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分子。”^[95]两年之后，1937年，毛泽东与国民党联合时，在他的论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他进一步确定了“停止武力推翻国民

党的方针。”^[96]由于他以社会和平的政策代替了阶级斗争的政策，他便不得不宣布土地革命的结束。由于他一旦与国民党联合，也就是跟中国资产阶级的各种成分结成了联盟，毛泽东就不得不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97]毛泽东仍然把中国的革命称作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他已经把它基本上变成了夺取自由主义的政治自由。他要求一种多党选举制度，召集国民大会起草一部民主宪法，实行议会制度和大量的“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98]

统一战线的战略不仅表明了从土地革命到自由主义的政治改良的变化，而且表明了毛泽东为中国预想的那种国家形式的变化。在江西苏维埃时期，毛泽东曾谈到苏维埃国家形式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政权”。但由于统一战线政策，他认为适合于领导中国完成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形式，不是“人民共和国”。^[99]但是，他使用过“工农武装割据的政权”的术语，并且意识到抛弃这个术语对于党的历史影响重大，它可能被看作是对江西革命时期的否定。在论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毫不回避这个问题，并问道：“我们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否错了呢？”^[100]毛泽东回答说，没有错的，但在当前这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为实现自由主义的政治改良，“人民共和国”还是合适的国家形式。适合于阶级革命的国家形式的时期结束了，而适合于民族联合政策的自由立宪的国家形式的时期出现了。毛泽东对于为民族联合政策应付的代价并不讳言：“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准备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建设过程中，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101]

此外，“人民共和国”不但在政治的意义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而且“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也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决不

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但他们还必须认识到，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102]其实，为了消除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的恐惧，毛泽东否认江西苏维埃时期打算消灭资本主义。“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103]

事实上，为了替他的“人民共和国”找到历史的先例，毛泽东回到了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104]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提倡福利的资本主义。三项原则要求一种民主的议会制，合法地补救无地农民的问题，以及银行和其他主要工业的国有化。在实行中国经济的最高控制的国有化的同时，三民主义允许中国经济的重大中心保持资本主义。三民主义能够充实毛泽东的新国家形式的内容，他按照民粹主义的方式称这种形式为“人民共和国”。它是福利的资本主义，是符合“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和统一战线需要的国家和政治的形式。

而且，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在统一战线的纲领中所规定的他的夺取政权的革命手段，是与列宁在俄国夺取政权的手段完全不同的。在1917年，列宁选择了阶级斗争的路线。在1917年，列宁就已指出，开始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结束了，因此俄国可以开始社会主义阶段。此外，1917年列宁还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并且要求苏维埃建立工农专政。列宁的模式是革命的大变动的模式。1935年的统一战线之后，毛泽东意识到他夺取政权的革命手段在三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列宁的手段：（1）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2）关于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

(3) 关于资产阶级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之间的关系。下面我对这三个方面逐一加以讨论。

1. 无产阶级领导权

对于布尔什维克思想来说，不论是列宁主义或是斯大林主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概念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领导的思想。因为统一战线是中国社会中希望与日本作战的所有阶级的一个“集团”，又因为“人民共和国”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所以不可能设想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在他的论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把问题提为“我们的领导责任”。^[105]当他写道，中国共产党必须认识“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106]这样他就很快地称赞了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表述的党的概念。但当要确切说明无产阶级能够履行什么样的领导时，毛泽东就变为大谈“口号”和“榜样”了。树立道德榜样的思想，与列宁主义的政治权力的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2. 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

列宁在谈到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时，他总是设想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工农联盟。正是在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列宁创造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术语，来把握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布尔什维克称中国的苏维埃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以便再次示意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中国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具有领导资格。但是，一旦毛泽东放弃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领导的思想，他随着也就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由无产阶级指导的思想。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由无产阶级指

导，毛泽东就需要说明它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指导，毛泽东就还需要说明它如何可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谈论这些问题时把资产阶级革命划分为三类：（1）古典式；（2）布尔什维克式；（3）中国式。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古典的 18 和 19 世纪的欧洲形式。古典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形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创立了资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由无产阶级指导的革命，所以没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并且很快地（从 1905 年到 1917 年只隔 12 年）转向了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于古典的和布尔什维克的形式。他承认江西苏维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外，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权，就不能追随布尔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因而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在中国就比在俄国要更为持久。最后，他论证了中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古典的 18 和 19 世纪欧洲模式也不一致，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会使它不可能那样。

但是，如果统一战线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形式，既不同于古典的又不同于布尔什维克的类型，那么它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它是适合于中国条件的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将朝向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为了追溯毛泽东的论证，就有必要转向第三点，即资产阶级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之间的关系。

3. 资产阶级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之间的关系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把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开来的历史事件，是 1917 年的俄国革命。

布尔什维克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带进了历史舞台，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说，不硬化为一种资产阶级专政，而成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引入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可能的了。中国的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革命，尽管由于抗日战争，它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必定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但由于它能使自己与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反帝革命的时代结合起来，它就有着社会主义的前途。

实际上，毛泽东把一个新的概念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没有评论该概念的有效性，而确实引入了一种思想，即资产阶级革命，即使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的基础上，是可以朝向社会主义的。但这种革命连续性、这种作为过程的革命的意义，又提出了其他问题迫使毛泽东加以说明才能自圆其说。毛泽东必须说明他的“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107]的概念在什么地方不同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毛泽东试图作出这种区别，他分析了三个主要因素：他的“革命转变论”的概念不同于“不断革命”，因为他的概念是包括资产阶级因素的一种持久的转变，不使用阶级暴力。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向社会主义转变，都是在一种民主共和国的宪法形式内，分几个阶段逐渐展开。“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108]其次，这种转变会不包含暴力：“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109]毛泽东不想吓唬那些可能与共产党结成联盟的资产阶级分子。^[110]

正如毛泽东创造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定义，他也发明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即“人民共和国”，通过这种形式，会发生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40年代有四篇主要论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

月),《新民主主义的宪政》(“New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1940年2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在这些论文中,毛泽东讨论和确定了这种资产阶级革命形式的特殊国家的问题。^[11]比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把不同的国家制度区分为三类:“(1)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2)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3)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12]毛泽东把第一类看作“旧民主主义的国家”^[13],即19世纪西方古典资产阶级的形式。第二类,当然是苏联的国家形式。第三类即毛泽东的创造,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14]也就是中国。毛泽东把这种新的国家形式称为“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5]毛泽东接着把这种新的国家形式描述为“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16]在下一个个月,即1940年2月的论文《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毛泽东又把统一战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称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17]

总之,毛泽东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是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理论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概念。但是毛泽东一旦放弃了这个概念,就无法挽回了,因为毛泽东在胜利之后,从来不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来统治中国。因此,在毛泽东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在江西苏维埃时期,是与中国无关的。

而且,即使在1935~1937年的破裂时期,毛泽东与苏维埃模式的决裂,也是由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所中介的。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是他与苏维埃模式决裂的一个原因,因为民粹主义引导他反对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党的概念。毛泽东是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初次转向农民群众,当时共产党人正在领导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农民群众被卷入一场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成分的内战中,然后毛泽东又在统一战线时期转向农

民和群众。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所寻求的群众支持，不是被引向阶级斗争，而是反对帝国主义。他所希望的群众支持，是要把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在统一战线时期，毛泽东以一种雅各宾派（Jacobin）的姿态出现。他试图组织一场抵抗日本的群众性的民主战争。这是一种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融合，很像雅各宾派的“全民入伍”（‘leve’e en masse’），并且成功了。他在1937年3月所写的论文《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就是他的民粹主义的一个明证。而且，毛泽东的民粹主义使他反对优秀分子的共产党这一列宁主义模式，而赞成一种能够“争取群众”的党。^[118]其实是在破裂的时期，毛泽东创造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因为他感到需要“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119]此外，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方针也引导他反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尽管毛泽东继续使用这个术语，但“民主集中制”术语的出现，显然只是忠实于苏联的一种仪式上的表示，因为他实际上完全重新定义了这个概念。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清楚地显示了这个重新定义的过程。^[120]

列宁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术语，是把它看作在党的“总参谋部”，即无产阶级先进意识之所在的内部发生的过程。毛泽东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术语，则涉及解放过程中群众的参与，涉及在群众内部创造对他们自身自我一解放所需要的自觉活动。在列宁那里，“民主集中制”把解放的意识想象为杰出人物的特权；而在毛泽东那里，“民主集中制”则是为了在群众中激发自我一解放的意识，使群众卷入政治斗争的艺术。

在毛泽东与布尔什维克模式决裂阶段，他归结在五个主要之点上与布尔什维主义相对立；决裂阶段也就是毛泽东主义的创立阶段，就是毛泽东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使之形成适合于中国环

境的理论与实践的阶段。决裂的五个方面是：^[121]（1）一种中国化的军事战略；（2）对于获得政权手段的一种中国化的认识；（3）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一种中国化的认识；（4）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家的一种中国化的定义；（5）关于党和民主集中制的一种中国化的定义。这五个决裂的方面构成了大家熟悉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本核心。为了完成毛泽东思想的所有方面，只需要补充一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和《评苏联经济学》中所表述的与苏联经济模式的决裂就可以了。因此，当毛泽东突破布尔什维克中国化^[122]的基准时，毛泽东思想体系也就出现了。毛泽东并不是发动而是继续中国化的过程，一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清扫掉那些妨碍达到符合中国条件的确切理论的布尔什维克因素，他便跳出布尔什维主义。

因此，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话，并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乃是开始于三年前的过程的顶点了。他在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所说的东西，只不过是自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以来运用于中国环境的一种理论的实践的明确表述。在1935年他所意识到的东西，在1938年他使之成了党的意识形态。

（二）决裂的理论化：1937-1938年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化的布尔什维主义决裂的实践—政治因素的讨论。我将转向对毛泽东脱离苏维埃模式的分析的第二部分，即研究毛泽东如何对他与中国化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裂加以理论化。最好是通过首先研究毛泽东在1937年详尽阐述的社会分析方法，来描述毛泽东如何对他的实践—政治活动进行抽象。毛泽东一贯特别强调需要一种理论来作为社会行动的适当基础，因此他也特别强调需要一种适当的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毛泽东从方法出发到理论，再到实践。他的分析社会

一政治形势的方法，为建构一种关于具体形势的理论，并由这种理论建构一种适当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材料，这种分析方法是有效行动的一个必要前提。毛泽东的方法是为了把握社会差别的目的而建构的。毛泽东的方法的概念规程结构，便于产生一种历史独特性的认识。

毛泽东的社会分析方法是辩证的，因为矛盾的概念形成了毛泽东的探究方法的核心。论文《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是毛泽东对他的社会分析方法的最好描述。《矛盾论》是关于矛盾形式的一种详细的哲学讲解，但毛泽东早在1935年就已经把矛盾的概念作为一种政治分析的工具来运用。在毛泽东的1935年12月的论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他谈到不统一的国民党，提到“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缺口”或“矛盾”。在他1936年12月的论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又说到“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125]在方法论的领域也是如此，毛泽东从他在某种具体形势下的政治活动出发，达到了他的方法论原则。由于毛泽东从事政治活动，他感到需要使他的行动有效验，因此他设计了一种社会探究的方法，作为创造对政治形势的理论占用的第一步。

在这方面，毛泽东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熟练的列宁主义者，因为通观他的著作，他反复使用了列宁主义的术语，即马克思主义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毛泽东发展了一种方法论，使他能够洞察具体情况的本质。矛盾的观念是毛泽东透视具体情况的主要工具。另外，毛泽东遵循了列宁主义的政治居于首位的原则。毛泽东从斗争开始，前进到革命的理论，方法则在斗争与革命理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毛泽东还遵循了列宁主义的原则：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就没有适当的革命实践。在列宁看来，理论先于行动。像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懂得，在有效行动之前必须建

立一种适当的革命理论，政治意识是意识的最高级形式。理论必须是政治意识的一部分：就是说，理论必须反映一个社会的权力关系。只有反映一个社会的权力关系的理论才是解放的，因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够改变那些权力关系。

《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历史分析方法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在往后的篇幅中我将全面讨论这篇论文，但在这里只需指出，毛泽东在论文中把矛盾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他称它们为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矛盾的普遍性，毛泽东提出了一种本体论的主张；他断言矛盾，或对立面的统一，是物质的和社会的实在的根本原则。^[126]矛盾的特殊性，涉及矛盾的本体论原则的实现过程：普遍性只有在特殊性中才能呈现出可感觉的形式。^[127]由于矛盾的特殊性是作为一个本体论原则的矛盾的可感觉的形式，因而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便是矛盾特殊性的各种样式或各个阶段。^[128]比如，由于矛盾是一个本体论的原则，它必定在历史领域表现它自身，它必定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形式。在 20 世纪，矛盾的特殊性呈现为帝国主义的形式，呈现为亚洲殖民地国家与欧洲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冲突。中国在 20 世纪，矛盾的特殊性表现于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即表现为中国为摆脱所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而获得民族解放的斗争。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必须首先使中国人民摆脱欧洲和亚洲的干涉主义，因为在中国的一切其他改革，都取决于清除对中国的一切外来干涉。

因为他需要一种理论来使他的实践合理化，因为他已经在具体工作中做了后来在理论上占用的东西，所以，在 1937 年 5 月的论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已经使用了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概念。毛泽东的论文以一种公式的方法论陈述开始，他将它运用于考察中国 1937 年 5 月具体政治形势：“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

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129〕}毛泽东指出，在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之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国内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国现存封建结构之间的冲突。由于主要矛盾是使资产阶级革命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矛盾的主要方面就集中在江西苏维埃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阶级斗争。由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国内的阶级斗争，对于这种斗争的适当反应，就是寻求推翻国民党的革命。

日本的侵略完全改变了中国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现在出现为外国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之间的斗争。在这种主要矛盾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日本对中国土地的征服。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包含中国共产党与封建主义之间的国内阶级斗争。而是中国人反对日本人的民族斗争。因为主要矛盾从内部转向外部，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从内部阶级斗争转向两个民族之间的外部斗争。在这种环境下，在矛盾主要方面的这种特殊形式下，适当的反应就是通过与国民党的联盟把日本征服者驱逐出去。

当毛泽东作他的三篇哲学论文《论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时，他已经达到了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而继续为这种政治上的中国化提供哲学基础。而且在延安从1937年开始，毛泽东就着手一项文化革命。毛泽东谋求把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强加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看得清楚，一场群众革命运动要求一部完整的思想机器，而哲学必须是这部机器的一部分。延安时期表明了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自觉意图。在毛泽东的论文《〈共产党人〉发刊词》（‘Introducing the Communist’）中，他反复要求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想把布尔什维克模式强加于中国共产党。当他要求“布尔什维克化”时，意在说明中国共产党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一个必须有思想的内在一致性的阶段。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被“布尔什维克化”的意义，就在于它由毛泽东提供了一种内在一致的世界观。我将首先讨论毛泽东的哲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然后讨论认识论方面。

毛泽东的论文《论辩证唯物主义》^[130]包含着他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大量思考。在这篇论文中，毛泽东以一个哲学实在论者出现。他主张，“一句话，物质是世界的一切。‘一切归于司马懿’。我们说，一切力量属于物质。这就是世界统一性的根源。”^[131]毛泽东不但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者，而且他主张辩证法存在于物质本身。毛泽东反对机械唯物主义，赞成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已经看到，布尔什维克机械唯物主义者主张物质运动的原因是外在于物质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回到17世纪的笛卡尔主义。但是，毛泽东认为辩证法的观点在于“承认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物质的一种固有的属性，物质多样性的一种表现。”^[132]毛泽东把哲学实在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结合起来。^[133]

毛泽东既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按照辩证法的模式，毛泽东遵循恩格斯把哲学史划分为唯心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的传统。唯心主义者认为物质依赖于精神，而唯物主义者则认为物质独立于精神而存在。此外，当毛泽东按照辩证法的模式写作时，他也继承恩格斯的传统，用物质及其运动来说明宇宙的过程。在形而上学的层次上，毛泽东的唯物主义表现为绝对实在论。

像恩格斯那样，毛泽东也觉得辩证法存在于物质之中。像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那样，毛泽东也设想辩证法存在于自然之中。不过，像列宁那样，毛泽东也把辩证法规律的数目简化为一个，即矛盾的规律，或对立统一规律的规律。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最初谈到两个辩证法的规律，即否定之否定和从量到质的运动。只是在他的著作《自然辩证法》的概要中，恩格斯才补充了第三个辩证法规律，即对立统一，或矛盾。然而，在列宁

于1914~1916年写作他的《哲学笔记》时，他并不知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书在苏联是1925年，即列宁去世后大约一年才出版的。列宁知道《反杜林论》，知道恩格斯断言两个辩证法的规律在自然中起作用，但他却偏爱谈论一个辩证法原则，即矛盾或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规律把所有其他辩证法的原则包摄于自身。毛泽东在这方面追随列宁，也把矛盾看作基本的辩证法原则。有趣的是，在《自然辩证法》（毛泽东在1937年不知道这本书）中，恩格斯本人却是把否定之否定规律看作概括所有其他规律的辩证法规律。毛泽东在他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Talk on Questions of Philosophy’）中，显然与恩格斯的观点不一致：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与质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134]

尽管毛泽东在哪个辩证法规律居首位的问题上与恩格斯有分歧，但在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在反映论、存在一意识问题，以及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相联系等方面，毛泽东与恩格斯是一致的。对于毛泽东，跟对于恩格斯来说一样，头脑按照辩证法的方式思考，因为头脑反映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中的客观辩证法。外部的客观世界先于主观世界；意识反映外部实在。^[135]

毛泽东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分割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古典经验主义传统之内。毛泽东从康德的框架出发，主张是外部的东

西缝合了主观与客观的裂痕，因为外部的东西反映在人脑中，他试图以此克服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分裂。其实，毛泽东甚至把大脑确定为自身就是运动中的物质。在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对于毛泽东来说，物质的运动不但能说明宇宙的发展，而且能说明有机的和社会的世界。除了否认恩格斯的辩证法的三个原则，而赞成辩证法的一元论观点，认为辩证法体现为一个规律即矛盾规律之外，毛泽东接受了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所有主要概念。

毛泽东接受了古典唯物主义划分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模式，这也表现在他对存在和意识问题的讨论中。在毛泽东看来，是外部世界的印记，通过感觉印象的方式，使观念得以产生。毛泽东设想存在先于意识，他继承了由休谟和洛克明确表述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主张思想起源于感性知觉的观点。毛泽东还坚持真理的符合论。^[136]

显然，毛泽东知道在苏联发生过的德波林、机械论者和米丁的正统派之间的哲学论战。正如斯大林在俄国把哲学的正统性带到布尔什维克党内，毛泽东也在延安试图把哲学的正统性带到中国共产党内。延安的文化革命，就是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一种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尝试。这是一场政治的干预，一种创立政治—官方文化的尝试。在这种党的正统性的创建中，毛泽东看到了知识与哲学二者都是阶级的武器。作为一种变化的哲学，唯物主义必定是革命阶级的哲学。

在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层次上，毛泽东继承了从恩格斯到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到米丁所延续的思想路线。虽然在关于毛泽东的形而上学的这种讨论中，我把毛泽东与恩格斯放在了一起，但我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启发读者的联想，因为我想强调一种特定类型的辩证法思想的延续性。我并不认为在文献或时间的意义上，恩格斯对毛泽东有密切的或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是从米丁那里学习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

我在本章的较前面的部分已经指出，艾思奇把米丁1933年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译成中文，收入一本称为《哲学著作选》的选集中。此外，米丁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所写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详尽分析，艾思奇也作了翻译，并以《新哲学概论》为书名，于1936年在中国出版。在形而上学的层次上，毛泽东大都受惠于米丁的这两部著作。在机械论者与德波林学派的论战中，作为正统中心的代表人物，米丁把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正统的解释传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形而上学复制了在20年代的哲学斗争中布尔什维克正统的形而上学。这种布尔什维主义的遗产成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毛泽东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关系是复杂的，在某些方面，如在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毛泽东继承了布尔什维克的遗产，没有突破苏维埃的模式。

由于毛泽东追随米丁，所以他的形而上学是非机械论的，而且在这方面，毛泽东与恩格斯对机械唯物主义的谴责是一致的。此外，显然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他在斯大林反对德波林的斗争中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在讨论辩证唯物主义时，毛泽东也把德波林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来谴责。德波林否认辩证法是自然所固有的，而声称物质成为辩证的只有在它最初存在之后。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斯大林没有其他的支持来源。在苏维埃俄国猛烈开展的哲学论战中，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有力支持，是毛泽东继续获得苏联援助所付出的一种代价。不过，由于跟随米丁和正统派，毛泽东确实割断了德波林主义和机械主义的联系。

而且，当毛泽东写作《论辩证唯物主义》时，他熟悉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这些篇章以《黑格尔的论理学大

纲》为题，在中国翻译并出版于1936年。在这些哲学摘要中，列宁主张辩证法的本体论可以概括为矛盾或对立统一的规律，所有其他的辩证法规律可以纳入范围极广的矛盾规律之下。毛泽东在这方面追随列宁。其实，我已在前面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早在1930年就译成了中文，无疑地毛泽东是熟悉那本著作的。但是毛泽东没有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书到1940年才译成中文，因此，在1937年毛泽东不知道恩格斯所说的辩证法前三个规律。然而，毛泽东所作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是在1964年8月18日，其中他攻击恩格斯的三个辩证法规律是三元论，显然那时他已读过《自然辩证法》。但是，在1937年，在阅读《反杜林论》的基础上，毛泽东知道恩格斯的辩证法的两个规律，即从量变到质变和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却不谈辩证法的两个规律，而是遵循列宁主义的公式，只讲一个概括性的辩证法规律，即对立面的统一。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即阴与阳相冲突的思想，可能影响了毛泽东对辩证法原则的选择。

恩格斯的传统继续活在毛泽东那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事实上，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划分。当毛泽东推进基本上由恩格斯定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时，在形而上学的层次上，他把恩格斯的传统植入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是恩格斯的形而上学。此外，当毛泽东作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分时，他也是在追随一种自恩格斯开始而由普列汉诺夫更充分表述的传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一种形而上学和一种社会分析的方法，这也是恩格斯的一项遗产。

虽然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方面表现出他缺乏独创性，但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却的确表现出了独创性。当毛泽东涉及到人的干预问题和对实在的恰当理论占用所必需的社会探究方

法时，显示出了两种倾向：（1）毛泽东的论文《实践论》，确切地读来，就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一种直接的复述，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概述的批判唯物主义的一种继续；（2）毛泽东的社会探究方法使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永恒化。在这两个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层次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决裂了。尽管毛泽东只是重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实践的主要前提，但他重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干预的高度重视，使他与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强调历史中客观的、非转化的力量的观点相分离。此外，毛泽东从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学习了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武装了他用一种辩证的方式解释历史的运动，而与技术决定论的解释相对立。当毛泽东把历史看作一种对立统一的冲突时，他对历史的看法，所产生的结果，便与通过决定论和机械论的范式看待历史不同了。因而毛泽东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拒绝了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

在继续讨论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前，有个问题需要澄清。在讨论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时，若提出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或与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相比较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不恰当的。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域，列宁与米丁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讨论所集中的时期是直到1931年，而不超越到机械唯物主义的胜利阶段），所以，在涉及形而上学时，简单地提布尔什维主义是合适的。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层次上，却并不存在同样的一致观点。在关于“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就社会分析方法而言，列宁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所以，当讲到主观性和社会分析的问题时，把布尔什维主义划分为两部分是恰当的：（1）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或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2）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由于

我已经把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分为两部分，即人的干预问题和社会分析方法或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下面我就首先谈人的干预问题，并讨论毛泽东的论文《实践论》。

妨碍准确理解毛泽东的《实践论》的问题之一，产生于毛泽东在文中使用的“实践”一语有四种不同的含义。由于本人不懂中文，所以不能确定英语的“Practice”一词，是不是那个中文词的准确翻译，但它表现出四种不同的含义，这却是个意义问题。下面我就来说明“实践”一词所使用的四种方式。

一是毛泽东用它指感性知觉。“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137]毛泽东相信人所固有的社会性，即我在讨论马克思时所说的社会先验。人在从事他的“社会实践”、基本地是他的经济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从外部世界获得感觉印象。当毛泽东把“实践”用作感觉印象时，他只不过是重述了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中提出的古典经验主义的模式。在认知的层次上，有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划分，存在优先于思维，而思维是由感性知觉开始的。

二是毛泽东用“实践”一词去指一种改变意识的过程，或一种新的认识作为一种认识被接受的过程：“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才能间接地‘知天下事’。”^[138]毛泽东认为单纯在理智呼吁或道德呼吁的基础上不可能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变化只能从积极的社会参与中发生。毛泽东反对唯心主义的概念认为思想本身产生认识的变化，而看到教育过程与参与社会过程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

三是毛泽东使用“实践”一语，意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

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139]毛泽东像约翰·杜威（John Dewey）（杜威 20 年代在中国有过广大读者）那样认为，如果某种陈述应用于实在，并产生了预想的结果，那么它就是真实的。毛泽东以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证了能使人的思想与客观世界相符合。其实，在客观世界发现的规律，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就反映在人的头脑中。

四是毛泽东也使用“实践”的术语指 Praxis，即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活动的意义。“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140]在毛泽东看来，认识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在毛泽东看来，获得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的人，是一种积极的存在，而且凭着对这些规律的掌握，他能够干预和指导自然和社会中的事件。

如果我们记住这些差别，我们就能较好地洞察《实践论》的意义。它不仅应当被看作是对认识起源的讨论（实践作为感性知觉），或者是一种建立真理的方法（实践作为实用主义），而且应当被看作是引起变化的认识目的的讨论（实践作为 Praxis）。《实践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 11 条的推论。该书确证了毛泽东的看法是：认识必然是实践—批判的，就是说，认识必然是对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一种干预。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141]在马克思看来，认识的圆圈运动，必须作为对自然和社会世界的主观干预，才能实现它自身。但圆圈开始于“实践”，即第一层次的实践—感性知觉。这是认知的层次，即存在—思维关系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中客观性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把感性知觉发送到人的大脑。“实践 1”在这些

生产和阶级活动过程中，从非转化的世界达到人。

但是在认知的层次上，“实践1”是个初始的、弥散的感性知觉领域。这种缺乏联系的感性印象还没有被集合进任何概念的框架。“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142]经验主义的错误是不打算综合这些初始的感性知觉群。而按照毛泽东的“认识论的辩证法”，^[143]则要求这样一种综合，因而感性知觉就在“理性阶段”^[144]被形成为概念。为了“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145]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理性，就是心灵综合感性知觉的能力。

理论是与理性的组织能力相联系的：“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46]所谓本质，毛泽东是指使一组特殊的东西结合起来的共同特性。毛泽东完全是照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方式使用本质这一术语。本质，对于列宁和毛泽东来说，都是把在其他方面无联系的因素结合起来的相似特征。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一种正确的理论是对行动的必不可少的指导。在这方面，毛泽东也是地道的列宁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147]毛泽东的《实践论》不是一种纯粹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的陈述。当然，它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因素。《实践论》表述的是对世界的理论占用的需要。改变实在的尝试，“实践—批判的活动”，是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理论的层次上，毛泽东从存在—思维的范式转到了概念—实存的范式。概念一旦形成，理论就改变实在。在这一方面，毛泽东与马克思完全一致。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来说，在存在

—思维的层次上，思维是从感性知觉开始的。然而，在概念—实存的层次上，思维就成为一种构成的力量。毛泽东持相同的意见，认为理论是一种概念，理论改变实存。

正是在理论的层次上，才调动了“实践2”和“实践3”；“实践2”，概括地说，是指一种新认识作为一种认识被接受的过程。一种新理论不单纯以唯心主义的、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t）的形式被接受。无论何人，要想了解一种新的理论结构，就必须使自己在生产和阶级活动中熟习它。去认识并不单纯是一种理智的训练，而且是态度、感情的和心理上的训练。“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148]

“实践3”，要唤起我们的记忆，是对真理的实用主义的检验。在理论能够转变为实践之前，必须确定它们是不是真实的。只有一种真实的理论才能起构成实践的作用。^[149]

实用的层次即“实践3”，是学习的领域。在这样一个领域，人们自己学会如何达到对世界的正确的理论占用。后面我们将看到，毛泽东写了好几篇文章，来讨论人们应当如何学习。在毛泽东看来，学习，就意味着改变意识：学习是改变意识的一个早期步骤，或者说是世界的理论占用。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所从事的不是一次而是几次革命：反对日本，反对蒋介石，反对苏维埃模式，反对古代孔夫子文化。按照孔夫子的教学法，一个人通过他的内省开始改变个性和他的行为。借助于强调“实践3”和“实践2”，毛泽东驳斥了孔夫子的意识先于存在的传统，而代之以存在或社会先验先于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毛泽东懂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使意识脱离社会先验是不可能的。

正是在理论的层次上，认识的正当结局和目的显示出来了。认识不是单纯的冥思，它也不是孔子式的为了自我修养。在实践—理论—实践的圆圈中，理论的目的是为行动作准备。在整个

《实践论》中毛泽东重复着这个主题：“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150]同时，改造的概念不限于社会的世界，而且包括自身的改造：“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151]最后，人的转化力量也与物质世界方面相关，因为人也能改造自然：人们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面临着困难，“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152]

理论所要变革的目标，在所有的领域，即自然、社会、自我等领域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的领域。毛泽东显示出他的列宁主义，不但在于相信理论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于他相信政治意识是意识的最高形式。毛泽东和列宁所说的政治意识都是指对一个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认识。“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53]的确，毛泽东断言理论之能成为理论，只有当它“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154]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认识的圆圈，以实践，或“实践4”，或 Praxis 结束。当作为人的干预的结果，物质或社会的外在性得到了改造，理论也就实现了它自身，完成了它的目的。实际上，认识的圆圈，只有在 Praxis 出现时才完成。没有 Praxis，认识的圆圈就会夭折。显然，“实践4”中的实践概念与“实践1”中的实践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把《实践论》单纯当做一种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的陈述来阅读，就会误解原稿的锋芒所向。^[155] Praxis，即人类活动的变更力量，造成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156]

阅读《实践论》的正确方式，是把它看作对社会活动的一种解说。我想，标题《实践论》应假定改为“关于人类社会活动层

次的论述”，或者“对 Praxis 的一种解说。”尽管要确切地弄清毛泽东什么时候读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不可能的，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方案，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达到的唯物主义定义与人的干预概念相结合的方案乃是完全相似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 11 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蕴含在毛泽东关于“Praxis”（“实践 4”）的阐述和他所说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之中。根据它们文字上的相似，可以肯定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之前，确实知道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像我在前面指出的，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分为关于人的行动的阐述和社会探究的阐述。当毛泽东思索关于人的行动时，他突破了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中所描述的唯物主义。《实践论》的唯物主义，或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以“实践—批判活动”为前提的。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中，唯物主义的模式是形而上学的、演绎的。在《实践论》中，唯物主义的模式是实践（Praxis），唯物主义指向改变世界。《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实践论》的唯物主义难以接合，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表现不一贯，这种事实不会造成什么困难。

本章所依据的事实就是毛泽东不是一个有体系的哲学家。人们读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难以发现一个连贯的体系。难以接合这种情况表明，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论证了他的思想的一个不同的方面，这个方面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还原的唯物主义是相矛盾的。

这种唯物主义使毛泽东离开恩格斯，而与马克思、列宁相统一。黑格尔对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没有直接的影响，他只是间接地到达毛泽东，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出现于列宁的著作中。毛泽东的实践概念使他与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相联系。在列宁的《谈谈辩

证法问题》、《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和《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也强调了实践的主题。在对黑格尔的这些评论中，列宁突破了还原的唯物主义，重新肯定了主观动因的变革力量。毛泽东确实知道列宁的这些著作，吸取了列宁思想中的“实践—批判活动”的主题，并且使之与他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发现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思想结合起来，由于这种综合便出现了一种典型的实践哲学。毛泽东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继续贯彻了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传统。

如果说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他的实践学说的绪论，那么，他的《矛盾论》就是他的社会分析方法的绪论。虽然《矛盾论》的开头部分，大都是重申包含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形而上学，但论文的主要部分还是阐述了进行社会探究的原则。因为就绝大部分而言，《矛盾论》开辟了社会方法论的新天地。列宁运用矛盾的思想，作为基本的范式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世界。毛泽东也以同样的方式运用矛盾的思想，但给它以新的内容，诸如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概念，因而使列宁的方法更为精炼了，使它成为描述各种历史状况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的较好的“地震仪”。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方面，毛泽东也是继续执行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

由于使矛盾观念成为他的社会分析方法的轴心，毛泽东便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的一切痕迹。可以把《矛盾论》看作奠定了中国化的社会科学的基础。在它的篇幅内，毛泽东拒绝了一切形式的历史决定论。显然毛泽东也拒绝一切直线发展的历史预示论，因为整个矛盾学说设想每个社会具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和它们演化的不同途径。《矛盾论》在如何贯彻列宁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上，是一部实践的指南或手册。

《矛盾论》的开头部分重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毛

泽东通过摘引他读过的列宁的哲学笔记，宣称矛盾的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毛泽东还重述了他的哲学唯物主义的-般原则，包括反映论，即认为自然和历史中的辩证法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在题为“两种宇宙观”的一节中，毛泽东把西方和东方的思想史，都解释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就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唯物主义而言，毛泽东把这种运动看作两个阶段，即笛卡尔、牛顿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论》的开头两节，大都来自米丁的著作，有两个目的：概括《论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并且确立矛盾普遍性的原则。只有在给予矛盾以普遍性的地位之后，毛泽东才能探讨“矛盾的特殊性”问题。⁽¹⁵⁷⁾因此，到第三节，即毛泽东开始讨论特殊的矛盾时，便出现了论文中从形而上学到方法的转折。《矛盾论》正是矛盾的形而上学原则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应用。列宁在毛泽东所读的哲学笔记中进行了同样的理论转变。

因为矛盾的普遍性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这种普遍性就只能在特殊的形式中变得明显起来。所谓“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是指普遍矛盾所呈现的具体的、可感觉到的形式。正是矛盾的特殊性，揭示出历史状况的独特的质和特性。毛泽东首先把矛盾特殊性的观念运用于自然领域。他从世界上运动着的物质是第一性的这个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假定开始：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

别。^[158]

把特殊矛盾的观念，从上段引文中设想的科学背景，移向历史的背景，毛泽东的社会分析方法的原则之一就清楚了。毛泽东关心的是质的差别。与机械主义者相反，毛泽东并不以为所有质的差别都能归结到量的增加或减少。这里需要多作一点引证。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159]

特殊矛盾的原则使毛泽东得以弄清包含在不同斗争形式中的不同的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和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斗争，有着质的区别。而且，“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斗争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的情况，也有着质的不同。换句话说，每一种矛盾都是一种特殊的类型，要了解那种矛盾，就要了解它的特殊类型，或它的质。

分析，或者理论，先于行动。只有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才能准备好对付这种矛盾的正确策略。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普遍公式的概念是不正确的。没有什么把握历史状况的普遍公式，也不存在什么应付一种形势的普遍公式。毛泽东是在抨击普遍范畴的原则，而当他驳斥一般的普遍范畴时，他也就摒弃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战略模式和布尔什维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在毛泽东与王明、与“回国留学生”的斗争中，他在方法论和策略方面都是反对他们的。《矛盾论》是那场斗争的一部分。毛泽东攻击“回国留学生”为教条主义者，根据是他们违背了列宁的对于各种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的原则：

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160]

此外，毛泽东还进一步提炼了矛盾特殊性的观念。^[161]在他看来，每种特殊矛盾都有两个方面。比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中，无产阶级是一个方面，资产阶级是另一个方面。要正确地估计一种历史形势，就必需对特殊矛盾的各个方面作出恰当的估价。一面是无产阶级的特殊状况，另一面则是资产阶级的特殊状况，不可偏废。毛泽东还使用了相互联系的辩证概念。只有把无产阶级的特殊方面与资产阶级的特殊方面相互联系起来，才能充分把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特殊矛盾。简言之，特殊矛盾的分析方法不能忽视矛盾两级的条件。

而且，一种特殊矛盾会经历各个阶段，必须按照它的阶段来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并进

而指出它经历了一系列阶段。要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矛盾，就有必要按它所处的特殊阶段（如在1911年、1927年或1935年）来把握。

在特殊性的概念下，毛泽东概括地谈到了四个因素：（1）质的差别；（2）特殊性的各个方面；（3）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4）矛盾的过程。在任何复杂的历史状况中，存在着许多特殊矛盾，在一个主要矛盾下面，还有许多从属的、次要的矛盾。但毛泽东已经区别了“矛盾的各个方面”或矛盾的两极，诸如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毛泽东关于特殊矛盾的讨论，还需要提出如何划分主要矛盾与从属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存在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着”^[162]从属或次要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从属的矛盾是封建阶级残余与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与富农，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确的革命策略就是要去调整主要矛盾。局限于攻克次要矛盾不会带来任何结构上的变化，因为主要矛盾将仍然存在。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有着类似的情形。主要方面规定和影响次要方面。在一段时间里，无产阶级的力量可能比较强大。在这里，正确的策略也是去调整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我们设想的是次要方面会进入适当的位置。重要的策略问题是造成结构上的变化，而这只能通过改变所有其他方面所依存的矛盾的方面，即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做到。

在确认需要识别总的矛盾和从属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后，毛泽东在第五节描述了矛盾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应该记得，毛泽东曾把矛盾特殊性的概念划分为四部分：（1）质的差别；（2）特殊性的各个方面；（3）各方面的相互联系；（4）矛盾的过程。于是，在第五节里，他回过来详细阐述他前面引进的论题，即第三题，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和第四题，矛盾的过程。

他运用对立统一的概念进一步阐明矛盾的两极之间的关系，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矛盾的过程。毛泽东在开始运用对立统一的概念分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时，他参考了列宁的哲学笔记。换句话说，毛泽东用来证实他运用同一性观念分析矛盾各方面和矛盾过程的文字根据，是列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把列宁在笔记中建立的方法，作为自己的社会学分析方法。毛泽东从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引证了以下段落：

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相互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163]

对立面的统一，运用于矛盾的各个方面时，就意味着对立的各方与另一方相互依赖因而相互同一。对立面的统一“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164]显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相互对立中是敌人，但同时它们是相互同一的，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内部特殊矛盾的两个方面。正如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既“对立”又“同一”的，因为既然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特殊矛盾的两方面的反映，它们就既相互斗争，同时也相互“同一”。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种差别中的统一是“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165]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进程证明了对立面的统一，无产阶级，以前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变成统治阶级、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资产阶级，以前矛盾的

主要方面，变成了被统治阶级，或矛盾的次要方面。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表现出同样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在中国的土地革命中，曾经是矛盾主要方面的地主阶级，失去了土地，把土地交给了现在成为矛盾主要方面的农民，地主阶级代替了农民作为矛盾的次要方面。

当毛泽东谈到他的特殊性概念的第四个因素，即矛盾过程的概念时，他再次引证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作为这方面讨论的开始：

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166]

从列宁的矛盾的本体论开始，毛泽东也假定了过程的本体论地位。如果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那么矛盾就会导致一切事物的运动或变化。“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167]在社会分析的方法论方面，矛盾过程的概念，意味着认识到矛盾的主要性质和首要方面必须改变。有时民族斗争必须优先于阶级斗争，而且有时必须求助于民族资产阶级，比如在统一战线时期，但在其他时期又必须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阶级敌人，比如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社会学的分析必须假定普遍矛盾和特殊矛盾的本体性，还必须假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历史性和条件性。

毛泽东的矛盾的本体论概念，不仅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而且在他的政治理论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如果矛盾是一个本体论范畴，那么政治社会就从来不能使自己摆脱阶级矛盾。这种见解是《矛盾论》第六节的主题，在这一节里

毛泽东确实把矛盾的概念运用到了政治领域。毛泽东又一次从列宁那里获得经典权威。他把列宁的以下论述看作他的国家分析的来源：“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168〕}

在毛泽东看来，矛盾必定存在于一切社会。但是，毛泽东像列宁那样，在对抗的与非对抗的矛盾之间，作了区分。对抗的矛盾，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将会消失。而非对抗的矛盾，没有陷入社会权力之争的人民之间的职能差异，则不会消灭。这种非对抗的矛盾的概念，成为毛泽东借以说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一般历史的立足点。毛泽东从来不当乌托邦主义的牺牲品。非对抗的矛盾必然永远存在的思想，使他不能相信救世主或千年幸福国度的未来。非对抗的矛盾永远不能从任何社会形态中消除的思想，使得毛泽东倾向于接受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论。由于从本体论上说，不可能消灭非对抗的矛盾，就有必要创立多种政治形式，以便这些矛盾、异议能够得以表现出来。

此外，由于坚持对矛盾的本体论解释，就必然导致毛泽东在历史过程方面采取某些主张。比如，毛泽东不能设想历史会停止，也不能设想那推动历史前进的对抗的或非对抗的矛盾会停止。因此，毛泽东从来不能设想，共产主义是人的最终状态。与对共产主义的任何太平盛世的解释相反，毛泽东并不把它看做一种一切人类的摩擦或忧虑都会消失的社会状态，而是把它看得比资本主义有极大的改进，并且是人类在时间的长河中继续旅行的一个阶段。

最后，矛盾的概念不仅决定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和历史的性质的思想，而且也决定了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性质的思想。毛泽东的政治理论概念主要是由矛盾概念决定的。毛泽东对政治理论领域最重要的涉猎是他的论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应当把这篇论文读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的一种推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表明了毛泽东突破布尔什维克模式的另一方面的根据是什么，指出了毛泽东与布尔什维克国家模式决裂的理由。毛泽东从来没有提倡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毛泽东期望于中国的是一种“几个革命阶段联合专政下的共和国”，或者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专政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于1917年，它充满着希望，即共产主义社会将表明一切社会冲突、对抗的和非对抗的矛盾的结束。在《国家与革命》中，共产主义被描绘为人类的最终状态，因为列宁甚至没有提到任何可能的接替。为了说明无矛盾的社会如何是可能的，列宁求助于B.F.斯金纳(Skinner)的《沃尔登第二》(Walden II) (Bu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年3月20日~)，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的有影响的代表。《沃尔登第二》是他于1948年发表的小说，描述了按他的社会学原则建立的乌托邦式社会中的生活——译者注)的主题，即有学问的应付办法会消灭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的原因。但是，在斯金纳谈到用行为心理学教会人合作的地方，列宁则以邮局的情况为例，说那里的工作将会程序化，变成单纯的簿记式，而且这就会用来消灭社会矛盾。从这种观点出发，无产阶级专政被看作是消灭一切矛盾的一个步骤。《国家与革命》还充满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偏见。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国家将会消亡。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完全突破了《国家与革命》的传统，以及由该书启发的一切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理论。毛泽东由于他的矛盾的本体论，他不能把共产主义描绘为没有非对抗的矛盾，并因而看作是历史的完成。所以，毛泽东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因为他没有想到要消灭一切形

式的矛盾。此外，毛泽东没有按照无政府主义来思考，没有想到一切矛盾消失时国家的最后完结。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没有国家的，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则有一个国家，其实是一个多元的国家。列宁的国家或者是一块阶级的磐石，即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在共产主义下它自己自行消亡。毛泽东的国家在共产主义下是一个多元的国家，因为对抗的矛盾会存在，表达这些矛盾的各个集团必定被允许存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一个例证。它为下一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留下了一种基础，一个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理论的纲要，这种理论是完全不同于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的。

就目的而不是就意义方面来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毛泽东的一篇论文颇为相似。列宁的1909年的著作和毛泽东的1937年的著作都是政治对哲学的干预，都是出于对政治运动加以系统的哲学化的需要，或者是使哲学适应于运动的政治需要。当列宁和毛泽东使哲学适应于运动的政治需要时，他们也就是在从事于创立一种官方的党文化或世界观的事业。

毛泽东的哲学论文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因为他得以指控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并夺得党的政治领导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1945年4月20日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esolution on Some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确认了毛泽东的支配地位。毛泽东在1942年2月8日所写《反对党八股》的论文中，表达了他对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的称赞。这本书通过创立官方的党史，带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推论。^[170]因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全适合于用来作为使毛泽东的支配地位合法化的宣言，并宣布他的一贯正确性和他对列宁、斯大林的继

承。^[171]况且，毛泽东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的尝试的确是成功的。

1927年，王明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两条路线——为中国共产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The Two Lines—A Struggle for the Further Bolshev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在这里他为中国提出了一种与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愿望更为相符的战略。^[172]尽管毛泽东拒绝了王明的战略，但他显然认为“布尔什维克化”是个有力量的口号，所以他进而悄悄地从王明那里夺取了这个口号。1939年10月4日，在他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道，党的刊物应当有它的目的，“帮助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73]尽管毛泽东使用了王明的术语，但他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但是，毛泽东这样做时也是经常使用布尔什维克的术语：他借用形式而改变内容。他这样做给人的印象是，他顺应布尔什维克模式，而同时又与这种模式决裂。他对苏联表示必要的尊敬，以报答第二次国内革命与蒋介石作战时期他们给予的军事和经济支援。比如，在毛泽东于1949年6月2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的论文中，“专政”一词的使用，就明显暗示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174]但是，仔细一读就知道，毛泽东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专政”，与布尔什维克的术语“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专政”，有很大的不同。布尔什维克专政是在政治权力的运用中排斥除无产阶级之外的一切人，毛泽东主义的专政则只是排除那些与国民党或日本人相勾结的人，而包括六亿其他人民。毛泽东的“专政”只排除中国人民中的极少数，而包括了绝大多数。此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还谈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175]但是，显然毛泽东不是在列宁主义的意义上去把“先锋队”理解为一个脱离群众的精英分子的党。实际上，

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自己的党的概念，是一种离开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能生存的机构。说“先锋队”，毛泽东只是意味着“先进的”，而绝没有脱离群众或贵族式的意思。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术语的应用，情况也是如此，他从中剥去了一切少数党的含义。正像毛泽东应用布尔什维克的词语“专政”、“先锋队”、“民主集中制”时，他给予了不同的含义，他的“布尔什维克化”一词也不意味着就是绝对服从莫斯科。

对毛泽东的思想讨论到了这一步，我觉得，停下来总结一下已经说过的东西是有好处的。我深入研究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我进而分析毛泽东的思想中的理论—实践，或意识问题之前，浓缩和提炼一下我已深入思考过的东西，会是有益的。

毛泽东也有自然哲学。在这方面他追随恩格斯和列宁，而背离了马克思。毛泽东从来没有描述一种系统的自然哲学，因为他无意于发展一种首尾一贯、包容一切的哲学体系。但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发现的迹象看来，他的自然哲学是一种物理学哲学和道家学说的混合物。我将在本章的后部分讨论毛泽东思想中的道家学说因素。这里我只需要指出，变化与过程构成了道学本体论的核心，而在道家的形而上学中，变化与过程又被表述为产生于阴与阳的矛盾力量。毛泽东的自然哲学是一种物理学哲学和道家的阴、阳概念，前者把对立面的统一想象为物质本身所固有的，而后者则在赫拉克利特的意义上看待流动，把它看作形成宇宙的本质。毛泽东的自然哲学是中国化的自然哲学，是古代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近代热力学的融合。

毛泽东也具有一种科学哲学，它符合于实用主义的模式。由于坚持真理的符合论，毛泽东从来没有放弃实在论的信念，即认为非转化的东西可以近似确定地被认识。毛泽东像列宁那样，坚持一种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他还像列宁那样，由于规定真理是

与对象相符合，并宣称外部世界是能够近似地被认识的，而没有超出西方经验主义的传统。毛泽东的科学哲学是与哲学实在论相联系的，毛泽东总是把真理定义为与所指外界事物相关，而不是与内部的、认识论上的所指概念相关。

在认识论的层次上，毛泽东把概念了解为在存在的领域，由初步的感觉材料引起。但是一当感觉材料被形成为概念，这些概念就会既解释又转变实存。毛泽东看到了存在—思维和概念—实存的差别。他知道，一旦概念被构成，这些概念就承担起一种自身产生的力量；这就是说，概念转变实存。概念是人类实践的概念的方面；它们是改变外部世界的工具或指南。

毛泽东对辩证法原则的客观性的信念，并不意味着他拥护经济或技术决定论、或直线发展的历史观。自然与历史两方面最重要的客观规程就是对立面的规律，而对立面的统一则要求相信每个社会的独特结构，它的阶级矛盾的独特性，因而要求认识一切社会都将追寻个别的历史发展道路。

但是，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有着难以接合之点。这并不奇怪，因为毛泽东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哲学家，他自己也没有阐述一种系统的哲学的任务。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冲突点。第一，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还原性质，与他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实践的强调是矛盾的。在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强调的是人的干预的主题，而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毛泽东把发展与过程还原为非转化的、独立于精神的力量。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中，社会与人类生活主要由非转化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决定。第二，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被决定论的经验规律所支配的世界，而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过程是由辩证的矛盾原则支配的。

为了概述毛泽东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思想，也有必要把它分为两部分：（1）作为实践的概念；（2）作为社会分析的一种方

法。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方面，《实践论》是毛泽东对一种实践学说的阐述。论文的基本主题是探索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着重强调社会—经济的生产能力。社会活动，或社会先验是意识形成的条件，是感性知觉由以产生的基础。而且，人在社会中的活动也是干预的形成的来源。《实践论》是对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信奉的唯物主义的再肯定。它不是一种哲学的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它毋宁是一种感觉论的唯物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突破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沉思的和一般的唯物主义。代替他们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提出了一种人类变革的唯物主义，一种本质上是实践—批判活动的唯物主义，因而是一种旨在改变世界的唯物主义。

但是毛泽东在实践的主题上不仅与马克思相一致，而且与列宁相一致。列宁在他的《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也强调了人的行动的变革性质。列宁也相信一种实践的哲学，主张产生于正确理论的行动能够改变世界。列宁没有提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感觉论的唯物主义主题，没有提到人的社会活动是实践—批判的。列宁的实践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的意向，关心的是一个国家中制度上的权力关系。他的实践基本上是政治的实践，也就是旨在摧毁一个国家中的现存权力关系的实践—批判活动。像列宁那样，毛泽东的意向也在本质上是政治的，他也按照改变一个国家中的权力关系的行动辩证法来思考。因此，在毛泽东的实践观念中，他继承了马克思的主要思想，以及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

在毛泽东关于社会分析方法的著作中，在《矛盾论》中，他依靠了列宁留给他的遗产。毛泽东采纳了列宁提高到辩证法首要

规律的矛盾观念，使它成为分析社会历史事件的中心概念。他还运用了马克思和列宁没有用过的方法来提炼矛盾的概念。当毛泽东把一整套的社会分析方法建立在矛盾观念上时，他的社会分析方法有着不同于机械决定论模式的基础。毛泽东不是从经济角度思考，而是从政治角度思考，不是从必然的技术或经济发展的观点分析社会，而是从对立面的斗争和相互依赖的观点分析社会。

这样，在方法论的领域，毛泽东便使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传统永久化了。在《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列宁也说过对立统一观念应当用作研究社会的范式。毛泽东执行了这个列宁主义的训令，并据此建立了一整套的方法论。的确，在列宁和毛泽东的理论设置中，矛盾学说履行了一种相似的职能：它是解放性的。列宁在1914年开始读到黑格尔的著作，他写作《哲学笔记》，以及他对矛盾观念的熟悉和运用，这一切都为他提供了借以把握俄国革命的到来的理论框架。矛盾的观念使列宁得以突破欧洲模式，看到俄国的革命与其说是依据资本主义的内部发展，不如说是把该范式转移到了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从这个观点、从打破帝国主义链条的观点出发，来证明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矛盾的观念武装了毛泽东，使他在苏维埃模式之外，寻求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所做的，就是运用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的方法，达到非列宁主义的结论。毛泽东运用列宁的方法论来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列宁自己在俄国重新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谈到斯大林所解释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乃是帝国主义时代重新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49年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这本书里，列宁特别告诫西方欧洲的共产主义者不要模仿苏维埃的模式。在毛泽东提到的段

落中，列宁探究了俄国的革命学说本身，在采取适合俄国的背景的理论形式之前，如何经历重大的变化并经常进行修改的情形。⁽¹⁷⁶⁾因此，毛泽东实现了列宁曾给予西方共产主义者的训令，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运用于中国的条件。毛泽东采取了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方法论，作为在中国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且以这种方式，他完成了对列宁本人的革命模式的批判和超越。

为了恰当地评价毛泽东与列宁之间的连续性或中断性的范围，有必要把列宁主义的遗产区分为两部分：作为方法和作为政治律令的部分。毛泽东吸取了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构思，而抵制了作为政治律令的列宁主义。

在方法论方面评价列宁与毛泽东之间的连续性时，为了明晰起见，也有必要把这一范畴分为两部分：（1）作为实践—批判活动；（2）作为社会分析。就第一部分实践—批判活动而言，毛泽东继续了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的列宁主义传统。毛泽东还遵循列宁的理论先于行动，而有效行动只能是正确理论的结果的信念。毛泽东与列宁都不是唯意志论者。毛泽东也遵循列宁强调意识的作用、断言政治优先的思想。两人都不是经济学家，都认为政治变化乃是行动必然导向的目标。就第二部分作为社会分析而言，毛泽东遵循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正确评价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还借用了列宁视为辩证法首要规律的矛盾观念，使之成为他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毛泽东继续了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首次勾画的社会分析方法。

正是在政治律令的层次上，毛泽东利用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超越列宁主义。毛泽东摈弃了列宁主义的党的概念，包括关于先锋队 and 民主集中制的定义。他推翻了整个列宁主义的国家概念，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他否定了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定义。他否认了列宁主义对自发性的认识，列宁不相信自发性而毛泽东则常常诉诸于它。他取消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模式的整套演

算，即获得政权的过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总之，一切列宁用来获得政权的惯常形式都为毛泽东所抛弃。

在对毛泽东主义哲学的这一总结中，必须考虑到他早期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毛泽东熟悉中国的经典，显然他的早期教育为他后期思想的形成留下了某种框架。这里不可能详细找出散见于他的全部著作中的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引述，也不可能详细探究这些中国来源对毛泽东的哲学的影响。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我把它留给中国文化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门学者们。这里我只是试图就留有中国古典文化印迹的某些方面勾画一个轮廓。

在这一章的前面几节里，我谈到过毛泽东所领导的三次革命：(1) 反对日本和蒋介石；(2) 反对俄国模式的霸权；(3) 反对中国古代文化。我已描述了前两次毛泽东主义的革命。在略述毛泽东对待中国古典文化的态度时，我要接触到第三次革命。毛泽东反叛中国古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形而上学方面和伦理学方面。每个方面都既有继承又有中断。毛泽东借用了古代的思想，但把它们置于毛泽东主义的框架内。毛泽东通过利用过去而推翻过去。他借用过去的某些思想，但把它们置于革命的背景中。下面先谈毛泽东推翻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方面。

宇宙形成和消逝的观念，是过去中国文化的一个遗产。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最初表达在《易经》(I Ching) 中，并贯穿于老子和孔子思想中的，是变的概念。作为伦理上的清静无为思想的来源，中国哲学曾奠基于一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即把宇宙分为阴与阳、发生与感受两种力量的见解。这些力量的交替，运动优势与静止优势的相互交替，就是那种把变看作世界唯一永恒的东西的观点的基础。

包含在《易经》、道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变的观念，是有差别的。《易经》的变是一种流动的变，与赫拉克利特

的流属于同一类。道家学说和《易经》都把这种变设想为一种上升与下降、一种实存与非实存的循环。它源于一种关于存在与非存在、关于从非实存过渡到实存，又从实存回到非实存的形而上学。由马克思的辩证法得出的变，不是从形而上学上奠基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条件中，产生于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易经》与道家学说把变设想为事物的条件。马克思则不是这样，他把变看作是先天存在着的矛盾的一种结果。

然而，包含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变的概念，确实包含着变或发展的一种形而上学。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把变的概念物质化。他们两人都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者，相信宇宙中的发展来自物质自身中的辩证规律。毛泽东的《易经》和道家学说的知识使他事先就倾向于把宇宙解释为过程。他在《易经》和道家学说的形而上学基础中获得流动和过程的思想，并给它以哲学唯物主义的根基。他跟随恩格斯、米丁和列宁的思想动向。在《矛盾论》中，他提到中国的形而上学，并把它们归入唯心主义。他的意思显然指《易经》和道家学说中的变的概念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们是从形而上学上奠基的。在中国的背景下，毛泽东把古代变的概念唯物主义化了。

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层次上，毛泽东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他摒弃孔子的社会寂静论思想，拒绝孔子把知识看作基本上是追求内在的自我道德修养的想象，以及把人类道德看作脱离一切环境和社会的依赖或关联的见解。孔子的思想基本上是一种伦理学说，因而关系到决定与判断的合理基础。孔子的伦理思想是对王权、族权和夫权的支持。

然而，孔子的许多观念在毛泽东那里继续存在。它强调自我修养，强调个人意志是一切人类改良计划的基础，以及承认自我意识在人的动机形成中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吸取孔子伦理模式中

对意志和自我修养的看法，把它们置于一种革命的模式中。意志与自我修养，在毛泽东有关人的行动和人的意识变化的思想中，仍然占有首要地位。但是，它们服务于毛泽东的目的，它们被导向的目标，不是什么贤哲、不是什么伟人，也不是什么家族的服从关系，而是革命意识的创造。毛泽东利用孔子的观念来推翻孔子的文化。^[177]

二 理论与实践，主体—客体

这一章到此为止，我已集中讨论了毛泽东的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和实践概念上的起源。在这一节“理论与实践”，和下一节“意识”里，我将把我的研究重点集中到毛泽东主义思想的两个具体问题上，即实践与意识。我将试图确定，在毛泽东主义哲学的这个方面，以列宁为中介，马克思与毛泽东之间是否有着连续性或中断性。

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的概念产生于他对黑格尔主义的突破。黑格尔从一种先验的观点出发，论证了理想与现实的统一。黑格尔破除了康德关于观念与世界相分离的观点，采取了精神与世界相同一的立场。根据基督教对耶稣基督的解释，基督象征着精神与肉体的结合，黑格尔扩展这个概念，肯定哲学也是与现实相统一的。于是，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的历史就是哲学的自我现实化。

对黑格尔来说，现实是合理的，意即物质世界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思想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178]

马克思不是论证思想与现实的统一，而是从它们的分离性的角度来思考。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和《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是按照现实与理想的分离来思考的。哲学不与世界相同一，但哲学必须被用于证明世界如何与理想或概念相背离。

马克思在演化出他的行动辩证法时，首先必须经过批判的阶段。^[179]

批判本身是实践的一种形式。批判本质上是哲学的实践。在批判中，哲学被用来反对世界，就是说，概念被用于暴露现实背离理性的东西的程度。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就是这类哲学实践的一种探索。在马尔库塞看来，实践必然总是出自理论。^[180]

当马克思假定现实与理想的分离时，他最初是用哲学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着手对黑格尔的政治理论进行了哲学的反驳。不久马克思开始了他的费尔巴哈阶段，因而运用了人类学的标准发动对现实的批判。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是在那些讨论经济学的手稿中，马克思应用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原则，批判英国的政治经济学。

在马克思那里，理论代替了哲学。至于哲学，马克思是指寓于现实之外或被设想为与现实相同一的思想。哲学或者是证明现实的思想，即黑格尔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概念，或者发现它自身与现实无关，比如宗教或艺术。哲学是处于思辨方式的思想，而理论则是已经为世界所固有的思想。理论是一个现实性的概念，因而是作为借以批判现实的基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到他的行动辩证法发展中的一个不同阶段。他的实践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以前他把实践看作是理论的实践，也就是看作概念与现实不相一致的证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实践重新规定为活动性，或人的干预。由于概念与实存之间有分离，人的行动便通过改变现实以适应概念或理论，而成为跨越这种分离的力量。

在行动的辩证法中，实践产生历史。由于实践是变更的力量，它导致过程。由于实践总是在构成，所以就总是有转化和未

来。产生于人的力量对其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内在干预的概念与实存的统一，也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基础。由于实践，客观的东西被“人化”了，它按照主体的特性，按照主体的概念而被塑造着。

就政治领域来说，实践是以无产阶级为范例的。将对资本主义实现理论批判的力量，必定是一种政治—集体的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当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将实现哲学，他不是说，哲学化的行动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完结。无产阶级革命将实现哲学，是因为哲学不再脱离或外在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通过改变世界，将使哲学内在于世界，就是说，按照主体来变更客体。但是哲学化的行动，产生对世界的理论占用的活动，将继续下去。哲学不会被自然科学同化。自然规律不会是理论内在性的一种代替物。正如实践是延续的，对世界的理论占用也是延续的。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批判活动，或革命活动，总是受理论制约的。马克思不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因为他不相信自在的行动、与概念相脱离的行动，能够或者创造一种正确的理论；或者富有意义地改变现实。唯意志论是相信行动本身会启导现实并改变意识。但是，唯意志论的行动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行动辩证法，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哲学前提。马克思的行动辩证法所基于的信念是，必须使客观的东西与概念相一致。它是从对世界的理论占用的角度来推断世界的革命转变。

除了毛泽东的思想中缺乏黑格尔的先验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之外，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概念与马克思的有关概念完全相似。毛泽东不是把共产主义定义为异化的结束，定义为人的类存在与社会—政治生活相一致，而是按照孔子的术语把共产主义定义为“大同”。^[181]由于毛泽东缺乏哲学人类学，他不可能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的存在的类与他周围的社会—政治制度相一致。毛泽东想

到的是和谐的人类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毛泽东不把实践了解为理论的实践，了解为批判。由于没有黑格尔那种认为概念应当用于指出实在的不完善的思想，所以毛泽东不拥有实现这种批判的哲学武器。受列宁的影响如此之深，实践，在毛泽东看来，总是政治的干预，或革命的活动。

尽管毛泽东与马克思有这种差别，但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唯意志论者。从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理论是革命行动的基础的思想得到启示，毛泽东总是认为行动必须出自理论的指导。在毛泽东看来，行动本身，脱离概念的行动，既不能改变意识，也不能有效地变更现实。在他承认理论的优先性方面，毛泽东的行动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行动辩证法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从马克思到毛泽东贯穿着一条连续的路线。

毛泽东的论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整顿党的作风》（1945年2月，应为1942年2月——译者注），《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以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43年5月，应为1963年5月——译者注），应作为一组文章来阅读，因为它们作为构建正确理论的指南来写作的。这些论文成为党的干部的一份教育手册，是如何达到对实在的正确的理论占用的一种指南。在这些论文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他的实践—理论—实践范式的三个阶段。对这三个阶段的仔细考察表明，它们与马克思的理论—实践范式的三个阶段：存在—意识、理论、概念—实存（或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完全一致的。

一切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182]这句话纯粹是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则的重述。像认识的任何其他形式一样，理论起源于感性知觉，起源于人们在从事社会生产时

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感性材料。毛泽东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方式，把存在定义为人的社会生活。

然而，零散的感性知觉必须组合成为一种理论。“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183]理论是对世界的说明，它们的真实性需要接受检验。但理论是行动的必要前提。在范式实践—理论—实践的第三个阶段上，实践再次出现，但它是作为 Praxis 再次出现。毛泽东的实践出现于对实在的理论占用，改变着世界。

毛泽东在他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写道：“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184]人的干预的主题再现在整篇论文中：“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85]在实践—理论—实践范式的这一最后阶段，毛泽东是在重申马克思的概念与实存，或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所意指的东西：他的实践的思想与马克思的 Praxis 的思想是同义的。^[186]

而且，为了达到一种正确的理论，正确的学习形式和正确的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是想要向中国共产党党员教以正确的社会分析方法。它们有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使命，就是说，教育干部如何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187]毛泽东的论文之一的标题《改造我们的学习》，表明了毛泽东对教学法问题的整个态度。毛泽东专注着教育改革。他希望通过改变中国传统的学习方法，即孔夫子的方法，而代之以行动的辩证法，即实践—理论—实践的方法，这种方法将使共产党的干部具备充分的技能，去实现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188]

毛泽东对学问、对正确的学习方法的强调，表明意识和意志在毛泽东主义的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学问与学习能够改变意

识，而通过实践现实化了的意识能够改变世界。对于毛泽东来说，意志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对行动的支撑，它使得主体保持改变世界的努力，意志提供实践—批判活动所必需的耐力。毛泽东的孔子思想的背景无疑促使了他对意识和意志的重视。但是，毛泽东从其目的和方法上突破了孔子的遗产。

毛泽东反对孔子思想，反对蒋介石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三次革命，都表现了对实在的特殊的理论占用。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与可能两方面的认识，迫使他反叛孔夫子的政治迁就主义。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需要一种与布尔什维克不同的战略，这就迫使他突破布尔什维克的模式。的确，毛泽东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突破，是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的：（1）革命战略；（2）国家和政党理论；（3）社会主义模式。在这三个决裂的每个领域中，毛泽东对中国情况的理论把握，都成了创造不同社会主义战略行动的前提。毛泽东的行动辩证法，他对中国革命情况的三个具体领域（策略、政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分析，便使他具备了对中国形势独特性的正确的理论把握。

然而，在与布尔什维主义决裂的所有三个领域内，贯穿着一条连续的线索。毛泽东的民粹主义，他那尊重群众的雅各宾派思想，不允许他走向任何形式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必不可少的意义，这种民主倾向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始终是一个坚定的主题。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国家和军队专政的概念的突破，都归因于他的民粹主义情绪。其实，文化革命，以及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也是试图造成一种社会主义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是民主，群众路线，而不是杰出人物统治论，将成为占优势的社会精神。

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苏联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保留了许多资本主义的特征。它把决定如何使用生产力的权力，不是交给人民，

而是交给了与人民相脱离的一种机构。支配力量在苏联仍然存在，只是这种支配不属于一个财产私有者阶级，而属于一个政党和由该政党控制的一个国家。政党资本主义让群众仍然像在私人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被剥削、被控制、被支配、被异化。官僚政治、中央集权制、等级制和经济命令主义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全部特征，它使新的统治阶级即党的控制得以长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表明了某些资本主义特征的复辟。它没有消灭统治阶级，只不过使剥夺的产生从一个私有的中心转移到一个党的中心。

以群众路线为先决条件，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认识，是在创立民主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基础上开始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论，要求群众参与决策过程。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目的，是要建设一种既是生产性的又是由群众参加的社会主义。

在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开始于1953年，但实际以书面的形式表达，最初是在1955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在毛泽东对过渡问题的最初的理论占用中，他踏上的是—条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路线。他曾强调集中计划，并以牺牲农业为代价集中于工业的发展。与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模式相—致，农业是用来为工业技术的提高提供所必需的资本。那时毛泽东还没有集中注意生产关系问题。对于生产所有权是属于一个人、或者属于一个党、还是属于社会这样的所有权问题，他仍然是从法律的角度去考虑的。他还没有超出法律上的所有制问题之外，去达到控制和决定问题。

然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后不久，就可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改变了方针，转向了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化模式决裂。1955~1956年，标志着中国与俄国决裂的另一个时期。斯大林死于1953年，1956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罪行”的著名演说，

同时，1956年是匈牙利发生革命的一年。1956~1960年的几篇文章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的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他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这第三次决裂的著作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On the Co-ope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1955年7月31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Preface in The Socialist Upsurge in China's Countryside）（1955年9月13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战和当前阶级斗争》（The Debate on the Co-ope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Current Class Struggle）（1955年10月11日），《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1961~1962年），《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和《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其实，这些突破性的著作加上论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阐明了适应这些经济改革的体制结构，阐明了毛泽东试图建立的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类型。

正如毛泽东创立了一种中国化的革命战略，一种中国化的政党和国家的理论，他也创立了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化过程模式。毛泽东再次遵循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的训令，创立了一条中国化的工业发展和社会化的道路。毛泽东的社会化理论是在他的论文《论十大关系》中概括的：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89]

毛泽东的发展理论要求创立一种牢固的农业基础，作为工业化的前提。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道路不同，也与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的道路不同，毛泽东的发展理论是依据这样的事实，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190]再者，显示他对群众和他们的自发性的牢不可破的信念，毛泽东利用农业合作化运动，来创立工业发展的基础。毛泽东避免了俄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斯大林对农民的猛烈冲击，在那个计划里，斯大林摹仿西方资本主义，单纯从技术改进方面来定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在生产上超过资本主义的社会。毛泽东避免了反对农民的阶级斗争，而凭借合作化作为一种引诱，劝导贫苦农民加入大规模的合作社。“大跃进”是中国化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表现。

关于毛泽东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最清楚的说明，可以在他对苏联经济学评论的著作中找到。在那些评论中，毛泽东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归结论（reductionism），批评社会主义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毛泽东不是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技术上的先进及商品和消费品产量的较大增长，而是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191]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不是消费的物质性，而是一种与生产资料相关联的方式。毛泽东所说的“与生产资料相关联”，指的是决策和民主管理。与斯大林主义相反，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的定义从纯技术的领域转向对经济物品的生产与消费的民主参与和监督的领域。

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关心参与管理而不是关心消费至上原则，毛泽东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必须以“政治挂帅”的原则而不是以经济刺激为指导。^[192]毛泽东对意识、对一切理论方面的考虑的强调是很明显的，这是由于他经常设想政治方面的考虑必须用来指导经济决策，并用来激发人民增加生产。毛泽东以“政

治方面的考虑”去理解决策与“生产关系”的联系。当毛泽东谈到“政治挂帅”时，他是说经济决策的作出必须从加强民主参与决策过程的观点出发。

毛泽东的不同发展的道路模式，表明了政治与经济，或意识与经济的辩证法。在关于社会化问题的探讨中，毛泽东再次表明，对他来说，理论是实践的必不可少的前驱，也表明他相信意识的变化能够先于社会环境的整个结构的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认为改变意识可以不涉及任何社会方面。正如毛泽东从来不认为实践离开理论而存在，他也从来不认为意识离开社会先验而存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法，是相信意识的变化不需要在社会的整个结构转变之后，而能够在经验斗争的进程中实现；并相信，一旦意识发生变化，它就能成为整个经济转变中的一种转化力量。讨论到了这一步，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在有关意识的最后一节里充分地加以论述。

三 意 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他的意识的社会决定作用的主张。《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与德国唯心主义决裂、也是与诸如包含在费尔巴哈哲学人类学中的一切超历史的实体概念相决裂的宣言。对于实体概念，包括费尔巴哈的类存在的一般人类实体，马克思代之以历史的、社会决定的观念。受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的著作中第一次考察过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影响，马克思把左翼黑格尔主义的整个学派看作德国社会和智力生活的意识形态表现。《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对把意识看作是先于社会实体的左翼黑格尔派传统，确立了意识由社会决定的主张。

马克思使用意识的术语时，他不是指大脑接受感觉印象的能力。人的大脑从外部来源接受感官刺激的生理能力，是人脑生物性质的官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是指这些感觉印象得到阐释的方式和形态，是使这种初步的感觉材料得以组织因而相互联系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来说，意识与社会先验有着固有的相互联系。存在的确决定意识，但存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如果离开与社会实存同时发生的选择机制和分辨力，人就不可能有意识，不可能有组织起来的概念。

既然意识是由社会先验决定的，它就不能超出社会先验而改变。正如马克思反对左翼黑格尔派认为意识先于社会的观点，他也反对认为意识能够离开社会先验而改变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意识变化的条件是社会先验的先天变化，因为社会先验产生那些阐释框架，个人则通过这种框架来感知实在。改变人的途径在于首先改变人的生活基础，即改变社会。

然而，马克思没有讲清楚他关于意识形态的层次，即社会意识的的一个方面，与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关系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意识形态是代表社会特定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信念体系。比如，政治经济学，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以及托玛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中具体表现的，就是资本家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体系。的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尽管没有写完，而且在结构上是不完整的，但它把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一种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但这并没有使我们获益很深，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详细分析意识形态与阶级之间的确切关系究竟是什么，以及在个人的意识形态信念中，经济上的阶级地位是不是充分的决定因素。

至此，我已就其与意识形态的联系讨论了意识。但马克思也在别的意义上使用意识一语，就是说，把意识看作解放的一个前

提。马克思设想，一个人只有希望自由，他才能成为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意识与获得自由的欲望或能力同义。马克思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身来获得”，这就是说，只有当工人阶级为自身的自由达到了一种自觉的愿望，它才能获得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自由的自觉愿望成为解放的前提，马克思便集中注意主观的动因。

在意识的领域，马克思也不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受费希特唯心主义的影响，唯意志论认为意识离开社会而存在，并能离开社会而改变。实际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抨击了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所代表的唯意志论。施蒂纳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The Ego and Its Own*）中，维护了理性及其独立于社会环境的自主性。实际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多半是批驳那种维护自由漂浮于社会先验之上的自我包容的意识的论点。

在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发展方面，我将限于讨论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问题，因为毛泽东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布尔什维克的黑格尔主义或列宁所信奉的观点，把较为重大的因果意义归于概念的变更和构成力量。由于推翻了德波林和布尔什维克的黑格尔主义，由于苏联哲学内部机械唯物主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便把客观力量的优先地位强加于对意识的决定中。

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认为，在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中，客观力量享有因果关系上的优先地位。布尔什维主义分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式，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把基础定义为人的经济生活，把上层建筑定义为这种基础在意识形态上的延伸。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基本上是还原式的，它把意识形态还原为经济基础的单纯表现。

例如，阶级构成是基础的基本集合单位。在斯大林主义的布

尔什维主义之内，意识形态主要被判定为客观阶级利益的表现。因而各种思想体系就被估价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它们的种种表现。基本说来，布尔什维主义是按照两种主要的世界观（二者都是客观阶级利益的表现），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思考的。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力量的意识形态表现，而唯心主义则是资产阶级力量的表现。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农民的意识形态，但它们只是占支配地位的共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种或子集。

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坚持基础—上层建筑的范式，在说明意识形态的尝试上，表现了一种从主观到客观转移。它的分析既是还原的又是集合的。信念体系可以还原为经济因素，并被看作是集合单位的表现。从主观力量到客观力量，从转化因素到非转化因素的同样的转移，也发生在我们对意识分析的第二个范畴，即意识与解放的关系中。

讨论意识的第二个范畴，有必要提一下列宁。与意识和解放问题有关的列宁主义的文献，是列宁在1903年发表的小册子《怎么办？》。在这篇文献中出现了一种确定无疑的转动，即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解放必然是工人阶级自身事业的思想主观性再次被归属于客观性的东西。在列宁的《怎么办？》中，自我解放被转移到了解放的客观来源，即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所体现的来源。

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坚持党作为先锋队的传统，也把党解释为政治革命因而也是解放意识的动因。布尔什维主义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观力量、自我解放的方面的破坏。在布尔什维主义中，政治意识从转化的力量抽离开来，并被注入客观主义的、集体的力量之中。

在意识问题上，毛泽东完全突破了布尔什维克传统。在这个领域，毛泽东也突破了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主义代

表了一种再现马克思对主观力量和自我解放的强调的尝试。毛泽东主义还重新肯定自由的获得、解放的意识必须在主体自身中产生，而不是什么从外部、由动因的知识代表所强加的一种态度。

所谓主观的，我不是指个人的或个人主义的，我是指内在的，或由动因本身所达到的一种决定。所谓动因，我指社会阶级，如农民。因此，马克思和毛泽东（而不是列宁和斯大林）所定义的主观决定，乃是由一个社会阶级（一个集团成员的大多数）完全自愿地选择的决定。

在这方面，毛泽东突破了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定义。他对列宁主义把党定义为一种机构（如我已讨论过的）和作为革命意识之所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毛泽东的论文《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2年），《组织起来》（*Let's Get Organized*）（1943年11月29日），《为人民服务》（*'Serve the People'*）（1944年9月8日），是对列宁在《怎么办？》中的主张的直接反驳。毛泽东反对把党作革命意识贮藏所的思想，他反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先锋队论。对于毛泽东来说，给党以先进意识方面的特权垄断，就是继续使群众受外在的异化的力量的奴役。列宁主义的先锋队论使那种认为自由能够强加于人民的客观主义谬误永久化了。

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方式，就是把它看作是避免客观主义谬误的一种尝试。“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标就是一切形式的官僚政治和对客观的现存制度的信赖。在对红卫兵的感召中，毛泽东甚至谋取民众自发反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官僚机构的力量支持。“文化大革命”是40年代“群众路线”的民粹派情绪的继续，更重要的是延安时期游击战争经验的继续。意识到游击战争时期军事上的成功完全依赖群众的支持，这乃是毛泽东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毛泽东以同样的观点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必须构成制度管理包括党的管理的条件和前提。由

于毛泽东想使群众与各种管理融合起来，像在延安所做的那样，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是试图保证，经济上的官僚主义、党的制度上或学究式的杰出人物统治论，都不会形成离开或摆脱民众控制的客观力量。

毛泽东不但把解放的中心重新从党转移到群众，而且抨击了布尔什维克的基础—上层建筑的范式。按照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可以归结于阶级地位，而阶级地位本身又可归结于收入水平。毛泽东反对把意识和思想体系看作单纯是收入水平的附带现象的观点，从而主张使意识形态领域摆脱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因此，我已经提到，毛泽东作为哲学家有其不一致的地方。在他的论文《论辩证唯物主义》和《矛盾论》中，他对文化史提出了一种两极化的经济的说明。在那些论文中，他把文化史分为两个阵营，无产阶级阵营和资产阶级阵营。无产阶级阵营是唯物主义者，而资产阶级阵营则是唯心主义者。一切意识形态的表现或者属于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的范畴，或者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范畴。于是，在这些论文中，毛泽东成了布尔什维克的经济的阶级还原论的受害者。但是，这些论文是在毛泽东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时期写的，当时他正试图为他的党提供一个连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当时他在政治上依赖于斯大林，因此，不应当把这些论文看作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最后论述。

基本说来，毛泽东突破了把意识形态看作经济的一种附带现象的定义。在毛泽东看来，政治意识是首要的。我们已经看到，列宁主义的遗产本身是有歧义的，而在这方面，列宁留下了一种主观主义的传统。对于列宁和毛泽东两人来说，政治是首要的，在这种主张中，两人都认为政治认识能够先于经济变化。政治意识优先于经济决策，因而政治意识先行于社会的整个经济改组。

我们来分别考察一下上述论断的各个部分。毛泽东和列宁两

人都主张，政治意识，或政治意识的变化，不需要等待环境状况的整个变更。关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政治意识先行于整个结构的改变。显然，人们不能使政治意识与社会先验分离。为了使政治意识反映现实，就必须能动地进行斗争。但对社会先验的这种参与能动的经验，并不需要等待社会的整个改组。换句话说，政治意识的变化，是一种产生于能动的经验斗争的变化，是发生于革命之前的变化。

政治意识一旦发生变化，它就能成为一种经济的力量。换句话说，政治情绪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被动员起来：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部分；作为经济改革的一种指导路线。这实质上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战略。他是在政治的基础上而不是阶级的基础上感召中国的群众。他是基于政治的考虑而不是基于经济的考虑，谋求重新制订关于中国社会的方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用来指导变革的准则，不是经济效率或生产，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存在着一种政治与经济的辩证法。政治意识和政治标准被用作重新规定中国方针的力量和指导路线。

对毛泽东来说，问题不在于政治意识能够不涉及社会先验而变化，而在于政治意识在它与社会先验有关的哪一方面能够变化。社会先验总是意识的一个条件，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的问题。毛泽东不认为只有在整个结构的革命之后，政治意识才能变化。他的确认为，政治意识的变化，发生在能动地经验参与整体结构变化运动的过程之中，在能动的、经验的交锋进程中能够发生变化。

其实，毛泽东对于文化自身的认识，是从政治评价的角度来规定的。在他的论文《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把文化的目的规定为提高人民的觉悟。文化必须助

长政治意识，而文化本身又是政治意识的一种表现。孔子的清静无为和事不关己的主张被否定了。达官贵人的世界观必须由无产阶级世界观来代替。文化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创造中，它必须构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重新发现了主观的首要性。他的生涯就是对作为革命武器的意识的力量的一种探究。在这方面，它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挑战。它是对西方环境中的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再创造的召唤。但是仰仗毛泽东的贡献，这种再创造现在能够把意识设想为一种批判的武器，一种摆脱一切客观主义的先见的武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是解放意识，所以它又能自由地对当代世界作出一种新的理论占用。

注 释

[1]这一章对我的文章‘Non - Marxist elements in the communism of Mao,’ *Studies in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December, 1976), pp. 307—32 作了某些修正。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毛泽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概念。那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在这里作了纠正。然而，那篇文章的某些方面仍然是正确的，比如把毛泽东与民粹主义联系起来，认为毛泽东不包含黑格尔或马克思主义的对象化和异化的命题，以及把“文化大革命”与延安游击战争的群众支持相联系。

[2][3]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卷，第30、29页。

[4]David Jonavsky, *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1) P. 171.

[5]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1页。

[6]Jonavsky 在 *Soviet Marxism* 中对这一斗争作了极好的叙述。

[7]Gustav Wetter,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rans. Peter Heat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6), P. 130. 另一本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的极好

著作是 Zbigniew A. Jordan, The Evolu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7)。Wetter 集中于历史的叙述,囊括了所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出現有关的重要人物, Jordan 则主要关注三个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以他的描述不致松散而更为集中。

[8] Joravsky, Soviet Marxism, P. 96.

[9] Wetter,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 146.

[10] Wetter,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 140.

[11] Abram Deborin,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 in Oskar Negt (ed),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 Suhr - kamp Verlag, 1969), P. 105. Negt 的卷本包括德波林的其他文章。虽然我没有专门引证它们,但我觉得下列文章对形成我关于德波林的看法是起了作用的: 'Lenin als Revolutionärer Dialektiker', 'Lenin über Dialektik', 'Hegel und 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and finally 'Lukacs und seine Kritik des Marxismus'.

[12] Negt,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P. 104. 德波林是一个令人迷惑的人物,他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前辈之一。已有一些著作论述他。主要的德波林学者是 Rene Ahlberg, 参看他的两本书, Dialektische Philosophie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Soviet Union (Berlin: Otto Harrassowitz, 1960) and Entwicklungsprobleme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in der Udssr (Berlin: Otto Harrassowitz, 1968) 有一篇由 R. D. Reeler 写的论德波林的英语论文, 'Abram Debori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April, 1979), PP. 189—201。但是,对于德波林的研究还可大作文章,特别是对他的学生的研究。德波林的许多学生在斯大林主义布下铁幕之前逃离了苏联。为了回答德波林的思想在俄国是否已随他一同死去,重要的是要了解,他的学生们在哪里定居,在哪里任教,以及他们可能影响过谁。

[13] J. M. Bochenski, Soviet Russia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Dordrecht: Reidel, 1963), P. 35. 这本书风格凝练,见解精辟,较之 Wetter 的著作更为简明。

[14] Bochenski, Soviet Russian Materialism, P. 36.

[15] 'Aus der Resolution der Parteizelle des Instituts der Roten Professor für Philosophie und Naturwissenschaft in Moskau', in Negt,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P. 318.

[16] Negt,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P. 322.

[17] M. Mitin, 'Über die Ergebnisse der Philosophischen Diskussion', in Negt,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P. 335.

[18] Negt,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P. 330.

[19] Wetter, Dialectical Methodology, P. 138—9.

[20] Frederick Wakeman, History and War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 224—6.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尽管它没有十分明确地区分马克思的德国式前提和毛泽东的孔子式前提。对 Wakeman 的科学的批评, 见我的文章 'Non-Marxist Elements in the Communism of Mao'.

[21]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89—90. 对于了解毛泽东在准备系统阐述毛泽东主义时期席卷中国的思潮, 这是一本重要著作。

[22] Wylie, Emergence of Maoism, P. 26.

[23] Wylie, Emergence of Maoism, P. 26.

[24] Wylie, Emergence of Maoism, P. 34.

[25] O. Briere, 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 Laurence G. Thomps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56), pp. 34—5. 这是一本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中国通用的西方和俄国著作的重要指南。Briere 也是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在中国激起的哲学论战、特别是关于德波林的争论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他对于中国 20 世纪哲学的这个方面写了好几篇论文。遗憾的是我不能找到和利用这些论文, 我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写这一文章, 大学图书馆没有这些 Briere 的参考资料。

[26] Wylie, Emergence of Maoism, P. 99.

[27] Wylie, Emergence of Maoism, P. 7.

[28]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raeger, 1969), P. 35. Stuart R. Schram 是一位关于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问题的专家, Schram 与作者之间曾有过这方面的许多著作, 其中的不少部分我将在后面提到。尽管我与他的观点显然不一致, 我还是把他看作对毛泽东最有洞察力的学者之一。我总是从他的著作中学习, 并乐于承认受惠于他。Schram 的最好品质之一是, 他不像一个名叫 Wittfogel 的人只知道扣赤色分子的帽子, 也摆脱了 B. Schwartz 和 A. Cohen 的简单程式化。但是, 我期待着 Schram 解

说毛泽东思想的巨著。Schram 编辑过许多种毛泽东的选集,把许多以前未出版过的毛泽东的著作拿来出版,显然他手头拥有随时可供利用的毛泽东的原始资料。对 Schram 来说,看来已经到了不再编辑选集而着手编辑一部毛泽东的思想传记的时候了。

{29}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30} Nick Knight, 'Mao Zedong's *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 Pre-Liberation Texts',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1980), PP. 641-68. 旁的不说,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完全破除了 Doolin 和 Golas 认为毛泽东就《矛盾论》的写作日期说谎的论点。见 Dennis J. Doolin and Peter J. Golas, "'On Contradiction" in the light of Mao Tse-tung's essay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China Quarterly* (July-September 1964), PP. 38-46. Doolin 和 Golas 断言毛泽东说他 1937 年写《矛盾论》是说谎,但 Knight 的著作确切地证明毛泽东真是在 1937 年写作《矛盾论》,从而解除了关于毛泽东说谎的指责。Doolin 和 Golas 属于那种歪曲历史、扣赤色分子帽子的早期派别,这一派别企图以各种方式诋毁毛泽东,诋毁中国革命。

{31} Vsevolod Holubnychy, 'Mao Tse-tung's materialist dialectics', *China Quarterly* (July-September, 1964), P. 3-37. Holubnychy 的文章特别全面正确地列举了毛泽东可能读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米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的文章确切地占有了有关毛泽东的文献资料,而且,他对毛泽东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关系方面的评论也是深刻的,另一篇专论毛泽东及其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的文章是, Joseph Liu, 'Mao's "On Contradictio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June, 1971), PP. 70-81. Liu 正确地看到毛泽东的辩证法与道家学说中的阴阳原则的相同之处。还有另一些把毛泽东的思想解释为一种哲学的文章,想要参看的读者,可从已提到我的文章 'Non-Marxist Elements in Communism of Mao' 的脚注中了解。

{32} Holubnychy, 'Mao's materialist dialectics', PP. 11-12.

{33} Knight, 'Mao Zedong's *On Contradiction*', P. 655.

{34} Karl Wittfogel, 'Some remarks on Mao's handling of concepts and problems of dialectic',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December 1963), P. 264. Wittfogel 也属于那种对毛泽东的解释扣上赤色分子帽子的派别。这篇文章的整个锋芒,是要把毛泽东说成完全没有独创性。Wittfogel 试图证实毛泽东的全部思想取自米

丁,因而毛泽东的思想既缺乏独创精神又几乎全是从米丁那里引申出来。Wittfogel 希望通过表明毛泽东缺乏独创精神,从而使任何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的合法继承者的主张无效。

[35] Wittfogel, 'Some remarks on Mao's handling of concepts', P. 262.

[36]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卷,第1—95页。

[37]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卷,第323—439页。

[38]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卷,第185页。

[39] Schram,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 - Tugn*, PP. 171—4.

[40] 在刊登于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82年春季号的一篇文章中,我指出了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与列宁之间存在着一条连续的路线。列宁与马克思两人都承认农民的革命性,认识到在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农民中的资产阶级部分能够与城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因而无产者农民也就能与城市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对这个主题的较充分的发挥,见我的文章 'The ideology of anti - bolshevism'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April - June, 1982)。

[41]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卷,第1—124页。

[42] 一部极好的列宁论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著作选集,见 *National Liberation, Socialism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关于民族主义的许多相同的材料,可在 *Collected Works* 的第22卷中找到。列宁的策略天才最清楚地显示在他对农民和民族主义二者的革命性质的敏锐鉴别上。列宁精明地掌握与革命民族主义形成联盟的布尔什维克政策,从而把布尔什维克置于这种爆发性的、进步的 and 反帝力量的一边。

[43] 列宁与 M. N. Roy 的论战,见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llected Works*, Vol. 31, PP. 213—63. 列宁的策略天才的另一明证,是他看到布尔什维克联合亚洲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战略必要性。列宁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会议上完成了两件事:(1)他重新指导共产主义革命的扩展从欧洲中心的态势转变为亚洲中心的态势,亚洲成为苏维埃能

够突破它们的资本主义包围圈的地区。(2)他认识到,亚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力量,特别是在与农民起义相联合时。他看到亚洲的民族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削弱着西方资本主义。对第三国际1920年会议的更完整的叙述,见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trans. R. A. Archer(London;New Park Publications, 1977), 2 Vols.

[44]Jane Degra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Oxford: OUP, 1965), Vol. 3, P. 279.

[45][46][47][48]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卷,第330、328、322、328页。

[49]Degra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P. 18—19.

[50]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卷,第328页。

[51]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卷,第206页。

[52]Degra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P. 33—4.

[53]Degra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 36.

[54]Degra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 42.

[55]Degra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 118.

[56]Degra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 186.

[57]Degra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P. 118—119.

[58]Degra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 86.

[59]Degra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 173.

[60]Conrad Brandt, 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 Fairbanks, A Document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London: Allen & Urwin, 1952), PP. 130—1.

[61]Brandt et al., Document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P. 126.

[62]Brandt et al., Document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PP. 229—230.

[63]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77页。

[64]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48页。

[65]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

版,第1卷,第98页。

[66]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49页。

[67]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98页。

[68]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47页。

[69][70][71][72][73]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100—101、97、106、106、106页。

[74][75][76][77][78][79]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69、69、69、50、79、98页。

[80]对毛泽东主义军事战略发展的一篇好的论述,见 Stuart R. Schram, Mao Tse - Tung: Basic Tactics (London: Pall Mall, 1967)。另一篇对毛泽东的军事策略有价值的研究,把毛泽东的战略与中国古代军事指南联系起来,是 Sun Tzu, The Art of War, trans. Samuel B. Griffith (Oxford: Oup, 1963)。

[81] Maurice Meissner 是最早指出毛泽东主义的民粹主义根源的人之一。见他的 'Leninism and Maoism', China Quarterly, xxxv (January - March, 1971), PP. 2-36。关于毛泽东的文献十分浩繁。除了已经提到的著作以外,还有一些别的我所得益的著作。下面的书目并不是详尽无遗的,只是想列出那些我曾从中获益,而且我觉得对读者也有好处的著作,因为它们提供了了解和解释毛泽东主义的主要学派的材料。Peter Binns, 'The Marxist theory of truth', Radical Philosophy, no. 4, 1973; R. P. Bulkeley, 'Mao's philosophy', Radical Philosophy, no. 18, 1977; R. P. Bulkeley, 'A reply to Norman', Radical Philosophy, no. 21, 1978。Jack Gray 是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敏锐的评论员,他代表了赞成毛泽东主义而反对苏联关于中国革命的解释。见他的 Mao Tse - Tung (London: Lutterworth, 1966); 'The Thought of Mao Tse - Tung' in Chinese Communism in Crisis, ed. Jack Gray and Patrick Cavendish (London: Pall Mall, 1968), PP. 47-68; 'The Two Roads', in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ed. Stuart R. Schr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09-58; 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 Daily Lif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Rossana Rossanda, 'Mao's Marxism',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1971), PP.53—81. Rossanda的论文是强有力的。她使人注意毛泽东对意识的理解,和毛泽东如何改变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概念;John Bryan Starr, 'Mao Tse - Tung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theory, ideology and phylacter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April, 1970), PP.149—157; Brantly Wom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hought of Mao Tse - Tung,' in The Logic of Maoism, ed. James Chieh Hsiung (New York; Praeger, 1976), PP.1—36.

[82][83][84][85]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67、124、124—125页。

[86]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卷,第1—183页。

[87]Karl Marx,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未查到中译本,故照附原文——译者注)。

[88]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153页。

[89][90]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186、228页。

[91][92][93]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142、142、153页。

[94]Schram,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 - Tung, P.64.上面我提到, Schram写了大量论中国的东西,我已经在[28]和[81]中涉及他的某些著作。另外,下面的著作都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Mao Tse - Tu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 Wakeman关于毛泽东的著作是一部思想传记,而 Schram的 Mao Tse - Tung 则是权威性的生活—政治叙述。又见 Schram的 'Introduc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载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ed. Stuart R. Schr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这一卷还包括了 Jack Gray 的杰出论文。此外,关于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关系的有价值的见解,可读 Marxism in Asia, ed.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and Stuart R. Schram (London; Penguin, 1969)。这是一部文集, Schram 为它写了一篇很好的导言,选人的文章叙述了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胜利。

[95]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卷,第156页。

[96][97][98]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258、258、257页。

[99]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156页。

[100][101][102][103][104][105][106]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260、260、264、260、259、261、262页。

[107][108][109][110]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276、276、276、276页。

[11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260页。

[112][113][114][115][11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第675、676、676、676、676页。

[11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第733页。

[118][119][120]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279、279、278页。

[121]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183页。

[12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267页。

[123]Schram,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PP.172—173.

[124]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148页。

[125]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126][127][128]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299、304、320—326页。

[129]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

社 1991 年版,第 1 卷,第 252 页。

[130]关于毛泽东的这篇论文的写作起源的正确叙述,见 Knight 的 'Mao Zedong's *On Contradiction*'. Knight 不仅驳斥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写作日期上说谎的意见,而且他有《论辩证唯物主义》的以前未知部分的新的原始资料译文。

[131] Mao Tse - Tung,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Schram,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 - Tung*, P. 288.

[132] Mao,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 188.

[133] Mao,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 189.

[134] Stuart Schram, *Mao Tse - Tung Unrehears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P. 226.

[135] Mao,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P. 187—188.

[136] Mao,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 185.

[137] Mao, *Four Essays on Philosophy*, P. 5.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卷,第 285 页。

[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卷,第 287、284、295 ~ 296、292、291、291、291、291、286、292、286 ~ 287、294、296、296、294、292、292、296、294 页。

[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卷,第 308、308、311、311、318 ~ 319、320、327、327、327、332、332、336 页。

[169] Schram, *Mao Tse - Tung Unrehearsed*, P. 227.

[170] Mao, *Selected works*, Vol. 1V, P. 51.

[171] Mao, *Selected works*, Vol. 1V, P. 172.

[172] Mao, *Selected works*, Vol. 1V, PP. 180—181.

[173]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卷,第 602 页。

[174][175][176]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 卷,第 1469、1472、1469 页。

[177]在写作中国古典哲学对毛泽东的影响这一部分时,有助于我的几

本著作是: I Ching, trans. Raymond Von Ov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1); Hellmut wilhelm, Heaven, Earth and M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Confucius, The Analect of Confucius, trans. Arthur Waley (London: Allen & Unwin, 1938); Lao Tse, Tao te Ching, trans. Arthur Waley (London: Allen & Unwin, 1936)。在关于毛泽东主义思想的道家学说和孔夫子的背景方面,对我也有帮助的是, Wakeman 的 History and Will。关于我查阅过的那些中国古代哲学方面的著作的比较完整的文献目录,见我的文章 'Non - Marxist Elements in the Communism of Mao'。

[178]关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文献是大量的。这里我所列举的著作,尽管它们是深刻的,但不过是关于这个主题的现有资料的一鳞半爪。Richard Bernstein, Praxis and Ac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6)。伯恩斯坦的著作特别有价值,因为它区分了毛泽东的实践概念与威廉·詹姆士、约翰·杜威和让·保尔·萨特的行动或活动性概念。Klaus Hartmann, Die Marxsche Theori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0),这是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最好的研究著作之一。在区分理论、批判与实践方面, Hartmann 叙述得极为明白; John Maguire, Marx's Paris Writings (Dublin: Gill & Macmillan, 1972); Nathan Rotenstreich, Basic Problems of Marx's Philosophy (Indianapolis: Bobbs - Merrill, 1968)。Rotenstreich 大量地依赖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认为这个提纲包含着马克思的实践思想的核心。Rotenstreich 的书很值得一读。

[179]见 Klaus Hartmann 的著作对马克思的批判概念的讨论。

[180]Herbert Marcuse 的著作, Reason and Revolu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2),这本书在任何有关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文献目录中都不能被忽略。

[181]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详尽阐述,可看我的文章 'Non - Marxist Elements in the Communism of Mao'。

[182][183][184][185][186]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225、226、227、225、226 页。

[187][188]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卷,第 797、798 页。

[189]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5 卷,第 269 页。

[190]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5卷,第181页。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各种模式的争论,是适时的重要而热切的。自1949年以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是寻求反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模式。写过有关这种论战的作者是: Charles Bettelheim,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trans. Brian Pe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2 Vols 还有两本 Derek Sawyer 的书,讲到毛泽东与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争论。见 Derek Sawyer, Harvie Ramsey and Philip Corrigan, For Mao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79)。面对毛泽东主义的哲学问题,尤其是毛泽东主义的实践理论,这本书特别有见地。此外,见 Derek Sawyer, Harvie Ramsey, Philip Corriga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这本书着力于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毛泽东主义形式与斯大林主义形式之间的对照。Paul Sweezy 和 Charles Bettelheim 合著的书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中两人的对话也是有趣的。在 Rudolph Bahro 的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中,虽然专门讨论东欧问题,但也有许多涉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地方。在我前面提到的资料中,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Rossana Rossanda 的 'Mao's Marxism'。Rossanda 是意大利的“第二宣言”集团 (Il Manifesto group) 的一个成员,这篇论文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尖锐抨击,对毛泽东试图创立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支持。

[191] Mao Tse - Tung, 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13.

[192] Mao,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 P. 56.

索 引

(英文后面的页码是原英文版的,中文后面的页码是中文版的)

- abstraction 156 - 7, 298, 300 - 1, 310 抽象 33, 112, 187, 264, 374, 424
- actuality 87 - 8 现实 6, 115, 167, 268, 329, 423
- agrarian revolution 350 - 7, 361 土地革命 430, 432, 433, 435, 438, 441
- Ai Ssu ch'i 326 - 36, 368 - 9 艾思奇 412, 413, 414, 415, 417, 418
- atom 105, 107, 116, 273, 276 - 7, 320 原子 16, 129, 346, 405
- attraction - repulsion 88 吸引—排斥 116
- Avenarius, Richard 27, 31, 285 阿芬那留斯 35, 361
- Bacon, Francis 65, 94, 117 - 18, 264, 279 培根 80, 123, 263, 334
- being 129 - 72 存在 10, 109, 165, 237, 326, 402
- being - thought 11, 64, 67 - 8, 97, 120, 298, 367 - 8, 372, 386 存在—思维 14, 466
- Bentham, Jeremy 65 - 6 边沁 83, 84
- Berkeley, Bishop 32, 278 贝克莱 14, 352
- Bernstein, Eduard 26, 28 - 30, 264, 274 伯恩斯坦 1, 2, 9, 334, 515

- Bogdanov, A. A. 27, 30 - 4, 259、波格丹诺夫 30, 34, 35, 39, 40, 42
269 - 78
- Empirio - Monism 269 - 72 《经验一元论》42, 341
- Bolshevism 27, 58, 264, 268 - 310、布尔什维主义 7, 8, 326, 402
320 - 404
- Leninist Bolshevism 258 - 310、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 7、
320 - 404 8, 327, 404
- Stalinist Bolshevism 258, 268 - 310、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
310、320 - 404 7, 8, 326, 410
- bourgeois - democratic revolution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76, 425
336 - 62
- Büchner, Louis 66, 88, 91 毕希纳 65, 116
- Bukharin, Nicholai 52, 284, 322 - 3 布哈林 66, 359, 408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52, 55 《历史唯物主义》48, 66, 67, 70、
71
- capitalism 148 - 60 资本主义 6, 124, 185, 236, 330、
421
- category 109 - 10, 146 - 72, 227 范畴 13, 111, 164, 227, 349, 403
- causality 88, 99, 115 - 16, 127, 139 因果性 116, 210, 377
- 42, 238 - 9, 298 - 9
- chance 87, 88 偶然 20, 114, 234, 407
- chemistry 84, 111 化学 10, 107, 250, 372, 407
- Ch 'en Po - ta 326 - 36 陈伯达 412, 413, 414, 415
- Chiang kai - Shek 58 - 9, 340、蒋介石 74, 75, 429
354, 355
- China 336 - 62 中国 4, 163, 401

-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58、327 中国共产党 73、401
- 404
- Chinese model 334 - 404 中国模式 422
- circulation 147 - 56、184 - 244 循环 131、192、236、331、488
- class struggle 350、355 - 7 阶级斗争 30、340、432
- classical empiricism 10 - 11、120、 古典的经验主义 146
361
- collapse theory 235 - 6、239、245 崩溃理论 295、297
- commodity 188 商品 237、330、497、188
- communism 382 - 3、389、396 - 共产主义 6、156、254、334、402
404
- comparative economic anthropology 比较经济人类学 186、187
146 - 72
- Comte, Auguste 84、106、117、119、 孔德 30、111、209
165
- concept 109、129 - 72、296 - 8、 概念 1、3、10、106、164、228、331、
300 - 10、313 442
- concept - existence 11、64、67 - 8、 概念—实存 14、377、467
99、120、298、373、386
- Confucius 62、374、389 - 97、393 孔子 79、468
- consciousness 98 - 9、265、274 - 意识 3、5、12、109、165、234、325、
5、367、371、395 - 6、399 - 406 403
- consumption 147 - 56 消费 183、234、338、497
- contingency 88 偶然
- contradiction 129 - 72、261 - 3、 矛盾 2、2、10、110、166、264、331、
363 - 7、376 - 82、389 - 96 400
- 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 382 - 对抗性矛盾 478、479、480

- non-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 非对抗性矛盾 478、479、480
382-3
- copy-theory 96-7、277-8、295 摹本论 14、126、350
- corpuscular theory 95、105、115-16 微粒学说 124、149
- correspondence theory 89-90、96 符合论 13、131、461
-9、277、289-90、368
- critique 64、164-5、193、334、392 批判 6、8、125、184、230、326、400
-6
- cultural revolution 402-4 文化大革命 443、502、503、504、505
- Darwin, Charles 33、93、169、260
-3、262 达尔文 17、114、263、329、443
- Deborin, Abram 257、282、318、320-36、368-9 德波林 325、402
- democratic centralism 361-2、385、389 民主集中制 444、445、454、455、482、486
- Democritus 63-4、273、275-6 德谟克利特 80、346
- Descartes, René 66、97、99、105、115-16、119、263-4、320 笛卡尔 22、126、345、405
- determination 129-72 规定 24、110、165、266、339、440
- dialectic 1、2、10、24、87-122、128 辩证法 1、1、8、107、163、228、-172、265-7、272-310、319、325、400
328-404
- dialectic of action 265-6、275、304、319、387-96 行动辩证法 2、2、335、403
- dialectic of nature 10、19、21、100-5、283、286-310 自然辩证法 2、13、108、346、407

- dialectic of revolutionary strategy 革命策略的辩证法
317
- dictatorship 340 - 2, 361, 385 专政 61, 358, 427
- Dietzgen, Joseph 35 - 6 狄慈根 8, 44, 45, 46, 98, 99
- distribution 147 - 56 分配 183, 296, 434
- ECCI 336 - 6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425, 426, 427
- emergent evolutionism 84, 92 - 3, 116, 168, 322 突生进化论 111, 425
- Engelism 2, 7, 26, 40 - 4, 52 - 3, 56 - 7, 104 - 5, 107 - 22, 194, 286, 293 恩格斯主义 3, 9, 403
- Engels, Friedrich 7 - 27, 40 - 4, 81 - 127, 179 - 245, 257 - 370, 366 - 8 恩格斯 1, 8, 106, 162, 227, 326, 400
- Anti - Dühring 22 - 6, 61 - 6, 259, 273, 275, 277, 283, 329, 366, 369 《反杜林论》 8, 8, 108, 328, 416
- Dialectics of Nature 82 - 9, 91 - 7, 106 - 119, 321 - 36, 366 - 8 《自然辩证法》 16, 108, 346, 407
-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82, 94, 117, 273, 277, 329 《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译者注) 8, 108, 333, 416
- Ludwig Feuerbach 21, 23, 25, 40 - 1, 82, 91, 96, 263, 273, 277, 279, 329 《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8, 108, 345, 416

- | | |
|--|--------------------------------------|
| Enlightenment 910 - 100 | 启蒙运动 119, 345 |
| Epicurius 46, 63 - 4, 273 | 伊壁鸠鲁 59, 346, 412 |
| epistemology 83, 89 - 90, 96 - 9, 156 - 72, 286 - 310, 303 - 10, 386 | 认识论 2, 13, 109, 169, 264, 334, 406 |
| essence 129 - 72, 290 - 1 | 本质 5, 5, 21, 109, 165, 228, 345, 423 |
| essence - appearance 129 - 72 | 本质—现象 115, 166, 315, 423 |
| essential discontinuity 2, 3 | 本质突变性 |
| essential unanimity 2, 3 | 本质一致性 |
| evolutionary determinism 122 | 进化决定论 |
| feudalism 336 - 62 | 封建主义 6, 156, 223, 425 |
| Feuerbach, Ludwig 51, 65, 263, 279 - 83 | 费尔巴哈 5, 5, 108, 333, 415 |
| form - content 129 - 72 | 形式—内容 166, 315 |
| Fourier, Charles 65 | 傅立叶 83 |
| Galileo, Galilei 115 - 16 | 伽利略 120, 148 |
| Gorter, Herman 27, 34, 37 - 8 | 郭尔特 35, 44, 45, 48, 49, 50, |
| Gramsci, Antonio 27, 45 - 56, 283 - 4 | 葛兰西 1, 35, 325, 415 |
| guerilla warfare 59 - 62, 340 - 62 | 游击战争 1, 35, 429 |
| guide to action 332 - 6, 389 | 行动指南 429, 430, 442, 447, 453, 502 |
| Haeckel, Ernst 51, 88, 97 | 海克尔 65, 116, 345 |
| Hegel, G. W. F. 12 - 19, 24 - 7, 63 - 9, 87 - 122, 127 - 172, 257 | 黑格尔 1, 10, 107, 163, 232, 325, 400 |

- 310, 317 - 36
- Encyclopedia 85 - 6, 88, 102 - 3, 257, 284, 289, 297 《哲学全书》22, 112, 325
- History of Philosophy 63, 101, 117, 257, 284, 295 《哲学史》80, 131, 150, 360
- Phenomenology of Mind 106, 128, 136 - 7, 144 - 5, 287 - 8, 304 《精神现象学》171, 138, 165, 329
- Philosophy of History 101, 284 《历史哲学》131, 196, 359
- Philosophy of Mind 56, 115 《精神哲学》133, 148
- Philosophy of Nature 64, 81, 84, 100 - 13, 128 - 9, 131 《自然哲学》81, 107
- Philosophy of Right 56, 145 《法哲学》71, 184
- Science of Logic 128 - 56, 287 - 8, 290 - 1 《逻辑学》21, 107, 164, 268, 325
- Helmholtz, Hermann 108, 110, 119 赫尔姆霍兹 142, 164, 268, 325
- Helvetius Claude 65 - 6, 264 爱尔维修 53, 334
- Heracitus 42 - 3, 46, 93 - 4, 107 - 8, 122, 293 - 309 赫拉克利特 26, 122, 371, 482
- historical determinism 238 - 9, 242 - 3, 245, 267 历史决定论 471
- history 121 - 2, 266 历史 1, 10, 108, 162, 229, 325, 401
- Hume, David 37, 94, 96 - 9, 115 - 6, 136 - 7, 141, 167 - 8, 170, 278, 368 休谟 14, 123, 174, 344

- idealism 100、275、280、299、366 唯心主义 2、14、108、187、328、401
- identity 85、86、109 - 12、132 同一性 112、169、370、476
- ideology 394 - 404 意识形态 7、15、196、263、340、412
- imperialism 336 - 62 帝国主义 6、76、359、417
- industrialization 396 - 404 工业化 8、411
- intelligentsia 352 - 3 知识分子 8、7、410
- intransitive 8、9、68、97、120 - 1、298 非转化的 11、127、377、464
- Japan 353 - 6、361、365 日本 75、413
- Kant, Immanuel 12、18、93 - 6、116、136 - 7、141 - 3、274、278、285、367 康德 9、121、174、346、460
- General Na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Heavens 93 《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17、121
- Kautsky, Karl 20 - 8、47 考茨基 8、247、355、404
- Kiangsi Soviets 58 - 9、340 - 1、344 - 5、356 - 9、361 江西苏维埃 74、430
- Korsch, Karl 27、45 - 56、284 科尔施 2、35、325、405
- Karl Kautsky und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47 《考茨基与唯物史观》2、35、325、405
- Karl Marx 48 《卡尔·马克思》62
-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47、284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60、61、62
- Kuomintang 327、340、355 国民党 74、412

- labor 188 劳动 2、10、154、184、237、335
- Labriola, Antonio 49 - 50 拉布里奥拉 51、63、64、101、102
- Lange, Frederick Albert 66 - 94 朗格 22、123
- 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 94 《唯物主义史》52、123
- law 规律 2、10、107、173、249、337、403
- interpretation of opposites 81 - 对立面的解释
 8、107 - 22、302 - 7、366 - 7
-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 81 - 2、否定之否定 114、416
 107 - 22、366 - 7
- quantity and quality 81 - 8、107 量与质 114、416
 - 22、168、302 - 6
- left - wing Hegelianism 91 左翼黑格尔主义 114、416
- 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65、莱布尼兹 83、114、333、416
91、263
- Lenin, N. 5 - 7、27 - 8、33 - 4、38 列宁 1、7、8、114、163、315、325、
- 9、43 - 5、257 - 310、317 - 400
404
- Characterization of Economic 《评经济浪漫主义》331、332、393
 Romanticism 262
- Conspectus of Hegel's Science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of Logic 293 - 9、306 - 7 325、407、
- Conspectus of the Holy Family 《〈神圣家族〉摘要》329、333、
 260、263、267 338、390
-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330、
 Russia 261 - 2、281 331、355、393
- Karl Marx 287 《卡尔·马克思》356

- Left - 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38, 44, 333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48, 421
- Marxism and Revisionism 274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347、397
- Materialism and Empirio - Criticism 33 - 4, 43 - 52, 257 - 370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8、326、402
- Philosophical Notebooks 38, 43 - 4, 61 - 2, 257 - 310, 318 - 22 《哲学笔记》 8, 375, 325, 400
- Significance of Militant Materialism 310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392、400
- State and Revolution 383 《国家与革命》 479
- Three Sources and Three Component Parts of Marxism 282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9, 356, 479
- What is to be done 264 - , 284 - 5, 401 - 02 《怎么办?》 326, 443
- 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281 《什么是“人民之友”?》 328、329, 333, 339, 355, 393
- Leucippus 43 留基伯 55, 80
- Li Li - San 58, 326, 344, 349, 350 李立三 74, 413
- Locke, John 65, 66, 94, 115 - 16, 118, 263 - 4, 279, 368 洛克 14, 123, 198, 334, 461
- Long March 58 - 62 长征 74, 412
- Lukacs, Georg 27, 45 - 56, 257, 283 - 4, 324 卢卡奇 1, 2, 35, 425, 318, 405
- Ästhetik 53 - 4 《美学》 68, 103
- Der Junge Hegel 53 - 4, 257, 《青年黑格尔》 68, 326

- 309
-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53 - 5, 257, 283 《历史与阶级意识》57、325、409
- Über Bakharins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55 《关于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71
-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53 - 4, 257 - 8 《社会存在的本体论》68、103
- Lyell, Charles 93 赖尔 17、121
- Mach, Ernst 27、31 - 2, 269, 271 - 8, 285 马赫 340
- Mao Tse - Tung 57 - 62, 317, 404 毛泽东 1、72、163、401、516
-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347 - 52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438、439、441、510、511
-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 354 《苏联经济学评论》446
- Introducing the Communist 365 《〈共产党人〉发刊词》458、481、514
- New Democratic Constitution-ism 360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453、513
-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60, 360 《论联合政府》77、104、453
- On Contradiction 335 - 69, 363 - 6 《矛盾论》78、415
- On Dialectic Materialism 329 《论辩证唯物主义》78、415
- On New Democracy 360 《新民主主义论》76、437
- On Practice 61 - 2, 329 《实践论》78、415
- On Protracted War 351 《论持久战》104、442
- 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385 《论人民民主专政》481、485、514

- On the Tactics of Fighting Japanese Imperialism 59、353 - 5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76、445
- Oppose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 61 《反对党八股》 78、480
- Rectify the Party's Style of Work 61 《整顿党的作风》 78、492
- Reform Our Study 61 《改造我们的学习》 78、492
- 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Methods of Leadership 60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77、502
- Strategic Problems in the Anti-Japanese 351、363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04、442
- Strategic Problems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59、35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76、445
- Strategic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353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策略问题》
- Strive to Win Over Millions... 59、353、361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75、445
-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6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78、504、104
-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60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60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76、77、104
- The Struggle in the Chingkang 347 - 52 《井冈山的斗争》 438、441、443、510、511、512
- The Task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59、356 - 8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76、77、104
- We must attend to Economic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 Work 347 - 52
- Why can china's Red Political Power Exist 347 - 52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437、438、439、510、511
- Marx, Karl 7 - 12、62 - 9、105 - 7、127 - 72、179 - 45、257 - 310、318 - 19 马克思 1、8、106、162、325、400
- Communist Manifesto 328 - 9 《共产党宣言》9、414
-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46、151、262 《政治经济学批判》28、186、312、332
- Das Kapital 127 - 8、155、164 - 72、179 - 245、259、267、305 《资本论》1、9、117、163、227、328
-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emocritean and Epicurean... 65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80、82、104
-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1844 144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0、184、335、1090
- Grundrisse 67、145 - 72、28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55
- Notes on Adolph Wagner 155 《对阿道夫·瓦格纳的评论》197
- The German Ideology 67、154、287、399 - 400 《德意志意识形态》196、355、498
- The Holy Family 263 《神圣家族》82、263、333
-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95、400 《剩余价值理论》9、124、247、1099
- Theses of Feuerbach 57、66、26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62、138、336、415
- mass 352 - 3、361、396 - 404 群众 43、434

- materialism 4, 5, 8 - 12, 24 - 5, 63 唯物主义 1, 6, 8, 17, 106, 164, - 9, 91 - 5, 275 - 310, 366 - 263, 326
70
- dialectical 25 - 8, 45 - 56, 81 - 辩证唯物主义 1, 2, 8, 150, 212, 122, 282 - 3, 286 - 310 326, 402
- eighteenth century 41, 91 - 5, 18 世纪唯物主义 14, 125, 333
99 - 100, 212 - 13, 263 - 4, 272
- English 65 英国唯物主义
- French 41, 51, 65, 95 - 6 法国唯物主义 17, 125, 334
- historical 2, 7, 27 - 8, 62 - 9, 历史唯物主义 1, 10, 120, 164, 91, 168, 366 - 76, 386 - 95 337, 402
- Ionian 93 - 4 爱奥尼亚唯物主义
- mechanical 24, 27, 84 - 5, 92 - 机械唯物主义 6, 31, 111, 327, 3, 212 - 13, 320 - 36, 366 - 70 402
- metaphysical 25, 65, 93, 120,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41, 347, 472
257 - 8, 272 - 6, 279
- monism 40, 110, 112, 117, 120, 一元论唯物主义
257 - 8, 266 - 70
- philosophic 275, 279, 281 - 2, 哲学唯物主义 9, 348, 406
285, 310, 366 - 70
- reductive 12, 84, 96 还原的唯物主义 15, 111, 470
- sensuous 65 - 6, 263 - 4 感性唯物主义 83, 84, 85
- seventeenth century 116, 263 - 4 17 世纪唯物主义
- mathematics 105 - 6 数学 4, 30, 120, 228, 353, 409
- matter 17, 19, 104 - 5, 112, 115, 物质 3, 10, 107, 165, 228, 334, 117, 264, 267, 276, 278, 299, 405
366 - 7

- Mattick, Paul 46
 measure 111 - 13
 mediation 110, 129 - 72
 Menshevism 268, 271, 324
 method of explanation 155 - 72
 method of social inquiry 159 - 72, 335 - 56, 363 - 4
 mind - dependent 68, 266
 mind - independent 68, 158, 265 - 6, 301
 Mitin, M. 318, 320 - 36, 368 - 9, 376
 Moleschott, Jacob 66, 88, 91
 Mondolfo, Rodolfo 27, 50
 Il Materialismo Storico in Federico Engels 50, 283
 motion 17, 84 - 7, 104 - 5, 108, 110 - 11, 115, 366 - 7
 Narodnik 259 - 68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336 - 63
 nationalism 336 - 62
 natural laws 116, 169 - 72, 280, 291
 natural science 69, 90 - 1
 naturalism 261 - 3, 267
 nature 27, 63, 101 - 4, 116
 马蒂克 59
 度 1, 10, 110, 162, 227, 331, 403
 中介 24, 131, 163, 274, 336, 402
 孟什维主义 339
 解释方法 166, 345
 社会研究方法 5, 212, 417
 依赖于精神 51, 221, 459
 独立于精神 170, 336, 459
 米丁 402, 404, 407, 410, 411, 412
 莫勒斯霍特 84, 116
 蒙多尔福 35, 64, 65, 67, 101, 10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
 主义》64
 运动 3, 10, 110, 165, 238, 330, 401
 民粹派 328, 502
 民族解放运动 426, 427, 430, 433, 437
 民族主义 73, 425
 自然规律 11, 118, 213, 358, 491
 自然科学 11, 107, 185, 263, 352, 405
 自然主义
 自然界、自然

- necessity 88, 121, 137 - 8, 139 - 43, 291, 298 必然 23, 107, 165, 229, 332, 401
- negation 107 - 8, 129 - 72 否定 3, 10, 107, 166, 298, 328, 410
- Neo - Kantianism 26, 28, 274 新康德主义 9, 346
- New Education Movement 326 - 36 新教育运动 412, 413
- Newton, Isaac 92, 105, 113, 115 - 17, 137, 262, 272, 279 牛顿 40, 120, 175, 332
- Anton Pannekoek 35 潘涅库克 35, 359
- party 352 - 3, 362, 385, 402 - 4 党 5, 9, 326, 401
- peasants 60, 336 - 62 农民 5, 73, 237, 410
- peoples republic 357, 360 - 1 人民共和国 448, 449, 450, 452
- philosophy 69, 102 - 3, 106 - 7, 267 - 8, 280, 310, 319 - 36 哲学 1, 5, 8, 106, 162, 309, 325, 400, 516
- natural philosophy 8, 96, 100, 105, 117, 120 自然哲学 2, 10, 107, 162, 337, 403
- philosophy of nature 8, 10, 12, 21, 68, 85, 95, 100 - 22, 306, 385 自然哲学 2, 10, 107, 162, 337, 403
- philosophy of science 68, 83, 118, 120, 306, 386 - 7 科学哲学 11, 109, 356, 482
-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69, 267, 279, 281 - 3, 309, 393 哲学人类学
- physics 7, 66 - 7, 105 - 6, 110 - 12, 115 - 16, 272 - 9, 281 - 3 物理学 10, 108, 266, 401
- plekhanov, Georgii 39 - 44, 258 - 9, 262 - 9, 277 - 5, 302 - 3 普列汉诺夫 8, 108, 266, 327, 401
- populism 346, 351 - 3, 361 民粹主义 29, 250, 328, 435

- positivism 84、90106、119 - 20、168、298 实证主义 50、111、162、254、405
- possibility 88、165 - 7、172 可能性 70、115、170、229、327
- pragmatism 12、84 - 90、96 - 8、120 - 1、280、300、371 实用主义 14、118、354、405
- praxis 12、45、64 - 5、120 - 1、265、266、309 - 10、370 - 6、386 - 95 实践 1、2、15、154、184、335、403、516
- presupposition 160、163 - 7、172、188、213、227、238 预想,假定
- problem of transition 396 - 404 过渡的问题
- production 145 - 61、56 生产 2、2、10、148、164、230、423、330、423
- proletarian hegemony 341 - 7、358 - 9 无产阶级领导权 425、428、423、431、436
- proletariat 280、336 - 62 无产阶级 34、117、331、411
- quantitative change 107 - 13、121 - 2 量的变化 32、135、185、269
- radical empiricism 90、118 彻底的经验主义 118
- realism 8、25 - 6、97、106、277、282、286、296、299、366 - 70 实在论 5、11、126、201、350、406
- reflection 97、132 - 3、278、296 - 7、299、306、367 反映 3、10、115、170、233、406
- regression 159、163 - 7、172 倒退 68
- revisionism 264、268、274 修正主义 2、2、37、334
- revolution 337 - 62 革命 5、6、8、116、196、237、326、

- Russification 330
 Saint - Simon 85
 Schmidt, Conrad 26, 28
 Schorlemmer, Carl 19 - 20
 science 99, 101, 103, 117, 280, 306
 scientific socialism 27, 260
 Second International 39, 48, 62
 sensation 11, 97, 156, 371
 sensationalism 25, 90, 267, 278 - 9, 295 - 6
 Sinification 57, 62, 317 - 404
 social a priori 97, 106, 117, 157, 371 - 4, 386 - 95, 399 - 404
 socialist revolution 359 - 60, 396 - 404
 Soviet model 326 - 404
 Spinoza, Benedict 65, 108, 263
 Stalin, Joseph 56 - 61, 257 - 9, 284, 304, 317 - 404
The Foundations of Leninism 48, 62
 state 382 - 83, 389
 structural determinism 239 - 40, 244 - 5
 subject - object 68, 114, 146, 158, 319, 391 - 6
 401
 俄国化 79, 413
 圣西门 111
 施密特
 肖莱马 25, 26, 32, 92, 93
 科学 4, 1, 8, 106, 164, 239, 328, 405
 科学社会主义 27, 120, 328
 第二国际 1, 6, 8, 359, 404
 感觉 3, 14, 117, 234, 333, 457
 感觉主义
 中国化 6, 72, 401
 社会先验 3, 13, 127, 199, 465
 社会主义革命 44, 425
 苏联模式 413, 415
 斯宾诺莎 31, 115, 170, 333
 斯大林 5, 8, 6, 16, 326, 402, 516
 《列宁主义基础》 62, 416
 国家 5, 17, 246, 357, 402
 结构决定论
 主体 - 客体 45, 196, 403, 404, 489

- syllogism 87, 101 - 4, 109 - 11, 三段论 24, 110, 165, 316
 114 - 15, 130 - 72, 291 - 4
- tactics 333 - 62 战术, 策略
-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118, 技术决定论 155, 464, 483
 121, 386
- theory 265 - 6, 386 - 9, 390 - 6 理论 1, 8, 114, 169, 230, 326,
 403, 516
- theory of knowledge 9 - 12, 67 认识论 2, 13, 109, 169, 264, 334,
 - 9, 156 - 72, 276 - 310, 310 406
 - 76
- theory - praxis 319, 333 - 6, 363 理论—实践 336, 403
 - 4, 391 - 6
- Third International 43, 58 - 67, 326 第三国际 49, 425
 - 62
- Third World Revolution 336 - 404 第三世界革命 424
- transitive 8, 9, 68, 120 - 1, 298 转化的 11, 127, 191, 277, 371,
 464
- Tsunyi Conference 59, 342 遵义会议 75, 414
- Twenty - eight Bolsheviks 58, 326,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74, 75
 344, 355
- understanding 98 - 9 知性 45, 113, 364
- United Front 60, 342, 349, 355 - 8 统一战线 75, 432
- universal - particular 129 - 72, 291 普遍—特殊 166, 368
 - 3
- vanguard 385, 389, 402 - 4 先锋队 337, 443
- vitalism 26 - 7, 30, 269 生机论 30, 124, 338
- Vogt 51, 66, 88, 91 福格特 116
- Wang Ming 326 - 8, 344 - 5, 355, 王明 74, 412

- 384
- Wayaopao 60、328、333 - 4、347、 瓦窑堡 76、414
355
- whole - parts 129 - 72 整体一部分
- Yeh Ching 326 - 36 叶青 412、413
- Yenan 58 - 62、326 - 36、342、365 延安 1、74、401
- 6、368、402
- ying - yang 57、369、385 - 6、389 阴阳 72、508
- 91

译后记

在此书即将奉献于我国广大读者的时候，我想简要地谈谈书的内容，我翻译它的缘由和争取出版的经过。

近些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特别是在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中，为了了解国际研究动态和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和对照，我努力将教学、科研和翻译结合起来，在推进教学、开展科研的同时，陆续翻译了西方学者的某些著作。《辩证法内部对话》是其中篇幅较大、着力较多的一本。作者诺曼·莱文，1965年在美国纽约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现任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历史学教授。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译甚丰。

《辩证法内部对话》是一本谈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的著作，它叙述和评论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历程。作者自称是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他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马克思创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创立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二者是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和应用，书中着重分析了这种差异和分歧的由来、方法论基础，以及它在20世纪历史中的命运。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辩证法内部对话”，一般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等方面的分歧，叙述了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他逝世后遇到的两次挑战性的浪潮，叙述了辩证唯物主义随后发生的演变。第二章“辩证法的毁灭”，着重论述了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

关系，就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和其他范畴进行两者的对照，认为自然、物质的本体论使恩格斯将自然科学与辩证法进行综合，因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发生曲解和“毁坏”。第三章“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基础”，论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应用黑格尔方法上的区别，认为马克思没有接受黑格尔的任何形而上学，只是把辩证法看作一种分析社会结构的方法，恩格斯则接受了黑格尔提供的某种形而上学，因而把辩证法视为构成存在的规律的东西，视为应用这些本体论的规律来解释物理世界的过程。第四章“走向《资本论》的重建”，详细对照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的马克思的原稿与恩格斯编定的版本，试图说明恩格斯对马克思原文的实际改动的状况和程度，揭示这种改动的方式和意义。第五章“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叙述了列宁活动的三个时期，分析了列宁的两部主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之间的关系，认为前者主要是对普列汉诺夫准则的一种捍卫，而后者则形成了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基础，列宁终于在某些方面突破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传统。第六章“辩证法与延安道路”，阐述了毛泽东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模式逐步决裂，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于中国历史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毛泽东突破布尔什维主义模式的几个层次，试图说明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源和主要方面。总之，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和系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出现了重大分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社会分析方法和人类行动的指南，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则不仅是一种本体论的体系，而且是一种可以还原的体系。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恩格斯逝世之后，延续到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之中。

作者的这种观点，在西方的某些思潮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的立论基础，与我们显然有原则分歧。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

创立的。在这一创建宏伟大厦的事业中，虽然恩格斯曾多次声言自己只是充当“第二小提琴手”，但他们始终是紧密合作、取长补短，因而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尽管由于个人的实践和阅历、理论专长和思维方式的某些不同，在他们的理论与写作活动中，自然会显示出研究领域、侧重方面和行文特色等若干方面的差异，但他们所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运用辩证法的结果，在这里，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是高度统一、不可分离的。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内容的扩展和丰富，并不是建立与历史唯物主义有重大分歧的另一种体系。此外，作者对列宁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评述，特别是对斯大林思想的基本否定，也有不少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应当注意澄清的。

为了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出现的若干重大争论问题，认真辨析书中的某些观点，我们特请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楠森教授写了一篇评介性的序言，供读者阅读、研究时参考。同时，我们也充分相信广大读者自身的阅读水平和分辨能力。此外，原作者也应约寄来了《致中国读者》一文，我们一并译出，编入书内，以飨读者。

为方便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原书注释中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我们都将它们改为最新的中文版本。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所发现的原书有关时间、地点、人物等方面的差错，也分别以译者注和编者注的形式做了订正。此外，为便于读者的学习和研究，我们不仅照排了原英文版的索引页码，还用计算机检排了中文版的索引页码。

总的说来，《辩证法内部对话》是一本需要批判地阅读和研究的著作，作者的观点中显然带有某些西方人士不可避免的偏见。但是，作者又终究是一位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此书基本上

是一本学术性研究的著作。作者的立论，基本上是靠他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从一定的角度和意义上看，这种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如此详尽地分析和叙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史，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也并不多见。因此，书中包含的材料和观点，我感到都有值得参考、借鉴和认真批判的方面。这就是我翻译此书的主要缘由。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难道需要了解和参考西方学者的某些带有“偏见”性的著作吗？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的确，有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发表见解、写文章，甚至写大部头专著时，只是凭藉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或选集，或者只是参考国内学者所写的著作、文章和所编的资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只需要了解正面的观点，不需要了解反面的观点；只需要了解国内学术界的情况，不需要把握国际性思潮的动态；或者只注意与自己的观点相一致的资料，而不注意与自己的观点相分歧、有异议的资料。这种对待研究工作的视域和态度，实际上未免偏执，容易导向狭窄、贫乏的境地。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学说，本来就是国际性的开放的思潮，它的丰富与发展，既要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又不能局限于一国一地或一个方面的理解。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是不怕批评的，而且它正是需要在不同观点的批评、比较和对照中获得鉴别与发展。许多年来，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着某种直线性和单线性的思维模式。直线性，就是只看到理论上的一个接一个的贡献和发展，基本上看不到历史的局限或理论的失误，看不到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起伏和转折；单线性，就是只看到一条传统观念上的发展线索，基本上看不到不同民族的不同思想的发展脉络。这样，就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进程的曲折性和发展途径的多样性，这就没有把辩证法运用于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本身的研究，因而难以科学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真貌。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国际思潮争议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严肃回答某些西方学者的诘难，为了深入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思想的总体上完整一致的同时，也不应当否认或回避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某些思想转折和差别，而应当通过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等方面作出合理的说明。在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或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著述中，在批评西方某些学者制造“对立”的观点时，诺曼·莱文的论述常被当作典型材料而引用，但被引用的，往往只是零散的词句，从中难以窥视其全貌，因而批判也有失于简单的方面。

鉴于以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我更加深切地感到翻译《辩证法内部对话》全书的必要性。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就作了翻译的准备。原书最初出版于1984年，我在1987年读到它，1988年动手翻译。白天，我的教学、科研工作较忙，还有不少杂事，只能在晚上挤出时间作翻译，大致每晚翻译一二页，时常因事而中断，但我坚持不懈、集腋成裘，又幸得北京大学英语系讲师、在职博士生邹溱和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哲学教授黄振定的密切合作，于1990年译出初稿，经过认真校阅、修改，于1991年方告完成。全书第一章由邹溱译，第二、五、六章和索引等附录部分由张翼星译，第三、四章由黄振定译。黄振定曾校阅大部分译稿，郑志宁、张翼星曾校阅部分译稿，最后由张翼星两次通读，最后定稿。在校阅和誊写稿件的过程中，北京大学英语系王玲同志和她的年逾花甲的母亲，也帮忙作了不少工作。在这里，我向以上我的合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译稿完成后，我即多方联系出版，但由于种种难以说清的原因，未能如愿以偿。后寄至海外的一家出版公司，竟被搁置五年之久，原订的出版合同成了一纸空文。直到1996年夏，译稿才

回到我的手中。在此期间，第五章的一部分内容曾分别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第100期专号、《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53、54辑，并曾收入《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一书的“附篇”部分；第六章的一小部分内容曾摘要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1、3期。这些译著的片断发表后，我曾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希望看到译著的全部内容，要求全书尽快出版。

1996年8月在山东省日照市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我与云南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杨云宝编审相识，告以书稿的内容和特点，他颇为重视。随后他于1996年11月来北京参加会议时又认真阅读了译稿，提出了完善此稿和促成出版的意见。我们分别加紧工作，配合默契，终于使此书尽快地得以付梓出版。在此书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时候，我倍觉苦尽甘来，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我的若干著译的遭遇，往往与我个人的经历相仿，命途多舛，但又终有幸遇或略有所成，这就稍可告慰于哺育、指导、帮助过我的父母、师长和亲友了。至于译文中的缺点和错误，因学识和文字水平所限，在所难免，尚望海内外学者和广大读者多予指正。

张翼星谨识

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1997年2月21日

（农历丁丑年元宵节）